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 中共名人在廣東

ZHONGGONG MINGREN ZAI GUANGDONG

## 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人物在这里运筹帷幄、叱咤风云

广东，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六个地区之一，中国大革命的策源地和中心

中共『三大』、海陆丰农民运动、省港大罢工、东江纵队……

一个个惊天动地的事件和闪光的名字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 中共名人在广东

ZHONGGONG MINGREN ZAI GUANGDONG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名人在广东/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6
ISBN 978-7-218-07175-6

Ⅰ. ①中… Ⅱ. ①中… Ⅲ.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史料—广东省 ②中国共产党—人物—列传 Ⅳ. ①D235.65②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0764 号

**中共名人在广东**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金炳亮

责任编辑：卢雪华 曾玉寒
封面设计：李桢涛
责任技编：周 杰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 话：（020）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020）83780199
网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书 号：ISBN 978-7-218-07175-6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40.5 插 页：2 字 数：800 千字
版 次：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9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83790604 83791487 邮购：（020）83781421

# 编　委　会


**编委会主任：** 陈俊凤

**编委会副主任：** 陈弘君　杨汉卿　李淼翔

**编 委 会 成 员：** 陈俊凤　陈弘君　杨汉卿
李淼翔　王国梁　游慧冰

**主　　编：** 王国梁

**副 主 编：** 游慧冰　张丽红

**编　　辑：** 郑家雄

# 序　言

在举国欢庆建党90周年之际，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和广东党史工作者经过近两年的辛勤劳动，终于成功地编写出版了这部《中共名人在广东》党史著作。这部书以人物的角度，反映了我党90年的战斗历程和再现了我党一批老一辈革命家和先烈的风貌，以及他们关心、爱护、支持广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动故事，对当前学习党史、资政育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历代对外开放的主要窗口，在近现代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广东，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舞台，中国有无数的革命者和精英在这里大显身手，演唱出许多扣人心弦的壮歌，推动着大中国的历史进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广东是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六个地区之一，是中国大革命的策源地和中心。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苏兆征、彭湃……党的一批创始人和领袖人物就在这里运筹帷幄、叱咤风云，推动革命车轮滚滚向前。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并作出国共合作的决策、海陆丰农民运动点燃了中国农民运动耀眼的星火、共产党人主持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省港大罢工、广东工农武装起义、中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府、东江革命根据地、红旗不倒的琼崖革命根据地、华南敌后抗日战场和东江纵队……一个个惊天动地的事件和闪光的名字，谱写了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的重要篇章，彪炳千秋。

全国解放后，广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重要成就，叶剑英、陶铸等一批领导人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上创造了许多宝贵经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常常到广东指导工作，总结经验，召开会议，指导全国的革命和建设。广东是改革开放的窗口和前沿阵地。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的领导人为培育、扶持广东这位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的排头兵，关键时刻都亲临广东及时指导、考察，把广东的经验总结升华，指导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以习仲勋、任仲夷等为代表的广东党的地方领导人和党组织不负中央重托，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创办经济特区，勇于探索，勇于拼搏，先走一步，取得了巨大成就，竖立起一面鲜艳的旗帜。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两次南方视察的重要讲话，成为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在广东首次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在广东首次提出的科学发展观都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经典理论。

回首建党90周年，广东大地涌现了一大批中国共产党的精英人物，他们有的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浴血奋战、英勇献身，谱写了一曲曲悲壮之歌；有的成为中共的领袖人物，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出谋划策，功绩卓著。同时，由于广东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政治地位，广东也成为党的领导人特别关注的地区，他们为总结经验、酝酿重要决策，大都会莅临广东考察调研，听取广东领导人和人民群众的意见，然后通过理论升华，成为指导全国大局的重要理论和思想。在90年的建党历史中，就有500多名中共领导人和名人要人在广东战斗、工作、生活、考察过。他们大多是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立下了丰功伟绩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道德文章堪为师表，文韬武略出类拔萃，优良作风足以效法弘扬，革命精神足以激励千秋万代。

由于篇幅所限，本书收集了80多位主要的中共名人。该书采用史学与文学相结合、以人带事的写法，通过生动形象的描述，介绍了历代领导人在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和重大事件上在广东的决策过程，展现他们的胆略、气魄和智慧，为我们新一代的共产党执政者提供历史的借鉴，对我们今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该书通过一个个感人的故事，热情讴歌我党为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讴歌革命先烈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党和人民建立的光辉业绩，展现我党建党90周年来重要领导人和先烈在广东的风采，弘扬他们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以他们感人事迹和崇高品德教育人，相信广大读者，特别是广大党员干部、青少年学生一定能够从本书中感受到革命先辈的崇高思想境界，领悟革命先辈创业的艰辛，也知道我们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来之不易，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烈用头颅、鲜血、智慧和辛勤汗水换来的，从而更加珍惜今天安定的幸福生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二〇一一年五月六日

# 目　录

序言 …… 陈俊凤（001）

## 前辈风采篇

毛泽东　在广州农讲所的岁月 …… 洪　霓（003）
在南雄的足迹 …… 肖　锋（012）
八次视察广州逸闻 …… 张丽红（020）
刘少奇　真知灼见明眼人 …… 彭建新（028）
周恩来　建国前在广东六次遇险 …… 陈永红（035）
大革命时期在潮汕 …… 刘庆和（044）
视察新会纪实 …… 杨汉卿（052）
朱　德　茂芝星火耀征程 …… 姚尚睦　苏丽珊（061）
羊城兰圃寄情思 …… 关相生（069）
陈独秀　创党活动在广州 …… 刘子健（072）
邓中夏　他领导了震惊世界的省港大罢工 …… 杨苗丽（080）
谭平山　跌宕人生终不悔 …… 高宏的（088）
蔡和森　寻党于羊城　喋血于羊城 …… 魏法谱（097）
瞿秋白　与广东的不解之缘 …… 苗体君（104）
李立三　四到广东，彰显杰出的领导才能 …… 魏法谱（110）
陈延年　陈独秀长子，“开疆辟土的拖拉机” …… 陈永红（116）
彭　湃　中国农运大王的壮丽人生 …… 谢　涛（123）
张太雷　壮烈牺牲的广州起义总指挥 …… 吴志菲（131）
恽代英　广州苏维埃秘书长 …… 胡提春（136）

**张闻天** 肇庆“流放”记 …… 陈立平（143）
**杨　殷** 铁汉斗“田鸡” …… 郭昉凌（154）
**苏兆征** 以心换心情谊长 …… 禤倩红（160）
**杨匏安** 华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 刘利亚（167）
**叶　挺** 毛泽东曾说叶挺完全可以授元帅衔 …… 官丽珍（174）
**邓　发** 机智勇敢的工人领袖 …… 李慧敏（181）
**阮啸仙** 阮誉传岭表 …… 陈其明（188）
**萧楚女** “工农兵中传播马列主义的标兵” …… 魏雅丽（197）
**董必武** “我的作用就是坐在那儿！” …… 游慧冰（205）
**彭德怀** 彭大将军激战粤北佳话 …… 李秀珍　肖　锋（213）
**陈　毅** 难忘岁月谱写《梅岭三章》 …… 肖　锋　肖燕明（219）
**徐向前** 元帅危难见英豪 …… 王宋斌（227）
**聂荣臻** 元帅初起与广东革命的风雨沉浮 …… 孙莉娜（233）
**叶剑英** 与名人要人的故事 …… 黄子云（241）
**陶　铸** 南粤执政十五年的第一书记 …… 王国梁（251）
逸闻五则 …… 江　风（259）
**李富春** 横刀立马撑危局 …… 孙莉娜（268）
**罗　明** “罗明路线”让他名扬党内外 …… 余　敏（277）
**邓颖超** “新娘子”与周恩来在粤海风雨泛舟 …… 张启良　赵金地（283）
**王　震** 名副其实的“实干家” …… 周　珺（290）
**宋庆龄** 孙中山赠联“精诚无间同忧乐，笃爱有缘共此生” …… 欧大军（297）
**熊　雄** 黄埔军校第七任政治部主持人 …… 熊巢生（306）
**刘尔崧** 南粤天空璀璨之星 …… 陈雷刚（313）
**周其鉴** 农民武装运动的先驱 …… 陈万安（321）
**周文雍　陈铁军** 革命者爱情的绝唱 …… 陈永红（328）
**郭沫若** 一代文豪与广东大学 …… 谢东江（335）

**张文彬** 战时省委书记的正气歌 …… 叶文益 刘树新 杨 建（343）
**陈 郁** 他打响了省港大罢工第一炮 …… 林 益（352）
**陈 赓** 东征救蒋，而他只有“一个主义一个党” …… 魏雅丽（362）
**冼星海** 一曲《黄河大合唱》流传千古 …… 王国梁（370）
**许世友** 读书治军有良方 …… 夏明星（378）
**廖承志** 他钟情于南粤家乡热土 …… 蒙光励（386）
**方 方** 南粤大地好男儿 …… 刘子健（395）
**古大存** 他是“带刺的红玫瑰” …… 王国梁（402）
**冯白驹** 引领大军渡海作战的“探照灯” …… 欧大军（411）
**王首道** 他那四化建设的战略眼光令人敬佩 …… 孙铁钟（420）
**李坚真** 毛泽东赞她“不简单” …… 游慧冰（427）

## 改革风云篇

**邓小平** 他十八次莅粤，编创了中国春天的故事 …… 高宏的（439）
**叶剑英** 经济特区的主要奠基者 …… 陈宪宇（448）
**陈 云** 他对南粤别样情 …… 王 莹（455）
**胡耀邦** 1983 年南粤之行 …… 陈雷刚（464）
**江泽民** 甘霖日煦世纪行
——2000 年南粤之行 …… 肖燕明（472）
**杨尚昆** 复出挑重任，南粤立奇功 …… 孙铁钟（479）
**李 鹏** 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 …… 赵艳珍（489）
**朱镕基** 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 师春苗（496）
**谷 牧** 广东人忘不了“总工程师” …… 罗木生（503）
**乔 石** 希望把特区史“写”得更好 …… 王天海 郑惠玉（512）
**李岚清** 广东应走在全国前列 …… 赵东辉（518）
**刘华清** 在深圳为驻港部队送行 …… 刘四年 罗玉文 贾昭全（5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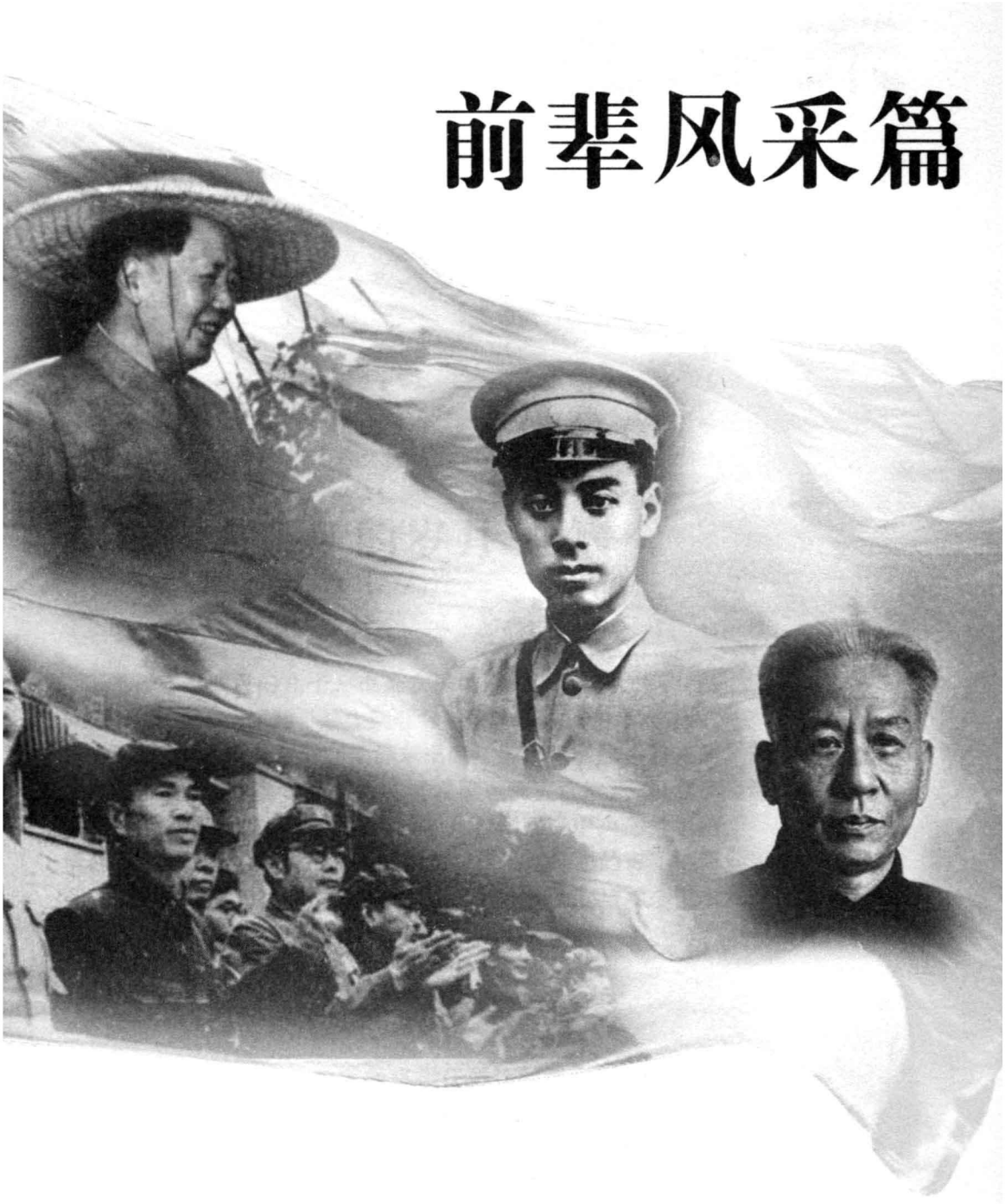
**李瑞环** 春风送暖到粤东 …… 林贞和 戚帝欧（523）
**尉健行** 推动反腐斗争向纵深发展 …… 张知干（527）
**宋　平** “我的根要扎进特区沃土，长留广东大地” …… 琚立铭（530）
**习仲勋** 广东改革开放的奠基者 …… 卢　荻（534）
**任仲夷** 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 …… 卢　荻（542）
**谢　非** 一个实事求是、永不言倦的改革者 …… 周　珺（551）

## 科学发展篇

**胡锦涛** 不平凡的春天
——记2003年广东之行 …… 胡　耿（561）
**吴邦国** 亲切指导　殷切寄望 …… 岳　宗（569）
**温家宝** 情满珠江·亲民爱民 …… 张丽红（576）
**曾庆红** 金秋的寄望 …… 凌广志　王垂林（583）
**黄　菊** 在广东考察强调坚持对外开放 …… 赵　承（588）
**吴官正** 花开千树五月天 …… 戎明昌（591）
**罗　干** 任何时候都不能伤害群众感情 …… 戎明昌（597）
**贾庆林** 放眼南粤气象新　殷切寄语促创新 …… 雷　辉　粤　宗（602）
**李长春** 南粤迈步从头越 …… 岳　宗（609）
**习近平** 在进一步解放思想中推进科学发展 …… 徐　林（616）
**李克强** 情牵亚洲盛会 …… 周志坤　岳　宗（621）
**贺国强** 要向党和人民交一份明白账、放心账 …… 李亚杰（627）
**周永康** 为大家创造更加温馨、方便、安全的环境 …… 徐　林（630）

**后　记** ……（636）

# 前辈风采篇



# 毛泽东

## 在广州农讲所的岁月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也是农民的领袖。他曾大声疾呼："农民问题不是小问题，是大问题"，"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1926 年 1 月，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农民运动决议案》，设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为委员。3 月，国民党中央通过了聘请毛泽东担任第六届农讲所所长的决议。踌躇满志的青年毛泽东，成为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担负起培养全国农民运动干部的重任。

### 开学第一天

1926 年 5 月 3 日，由毛泽东担任所长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惠爱路（现中山四路 42 号）的番禺学宫开学了。这一天，灿烂的阳光洒满了红墙绿瓦的古庙，辉映着石拱桥和一池碧水，一面面犁头旗迎风飘扬，"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农民运动万岁！世界革命万岁！"等革命标语光彩夺目。



画照：毛泽东在讲课

从全国各地汇集而来的学员，统一穿着灰色军装，容光焕发，朝气蓬勃地聚集在红色的课堂里。只见毛泽东迈着矫健的步伐走进课堂，满面笑容地说：今天，我们农讲所开学了！我们为什么要办农讲所呢？就是为了革命。我们要革命，才办这个农讲所的。我们开办这个农讲所是很艰难的，有人不让我们办，经过斗争，结果办起来了。但是，我们的经费是很少的，钱少能办好学，才算真革命。我们要勤俭节省，努力学习，共同革命……

学员们听了毛泽东的教导，个个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他们正是为了革命，才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毛所长身边学习革命的理论和方法。

晚饭以后，毛泽东又深入学员宿舍，亲切询问学员的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了解各地农民受压迫和农民的组织斗争情况，了解各地的军阀、官僚、地主豪绅专制统治的情形。激起了学员的阶级义愤，提高了学员的政治觉悟，使学员懂得，广大贫苦农民只有起来革命，才有出路。

这天晚上，毛泽东还邀请了来自内蒙古的蒙古族学员高布泽博等人到他的办公室。在农讲所，毛泽东居住和办公都是在番禺学宫的东耳房。高布泽博一行向东耳房走去时，在远处就看见毛泽东已经迎在门口。进屋后，毛泽东亲自给他们让座倒水，并且拿出香烟来问大家会不会吸，高布泽博等人说不会吸。只见毛泽东自己点了一支烟，坐在桌后的木椅上。

看到那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毛泽东，高布泽博等人一下子就觉得有满肚子的话想向他倾诉。

“我们那里的蒙汉关系不大好，汉族压迫蒙古族很厉害。”“军阀、土匪欺压老百姓，灾情严重，穷人活不下去，饿死的、逃荒的和卖儿卖女的情况很多。”

毛泽东听了以后，很沉重地说：“是啊！我们人民的生活很苦。你们到这里来，主要就是学习人民为什么不能安然生活的道理，再就是怎样才能使人民过好生活。我们人民不仅有地方军阀压迫，还有洋鬼子在后面支持军阀，叫中国人打中国人，他们渔人得利。我们以后就一课一课地讲清楚。”说到这里，毛泽东停了一下，笑了笑，接着又亲切地说：“要使各族人民都解放，就得团结起来，不要分汉人蒙人。其实，汉族的地主、官僚不仅欺压你们蒙古族，也一样欺压汉

族；你们蒙古族的王公也同样不仅压迫、剥削汉族，也压迫、剥削你们蒙古族人民。汉族的地主、军阀跟蒙古族的王公们有勾结，他们是一家，我们蒙汉的人民又是一家，所以蒙古族人民要解放，就一定要跟汉族的穷苦农牧民联合起来，共同打倒他们。”说到这儿，只见毛泽东探着身子问我们：“我说的话，你们听懂听不懂?”高布泽博说：“听得懂，就是广东的本地话听不懂。”毛泽东又笑着说：“这里也有其他少数民族的同学，要使民族解放，就得有本民族的干部。你们要好好学习，回去好向群众宣传。”

聆听了毛泽东的一番话后，从东耳房出来，学员们就议论开了。有的说：“是啊！咱们那儿的王爷不就是和汉族军阀们勾结吗!”也有的说：“北京的蒙古族学校还不是蒙藏贵族们办的，不也一样不叫咱们上学吗!”

大家困惑了多少年的问题豁然开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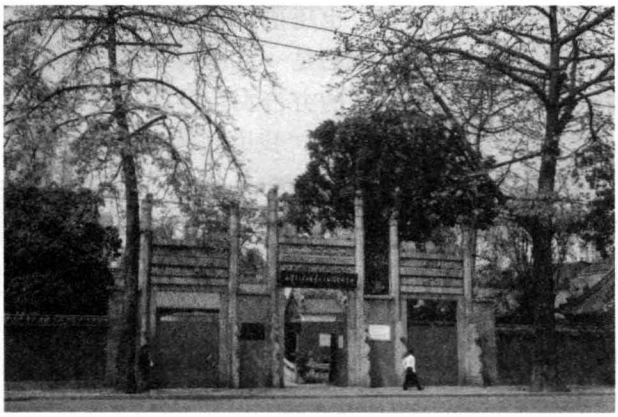
## 亲任教员授课程

作为一所之长的毛泽东对第六届农讲所的开办，不论是在教育方针、招生对象、教员选择，还是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都亲力亲为。农讲所的教学，共设置25门课程，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学员主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研究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问题。此外，毛泽东还亲任教员，给学员讲授了《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并专题讲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在番禺学宫高大宽敞的大成殿里，毛泽东当年就是利用这座大殿做教室，向全国各地来的学生灌输其对早期农民问题研究的理论。毛泽东是最早在政治上考虑农民问题的中共领导人之一。他博览群书，注重实践和调查研究，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做了大量的农民运动实践工作。他在讲授《中国农民问题》这门课程时，深刻地分析了中国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伟大作用，论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

毛泽东指出：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农民占大多数，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但以前没有人研究过，而这是一个很重要、很复杂的问题。我们共产党对农民问题比较注重。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同志不肯到乡下去做农民运动工作，这是十分错误的。从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的性质来看，中国人民要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得到胜利，就一定要有农民这支主力军参加。革命是要联合大多数人才能取得成功，农民约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所以不能抛弃农民这支大军。毛泽东还批评了当时党内许多人认为“农民无知识，又不集中”，怀疑农民革命力量的错误看法。

在讲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时，首先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



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要分辨真的敌人，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他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阶级划分为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由于各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不同，因而对革命的态度也不同，乃有反革命、半革命、对革命守中立、参加革命和革命主力军等等。如讲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时，他生动地把其比喻为一座多层的塔。他一边讲一边在黑板上画了一座底大顶尖的宝塔。他指着塔说：“你们看，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最受压迫和剥削，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一层有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团结紧，劳苦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座大山就可以推翻。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可倒乎！”这一形象生动的讲授，使学生明白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开始懂得了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观察和解决问题，懂得了农民同盟军问题的重要性，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

在讲授《农村教育》这一课程时，通过剖析中国农村文化教育的历史，揭示了中国农村封建教育的本质。指出：“农村中有两个阶级很明显，就是剥削阶级及被剥削阶级，前者田地多，财产富。因为他们有饭吃，有受教育的机会。后者没有田地，没有财产。因为没有饭吃，所以一点受教育的机会都没有。”他认为，中国当时的教育是属资本主义的，而广大农民是反对的，其原因“就是资本主义教育不适合农民切身利益的。这种教育的内容，都是资本家的护身符，于农民没有丝毫关系。所以，解决农村教育的问题是解决农民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后农村教育应适合农民的需要和利益。”

毛泽东讲授的课程，都是运用比喻和启发式的教育，既通俗易懂，又生动感人，学员们置身于这红色的课堂里，聆听了毛泽东的教导，心情明朗，给不少学员留下了经久难忘的深刻印象。以至60年后，还活着的农讲所学员回忆起毛泽东当年讲课的情形，都能记忆清晰、栩栩如生地表述。

## 新型学校形式新

农讲所是一所新型的革命学校，毛泽东经常和教员一起研究教学工作，制定教学方案。他要求教员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进行革新，要从学员的实际出发，从革命需要出发，紧密联系社会实际进行教学。教员根据毛泽东的要求，编写新教材，采取多种形式，使整个教学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面貌。有一次，毛泽东从学员的反映中发现，当前的教学还不能完全适应今后对农民宣传的需要，因为农民一般没有文化，单靠理论、文字方面的宣传，是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果通过形象的宣传，农民就很容易接受。因此，毛泽东决定增加图画这门课程，并通过阮啸仙到广东省农民协会宣传部聘请一位美术教员，负责教图画课，称为“革命画”。为了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毛泽东又指示教员开办了一个图画临时训练班。这个班由学员中绘画比较好的五十人组成，利用晚上上课，主要学习人物的素描，对各阶级人物形象的描画，如农民种地、地主收租，等等。经过短期的训练，这些学员掌握了基本的美术常识和绘画技巧，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毛泽东在认真组织教学的同时，还经常邀请中共两广区委的负责同志和社会上的进步人士到农讲所作政治时事报告，如陈延年、张太雷、林伯渠等人。这对学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帮助很大。

为了使学员更好地学习革命理论，增长革命知识，毛泽东在农讲所设立了图书馆。图书馆里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中国农民》、《农民运动》等许多书籍。由于学员的文化较低，有些书看了半天还摸不着头脑，怎么办？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况后，征求了大家的意见，提出了一个新的学习方法：在阅读前，先由专任教员将每本书的重要部分列出若干问题，公布出来，然后让学员自己阅读，要求学员边看边做出答案，限期交卷。这样可使学员能根据专任教员提出的问题，抓住重点，认真细读，领会其精神实质。学员们交卷以后，专任教员又从这些答案中选出几份，公开张贴出来，称为“标准答案”。然后，将所有的答案都发给学员，让学员按照“标准答案”自行修改。这种方法，既能充分发挥学员的独立思考能力，又能互相帮助，互相启发，共同进步。毛泽东倡导的这种学习方法，对于帮助学员学好革命理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为帮助学生研究各省农民问题，毛泽东在农讲所设立了十三个农民问题研究会，推举学生主持其事。毛泽东根据农民运动的实际情况，亲自为研究会拟出了租率、田赋、地主来源、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平粜等风潮、地方政治组织、团防、妇女的地位等三十六个调查研究项目，引导学员研究各省农村的阶级斗争和农民运动情况。还经常印发一些表格或调查提纲，要学员把自己家乡的情况、调查项目填写好。解放后，毛泽东于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

话中回忆说："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我发动各省来的学生抄写民歌，每人十首，十人百首，百人千首，三百人就有三千首民歌，还有一个人抄写了几十首。其中包括内蒙古、黑龙江的，只是没有青海、新疆的。我对他们说：你们抄写民歌，我发纸，每人发几张纸。一个人长到十几二十岁，总能记得一些民歌。从这些民歌里面可以懂得许多东西。"在毛泽东的正确引导下，农民问题研究会搞得生动活泼。学员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善于思考，集思广益，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学员们不仅加深了对家乡农村乃至全国农村的认识，而且初步学会了调查研究的方法，提高了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 刀对刀，枪对枪

在农讲所里，毛泽东给每个学员发一支枪。他教导学员干革命就要刀对刀，枪对枪。并将全体学员按军事编制，编成了一个总队，两个中队，六个区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参加野外演习和实弹射击，军事训练时间占全课程时间的三分之一。使学员既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斗争的理论，又学到了基本的军事知识，为今后领导农民武装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毛泽东经常亲临训练场，指导学生军训。强调军事训练的重要性，指出："搞革命就要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就会出乱子。"他经常对学员说，我们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要是研究中国农民问题，这个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我们还要进行军事训练，军事训练就是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学习武装斗争的本领。我们这里虽然只有三百多人，但是全国的农民是很多的。如果把全国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协会，成立农民自卫军，就能够对付土豪劣绅。毛泽东的话，犹如一把火，把积压在学员心头的疑团烧光。

为了加深学员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毛泽东引导大家把学习军事知识和当时的阶级斗争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组织大家调查研究"地方政治组织"、"团防情形"、"兵祸及其影响"等问题。还组织学员到广州黄花岗、市郊石井广东兵工厂进行实弹射击。该届学生接受了比较系统的军事理论和技术训练，学习了立正稍息、队列操练、托枪、放枪、刺杀瞄准、卧倒跃进、利用地形、潜伏隐蔽、班排进攻、野外演习、实弹射击等。

## 示威游行

1926 年 6 月 23 日，广州各界群众举行盛大示威游行，纪念沙基惨案一周年。毛泽东带领着农讲所学员也参加了这次大游行。

这天下午一时，只见农讲所学员们身穿灰布军装，腰束皮带，脚穿草鞋，手里拿着各色标语小旗，迅速来到草坪集合。毛泽东大手一挥，“出发！”参加游行的队伍走出大门口，与街上川流不息的游行队伍汇合在一起。农讲所学员个个激情满怀，热血沸腾。毛泽东带领着学员不时地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坚决收回一切租界！为沙基死难烈士报仇！还高唱革命歌曲：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杀尽敌人！
我们团结，我们前进，我们奋斗，我们牺牲，
杀向那帝国主义的大本营，
最后胜利必定属于我们工农兵！

当游行队伍来到沙面时，忽然天空下起了瓢泼大雨，把人们从头到脚浇个湿透。这时游行的人们豪情不变。毛泽东与高举着犁头旗的学员迎着风雨，奋勇地向前进。“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声把盘踞在沙面租界的帝国主义者吓得屁滚尿流。回所后，毛泽东还意犹未尽地冒着大雨发表演说，慷慨激昂，催人奋发。

## 海丰实习

快要毕业时，为了使大家把学到的革命理论和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组织全体学员，到广东海丰农村实习，让学员们参加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队伍临出发前，毛泽东在农讲所的草坪上对学员进行了一次讲话。他说：同学们，我们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课堂学习，现在就要到农村去，深入到革命的农民群众中去，考察农会组织，体验农民生活，虚心学习他们的经验，要求大家把学到的革命理论和社会实际结合起来，增强搞农民运动的信心和决心。

接着，毛泽东还高声地问：大家能不能做到？

“保证做到！”学员们响亮地回答。

去海丰，当时是在广州天字码头坐船去。

船在海中航行，学员们情绪激昂，革命歌声响彻云霄：

走向前去呵，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
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
勇敢上前，稳着脚部，要高举着少年旗帜，
我们是工人和农人的少年先锋队。

学员们到了海丰，与当地的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海丰，原来是军阀陈炯明统治的地方。自从有了农民协会后，农会会员的腰杆硬了，他们和革命军联合起来，打败了陈炯明，建立了农民自卫军，掌握了乡政权。现在，官吏征收捐税钱粮不敢额外刮钱了，土豪劣绅不敢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为非作歹的土匪也不敢活动了。在海丰，学员们还参加了当地七五农潮三周年纪念大会。学员们看到、感受到确实与别处不同的一派新景象，都热情夸赞海丰农民运动好！农民协会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

两个星期实习很快过去了，学员们喝着乡亲们端来清甜甘香的功夫茶，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海丰。回到所里，他们纷纷拿着厚厚的一叠调查报告争着向毛泽东汇报。

“毛所长，海丰的农民运动实在太吸引人了。”

“我们一定要像海丰的同志那样，把农会组织起来，与地主老财作斗争”……

农讲所专职教员萧楚女在实习报告中说：“学生上课已久，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入革命的农民之中，考察其组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

## 学员们的贴心人

在农讲所里，毛泽东不但在学习上关心学员，在生活上也做到无微不至的关怀。无论在课堂上还是在宿舍里，或是课余饭后在草坪上，他都爱和学员亲切交谈，拉家常，了解情况，帮助大家解决学习上的疑难和生活上的困难。为了保证学员的身体健康，讲习所专门配备了一名医生，添置各种医药用品。有位学员生痔疮，所里的医生说，只要有医疗器械，就能够给他割治。这位学员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毛泽东，他听后亲自把医生请来，详细地询问了学员的病情和手术的可靠程度。当医生再三保证绝对安全时，毛泽东立即同意购买所需器械，并一再嘱咐医生，手术一定要可靠，不能出问题。在毛泽东的关怀下，这位学员的病得到了及时治疗，很快又投入到新的学习生活。

当一位学员接到家信，说母亲病了，要他想法寄钱回家。这位学员很为难，因为一个月才有三块钱的零用费，哪有多余的钱。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后，指示所里补助三十元让他寄回家。当这位学员从庶务部领到这三十元的时候，心中无限感动，更加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有一次，学员们正在饭堂吃饭，毛泽东来到学员当中，亲切地问大家生活过得习惯吗？一位北方来的学员告诉毛泽东，这里的一切都很好，就是吃不惯南方的大米饭。又有一位学员说，有些回族学员已经吃了几顿白饭了。听着听着，毛

泽东关切地说，是啊，我们一定会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的。以后，他发动全体工作人员想办法，提建议，群策群力，办好伙食。并经常督促庶务部改进工作方法，尽可能帮助学员提高生活福利。后来，毛泽东根据学员们的意见，指示学员选出代表，组成膳食管理委员会，发动群众民主管理伙食，组织学员轮流外出购买东西，使伙食得到了很大的改进。为了照顾南方和北方学员的不同饮食习惯，将学员分为吃面食和吃大米饭两组。为了照顾少数民族学员的饮食习惯，还专门设立了少数民族用餐的专席。

在毛泽东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学员们过着愉快的生活。每当他们走进膳堂，看到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大米饭、白面馒头、香喷喷的大锅菜，以及可口的民族食品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个个都情不自禁地说："毛所长真是我们的贴心人！"

（洪　霓）

# 在南雄的足迹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1929年1月至1934年10月，毛泽东曾四次率领中国工农红军进入广东南雄从事革命活动。第一次是1929年1月24日，率领红四军的一支部队，与朱德率领的红四军的另一支部队在南雄胜利会师。第二次是1930年4月1日早晨，与朱德率领红军主力部队越过大庾岭进入南雄，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道理，动员南雄人民参加革命队伍。第三次是1932年7月，随红一、五军团到南雄，与朱德、王稼祥等一起指挥著名的“水口战役”。第四次是1934年10月，与朱德率领中央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红一军团从于都出发，开始战略大转移，也就是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 朱毛南雄会师，点燃革命烈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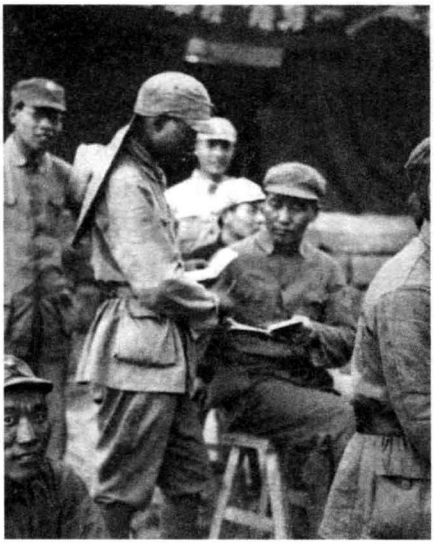
1929年1月24日，巍巍梅岭朔风凛冽，雪花狂舞。

前委书记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的一支部队，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到达赣粤边界梅岭后迅速进入南雄，第一次踏上了南雄这块土地。

部队行进至南雄境内的梅岭角湾村时与敌人相遇，经过短促的战斗，打败了阻击的敌人，然后取道东山岭背、黄坑、上下杨梅，直下小梅关、东山门、钟鼓岩，向东经邓坊的蓝田、益田，到达油山的茶田，占领了十里岭，对占据在白石埂的敌军形成了包围之势，击溃敌人的一个团。与此同时，朱德率领红四军的另一支部队由江西经油山广亭坑、上下兰田，半夜时分到达寨下的山沟里露营。

赣敌李振球获悉红军到了油山，便带领一个团的兵力由江西池江进入南雄，占领了油山坪田坳的白石埂山头，将红军包围住，妄图一举歼灭红军。在朱德的亲自指挥下，南雄县委书记彭显模带领油山游击队、上朔赤卫队与红军一道迅速抢占了

制高点十里岭，实行反包围，居高临下，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至中午战斗结束。


毛泽东与红军战士在一起

战斗结束后，朱德和毛泽东在夹河口会合，然后率部经上朔到达锦陂，在禾场休息。当地群众听说红军到来，无不欢欣鼓舞。不久前，南雄县委领导了有三万余人参加的农民暴动和土地革命运动，但随即遭到反动派的镇压，数百名农民在这次斗争中献出了生命。从此，南雄的革命斗争走向低潮，广大人民在沉重的压抑下生活着。红军的到来，在他们苦难的心田里升腾起希望的火花，他们像迎接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欢迎红军的到来。许多人送茶送水，并拿出当地特产糯米糕到村口的榕树下慰劳红军。目睹此情此景，毛泽东眼眶湿润了。当他看到村里的房屋已被烧光时，便向身边的群众问道："这是谁烧的?"群众回答说是国民党军队烧的。毛泽东听到这里，指着被烧的房屋，愤怒地说："这笔债，一定要他们还!"

当晚，在井湾村召开群众大会，毛泽东站在会场上，情绪激昂地说："穷人要闹革命，打倒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我们穷人才有饭吃，才有衣穿，我们红军也是穷人，是穷人的军队，穷人和红军要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才能打倒反动派，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跟地主财东斗，跟白狗子斗，跟他们斗到底，今天，他烧了我们的房子，明天，我们一定要他们来偿还。"贴心的话语赢得了群众的热烈欢呼。

毛泽东、朱德在锦陂稍作逗留后，又率部队到达乌迳的王木岭，接见了南雄县委的负责人。毛泽东对南雄县委的负责人说道："我们要广泛地发动群众、动员群众，激发起他们的革命热情；广大农民是我们事业永不枯竭的源泉，是革命之母，只有依靠他们，我们的事业才能取得胜利，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他显得异常兴奋，双眼炯炯有神，高昂着头，继续说道："谁能赢得农民，谁就能赢得中国，而要赢得农民，就必须满足他们对土地的要求，我们要发动群众，大力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我们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教育群众，例如，我们讲打倒帝国主义，群众不明白，但我们将它改成打倒洋财东，群众就知道了。"语重心长的一席话，使这位负责人深受启发。他表示一定要把南雄的革命烈火燃烧起来。

在王木岭，毛泽东、朱德又召开了群众大会，并将 10 支五响步枪和一批子

弹赠送给南雄县委。第二天到达乌迳山下村，次日清晨经乌迳官门楼，穿过界址圩往江西信丰方向前进。

油山上朔一带农村墙壁上至今仍依稀可见《十大政纲》、《当红军歌》等红军标语，这就是当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第一次到南雄时留下的。

## “朱毛是两个人，朱是朱德，毛是毛泽东”

1930年4月，毛泽东再度率红四军进入南雄。这时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蒋、桂、冯军阀大战的空隙，红色根据地得到了迅速发展，赣南已完全为红军所掌握，闽西六县全面暴动，红三军和红十二军相继成立，各地苏维埃政府纷纷创立，红军在苏维埃推行土地政策深得农民的拥护。面对这种局面，蒋介石慌了手脚，仓促组织“三省会剿”，命令广东军阀陈济棠、陈维远、余汉谋向苏区逼近。

4月1日凌晨，陈济棠、余汉谋急命吴文献教导团向江西大余进犯。几乎同时，红四军在大余城郊外五里的一个小山坡草坪上召开了战前动员大会，准备消灭来犯之敌。毛泽东在会上动员道：敌人有一个吴文献的教导团到了南雄，前面就是梅岭，离这里只有12里路。不管它什么团，今天我们都在梅岭将它消灭。会后，毛泽东亲自指挥部队，夜袭梅岭，将吴文献团的一个营消灭，缴获长短枪500余支。

这时的梅岭，已是山花烂漫的时节。天刚放亮，毛泽东站在梅关古道旁，放眼山野，红军战士正从他身旁走过，山下红旗招展，山上鸟语花香，真可谓“风展红旗如画”。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使他信心百倍，雄心万丈。他相信中国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那决不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空东西，它就像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像立于高山之巅远望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红日；像躁动于母腹之中快要成熟的一个婴儿……这时，朱德也赶了上来，他们并肩而行，指挥红军直指南雄县城。

红四军前行时，与吴文献调来增援的一个营在梅岭中站城遭遇。红军速战速决，歼敌百余人，缴获枪支200多支。红军行至珠玑镇石子岭时，又遇敌一个营，敌人闻风丧胆，不堪一击，四处溃逃。下午4时，毛泽东、朱德率部乘胜包围南雄城，战斗数小时，俘虏吴文献教导团数百名官兵。国民党伪县长梅翊翔化装逃跑。

红军开进南雄城，鲜艳的斧头镰刀红旗在街头飘扬。

第二天，毛泽东和朱德在南雄县委书记彭显模的陪同下朝城隍庙（今市人民医院门诊部）走去，在那里参加群众大会。沿街的店铺旁，到处贴满了红军的安民告示和“平买平卖，公平交易”、“老百姓不要怕，大家开门营业”、“取消苛

捐杂税”、“红军官兵待遇一致”等标语。沿着石块铺成的街道，他们边走边聊。毛泽东忽然幽默地对彭显模说道：“南雄人民有革命的好传统，南雄人喜欢吃辣椒，吃了辣椒就容易激动，一激动就要造反，反动派最害怕我们这些吃辣椒的人。”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不一会，便到了城隍庙，这里周围插满了红旗，热闹异常，毛泽东等人走进会场，会场挤满了人，他们久闻朱毛大名，各种传闻如雷贯耳，今日有幸一睹朱毛的尊容。毛泽东风趣地对大家说：“大家经常讲朱毛，朱毛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朱毛是两个人，朱是朱德，毛是毛泽东，我就是毛泽东，朱德也来了，他就在这里！反动派将我们描绘成青面獠牙的恶魔，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了。”说着，他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我毛泽东也和大家一样，都是穷人，朱毛红军就是替穷人打天下的军队，我们穷人只要团结起来，就能将地方老爷洋财东打倒。”这时全场群众都兴奋起来。毛泽东继续说：“我们是红军第四军。红军是为人民服务的，是打土豪劣绅分田地的，是打倒帝国主义的……”，并提出“万富准备钱，千富不相连，贫穷跟我去，每日一吊钱”的口号。毛泽东号召广大工农群众行动起来，建立苏维埃政权，建立工农武装。毛泽东讲完话后，朱德也讲了话。会后，红四军宣传队还演了一出戏《王老三交粮支援红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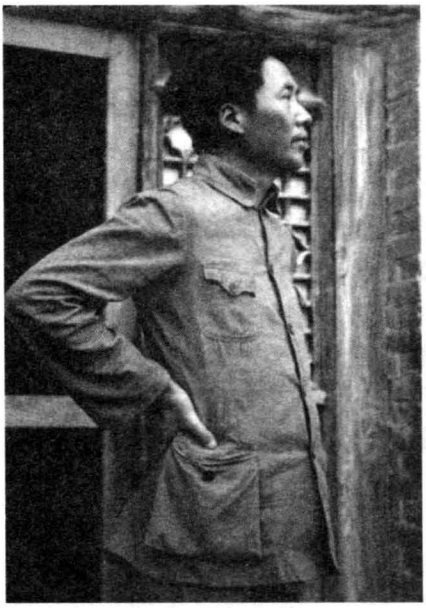
红军在南雄几天，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深得人民的爱戴。红军查封了不法资本家和大商家的财物，把约十万大洋分给贫穷百姓，向伪商会筹集了4万大洋的军饷，还集中全城裁缝匠为红军赶制数千套军装。同时，烧毁了国民党伪县政府，打开监牢释放了被关押的穷人，吸收他们参加了红军，抓住了一个民愤极大的警察巡官游街示众，并将其枪毙，为民除害。广泛的宣传发动，使群众受到了很大的教育，许多青年要求加入红军。

4月7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离开雄州，经乌迳返回江西，沿途又歼灭民团700余人，使蒋介石“三省会剿”的阴谋彻底破产。红色根据地却得到进一步扩大，南雄县委也划归赣西南特委领导，南雄成为中央苏区的组成部分。

## “水口战役”，与萧劲光“较劲”

1932年5月，毛泽东正随红一、五军团在进军闽南的途中。蒋介石命令广东军阀陈济棠、余汉谋进攻赣南，侵占了赣西南大片地区。这时，毛泽东接到党的临时中央关于“红一、五军团主力应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赣粤敌”的指示，他们决定回师赣南，与三军团会合，夹击粤敌。

毛泽东、朱德不顾天气炎热和长途行军的极度疲劳，昼夜兼程，于6月底进入南雄乌迳地区，并派部队占领了梅关，将进驻赣南和南雄的余汉谋部分成两股，逼使余部重新布防，将张梅新的粤军第四师调回南雄驻防。



毛泽东

这时期，虽然毛泽东已被“左”倾路线排挤出红军的领导圈外，但他在红军指战员中享有的崇高威望，仍能使他发挥重要的作用，他所制定的战略战术仍被广大指战员所推崇。

7月7日，粤军第四师到达乌迳，红一方面军命令五军团和江西独立第三、第六师共同歼灭粤敌第四师。8日凌晨，五军团在向乌迳开进途中发现敌四师由浈水南岸向南雄方向逃窜，立即改变行军方向，向水口圩堵击。当天下午1时，五军团在水口以东的弱过隔河与敌四师打响，拉开了水口战役的序幕。随即五军团以十三军从正面攻击，以第三军由左翼渡河绕到敌后，很快就击溃了敌军两个团。当晚，敌四师退守水口圩及附近高地。

9日凌晨，五军团向水口之敌发起进攻，在浈水南岸高地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拼杀。中午，敌人援兵赶到，以10个团的兵力向第三军阵地猛扑，战斗异常激烈。红三军指战员英勇顽强地阻击敌人，阵地数次得而复失，部队伤亡很大。在这危急之时，陈毅率领独立第三、第六师赶到，打退了凶猛的敌人，稳住了阵脚。水口东面阵地上，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棠亲自指挥部队同敌四师进行白刃战。他脱掉外衣，只穿一件白衬衣，指挥着四五千名手持大刀的战士，分四路冲向粤军第四师阵地，随着震耳欲聋的喊杀声，战士们手起刀落，敌人一片片倒下，阵地上尸横遍野，战士身上血迹斑斑。敌人一次次进攻，又一次次地溃退，战斗达到白热化程度。

10日拂晓，毛泽东亲自率领一军团和十二军赶到水口战场。他了解到敌我两军的作战态势后，又亲自观察了敌军阵地，随即命令一军团和十二军分别增援两岸的三军和十三军。

上午7时，两岸的红军同时向敌军发起攻势。浈水两岸，战火纷飞，硝烟弥漫，倒下的红军战士和敌军尸体互相枕藉，滔滔浈江河水，也被染成了淡红。毛泽东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经两小时激战，敌人终于不支，纷纷向南雄方向溃逃，红军乘胜追击，毛泽东也随着部队冲了上去。在追击过程中，五军团政委萧劲光突然看见追击队伍中有个大高个儿很惹人注目，急忙撵了上去，靠近一看，竟是毛泽东。毛泽东端着一支驳壳枪，步子迈得很有些特别，不像战士们撒丫子猛跑，而是甩开长腿，大步往前，半跑半走，速度居然不亚于身边的队伍。这

时，战况虽然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战斗并没有结束，敌人边逃边组织阻击，交替掩护。远处还有几门钢炮不停地向这边射击，红军追赶队伍中不断有人倒下。但毛泽东此时似乎忘记了身份，一边往前奔走，还一边举枪高喊，叫战士们快追。萧劲光一看这阵势，吓得不轻：毛泽东大大咧咧地把自己当个连长、排长用，要是有个闪失，怎么向中央交待？萧劲光手一挥，一个班紧跟在他的身后，把毛泽东围住了。“毛泽东同志，这里危险。离开这里！”毛泽东停住步子，哈哈一笑说：“追赶残敌，乃一大快事也！待我追至前方树林，坐下歇息不迟。”说完，驳壳枪一挥，迈着长腿又往前跑。萧劲光火了，把脸一沉，严肃地说：“毛泽东同志，请你尊重我的指挥权！”毛泽东愣了一下，随即又笑了起来，说：“你这个萧劲光，你指挥你的，我追我的。我也是一个红军指挥员，追个敌人都没权力呀？你好霸道嘛！”说完又往前冲，并且跑了起来。萧劲光跟在后面，边追边喊：“打完这一仗，你怎么批评都可以，现在我是前线指挥员，我命令你不要乱跑！”说完，他对身边的一个连长说：“你们不要追了，把毛泽东同志拉住，送回军团部去！”毛泽东见萧劲光动了真的，也焦急起来，振振有词地说：“久居指挥所，无缘上火线，你也让我透口气嘛！”一边说，一边挣脱那位拉着他的连长，拎枪又往前跑，嘴里还嘀咕：“兵败如山倒，惊弓之鸟，丧家之犬，我为何怕他，追追何妨？你不让我追，我偏要追！”萧劲光见毛泽东执意要亲自追击，无可奈何，也只得依了他，指挥部队不离毛泽东前后，大家一起追了上去。毛泽东这种身先士卒的精神，鼓舞着红军指导员们奋勇前进。经过连日激战，10 个团的敌军被击溃，纷纷逃回南雄县城。

战斗结束后，毛泽东站在山坡上，望着硝烟滚滚的战场，感慨万千。这次战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红军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几千名红军战士倒在浈江两岸。几千名战士，这对于红军、对于中国革命是多么宝贵的财富啊！他们都是英勇无畏的战士，为了保卫红色根据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想到这里，毛泽东默默地面对那些红军战士倒下的方向鞠躬、鞠躬、再鞠躬。他向来主张以最小的牺牲来换取最大的胜利，他从来都不欢迎这种拼消耗的胜仗，这在某种意义上简直是一次败仗。对水口战役的评判，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一九三二年七月在广东南雄水口圩地区对陈济棠的作战”，“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如像水口圩……这类的仗，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的，然而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

水口战役后，红军在界址圩休整了一段时间便回师赣南。经水口战役重创的粤军再也不敢随意进犯苏区，使赣南根据地安定了一段时间，为此后红军向北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 率领长征部队经过南雄

1934年，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发动了对中央苏区和各地红军的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9月，以50万大军开始向中央苏区进攻。

10月，由于强大敌人的进攻和我军决策的失误，致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红军为了保存实力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10月18日，毛泽东抱着对中国革命的无限信心，带着一袋书、一把破雨伞、一条毯子、一件旧外套、一块旧油布，越过于都河，踏上艰苦的征程。不久，他便因疟疾缠身而躺在担架上，严重的疟疾使他双颊深陷，憔悴消瘦，头发长得几乎齐肩，一双深邃而熠熠生辉的眼睛时常望着天空。他苦思冥想，思索着这几年来的党内斗争和红军的出路。是啊，这批中国希望的火种，又该撒向何处呢？

21日，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8万余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向红二、六军团所在地的湘西进军，开始长征。

同日，毛泽东、朱德率领中央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红军一团从于都出发，开始战略大转移。22日，红一、三军团打垮了国民党军陈济棠部一个团，占领了江西省安远县的版石，信丰县的新田、金鸡、古坡、安息和韩坊等地，基本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25日，渡过信丰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决定，红一方面军向湖南省的汝城县，广东省仁化县的城口方向前进。26日，红一军团前锋在信丰县的石材圩一带开进，经小和、万隆进入粤境南雄县的界址、乌迳一带。

此时，获悉广东军阀军陈济棠部一个连，抢先在乌迳区的新田一带挖战壕，构筑工事，设置封锁线，妄图阻击红军的行动，使其主力跟上截击。红一军团直属侦察连受命奔袭乌迳，突破敌人封锁线。当到达前沿阵地时，见前方山坡上的国民党军正忙着挖战壕，筑工事，刘云彪连长率全连160多人分三路向敌人阵地发起攻击。他带领中路正面攻击，猛扑过去，当国民党军还击时，已有10余人丧命。同时，侦察连的左右两路也插向敌阵两侧开火进攻。敌人发现被包围，为逃避被歼的厄运，一边急忙还击，一边沿一条小山沟逃命。侦察连以猛烈的攻势将敌人打垮。这次战斗歼敌20多人，缴获枪支弹药一批。这是红一方面军进入粤境的第一仗，也是在粤的第一场胜仗。

打垮这股敌人之后，红军占领乌迳，红一军团部直属队进驻南雄县境的界址圩。至10月28日，红一军团大部经乌迳、大塘、夹河口、平田坳一线出江西省大庾县的兰村。红一军团另一部由信丰县的下坑，经南雄县的黄地、大兰到达大庾县的兰村会合，在大庾县的南部向赣、粤、湘边开进。红九军团跟着急行军，

经界址，尾随红一军团路线疾进至平田坳、兰村一带。至此，红军长征胜利穿越南雄。11 月 13 日，红军长征主力部队离开广东乐昌境内向湖南宜章前进。

红军长征首战告捷，士气大振。毛泽东、朱德率领部队顺利通过南雄东北部，向湖南挺进。

（肖　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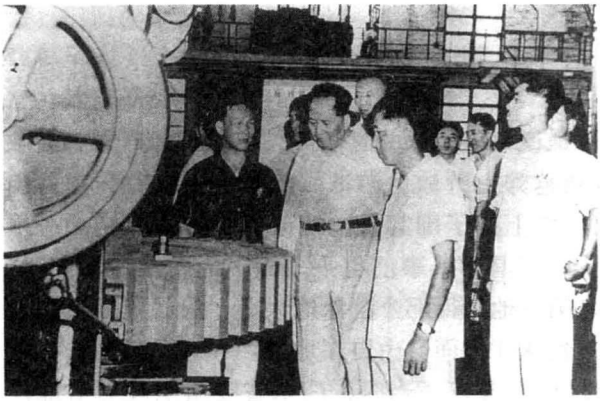
# 八次视察广州逸闻

建国后，毛泽东曾经八次视察广州：1954 年 11 月 3 日至 26 日他到广州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修改和审定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参观了广州三元里抗英烈士纪念碑、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广州苏维埃政府旧址等；1955 年 12 月，他到广州编审《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该书写了序言和按语；1956 年 5 月 3 日至 30 日，他先后在广州召开 20 次会议，听取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等五省领导人的工作汇报，并参观广东水产展览馆、广州造纸厂、广州通用机器厂，实现了畅游珠江的愿望；1958 年 1 月 23 日至 24 日，他到广州接见奉调回国的印度驻华大使尼赫鲁及其夫人，次日到中山纪念堂接见驻广州部队、广东和广州市的干部；1958 年 4 月，到广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全国工业建设问题，并视察广州市郊的棠下农业社；1958 年 12 月 13 日至 26 日，在广州写下《对所作诗词的注解》并度过 65 岁寿辰；1960 年 1 月 27 日至 3 月 9 日，在广州读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主持编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并多次召开会议；1961 年 2 月 13 日至 3 月 29 日，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制定《农业六十条》，并大力提倡调查研究。

本来毛泽东每一次视察广州，每日行程都有详细的记录，可惜“文革”中这些材料被收走，以致很多史实不清楚。笔者通过多方搜罗，撷取毛泽东在广州的一些精彩片断，使广大读者能够目睹领袖的风采。

## “外国人能搞的，中国人要搞；外国人不能搞的，中国人也要搞”

毛泽东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在延安时就提出“自力



毛泽东视察广州通用机器厂

更生”的原则，1956 年初苏共“二十大”破除斯大林个人崇拜、暴露苏联模式部分弊端后，毛泽东更加强调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当年 5 月他到广州视察时充分表达了这种豪情壮志。

这次毛泽东决定乘飞机去广州。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坐飞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原来考虑让毛泽东乘坐苏联顾问团的飞机，但毛泽东不同意。还是毛泽东自己说出了缘由：“我们有自己的飞行员，为什么要坐外国人的飞机？外国人的飞机我不坐，我一定要坐中国人自己驾驶的飞机。”原来，毛泽东是在以自己的行动支持年轻的中国空军。

5 月 3 日，晴空万里。7 点 30 分，毛泽东到了机场。机长胡萍代表机组敬礼：“飞机已经准备好，请主席上飞机。”毛泽东微笑着和机组成员一一握手，并询问了每个人的名字和年龄，慈祥地说：“你们都很年轻啊！”接着，刘亚楼向毛泽东报告飞机、航线及天气情况，然后和公安部长罗瑞卿陪毛泽东登机。飞行了将近 8 个小时后，飞机抵达广州。毛泽东毫无疲态，走下飞机，颇有感触地慨叹说：“还是飞机这东西好，飞得快，当天就到了广州。我们就是要有自己的飞机才行。”

5 月 29 日上午，毛泽东身穿米黄色衬衣，灰色长裤，脚踏一双黑色布鞋，手拿一把广东葵扇，乘船来到了广州造纸厂码头。在厂长封贯之的引导下，他首先走进了磨木车间。当他知道全车间 8 台磨木机中有 6 台是国产的，而且国产磨木机的性能比进口的还要好时，非常高兴，连声赞好，对广州能制造出优于外国的机械表示了极大的欣慰。

离开广州造纸厂后，毛泽东乘坐一辆黑色“吉姆”牌小轿车，到广州通用机器厂视察。当他了解到该厂工人和技术人员正在研制日榨 2000 吨糖蔗的榨糖机，这种榨糖机的日榨量可超过解放前进口榨糖机的一倍时，挥一挥他那有力的大手，豪迈地说：“中国人应当有这样的志气，外国人能搞的，中国人要搞；外国人不能搞的，中国人也要搞，要为国争光。”他的豪言壮语久久地回荡在工厂，回荡在南粤大地……

## “我自由了！我自由了！”

工作之余，毛泽东喜欢游泳，他说只有游泳的时候可以不想事。广东省委知道他的这一爱好，1954 年安排他到越秀山游泳池游泳。为了保卫安全，越秀山前前后后封闭了一个月，游泳池也搭上棚子围起来。游泳用的泳衣、浴巾、拖鞋、救生设备和休息室的桌椅板凳、茶具等，事前也一一做了周密准备和安排。毛泽东对越秀山游泳池并不满意，第一他觉得那个游泳池太小，第二他知道把老百姓赶跑了，怕拖累群众，所以想到珠江里面自由自在地游。

其实，1954 年毛泽东就提出过要游珠江。当时，广东省委组织人力对珠江的河情和水质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的情况，并出于对安全的考虑，广州市公安局长薛焰给毛泽东写了一张字条：“毛主席，这河水很脏，洪水泛滥，可能有血吸虫，不宜游泳。”毛泽东看后，无奈地摆了摆手说：“好吧，不去就不去。”然而，1956 年这一次毛泽东却下定决心要到珠江游泳，谁也挡不住，只好派一批体魄健壮、政治上可靠的游泳尖子陪他到珠江游泳。

这一天，毛泽东及其陪同人员登上了停泊在小岛旁的“花船”，向西溯江而上。毛泽东换上泳装，坐在船头甲板的藤椅上，尽情地享受着阳光的沐浴和江风的吹拂，欣赏着珠江两岸的秀丽景色。穿过一段稍窄的河道之后，江面突然开阔了许多，这就是毛泽东要下水的“白鹅潭”。为什么选在白鹅潭？因为西江从这儿进入到珠江水系，这儿是上游，相对稳定、安全。“花船”缓缓停下，毛泽东离开坐椅，走近舷梯正要下水，忽然，远处几艘小渔船上传来呼喊声：“毛主席，是毛主席，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循声望去，兴致勃勃地向渔民们挥了挥手，然后纵身跃进珠江。陪同人员也一个接一个跳入水中。

毛泽东搏击着江水，高声呼喊：“我自由了！我自由了！”他回头一看，见不熟水性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和广州市公安局长薛焰还在船上，就打趣说：“你们两个人，一个是部长，一个是局长，天天说保护我，现在我在水中，你们却在船上，要是我淹死了怎么办？”在宽阔的珠江江面上，他时而侧游，时而仰泳，显得逍遥自在。毛泽东率领着一小队敢于搏击风浪的健儿，逆流而上，穿过如意坊码头，闯进大坦沙河段，直抵海角红楼泳场，然后，又转身顺流而归。畅游一个多小时后，毛泽东回到“花船”，见到薛焰，大概是想起了两年前薛焰所写的那张字条，拍拍自己发胖了的肚皮，风趣地说：“你看我的肚皮这么大，是得了血吸虫病吧。”引起船上阵阵欢快的笑声。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基本上每天都到珠江去游泳。对于他的出行安全，接待小组想尽一切办法，即便是如此周密，还是有很多人能看到他在珠江里畅游。此后，毛泽东每次到广州来，只要天气不是太冷，他就必定要下珠江畅

游。白鹅潭、黄埔、二沙头等处，他都下去游过，而且哪里水流急，他就越喜欢往哪里去。

这次畅游珠江之后，毛泽东说服了所有劝阻者，决定到武汉去，实现他多年来畅游长江的夙愿。5月31日，毛泽东抵达武汉，以63岁高龄第一次畅游长江，并写下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 勤俭持家，勤俭建国

毛泽东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早在青年时代，他就说过"嚼得菜根，百事可做"。穿越艰苦的战争岁月，走进和平建设时期，他一如既往地保持简朴的生活。建国初期，他就提出"要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指出："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作为领袖人物，毛泽东生活上的简朴，令人惊讶。他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衣服。三年困难时期，他和全国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跟身边工作人员约定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连他一向爱吃的红烧肉都停了。在广州视察期间，工作人员趁机为他加菜，却被他"克"了一顿。在这个时期，为节省汽油，毛泽东和秘书、警卫等5人共乘一辆车，使负责接待工作的苏汉华深受感动。

毛泽东不仅践行勤俭持家，还时刻铭记要勤俭建国。他深知，中国还很穷，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应充分利用资源，容不得半点浪费。1956年视察广州造纸厂时，他在磨木车间磨木面平筛旁，看到几个存放着磨木粗渣的箩筐，上前拾起一束粗渣，仔细地察看着、思考着，然后转身询问一旁的封贯之厂长："这是不是经常有？还有没有用？"封贯之老老实实回答："磨木机生产经常有粗渣，现在还没有利用起来。"毛泽东稍有不悦，督促道："要尽快利用起来！"视察第一抄纸车间时，毛泽东看到复卷机切出许多一厘米多宽的小纸边，在地上形成了一个小纸堆，他俯身拾起一条，关切地问："纸边还有没有用？"封贯之响亮地回答："可以重新利用。"毛泽东听后十分满意，愉快地点了点头，连声称赞："用了就好。"

## "海外的游资这么多，可以利用嘛"

广州毗邻港澳，历史上省、港、澳三地的关系从来十分密切。1956年来广州，毛泽东听取了省委书记陶铸的全面汇报之后，提出要找负责港澳方面工作的



毛泽东65岁生日在广东省委小岛招待所院内留影

领导人谈一谈。此时，广东刚刚成立了华侨投资公司，吸收华侨资金情况并不是很理想，而香港充斥着大量游资，陶铸正想着要实行更积极的政策吸引侨资，适逢毛泽东提出要听取港澳方面的工作汇报，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陶铸指示港澳工委迅速做好了准备，并指定负责港澳具体工作的黄施民向毛泽东作口头汇报。

在小岛旁的“花船”上，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听取黄施民的汇报，不时作些记录。当他了解到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侨居东南亚的华侨富商巨贾纷纷将资金转移到相对安全的香港，香港各银行游资充斥，存款利息急剧下降，甚至到了存款者要倒贴利息给银行的地步时，眼睛一亮，指示说：“海外的游资这么多，可以利用嘛。”当他了解到由于华侨对回国投资存有被“共产”的顾虑，一年1000万港元的投资也不易吸收时，沉思了一会儿，指示说：“要有更积极的政策。”这天晚上直至深夜，透过窗帘人们依然能看到毛泽东房间闪着明亮的灯光，也许他还在思考这个问题。毛泽东对这件事念念不忘，结束此次广州之行前夕，再次叮嘱陶铸：“敞开大门，引进外资，这个想法很好。你们赶快写个报告，我们到北京进一步研究。”

广东省委的报告很快写出来了，据说很快就呈送到了中央，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得到正式的回复，毛泽东积极利用外国资本的构想在他有生之年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成为现实。

## 农业社里笑声洋溢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对农村有深厚的感情，建国后他伟岸的身影还时常出现在乡间田头。1958年4月30日下午，在陶铸、朱光等省、市领导人的陪同下，毛泽东那高大的身躯出现在广州市郊的棠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并留下了阵阵笑声。

下午3时45分，晴空万里，阳光普照。毛泽东身穿银灰色的中山装，神采奕奕地跨出小轿车的车门，红光满面，微笑着向聚集在村口的群众招手致意，并和社干部一一握手，人们心情激动，喜形于色，雀跃不已。毛泽东在社干部的陪同下，在滚动的人流中慢慢地走着。他先跨进供销社大门，与售货员亲切地握手，还仔细地看了供销社里陈设摆卖的商品，频频点头。然后信步走到农业社办

公室，亲切地让梁富、钟叙本等社干部坐在他身旁，他逐一询问社干部的姓名、年龄，听取社员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意见和当年早稻生长的情况、农民的副业收入及生活情况汇报，态度亲切，平易近人，室内气氛轻松愉快。陶铸打趣说："今天我们在这里是开四级干部会议哩。"毛泽东却指指陶铸和自己，风趣地纠正："你，我，不是四级，是六级干部会议嘛！"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

随后毛泽东站起来，朝门口走去。办公室门口、村街上，早已站满了人。毛泽东迈出门槛，一边向围观的群众挥手致意，一边顺着社员让出的石砌小道向村外走去。毛泽东走到试验田旁边，仔细观察了水稻，并详细询问亩产多少、是否会倒伏。此时的广州，已是穿单衣短裤的季节了。在阳光下，人们的脸上都热得渗出了汗珠，身着中山装的毛泽东也微微出汗，可他依然认真倾听着干部的汇报。东圃乡党委书记潘湛将一顶竹帽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接过竹帽，端详了一下，高兴地戴在头上，双手拉着带子，笑吟吟地说："我也像个农民了。"毛泽东风趣的话语，使田野里又一次发出了欢乐的笑声。穿过水稻试验田，毛泽东发现了一块多种作物间种、套种的菜田，很感兴趣地看了又看。这块菜田菜坊上都搭起了竹篱，竹篱上瓜蔓豆藤左盘右旋，篱笆下种有几种作物，像一簇簇矮树丛，枝叶交错。社干部向毛泽东介绍："竹篱上的那是豆角，这是黄瓜，竹篱下面的是芋头、生姜和藿香。"毛泽东赞赏地说："这样土地利用率就高了，多搞些这样的试验田好！"毛泽东这么重视试验田，使在场的人受到很大的鼓舞。这时，正在附近田里劳动的广州第七中学的一群学生，看见了毛泽东，跨过水渠飞奔过来。没等学生们开口，毛泽东就热情地问他们从哪里来，来这里干什么？学生们一一回答。毛泽东十分高兴地指着这群学生，问旁边的农业社干部："你们欢迎他们吗？""我们欢迎同学们来这里劳动，把知识同实践相结合。"钟叙本回答。在场的社员、干部、学生都笑了。顿时，田头又一片欢声笑语。

## 偏爱《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众所周知，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思想家，还是才华横溢的文人，不仅诗词写得好，还是写文章的高手，留下了不少传世佳作。却很少人知道，在自己的文章中，毛泽东尤其偏爱《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更少人知道，《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是在广州审读定稿的。

1960 年 1 月 27 日到 3 月 6 日，毛泽东差不多每天都到鸡颈坑（广州郊区的一处别墅）审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文稿，同他一起审读的主要有康生、胡乔木、田家英、邓力群、逄先知等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著作，反映了中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和所向披靡的革命威势。毛泽东对这一卷选集特别偏爱。他曾说过："一、二、三卷我都没有多大兴趣，

只有个别的篇章我还愿意再看，这个第四卷我有兴趣。那时候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如此，不足以对付我们这位委员长。”在通读第四卷时，毛泽东显得特别兴奋，“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气概，油然而生。读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时，他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客观来讲，《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文章，不仅内容重要，思想深邃，从文字上说也是上乘之作，有很高的艺术性，既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又有行云流水、议论风生的韵致，还有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幽默和讽刺，刚柔相济，文情并茂，充分表现了毛泽东特有的文风，难怪毛泽东如此喜欢。

## 通知代表返回继续开会

1961 年 3 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决定划小社队规模，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同时增大生产队的权力。本来这是符合农村实际的政策调整，是对公社化以来过左政策的纠正，但一些干部以为这是倒退，虽然组织上服从中央的决策，但思想并未真正转过弯来，毛泽东对此也有察觉。

据毛泽东机要秘书罗光禄回忆，广州会议后，毛泽东曾问他：“罗秘书，你看这次会议开得怎么样？是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罗光禄老老实实回答：“从总的看是基本解决问题，但我看还有少数同志思想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的看法不知道对不对？”毛泽东略有所思地点点头：“你说的对。”他又问罗：“代表们走了没有？”罗说：“代表们到机场去了！”他问：“叫他们回来可不可以？”罗说：“可以打电话问问飞机起飞了没有。”他说：“你赶紧办办吧！”罗光禄立即打电话问，知道代表们刚刚到机场，便通知他们不要走了，留下继续开会。这次会议又增加了两天时间。经过充分讨论，大家反映思想通了。毛泽东才真的高兴了。

## 未竟的心愿

广州会议闭幕式上，毛泽东侃侃而谈，谈到他的一个心愿：“沿着黄河而上，再由长江发源地而下，一个逆流而上，一个顺江而下，不坐火车，只走路骑马，到处做调查研究，那才真是快事。”与会人员都以为这又是他浪漫主义的突发奇想，以他的地位和声望，以他肩负的重大责任，以中国的政治环境，这个愿望是断然不能实现的。哪知 1964 年 7 月末的一个凌晨，毛泽东临睡前再次对身边工作人员提到他的这一愿望，“我今年 70 多岁了，在见马克思之前还有件事要办，我准备带上一批科学家，逆黄河而上，顺长江而下，用两年时间考察长江和黄

河，而且不坐汽车要骑马去考察。你明天给我搞几匹马来，同时要有一匹烈马。驾驭住烈马就会带动全局，所谓‘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就是这个道理。”工作人员以为是毛泽东在安眠药作用下突发的奇想，不料他醒来再次追问这件事，工作人员很快准备好了马匹。毛泽东曾经骑了一次，毕竟 71 岁高龄了，明显有些吃力，始终没有松开缰绳或让马跑几步，只是信马由缰，慢慢地走。

（张丽红）

# 刘少奇

## 真知灼见明眼人

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刘少奇先后两次到广东，参与筹备召开第二次、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领导省港大罢工，促进省港工人阶级的大团结、大联合，为广东和全国的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解放后，刘少奇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关心广东的建设事业，多次来粤视察，调查研究，指导工作。

### 一

1925 年 1 月，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主任。3 月，刘少奇作为汉冶萍总工会代表，来到国民革命大本营广州，参与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刘少奇直接领导第二次“劳大”秘书处工作，起草或主持起草大会的主要文件，了解大会动态，及时布置工作。在短短的两个多月内，刘少奇主持起草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等 30 多个大会文件，为“劳大”的胜利召开作出了重要贡

献。

4月29日，刘少奇在第二次“劳大”第一次预备会议上提出，全体代表5月1日参加群众示威游行活动，晚上同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工农联欢大会；以大会名义致电赤色职工国际；通电全国各工会团体等，得到与会者的热烈赞同。



1960年在全国文代会上刘少奇主席接见广东省代表潮剧演员

1925年5月1日至7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汉冶萍总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四大团体联合发起的第二次“劳大”在国民革命中心——广州正式开幕。全国各地到会代表281人，代表有组织的工人54万。这是一次组织全国工人阶级向帝国主义、军阀和资本家宣战的动员大会。大会总结了三年来工人运动的经验、策略和教训，提出新形势下工人运动的方针和策略。刘少奇会上作关于《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决议案》的报告，这个议案被大会一致通过。

大会通过了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等文件和决议，宣布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以下简称“全总”）。全总代表166个工会，拥有有组织的工人54万人。

在第二次“劳大”上，工人出身的香港海员大罢工领导人林伟民任委员长，刘少奇由于领导安源工会、汉冶萍总工会和筹备“劳大”成绩卓著，表现了不凡的领导才干，被推选为全总副委员长，此时他还不到27岁。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劳大”，揭开了全国第二次工人运动高潮的序幕。大会决定全总设在广州，在上海设办事处。会后不久，刘少奇前往上海组织全总上海办事处，并参与领导上海五卅运动。1925年冬，刘少奇因积劳成疾，回家乡湖南养病，被湖南军阀赵恒锡逮捕。

## 二

1926年1月16日，经党的组织和社会各方面的营救，刘少奇在湖南幸脱囹圄。

2月19日，刚刚从湖南出狱不久的刘少奇抵粤，他的使命是主持全总工作，任全总代理委员长（委员长林伟民已卧病数月）。在广州期间，他和邓中夏、苏兆征等担负起领导省港大罢工的重任。

此时，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已坚持9个多月，国民革命的浪潮奔腾怒吼，席卷南中国。20万罢工工人在省港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下，成为一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重要力量，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然而港英当局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1926年2月22日，即刘少奇刚到广州的第三天，广东海关掌管税务的英国官员贝尔，以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扣留未经查验的货船为借口，擅自下令封锁海关，停止装卸货物，妄图阻断广州及华南对外贸易通道，以期达到扰乱中国内地经济秩序和败坏省港罢工声誉的目的。刘少奇、邓中夏、苏兆征等经过研究，决定迅速采取行动，发动广州各界群众投入反对封闭海关的斗争。25日，全总和省港罢工委员会联合广州各商会，发出《工商联合对粤海关税务司贝尔宣言》，揭露帝国主义“以小故封关”，“妄图断绝我生命”。26日，在刘少奇等的领导下，广州工农商学各界10余万人举行示威游行，声讨和抗议英帝国主义无理封关的行径。港英当局在中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宣布重开海关。

在省港大罢工期间，省港工人运动迅速发展，但各工会之间存在着组织涣散、派系林立、各自为政、行动不统一的现象，未能形成集中统一的力量。为增加省港工人阶级的团结和战斗力，刘少奇多次约请各工会领导人开茶话会、谈心会或报告会，循循善诱，耐心地向他们阐述统一工会组织的意义。在刘少奇等的耐心帮助、具体指导下，省港工会迅速地行动起来。

省港工会统一运动首先从香港工会开始。香港工会统一运动首先从香港运输业、金属业开始。

3月19日，香港运输业工会联合会在广州举行成立典礼。刘少奇亲临大会，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

香港机器工人在省港大罢工期间回到广州后，分别成立香港机工联合会和华侨机器十科工会。经过刘少奇、邓中夏、苏兆征等反复劝导和帮助，两工会同意联合起来，成立香港金属业总工会。

香港运输业工会联合会和香港金属业总工会的成立，构成香港工会统一运动的两大支柱，带动了香港各行业工会的迅速联合，为成立香港总工会创造了条件。在香港各派工会逐步按行业实现统一的基础上，4月4日，刘少奇主持召开香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着手建立香港总工会。15日，香港各工会代表在广州召开香港总工会成立大会。到会代表600多人，代表香港140多个工会组织。刘少奇作《全国职工运动的报告》。23日，刘少奇出席全总、广东省农民协会等6个团体召开的欢迎香港总工会代表大会代表的集会，代表全总将写有“革命前线大炮台”的旗帜亲手授予香港总工会。香港总工会的成立，是省港工运史上一件大事，使全港分散的工会形成了统一的领导机关，使省港大罢工的组织领导工作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与此同时，根据全总和刘少奇等的指示，广州工会也逐步按系统、行业实现

统一。4月1日至7日，广州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参加大会的工人团体138个，出席代表1752人。刘少奇参加大会并致辞。会后不久，广州各派工会成立了全市统一的工人代表会，有210多个工会组织参加，代表近20万工人。在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的带动下，广东全省的工会统一运动日益发展。

省港工会的统一，壮大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和声势，充分显示了有觉悟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刘少奇为统一省港工会所作的贡献，在省港工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 三

为总结第二次“劳大”以来工人运动的经验，确定今后的奋斗方针，全总决定于1926年五一节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劳大”。刘少奇和他的战友们废寝忘食，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

5月1日，第三次“劳大”在广州开幕。到会代表502人，他们代表全国699个工会团体，124万有组织的工人，并有英、苏、法、德、日等国工会代表参加。刘少奇担任大会秘书长，并代表全总作《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报告，大会通过了数十件决议案。大会还向广州国民政府提交了北伐请愿书，号召全国工人积极投身和支持北伐战争。在“劳大”期间，广州连续举行工与农、工农学、工农商学各种联欢盛会，全市如同过节一般，到处人山人海，红旗飘扬。大会接到的来自各省各界的拥护函电多达六七百份，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各社会团体都表达了对大会的热烈祝贺，以及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希望与信任。

第三次“劳大”闭幕后，刘少奇担任全总常委兼秘书长。在他的主持下，全总设立了教育宣传委员会。1926年6月，全总在广州创办了劳动学院，招收的学员是省港各工会的职员和工友。

## 四

解放后，刘少奇曾于1954年、1957年、1958年、1961年多次到广东视察，指导广东工作。其中，1957年他到广东调研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众“闹事”事件时，提出许多真知灼见，给广东人民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1957年2月18日，一趟专列从北京悄悄开出，向南方疾驰而去。乘坐专列的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少奇和他带领的南下调查组。刘少奇沿着京广线，一路南下，先后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调查研究。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对1956年下半年以来某些地区出

现的工人、学生和复员军人在就业、升学、安置等方面出现一些一时难以解决的困难，发生少数人“闹事”的问题进行调研。

3月29日，刘少奇乘坐的专列抵达广州站。刘少奇不顾旅途的疲劳，一下车就开始投入紧张的调研工作。直到4月11日，刘少奇才离开广州。在这短短的半个月内，刘少奇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分析群众“闹事”事件的性质、原因，并提出了许多富有改革精神的思想和主张。

在群众“闹事”事件的性质判断上，他认为群众闹事，属人民内部矛盾。他一再强调，人民内部矛盾最基本的就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地”“表现在分配问题上”。他分析说：大家都想多分房子，都希望升学，想多得些工钱，其实，这些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分配问题，这些问题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是实行按劳取酬的，但真正实行起来又是很难的。他风趣地说：“你们说你们一个月的劳动值多少钱，毛主席一个月的劳动又值多少钱，我的劳动又值多少钱？我们的劳动是很难计算的”。刘少奇认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问题上”，“上层建筑犯主观主义错误、犯官僚主义错误、犯宗派主义错误就不能适合经济基础，就不能为经济基础服务，而损害这个经济基础”。

刘少奇强调，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已“突出起来”，党的中心工作不再是阶级斗争。他对广东省委负责同志说：“以前主要是搞阶级斗争，现在已经基本上结束（当然尾巴还要扫），今后党和政府干什么呢？就是要管理经济（当然阶级斗争还有一点，还要由公安人员去管这方面的工作），政府就日益成为管理经济的机构，当然也还要有政治思想工作的保证”。他语重心长地要求广东省委的同志要熟悉经济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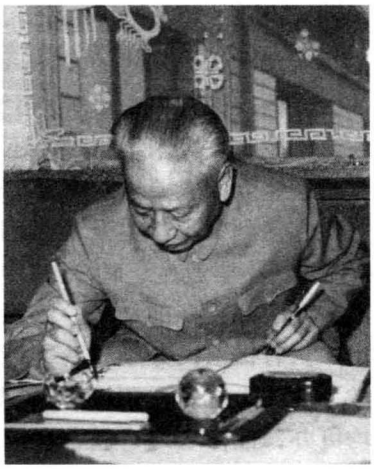
政府如何管理经济呢？刘少奇在广东调研时，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

在计划方面，刘少奇提出经济计划要有多样性和灵活性。他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计划，“组织得不好会阻碍生产，搞得好会促进生产”。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只能计划那几类，而不是几十万种，如只强调计划性，就会挤掉灵活多样，变得简单、呆板。他提出要做到计划性、多样性和灵活性相统一。一是要学习和利用自由市场灵活、多样的特点；二是在国家计划之外，各地区、各部门要有各自的计划。

在工业方面，刘少奇提出应该向“地下工厂”（私人开设的小厂）学习。当广东省委向他汇报广州市出现“地下工厂”时，刘少奇插话说，“地下工厂”值得研究，“我们要研究它们的经验，研究它们为什么能赚钱，研究它们的经营方式，要灵活。不要像苏联那样，搞得太死板”；“地下工厂很灵活，钻得很厉害，哪里需要它就搞，这对我们很有好处。我们是不去钻的，我们应看着它钻，我们

也跟着钻。前面乌龟扒开路，后面乌龟跟着扒，资本主义开辟道路，我们跟着来，这很好”。

在农业方面，刘少奇提出要切实做好包工、包产工作。4月4日，广东省委向他汇报农业工作，他了解到广东一些农业社包产无法包下去时，指出：包产包不下去，是因为定产的指标问题：农业社要定产高，队在定产低。他认为应定两个指标，包产的指标应定得稍低些，争取超产的指标可定得高些，“总之让生产队有点油水”。他对广东一些地方实行包工到户的做法表示赞赏，“固定地段专人负责，一部分田间管理工作包工到户，可使农民灵活掌握时间，加强责任心”。



刘少奇工作照

在商业方面，刘少奇提出“不能把自由市场搞掉”。刘少奇在听取广东省委汇报自由市场问题时说：“自由市场对我们有利，可以暴露我们缺点，补充国营商业不足，方便人民……这虽然不很痛快，但有好处”，“看来自由市场搞大一点好”。他要求国营商业应当放下架子，向私商小贩学习，采取一些灵活的办法。例如下乡采购、晚间营业等等，搞好对市民的蔬菜供应，国营商业能让群众方便地买到又便宜又新鲜的蔬菜，才能显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当广东省委向刘少奇汇报许多国营商业竞争不过私商时，刘少奇严肃地说：“现私商有钱赚，发横财……这表现社会主义失败，私商胜利。我们搞它不赢，表现无能（虽然我们国家有机器、有军事、有资金），没有小商贩进步，有落后性”，接着，他风趣地说：“私人可以做的生意，为什么陶铸、朱光不能做，省、市政府不能做呢?”他强调：“我们的成本、劳动生产率、利润率都显得落后，不要迷信社会主义一定比资本主义进步。做的结果，我们很多不如资本主义，这样社会主义就要灭亡。”

怎样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众“闹事”事件？刘少奇认为不能草率处理，简单压服，要诚心诚意同群众商量、讨论，解决他们的问题，绝对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办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春，广东发生了多起工人、农民、学生、退伍军人“闹事”事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震动全国的“化县麻风村事件”。是年3月，化县（今化州市）兰山乡群众强行阻止在该地兴建麻风村，刘少奇对该县出动警察对付群众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认为是严重混淆敌我界限，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他严厉指出：“必须搞清楚，我们现在还有几百万的军队和一些警察，这些是对付谁的……如果对付人民内部的矛盾，对付人民，也可以说，这几百万军队和警察等于没有用”，“如果拿军队和警察去对付人民，那我们就会从根本上犯错误，因为它是用来对付敌人的”。刘少奇反复

强调，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必须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这是我们过去解决党内矛盾的方针，“现在把这个方针扩大了，扩大到用在所有人民中间，全国6亿人口内部所发生的问题，都用这个方针来解决。”

刘少奇在广东调研时，还了解到一些群众反映比较大的问题，如中小学生升学难、企业工人要求盖家属宿舍、临时工要求转正等问题。

在谈到中小学生升学难问题时，刘少奇提出，全国约有4000万适龄儿童、400万高小毕业生、80万初中毕业生、8万高中毕业生要升学，而国家财力有限，无法办更多的学校，满足他们升学的愿望。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刘少奇提出，只有提倡民办学校，才能解决这个矛盾。他把办学分成三类：一是国家办学，他认为这是“正规军”，要办得正规一些；二是合作办学、集体办学，城乡均可办，他称之为“教育合作社”；三是私人办学。刘少奇主张教育不应由国家全包下来，提倡“发动大家办学，普遍地搞”。

针对临时工要求国家将他们转为固定工的“闹事”事件，刘少奇在广东作报告时说：“如果所有的工人、教职员、干部等等，都是这样要求，行不行？我看，是不行的。”他主张实行两种劳动制度，一是临时工，一是固定工。所谓临时工，“也就是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可以出卖，它有市场，我需要工人，可以雇请你来，签订个合同……合同期满，不解雇也要回去。这也可以叫劳动力自由市场，国家要就雇请，不要就解雇……大家都照合同办事”。

在谈到住房制度暴露的问题时，刘少奇认为，由于职工宿舍房租太低，导致宿舍盖得越多，成本贴得越多，国家投资不但收不回，而且每年连维护管理费都不够，怎么办？刘少奇提出收高房租的设想。为解决住房困难，缓解住房紧张局面，刘少奇主张工人积钱建房，房子归个人所有，也“可以出租、出顶，或出卖”。

（彭建新）

# 周恩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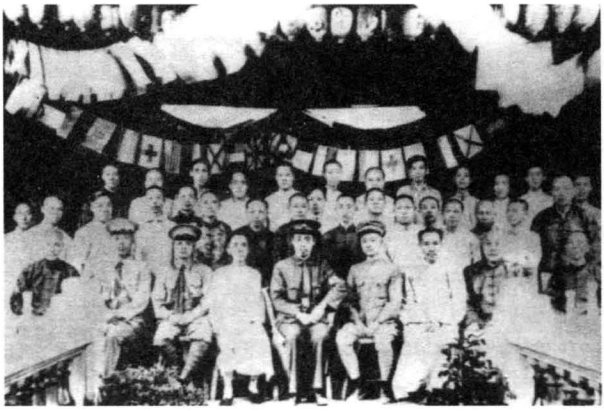
## 建国前在广东六次遇险

大革命时期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粤东八属行政专员等职。南昌起义后，又率领起义军南撤粤东。在广东这块土地上，曾为革命洒下辛劳的汗水，作出莫大的贡献，也在这里遇险六次，而都凭他的大智大勇以及在广东党和人民的关照下，安然脱险。

### 棉湖之役，九死一生

1925 年 3 月的“棉湖之役”是第一次东征中最激烈的一次战役。在天津的邓颖超时刻牵挂着周恩来，不知他在前线怎样了？负伤了没有？3 月中旬，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天津市面传开，说东征军在棉湖失利，蒋介石被打伤了脚，周恩来阵亡。这个消息使邓颖超惊呆了。她不相信这是真的，她判断东征军肯定在棉湖打了一场恶仗，不禁为周恩来和黄埔学生军担起心来。

6 月初的一个晚上，邓颖超正在灯下起草一个文件，突然



1925年，周恩来（前排左五）和东征军到达梅县，受到当地人士的欢迎。

有人叩门。她谨慎地问："谁?"门外的人答道："大姐，是我。"啊！是从广东东江前线回来的。她赶紧打开门，把客人让进屋里，倒茶端糖果，等到客人坐定了，她才缓缓说道："近来市面上谣言很多，我真为你们担心。棉湖那一仗是怎么打的?"一说起战斗，客人来劲了。他怕邓颖超听不懂他的湖南话，比划着讲了起来，邓颖超这才知道战斗的经过。

原来东征军占领棉湖后，留下1000多人驻守。总司令蒋介石这时产生轻敌思想，率领主力部队准备前进。不料陈炯明的悍将杨虎率1万余众反扑过来。蒋介石慌了手脚，连命令都发不出来了。周恩来眼见形势危急，挺身出来指挥，命令何应钦率棉湖驻军抗击，又派人给前方的叶剑英送信，命他回援。周恩来亲自到驻军指挥所，命令部队抗击。东征军奋勇抗击着如潮水般冲过来的敌军，杀声震天，炮火连天。周恩来又亲自到炮兵阵地上指挥。炮兵阵地是当时敌炮轰击的重点，万分危险。刘畴西说："周主任，那里危险，我去吧！"周恩来拉开他，斩钉截铁地命令道："赶快执行命令，不要中断指挥。"说完冲出指挥所，向弹片横飞的炮兵阵地跑去。他向战士们一挥手："我们是革命士兵，决不让敌人冲上来。听我的指挥，朝着敌人开炮！"说完，跑到炮位上，拿起指挥旗，命令道："目标，正前方开炮！"战士们见东征军政治部主任亲临炮位指挥，勇气倍增，不管周围乱飞的弹片和子弹，按照命令，拉响6门大炮的炮栓。"轰隆"炮弹在敌人阵地上爆炸了。只见敌人冲锋的队形顿时混乱，更奇怪的是，敌人的冲锋也停了下来。周恩来拿起望远镜看了一会，高兴地喊起来："我们把敌人的指挥部打烂了，指挥官也叫我们打死了。大家快装炮弹，目标：敌冲锋群——放！放！"炮兵们打得正高兴，忽然对面出现了一支部队，喊杀着，向敌人包抄过来。周恩来拿起望远镜看了一下，认出是叶剑英的援兵到了，便把指挥旗给一位炮长，命令他指挥，自己赶往指挥所去了。就这样，东征军在周恩来的指挥下，棉湖一战，歼灭了陈炯明的主力，平定了东江。当然，东征军伤亡也很大，所以才传出周恩来阵亡的消息。

邓颖超听完客人的叙述后才放了心，这时东征军已回师广州，镇压滇桂军叛乱。

## 沙基惨案，幸免于难

1925 年 5 月 30 日，英国在上海南京路开枪打死打伤数十人，逮捕百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接着，英、日、美帝国主义于 6 月 1 日出动军舰，其陆战队又在上海大肆捕杀工人和学生，使 60 多名中国人死于非命，70 余人受伤。如此的血案，如此的杀戮，不仅激起受害当地人民的愤怒，广州的各界人民都发出了巨大的吼声。6 月 18 日，广州 120 个团体举行了集会，广东和香港外国工厂的中国工人于 19 日开始了大罢工。23 日，广州举行了各界声援上海人民和香港工人的反帝示威大游行，参加游行的军队是周恩来抽调去的，当时他从黄埔学生军中的两个团里抽调了六个连，组成一个营，从国民党党军里同样抽调两个营，并让铁甲队也出动，排在香港罢工工人大队及工、农、商、学队列之后，臂缠黑纱，手执红旗，高呼口号，沿着预定路线前进。革命政府派出的两架飞机，不时地在游行队伍上空上下飞翔，投撒传单，给游行增加了一种扬眉吐气的特别气氛。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使盘踞在沙面小岛上的英、法等帝国主义强盗十分害怕。在游行示威的前一天，英、法帝国主义分子就将沙面东西桥的铁闸完全关闭，并派水员登陆，在沙面所有重要地点高筑沙包，又将 8 艘外国军舰停泊在沙面江面上。果然，当游行的黄埔学生军将至西桥，走到沙基调元街口之时，沙面维多利亚酒店楼上就有人突然向游行队伍开枪了。英国工部局的洋兵听到枪响，便用机关枪向沙基一带猛烈射击，停在沙面附近白鹅潭的外国兵舰，也向北岸开炮轰击。

这次惨案中，周恩来和他的同事们身先士卒。在随军警队伍的行进中，他的左右两侧各有一位同事并肩而行。突然，一阵枪声响，左右两边的两位同志倒在了血泊之中，中弹身亡。周恩来听到枪响，当即敏捷地匍匐在地，很快转入小巷，到后街隐蔽起来。事后统计，沙基惨案死难 50 多人，受伤 170 多人。对于这次历险，周恩来很少提及，当时甚至连邓颖超也没有告诉，直到一个多月后邓颖超由天津调到广州担任广东区委委员和妇女部长时，才听周恩来说到了这段经历。

## 宵禁枪击，险些丢命

1925 年 7 月 1 日，国民党把孙中山的陆海军大元帅军事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汪精卫担任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主将廖仲恺，担任政府常委和财政部长。廖仲恺的政治态度和认真工作的精神，受到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嫉恨，时任粤军司令的许崇智纠集一些人在胡汉

民家中召开倒廖会议，决定将廖刺死。8月20日上午，廖仲恺去中央党部出席会议，刚登上党部大楼门前台阶，就遭到预伏在骑楼下几名刺客的枪击，廖仲恺身中四枪，当即被送到医院抢救。周恩来听到消息后直奔医院，才见了廖仲恺最后一面。国民政府成立了“廖案检查委员会”，周恩来参加并担任委员，在提审被捕的刺客时，得知有人花几十万元来买枪手，以刺杀廖仲恺和谭平山。在香港还有人花200万元买凶手，刺杀共产党员。暗藏势力的卑劣活动使周恩来异常气愤，写了《勿忘党仇》、《沙基惨案与廖党代表之惨死》等文章，还发表演讲，认为这一暗杀案的后边有极大的黑幕阴谋。他提出处理廖案要与肃清革命政权内部的右派相联系。廖案发生之时，粤军正驻守在广州城内。国民党政府主席汪精卫知道此案与粤军干系不浅，便命令黄埔军校校长兼广州市卫戍司令、长洲要塞司令的蒋介石，实行全城宵禁。蒋接令后立即占领军事要地，实行戒严，使许崇智无法再调城外的粤军入城，城内粤军的活动也被蒋介石的部队所控制。由于广州公安局长吴铁城是倒廖的主要成员，汪精卫又反对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扣押胡汉民的主张，因而直到案发第四天，一些主要案犯仍然逍遥法外。8月24日，蒋介石和周恩来、何应钦商议，决定当晚11时加强戒严，组织兵力搜捕案犯，并规定了内部联络的口令。决定作出之后，蒋介石忽然担心晚上的行动计划泄露，造成刺廖凶犯逃匿，便独自召集亲信，将戒严时间提前到晚上9时，还改变了原定的内部联络口令。

周恩来这天傍晚代表革命人民和政府专程去黄埔港口，迎接乘列宁号轮船来华的苏联派遣的“国际工人沙基惨案调查团”。在和苏联使者交谈之后，看见晚上9时已过，戒严缉拿凶犯的时间就要来临，便急忙坐进汽车，赶往司令部督察部队行动。周恩来根本不知道此时全城已经戒严，也不知道联络口令已变，只是想尽快赶到司令部。已经看见司令部的大门了，就听门卫突然大叫：“停下！”司机没有想到周恩来的车在很远的地方被叫停下，仍然驾车行进。“口令？”回答却是原定的口令。门卫见口令不对，车又不停，便大叫：“再不停，我就开枪了！”正喊着，一串子弹就飞了过来。身受重伤的司机见情况不妙，急调车头拐进小巷后，倒在了驾驶座上。听到枪响，周恩来急忙伏下身子，躲过了枪弹。他走下车连声高喊：“我是周恩来！”门卫这才发现是政治部主任，一个个都被吓呆了。当他们赶来抢救司机时，发现司机已经没有了心跳。当晚，抓获了刺杀廖仲恺的三四个凶犯。刺廖的真凶国民党右派也受到打击，粤军司令许崇智被赶下台逃离了广州，原代理大元帅胡汉民被卸职出洋，左派势力得到胜利。在完成上述任务之后，周恩来才返回自廖案发生以来未曾回过的家——文德路文德里寓所。

周恩来的这次遇险，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更改戒严时间和变更口令实属大事，蒋介石为何不通知“廖案检查委员会”成员的周恩来？蒋介石和何应钦是无意疏忽，还是有意而为？当时未能搞清，事后更成了一个谜案。

## 黄埔军校，遭蒋软禁

“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前，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地位非同一般，由他执掌的政治部和教练部、教育部并称为黄埔“三大支柱”，并担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6 年 3 月 20 日“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周恩来立即带了四名卫士去造币厂见蒋介石，要求蒋介石释放所有被监禁的共产党员。路上巡逻的士兵见是周主任，都没有阻拦他。到了造币厂门口，只见门口排列着许多士兵，个个端着刺刀，如临大敌。以往周恩来去见蒋根本不需要通报，今天却不同了。他刚走到门口，一个军官走过来，“啪”地敬了个礼说：“校长有令，任何人不得擅入。请周主任稍候，我进去通报一声。”周恩来在门口等了好一会，不见那个军官出来。再看看那些士兵，个个脸色铁青。周恩来一阵心寒，一种不祥的预感掠过心头。但被捕的那些共产党员的安危扯着他的心，即使是赴汤蹈火，他也得闯闯这阎罗殿。周恩来等了很久，那个军官出来了，把手一摊说：“周主任，请!”周恩来随即带了四名卫士跟着军官走了进去。刚走几步，忽然“哗啦”一声，一下子拥出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把枪口对准周恩来和卫士，大声喝道：“不许动!”随即缴去了卫士的枪。周恩来怒斥他们：“我以东征军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命令你们，快把枪还给我的卫士。”那个带他们进来的军官赔笑说：“周主任不要误会，这也是校长的意思。”周恩来正要发脾气，蒋介石的警卫连长从里院走出来说：“周主任，请你不要生气，这是不得已的事。校长正在办公室等你呢，请走吧。”周恩来知道士兵们是奉令办事，和他们再讲也没有用，见了蒋介石再说，便急步向蒋介石的办公室走去。

蒋介石正在屋里等他。一看他进来，连忙招呼：“周主任，请坐。”又吩咐卫士泡茶。周恩来摇摇手说：“不要泡了。请问蒋校长，你为什么要逮捕李之龙和共产党员?”蒋介石把手往下按按说：“周主任，不要这么大火气嘛，你听我解释。”蒋介石故作亲热地朝前凑凑说：“今天的事和共产党没有一点关系，这都是娘希匹汪精卫搞的名堂。我先把李之龙他们集中起来，是为了避免他们上汪精卫的当，这也是为贵党好啊！你今天来了，也别出去了，就在我这里住上一天，看汪精卫还能造你的什么谣。”周恩来抗议说：“你是要软禁我?”蒋介石“这个”“这个”地哼了几句说：“不要说那么严重嘛。棉湖一战，你帮了我，我是信得过你的。现在外面乱得很，我有责任保护你。”说完叫来卫士，吩咐说：“你们送周主任去休息。要好生伺候，不许怠慢。”就这样，周恩来被送到造币厂的一个豪华客房被软禁起来。直到晚上，蒋介石才跑过来看他。一进屋就说：“周主任，好了，事情搞清楚了。贵党总书记陈独秀给我发来电报，说这件事完全是一场误会，国共两党还要精诚合作。”周恩来说：“什么误会？这完全是你借右派来打击

共产党。我对此表示抗议。”蒋介石说：“不要这样嘛，这是误会，咱们一起吃饭去吧。”周恩来问他：“你既然连连说是误会，那些关在造币厂的共产党员什么时候放?”蒋介石说：“就放，就放。不过事情既然到了这个地步，我希望共产党员从第一军和黄埔军校退出去，以免再发生误会。”周恩来反驳说：“黄埔军校和第一军都是国共合作的武装。你要共产党员退出去，是不是要和共产党分裂?”蒋介石一听慌了，忙解释说：“不要误会，不要误会。我是非常尊重贵党的。我不止一次在军校讲演说过，谁反对共产党那就是反对我，是反对革命。我怎么会和贵党分裂呢？我只是担心就这样下去，军心不稳，指挥不统一。你还记得吧，第二次东征途中，胡宗南和陈赓为了一点小事吵起来，结果两党军人在餐厅里用餐具打斗。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周恩来说：“我没有忘记，第二次东征途中，当改编的第三师兵败如山倒的时候，是陈赓把你从阵地上背下来，救了你的命。你现在屁股刚坐稳，就把第一军的共产党员抓起来，你对得起谁?”蒋介石听了，似有所动，“这个”“这个”地支吾了几句，下令把关在造币厂的共产党员放了，把缴的枪还给周恩来的卫士。

周恩来见援救共产党员的目的已经达到，就告辞走了。蒋介石望着他气昂昂的身影，感慨地想到：英才啊，英才！为什么杰出的人才都跑到共产党里去了呢。过了一个多月，他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要求共产党员不要跨党，但可以退出共产党，保留国民党党籍。他本想通过这个办法把周恩来、蒋先云、陈赓、聂荣臻，这些黄埔军中的共产党员都拉到国民党内来，今后好为他所用。他估计许多共产党员会这么做的，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嘛，现在谁不想抱住蒋校长这棵大树好乘凉。没有想到，此案一出，黄埔军中的400多名共产党员“哗啦”一下子都退出了国民党，连他最信任的黄埔高材生蒋先云也不要国民党的党籍了。这使他感到非常失望。

## 普宁遇险，暂避香港

1927年8月5日，起义军占领南昌后，周恩来随革命委员会机关撤离南昌，踏上南下征途。盛夏酷暑，烈日当空，在浩浩荡荡的起义军行列里，周恩来始终坚持和部队一起行军。劳累一天的行军后，战士们一到宿营地，很快都呼呼入睡了。一觉醒来，同志们经常发现周恩来还坐在油灯下，专心致志地看着文件材料，筹划着第二天的行军路线和下一步的工作。

1927年9月，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起义军主力进军潮汕。面对三倍于己的敌军，起义军虽然作战英勇，终因连续鏖战，疲惫不堪，未能获胜，只好放弃汕头，向普宁及海陆丰撤退。而此时，敌人已抢先占领了揭阳、汤坑一带的有利阵地。

1927 年 10 月 3 日，周恩来和贺龙、叶挺等到达普宁县流沙镇。这时，周恩来患上了恶性疟疾，连日发高烧。尽管这样，他还是抱病在这里召开了紧急会议。



周恩来和邓颖超

会议正在开着，敌人突然袭击，战斗在镇子打响了，会议被迫中断，一片混乱中大家紧急疏散隐蔽。在撤退中，周恩来的身边只剩下聂荣臻、叶挺，两个人轮流背着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的周恩来连夜转移。路不熟，又不懂当地话，三个人只有叶挺身上配了一把小手枪，如果遇到敌人，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聂荣臻和叶挺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周恩来是党的重要领导人，宁肯自己粉身碎骨，也要保护好他。就在这时，他们找到了中共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晚上，杨石魂找来一副担架，把周恩来等转移到离流沙河不远的一个小村子。几个人经过商量后，决定渡海到香港去。在辗转中，周恩来病情加重，连稀粥都吃不下，有时神志不清，躺在担架上还在喊“冲啊”！费尽千辛万苦，他们终于来到陆丰县甲子镇，找到了一条小船，于黎明前扬帆出海。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周恩来、叶挺、聂荣臻、杨石魂，再加上船工，一共五个人把小船挤得满满的。他们把周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挤不下第二个人。其他三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

那天台风刚过，海面上仍然风大浪急，小船摇晃得厉害，坐都坐不稳，随时都有掉到海里的危险。大家找来船上的绳子，把身子牢牢拴到桅杆上。小船就像一片树叶，贴着浪尖颠簸着前行。在茫茫大海中漂泊了两天一夜，他们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杨石魂和省委取得了联系，把周恩来安置下来治病，便回海陆丰了。由于走得匆忙，他忘了给聂荣臻和叶挺清楚地留下与省委联络的暗号。由于不清楚接头的办法，当他们去省委机关时，省委的同志没有贸然与他们接头。他们一时不敢在街上活动，就找了一个小饭摊，买了两碗饭和一点广东腊肠，匆匆忙忙吃完就走，然后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下。后来，他们终于设法同组织联络上。不久，周恩来在香港养好病，回上海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 途经汕头，化险为夷

1931 年 12 月的一个傍晚，夜幕降临，汕头大街小巷热闹非凡。位于海平路

的华富电器材料行和位于镇邦街的中法药房是中共汕头地下交通站的两个绝密住所。这时，临街的华富电器材料行里来了两个特殊的客人，正像与主人在切磋什么生意的样子。那个像老板一样的年龄约摸有30出头，浓眉大眼，气宇轩昂，身穿对襟哔叽中式短上衣，着一条蓝哔叽裤子。他正是大名鼎鼎的中共中央常委、军委主席周恩来，他是经过此地前往中央苏区的。坐在左边的机警的小鬼绰号叫“小广东”，大埔人黄华，是汕头交通站的交通员，公开职业是华富电器材料行的勤杂，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潮州话，坐在右边的叫萧桂昌，原籍广东中山，出生地上海，是中央交通局的交通员。

汕头交通站长陈彭年汇报了汕头站和通往苏区沿途的一些情况，对几个月前项英、任弼时、王稼祥、徐特立、萧劲光等一批干部路过汕头的经过，也作了简要的介绍。周恩来听后很满意，对汕头站的出色工作表示赞赏。周恩来和萧桂昌被安排进金陵旅社。这是当时汕头最大的一间旅社，豪华而宽敞。周恩来以商人的身份，在这里下榻是很合适的。安排停当后，周恩来随陈彭年走下楼来，在拐弯处，忽见墙上玻璃框里面，镶嵌着一张照片，定睛一看，不禁怔住了：原来，镜框里的那张照片，是1925年汕头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合影，里面就有周恩来。这张照片，对他来说，无疑是一幅“通缉像图。”虽然时隔六年，他的相貌仍与照片十分酷似：那浓密粗黑的剑眉，那明亮传神的眼睛，那俊秀刚毅的面庞，只要过去同他有过接触的人，还是不难辨认出来的。他在汕头主持东江政务时，多少人进出行政公署，而这些人当中，有的已成为反动派的鹰犬……长期搞地下斗争，时时刻刻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的周恩来，意识到问题严重性，轻拉一下陈彭年的袖管，轻声道：“转移!”

陈彭年也跟着周恩来的眼神，发现了那张照片，他毫无二话，马上与萧桂昌一道，把行李搬往棉安街的一间小旅店。别看这家旅店门面不大，来头可不小呢。原来，这是潮汕国民党驻军最高长官一独立第二师师长张瑞贵秘密开设的。局外人不知底里，汕头交通站的工作人员却是一清二楚。那些年头，汕头的旅店，几乎天天都要“查夜”，而且往往是“闹通宵”。先是警察来，接着是宪兵来，最后还有便衣特务来“打扫战场”。闹得旅客心惊胆战，睡卧不安。唯独这棉安街旅店，警察特务不敢查夜，地痞流氓不敢来骚扰。谁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于是这间小旅馆便成为闹纷纷的汕头“世外桃源”。这一夜，周恩来放心地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一早，周恩来、萧桂昌来到华富电器材料行，在这里吃了早饭，更换了衣着，然后，由黄华雇了三辆人力车，直奔汕头火车站。

这一回，周恩来穿的是一套西装，依然戴一顶毡帽，随身只有一个体积不大的扁平小木箱，里面装着色料、画笔和纸片——原来，他装扮成一位画像先生。黄华买了三张汕头至潮州的二等车票。三人随即上了火车。谁知上车后，周恩来发现偌大的一节车厢里面，只有他们三个人，很容易引人注目。周恩来感觉情况

不妙，连忙带着萧、黄两人转至隔壁的三等车厢。那时，汕头至潮州的三等火车票，价格是大洋七角六分，二等车票价加一倍，而多花了一元多钱，平民百姓谁能花得起？三等车厢里，乘客拥挤吵杂，行李横七竖八，三人好不容易找到临近窗口的空位子，挨着身子坐下来。周恩来随身取出一张报纸，低头阅览。

就在这时，检查员走了过来，周恩来警惕地抬起头来，瞅了那人一眼，不禁心头一震。原来，那人是铁路工会的一个骨干，六年前曾多次到东江各属行政公署，向他汇报请示过工作。此人心是“红”的还是“黑”的，天才晓得！周恩来赶紧拉下帽檐，扭过头去看窗外，萧桂昌看在眼里，机警地站起来挡住他，随手将三张车票递给那检票员，跟着又恭敬地递上一根香烟。那人见是二等车票，用手一指说：“到那边去坐，这里是三等车厢。”“是是，刚才上车看错了，真是的。”萧桂昌装着责备自己，一面又顺从地应和检票员：“这就过去，这就过去……”

幸好车厢里只有这么一个检票员，三人见他又继续检票去了，也就坐着不动了。在潮州吃过午饭后，周恩来等来到韩江边，乘坐下午 2 时开往大埔的电船，溯江而上，过茶阳、入青溪……沿着我地下党开辟的红色交通线，直上江西苏区去了……

在革命斗争的艰苦岁月里，周恩来遇到过多次危险！但他都能从容面对，毫不畏惧，用过人的智慧，安然无恙地渡过了难关。

（陈永红）

# 大革命时期在潮汕

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斗争时期，周恩来曾经先后多次到达潮汕，在这块土地上叱咤风云，指点江山，留下了许多动人的历史镜头：1925 年 3 月和 11 月，周恩来以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政治部主任身份两次莅临潮州，建立潮汕的中共党组织，参与创建黄埔军校潮州分校；1927 年 9 月，带领南昌起义，挥师挺进潮汕，建立革命政权；1931 年 12 月，从上海转移到福建汀州的中共闽粤赣苏区省委，智过潮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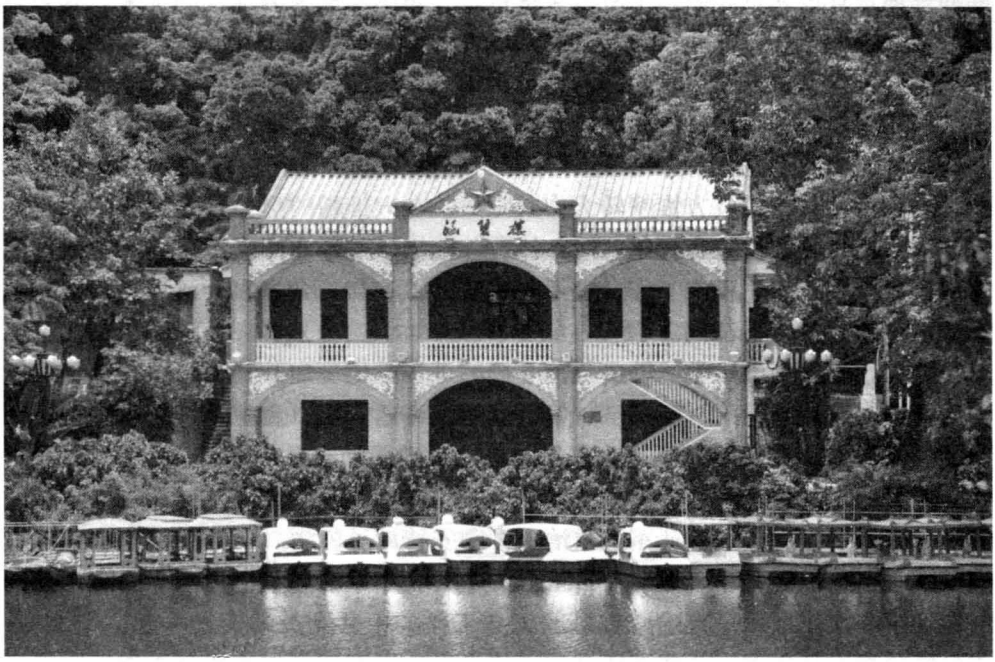
## 播下革命的火种

1925 年 2 月，为了摧毁盘踞东江潮梅的反动军阀陈炯明的势力，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国民革命政府组织以黄埔军校学生军为主体的国民革命军东征，粉碎陈炯明妄图推翻国民革命政府的阴谋。3 月来到潮汕，10 月国民革命军再次东征。周恩来以东征军政治部主任身份领导东征革命斗争。他广泛开展革命宣传，鼓舞民众信心，使潮汕出现朝气蓬勃的政治景象。紧接着又着手建立潮汕的中共党组织。

秋末的南国潮州，西湖两岸垂柳依依，碧绿湖水倒映涵碧楼。城北的湘太路街头上，宣传员有的正在写宣传标语，有的忙于张贴。周恩来走过来，对着宣传员说："大家辛苦了，我来帮忙啊。"他兴致勃勃地拿起笔、展开纸，专注写起标语来。群众迅速围观过来，有人说："这年轻的军官是谁？写得好漂亮的字。"

杨石魂、廖其清、宋青走过来。杨石魂说："大家不认识吧，他是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军委书记、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东征军总政治部的周主任。"

"哦，石魂兄、其清兄、阿青，我们到涵碧楼里坐一坐，谈潮汕方面的情况。"周恩来招呼杨石魂、廖其清、宋青，从



涵碧楼位于潮州西湖公园湖畔上，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中，周恩来、周逸群等曾驻扎于此。

虹桥向涵碧楼走去。

周恩来站在涵碧楼阳台上，放眼氤氲中的潮州古城，对杨石魂说："5 月东征军胜利进驻潮州，东莆农协妇委孙应采和三位农工带我到潮安的金石西林村，在西头书斋会见农协负责人孙戊昌，潮安的农运迅速发展随处可见可闻。"他思索着，又说："革命到此关头，民众已经发动起来，可是民众的革命行动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组织统一指挥部署。我们到了东江，着手组建国民党党部，我看也应该创建中共潮汕党组织，才能开创东江革命的新局面。"

杨石魂说："周主任，潮安处于粤系军阀陈炯明的控制之中，其部属洪兆麟的指挥部及主要兵力均驻扎于潮州城，反动统治根深蒂固。民众的反抗意识强烈，可是革命力量转移在农村。方惟精、余益求、赖其泉等人在上莆、东莆（现金石、彩塘、沙溪一带）开展革命活动，他们都是共青团组织的成员。"

周恩来说："潮安全县农运如火如荼，闻东莆区农协在西林成立，这次我还得再去看看。石魂兄，你和我到西林，了解西林情况，指导农军更好地开展革命斗争。"

"好，我们向大家说明，国民革命运动必须有强而有力的共产党地方组织来领导。"杨石魂说。

周恩来说："很好，按中共广东区委的部署，要把一批党、团员骨干分布到

潮汕各地，宣传先进思想，了解人民疾苦，开始恢复被军阀摧残的工会、农会组织，并着手准备建立共产党、共青团的地方组织。汕头是粤东的要津，群众政治思想进步，先在汕头建立领导潮梅革命活动的党组织和团组织。”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不久，杨石魂在汕头建立了中共汕头特别支部和共青团汕头支部。中共汕头特支书记杨石魂经常到潮安指导工作，培养、发展了新党员，把东莆区共青团员方惟精转为中共党员。在方惟精的努力下，建立了共青团大寨支部，吸收九位进步青年入团。接着，建立了生聚洋团支部，团员六人。团支部积极开展青工、青农工作，学习时事政治，参与工会、农会活动，为中共潮安县组织的建立打下基础。

随后，省立金山中学、韩山师范学校的进步学生参加共青团组织，韩师成立了共青团支部。农、工、商、学、妇群众组织迅速恢复。金中以推翻思想封建保守的校长黎贯的“倒黎”学潮为先导的群众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形势的发展预示着革命高潮的到来，建立中共潮安党组织的条件日趋成熟。周恩来指示中共党员、东征军总政治部驻潮安特派员郭瘦真，筹办建立中共潮安支部事宜，并把在普宁、揭阳一带工作的中共党员方临川，也调到潮安来。他们与参加第一次东征后一直隐蔽在篷船工会工作的中共党员赖炎光一起，于11月成立中共潮安县支部。郭瘦真任书记，赖炎光负责工运，方临川负责农运，王光明负责宣传。中共潮安县支部的建立，标志着潮安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翌年春，先后有一批共青团员转为党员，同时，在各群众团体中吸收了一批优秀分子入党，党员人数迅速增长，中共潮安县支部也随之扩展为特别支部。

在周恩来和中共广东省委、汕头特支的指导下，潮安县党组织带领全县人民，投入到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打倒封建军阀为中心的国民革命运动并为之做出积极的贡献。

## 引导学生新学潮

省立潮州金山中学创建于1903年（1952年迁至汕头），是清末由地方团体“遵章缴款”而建立起来的府立书院。后由书院改为潮州中学堂，由府立而转为省立，称省立第四中学，1925年12月称省立金山中学。潮汕很多著名人士曾在这里就读和开展革命活动，是岭东地区一所著名的学校。对这样一所学校，周恩来给予极大关注和支持。

1925年，金中发生了驱逐反动校长黎贯的学潮。3月，第一次东征到潮州的时候，周恩来先后让潘学吟、周逸群、黄锦辉和陈昉虎到金中向学生宣传国民革命的意义和孙总理“三民主义的”主张。省立潮州金中学生受进步思想的熏陶，迫切要求在校内创造一种民主、平等的气氛，要求参与校政，投身国民革命。而

该校校长黎贯，严禁学生言论自由，禁止学生参与校务及社会进步活动，擅自把金中学生会改为“学校市”，改变学生会自治性质，引起了学生们的强烈不满。以潮籍为主的273名学生，首先联名组织了“驱黎大运动”，请求撤换校长。黎贯是客籍人氏，故客籍学生认为“驱黎大运动”带有排外色彩。12月3日，以客籍为主的学生另外组织了“金中校务促进会”，这两派学生组织互相指责，学潮没能够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12月9日，周恩来指示，中共潮安县支部书记郭瘦真和东征军政治部杨嗣震、刘康侯到金中调解学潮纠纷，向学生作了多方面的解释，让他们对学潮的真正意义有了较正确的认识，在目标一致的基础上达到了统一和团结。全校500多名学生一致要求驱逐反动校长黎贯，改组学校董事会，成立由东征军总政治部代表、金中师生代表组成的清理金中校产委员会，整顿金中的财务制度，对金中的校务进行彻底的革新。推荐了学问好、思想进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过的杜国庠任金中校长。

1926年1月11日晚上，金中校务处即贴出通告：“总指挥部政治部周恩来主任，定于本晚莅校演讲，仰各生一律于本日下午三时，齐集藏书楼听讲，勿误切切。”

周恩来来到金中，与校长杜国庠进入会场。会场布置甚为庄严，周恩来步上讲台。杜国庠向到会者介绍：“同学们，东征军总政治部周主任来为我们讲授革命的理想。”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周恩来示意大家安静，说：“诸位，我今晚来看望大家啦。杜校长主持校务以来，学校充满生机，也让女同胞来上学，学员们朝气蓬勃。国民革命以来，我们打倒反动军阀，取得了胜利。大家将来也是革命的骨干，不论是潮籍还是客籍，不要彼疆我域，教员学员都要团结一致，可以组织一个‘新学生社’，作为共青团的外围组织；全体女生参加‘妇女解放协会’，欢迎学员们报考黄埔军校潮州分校，将来为革命事业而奋斗。我相信在杜校长带领下，大家都是革命事业再造之才。”

周恩来富有鼓动性演讲深深感染了广大师生，激发了广大青年学生投身国民革命的热情。

演讲结束后，杜国庠对当地劣绅侵占金中校产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杜国庠说：“周主任，潮安劣绅廖鹤洲，看中金中校产宿舍府学署，他挖空心思，借自己拥有县学署（现文星路儒学宫）地产权，通过省公路处在其执照上非法把县学署改为府学署，反诬金中霸占他的产业，企图侵吞府学署地方。这事遭金中广大师生的强烈反对，为了使金中办学顺利，请你维护正义、鞭挞邪恶，保护金中校产。”

周恩来说：“关于金中校产问题，我会在东江各属行政会议上提出讨论的，

并致电省政府，陈述金中校产的来由，请省政府教育厅收回成命。”

尔后，周恩来以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的身份，对金中校方的提案进行认真审议，秉公而断，上报省教育厅，把金中校产拨为省立各校基本财产，使廖鹤洲的阴谋破产，维护了金中的合法权益，有力支持了金中师生的正义斗争，保护了地方人士办学的积极性，震慑了潮州反动势力。

## 辟建潮州军分校

1925 年 3 月，东征军胜利占领潮州，为使随军东征的黄埔军校第二期学员能补习课程并培养东江潮梅地区的进步青年，革命军总指挥部拟办潮州分校。9 月，国民革命军再次东征。东征军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带领学生军在右翼英勇作战，彻底荡平军阀陈炯明在粤东的反动统治，10 月到达潮州，于是复前议创立潮州分校。从 11 月开始，周恩来发动了扫除残敌、澄清官吏、禁绝烟赌等活动，又开展了国民革命运动和东江一带国民党党部的改组工作，使各地党部（指国民党）和人民团体亦复如春笋怒生。这一切，均为黄埔军校潮州分校的开办和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政治局面。

11 月初旬，国民革命军东征指挥部开办了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最初定名为“陆军军官学校潮州分校”，次年 3 月由于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易名，潮州分校于同年 5 月也改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潮州分校”。分校仿照本校建制建立组织系统。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早期政治部主任，到次年 2 月改任东江各属行政公署专员。4 月间，他不时到军校在学生中开展政治宣讲的工作。

12 月的一天，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潮州分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在政治部秘书王昆仑陪同下，到分校为学员演讲。

周恩来说：“学员们，军校设分校于潮州，让本校学员继续学业；东江潮梅等地不乏青年有志之士，潮梅海陆丰各属学生，又得以招收至军校培训。”

他用亲切的眼光探望学员，又说：“我又接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政治部主任，政治思想是军队的灵魂，大家要对目前的形势有足够的认识，要为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为劳苦大众谋幸福而战斗。”

周恩来的演讲，注重国内和国际形势分析，对学员开展阶级教育，充满感染力，学员们群情激奋。



周恩来（1927 年）

周恩来主持军校潮州分校政治部的工作，开设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史、帝国主义侵华史、世界革命史、社会主义等 15 门政治课程，使军校的军事训练与

政治课程并重。周恩来聘请黄埔军校本校的熊雄、恽代英、萧楚女等共产党员为潮州分校政治教官，请共产党员恽代英为大家讲授社会发展史，萧楚女为大家讲授经济学概论，还聘请共产党员李春蕃（马克思主义原著翻译家）、李春涛（国民党左派、周恩来称之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到校授课，并指示政治部宣传科长、共产党员杨嗣震创办校刊《韩江潮》，作为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

周恩来是开创军校政治工作的先锋。潮州分校也同黄埔本校一样，培养了一批具有奋斗精神，为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而战斗的革命军事骨干。

## 创办革命的报纸

位于汕头外马路207号的“适宜楼”，两座砖混结构的两层楼房，分东、西两楼，形式相同。这里是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旧址。1925年12月的一天，周恩来和李春涛在此亲切地交谈着。

周恩来说：“东江地区的行政工作，要有革命的宣传。潮汕虽有报馆14间，但全为国民党右派所控制。它们秉承反动军阀的旨意，肆意漫骂孙中山，污蔑中伤共产党，迷惑不明真相的市民群众。”

李春涛：“周主任，针对这种情况，我建议，我们出一份宣传革命思想的报纸，宣传革命的主张。”

周恩来：“好，我们接收汕头的反动报纸《平报》，筹办为国民党党报，由杜国庠出任金山中学的校长，你不用代理金中校长，就来出任报社社长，行吗?”

“行，我尽力而为，就这么定。报纸用什么名字好呢?”李春涛高兴地说。

“潮汕地处南岭之东，就叫《岭东民国日报》吧。”周恩来说，“《岭东民国日报》要反映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宣传革命。”

李春涛说：“报纸要宣传革命，那我创办个副刊就叫《革命》吧，我的弟弟李春潘，熟悉外语，可以翻译马克思原著，又思想进步，他来负责这个副刊最合适，还有许美勋，他是潮安人，对潮汕情况熟悉，请来协办新闻吧。”

周恩来说：“好的，人选由你定，要聘报社特约评论员，报纸也可摘登和评价沈雁冰、谢冰心、郁达夫等进步作家的文章和译作。这些都能有效地扩大了《岭东民国日报》的政治影响，使报纸真正成为党的公开喉舌。”

周恩来接着说：“为加强报社的业务力量，支持你的工作，我电告中共广东区委抽调干部来汕，协助办报。”

李春涛高兴地说：“那太好了。”他想了想，又对周恩来说：“周主任，共产党是代表劳苦大众的利益，以救民于水火为己任，中华民族的希望在共产党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还不是共产党人，我再一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欣喜地看着李春涛，说：“欢迎，欢迎，你早就够一个共产党员标准

了，只是你目前的身份是汕头市国民党党部委员、宣传部长，虽然不是共产党人，但你也为党为革命做了大量的工作，你的请求我已在中共汕头地委讨论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当前国共合作，你立场坚定，以目前的身份正能更好地为党工作，你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嘛。”

李春涛说：“周主任，革命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也是你对《岭东民国日报》的殷切期望，请你为《革命》副刊题词。有你的支持，岭东民国日报社机构日臻完善，报纸会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

几天后，许美勋来到周恩来办公室。周恩来说：“美勋啊，你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周主任，请你来题写《革命》刊名。”周恩来微笑着爽快答应了，他走近大桌前，兴致勃勃地展开宣纸，提起毛笔，蘸了饱满的墨水，一气呵成地写了“革命”两个字，谦逊地说：“字写得不好，你看好用则用，不用也请便。”

1926 年 1 月 20 日，《岭东民国日报》正式出版。

创刊报纸上，登载了周恩来以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的名义，行文各县署：“潮梅人民，历受洪（兆麟）、林（虎）诸逆蹂躏，对于革命真谛，都未了解，该报负有指导之责，期在唤起潮梅民众革命精神，以扫除一切障碍。”指令各地订阅劝销，“所有一切广告文件，务须登载该报”。

此后，周恩来定期听取李春涛的汇报，及时对报社的工作予以指示，口述潮梅海陆丰重大政治新闻，并由记者记录后发表。对一些重要电讯新闻，周恩来还亲自动笔撰写。

## 率起义军到潮州

1927 年“四一二”事变，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只能独力担当领导中国革命、振兴中华民族的大任。8 月 1 日，周恩来和朱德、贺龙、叶挺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创建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9 月 23 日，南下广东的八一南昌起义军攻占潮州。

这时的潮州群情激昂，满城到处是红色标语。

周恩来、贺龙、叶挺、彭湃、刘伯承、郭沫若等人，在潮安县委书记、委员林谦等人带领下，在人民群众热烈的欢呼声中进驻了涵碧楼。

周恩来等在涵碧楼听取林务农关于潮安的革命形势的汇报，简单交流了意见。林务农高兴地握着周恩来的手说：“周书记，东征军到海丰时，我们在彭湃同志家遇过的。欢迎大家来到潮州，这里的反动势力太强大，浮洋徐陇的反动民团、洪巷的反动乡公所阻断了潮州到汕头的革命活动的联系，革命民众热切地盼

望着你们的到来。”

周恩来说：“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点燃了潮州革命烽火，潮州的民众对革命是积极支持，所以南昌起义之后，我们挥师南下，还想来开辟一个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闹翻身的好阵地，这里的民众革命基础好嘛。”

林务农：“周书记，大革命失败后，潮州的党员和进步民众组织活动陷于低潮。今天，你带领革命军重返潮州，这里的农、工、商、学、妇女各界民众团体又恢复革命活动。”

周恩来：“潮安县委从农村搬到城里来了，要争取民众的支持，先宣布废除苛捐杂税，颁布分田分地的政治纲领，潮州还得建立由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革命政权。”

听到这话，林务农说：“周书记，那太好了！”

彭湃说：“革命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今天，我们就商谈建立潮安革命委员会的政权。”

周恩来说：“潮安县委现在的成员都忙于带领民众参加革命活动，前委派来的十一军二十四师政治部主任陈兴霖、政治部保卫科长李国珍，我看革命委员会的委员长就由陈兴霖同志先担任吧。”

陈兴霖站起来，迅速立正说：“周书记，遵命！”

彭湃说：“恩来同志，革命军刚刚进入潮州，形势未定，反动分子活动猖獗，需要肃清其残余，还得建立公安局来维持社会秩序，你看谁来担此重任？”

周恩来望了望李国珍说：“李国珍同志，你来担任潮安的公安局长好吗？”

李国珍站立起来行了军礼：“周书记，我会尽力的。”

周恩来又任命潮安县委委员林谦担任县总工会执行委员长和肃反委员会委员。

彭湃说：“明天前特委员会就转移到汕头。恩来同志，让起义军配合潮安农民自卫军，摧毁掉浮洋徐陇的反动民团和洪巷的反动乡公所。”

周恩来说：“好，军民团结一条心，狠狠地打击反动势力气焰。”

林务农说：“潮州革命民众以实际的行动支持革命，组织武装梭镖队参战、组织担架队救助伤员，还组织潮州商会募集军饷支持起义军。革命队伍为人民翻身流血战斗，民众就会为革命事业无私奉献。”

在起义军前特委员会坐火车转驻汕头到达潮安的鹳巢火车站时，周恩来下车接见革命群众，鼓励他们为反对强权政治、实现自由民主的革命目标而战斗。

正是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军，在潮州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为以后的潮州革命点燃了火种。经过22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潮汕人民的解放事业取得了胜利。

（刘庆和）

# 视察新会纪实

南方的七月骄阳似火。1958年7月1日至7日，周恩来总理冒着酷暑高温莅临广东省新会县视察工作。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为什么选择远离北京的葵乡——新会来视察呢？缘由是这样的，1958年5月，新会县委第一书记党向民赴北京参加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会上作了《县的商业工作要成为农业生产的后勤部》的发言，得到中央领导的好评和重视。毛泽东主席指示：广东新会县商业工作搞得好，可到那里开一次现场会。6月8日至18日，全国财政贸易工作现场会议在新会召开。6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新会农民周汉华用水稻与高粱杂交，培育出水稻优良品种的消息，引起周恩来的关注。周恩来视察新会伊始就非常恳切地对新会县负责人表明："我是来新会工作的，来这里学习的。要像你们一样，到乡里去，到社里去，到街道去。不要给我什么特殊照顾，不需要特殊招待。……我是你们中间的一个人，都是普通劳动者，要平等相待，要创造这个风气。"周恩来总理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

## "这次活动要轻车简从"，"不要搞什么特殊照顾"

为了能广泛地接触群众，更多地了解到真实情况，周恩来在广州就对广东省委提出要求："这次活动要轻车简从。"因此，随同周恩来到新会的，只有广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李子元、省公安厅副厅长苏汉华、佛山地委第二书记杜瑞芝等几个人。7月1日下午，周恩来和秘书罗青长、范若愚从广州乘坐吉普车抵达新会。7月2日午后，周恩来乘车前往大泽区五和乡第二农业合作社视察。出发之前，正在新会检查工作的省、地领导，要求陪同总理下乡。县委为此安排了两辆吉普

车，周恩来不同意，再次重申要轻车简从，只能开一辆。县委负责人解释说：一辆吉普车坐不下几个人。周恩来说：坐不下，人可以再少一点嘛。县委只好按照总理的吩咐，一方面尽量减少陪同人员，一方面叫随行人员挤着坐。开车时，总理叫工作人员搬来一张小板凳，放在车厢中间，自己笑呵呵地坐上去。

周恩来在新会，县委安排周恩来一行住新建的招待所，周恩来婉言拒绝了。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县委会有地方，还是住在县委会吧！这里很好嘛！与同志们住在一起，工作方便。"周恩来视察新会七天时间里，一直住在县委书记工作兼休息室，睡的是木板床，坐的是普通木椅，吃的是县委食堂炊事员煮的普通饭菜。为照顾周恩来的生活，省委专门派来了厨师，但被总理请了回去。县委食堂炊事员，担心做不好饭菜，对周恩来说："总理啊，我只会做大锅饭，不会煮小灶呀！"周恩来爽朗地笑着说："我就喜欢吃大锅饭。"周恩来还一再叮嘱县委负责人："我们吃的已经比群众好多了，不要搞什么特殊照顾，要朴素，不要使我同群众有距离，不要搞迎送，不要前呼后拥，妨碍我接近群众，妨碍地方工作，不要公家请客。"

7月3日中午，周恩来视察途中在周郡社委会吃午饭。周郡社的干部群众为了表达对周恩来的敬意，准备了一些地方小食。开饭时，周恩来看到饭桌上摆放着鹅、鱼、猪肝，就笑着问："我看见你们这里种了豆子、番薯，怎么不拿来给我们做菜？"社干部回答说："这都是本地特产，我们并不敢搞多少菜。"周恩来接着又问："像这样的菜，你们的社员一年能吃多少顿？"社干部说："社员逢年过节也是这样吃的。"周恩来笑着说："请我们吃得这样好，你们不怕社员贴大字报？你们不怕，我是怕的！"吃完饭，周恩来问食堂招待员："你们说，这顿饭浪费不浪费？"招待员笑着说不浪费。周恩来又说："你们有意见，可以去写大字报。"接着对省里的干部说："这餐饭的费用，不能让社和县负担，就由省里出吧。"

7月4日上午，周恩来乘坐电船前往官冲视察。由于电船动力不大，途中航行几个小时。周恩来与随行人员在船上共进午餐，十分节俭，只有馒头、油炸花生、咸菜等。电船临近官冲，周恩来远望山上有一面红旗（是当地少先队员队日活动用旗），误以为县委通知当地干部群众组织欢迎活动，很不高兴地说："怎么搞的，我说过不要惊动他们了。你们又通知他们了吗？"因为周恩来早就叮嘱县委领导说"不要搞迎接，不要前呼后拥"。随行的县委干部如实回答说没有通知他们。当时，官冲没有码头，周恩来乘坐的电船靠岸时，官冲村长烽农业社主任，驾驶一只小船上前迎接周恩来一行上岸。周恩来视察长烽社结束时，当地渔民送给他一条大鲤鱼，他再三致谢，却不肯收下。渔民把鲤鱼偷偷放在周恩来乘坐的电船上。他发现后，如数付了钱。

心里只有人民的周恩来在新会县视察工作结束时，在全县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中再次说："下次来，你们可不要这样招待我了。这样招待，我就不敢来了。"

## "工农结合，城乡结合，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

7月2日清早，周恩来在新会县委书记党向民等人陪同下，乘车前往会城北郊的圭峰农场视察。在办公室稍坐片刻，周恩来便走下办公楼察看农场生产。他顶着烈日，上高山，下沟壑，步行两个多小时，看了荔枝园、菠萝山、养猪场、职工宿舍。他边看边问，详细了解农场的生产经营情况。在视察中，他十分关心农场干部学员的思想、工作、学习、生活。一路上，他不时停下来与干部学员亲切交谈。他问干部学员：下放劳动思想通不通，劳动辛苦不辛苦，学习安排了哪些课程，工资收入有多少，一天吃几餐饭，一餐花多少钱，能否吃上猪肉？在简陋的茅棚宿舍，周恩来看见患病在床休息的学员，便亲切地问：得了什么病，请医生看了没有，现在感觉怎么样？周恩来如此真诚的关心，平易近人的作风，深入细致的调查，使干部学员深受感动，有的忍不住流下激动的热泪。

中午周恩来来到农场食堂。当时正好干部和职工劳动回来，大家围着总理热烈的交谈。一位学员说：我们单位还没有正式名称，请总理题名吧！周恩来欣然答应，挥毫写下"新会劳动大学"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周恩来的民主作风感染了在场的干部学员，他们又要求总理签个名。周恩来谦逊地说："不用啦！不用啦！"大家一再请求，周恩来便说："那好，我另外写一个，你们贴在墙报上。"于是又挥笔写下"工农结合，城乡结合，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的题词，落款写上姓名和年月日。周恩来还就"三个结合"的意义作了解释，说："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要向共产主义的方向逐步前进……三个结合好了，就为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了条件。"言谈之中，充分体现出这位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坚贞信念。临别时，周恩来勉励干部学员"要以延安'抗大'为榜样，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一面学习，一面劳动，坚持"三个结合"，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 "我们要把山区建设成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7月2日，午饭后周恩来来到大泽区五和乡二社视察。当时，正是"大跃进"始发阶段，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特点的"左"倾错误日益严重。身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为抑制这种错误的泛滥，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尽管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再次对反冒进问题进行检查，但一接触到实际工作，周恩来总是坚持实事求是。他对每一个问题，都了解得十分详细，且经常亲作记录，对每一个数字都力争了解得准确无误，对一些

诸如粮食产量等的关键数字，他总是不厌其烦，反复核实。当社主任汇报社的粮食生产时，周恩来问："晚造会不会收成好？"社主任答："一定好。一方面，晚造种粮食的田比早造多；同时，肥料也多一倍。晚造准备实现亩产1200斤谷。"周恩来说："这样说来，加上早造的产量，就不只1200斤了。"座谈会结束前，周恩来非常高兴地对社干部说："你们的合作社办得很好，还要开展多种经营，增加社员收入。"同时针对当地妇女参加合作社劳动的情况，深情地嘱咐当地干部："要给妇女产假，安排劳动要照顾妇女同志的生理特点。"随后，周恩来前往网山察看柑橘、菠萝等经济作物的生长情况。他见到网山上的柑橘、菠萝果实累累，非常高兴。社主任向周恩来汇报了改造网山的过程和发展计划。党向民也向总理汇报了全县造林绿化、开山种果的成绩。周恩来不停地点头，表示赞许，说："山地多，前途大有可为。我们要把山区建设成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随后周恩来看望了农民育种专家周汉华，周汉华向周恩来汇报用水稻和高粱进行远缘杂交，培育了五个水稻优良品种的成果，还向周恩来一一介绍试验田以及开展试验的过程。周恩来边听，边问，边看，时而站着，时而蹲下，时而弯着腰，仔细地用双手盘数水稻株数，详细地询问每个试验品种的名称、特性和培育过程。临别，周恩来鼓励周汉华："要继续试验，要培育下一代专家，要巩固试验成果。"晚上9时许，周恩来与周汉华及乡亲们告辞，乘吉普车返回会城。乡亲们哪里知道，这时周恩来还未吃晚饭。

7月3日，周恩来到棠下区周郡农业合作社视察。周恩来得知省委宣传部和省农科院干部在周郡蹲点，搞丰产试验田，便来到试验田视察，询问种了多少个水稻品种，哪个品种产量最高，哪个品种抗病力最强，搞丰产试验采取什么措施。周恩来离开丰产试验田，来到周郡小学，了解农村学校的教学情况。离开学校，走进卫生站，与医务人员亲切交谈。询问医务人员收入有多少，一般的中药是否都有，哪些药较缺乏等等。接着，周恩来走进幼儿园，看望老师和儿童。中午12时左右，又察看了周郡蚕房，对在场的干部说："蚕业工作很重要，要好好地做。"午饭后，当地干部考虑到周恩来连续步行视察了几个小时，请他休息一会儿。周恩来和蔼地说："不用休息啦。"周恩来十分关心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他详细了解棠下区委、区政府、周郡党支部、合作社的班子人员结构、组织分工、文化水平、领导方法以及党、团员人数等情况。在座谈中，周



周恩来到新会丰产试验田调研

恩来询问得最多的是合作社的生产情况。他对周郡人民在“大跃进”中表现出来的生产积极性，既给予热情支持，又始终保持着冷静头脑，讲求实事求是。在了解周郡生产情况时，周恩来问：“去年水稻平均每亩930斤吧?”周郡社主任答：“是。”周恩来问：“今年你们提出挑战，亩产要达到2000斤，是杂粮吧?”社主任说：“是稻谷。”周恩来说：“哎哟，不得了!”临别前，周恩来答应周郡社干部群众的要求，当场挥毫写了两幅题词。他先写下：“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实现两千斤社而奋斗。”大家要求周恩来署名，他看看整张白纸写满了，便爽快地再写一幅：“冲天干劲周郡社，英雄人物数今朝。”

## “要加把劲，创造更大的成绩”

新会种植蒲葵历史悠久，葵叶加工质地优良，素有葵乡之称，葵艺业是新会的传统工业。新会解放后，葵艺业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7月6日上午，周恩来带着对新会工业的关注和对基层工人的关怀，来到新会葵厂视察。周恩来兴致盎然地参观了葵厂陈列的葵藤席、葵花篮、葵通帽、葵骨牙签等。厂干部汇报说：这些葵类产品，是用过去当废料做柴烧的葵叶尾、葵柄等加工制成，试产外销，很受欢迎。周恩来微笑着点头，表示赞许。



周恩来参观新会葵厂

参观完展品，周恩来深入到火画车间、剪扇车间察看。每经过工人身旁，不管工人满身炭灰，还是满手油污，他总是亲切地与他们握手。在剪扇车间，周恩来看到木制的简陋剪扇机代替了人工剪扇，高兴地说：“剪扇开始机械化了，很好！就是要向机械化发展，用机械代替笨重的体力劳动，减轻工人体力消耗。”在火画车间，周恩来认真观看工人用烘热的铁笔在玻璃扇上烙画。看到扇面烙画精致古朴，独具风格，周恩来说：“火画葵扇是优秀的传统工艺，你们要为社会主义创新。”在参观过程中，葵扇厂干部说厂总支提出“人工变机械，废料变成宝，下扇变上扇（提高质量），工厂变花园”的口号。周恩来对此表示赞赏，说：“毛主席讲综合利用，大有文章可做。希望你们利用废料，制造出更多更好的成品。”

周恩来离开新会葵厂，前往新会县废物利用展览会参观。周恩来对新会废旧物资回收利用工作给以高度评价和热情支持，并且以政治家和学者对新生事物的

敏感和理论思维，把新会的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加以发挥，他颇有感触地说："要抓紧利用废物这一环节。"副县长陆其俭向周恩来汇报新会回收利用废品的主要经验是实行"三变"：收购废品，变无用为有用；扩大加工，变一用为多用；勤俭节约，变破旧为崭新。周恩来非常高兴地说："'三变'的经验很好，这说明新会县委和新会人民懂得辩证法，把无用的物质变为有用的物质。这是新会的一种独创精神搞出来的。"参观展品时，周恩来说："商业工作也要破除迷信。过去有人认为商业工作不过是做买卖、交换、分配，只为生产服务不能生产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却要改变这个观念。你们组织收购废物，变废物为有用，这证明打破常规，商业也能生产财富。"大家要求周恩来题词留念，他欣然答应，当晚，周恩来处理完公务，于次日凌晨挥毫写下题词："全国商业部门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应该向新会学习，抓紧废物利用这一环节，实行收购废品，变无用为有用，扩大加工，变一用为多用，勤俭节约，变破旧为崭新，把工农商学兵联成一片，密切协作，为全面地发展生产服务，以便更好地实现勤俭建国、改造社会的任务。周恩来　一九五八、七、七。"这幅题词，经党中央批准，于1977年7月18日在《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公开发表。

7月6日中午12时左右，周恩来又参观了新会县粮食工作展览会。周恩来边看边问："全县有多少个粮食加工厂?"工作人员答："国营10间，合营12间。"周恩来又问："群众办有多少?"工作人员答："利用抽水机安装碾米机的有38间。"周恩来高兴地称赞说："农民办工厂好!"在工具改革展台前，周恩来饶有兴趣地参观每一件展品。当讲解员把油车和双轮车的作用解释并操作给周恩来看时，周恩来满意地说："好，减少劳动力一半。"看到旧报纸制成的美术纸，周恩来又说："很好看，很好看，又是废物利用，可推广使用。"参观完展览会，请周恩来题词留念。周恩来挥笔写下："厂仓当战场，创造新刀枪。一天当十天，夜间出太阳。"

7月6日下午，周恩来视察新会农具机械厂。他察看了车间设备，观看了工人操作，边看边问，了解工厂生产情况。从车间出来，周恩来参观陈列厂内的新会生产的碾米机、手扶拖拉机、插秧船、碎土机等机械农具。周恩来询问了各种农具的生产情况、性能、使用等。还走到田边观看农具机械厂制造的手扶拖拉机现场操作。当他看到手扶拖拉机能犁耕到六七寸深时，高兴地说："连草都打碎了!"厂长说："我们正在试验，还不够完善。"周恩来鼓励说："继续完善，这是一个方向嘛。"观看完农业机械操作，周恩来与厂干部工人座谈。从学习到工作，从生产到生活，周恩来都十分关心。勉励青年工人要向老师傅学习，全厂干部职工"要加把劲，创造更大的成绩"。临别时，有人请周恩来题写厂名，周恩来欣然应允，当天深夜，座谈会后，挥笔题写了"新会农业机械厂"几个苍劲有

力的大字。

## “不要满足，不要自满，还要前进”

7月6日晚，周恩来在县委会二楼小会议室，听取新会县委、江门市委和会城镇等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汇报是在民主、和谐的气氛中进行的。经过六天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周恩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对新会的实际情况已有相当的了解。在听汇报时，他亲自作记录，并不时插话，既肯定新会取得的成绩，又有针对性地分析存在的问题，并对解决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党向民汇报了全县当年工农业生产、计划和存在的困难。谈到工农业生产时，周恩来殷切地说：“工业是有点落后，这一环还没有抓起来。农业抓起来了。要工农业并举，要机械化。”谈到存在的主要困难时，周恩来插话说：“你求人，人求你，要协作。你们废物利用搞了很多。还要弄点化学。”接着说：“要协作，现在非协作不可。要打破乡界、区界、县界、省界，将来与社会主义国家还要打破国界。”当时“浮夸风”已在各地刮起来，各地都在放粮食高产“卫星”，周恩来针对这些“左”的倾向，一再对新会县负责人说：“搞工作要实事求是，不能办到的事不要瞎吹。按照你们县的情况，今年能扎扎实实地将粮食平均产量搞到800斤就很不错了，可以到北京向我报喜了”。在“大跃进”的政治气氛下，能这样清醒地提出问题，确实需要坚定的原则与大无畏的胆略。

7月7日上午，周恩来来到新会人民礼堂，向新会干部2000多人，作了一场三个多小时的报告。周恩来在热烈的掌声中，站着开始了他那富有指导意义、内涵丰富、理据充分、深入浅出的讲话。周恩来说，为着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掉“三个主义”和“五气”，要多多地到下面来，接触实际，接触群众，一年要下来四个月，这对我们做领导工作的人来说，非常必要。周恩来在讲话中，首先分析了国际形势的现状和发展。谈到国内形势，他说，今年上半年有很大的跃进。在谈到今后的任务时，他详细地论述了“三个并举”、“两个革命”。三个并举是工农业并举，中央和地方并举，大中小并举。两个革命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周恩来又说，我们是社会主义战士，要有理想嘛，不但要看今天，还要看明天。我们要看远处，朝着什么方向去。我们把社会主义建成，还要进入共产主义。周恩来跟着说，为了实现总路线的方针，要有办法，这就是三化：第一是革命化，第二是群众化，第三是多样化。这既是工作方法，也是思想方法。要实现这样的工作方法，有一个中心的精神，就是要有共产主义的风格，全国都是这样一种精神，就会很快地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我们提出的：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水平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讲话中，周恩来运用了大量在新会调查研究了解的事实来论证他的观点，使大家听得亲切、明白。他对新会人民在党的

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给以充分的肯定，多次称赞新会是“模范县”、“上游县”、“一类县”。同时，勉励新会干部群众“不要满足，不要自满，还要前进”。

## “不要使我同群众有距离”

在群众面前，周恩来没有丝毫的官气。周总理一到新会，就嘱咐新会地方负责人：“不要使我同群众有距离。”他每到一处，都十分注意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劳动大学，他亲自动手用牙签把切好的菠萝插好，先送给身边的学员品尝。在五和农场，他与干部职工在农场门口一棵大树底下，谈生产，谈计划，还亲手捧杯为农场技术员敬茶。在参观葵厂时，他拿起葵扇，给正在烙画的青年工人扇风取凉。临别时，他走到送行工人的后排，与老工人握手话别；此情此景，令在场工人深受感动。周恩来视察周郡时，群众都想亲眼看看敬爱的周总理，负责保卫工作的干部正为是否让群众进去而为难，周恩来见此情景，高兴地说：“不要紧，我们相信群众，让他们进来吧！”霎时，100 多名群众争先恐后地挤入会议室。在周郡，他十分关心农民群众的生活，询问一个劳动日值多少钱，社员全年收入有多少，公共食堂一天做几顿饭等。在参观废旧物资利用展览会时，他问：“怎么没有群众？”他听了管理人员回答说因为是下班休息时间，仍然心存疑问，不够满意。走出展览会，看见有人叫过往群众不要停留观看，他又对地方干部说：“我们订个合同，不要这么多招待。”在新会视察期间，周恩来总是关注着群众，一再声言不要影响他与群众接触。他在人民礼堂作形势报告时，门外的群众纷纷朝里探头，有的人干脆走了进去，谁不想亲眼看看人民的好总理啊！工作人员怕影响周恩来作报告，把门关上了。周总理看到这情景，回头笑着对县委书记说：为什么把我同人民群众隔开来？于是会场的门全都打开了，门外的群众兴高采烈地走了进去。周恩来作完报告，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出会场，和等候在外面广场和街上的广大群众见面。他微笑着，频频向群众挥手致意。群众沸腾了，大家尽情地鼓掌，沉浸在无比欢乐之中。

周恩来在新会短短的七天视察中，深入到工厂、田间、学校、供销社、卫生站等，同工人、农民、基层干部、科技人员、归侨、侨眷、学校师生、医务人员、城镇居民等广泛接触，促膝谈心，殷切关心和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工作、生产、学习等情况。就工农业生产、文教卫生、金融贸易、城镇建设、群众生活、侨务工作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他热情地赞扬和支持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浓情重墨写下了七幅光辉题词、题名。据当年跟随采访的《南方日报》记者邓国庠回忆，他把现场的所见所闻，不管是否重要，都全部记录下来，谁知一开始出访圭峰山，周恩来见记者有闻必记，站着记，走着也记，

就几次摆手轻声说："不要记，不要记。"也不要摄影记者拍照，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周恩来视察圭峰山的照片。在周恩来离开广东前，他对跟随采访的新华社广东分社副社长说："未经我同意，是不能报道的。"后经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出面请求，才同意在广东三家地方报纸发表约2000字的综合报道，新华社则没有向全国播发消息。虽然当年周恩来视察新会留下的文字和照片极少，可是他轻车简从、深入基层、实事求是、心系群众、平等待人的作风在南粤人民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也给今天的各级领导干部树立了榜样。

（杨汉卿）

# 朱 德

## 茂芝星火耀征程

朱德，被尊称为“红军之父”，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1927 年参加南昌起义，为起义的领导者之一，1927 年 10 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 2000 多人进驻潮州饶平，在茂芝全德学校召开重要军事会议，作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战略决策前后发生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 赠枪农军，攻克饶城

话说朱德扼守三河坝时，获悉隔山的饶平农军正在攻打饶城，阻击妄图从背后袭击起义军的守敌。但农军装备差，饶城屡攻不下。为加强农军装备，朱德即给中共饶平县委去信说：“起义军在江西会昌战斗中缴获大量枪支，可支援你们部分，速派人来领取。”

10 月 4 日，朱德站在指挥部——东文部高地上，一身灰布军衣，背顶斗笠，脚穿草鞋，草鞋早已破了，用一条什么带子横七竖八地捆在脚上。胡子老长，精神饱满，眼神和蔼慈



朱　德

祥，但眉间川字纹却越来越深。他深思着，二十五师在历次战斗中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但眼前敌强我弱，力量过于悬殊，依靠工农，才是成功之道啊。此时，士兵领着一位小伙子走进来，对朱德说："军长，这是饶平县委委员张碧光同志。"

张碧光上前握着朱德的手，激动地说："朱军长，我们接到你的信，我带了46位兄弟从昨天傍晚出发，天刚蒙蒙亮就到你这。"朱德见农军安全到达了，非常高兴，连忙招呼农军兄弟们吃面包，喝开水，亲如一家。但是，太阳已出山了，朱德仍只字不提赠枪的事情。

张碧光等得心急如焚，斗胆问道："朱军长，你对俺饶平农军很关心呀，派俺前来领枪，但枪支放在哪里呢?"

朱德摸一摸下巴的胡子，笑笑道："同志，别急嘛，你们吃饭后，就到山后树林隐蔽，这里危险。枪，眼下都被大埔农军带去了。日上三竿的时候，你们就出来吧，我的门口就有许多枪支呢。"

张碧光将信将疑，就遵照朱德的吩咐，带着农军兄弟们隐蔽到山后的树林里去了。

忽然，韩江里枪声大作，炮火连天。约摸半个时辰后，枪声平息了，晨风吹来一股股刺鼻的火药味。张碧光见此时刚好是日上三竿了，便带着农军兄弟们来到朱德指挥部门口，只见原来平展展的黄土地上浮起一个高高的枪"山"。农军兄弟们惊异地私语："真神啊！无怪乎人们传说朱德是活神仙，料事如神，这不是嘛，他说日上三竿有枪真的就有枪，真比孙大圣还灵呢!"

临别，朱德让农军兄弟每人挑一条上好的步枪，多可不行呢！不是朱军长不慷慨，而是三河坝周围尽是敌人，带太多的枪负担太重，遇到敌人难以自卫。

农军兄弟们带了朱德赠送的枪回来后，县委即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立即组织农军再次攻打饶平县城，以配合三河坝战斗，并把这决定迅速传达到各乡农军，很快组织了1000多人的队伍，于10月4日开始攻城。说来也怪，这些枪支打起敌人来，真神呢，一枪一个，打得敌人哭爹叫娘的，纷纷龟缩在炮楼里面，再也不敢在城头上耀武扬威了。

隔天天亮时，朱德率领的部分起义军经饶平九村到达饶洋上、下祠一带。住大陂楼村的县委书记杜式哲同志向朱德汇报："饶平农军正攻打县城。"随即，朱

德果断令周士第师长："速速带领第九军教导团300多名起义军帮助攻城。"经过半个多小时联合作战，上午10点多，起义军、农军攻下县城，把敌人打得夹着尾巴向凤凰山逃跑了。

后来，饶平农军兄弟们还拿着朱德赠送的几十条步枪参加了福建的平和暴动。那天，刚好下暴雨，平和农军的药枪淋湿打不响。但奇事又出现了，朱德赠送的步枪却雨越淋打得越准，执枪的饶平农军兄弟们大展神威，打得敌人血肉横飞，血流遍地。暴动胜利后，饶平农军被平和县委誉为"神勇的朱德洋枪队"。

## 朱军长买鸡，感动民心

三河坝激战三昼夜之后，朱德军长指挥部队及时撤出战斗，率领起义军主力进驻茂芝。队伍驻下不久，朱德领着几位军官到各个宿营点了解情况。几天来，由于日夜鏖战，加上急速行军和缺粮，部队得不到休整和补给，伤病员很多。许多伤病员打仗时勇敢拼杀，坚持不下火线，但到了宿营地，一躺下便动弹不得了。

朱军长来到二十五师驻地，看到一位战士傍靠着墙角，双目紧闭，铁青的前额上，渗出一层豆大的汗珠。"看样子，这小同志病得不轻呵！"朱军长对身旁的一位军官说。那位小战士听到耳边那温和亲切的声音，慢慢地睁开眼睛，朝朱军长微微一笑，然后又无力地合上了双眼。还有一位伤员，在昏迷中时断时续地发出呓语，两片干瘪的嘴唇不停地嚅动着。看到战士被病魔折磨的痛苦样子，朱军长心里非常难过。他浓眉微锁，沉思片刻，转身吩咐同来的几位军官再到别处看看，自己带着警卫员到村里买鸡给战士补养身体。

"老乡，家里有人吗?"朱军长轻轻地敲着门问。

"依呀"一声，门开了，一位弓着腰的60多岁的老婆婆，出现在朱军长的面前。

"老人家，家里有鸡卖吗?"

老婆婆感到好些奇怪。她默默地打量着门外这位穿着灰色制服、头戴平顶军帽、腰挂短枪的仪表轩昂而又安详和蔼的中年军人。

"是这样"，朱军长解释说，"我们有几名士兵病得很厉害，想买只鸡给他们补养身体。"

老婆婆渐渐明白过来了，她想起刚才听到的一个消息，村里来了一支穿灰色军装的军队，纪律严明，买卖公平，对老百姓挺和气。眼前这位长官，莫非就是这支军队的么?

"长官，你们是住在我们村里的吧?"

"我们部队刚到不久，打扰乡亲们了。"朱军长和颜悦色地回答。

“你等等!”老婆婆说着，转身走进屋里。过了一会儿，她抱着一只大母鸡走出来，把鸡塞到朱军长手里，说：“拿去吧，给小兄弟熬点汤喝喝。”

“不，老人家，我们怎能随便拿乡亲们的东西呢!”朱军长把鸡推还给老婆婆，恳切地说：“这鸡要是你肯卖，就请称一下给个价吧!”

双方互相推让之后，老婆婆最后说：“这鸡估计有三斤重，随你的便就给一点钱吧。”

“谢谢你了!”朱军长把鸡接过来，手指碰到鸡屁股，感谢地说：“老人家，这鸡还在下蛋哟?!”老人微笑着点点头。

朱军长从身上掏出两块光洋，送到老人家手上，说：“这鸡我就提走了。”老人家一下愣住了：“长官，这鸡没值这么多钱呵!”老婆婆惊奇而又不安地说。

“老人家，别长官长，长官短的。”朱军长谦和地说，“这是下蛋的母鸡，要是不卖，明天、后天照样会下蛋。有了蛋，便可以卖钱。所以，这鸡的价钱还不止两块光洋哩！收下吧，老人家!”

这话讲得多体贴啊，老人家手里捏着两枚银元，心里感激万分，泪水不觉涌上了眼眶。凝视着眼前这位和蔼可亲的官长，她脑子里立时清晰地浮现出另一幕情景。

那是三个月以前的事。一天，有几个当兵的，突然闯进她家，进门二话不说，东瞧西望，见鸡就抓，见蛋就拿。老婆婆哭哭啼啼，上前哀求给她留下两只母鸡度日，这群狠心的家伙把老人家一下推倒在地，临走时还在她身上踢了两脚。至今，老人家的腰还直不起来。

“老人家，你？……”

“没什么，长官，我心里感激你哪！我活了这么大年纪，还没有见过像你这样体贴穷人，拿老百姓当人看待的长官啊!”老婆婆脸上露出笑容，用袖口拭去挂在眼角的泪花。

朱军长走了。老婆婆站在门口，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口里喃喃自语：“真是个菩萨心肠的好人哪!”

## 寒夜让铺，情暖义军

朱德率领部分南昌起义军来到了饶平县茂芝乡宿营。起义军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朱德等主要领导人，也住在全德学校。这个有着数百户人家的山村，一时间祠堂、学校和老乡的空屋都住满了部队，还有许多同志只能在群众的屋檐下、屋坪、楼巷露天宿营。深夜，四面环山的茂芝，秋风瑟瑟，寒气袭人。朱德从连队回到了作为临时指挥部的全德学校，一进课室，就看见一个战士靠在墙边睡着了。他小声地叫：“同志！同志!”战士没有听到。朱德用手摸摸他的额头，“哎

呀，正发烧哩！”忙把生病的战士摇醒、扶起，指着用门板架起的床铺说：“同志，有病不能在这里睡，快上床吧！”战士醒来，见是朱军长，连忙说：“不，这是副官为您准备好的，我睡这里就好了。”朱德关切地说：“小鬼，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们起义军肩上担子很重啊！”战士深知军长一向关心士兵胜过关心自己，再退让也没有用，便问：“朱军长，那你要睡哪里呢？”朱德指着墙边几张课桌笑了笑说：“小鬼，别担心，你看……”他一边把几张课桌拼起来，一边非常满意地说：“你看这不是很好的床铺吗？”战士望着几张放在坑坑洼洼泥地上的课桌，不忍心让朱军长睡在上面，便说：“朱军长，还是让我睡在课桌上吧！”朱德忙说：“你快睡吧！”说着，把一张薄薄的军用毛毡铺在课桌上，找来了一个山区特有的瓷枕垫在头下，侧身躺在高低不平的床铺上，不一会，就呼呼睡着了。那位生病的战士，躺在副官为朱军长准备的床铺上，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望着朱军长酣睡的面容，眼眶饱含泪水，却久久不能入眠。

## 茂芝会议决策，谱写军史辉煌

深秋时节，茂芝溪两岸芦苇摇曳，田野金谷飘香。太阳升起来了，溪旁的旷地里，穿着米黄色军装的南昌起义军战士正沐浴着晨曦，有的在洗衣服，有的在理发，有的在擦枪……

中共饶平县委书记杜式哲带着农军兴高采烈地涌来了。大家端着香喷喷的茶水，招呼起义军喝个痛快。茶浓情更浓呀，他们要让转战千里劳苦功高的同志尝尝饶平山区香茶的韵味呢！朱德军长看见农军来了，立即起身与大家一一握手。一位年轻姑娘端上一碗茶水，朱军长接过来，一饮而尽。他和蔼地问端茶的姑娘：“这是什么茶呀？”姑娘听不懂朱军长的四川口音，只是莞尔一笑。杜式哲拉着朱军长的手说：“这是饶平的名产——西岩乌龙茶呀。”朱军长连声称赞道：“好茶，好茶，比俺四川李家湾的绿茶还香呀！”

忽然，路口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朱军长机警地扫视路口，只见一名高大的军人飞奔而来，一路烟尘滚滚，似乎还有大队人马跟在后面呢。那军人跑到朱军长面前，他正是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

“报告军长，有急事！”

“恩来同志好吗？贺龙军长好吗？”

周邦采欲言又止。朱军长深觉情况有异，立即招呼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七十三团党代表陈毅到旁边的一棵大枫树下详谈。

原来，1927 年 8 月 1 日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领导北伐部队 2 万余人，举行南昌起义。3 日，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准备以东江为革命基地，夺取广州，再次北伐。9 月中旬，南昌起义军经福建抵大

埔。在三河坝分兵，主力由贺龙、叶挺率领，进占潮州、汕头，留下十一军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育团约2000人镇守大埔三河坝，阻击尾追于后的国民党军钱大钧部，掩护主力部队进击潮汕平原。朱德率部在三河坝激战三昼夜，击退敌人10多次进攻，毙伤敌2000多名，我方也伤亡几百人。10月4日清晨，朱德率起义军从三河坝突围，经大埔的湖寮、百侯，于5日一早到达潮州饶平上饶。万万没有料到，同志们正在休息，准备整装奔赴潮汕与主力部队会师之际，周邦采却给他们捎来一个不幸的消息。



朱德同志

周邦采见到亲切而严肃的朱军长和陈毅等战友，好像回到家里一样，觉到热乎乎的。心头一酸，眼眶潮湿了。他接过朱军长递给他的一碗茶，呷了一口，沉痛地叙述主力部队失败的经过……

原来，9月23日，起义军主力顺利占领潮州，24日进入汕头。9月28日，起义军主力在揭阳县山湖与敌激战三天后受挫，向海陆丰方面撤退。30日留守潮州的起义军也受挫，撤出。周邦采从潮州突围后，便带着几十人往饶平方向寻找朱德部队，沿途集结了失散的200多名起义军战士。

战士们听到主力失败的消息，皆骇然失措。

身经百战的朱德望着二十军剩下的四五百人，看着自己所带领的第九军所存的2000余人，深感起义军面临的险恶境况。敌人重兵压境，集结在潮汕和三河坝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共约4万人，敌众我寡，力量悬殊。加上我军连连受挫，主力失败消息传开后，内部思想混乱，失望情绪加重。队伍一无供给，二无援兵，随时有被敌人包围或自我瓦解的危险，应当怎么办？该走到哪里去？

朱德环顾一下身边的战友，只见周士第、李硕勋、陈毅等脸色也十分沉重。这是多么坚强的战友啊！与他们团结战斗，生死与共，不知闯过多少难关，战胜多少困难。看到眼前的这批战友，他立即增强了摆脱困境的信心。

他猛吸一口纸烟，微笑地问：老周、老李、老陈，你们瞧瞧怎么办？

周士第是从团长升任不久的师长，战绩显著。此时他手中摆弄着一段柴枝，在地上划着道道。

“军长，我看现在当务之急，是立即召开师团营连政工人员紧急会议，统一认识，然后大家分头做好战士们的思想工作，先稳定大家的情绪。”李硕勋的意见有独到之处。

“对！先稳定情绪，然后再筹谋下一步的策略。总之，我们这支队伍，是我党唯一留下来的完整建制的队伍，一定要保存下来，万万散不得。下一步，我们就听军长你的了！”陈毅操着浓重的四川乐至口音，充满信心地说。

朱军长听着大家的发言，终于把心放下来了。

于是，他作出决定：由李硕勋、陈毅先召开连以上政工人员紧急会议，把战况讲明，把困难讲清，统一认识；迅速分头到战士中间做思想工作，先稳定全军情绪。然后，在今天晚上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共商决策。

布置完毕，朱军长仰望长空，长长吁了一口气，只见那棵枫树叶色正红。啊！秋天过去了。冬天将要来临，春天还会远吗?!

一个重要的干部会议，也即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茂芝全德学校召开了，参加会议的有朱德、陈毅、周士第、周邦采、王尔琢、杨至诚、赵镕等20多位军事干部。

会议在激烈的争论中进行着。朱德军长披着军大衣，他有时左手托着下腮，专心听取同志们的讨论，有时，在屋子里踱步，陷入深思。是呀，朱军长作为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者，此时的一言一行，都决定着2000多名战友的命运，决定着南昌起义军的种子的存亡，决定着革命的前途啊……

朱军长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之后，呷了一口茶水，发言了。他冷静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同志们，撤离三河坝，我们还寄希望于前线，现在主力部队失败了，我们失去与党中央的联系，变成一支孤军了！我们只有另想办法，另找出路。起义军主力虽然失败了，但八一南昌起义军这面旗帜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起义军的种子保存下来，把革命干到底！"

会上，有人心灰意冷，提出要解散队伍。在这关系到能否保存南昌起义军的种子的严峻时刻，陈毅挺身而出，坚决表示："我愿意辅助朱军长，把南昌起义军的种子保存下来，我们这支队伍来之不易，千万散不得啊！"李硕勋、王尔琢等也在会上表态，坚决支持朱军长。会议终于否决了关于解散部队的意见。

会议开了一夜，终于在10月7日上午形成了一致的决议：第一，我们和上级党的联系已经中断，要尽快找到上级党组织，及时与上级取得联络，才能随时取得党对我们的指示。第二，保存这支队伍，必须找到一个可以隐蔽的、可靠的立足点。粤赣湘边是国民党统治力量较薄弱的地方，北伐时期，这里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支援北伐军最得力，我们应以此作为立足之地。第三，目前面对强敌，我军孤立无援，不能打硬仗，应该避开敌人，穿插前进。第四，大力开展政治动员工作，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坚决扭转悲观失望情绪，防止自由离队、携枪逃跑，甚至小股叛变等事故。会议的决策概括为"穿山西进，直奔湘南"八个字。

朱军长对革命坚定的信念，似一团火在指战员心中燃烧了，大家情绪高涨，决心跟着朱军长，革命到底，决不回头！

会议结束的当天下午，朱德率部队告别茂芝的父老乡亲，向麒麟岭挺进。县

委书记杜式哲和县委委员詹前锋、刘瑞光等带领上饶区赤卫队队员、农会会员100多人，依依不舍地送了一程又一程。一路上，朱德不时深情凝视着这位年轻有为的县委书记，一再勉励说："眼下革命是存在困难，但只要我们坚定沉着，依靠群众，执行党的指示，坚决奋斗，我们是会胜利的。"

登上麒麟岭，朱德亲切地与杜式哲等告别。他深情地说："式哲同志，送君千里，总有一别，你们还是回去吧。我们走后，敌人一定要疯狂反扑，望你们组织群众，坚持斗争。要紧握枪杆子，讲究斗争策略，革命一定能够成功的！"说罢，朱德将1匹白马和12支步枪送给饶平县委。起义军有20多名伤病员不能随队出发，必须留下养伤治病。朱德将早就准备好作为医疗费的100块光洋亲手交给县委委员刘瑞光同志，叮嘱道："这些同志是我们的革命种子，请县委好好帮助他们把伤病治好。"

随后，朱德率起义军队伍经柏嵩关进入福建平和、上永定，向西穿入粤赣边界，直达韶关、湘南，转战千里，历尽艰辛，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两双改变中国命运的巨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了。当时在井冈山的秋收起义军有1000多人，朱德和陈毅领导的部队有2000多人，加上湖南农军8000多人，合计有1万多人，正式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从此，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成为中央红军主力。

朱德在与史沫特莱的谈话中，把他在茂芝会议上的决策概括为十二字："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革命实践证明，茂芝会议是一个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是一次关系到能否保住八一南昌起义成果的重要会议；是决定南昌起义军的种子能否保存下来的会议；是关系到南昌起义军的发展方向和路线的决策会议；是八一南昌起义后起义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也是与朱德率领的起义军登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部队胜利会师有着重要关系的会议。朱德带领的这支部队，是党领导的身经百战的部队，是党直接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精华，它培育和造就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高级将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更有那井冈山会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那是创建的辉煌。但鲜为人知的是，如果没有朱德在那粤东北部山村的茂芝全德学校召开的南昌起义军的重要军事会议，作出了"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决策，也许就只有起义军挥师南下，而没有"湘南暴动"，没有井冈山的"朱毛会师"，更没有中国工农红军的迅速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也可能要重新编写。因此，茂芝重要军事会议决策，谱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的重要篇章。

（姚尚睦　苏丽珊）

# 羊城兰圃寄情思

在广州60多年的岁月中，我因工作关系，曾先后陪同过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春节前夕观赏花市，每每都是联想翩翩，深寄情思，满载喜悦心情而归。其中最让我难忘的是朱德对兰花的钟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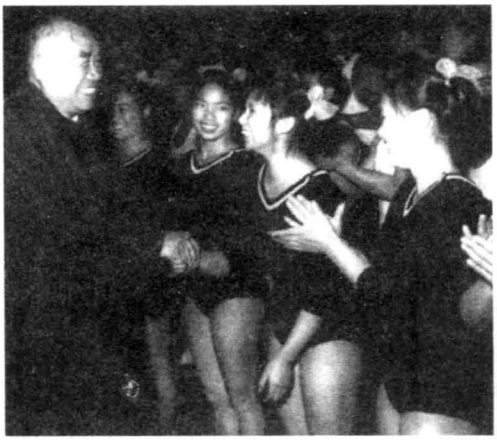
朱德元帅，是我敬仰的革命老前辈。从延安时期至今，我们还是喜欢称他老人家为“朱老总”。

朱老总不仅喜欢羊城花市，更钟情广州兰圃。在接待工作中，我有幸陪他老人家观赏过春节花市，更值得一说的是，曾陪朱老总四顾兰圃。朱老总酷爱兰花，而且情有独钟。

朱老总喜爱兰花，是大家都知晓的。但他为什么对兰花特别厚爱，却是一直在我脑海中盘旋了几十年的问题，至今我也只在猜想中寻找答案。

朱老总从1954年2月至1971年下半年，曾来过广州11次，我有幸接待陪同4次。1955年1月，朱老总乘的火车因湖南大雪，铁路电线被冰压断无法正常运行。我奉命到坪石迎接，却被困在坪石两天。后来老人家乘的列车到了坪石，我即上车迎接并陪同到广州。但让我惊奇的是，在公务车的客厅和走廊里，摆满了许多盆兰花。到了广州，所有的兰花都一起搬进当时的小岛（即今珠岛宾馆）五号楼朱老总休息处客厅。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朱老总的爱兰情结。

1957年1月16日至2月13日，朱老总从南宁乘专机先到海南岛，后抵广州。老人家下榻广州后，第一个要参观的地方是兰圃。我当即电话请广州市副市长林西同志在兰圃迎接并作介绍。老人家从进园起即按陈设顺序细致观看，不时向陪同的负责人询问：有多少品种？各个品种来自何地？有无出口？广州有无兰花协会等等。朱老总细说种兰花的好处：除可以为人观赏外，还可以出口为国家创汇。老人家殷切希望兰圃办得更好。这天，老人家兴致勃勃地观赏完兰花后，高高兴兴地返回



1959 年 2 月，朱德在广州接见运动员

宾馆。我受到朱老总爱兰的感染，对兰花有了初步了解，也开始爱上了兰花。老人家在除夕前提出要到广州花市看花。这对接待工作来说是个难题，如何保证老人家的安全，便成为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大问题。我们和北京来的同志商量，给老人家戴上个大口罩，以免在花市中被群众认出而难以脱身。于是选择在下午近黄昏游人较少时，到西湖路中心花市转了一圈。花市灯花辉煌，百花争艳，在广东音乐伴奏声中，人流如潮，一派娱乐升平的景象，令人陶醉。老人家不顾年迈与疲劳，自始至终呈现兴致勃勃、满怀喜悦的神态，并不时向陪同同志询问有关花的品种、价格及花农收入等问题，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兴趣。

1959 年 1 月 22 日至 2 月 24 日，老人家再到广州，爱兰情结丝毫未减，头一个参观地点仍是兰圃，我又陪老人家到兰圃转了一圈。我预先告知兰圃的同志作好准备，不料老人家看后闷闷不乐地说："没有什么变化。"我立即将老人家的观感转告给林西同志，希望他能有所改进。

过了两年以后，1961 年 3 月 3 日，老人家再次到越秀公园参观，并题写了《游越秀公园》名诗一首，抒发了钟爱兰花的情结，后被镌刻在兰圃园内。

**游越秀公园**

越秀公园花木林，
百花齐放各争春；
惟有兰花香正好，
一时名贵五羊城。

朱　德

一九六一年三月三日



1961 年 3 月，朱德在广州兰圃

朱老总对广州特别厚爱，与一般领导人不同的是，他来广州，多数是乘坐火车，每次都在车厢里装上不少盆兰花，来到广州随时欣赏。他如此的喜欢兰花，总让我感到这必定另有深意。

1959 年春，为迎接建国十周年，中央在京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和接待工

作会议，周总理和陈毅、习仲勋副总理亲自主持。朱光、任泊生、侯甸同志和我参加了外事工作会议后，我和侯甸同志继续参加接待工作会议。会议期间，遇上一个星期日，休会一日，突然接到大会秘书处通知："南方十几个省的与会代表，上午九时，等候朱老总的接见与讲话。"大家非常高兴地迎接朱老总到来。老人家到后同大家不谈别的事，专谈种兰花的重要性，要求气候较暖和的南方各省交际接待部门大种兰花，力求多出口创汇，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讲话近一个小时结束后，朱老总在热烈的掌声中与大家告别。朱老总的爱兰情结，再一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经过这么多年，我总试图了解：老人家为什么那么钟爱兰花？为什么对广州的兰圃和花市那么喜爱？从我多年的接触中，深感老人家既是一位身经百战疾恶如仇的元帅，又是一位非常重感情的长者。众所周知，朱老总的前妻伍若兰（1903—1929）是湖南耒阳人，1924 年入衡阳第三女师读书，1924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任耒阳县妇联会主席，从事农运工作，1928 年参加湘南起义并与朱德同志结婚。接着随同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到达井冈山，任红四军宣传队长、妇运科科长。1929 年 2 月，在江西寻邬项山战斗中，为掩护部队转移，不幸受伤被捕。她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面无惧色、坚贞不屈，于 1929 年 2 月 12 日被敌杀害于赣州，英勇就义。朱老总为此曾题写了一首意义深远的七言诗，以表哀思：

幽兰吐秀乔林下，
仍自盘根众草傍。
纵使无人见欣赏，
依然得地自舍芳。

前几年，我曾把我的猜测向来采访我的北京朱德传记电影摄影组的同志询问过，他们一笑置之，既不否定，也不肯定。我想，朱老总大概是以兰花寄托对英烈与亲人的思念吧。这种方式令我感慨无穷。

（关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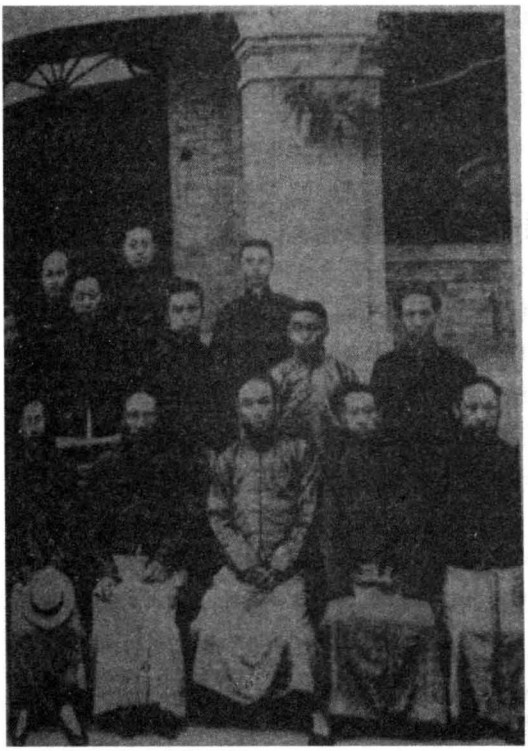
# 陈独秀

## 创党活动在广州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曾三次南来广州，指导、建立了广州的党组织，并任书记（后谭平山接任），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包括1922年在广州召开党团领导干部会议，出席中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1923年主持将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至广州，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主题报告，推动国共合作，揭开中国大革命运动的序幕。

### 创新教育

1920年底，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率军赶走统治广东的桂系军阀莫荣新，收复广州，主政广东。12月5日，陈炯明致电上海邀请陈独秀到广州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执掌全省的教育工作。陈独秀去函征询李大钊和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意见。李大钊表示赞同，认为既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想带到广东，又可以在广东发动共产主义者组织。于是陈独秀在



1918 年陈独秀（左三）北大哲学系毕业照

12 月 17 日乘船赴广州，26 日抵达广州，先入住大东酒店，不久搬到泰康太平沙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 11 号二楼，在这里凭栏远眺，可看见白云山。陈独秀为寓所起名为“看云楼”。寓意并非游览风景胜地，发思古之幽情，而是预见中国大革命的风云即将来临，故此得名。

陈独秀抵达广州后，随即在《新民国报》刊载他关于教育方面的计划，开展宣传新教育思想，他指出：“新教育是注重在改良社会，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他提出改革教育计划的三大纲，即未成年教育、成年教育、专门教育，要建立全面的教育系统，对人才从小到大进行培养。主张普及幼儿园、中小学教育，强调创办大学。这些主张均得到孙中山、陈炯明的支持。1921 年 1 月，陈独秀派袁振英任广东省立一中校长，并支持袁首创中学男女同校。

## 宣传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

首先，刷新《广东群报》版面，公开介绍上海《共产党》月刊每期要目，大量转载该刊文章，如刊登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谭平山、陈望道、沈雁冰、李季、瞿秋白等理论先驱的文章。同时加重了对苏俄和各国共产党情况的报道。上海新青年杂志社迁到广州昌兴路 26 号，发行处也搬到广州发行。广州党组织成立后，《广东群报》被明确规定为党组织的机关报。这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第一张大型地方党报。

得悉陈独秀到广州，各界人士慕名而来探望，或请他撰稿和去演讲。陈独秀的日程是“逐日排满”。据记载，单是 1921 年 1 月间，陈独秀到广州各类学校发表了七次大型演说。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理论，分析和阐明了有关社会主义、教育、劳动运动、人生观、妇女解放等问题。他撰写大量的政论文章，在《广东群报》、《新青年》、《民国日报》、《曙光》、《劳动与妇女》等报刊上发

表。据不完全统计，他在广州这段时间共发表4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大多是短小精悍的短文。陈公博评他写的短文“犀利无比”。他主要宣传劳动神圣，劳动创造世界；军人有新旧之别，要做新军人；妇女解放与劳动者解放一致；社会主义是今后必走的路。

## 创办宣传员养成所等学校

创办宣传员养成所，地址设在广州高第街素波巷，主要培养向广大工农群众进行革命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知识的宣传员。该所由陈独秀在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中拨出经费，由宣传委员会直接领导，任命陈公博为所长，教导主任谭植棠，教员有谭平山、杨漳浦等。陈独秀有时也到该校讲课。当时招收来自广东各地学员100多人。用谭植棠的话称这所学校是“干部学校”，“用以训练工、农、妇、青运动的干部”。

举办注音字母教导团，地址也设在广州高第街素波巷。指定张毅汉为主任，由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授课，学员多是广州中、小学教师，有100多人。

设立俄语学校，由米诺尔及其夫人任教，引导学生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为帮助广大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除党小组成员外，还吸收了一批高、中等学校学生参加，有会员80多人。

## 帮助建立各种工会

陈独秀关注劳苦的工人大众，向他们作知识的普及，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他深入到理发工人中去，参加他们成立的工会大会。到会的谭平山、陈公博、沈弦庐等人也发表演讲。不久，理发工会补习学校开学，陈独秀亲到学校作指导。理发工会会员有数百人。

陈独秀等还特别注重在机器工人、海员工人和铁路工人中开展工作。他曾对谭天度说：“机器工人比较先进，革命要发动和依靠他们，我们得设法在那里做做试验”。于是他们就在广州河南机器总会内举办机器工人补习学校，董事会由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许崇清等组成，谭平山为董事长，谭天度、黄裕谦分别为班主任，当时参加学习的有100多人。

在他们的努力推动下，各种工会有很大发展。到1921年6月，仅在广州、佛山、香港地区就先后成立汽车驾驶工人总会，革履、理发、茶居、机织、洋务等工会33个。从1920年10月至1921年3月，不到半年时间，就先后发动政治的或经济的罢工达16次之多。

## 与无政府主义者论战

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的宣传，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引起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的诘难。他先后致信三封给陈独秀，陈便写了三答区声白书，就绝对自由、法律废存、善良教育等问题，与区展开论战，彼此以书信往复，先后在《广东群报》上发表。1921 年 8 月，陈独秀以《讨论无政府主义》为题，将这些信件在《新青年》杂志上全文发表。陈还在该杂志上写文章，题为《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下品的无政府党》，批判无政府主义者宣扬绝对自由的虚无主义。

无政府主义于20 世纪初从欧洲传入中国。其时，中国正处在风雷激荡、各种思潮相互碰撞的年代。无政府主义反对强权、反对专制、反对压迫剥削，主张平等、自由，很快受到中国一些激进知识分子的欢迎。

无政府主义在广东传播较早，甚至先于马克思主义，1912 年就在广州开始了宣传活动，尤其在工人中较有影响。1921 年，广州无政府主义者在前“互劳俱乐部”的基础上成立了“广东机器工会”，后出版《进化周刊》。每年逢农历正月初七，无政府主义者和广东机器工会的工友都到广州北郊茶室聚会、演说、唱歌，到会者达数百人。是年五一劳动节，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及其他进步人士，共同发动各行业工人罢工，游行示威。广州大学生也自由参加游行。永汉路上挂着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画像。游行队伍中，赞成共产主义的人佩戴着“红领带”，赞成无政府主义的人佩戴着“黑领带”。此为两者合作的写照。

实际上，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推翻旧社会的问题上主张是一致的，两者有共同点，是合作的基础。分歧在于，推翻旧社会之后，要不要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以及建立什么社会制度的问题上。区声白写信给陈独秀，宣扬“人人同意人人可以自由退出社会”的思想。陈独秀在回复的三封信中作了详尽有力的批驳，并认为，区声白是一位纯洁的青年，信仰克鲁泡特金，不是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反对虚无主义、无抵抗主义、个人的无政府主义，绝不像一班“下品的无政府党”，但是陈又深刻指出就是区这样的无政府主义，也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主义。难怪连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曾任中法大学校长）说笑话：“无政府主义三千年成功。”在此期间，陈独秀又进一步宣传在推翻旧社会之后，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这就从思想理论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为建立共产党组织明确了指导思想。

## 指导、建立广州党组织

陈独秀到广州，迅速形成以他为中心，汇聚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物，如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和省立甲工学生 阮啸仙、周其鉴、刘尔嵩、张善铭以及杨匏安等，他们一起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商议建立党的组织。谭平山曾说过，陈独秀一到广州，不久就找到他，叫他任广东教育行政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委托他建立共产党在广州的组织。

陈独秀也先后与米诺尔、别斯林（俄国共产主义者）和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梁冰弦、刘石心、谭祖荫等联系，研究党的组织问题。在此前的1920年9月，俄共（布）两个党员到广州与无政府主义者联系，于同年底开始建党活动。

1921年1月，陈独秀把他起草的党纲交给区声白、梁冰弦等人讨论，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等条文。经过几次激烈的争论，意见未能统一，无政府主义者便退出党组织。而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则赞成陈独秀的主张。于是，着手建立新的共产党组织。广州共产党组织就此成立（党的一大后称广东支部）。初由陈独秀任书记，后谭平山继任，谭植棠任宣传委员，陈公博任组织委员；党员有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以及原上海党组织成员沈弦庐、袁振英、李季连同米诺尔、别斯林等共九人。受上海党组织派遣，到广州见陈独秀的包惠僧也参加广州党组织活动。对此，我认为广州党组织成立应从1920年底算起。有论者引用谭植棠回忆称广州党组织成立于1921年3月，其实不确，谭植棠指的是广东党支部的成立时间，而不是指广州党组织的成立时间。

陈独秀还指导广州青年团的成立。1922年3月14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赴会者3000余人。全省团员500多人，是全国团员最多的地方。当时，有许多党员在团中工作，党团没有分开。实际上，党的工作是通过团的合法组织形式来开展。1923年6月，广州又成立团的外围组织——新学生社，创办《新学生》半月刊。新学生社组织后来遍及全省，成为广东党、团组织的得力助手。

## 指导党的一大召开

为了正式创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在广州继续指导上海发起组的工作。1921年3月，他草拟了一个党章草案，寄给上海主持工作的李汉俊（上海党组织代理书记）。关于党组织，李汉俊与陈发生了争执。李愤而辞去代理书记职务，改由李达接任。


陈独秀

旅法党小组也是陈独秀在广州指导下成立的。张国焘回忆，陈独秀认为，海外建立党组织“则以留法的勤工俭学生最有希望”，并与蔡和森通信，请蔡在德、法等国建立党组织。另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20 年 12 月 27 日北京大学讲师张申府（张崧年）应里昂中法大学之聘到达法国。张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受陈独秀、李大钊委托，旅欧期间负有在旅法华人中发展组织的任务。”张申府 1977 年回忆：周恩来和刘清扬（时在法国）都是我介绍入党的，时间约在 1921 年 1 月或 2 月，先介绍刘清扬，然后由我和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当时入党手续是和周恩来谈话后，写信向陈独秀（时在广州）报告。该书还提到，1921 年 2 月，赵世炎通过陈独秀的介绍，同张申府接上党组织关系。此外，陈独秀委托施存统在日本建立党小组，发展了彭湃等入党。

到了 1921 年 4 月，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和旅法、旅日共产党小组先后建立。张国焘回忆，这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人觉得各地的工作都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组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上海、北京和广州各地同志们互相函商的结果，决定于六月中旬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开好大会，陈独秀为大会起草了一份党纲，写了一封致各代表的信及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工作的四点意见，要求大会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1. 党员的发展与教育；2. 党的组织原则；3. 党的纪律；4. 群众工作。

根据要求，各地选派两名代表参加大会。陈独秀在谭植棠家召集广东党员开会，表示自己不能去沪出席一大，因兼广东大学预科校长，正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遂指派陈公博和包惠僧出席一大。

是年 7 月 1 日，陈独秀在《新青年》9 卷 3 号发表《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一文，大声疾呼：“改造政党!”希望新的共产党不要腐败，做出证据来取信于民。建党伊始，陈独秀就殷殷寄语，可谓意味深长。同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会议在陈独秀缺席的情况下，推选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并讨论了陈独秀所拟的党纲。8 月，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不久，北京、武汉、广州分部相继成立，作为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9 月，陈独秀回到上海就任中共中央书记职务。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拉开了帷幕。

## 出席全国第一次劳大和团代表大会

为推动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的发展，1922 年 5 月初，陈独秀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与青年团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向这两次大会宣传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使两次大会都接受了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口号。

5 月 1 日，陈独秀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发表演讲《劳动节的由来与意义》，号召工人团结起来，组织工会，进行斗争。

5 月 5 日，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马克思的两大精神》，指出：“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是根据马克思的学说而成立的。我们不仅仅研究其学说，还须将其学说运用到实际中去。”这两次大会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的高涨。此时，彭湃在海陆丰领导的农民运动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展。

1922 年 6 月 15 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就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大问题，向社会各界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状况，解决中国革命的新起点。它为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历史任务，奠定了基础。”

## 赴惠州劝解陈炯明

陈独秀第二次来广州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到惠州劝解陈炯明。原来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日益尖锐。孙中山主张北伐，陈炯明坚持“联省自治”，反对北伐，并拒绝出任北伐军的最高指挥。1922 年初，孙中山解除陈炯明粤军总司令、广东省省长职务，局势骤然紧张。陈炯明回到惠州西湖一个祠堂居住。为劝两人和解，陈独秀在全国劳动大会和青年团“一大”闭会之后，到惠州与陈炯明晤谈。陈独秀到惠州去做陈炯明的工作，希望陈炯明返穗，与孙中山和解，是可能的，是合乎情理的事情。虽然未能说和，但陈独秀是尽力而为了。

## 主持召开党的三大

为了就近与国民党讨论合作问题，陈独秀于 1923 年 3 月到达广州，中共中央机关也随之迁驻广州。在此期间，陈独秀一面筹备召开中共三大，一面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6 月初，孙中山任命陈独秀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长。

6月10日—20日，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路31号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和解决国共合作的问题。

陈独秀在会上当选为主席并作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着重指出“二七”罢工失败及其后的种种情况，都证明无产阶级力量的薄弱，强调国民革命的重要，承认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的领导中心，原则上主张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中共应领导工农群众，成为国民革命中的一个强大的左翼。陈独秀还提出在国民党内组织中共党团，以保持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一致的主张和行动的提案，获得一致通过。大会选举了以陈独秀为委员长的中央领导机构。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陈独秀主持召开的党的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统一了党内关于国共合作的认识，解决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从此，“党内合作”——即由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与同国民党合作的构想，变为现实并揭开了中国大革命运动的序幕。对中共“三大”会议成果，马林是这样评价的，“能否改组国民党，使之发展成为一个革命的政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同志的合作”，他认为，只有像陈独秀这样的人物才能通过宣传去促进国民党的新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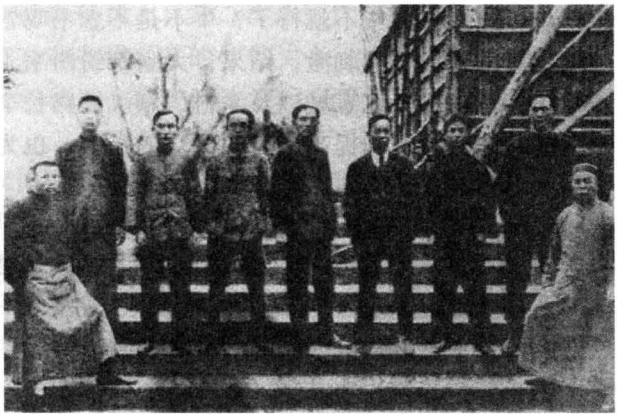
（刘子健）

# 邓中夏

## 他领导了震惊世界的省港大罢工

邓中夏，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早期的领导人，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曾参加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1922年，他第一次来到广州，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被选为大会领导之一。他还在广州出席了党团领导干部会议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为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来到广州。5月，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和大会秘书长。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邓中夏任“全总”执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为声援上海工人，邓中夏参与组织领导了震惊世界的省港大罢工，几十万罢工工人在党的领导下，运用正确策略，坚持斗争达一年多，为中国工人运动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大革命失败后，参与组织策划南昌起义，筹备和出席八七会议，出任过党中央秘书长、江苏省委、广东省委书记。1933年在上海不幸被捕，面对死亡，他毫不畏惧，大义凛然地痛斥国民党反动派，最后在南京雨花台慷慨就义。

## 唤起万千民众



邓中夏（左六）与苏兆征（左五）等人合影

邓中夏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接受十月革命的经验后，一方面认真学习中外近百年的历史，研究中国的政治现状，另一方面又积极地在同学中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十月革命的经验。他废寝忘食，干得特别带劲。为推动学生的爱国行动，学生救国会在邓中夏的积极筹备下，创办了《国民》杂志。

然而，创办杂志、撰写文章，面对的只是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对于广大劳苦大众，却不起作用，因为贫穷，他们没有文化，你的杂志办得再好，文章写得再好，他们也读不到，看不了。现实使邓中夏认识到普及平民教育的重要性，于是他又联系进步同学一道，组织平民教育团，通过演讲、办班，让青年工友学文化，在传播知识的同时，启发他们觉悟，宣传爱国、救国与反剥削等革命道理。

邓中夏组织的平民教育团在北京演讲引起了轰动效应，受到各阶层人民的普遍欢迎。1919 年4 月的一天，北京遇上沙尘暴，黄沙满天，不堪张目。然而，演讲却照常进行，而听讲者也非常踊跃，出乎主办者意料之外。在工人中演讲，邓中夏有一套办法。作为湖南人，他的普通话带有湖南口音，但他的演讲极富感染力，“讲得深入浅出，会打比方，语言生动活泼，通俗易懂，非常形象化。”“所以听他讲演的人老是全神贯注，目不转睛。”

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工人，对剥削制度没有认识，常常认为是自己命不好，说“工”字不出头，出头就是“土”，所以只有听天由命。邓中夏在工人夜校里讲课，对“工”字作了另一种解读，他对工人说“工”字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一人站立，工人是顶天立地的人，工人两字连起来写，就是“天”字，说明工人团结起来，他们的力量有天大！经他这样解说，工人都感很新鲜，很振奋，很受教育。

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刚开始时没几个工人来学习，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干活的命，学文化也没什么用。为此，邓中夏给工人们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从前，有一个地主，家里雇了一个长工，这个长工辛苦了大半辈子，四十几岁才

娶了媳妇，生了个儿子，儿子长到十二岁，长工回想到自己吃了一辈子苦，一个大字也不识，就想让儿子去念书。这事让地主知道了，他把长工找来，问道：你想让儿子念书？长工说：是的，穷人认几个字也好，不念书没记性哩。地主冷笑，说，穷人有力气不就行了？牛不是不念书吗？牛不认字，不也一样耕田？这个故事对工人们很大刺激，结果，大家都纷纷来学校学习。平民教育团一直坚持了几年，行踪遍及北京城以及乡村、京汉铁路长辛店直至安徽。在邓中夏与进步学生的共同努力下，提高了普通群众的觉悟，也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和党的创建作了一些思想准备。

## 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大”

广州对于邓中夏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地方，他曾三次来到这里出席全国性的重要大会，并在此领导了举世瞩目的省港大罢工，成为中国共产党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领导工人运动，邓中夏是负责人之一，一直在北京领导工人运动。1922 年 1 月，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以此为起点，出现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为统一领导全国的工人运动，通过劳动组合书记部等单位发起，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邓中夏以长辛店工会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大会。

这次大会是在党诞生后不久召开的，共产党的力量还很弱小，还不为人们所真正认识。出席大会的工会代表，有国民党的、共产党的，还有无政府主义的等等，可以说成分非常复杂，斗争也很激烈。邓中夏是北京工人运动的开创者和领导者，享有很高威望，所以他被推选为大会的领导人。在会前，邓中夏作了认真的准备，在会中，他了解情况，找人谈话，准备发言，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工作。团结各地工会代表，为推动会议向反帝反封建的目标前进而殚精竭虑。他以“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代表邓重远”的名义向大会提出了《工会组织原则案》。他的这个提案最后为大会所通过，成为大会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也成为后来指导中国革命工会组织的根本原则。

这次大会还有一项重要成果，就是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先设一全国总通讯处，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担任。这意味着，全国的工会组织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有指挥全国职工运动之权”，“公认它为全国唯一的领袖”。这样的结果与邓中夏的努力分不开，在大会期间，是他联合其他代表向大会提出这样一项临时动议，最终获得通过。

## 建立全国总工会

1925 年 4 月，邓中夏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第二次来到广州，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此之前，邓中夏在上海出席了党的“四大”，出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秘书长。为了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党中央决定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力促建立中华全国总工会。

到广州后，邓中夏住进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与广州工会和党组织的一些负责人一道，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他从为大会制定议程，起草各种文件，给各地工会发出邀请，到解决会场等，无论巨细，事必躬亲。据参与会议筹备工作的人士回忆，邓中夏生活简朴，待人热情，整天忙碌不已，但精力充沛。

对于即将召开的劳动大会要解决什么问题，邓中夏非常明确。为了帮助与会代表认识这些问题，他专门写了一篇《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文章作解答。

1925 年 5 月 1 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这天也在广州召开。为了表示工农兵大团结，这天上午，广州的工人、农民、军人与两个大会的代表共 10 万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盛况空前。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武汉、长沙、广州、青岛、济南、郑州、太原、大连等城市的铁路、海运、矿山、机械、纺织等产业部门的 165 个工会、54 万会员的代表共 281 人出席了大会，这些工会中多数由共产党领导，部分与国民党有关系，也有无党派组织的工会。邓中夏被选为大会秘书长，也是大会最主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刘少奇、苏兆征、林伟民、李启汉、王荷波、刘华等我党的工运领袖都汇集一堂，与各地工人代表共同研究中国工人阶级与工会的有关问题。会议开得非常成功，通过了“工农兵大联合”、“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等十多项重要决议案、二十多项临时案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和《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这些文件，几乎都是出自邓中夏与刘少奇之手。

大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按《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林伟民被选为委员长，邓中夏被选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工人的大团结。工人有了自己统一的组织，而这一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对推动大革命高潮的到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大会结束不久，五卅运动就爆发了。

## 组织省港大罢工

25 万省港工人参加，并且坚持了一年多的省港大罢工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

个伟大事件，在世界工运史上也是罕见的。邓中夏就是这场大罢工的最主要的组织领导人之一，被参加省港大罢工的有关人士称为天才的组织者。

到香港发动工人罢工，人地生疏、语言不通是邓中夏开展工作的最大障碍，然而，这丝毫阻挡不住他开展工作的热情。他紧紧依靠苏兆征与杨殷这两位非常熟悉香港的广东人，很快就进行了组织发动工作。当时香港有几十万工人，工会100多个，但是，真正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是少数，多数为黄色工会或旧式的行会工会，而共产党员与青年团员加起来也只有20人左右，要发动组织工人起来，谈何容易？甚至，当邓中夏将他的想法告诉香港地下党支部书记黄平时，还把对方吓了一跳。后来黄平回忆说："对我来说，这个消息好像晴天霹雳，把我从梦中惊醒。"

在邓中夏的组织领导下，香港的党团组织和进步力量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发动工作，让香港人民了解五卅惨案的真相和开展大罢工的目的、意义。邓中夏亲自到学校、报馆作演讲，出席各种会议宣传反帝爱国的主张。又与杨殷、苏兆征等人一起走访香港各工会，对工会领导人进行宣传发动，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谈话，使多数工会的头头接受了他的主张。他还以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名义，正式召集各工会代表开会，讨论开展大罢工的问题，结果，与会代表一致表示赞成，并通过了罢工宣言。

1925年6月19日，省港大罢工爆发，香港工人在党的领导下陆续投入罢工，还有几万工人冲破当局的戒严令，从香港回到广州。

## 红色的战略家

省港大罢工爆发后，如何组织安置好工人，如何坚持斗争，一连串的问题摆在了共产党人面前。邓中夏作为省港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他以非凡的组织才能、高超的斗争艺术加以应对，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对几十万罢工工人的安置问题，邓中夏吸取俄国苏维埃政府的经验，组织建立了由罢工工人代表组成的罢工委员会，让在工人中有很高威信的苏兆征任委员长。下设干事局、干事局又下设多个部，负责具体事务，罢工委员会内设党团组织，邓中夏接任党团书记。罢工委员会有全套完备的组织机构，而且有很大权力，被称为具有政权性质的"工人政府"，邓中夏是在为中国工人阶级探索建设政权的道路。

为了真正代表广大工人的意志，邓中夏还创造性地发动工人选出代表，组成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为罢工工人的最高权力机关。还组建了一支有2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为了打击帝国主义，封锁香港和维护罢工秩序而工作。

省港大罢工开始后，对香港和广州进行了封锁，这样做使帝国主义遭受了沉

重的打击。但是与此同时，也给自己造成很大困难，因为广东本身一直有进口粮食、燃料和日用品的传统，封锁口岸，广东的商人无生意可做，广东的人民生活也受影响。邓中夏认真分析了帝国主义阵营的情况，最后决定采取“单独对英”的斗争策略。即集中力量打击英帝国主义，而对其他国家的商船则网开一面，只要他们不贩卖英国货，可颁发特许证，允许他们来广州进行贸易活动。

“单独对英”的策略实施后取得显著效果，广州每天竟有几十艘船入口，促进了广东经济的繁荣。

但是，对特许证的颁发问题，由于手续较为麻烦，而且收费也较高，所以商人有意见。知道这个消息后，邓中夏意识到，大罢工还应得到商人的支持，为争取商人，罢工委员会又修改了之前的做法，免除了手续费。后来，邓中夏又提出“工商联合”的政策，建议在广州建立“工农商学联合会”。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对团结商人支持罢工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实践证明，这个政策的实行，是大罢工能够坚持十多个月的重要原因。难怪邓中夏在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说时说：“工商联合这个武器最厉害”，“比飞机大炮还有力量。”

## 建筑对敌斗争“炮台”

1925 年 5 月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当时，来自赤色工会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说的一句话给邓中夏极大启发，他说：工会是无产阶级的炮台。在这次全国劳动大会后，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邓中夏为建筑这个“无产阶级的炮台”倾注了大量心血。在省港大罢工中，邓中夏又为统一香港的工会做了不少工作。

现实斗争的实践使邓中夏认识到：仅仅自己认识工会的重要性和作用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使广大工人阶级都认识到这个问题，使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发动起来，共同来建筑无产阶级的炮台，抗击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为此，他在省港大罢工爆发后，创办了工人自己的报纸《工人之路》，他亲自担任主编，为报纸写了大量社论和评论。为适应工人阅读的要求，他为《工人之路》定下政治观点要鲜明、文字要精练通俗、深入浅出的风格。

为启发工人认识香港工会要进行整顿，使之统一起来的意义，他通过《工人之路》向工人提出问题，调动工人开动脑筋。他循循善诱，促使工友们去思考香港工会的统一问题。

在他的帮助教育下，工人们热情高涨。在万众期待中，他以全总名义发出对香港工会统一问题的意见书和组织香港总工会的章程草案，结果得到香港工人的热烈拥护。很快工人们就行动起来，根据全总要求，仅用一个月就组织成立了新型的产业工会和香港总工会，在成立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全总向香港总工会授旗，旗上写着“革命前线大炮台”几个大字。

# 别具一格的婚礼

广州贤思街近圣里的“龚寓”，是省港大罢工委员会的办公联络点，省港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苏兆征、邓中夏、李启汉都居住在这里。他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在一起，彼此也亲密无间，如同一家人。他们中间苏兆征是广东香山人，而邓中夏和李启汉则同为湖南人。苏兆征和李启汉已婚，住在楼上，邓中夏则住在楼下。这位职业革命家为了革命事业终日劳碌，不知不觉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不过，爱神并没有把他忘记，邓中夏与李启汉的妹妹李慧馨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相知相爱了。

李慧馨出生在湖南一个贫苦家庭里，有兄弟姐妹六人，她曾因家贫被两次卖给别人做童养媳。1924 年 10 月，李慧馨的大哥李启汉将她与母亲接到自己的工作地广州，李启汉在为工人运动忙碌，而母亲与李慧馨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他的“后勤部长”，住在楼下的邓中夏也受益不少，有时在苏兆征家或李启汉家吃个饭，有需要缝补的衣服也可以交给李慧馨办，一来二去，丘比特之箭已经把两颗年轻的心连在了一起。

在李慧馨眼里，邓中夏精力充沛，满腹学问，英俊能干。天底下的许多事情他都知道，在向工人中作宣传时，讲得深入浅出，深受工人欢迎与爱戴。同时他又毫无架子，与工人打成一片，对人和气。邓中夏则把李慧馨看作是自己的妹妹一样，鼓励她走上社会，参加革命斗争，又帮助她学文化，上夜校，听报告。在邓中夏的鼓励与帮助下，17 岁的李慧馨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投身到省港大罢工的火热斗争中，共同的革命志向使两位年青人相爱了，他们相互帮助与促进，使邓中夏的亲密战友李启汉、苏兆征倍感高兴，也力促他们早日成亲。

1926 年 8 月的一天，在刘少奇、何宝珍夫妇和苏兆征、李启汉等战友们的见证下，邓中夏与李慧馨结婚了。在这个人生的重大日子里，邓中夏忙里偷闲，“休息”了一天。按照广州的习惯，一对新人要穿上结婚礼服，坐上小轿车，在城里周游，并举行隆重的结婚仪式。然而，这对清贫的革命者却一反传统，以独特的方式进行婚礼。这一天，邓中夏与李慧馨穿上整洁的衣服，相拥来到城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凭吊英烈。走在长长的墓道，两旁是盛开的黄菊花、黄芍药和青松、翠柏，显得庄严肃穆，又充满生机。来到纪功坊前，邓中夏轻轻地诵读着纪念碑文，并且给新婚妻子李慧馨作耐心的解说，两人还向烈士们默哀鞠躬，表示敬意。邓中夏以黄花岗英烈的事迹为例告诉妻子，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但共产党人不要怕牺牲，要前赴后继，坚持斗争。

就这样，这对革命伴侣以凭吊英烈来度过自己新婚的第一天，这在历史也属罕见，不能不说是一个别具一格的婚礼。

## 英勇不屈，慷慨就义

1933年5月15日晚，邓中夏在上海不幸被捕。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邓中夏始终未暴露身份。为了出狱，他请史良律师为其辩护，宋庆龄、何香凝女士也出钱出力设法营救。然而，由于叛徒出卖，形势急转直下，邓中夏的身份暴露，被蒋介石点名解往南京。

在狱中，邓中夏进行了最后的斗争。他受尽敌人的百般折磨，打得遍体鳞伤，依然坚贞不屈，并对敌人的罪恶进行揭露。敌人软硬兼施，企图让他说出党的秘密，均被他严词拒绝。他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使敌人胆战心惊，无计可施。

他还在狱中对难友进行革命气节的教育。告诉难友们“共产党人被捕后要有骨气，要坚强，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失去气节。”“人生总有一生一死，要生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一个人能为最大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劳苦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

对国民党的特务和宪兵，邓中夏也不放过做工作的机会。据难友回忆，一次，邓中夏对打进监狱的特务说：“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不问你。我是共产党员，但你看我像不像国民党所说的青面獠牙、专门杀人放火的人？我看你是个年轻的朋友，你们缺乏政治经验，要小心上当……”

知道自己为国民党反动派所不容，将不久于人世，邓中夏从容地给党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写道：“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的胜利终于是属于我们的！”坚定的信念跃然纸上。

1933年9月21日黎明，敌人打开牢门提邓中夏出去，知道自己就义的时刻到了，邓中夏穿好衣服，高呼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口号，昂首走向刑场。

（杨苗丽）

# 谭平山

## 跌宕人生终不悔

谭平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等政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全面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工运、农运、学运、宣传、教育等许多重大开创性工作。他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三大历史时期，人生经历十分坎坷，但他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

### 两次加入国民党和共产党

1. 老同盟会员和国民党元老。

谭平山青年时期积极追求真理，并于1909年在两广优级师范学院读书期间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1912年8月7日，在宋教仁组织下，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联合在北京成立国民党，孙中山为理事长，宋教仁为代理事长，谭平山成为第一批国民党党员。

2.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1917 年至 1919 年，谭平山在北大读书期间就参加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并成为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20 年初，谭平山在北京大学毕业后，与陈公博、谭植棠等人在上海创办了《政衡》小报，先后发表《谁是制造社会革命的工人》、《中国政党问题及今后组织政党的方针》等理论文章，并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者。

在上海，谭平山奉陈独秀之命，于 1920 年夏回到广州，发起组织成立广东共产党和青年团活动，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1949 年 6 月在北平成立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合影。前排左一为谭平山。

3. 被国民党右派开除国民党党籍，并被共产党“左”倾中央错误开除共产党党籍。

1927 年春夏，国民党右派相继在上海、广州、武汉等地发动反革命政变。7 月 20 日，谭平山在九江主持召开座谈会，会同李立三、邓中夏、叶挺、聂荣臻等商议举行南昌暴动，并获中共中央批准。8 月 1 日，谭平山与周恩来等人一道领导了南昌起义。起义爆发后，对外宣布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谭平山任主席。

鉴于谭平山领导南昌起义，宣布与国民党右派决裂，8 月 8 日，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宣布开除谭平山的国民党党籍。同年 11 月 10 日，共产党中央也开除了他的党籍。

关于谭平山被开除中共党籍的原因，史书上的阐述主要来源于周恩来 1944 年 3 月在延安中央党校做《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称谭平山对一位师长说，如若张国焘再反对南昌起义，就把他杀掉，因此后来共产国际代表就把他开除了党籍。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时谭平山被开除党籍的原因是党中央及党内绝大多数负责人否定南昌起义，而谭平山是南昌起义的实际策划者及具体实施负责人。

1927 年 10 月 15 日，张太雷在香港主持召开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总结南昌起义失败原因，部署广州起义及全省工农武装暴动。开会时，他们不让谭平山等人出席，事后也不听他们的申辩。会议认为，南昌起义“完全是军事冒险的运动”，是“军事的投机”。张太雷在工作报告中阐明：“因为这样结果致使这次暴动成为平山所领导。”11 月 1 日，省委在给中央临时政治局的报告中，更进一步提出“开除谭平山党籍”的请求。之后，李立三、张国焘等人分别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都极力否定南昌起义，称本次起义实际上是谭平山个人领导，他“一心想另开一新局面，连中央及国际等名词都不愿听”。

11 月 9 日至 10 日，临时政治局在瞿秋白主持下于上海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受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左”倾思想指导：在政治上，错误估计处在低潮的中国革命形势仍在继续高涨，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决定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在组织上，采取惩办主义，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指责南昌起义前委执行了“机会主义的旧政策”，“完全是一次软弱的军事投机的尝试”，并对南昌暴动和秋收暴动的领导人给予政治纪律处分，开除谭平山党籍，开除张国焘中央委员和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对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等人给予不同程度的组织处分，对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全体成员给予警告处分。

张国焘晚年在他所写《我的回忆》一书中记述说：11 月的中央会议“否定了南昌暴动的意义，认为它仍然采用国民党的旗帜是机会主义的表现，而这种机会主义应负南昌暴动失败之责。谭平山因而被开除党籍。当时谭平山已从潮汕逃到了上海，他被断绝了与中共的一切联系，中共中央也不给他以任何辩护的机会。”

对于国民党开除谭平山党籍，他只是一笑置之。但对共产党开除他党籍，他在事后回忆中说：“像一个在大海中航行失去了指南针的小船一样的痛苦。”

4. 全面抗战爆发，先后被国民党和共产党恢复党籍。

鉴于共产党不要他，国民党迫害他，谭平山此后一直过着颠沛流离、东躲西藏的生活。1935 年，中共中央发表著名的八一抗日宣言，号召各党各派联合一致抗日，谭平山为之精神一振。此后，接连爆发西安事变、卢沟桥事变，随之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此时谭平山已完全按捺不住满腔激情，他不顾个人安危，公开来到武汉参加各种抗日救亡运动。

谭平山的公开露面，立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鉴于他原来在国共两党中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各派政治势力都来争取他。刚从监狱被释放出来的陈独秀来到武汉，邀请谭平山在汉口的南京饭店会面。两人因政治观点不和，不欢而散。刚刚叛离党中央的张国焘也主动邀请与谭平山晤面，但被他果断拒绝。此时的谭平山已完全接受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决心为之奋斗。

1938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1 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举国抗战的决策。谭平山出席大会并被恢复国民党党籍，还被任命为国民党武汉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指导委员和设计委员（周恩来为该部副部长）。随后国民参政会成立，他连续任一、二、三、四届参政员。

1938 年秋冬，谭平山在武汉向周恩来和董必武提出请求，希望党组织重新审查自己及恢复自己的共产党党籍，并盼望能去延安工作。党中央经研究，同意他回到党内的请求，但要求他继续留在国统区，以民主人士身份做各民主力量的统战工作。此后，他积极为贯彻中共中央的各项指示努力奋斗，从不计较个人利益的得失，始终与党的中心任务保持一致，圆满完成了党中央交给他的许多重大使命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谭平山迫切要求以中共党员的身份来工作。1951 年，他曾致信毛泽东主席，请求公开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毛主席当即复信，肯定了他的历史功绩，但说目前台湾还未解放，还有许多统战工作需要由他出面来做，暂时不宜公开他中共党员的身份；但可以看党内文件，可以过小范围的组织生活。1956 年春，谭平山病逝前三个月，再次请求中央公开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当时中央派人答复说，还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为了党的利益，暂不公开。

## 五次组织革命政党

1. 创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 年 7 月，谭平山奉陈独秀之命，以共产党员的身份，由上海回到广州，领导广东的建党、建团活动。同年 10 月，广州首先由无政府主义者成立了名为“共产党”的组织，谭平山等人认为无政府主义不能领导工人阶级取得革命的胜利，并于 1921 年初重新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的共产党广东支部。

谭平山在建党初期，领导创办了《广东群报》，建立了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广州机器工人补习学校、注音字母教导团、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俄语学校，创办了《劳动与妇女》周刊等，利用这些机构，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党的干部，对广大工人进行宣传教育。

在建党同时，谭平山还于 1920 年 8 月成立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将其作为建党的组织基础。1922 年 3 月 14 日，他又重新组建广东团组织。

2. 参加改组中国国民党。

1923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确立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方针。

鉴于辛亥革命和以后历次斗争的失败，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认真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经验教训，决定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和方法，

改组国民党。

1923年10月，孙中山为筹备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谭平山以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中共中央驻粤代表、老同盟会会员和老国民党员的身份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被孙中山指定为广州特别区代表。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通过了国民党的施政纲领，并宣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国民党的基本政策，使之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的起点。

3．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

大革命失败后，谭平山在被国共两党都开除党籍的逆境中，仍主张“实行民族的社会革命，向着社会主义的路上走”。针对“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他于1928年2月11日写信给中共中央，分析批评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判断，指出中国革命还没有发展到只要无产阶级一家独自干的阶段。他认为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中国的革命就是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极力主张开展土地革命。但他的正确主张反遭到更加严厉的无情批判。

那时，许多失去关系的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云集上海，政治上无出路，生活上无着落，就像“无坛庙可归的青年游魂”。鉴于谭平山在国共两党内都有极高威信，由他出面开会，协商处理办法。他首先成立了“国民党左派联合办事处”，1928年夏，他与章伯钧在上海成立“中华革命党”，1930年8月9日，他又与邓演达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推翻南京官僚独裁统治，建立以农民和工人为重心的平民政权，以实行耕者有其田作为土地国有的过渡纲领。

1933年，谭平山参加闽变反蒋。1935年11月，该党响应中共《八一宣言》，决定改称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积极投入抗日战争。1947年2月，该党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宣布易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4．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为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1943年2月，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支持下，由谭平山、王昆仑、陈铭枢、杨杰等国民党中的爱国民主人士在重庆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座谈会；9月，正式定名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5年10月28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在重庆上清寺特园正式宣告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全体大会。该组织采取组织公开、领导不公开的方式在国民党上层人中进行争取和团结工作，并参加一些党派、团体组织的反内战、争民主活动。

1949年11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决定将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统一为一个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联、民促宣告结束。

5. 参与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1946 年 6 月全面内战爆发，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继续从事民主进步文化事业和反蒋革命活动，大批民主人士、无党派人士，以及文化艺术界和金融经济界知名人士陆续由国统区转移至香港，谭平山也于 1947 年春出走香港。

当时，在香港仅原国民党系统就有谭平山组织的三民主义同志会，蔡廷锴组织的民主促进会，王昆仑、吴茂荪组织的小民革，以及柳亚子等国民党中著名人士。按其代表性而言，这些组织和个人都属国民党民主派范畴。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利用香港特殊条件，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大力开展香港新政协运动。分局领导方方、章汉夫、潘汉年、夏衍、连贯在经过分头做工作和多次商议后，促使李济深等国民党民主派人士认识到，要想形成更大的力量，争取反蒋斗争的胜利，就必须在民联、民促等已经成立的组织基础上，将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和爱国民主力量进一步联合起来。经协商，大家都同意建立一个由李济深任主席的统一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宋庆龄对此也表示赞成和支持。谭平山积极拥护这一主张，协助香港分局做好各个系统的思想工作，打消个别人的疑虑。

1947 年 11 月 12 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在香港开幕。1948 年 1 月 1 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举行成立大会，宣告“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主张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独立、民主与和平。

## 七次成为核心人物

1. 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成员。

1921 年春成立广东共产党，陈独秀、谭平山先后任书记。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随后在各地中共早期党组织基础上成立了支部（后改为区委），谭平山为中共广东支部（后广东区委）书记。

为更有力开展工人运动，1921 年 8 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北京、广州、汉口、长沙设立分部，谭平山为南方（广东）分部主任。

广东在 1920 年建团初期，由于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信仰不同，内部矛盾逐渐加剧，遂于 1921 年 4 月间自行解散。1921 年 12 月，谭平山开始重组广东团组织。1922 年 3 月 14 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开成立大会，谭平山为首任执行委员会书记。

1922 年 5 月，中国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谭平山都是会议的主要负责人。

1923 年 6 月中共三大及 1925 年 1 月的中共四大上，谭平山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九名委员之一，1927 年五大期间，中央委员会设立政治局，谭平山为七名成

员之一。他还担任了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

1924 年 1 月国民党一大后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谭平山受党中央派遣，任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书记。

1925 年 8 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广州、北京设立临时委员会（相当于以后的中央局），谭平山为广州临时委员会负责人。

1926 年 11 月，谭平山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中国委员会主席。

鉴于谭平山在中共历史上的重要地位，1947 年秋香港《星岛晚报》撰文《民主“美髯公”谭平山》，再次评论当年“南谭（广州谭平山）、北李（北京李大钊）、中陈（上海陈独秀）”在二十多年前传播马列主义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

2. 国民党左派的中坚力量。

从国共合作开始，就一直存在着左派与右派的斗争，谭平山则成为国民党左派的中坚力量。

1924 年 1 月 20 日，谭平山出席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 月 30 日，他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组织部长，并主持中央秘书处日常事务工作。

1924 年 10 月，商团在广州叛乱。孙中山在韶关北伐途中决定成立革命委员会，自任会长，并指定廖仲恺、谭平山、蒋介石、陈友仁等六人为全权委员，鲍罗廷为顾问，坚决镇压商团叛乱。

在谭平山、杨匏安主持下，1925 年 10 月，召开了广东全省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国民党广东省党部，进一步加强了国共两党在广东的合作。

1925 年 11 月，国民党一批老右派骨干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非法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的共产党员》、《解雇鲍罗廷》等反革命决议案，宣布开除李大钊、谭平山、瞿秋白、林伯渠、毛泽东等九名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国民党党籍。谭平山团结国民党左派，组织各种进步力量，掀起大规模的反击西山会议派的斗争高潮。之后，在谭平山等人的积极活动下，国民党在广州召开正式的第四次中央全会，严肃处理西山会议派，取消对李大钊、谭平山等人开除党籍的决定。

1926 年 1 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谭平山以 246 票的高票再次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谭平山和林伯渠、杨匏安三名共产党员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同时，谭平山还兼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

1927年初，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谭平山和苏兆征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国民政府任职。谭平山任国民政府委员、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国民政府农政部部长，苏兆征任劳工部部长。他们积极协助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罗易的工作。

3.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领袖。

1928年夏，谭平山与章伯钧在上海成立中华革命党。1930年8月，谭平山与回国不久的邓演达将中华革命党改组成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于8月在上海召集十个省区的代表参加会议，通过了纲领性文件《我们的政治主张》，选出了中央干事会，谭平山为领导成员。

4. 三民主义同志会创始人。

为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及消极抗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支持下，经过两年多的筹备，1945年10月28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宣告成立，谭平山成为该党创始人。

5.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

解放战争时期，谭平山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香港新政协运动，他拥护中共提出的将原国民党系统中的民主派合并为统一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8年元旦，民革在香港成立，大会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谭平山为民革中央常委。

1956年3月，民革开始设副主席，谭平山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

6. 新政协领导成员。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等23个单位，134人。会议推选毛泽东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谭平山等21人为常务委员。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六个小组，谭平山为第二小组组长，负责起草新政协会议组织条例。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谭平山为主席团常务委员和一届政协委员。大会成立了六个委员会，谭平山为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召集人。

7.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成员。

1949年9月下旬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并选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人，谭平山为成员之一。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谭平山等 15 人为政务委员；同时他还是首任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

1954 年谭平山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 四次险些遇难

谭平山一生坚持真理，英勇无畏，一直是反动派的刺杀对象。他在白色恐怖中有四次险些遇难，但他却一次次避过险情，成为一位幸存者。

1. 1925 年 8 月 20 日上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前往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准备参加第 102 次会议时被暗杀。这次国民党右派暗杀廖仲恺时，本要同时暗杀谭平山，但谭平山正急于去布置迎接被港英当局刚刚释放的共产党领袖杨匏安，因而迟到会场几分钟，这才碰巧得以幸免。

2. 1927 年 4 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5 月，许克祥在湖南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谭平山和鲍罗廷、陈公博、谭延闿在武汉开会研究对策，决定由谭平山牵头，组成国民党中央查办代表团赴湘。

5 月 26 日，在长沙的张翼鹏、仇鳌、彭国钧、许克祥、余湘等右派商量对策，随即成立“清共委员会”，并发出特急电报，命令在岳阳的周磐即刻将谭平山等人就地枪决。因当时两湖地区革命仍在高涨，武汉政府尚未最后公开反共，周磐不愿冒此风险，随之将电报出示谭平山。谭平山等人得此消息，立即离开岳阳返回武汉，避过了一场大难。

3. 由于叛徒陈敬斋的出卖，1931 年 8 月 17 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总干事邓演达等十余人在上海愚园路干部训练班等处被捕，后被杀害。此次蒋介石的捕杀计划名单包括谭平山在内。那日，适逢李世璋到谭平山家商议要事，使他未能依时赶到训练班。当谭平山获悉邓演达被捕的消息后，立即转移了住址，这才使他又一次脱险。

4. 1947 年春，蒋介石布置特务暗杀谭平山。在此前，国民党特务已暗杀了民盟领导人李公朴和闻一多。为此，中共和民主人士一再劝说谭平山尽快撤离国统区，并安排他于在四五月间秘密出走香港。

（高宏的）

# 蔡和森

## 寻党于羊城　喋血于羊城

蔡和森是我党著名的理论家、宣传家和活动家，毛泽东年轻时的挚友。他在短短36年的革命生涯中，写下了壮丽的诗篇。尽管他在广东的革命活动并不很多，但却都与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成为广东革命历史上的一枝奇葩。

### 寻党于广州

1921年11月，一个衣衫褴褛但却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带领着21个同样衣衫褴褛的人在广州城里四处寻找着什么，他们逢人便打听陈独秀和广东共产党组织的状况，但是人人都摇头表示自己并不清楚。这个面庞消瘦但却气宇轩昂的年轻人不禁心中焦急起来。这个年轻人就是蔡和森，他们一行是专程从香港来广州寻找党组织的。如果计划落空，下一步如何安排，想到这里，蔡和森不禁更加眉头紧拧。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刚刚成立不久的广



蔡和森纪念馆雕塑

东党组织——广州粤区党委。见到了陈公博，了解到党的“一大”及其以后的活动情况，这让蔡和森松了一口气，天随人愿。但他们要找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却已经离开广州去了上海。他们又马不停蹄地离开了广州赶到了上海，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面对全国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蔡和森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期待，思绪也渐渐回到了求学生涯……

1913 年蔡和森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毛泽东成为同学，两个出类拔萃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毛泽东以渊博的学识、奔放的热情、远大的理想、宏伟的气魄深深地赢得蔡和森的敬佩。二人很快成了志同道合的战友，并在他们周围逐渐聚集了一批有志于社会改革的进步学生。在此基础上，在蔡和森和毛泽东的领导组织下成立了新民学会，时间是 1918 年 4 月 14 日，这是五四运动前成立最早的革命团体之一。蔡和森将全部精力都用在了新民学会的发展上，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团结教育了大批先进青年和知识分子，为中国革命造就了大批骨干。

当蔡和森和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进展得如火如荼之时，他们的恩师杨昌济来信说，北京有人发起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并要他们去北京联络这一工作，为湖南有志于赴法的学生找条出路。为此，蔡和森与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反复讨论，并召开全体会员会议，决定在湖南开展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1919年底，蔡和森动员了自己的母亲葛健豪、妹妹蔡畅以及向警予一行乘坐邮轮抵达法国，来到了蒙达尼学习。初到法国，他除了能大略地辨认书名外，书的内容根本无法读下去了，法国人讲话他也听不懂，简直成了聋哑人。他感到这种状况如果不尽快改变，一切事情都将无从着手。于是，他特地买了一本法华字典。以后每天天亮，他就来到公园看法文报纸。经过四个月的刻苦攻读，蔡和森终于从开始一天只能看一则消息，到一天能看整版报纸了。语言关通过后，蔡和森开始猛看猛译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他经常穿着旧薄的衣服，坐在简陋的中学宿舍，顶着严重的哮喘宿疾，翻着字典，攻读马列著作，顽强地反复掂量着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的分量。半年多的时间里，用“霸蛮”精神译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著作的重要章节，并搜集了介绍各国革命的小册子。通过学习，他认为中国必须组织共产党，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系统阐明了有关建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组织原则，成为党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 南下广东

1923年5月，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着重讨论和孙中山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为了筹备这次大会，身为中共第二届中央委员和《向导》周报主编的蔡和森从上海赶到了广州。和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夫人向警予，恤孤院路宁静的街道上不时可以看到他们忙碌而又甜蜜的身影……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说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向蔡同盟”，这是一段自由恋爱促成的革命婚姻。

向警予，湖南溆浦人，长沙周南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于当年秋天回到了故乡，着手恢复停办的溆浦女校。在办学期间，为了学校经费和治安等问题，向警予曾请求当时的湘西镇守副使周则范支持。周则范表面上侠义心肠，有求必应。在给予了一定关照之后，竟然要娶向警予这样的新女性做二房夫人，以装饰自己的门面。向警予的父亲想利用周家的权势，也倾向于这门婚事。向警予没有在封建势力面前屈服，她只身闯入周宅，当面以“以身许国，终身不婚”拒绝了周的求婚。

1919年秋，向警予含泪离开办得红红火火的溆浦女校来到省城长沙，住在同学蔡畅的家里，在这里，她得以结识了蔡畅的哥哥蔡和森。在参加了新民学会后，与蔡和森有了较多的接触。

1919年底，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五十多人乘坐“盎特莱蓬”号法国邮



蔡和森与向警予合照

轮从上海启航前往法国。在35天的航程中，蔡向两人经常一起观看日出，讨论学习和政治问题。在谈到个人婚姻问题时，他们都强烈地反对旧式婚姻，主张大胆追求新式爱情和理想的完美结合。当邮轮停靠在终点站法国马赛港时，他们俩都惊喜地发现自己完全被对方吸引住了。于是，“向蔡同盟”的爱情之舟扬帆启航了。

尽管两人都曾有过不婚的誓言，但是彼此之间的爱慕还是让他们都食言了。到达法国蒙达尼城后，异国他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更加需要中国留学生的相互关照。在这些关照中，蔡向之间的感情和理想的同盟得到了升华。1920年5月，他们在蒙达尼结婚，几十名中国留学生为这一对志同道合的新人送上了温馨的祝福。蔡和森和向警予的婚礼气氛热烈而简朴，没有丰盛酒宴，没有繁琐的礼仪，新娘仍然是一身布衣，只有她那红晕的脸庞表明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其实蔡母见向警予平时衣着朴素，为了她在婚礼上穿得光鲜，特意赶制了一件花绸旗袍送给她。向警予接过旗袍用感激的目光看着蔡母说：“我从小不习惯穿这样的衣服，但是为了你，今天我就穿上，哪怕就一个小时。”婆婆明白她的孝心，但她见向警予穿上旗袍一副别扭的样子，反倒显得不自然，于是告诉向警予不要勉强。这样，婚礼上便没有见到向警予穿那件旗袍。但是，这件旗袍一直珍藏在她的身边，直到1928年在武汉被捕，临刑前，她换上了这件花绸旗袍，穿着它走向刑场。那时，她已经不再是蔡和森的妻子，也许她想用这种方式向蔡和森表示自己对往日爱情的眷念。

蔡向分别朗诵了两人在恋爱过程中互赠的诗歌，婚礼达到了高潮。不久，他们将这些诗作结集出版，题目为《向蔡同盟》，分别送给亲朋好友。萧子升在看完诗集后幽默地对他们说：“你们两位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深深地祝福你们，并献给你们四个字——‘向下同盟’。这是你们书的名称，我只不过改换了一个

字而已。”远在东半球的毛泽东收到诗集后，“为之一喜”，表示“我们正好奉蔡做首领”。从此，留学生中流传着“向蔡同盟”的佳话。

1923 年 6 月 12 日，中共三大正式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 31 号（现恤孤院路 3 号）召开，与会代表 30 多人，代表全国 420 名党员，参加了这次会议。蔡和森作为法国支部的代表，与夫人向警予一起参加了本次会议。

三大会议上争论的焦点问题是：联合战线问题、党的地位与独立工作问题、产业工人问题。围绕这三个问题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在联合战线问题上，马林等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故应与资产阶级联合；蔡和森等人以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因阶级性使然，所以只应与小资产阶级联合，即是与国民党联合，因为他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

在党的地位与独立工作问题上，马林等人以为目前应加入国民党作国民革命，故当完全做国民党的工作，将来国民革命成功，这时党的独立是不成问题的了，因为那时共产党自然会出现了；而蔡和森等以为加入国民党后应保存党的独立性。

在是否保持产业工人组织问题上，马林等主张不保留产业工人组织，因为保留就是减少国民革命势力；而蔡和森以为产业工人组织是共产党的基础，应留，而不应加入国民党内去。

蔡和森可以说是在三大上发言最为积极的，他慷慨陈词，力陈产业工人不能加入国民党的种种理由，主张保留产业工人组织，保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他的观点在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与会的大多数代表包括向警予在内都不同意他的观点。在马林的一再坚持下，三大最后确认了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政策，经过反复讨论，蔡和森同意了三大的路线，即：实行国共合作，又要保持党的独立性，并同意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他还参与了党纲和党章的起草工作。

平心而论，蔡和森当时的观点有许多地方是不正确的。后来在中共六大上他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认为当时犯了“左倾幼稚病”，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看得过低，对其革命性估计不足。

三大上，蔡和森以高票 37 票（仅次于陈独秀的 40 票，与李大钊票数相同），当选为中央委员，与陈独秀等组成中央局，担任起了中央领导工作。这与他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与主编《向导》取得的成绩是分不开的。

三大闭幕后，由于党中央迁回上海，蔡和森随之返回上海，继续主编《向导》周报。蔡和森在广东的革命活动告一段落。

## 被捕于香港

1931 年 3 月，刚刚从苏联回到上海的蔡和森受到了王明的新的“左”倾机

会主义路线的排斥和打击，当时的党中央既没有恢复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也没有批准他到中央苏区瑞金从事武装斗争的请求。根据革命工作的需要，他被任命为广东省委书记，主持广东工作。当时，广东被白色恐怖笼罩着，党的组织已遭到破坏，省委书记邓发已被捕（后经营救获释放），广东省委暂时设在香港。蔡和森不计个人得失和安危，坚决服从党的分配。

正当蔡和森准备起程时，他的外甥女刘昂从香港回到上海。刘昂告诉他，现在香港的情况很不好，白色恐怖和内地一样严重。她在香港为了躲避特务的侦缉，必须经常搬家，有时一天搬一两次。后来实在呆不住了，组织才决定她们暂回上海。刘昂如实告诉他这些情况，目的是想劝舅舅不要去香港。

然而，蔡和森是从来不考虑个人安危的。他对外甥女说："干革命，哪里需要就要到哪里去，既然中央已经决定了，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坚决服从，不能犹豫。"1931 年阳春三月，蔡和森带着妻女，离开上海，前往香港。抵香港不久，他与党的地下组织接上了头。经过周密考察，租住在一家洋酒罐头公司的楼上，对外的公开身份是这家公司的职员。为了替党节省开支，他没有在附近另租房子办公，而是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到党的工作中。每天跑一段很长的路到秘书那里去听取汇报，批阅文件，研究工作。

当时，曾经担任中央保卫任务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并潜入香港的消息已经传到了蔡和森的耳中。这对蔡和森是个极大的威胁，顾顺章因职务的关系，对长期在党中央担任领导工作的蔡和森是熟识的，虽然蔡和森知道随时有可能被敌人认出，身陷囹圄，但他仍然坚持工作，不是到省委办公，就是深入工人群众之中，了解情况，积极开展党的组织工作和工人运动工作，希望能重振旗鼓，为党的工作殚精竭虑。

6 月 10 日，适逢海员工会要开一次重要会议，考虑到蔡和森目标过于明显，随时可能被叛徒认出，遭遇危险，同志们都劝他暂时不要到现场去开会，可是蔡和森对省港大罢工的光荣斗争历史记忆犹新，很想重整海员工会的工作，发挥它的先锋作用。如此重要的会议如果不亲自参加，蔡和森始终不能放心。于是，他毅然不顾个人安危，决定去海员工会参加会议。临走前，他望了一眼仍在牙牙学语的女儿，告诉夫人说："这个会我不去不放心，下午一点前我一定回来，如果没有回来，那就是被捕了……"

等蔡和森刚刚踏入海员工会的会场，早就潜伏在那里的叛徒顾顺章和四个特务便将他逮捕了。他被捕之后，没等到党组织的营救，便被香港当局引渡给了国民党广东当局。

## 喋血于羊城

蔡和森被交给国民党广东政府后，受尽了各种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横眉冷对，没有透漏半点关于党的任何消息。残暴产生的唯一效果，就是使蔡和森更加坚定为推翻国民党统治献身的决心。他经常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被拖回监狱，躺在地上动弹不得。难友们见了都伤心地痛哭。蔡和森却鼓励大家要坚持与敌人作斗争，并作诗勉励大家，说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当敌人黔驴技穷的时候，终于丧心病狂，鉴于害怕社会舆论的指责，他们不敢公开审讯，于是决定把蔡和森杀害。凶恶的敌人把蔡和森拉到监狱的墙边站着，在他面前摆上几颗大铁钉，对他进行最后的威胁。他巍然挺立，威武不屈。敌人咆哮着，将他的手脚拉开，用铁钉把他钉在墙上。他痛得昏死过去，仍然一声不吭。愚蠢的敌人毫无办法，丧心病狂地用刺刀一点一点将他的肉割下来，最后一刀捅进了他的胸膛。蔡和森就这样壮烈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和坚贞的革命气节。

蔡和森牺牲时，年仅36岁，他用自己宝贵的青春和生命，谱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最壮丽的篇章。他那“世乱吾自治，为学志转坚”的刻苦学习、探求真理的革命精神，他那“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艰”的胸怀天下，改造世界的坚强意志，他那“忠诚印寸心，浩然充两间”，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高贵品德，将永远留在人民的心里，为广大人民所崇敬。

（魏法谱）

# 瞿秋白

## 与广东的不解之缘

瞿秋白在36年短暂的人生中，曾经多次来到广东，并与广东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广州是瞿秋白回国后政治生涯的起点。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上，瞿秋白赢得了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各方人士的信任、尊重与认可。瞿秋白多次南下广州，也催生了他与王剑虹的那段不寻常的师生恋。

### 参加“三大”筹备工作

1923年1月13日，瞿秋白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暂住在外交部做事的堂兄瞿纯白家中。因为瞿秋白精通俄文，维经斯基致信在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要求瞿秋白到刚刚成立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遭到马林的拒绝，马林很欣赏瞿秋白的才华，他更需要瞿秋白协助他在中国开展即将开始的国共合作，在“争夺”瞿秋白过程中，最后维经斯基做出让步。

1923年5月下旬，瞿秋白赴广州参加中共“三大”的筹备工作，在中共“三大”正式开幕前，中央先举行两天的预


瞿秋白

备会议，分工起草会议的各项决议案。瞿秋白最为忙碌，他除了负责起草党纲草案外，还要参加党章的修改工作，此外，他还要和张太雷一块将共产国际的有关决议翻译成中文，印发给大会代表讨论，他每天呆在房间里，常常苦思冥想到深夜。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恤孤院后街31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张国焘等30多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参加了会议，瞿秋白则是以苏俄归国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共“三大”的。会议没有举行开幕式，12日上午由陈独秀代表中央作报告，陈独秀着重谈了中共“二大”以来的革命形势和党的发展情况，报告中陈独秀还特别提到了瞿秋白主编的《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对瞿秋白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大加赞赏。下午，马林报告了国际形势与国际工人运动等问题。随后，从15日至19日，瞿秋白积极参加中共“三大”会议的讨论，并进行了会议发言，就国共合作问题瞿秋白做了一个共16条的总结发言，得到了马林、陈独秀等人的赞成。

## 与张国焘的争论

中共“三大”讨论的议题主要是改组国民党和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张国焘等人受到先前第一位来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影响，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由它来领导革命”，极力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尤其反对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认为这样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把工人运动送给国民党。这种主张遭到马林、陈独秀等人反对，特别是瞿秋白的反对。张国焘比瞿秋白大2岁，曾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很受李大钊的器重，中共“一大”召开时，张国焘代表北京共产党组织赴上海出席“一大”，而且还是大会主席，中共“一大”选举产生的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当时称为中央局）由三人组成，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在中共“二大”上，张国焘又与陈独秀、蔡和森组成了大会宣言起草小组，会上他又与陈独秀、邓中夏、蔡和森、高君宇一块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所以，当时张国焘在党内有很高的威望。

辩论中，当时的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了解得并不是很透彻，所以很难说服张国焘，马林既不了解中国国情，也不会说中国话，所以争论主要在瞿秋白与张国焘之间进行。争论中，瞿秋白总是显得很平静，他声音不是很大，但能以理服人，辩论中，还时不时用手扶一扶鼻梁上的眼睛，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张国焘

却时不时就情绪激动。二人之间的分歧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的性质。张国焘夸大中国资本主义的力量，忽视和低估封建主义的势力，只强调反对帝国主义，从而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混淆了敌友。瞿秋白先分析中国的国情，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还不是很成熟，封建的势力依然很强大，所以应该把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作为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强调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既要反对帝国主义，更要反对封建主义。二是关于联合的对象问题。张国焘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所以无产阶级只能与小资产阶级联合。瞿秋白则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以要与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瞿秋白娓娓道来，说服了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并最终确立了国共合作的策略。张国焘因为反对国共党内合作政策，在中共“三大”选举时，在40票中仅得6票而无缘中央执行委员，暂时失掉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地位。

## 与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的分歧

在关于国共合作的策略问题上，瞿秋白还与当时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产生了分歧。陈独秀比瞿秋白大整整20岁，1917年，瞿秋白在北京俄文专修馆读书时，曾到北京大学旁听过陈独秀的课，同时还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热心读者。1922年底，陈独秀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瞿秋白担任他的俄语翻译，其间，瞿秋白应陈独秀的邀请回国，陈独秀让他主编《新青年》季刊，对他十分器重。

在中共“三大”上，陈独秀从法兰西革命的角度，提出了“二次革命论”的革命主张。而瞿秋白则从列宁的故乡学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并试图用它来制定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在革命观上，陈独秀片面夸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力量，轻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从这种观点出发，陈独秀对于瞿秋白起草的中共“三大”党纲草案作了修改，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文中曾回忆说：“第三次大会的党纲，是我起草的，但是大会之后，独秀同志又修改了再付印的……我现在这种声明并非要标明独秀同志的错误，而是要客观的研究过去错误的来源。……当时确有一派同志，无意之中承认资产阶级应当领导革命，认为资产阶级不过暂时苟且偷安罢了。”

## 折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会议上，瞿秋白与陈独秀、张国焘在理论上的争论，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注意，瞿秋白的政治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的一些观点让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所折服，会议期间，马林在许多问题上征询瞿秋白的意见。

“三大”闭幕的那天，马林致信越飞、达夫谦，汇报中共“三大”的情况时，写道：“中国的领导同志陈独秀、李大钊在年轻的瞿秋白同志帮助下，在代表大会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大家想在国民党内引导这个政党去执行国民革命的政策。瞿秋白曾在俄国学习过两年，他是这里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同一天，马林在致共产国际及联共（布）的负责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的信中写道：“在主导地位的看法是愿大力支持国民党，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就持有这个看法。李大钊教授和他们最好的助手年青的瞿秋白同志与他看法相同。瞿秋白曾俄国学习两年，他是唯一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回国后，他发表了一本关于我国的书，该书起初获陈独秀的极好评价。瞿的确是唯一能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实际情况的同志。”

马林所说的“一本关于我国的书”即瞿秋白写的《赤都心史》一书，陈独秀曾将该书推荐给胡适，请胡适帮助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 广州催生与王剑虹的师生恋

1923 年 8 月 20 日至 25 日，瞿秋白赴南京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经施存统等人介绍，瞿秋白认识了王剑虹和丁玲。在瞿秋白的劝说下，王剑虹、丁玲离开南京到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读书。

在上海大学的课堂上，瞿秋白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原则，采取有重点的启发引导的教学方法，成为上海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瞿秋白出众的授课才能“征服”了上海大学女学生王剑虹的芳心。王剑虹 1903 年出生在四川酉阳县龙潭镇一户土家族人家里，据丁玲回忆：王剑虹长着一双智慧、犀锐、坚定的眼睛，可谓是美丽端庄，但平时显得非常严肃，走路时昂首出入，目不旁视，显得有一股傲气，一看就是一个不庸俗、有思想的学生。一次，瞿秋白替茅盾代课。课堂上，王剑虹为瞿秋白画了一张素描，下课时，就问瞿秋白画得像不像，瞿秋白瞅了一会，心里充满了喜悦，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人给他画素描。但他却口是心非地回答王剑虹：“不像。”王剑虹接着又问：“画得不好?”瞿秋白幽默地答道：“不，是你把我画得太夸张了，我可没有那么英俊潇洒。”

正当王剑虹与瞿秋白坠入情网的时候，广州的孙中山决心执行“联俄”政策，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越飞会谈后，迫切希望苏联派一位高级政治顾问给他，最终鲍罗廷被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选中。1923 年 8 月，鲍罗廷与比他小 5 岁的加拉罕一起来到中国，由加拉罕任苏联驻北京政府的大使，9 月，鲍罗廷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瞿秋白。10 月 6 日，瞿秋白以鲍罗廷的翻译和助手的身份，随鲍罗廷离开上海前往广州。

这次南下广州，瞿秋白仅仅在广州呆了几天的时间，广州的秋天依然是骄阳

似火，没有上海秋天应有的那份丝丝凉意。工作之余，瞿秋白思念起了远在上海的王剑虹，这种思念也随着广州的气温开始急剧升温。10 月上旬，瞿秋白离开广州回到上海，短暂的分手催生了二人之间的那份浓浓的爱意。

1923 年年底，瞿秋白以鲍罗廷翻译的身份来到广东，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一大”前的会议和文件的翻译工作，同年 12 月，在广州苦苦思恋王剑虹的瞿秋白，给王剑虹写了一封信还附了一首诗，诗曰：“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

1924 年 1 月初，回到上海的瞿秋白与王剑虹结婚，这一年瞿秋白 25 岁，王剑虹 21 岁，二人住在上海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彬兴里 307 号。新婚不久，瞿秋白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瞿秋白担当鲍罗廷的翻译，还加入了指导小组的工作，以指导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中共党员。工作十分繁忙，但瞿秋白依然抽出时间，几乎是每天都要寄给远在上海的新婚妻子王剑虹一封用五彩布纹纸写的信，信中有时还会夹有诗作。

1924 年 1 月 30 日下午，国民党“一大”闭幕。2 月 7 日，瞿秋白由广州回到上海。婚后的瞿秋白显得精力格外旺盛，有时候在外忙了一整天，回来仍然兴致很好，同王剑虹谈诗、写诗。有时为了赶写文章，瞿秋白通宵坐在桌子前，泡一杯茶，点几支烟，王剑虹在一边陪着他。可惜王剑虹这位土家族才女，只给瞿秋白带来半年多的甜蜜生活，就因染上肺病而逝去了，1924 年 7 月，王剑虹在上海医治无效病逝在瞿秋白怀中。瞿秋白悲痛万分，他把爱妻的棺木送往四川会馆，从墙上取下王剑虹的一张照片，并在照片后面写下了“你的魂儿我的心”，用一块白绸巾把照片包好，便匆匆赶往广州参加国民党的有关会议。

## 推荐郭沫若任职广东大学

1925 年底，瞿秋白在广州向党组织推荐比自己大 7 岁的郭沫若。在瞿秋白的推荐下，广东大学聘请郭沫若担任文科学长一职，对此，郭沫若在《创造十年续编》一文中有详尽的记载。那是 1925 年年底前后的一个下午，在上海，身患肺病的瞿秋白刚刚“吐了一阵血，出院才不久”，由蒋光慈陪同来访问郭沫若。瞿秋白惨白的面孔和浮肿的眼眶，让第一次谋面的郭沫若非常吃惊。二人这次见面，谈论的话题广泛，而且谈话的现场气氛融洽，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说是瞿秋白慧眼识才、爱才、荐才，把郭沫若推荐到了当时大革命的中心广州，为郭沫若以后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大显身手提供了机遇。1979 年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在乐山召开的郭沫若学术讨论会上，引用阳翰笙的回忆说：“郭老去广州，是秋白同志的推荐，由组织上安排的，虽然细节不知道，但这两点是没有问题的。”

# 最后两次来广东

1926年8月8日，瞿秋白离开上海赴广州参加国共两党联席会议，8月18日晚抵达广州，19日参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和中共中央代表团联席会议。20日早上，瞿秋白与张国焘一起去祭拜廖仲恺墓地，同日又出席了几个会议。随后的几天里，瞿秋白异常忙碌，到劳动学院演讲，到农民运动讲习所演讲，与广州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做深入调查研究。同年9月7日前后，瞿秋白离开广州回到上海，不久国民党迁都武汉。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上，陈独秀正式被免职，共产国际指定28岁的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

瞿秋白最后一次来过广东是1934年。1931年1月7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及“留苏派”新势力王明等人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却被定为“左”倾教条主义者，解除了瞿秋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从此瞿秋白被排斥在中央领导之外，1933年底，临时中央来电，要瞿秋白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1934年1月7日夜11时，当天是星期天，而且风雪交加，瞿秋白从上海乘船出吴淞口到香港，再乘船到广东的汕头，在汕头改乘火车到广东的潮安，再改乘秘密交通站的小船到广东的大埔，然后从大埔步行，进入福建，于2月5日，抵达瑞金，这也是瞿秋白生前最后一次来广东，而且是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在地下交通员的护送下秘密经过广东的。

（苗体君）

# 李立三

## 四到广东，彰显杰出的领导才能

李立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可谓大名鼎鼎，是立三路线的肇始者。他勇于承担错误的勇气也是尽人皆知。李立三在革命年代与广东也是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他先后四次来到广东，进行革命活动，在广东党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 一到广东：最初的美丽邂逅

李立三第一次到广东是在1921年11月中旬。当时他由于参加领导留法勤工俭学生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被法国政府驱逐并遣送回国。这次被遣送回国的还有蔡和森、陈毅、罗学瓒、张昆弟、贺果、陈公培、颜昌颐等104人。他们于10月14日离开法国马赛，海上航行30多天，12月中旬到达香港。按照法国政府的决定，这些学生是要送到上海的，但是船过苏伊士以后押送的法军已经不再严密监视他们。于是船到香港靠岸，李立三、蔡和森、陈公培等22人就提前离船上岸了。

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找陈独秀，找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



李立三

李立三在勤工俭学期间，深刻体验了资本主义“自由的新世界”的黑暗、丑恶和腐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欧洲，他由于接触和深入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迅速地转到了共产主义方面来。他经常翻看《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还时常读到从上海寄来的《共产党》杂志，最终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

当时广东的局面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形势：宣传方面，广东地方党组织的宣传阵地《群报》不断刊登文章，宣传社会主义，鼓励工农运动；工人运动方面，具有政治色彩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同盟性质的罢工增多，次数也明显增多。此外，农民运动也风起云涌……这些都对刚刚回国的李立三极大的震撼，坚定了做一番革命事业的信心。

但是，此时的陈独秀已经离开了广州，到了上海领导党中央的工作，所以他们只在广州粤区党委见到了陈公博，了解到党的“一大”及其以后的活动情况，得知陈独秀已经离穗回沪，党中央局设在上海等情况后，李立三、蔡和森、陈公培三人和另外六位同学一起，很快就同船去上海了。经陈公博介绍，他们很快找到了陈独秀，当即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 二到广东：杰出的工人领袖

这次李立三是从苏联归来直接到广东的。1925 年五卅运动过后不久，上海总工会就遭到封禁，李立三也受到通缉，无法继续在上海工作。因此，党中央派他同夫人李一纯和蔡和森、向警予等人一起，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执委会议和赤色职工国际的会议。1926 年 4 月中旬，从苏联乘船回到广州。一到广州，他就积极参与了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筹备工作。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是全国工人领袖和工运战士的空前大集会，出席会议的代表有 502 人，代表全国有组织的工人 124 万。李立三是以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身份领导上海代表团出席会议的。由于安源工运和五卅运动所形成的声望，又由于他刚从世界革命中心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会议归来，他受到会议的极大重视。他是大会领导核心成员之一，大会开幕时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同邓中夏、林伟民、苏兆征、项英、刘少奇等一起主持和领导了这次大会，并且多次向大会作长篇报告和参加会外活动。

5 月 3 日下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第三次会议（工农两大会联合开会），李立三以中华全国总工会派赴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会议代表的身份，向大会作《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的经过》的报告。4 日，他又向大会作了《世界工

会运动状况》的报告。李立三在这两个报告中，报告了在苏俄的见闻，讲述了十月革命胜利后，经过反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斗争而巩固起来的苏维埃俄罗斯国家，在各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传达了苏俄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对中国革命的热情支援。听众对这两个报告“甚为动容”，“各代表鼓掌之声一时盈耳，莫不欢呼。”极大鼓舞了与会代表的革命热情。

5月6日，李立三向大会报告上海工运情形。“李委员长报告甚久，历述上海工会成立经过，及军阀帝国主义压迫情形，报告达两小时之久，痛快淋漓，全场极为动容。”

5月10日，李立三主持第十四次会议，讨论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重要问题。

5月11日下午，大会召开第十五次会议，李立三在会上作了《罢工战术》的报告。这一报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工运的经验，特别总结了安源罢工、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的成功经验，对于罢工的意义、罢工战术的重要性、罢工的时机、罢工的准备、罢工战术注意之点、防止破坏和谈判策略、罢工后的工作等等，都作了全面系统的说明。“罢工战术在本届大会中是一个新的问题，引起了到会代表浓厚的兴趣和热烈的讨论”。会议根据李立三的报告，作出了《关于罢工战术的决议案》，这对北伐战争前夜正在高涨中的工人运动，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5月12日，大会召开第十七次会议，选举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和举行闭幕式。李立三主持大会并向大会作了关于选举问题的报告。会议选举产生了全国总工会第二届执行委员会，正式委员有林伟民、苏兆征、李立三、邓中夏、刘少奇、项英等15人，候补委员17人。随后，李立三致《闭幕词》，对中国职工运动作了一个历史性的总结。

大会闭幕后，全国总工会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选举苏兆征为委员长，李立三等9人为常务委员会委员。随后，常委会进行分工，李立三任组织部长。这期间中共中央首次决定成立全总党团，任命李立三为第一任全总党团书记。从此李立三成立全总的实际上的主要领导者。

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期间，蒋介石为了表示他对工农群众的支持，特在黄埔军校召开欢迎会，除了劳动大会和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代表全体出席之外，还有各界代表出席大会。蒋介石亲自主持大会并致《开会词》。李立三等各界代表8人先后发了言，黄埔军校学生代表蒋先云也发了言。不少人的发言都在不同程度上颂扬了蒋介石，说他是“我们的领袖”，他“指示和领导我们”……并向他表示“敬意”和“感谢”。唯有“工界代表”李立三在《致词》中没有一句这样的话。李立三这个与众不同的发言，引起了所有与会人士的注意，特别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这个25岁的工运领袖不买蒋介石的账，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蒋介石北伐途经湖南醴陵时，想起这是李立三的家乡，特在他的专车上约

见李立三的父亲李镜蓉，表示关怀和尊敬，还想以此笼络和影响对他不敬的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

## 三到广东：卓越的军事指挥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成立五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取代陈独秀的错误领导。李立三是中央政治局五人常委之一。7 月下旬，他代表党中央去九江和庐山部署紧急时期的军事工作和组织工作，向中央提出了组织南昌起义的建议并着手作了最初的起义准备工作。此时，前中央常委瞿秋白正在庐山。李立三、邓中夏即赴庐山和瞿秋白商议，瞿秋白听完李、邓的意见后，情绪激昂地说："我们早就该这样干了，我们已经压抑得太久了，也许这次暴动会给我们党带来新的希冀。"

李立三作为前敌委员会委员，参与领导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起义之后，他担任了革命委员会政治保卫处处长，负责起义军的政治军事情报、镇压反革命和群众运动方面的领导工作。起义军南征，他坚决贯彻阶级路线，一路上惩处了 30 多个土豪劣绅，征收他们的谷物作军粮。9 月，起义军进入广东。以李立三为处长的政治保卫处，在进入广东以后着重抓了发动工农群众，建立工农武装和革命政权的工作。在三河坝，他们用 150 支钢枪武装起一支农军。在汕头，建立起工农义勇队取代原来的警察，维持治安和捕捉反革命分子。他们还领导和支持海丰、陆丰、潮阳、揭阳等地的农民起义斗争，帮助创建和发展了农民武装，打土豪，镇压反革命，建立工农政权。

起义军在汤坑战败后，在紧急情况下，前敌委员会在流沙天后庙召集干部会议，作军事失败后的紧急部署。周恩来带病主持了这次会议。他向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转入土地革命的战略部署，指示大部分干部要经香港转赴上海，由中央分配新时期的革命工作；另一部分干部带领起义军残部退往海、陆丰地区，同农民军队相结合，建立苏维埃，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会后，因周恩来患病，李立三具体处理了大批干部的撤退工作。

李立三同张国焘、贺昌及另一部队干部一起，在农会干部的护送下，约于 10 月 5 日从甲子港雇用一条小船，在海上航行两天到达香港，找到党的地下交通机关。10 月 15 日，张太雷主持召开了中共南方局扩大会议。李立三参加了这次会议，主持写给党中央的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并在会上发言。11 月，李立三遵照中央决定，同林伯渠等同志一起回到上海。

## 四到广东：知错就改的省委领导


李立三同毛泽东在一起

李立三第四次来广东工作，是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到党的“六大”以前。这期间他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职务，是他在广东工作最长的一段时间，也是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后一次来广东。

1927年12月11日，爆发了广州起义。李立三听到这一消息之后十分振奋。他立即向中央表示愿意去广州参加革命战斗。中央当即决定派李立三赴广州加强领导。但是在他还没有动身的时候，就传来了广东省委书记牺牲和起义失败的消息。12月28日，中央任命李立三为广东省委书记，并立即赴香港重建省委，处理广州起义的善后事宜，恢复广东全省党的工作。中央要求李立三贯彻执行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各项决定，其中最重要的是“普遍暴动”、“洗刷机会主义遗毒”和“党的干部工人化”。这实质上就是继续搞冒险主义政策，开展反右倾斗争和以“干部工人化”为口号改造各级党组织。这是李立三去广东前，中央交下的基本工作方针。

12月下旬，李立三化装成富商，携家眷到达香港。他到达香港后，立即召集广州起义失败后来港的省委负责同志召开会议，组成临时常委，正式恢复了省委工作，对全省工作做了初步的部署。如何总结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是他遇到的首个棘手问题。

1928年1月1日，李立三主持召开省委会议，处理广州起义的善后工作。一些参加广州起义的同志，特别是工人同志，由于对广州起义指挥机关的不满，会议伊始就对具体指挥起义的同志进行了猛烈的批评指责。李立三不仅没有冷静地引导大家正确总结起义的经验教训，而且也陷于这种偏激的情绪之中，认为这是党内还存在机会主义和知识分子领导已经不行了的具体表现。会议就在这种气氛下作出了《中共广东省委对广州暴动的决议案》。

这个决议侧重点是强调说明起义失败的教训和“指导机关所犯的错误”，并且执行了“政治纪律”。受这个政治纪律决议处分的有黄平、周文雍、杨殷、苏兆征、叶挺、徐光英等十人，除了已经牺牲的张太雷之外，几乎所有领导机关的干部都受了处分，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处分更重。这个“政治纪律”的贯彻执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一些受处分的干部被立即派回受严重白色恐怖笼罩的广州等地的基层中去，有人因此而遭到敌人的逮捕，造成不应有的牺牲。

就在广东省委全体会议期间，1月3日，党中央作出了《广州暴动之意义与

教训》的决议。这个决议与广东省委的决议存在较大的分歧：（1）中央决议用了很长的篇幅说明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国际意义”，而广东省委决议在这方面则说得比较简单。（2）中央决议对广州起义的领导方针、策略、准备工作、具体指挥都作了肯定，有许多地方是夸大其词和美化的描述，而广东省委的决议基本上否定了起义领导机关的工作。（3）中央决议认为广州起义的失败原因主要是敌人力量过于强大，因而没有像对待南昌起义的前委那样追究领导责任的意见，而广东省委决议则认为失败原因主要是以知识分子为主的领导机关的机会主义和其他错误造成的，因而要追究起义领导人的责任。

李立三和广东省委收到中央1月3日决议后大光其火；而中央收到广东省委1月1日决议之后也表现了愤怒。

为了解决分歧，1月25日，中央写信给广东省委和李立三，指出广东省委在广州暴动问题同中央的意见分歧“的确是重大的问题”，要求省委服从中央的意见，并派邓中夏来港代理书记，李立三则到上海向中央面谈。邓中夏到香港以后，在2月中旬主持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李立三列席了会议。会议说明中央决议的正确和省委决议的偏差，决定按中央的根本精神进行宣传，但是同时还强调中央决议确有些与事实不符，还坚持“政治纪律不能取消”，“改造党仍是要积极进行”。会后李立三即动身去上海向中央汇报。二者的分歧在经过讨论和批评后，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广东省委取消了一月决议，党中央也根据事实对《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做了一些补充和订正。

2月，广东省委机关遭到破坏。代理省委书记邓中夏、罗登贤等四位在港常委全被港英当局捕去。因此，2月24日，李立三回到香港后，“一切均需从头做起”，李立三不得不又一次收拾残局，第二次进行恢复省委和党组织的艰苦工作。他一方面多方设法营救出邓中夏等被捕同志，一方面全面恢复省委工作。他决定在未被捕的省委常委的基础上，补充了陈郁、黄焯、黄钊等三人，加上他本人，组成了新的七人常委会，并且立即重新部署了全省工作。4月，根据党中央下达的关于贯彻执行共产国际决议案的第四十四号通告，李立三也从执行“左”倾政策的困境中解放出来，他下令停止盲目暴动的部署，大力抓党组织的整顿和建设，在《广东省委通讯》上发表几篇文章，加强了党内思想理论和政策的宣传，还同恽代英讨论了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广东工作逐渐脱离了“左”倾政策，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不久，中央发出了在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的通知。李立三以广东省代表团长的身份，从海上到大连，经哈尔滨会同周恩来等同志去苏联。从此，李立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再也没有来到广东。

（魏法谱）

# 陈延年

## 陈独秀长子，“开疆辟土的拖拉机”

陈延年是我党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陈独秀的长子。他1922年入党，1924年回国后即被派往广东工作，担任广东区委书记，被誉为广东党组织“开疆辟土的拖拉机”。1927年被敌人杀害，对此毛泽东曾深有感触地说：“在中国，本来各种人才都很缺乏，特别是共产党党内。因为共产党成立还没有几年，所以人才就更缺乏。像陈延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在许多地方，我看出了他的天才。”在早期中共党的领导人中，还没有看到毛泽东这样评价第二人。

### 广东党组织“开疆辟土的拖拉机”

1924年的广东，国共合作，一派革命高潮。又一位青年才俊来到了这块热土，这就是刚刚回国的有着“小列宁”之称的陈延年。

陈延年是陈独秀的长子，1919年即赴法国勤工俭学，


陈延年

1923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党内称呼陈延年为“小列宁”，就是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开始的。因为他学习勤奋，思想活跃，总是以列宁为榜样，每逢开会议论，他才思敏捷，出口成章，尤其是在辩论一些政治原则问题时，正像列宁所说以猛狮那样的气势和雄辩来征服对方，赢得大家的尊敬。在莫斯科，陈延年对列宁的辩证思想有深入的研究，奠定了他雄厚的理论基础。加上他从小闯天下，又经历了无政府主义的世界观的转变，锤炼了他的组织能力，这使他比一般人更具有独立的思想，善于处理复杂的问题和矛盾。到广东后，陈延年“小列宁”的称号被流传得更为广泛。

国共合作后，陈延年等奉命回国到上海党中央报到，随即派往广东工作。他最初以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身份开展工作，同年调两广任区委秘书、组织部长兼宣传部长，协助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两广区委委员长周恩来工作。1925年春，周恩来率部东征，广东区委委员长改为书记，由陈延年接替。当时广东区委工作范围包括广东、广西、闽南、云南和南洋一带，是当时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地方党委。陈延年主持广东区委期间，正处在大革命波澜壮阔、急流巨浪的风浪尖上，他全力、热忱、主动开展工作，充分发挥了党的组织家、宣传家的杰出才华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忘我无私、意志刚强、深入群众、胸怀全局的高尚品质与领导水平。

陈延年任广东区委书记初始，即着手整顿领导机构，增强领导核心，组织了区委主席团（即常委会）秘书处、组织部和宣传部等机构以处理区委各有关事务。另外，还设立了工人、农民、妇女、青年运动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其中军委和农委当时中共中央还未设置，这在我党组织史上是一个创举。包惠僧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自陈延年、周恩来两同志到达广东工作以来，工作重加部署，党的组织和纪律都谨严起来，学生、工人、妇女、军事及农民运动等各项工作都有平衡的发展。”在加强区委领导机构建设的同时，各地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加强了党的领导核心和党的战斗力。他领导的广东区委得到中央的肯定，“粤区的两年多的工作经验，负责同志亦甚得力……区委已健全，故指挥工作尚不费力。”陈延年重视党的组织建设，也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当时马列主义开始在我国传播，他根据革命斗争形势和广东党员思想状况，定期举办学习报告会，并亲自担任报告者。为配合思想政治工作，1926年2月至9月间，主持创办了区委对外机关刊物《人民周刊》、《少年先锋》、《我们的生活》。由于陈延年通过多种形式用马列主义理论对党团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从而大大提高了党团员的政治素质，使得他们在历次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中均发挥了先锋作用。广东区委所属

党员人数由1922年6月的32人发展到1927年3月的9000多名党员，是当时全国党员人数最多、组织机构最健全，具有高度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地方党组织之一。陈延年被誉为广东党组织“开疆辟土的拖拉机”。

陈延年积极配合国民党，为巩固和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促进巩固国共统一战线做出了重大贡献。1924年10月，以大买办陈廉伯、大地主陈恭受为首的反动商团，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妄图迫使孙中山先生下野，推翻广州革命政府。10月10日，广州太平路上，数千名各界群众举行游行示威活动，他们愤怒地高喊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帝国主义”、“推翻反动军阀”。走在队伍前列的有陈延年和周恩来。突然，枪声大作，游行示威队伍遭到反动商团军的突然袭击，几十人横死街头。第二天，陈延年便和国民党著名的左派领袖廖仲恺亲赴韶关，面见孙中山先生，力陈镇压反动商团的重要性，促使孙中山命令北伐军回师广州。第一次东征开始后，陈延年、周恩来、彭湃发动组织农民，支援东征。孙中山逝世后，广东革命政权再次处于军阀武力威胁下。陈延年力主采取紧急措施，彻底消灭杨希闵、刘震寰叛军，同时派我党部分负责人发动工人罢工、组织各农民自卫军配合作战，共同平息了杨、刘叛乱。随后又配合革命军取得了第二次东征和南讨邓本殷的胜利。

陈延年为广东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也建立了不朽功勋。他和周恩来、毛泽东、邓中夏、张太雷等放手发动群众，使广东的各种革命运动都搞得轰轰烈烈。为支援“五卅”运动，广东区委和全国总工会决定发动省港工人罢工。1925年6月19日，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爆发。23日，在陈延年、周恩来亲自指挥和参加下，省港罢工工人同广州工农兵学商10万多人举行反帝示威游行。英法帝国主义开枪屠杀游行群众，制造了“沙基惨案”。这更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更热烈援助省港罢工。罢工后，香港罢工工人纷纷撤回广州。区委组成以邓中夏为书记的中共省港罢工党团，抽调一批党团员加强对罢工的领导力量，迅速组成省港罢工工人代表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等罢工领导机构和纠察队等组织。在广东区委的领导下，省港大罢工斗争坚持了16个月，给予英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推动了广东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到1927年初，参加工会和农民协会的会员已有100多万人。他们在广东区委的领导下，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 毫不留情地批评父亲的错误

陈延年担任广东区委书记时，陈独秀任党的总书记。在公在私，他们的关系均甚密切。然而陈延年崇尚真理、坚持真理，对其父的错误主张从不徇私护短。早年，陈延年就说过：“我父亲也不过是一个新官僚旧学者而已，读书虽多，而不能为天地立心，为革命立命，和文盲有什么两样！”后来，随着大革命高潮的

到来，陈独秀果然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陈延年同他的距离进一步拉大。特别是广州发生“三二〇”事件时，陈独秀与陈延年之间就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处事态度。

1926 年 3 月 20 日，蒋介石下令逮捕李之龙，罪名是共产党阴谋暴动。陈延年、毛泽东、张太雷和苏联军事参谋团立即开会讨论对策，毛泽东认为这是逼蒋介石下台的好机会，苏联顾问季山嘉和斯切藩诺夫则主张利用蒋介石。两种意见争论不下，陈延年说：“既然我们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此事不妨请示中央。”几天后，陈延年和周恩来商量派胡公冕去上海，向陈独秀等中央领导汇报。但后来中央发来电报，要他们忍让，要继续团结蒋介石准备北伐。

1926 年 4 月，陈独秀派张国焘赶到广州，具体传达陈独秀的让步意见。陈延年建议召集区委会议讨论，他在区委会议上说：“我一开始便同意毛润之意见，对蒋介石来一个回击，无奈中央害怕影响团结，怕吓退国民党资产阶级，硬不同意……不错，蒋介石有军队，可是我们有群众，不怕他，任他怎样跳，怎么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至于父亲陈独秀对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排斥共产党人的阴谋，采取了姑息退让政策，引起陈延年的无比愤慨，陈延年说：“老头子糊涂极了，他不相信工农群众的力量，对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排斥共产党人的阴谋视而不见，不敢同国民党右派斗争，会把革命断送掉。我和老头子虽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员，坚决站在党的立场反对妥协退让政策。”这是陈延年在区委会议上首次激烈批评陈独秀。当黄埔军校的中共组织请示广东区委要不要按“整理党务案”的规定，将校内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名单交出时，陈延年斩钉截铁地说：“一个都不要向国民党表态，尤其是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人，更应保持常态，不要理睬国民党右派的无理要求。”他又指示各地党组织，要普遍发动农民运动，加强农民自卫军的建设。他说：“要发动工农运动，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要加强工农武装，如果国民党右派损害工农利益，就同他们斗争。”

## 活像一个黄包车夫

陈延年对他父亲的错误，批判起来，态度很坚决，但他并不是一个盛气凌人、狂悖傲慢的人。他同毛泽东、周恩来、苏兆征等同志一起工作，过从甚密。同鲁迅先生也有一段亲密的交往。无论上级下级，党内党外，都认为他是个和蔼可亲、老练成熟的领导者。邓颖超刚从天津赶到广东区委报到的时候，陈延年热情地接待了她，并嘱咐她：“恩来工作非常忙，既要做党内工作，又要做统一战线的工作，还要做黄埔军校的工作，有时几天几夜得不到休息，希望你来了之后，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以外，要很好地配合周恩来，照顾好他的生活和身体。”充分流露了对战友周恩来的关怀。

尤为可贵的是，他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受过高等教育，留过学，但身上却没有半点旧知识分子的架子。他要求区委主要负责人到工厂、农村，深入到广大劳动群众中去，大力开展工农革命运动。为了把人力车工人争取、团结、组织起来，他以身作则，常穿着工人服，到广州的万福路、大南路等工人聚集之地，与工人一起拉家常，交朋友，学拉黄包车，学讲广州话，谈人生和社会革命的道理，毫无留学生与高级领导人的架子，他将学会的几句惯用的广东话，偶尔插在谈话中间，工人听了十分亲切。陈延年身体结实，拉起车来强劲有力，活像个老练的黄包车夫。他代年老病弱的车夫出车赚回的钱全部交给车夫。因此他在人力车夫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人力车夫都把他当作自己人，称呼他为“老陈”。人力车工会很快组织起来，发展了党员，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很多作用。周文雍曾问陈延年：“香港的《工商日报》刊登文章说，共产党的干部当人力车夫。说的就是你啊!”陈延年一边吸烟，一边笑着说：“如果工作需要，不论任何同志，去当人力车夫都是光荣的。”

## 革命的“苦行僧”

陈延年严于律己，处处以身作则。他从海外留学回国初期，曾同周恩来住在一起，他的卧室极为俭朴，只有一套床板，一张席子，一条很粗的毛毯和一条被子。床头经常摆着一个黄色皮包，那也就是他的枕头。为了不浪费一分一秒，他给自己规定“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作私交”。有人说他实行“六不”，他听了为之一笑说：“为了革命，应当如此。”

陈延年担任党内重要领导职务后，他的生活仍是平常而朴素的。陈延年同广东区委其他同志一样，每月领取30元生活费。他领了生活费后，除了交伙食费和留下少量零用外，其余的全都交作党费。他甚至还把零用钱节省下来，捐给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广东妇女解放协会作经费。陈延年没有自己固定的住所。由于经常工作要到深夜，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是在区委机关打散铺住宿的。他的办公室书架顶上，有一个简单的铺盖，一旁靠着一张帆布行军床。深夜工作完毕，他把行军床一张开，铺盖一铺，就解决了问题。后来，为了安全起见，他才搬到广大路广大一巷的一间房子住，然而不久，机关内一位同志要结婚，没有房子。陈延年毫不犹豫地把这间房子让了出来，自己和另一位同志挤进了一间只有几平方米的小阁楼居住。陈延年因工作繁忙，常常早出晚归，饮食无定时，回来总是有什么吃什么，从来不挑拣。有时吃不上饭，就托人随便买点吃的，就算一顿饭了。作为一个留学生，能反映出陈延年出过国的也许是一套他从苏联带回来的旧粗绒服。就是这套粗绒服，伴随着陈延年度过一个个冬季。一天早晨，陈延年发现，一位刚从广东大学调到区委工作的青年党员穿上了一套时髦的西装。原来，这是

这位青年党员用刚发下的生活费买的。陈延年知道后，马上找他谈话，教育他“听说你把生活费买了西装，青年人希望穿好一点，这当然可以理解。但事事要以党的利益为重，不能讲享受。我们是党员，不是公子哥儿，要艰苦奋斗。”这位年轻同志听了区委书记的话，再看看陈延年身上朴素的衣服，十分惭愧。平常，陈延年埋头在工作上，很少和女同志接触，从不谈恋爱。有的同志关心他的婚事，他总是推说工作忙，无暇顾及。

## 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员！

廖仲恺被刺杀后，中共广东区委内部，一部分党员因这次事件，产生了畏惧情绪。在白色恐惧笼罩下，陈延年也想到了自己的生死问题，他在召开区委党员大会时，教育大家说：“一个共产党的牺牲，胜于千万张传单；如果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员。”两年之后，事实验证了陈延年确实是一个不怕死的共产党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时，陈延年正处在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上海。面对大批共产党员、革命群众遭到逮捕和杀害，党和工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的严峻局势，他毫不畏缩，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恢复和整顿党组织和工会等工作，团结和巩固革命力量，领导上海及江浙地区的民众进行反对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斗争。

6月16日，江浙区委在上海区委所在地举行江苏省委成立大会，陈延年被任命为江苏省委书记。会议期间，由于一名交通员叛变，会场遭到敌人包围。当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冲进屋子时，陈延年见已躲避不及，即拿起桌椅板凳，奋不顾身与军警搏斗，并示意一起开会的其他同志火速撤离。组织部长郭伯和见状也不顾危险，协助陈延年抗击敌人；其他同志迅速从屋顶撤离。陈延年、郭伯和等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捕。陈延年被捕后，自知危在旦夕，但仍沉着机智地与敌人作斗争。他素来衣着俭朴，且重视体力劳动锻炼，故体格健壮，皮肤粗黑。被捕当天，他身穿短衣，裤腿上还扎着草绳，很像干粗活的人。在初审时，他化名陈友生，自称是某家雇佣的伙夫。审问官目睹他的形象装束，再据他与军警搏击的情况，以为颇合其交待的身份，想草草发落早日结案。审问官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一身伙夫打扮的人，竟然是中共的省委书记。

中共党组织得悉陈延年等被捕，立即组织营救。经多方打听，知道陈延年等在敌人面前并没有暴露身份，便指示济难会中的党员，通过关系疏通敌办案人员，商定以800元将陈延年赎出。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使整个营救计划落空。陈延年的早年好友、上海亚东图书馆的经理汪孟邹得悉陈延年被捕的消息，心急如焚，找胡适帮忙。胡适又托他的老朋友、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想利用吴出面疏通各方关系。可是，此时的吴稚晖已成为与共产党势不两立的国民

党右派核心人物，早在陈延年抛弃无政府主义加入共产党后，他就曾咒骂："陈延年非杀不可。"他接到胡适的信后又惊又喜，连忙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发出贺信，诬蔑攻击陈延年"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催促杨虎立即杀除。一直跟踪搜捕陈延年的杨虎接到吴稚晖的信后，欢喜若狂，立即驱车前往龙华看守所提审陈延年。陈延年在狱中不知道囚牢以外的情况，更不知道一同被捕的韩步先已叛变投敌，所以审问时仍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几近黔驴技穷的杨虎使出了最后一招，他指令韩步先出来作证。这个可耻的叛徒当场指证了陈延年。陈延年的身份暴露后，敌人开始以许诺引诱，妄图从这位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那里得到宝贵的口供，但却一无所获，于是对陈延年施以重刑。陈延年虽然被打得体无完肤，几次昏死过去，仍一声不吭，只字不吐。敌人无计可施，只得下令将陈延年秘密处决。

7月4日深夜，反动派借着夜幕，把陈延年秘密押赴刑场。面对刽子手高高举起的屠刀，陈延年昂首挺胸，傲然站立。刽子手喝令他跪下，他大义凛然地说："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下跪。"任凭刽子手丧心病狂地嚎叫，陈延年仍岿然不动。刽子手们一拥而上，把陈延年按倒在地，随即挥刀砍去。在这一瞬间，陈延年一跃而起，傲然挺立，双目如怒火喷向刽子手，砍下去的屠刀扑了个空。刽子手们恼羞成怒，蜂拥而上，以乱刀将陈延年砍死，并惨无人道地将他"五马分尸"似的斩成数块。蒋介石还下令不准收尸。陈延年牺牲时年仅29岁。

陈延年壮烈牺牲不久，他的亲密战友赵世炎也因叛徒出卖而遭捕杀。中共中央为了纪念陈延年、赵世炎等烈士，于1927年10月24日在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第1期，发表了《悼赵世炎、陈延年及其他死于国民党刽子手的同志》一文，指出："赵世炎、陈延年二同志之死，是中国革命最大的损失之一。中国无产阶级从此失去了二个勇敢而有力的领袖，中国共产党从此失去了二个忠实而努力的战士"，号召全党同志继承烈士遗志，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为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血战到底！

广东人民尤其怀念陈延年，1928年11月中共广东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发出的"纪念死难诸先烈"的特别通告指出：陈延年等烈士"为了中国无产阶级与贫苦工农的解放流血，我们要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以完成他们未了的志愿"。

（陈永红）

# 彭 湃

## 中国农运大王的壮丽人生

在中共党内，以领导农民运动而著称的领导人不胜枚举，但是，具有开创地位的却不多。据史家评论，这样的人物，中共农民运动史上大概只有三位。一为领导湖南农民运动，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毛泽东；一为领导江西农民运动，建立赣东北苏区的方志敏；一为领导广东农民运动，创建海陆丰苏维埃的彭湃。相比毛泽东和方志敏，彭湃的一生虽短，然而，其精彩壮丽的程度却毫不逊色。

### “书生”智斗“大军阀”

1921 年夏，留日四年的彭湃回到故乡。一回海丰，彭湃便将满腔的热情投入到了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和改造中国社会的活动之中。在他的领导之下，海丰一带的工农群众运动很快得以蓬勃开展起来，迅速成为令广东乃至全国都瞩目的革命洪流。作为这股革命洪流的引领者，彭湃自然也就成为广东各派势力关注的重点。



彭 湃

当时，担任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是广东最大的实力派。同为海丰人，陈炯明对于彭湃这个在同乡后生中崭露头角的新人无疑抱有相当的期待。或许，在陈看来，像彭湃这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之所以热衷于搞运动，无非都是想出出风头，等成名了之后，再待价而沽，以求一个好前程。因此，陈一直都自信满满，希望有朝一日能把彭湃纳到自己门下，为自己服务。面对陈炯明的多方拉拢，彭湃的态度始终都很鲜明："如果你是真心革命，关心劳苦大众疾苦，我就可以和你合作，如果你只是以革命为幌子，打着革命的旗号扩充势力，那就坚决没有合作的可能。"

起初，陈炯明还没有背叛孙中山，他虽然没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志向，但却不得不暂时依附于这个旗帜之下。鉴于这种特殊的情势，作为工农领袖的彭湃，当然也就不便于和其公开对着干。为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彭湃和陈炯明之间保持的是一种既合作又斗争的微妙关系。在处理这种关系的过程中，彭湃发挥出了极高的谈判技术和应变能力，取得了不菲的成效，其中的两次当面智斗，更是堪称经典。

第一次智斗发生在1921年8月。陈炯明得知彭湃从日本学成归来，顿生结交之意。为了显示其求贤若渴的决心，这位贵为粤省军界巨头的大佬级人物不惜自降身价，托人写信给彭湃，邀请他到广州来面谈。接到陈炯明的信以后，彭湃寻思：自己虽然摸不着陈炯明的底牌，但是，至少在表面上，陈在当时还是具有一定开明声望的，因此，不宜轻易就排斥他。另外，陈手握重兵，对海丰一带的士绅影响很大，如果能借这次面谈，在陈的面前痛陈一番贪官士绅们的斑斑恶习以及他们对工农运动的污蔑攻击，或许还可以对这些人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考虑到这一层，彭湃决定接受邀请，到广州去会一会陈炯明。据悉，陈炯明对彭湃的第一印象很好。由于尚处祖母丧期，彭湃去见陈炯明时穿的还是一身丧服。这一微小的细节，陈炯明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顿时觉得：看来，这个彭湃还是懂得忠孝廉义的，不像传说中那样六亲不认，不要祖宗的，应该可以争取。作为同乡晚辈，彭湃初见陈炯明，特别恪守了一定的礼节。此举，亦令陈炯明很是受用。特别是与彭湃进行了初步的交谈之后，陈炯明更是觉得：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一定要想方设法笼络才行。然而，就在陈炯明心里想着如何才能将彭湃引到自己的陷阱中来时，原本四平八稳、斯斯文文的彭湃突然间话锋一转，义正词严地指出："外界所谓的'共产共妻'言论，纯属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曲解，我们所提倡的，无非是社会平等、自由恋爱等先进理念而已。"接着，彭湃又开始当着陈炯明和诸多社会名流的面，开始介绍起社会主义思想来了。眼看一场意在

拉帮结派的乡谊聚会，马上就要变成彭湃宣扬进步思想的演讲台了，陈炯明之前的兴致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心中想着的那些拉拢图谋自然也就不敢提出来了。此番交锋下来，陈炯明可算是领教到了彭湃的厉害。

第二次智斗发生在1923年8月。1923年元旦，海丰成立总农会。6月，陆丰也成立总农会。在彭湃的领导下，海陆丰农民运动得以迅猛发展起来，其成员达到了数十万之众。7、8月间，海陆丰一带频遭强台风袭击，在巨大的灾情面前，农民收成受到严重影响。为了应对灾情，尽量减少农民的损失，海丰总农会召开大会，提出“至多三成交租”的决议。对此，海丰当局非但没有响应，反而与豪绅一起，对农会进行武力摧毁，逮捕了二十多个农会活跃分子。由于听到了抓捕行动中的枪声，彭湃机警地离开了现场。逃出虎口之后，彭湃很快便把农会几个为首的人汇集到了一起，商量反击对策。通过商议，大家一致认为：对方武力强大，正面对抗肯定胜算不大，唯有智取才是上策，最好是能够利用一些标榜支持工农运动的地方实力派，以此来达到借力打力的目的。于是，刚刚脱险的彭湃，决定再入龙潭，再去会一会陈炯明——这位海陆丰士绅的总后台。8月23日，日夜兼程的彭湃经过六七天的长途跋涉，步行500多华里，来到陈炯明位于老隆的司令部。得知彭湃来了，事先已经知道消息的陈炯明，心中盘算着：闹出了这么大的事，他居然还敢来兴师问罪的，看样子，要先给他一个下马威才行。果然，两人一见面，陈炯明便虚张声势地说：“不得了了，你们闹出了大乱子呢!”见陈炯明先发制人，彭湃不慌不忙接招：“乱子不是我们弄的，是他们（指王作新、钟景棠等当地官员和豪绅）弄的。陈先生你不会不知道海丰现在的风灾水祸有多严重吧？农民的生活又有多苦吧?”陈炯明回答：“再大再苦，这租还是要按例来收的，祖宗定下来的规矩，焉能由你们说改就改的，难道你是皇帝不成?”听了陈炯明的反诘，彭湃立刻针锋相对：“我们不是皇帝，你也不是皇帝，地主官厅更不是皇帝，为什么满清皇帝的旧例，陈先生都可以把它推翻，而不是皇帝定的分租旧例，我们不可以推翻呢？我先问先生，业主和佃户是不是要很相爱的才对呢？是不是业主出田，佃户出种的本钱，合起来，好像商家合股去做生意的一样呢?”彭湃的一连串反问，顿时把陈炯明给问糊涂了，他来不及细想，只得回道：“这自然!”见陈炯明上了钩，彭湃开始收线：“既是做生意，亏本或遇灾难的时候，是不是要两相吃亏才公道呢？若两个股东，一方不管生意是否亏本，总是一味地想取回自己的本钱，且要逼另一方还他的利，这岂不是极不公平?”此时，已被彭湃牵着鼻子走的陈炯明，不得不回答：“这是对的!”紧接着，彭湃发起总攻击：“地主出钱买田，交给农民去耕，农民要用种子、肥料、农具、工食的费用，才会有谷生出来。可见，地主以田为本钱，农民以种子、肥料等为本钱。现在，遇到风灾水祸了，地主的股本没折，而农民的股本却没了。按道理，农民应该向地主算账，公摊风险才行啊，岂有地主倒过来压迫农民赔偿

他的利息之理。所以，这样的旧例是个恶例，我们要革去这个几千年来地主苛刻农民的恶例，和先生赶走满清皇帝是同一个道理！”到了此时，陈炯明已经完全无话可回了，只得讪讪地笑着说：“是，是，是！”事已至此，陈炯明就没有理由不表一个态了。最终，他起草了一个电报，指出：“凶年农民要求减租，事属正当”，对于被捕农民，“应即省释”。通过这次交锋，彭湃虽然没有从陈炯明那里获得实质性援助，但是，却狠狠地打击了海丰豪绅们的嚣张气焰，并迫使陈炯明发表支持农会的言论，令其在道义上陷入被动之中。

## 尽散私产办农会

彭湃从日本回到海丰之后，首先投入的是教育界。按照他最初的想法，改造中国社会须“从教育入手”，为此，他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在知识分子中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并领导知识分子揭露教育界的黑暗。然而，经过短暂的实践以后，他发现，中国是以农为本的国家，在亿万受尽压迫的农民之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能量。慢慢的，他的想法发生转变，决定把自己的活动重心从教育界转到农村中去。

从1922年的夏天开始，在海丰农村的田间地头，忙碌着的农民兄弟们便经常会看到一位身穿学生装，头戴白通帽的“斯文人”在这里出没。人们发现，这个突然出现的“斯文人”很是奇怪，他不像其他上层人士一样，一见到满身汗臭的农民便躲得远远的，反而，他还会主动迎上来，试图和这些下里巴人聊天。对于这种主动的“亲近”，农民们的潜意识里充满了抗拒。他们甚至在心里嘀咕：“这八成又是一个变着花样来收苛捐杂税的家伙。”因此，任凭这个“斯文人”如何想搭讪，这些农民都是不理不睬，只顾忙着自己的农活。眼见无法与农民进行交流，“斯文人”也很是着急。他回到家里，通过思考，终于明白：可能是自己的打扮惹的祸，看样子，要想和农民兄弟们接近，非得穿他们的衣服，说他们的话语不可。

于是，经过一番打扮，“斯文人”又来到农民当中。这次，“斯文人”的打扮完全变了，只见，他的干净学生装换成了粗布短衫，白通帽也换成了破斗笠。就这样，他光着脚板，踏着泥泞的田间小道，走到了农民跟前。他惊喜地发现，农民不仅不再排斥他了，而且还主动和他说起话来。有人问他：“你是哪里来的啊？”他回答：“我叫彭湃。”另一个农民问：“你是彭家那个到日本留学的四儿子吗？”他又回答：“是的，我是来和大家交朋友的。”听到彭湃的回答，原本打开话匣子的农民立马拘谨起来：“你是少爷，会和我们来交朋友？”见农友们有疑虑，彭湃很快真诚地拉着一位农友的手说：“我也是农民，我们大家一起去向剥削者讨公道，当然是朋友了。”

虽然，凭着满腔的热情，彭湃很快就打消了农友们的顾虑，但是，随着交往

的深入，他隐隐觉到：尽管农友们的心中对剥削制度和剥削者大都充满着怒火，可多年来安于现状的惰性却使得他们不敢把这股怒火释放出来。因此，要把农友们心中的怒火点燃，使其汇集成为一股熊熊燃烧的革命烈火，非得找一个具有轰动效应的突破口才行。就在彭湃盘算着如何才能点燃农友们的革命热情之时，一场意外的家庭纠纷适时而来。原来，彭家有几个兄弟合计，如果任由得彭湃那样“闹”，家产搞不好就要被农民分光了，还不如趁早分了家，还可以保住自己那份。拿着自己分到的田契，彭湃陷入了沉思：这些田契凝聚着农友们的血汗，我肯定是不能要的，可是，又该如何处理它们呢？想到最后，他突然间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这可真是个天赐良机。我不是要想方设法点燃农友们的革命热情吗？就让这把火从自己家里开始燃烧吧。”

1922 年的一个冬日，彭家门口上演盛大乡村社戏，四里八乡的乡亲们都跑过来看热闹。就在乡亲们翘首等待戏剧上演的时候，彭湃导演的一场大戏却抢先上演了。只见这位彭家的四少爷抱着一大捆田契走上了戏台。面对着黑压压的人群，他振臂高呼：“彭家的田不是彭家的，更不是我彭湃的，这些田，是农友们的血汗，现在，趁着这个机会，把它们都还给大家。”接着，他开始逐张宣读内容，读完一张，就烧一张。看着戏台上跳跃的火焰，台下农友们心中的烈火顿时也被点燃了，人群中开始爆发出掌声、欢呼声，甚至还有不少人开始跟着彭湃振臂高呼，喊起了口号。

接下来的几天，有关彭家四少爷公开烧田契的事迹马上便传遍了海陆丰一带的乡村城市。农友们开始认定：这个彭湃是真心实意为着农民利益的，看样子，加入农会，一定是不会错的了。于是乎，海陆丰的农民们开始争先恐后地加入农会，农民革命这把熊熊烈火很快就在这里燃烧起来。

## 勇闯虎穴救兄弟

1924 年春，蓬勃发展中的海陆丰农民运动遭到沉重打击，由于陈炯明的反复，当地政府和豪绅公然取缔了农会，农会的各项工作被迫转入地下秘密进行。针对这种情况，彭湃毅然决定：到革命形势更为明朗的广州去，把这股熊熊燃烧的革命怒火烧遍全广东，甚至烧遍全中国。

到了广州之后，彭湃先后担任了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等职务。在接下来的两三年中，他以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平台，不仅为广东乃至全国培养了众多出色的农运干部，而且直接领导、组织了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农民运动。1926 年前后，彭湃的名字，伴随着红火的革命浪潮传遍了岭南大地，俨然成为全广东农民心中景仰不已的“彭菩萨”。在领导农民与豪绅军阀斗争的过程中，彭湃除了直接发动农民起来抗争以外，还

特别注意把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以形成对旧势力的最强大压力。1926年12月，彭湃勇闯虎穴，营救工人领袖杨石魂的故事，可以说是谱写了一首工农之间兄弟情深的感人战歌。

杨石魂是潮汕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从1925年开始，他开始在潮汕领导工人运动。经过他的领导，潮汕地区原本死气沉沉的革命形势很快得以改变，数以万计的工人顿时被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眼见工人运动如脱缰之马一般，越发难以遏制，当地的豪绅决定从运动的领导者下手，好让工人群龙无首，自乱阵脚。1926年12月11日，身为汕头总工会执行委员长的杨石魂赶到揭阳，准备去调节一次工会纠纷，突然之间，数百个手持棍棒的彪形大汉涌进其居住地，将根本来不及反应的他强行架走了。工人领袖无缘无故遭绑架，这样的事情一传到党内，立刻引起了高度关注。经商议，中共潮梅特委决定派彭湃去揭阳组织营救工作。

一到揭阳，彭湃便马不停蹄地召集相关人员开会，商讨营救事宜。人员到齐后，彭湃大手一挥，高声说道："现在，有人把我们的工人领袖抓走了，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想打压我们的士气，好让我们知难而退，这样的把戏，是骗不了人的。"接着，他又说："我对揭阳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大家说说，是谁绑走了杨石魂同志？我们该如何进行反击？"彭湃的话一讲完，与会的人马上便七嘴八舌说开了。听了同志们议论，彭湃陷入了沉思：表面看，此举是歹徒所为，事实上，他们的后台极有可能是揭阳县长丘君傅等人。经过一番考虑，彭湃提出：单独去要人，力量太单薄，丘君傅肯定会虚与委蛇，要让他服服帖帖地交人，一定先要在气势上压倒他才行。为此，会议决定：先收集证据，待证据收集齐全之后，再利用农会的力量，发动一场浩大的示威活动，来逼丘君傅当场放人。

此次会后没几天，揭阳的文公祠广场上突然出现了大量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乡下人"。这些人高举旗帜，手持锄头、长矛，呼喊着口号，浩浩荡荡地聚集到了这里。经过简单休整之后，这支足有几万人的队伍，径直朝着县府衙门奔去。见到庞大的农民队伍汹涌而来，守门的士兵吓得赶紧关了大门，躲了起来。见大门关了，人群停了下来，开始高呼："请县长丘君傅出来讲话！"不久，大门终于在人声鼎沸中慢慢打开了，接着，一个官员模样的中年人战战兢兢地站了出来，熟识的街坊立刻一眼就认出——这便是平日里威风凛凛的丘县长了。看到这么多手持农具、跃跃欲试的"泥腿子"，见惯了大场面的县长大人也禁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就在丘君傅缓过气来准备说话的当口，人群高喊着："把杨石魂放出来！""不放杨石魂，我们誓不罢休！"

眼见县长手足无措，局面即将陷入僵持之时，人群之中走出一个人来。此人长脸白面，中等身材，长得斯斯文文，一副典型的书生模样。只见他快步走上前去，迎着丘君傅，不慌不忙地打起招呼："丘县长，久违了。"看到有人主动过来

搭话，丘君傅定睛一看，心中不由一惊："老天，怎么惹来了这尊菩萨?"然而，形势已由不得他细想，于是，他硬着头皮开始主动问罪："原来是彭湃先生。你来得正好，请你和这些农民说一说，这县衙是办公重地，岂能随便聚众闹事!"见丘君傅倒打一耙，彭湃一脸严肃地回答："群众过来请愿，怎么说是闹事呢?我们堂堂的工人领袖，竟然被一群无耻之徒当街绑架了。你说，遇到这样的事情，群众能不愤怒吗?"听了这话，丘君傅不免心虚，但他又不甘示弱，仍然装模作样地问道："还有这样的事情，他们是谁?"丘君傅的狡辩令彭湃很是恼火："你就是其中之一！没有你的指使，那帮歹徒怎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行此卑鄙恶毒之举呢?"接着，彭湃把收集到的证据一一摆了出来。在彭湃凌厉的攻势之下，丘君傅完全无法招架，马上就乱了方寸。他开始慌不择路："彭先生管的是农会，杨石魂的事与你何干呢?"见丘君傅讲出这样不着边际的话来，彭湃不由得好笑："杨石魂是职工会的领袖，工农兄弟本是一家，如今，工人领袖有难，作为兄弟，我们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事已至此，再和彭湃斗下去，肯定只会自取其辱，可能还会惹得群情激奋，甚至引来皮肉之苦。考虑到这一层，丘君傅决定不再硬撑了。他招来书记官，沮丧地说："你带他们走一趟，把人领走吧。"见到县长屈服，人群之中瞬间爆发出一阵胜利的欢呼。不久，饱受折磨的杨石魂得以平安走出囹圄。

## 转战东江留传奇

1927 年 3 月 30 日，彭湃当选为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31 日，他与苏兆征一起抵达汉口。至此，广东工农运动两大领袖北上聚首，推动着全国的工农运动日益走向高潮。然而，这种局面并未持续多久，国共两党便分道扬镳，彭湃亦与中共党内的其他领导人一起，走上了武装反抗新军阀，独立领导工农运动的道路。此后两年中，彭湃先是参与了南昌起义，与起义部队一起南下广东，传播革命星火，而后，又返回海丰，以中共东江特委书记的身份在东江一带领导武装斗争。

常人看来，彭湃作为一介书生，或许发动群众，传播革命理论，才是他的特长，论到开展武装斗争，领兵打仗，肯定就非他所强了。事实证明，彭湃在转战东江的过程中，展现出了一定的军事才能，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战斗故事。他亲自参与指挥的惠来攻城战，就可以称得上是红军早期战史上的一大亮点。

1928 年，粤军陈济棠部 3000 多人由余汉谋率领抵达揭阳，与同时抵达紫金的黄旭初部，驻扎普宁的陈铭枢部，形成对海陆丰苏区的合围之势。不久，陆丰、海丰县城相继被占。3 月上旬，彭湃在惠来附近的兵营主持农民代表大会，做出以攻取惠来县城，实行武装暴动的行动来援助海陆丰苏区的决议。随后，惠

来农军与海陆丰退下来的红二、四军余部合兵一处，由彭湃统一指挥，准备对惠来县城发起总攻击。



1927年，彭湃与阮啸仙（左三）、许冰（左一）、高恬波（左四）参加在武昌召开的湘鄂赣豫农民协会代表联席会议。

3月12日，战斗正式打响，攻城的红军部队、农民赤卫队，再加上前来声援的农民兄弟，将惠来城团团围住。身为战斗指挥者的彭湃，头戴斗笠，手持长枪，冲在攻城的最前线。见首长如此身先士卒，拿着各种长短武器的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们自然也是不惧生死，不顾一切往前冲。虽然，依仗着城高墙固，城内敌军拼命死守，但是，在抵抗了三天之后，他们终于顶不住了，开始秘密向城外撤退。看到城内出现异动，敏锐的彭湃立刻觉察到：机会来了。于是，他决定一鼓作气，发动总攻击。3月15日，红军终于趁势攻入惠来城。

得知惠来被红军占领，汕头的白军很是震惊，立即派出一个团的增援部队，与之前从城中撤出来的部队汇合，再次奔惠来而来。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刚刚入城的红军来不及庆功，就要开始考虑如何抵御的事情了。经过军前的紧急讨论，彭湃和攻城指挥部其他指挥员做出决定：敌人锋芒很盛，装备又精良，我军刚刚经历大仗，亟待休整，因此，不宜正面对抗，唯有避其锋芒，伺机再战。于是，红军主动退出惠来，将一座“空城”留给了白军。从城中撤出以后，红军并未远离，而是按照部署，重新将惠来城围了起来，就地展开第二次攻城战。

与前次不同，经过一番长途奔袭，再次入城的白军已经失去锐气，军心开始动摇。针对这种情况，彭湃心想：既然敌军军心出现动摇，何不抓住这一良机，开展猛烈的政治攻势，将其心理防线彻底冲垮呢？在他的组织下，城外的红军战士开始向城头上的白军士兵喊话，希望他们不要向自己的农民兄弟开火。同时，他还让懂文化的战士赶紧书写大量的传单，并同时赶制一批风筝，之后，再将传单系在风筝之上，趁着大风来临之时，全军将士一起把风筝放起来，等到风筝飞到惠来城的上空的关口，再用火烧断绳索。见到如雪片一般降落的传单，城内的白军士兵先是目瞪口呆，而后，又争相传阅。眼见守军陷入混乱，彭湃发出攻城号令，伴随着雄壮的号角声，红军很快便冲入城内，再次收复惠来城。

（谢　涛）

# 张太雷

## 壮烈牺牲的广州起义总指挥

1925年1月，中共举行“四大”，张太雷出席了会议，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会后，张太雷被派到广州，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同时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这时，由任弼时代理团中央总书记。

### 一

鲍罗廷的办公室设在广州东较场附近的一所二层楼的小洋房里。鲍罗廷和军事顾问团在楼上，张太雷住在楼下。每天前来找鲍罗廷商谈、请示的国共两党人士络绎不绝，其中蒋介石、汪精卫、张静江、谭延闿等国民党要人及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陈延年等共产党人亦经常光顾。张太雷将这些会见活动安排得有条不紊，并担任谈话的翻译工作，充分展示了惊人的工作效率和高超的协调能力，成为鲍罗廷的得力助手。鲍罗廷出席各种会议，或发表演讲，也均由张太雷陪同担任翻译。



张太雷雕像

张太雷给苏联顾问鲍罗廷当翻译时，出于工作需要，时常西装笔挺，但因还担负着对工农的宣传工作，故常常也换上与群众一样的装束，在满是鱼腥味的小船舱内和肮脏的陋室里召集会议。据老同志回忆，他虽然是党内参加外事活动最多的领导人，但个人财产就只有为工作需要买的两套西装，出差剩余的经费全部交给党，连接济他时时惦念的寡母，都要靠组织帮助一点钱。当时，党在经济上极其困难。张太雷看到身边的同志需要接济，便慷慨解囊——他把西装送进当铺，领到活动费再把西装赎回来。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张太雷还兼任着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宣传部长，主编中共广东区委的机关刊物《人民周刊》。他经常撰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的阴谋，指导工农运动的开展。张太雷还经常到中国共产党举办的各种讲习班、训练班讲授共产国际、俄共布尔什维克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并受聘为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员，讲授《十月革命问题》。

对于蒋介石排挤共产党员、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张太雷主张坚决予以反击。1926 年 3 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张太雷十分赞同毛泽东提出的以武力进行回击的主张。他提议把工农武装起来，组织十万工农群众，以革命武装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进攻。同时为了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张太雷根据广东区委的指示，起草了一封《公开信》。《公开信》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右派通过制造“中山舰事件”陷害打击中国共产党，破坏统一战线，分裂国民革命势力。信中严正声明：中国共产党决心“与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地主劣绅、贪官污吏奋斗”、“共产党决计不因为敌人的造谣而放弃他革命的工作”。然而，陈独秀却拒绝了毛泽东、张太雷等的正确主张，反而无端指责事件“是由于广州同志的左倾错误所引起的”，助长了蒋介石的反动气焰。

## 二

随着北伐军攻克华中重镇武汉，全国的政治、军事重心北移。12 月 7 日，张太雷陪同鲍罗廷专程上庐山，与蒋介石商谈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的问题。当初蒋介石为了使国民政府离开工农群众力量雄厚的广东省，极力主张迁都武汉。而今却出尔反尔，企图将国民政府迁至南昌，置于他的股掌之中。鲍罗廷、张太雷对

蒋介石的无理要求予以坚决的拒绝，坚持按十月国民党中央全会的决议迁都武汉，双方不欢而散，张太雷离开庐山，由九江乘船溯江而上，于12月10日到达武汉。

1927年4月，张太雷接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随即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张太雷与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李立三、任弼时等一起，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支持毛泽东关于迅速进行土地革命、大力组织工农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政权的正确建议，并与其他与会代表一起酝酿不再选陈独秀为总书记。这次会上，张太雷当选为中央委员。

6月5日，张太雷发表了《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题》一文，提出“帮助农民武装起来，以保卫自己”。张太雷和周恩来一起加紧隐蔽、应变等各种准备，安排党员撤离，把一些干部派往贺龙、叶挺领导的部队。根据他的提议，中央机关由汉口秘密迁到了武昌湖上园，湖北区委也同时迁至武昌胭脂山啸楼巷2号秘密办公。“黑云压城城欲摧”，张太雷常常提醒战友：“暴风雨来了。我们要随时准备应变。”

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革命，大肆逮捕与通缉共产党人，张太雷也被列入通缉名单。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屠杀政策下，到处弥漫着白色恐怖气氛。这时，中共中央与湖北区委已全部转入了地下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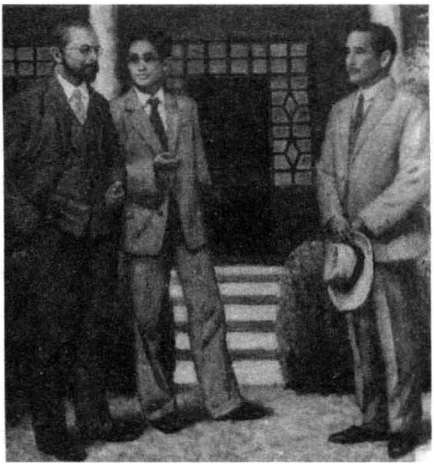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因出席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既不是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故称为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由于时局紧张，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和湖南、湖北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及另外两位俄国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会议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张太雷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决定派张太雷赴南方局，任广东省委书记。

11月26日，张太雷受命回广州组织武装起义，担任起义总指挥。

## 三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广州，张太雷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经常深入基层，传达党的决定。他在沙面白鹅潭一艘邮政船上秘密召开了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的负责

人会议，传达和部署起义的各项工作，又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旁召开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和黄埔军校特务营等单位的骨干分子200余人秘密会议，作动员起义的报告。会后，还亲自主持教导团各级干部的分组训练，落实教导团的各项起义准备工作，研究起义时的军事部署、起义政纲、宣言、文告以及成立苏维埃政府等问题。12月7日，张太雷主持召开秘密的工农兵代表会议，通过工农兵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委员名单。同日，还主持广东省委会议，通过苏维埃政纲、宣言和行动纲领。会上，张太雷被推选为人民海陆军委员，代理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苏维埃主席苏兆征未到任）。



张太雷担任孙中山与马林的翻译，图为会见时的场面（油画）。

12月10日深夜，张太雷在财政厅前党的地下联络站召开教导团、警卫团骨干会议，部署立即发动起义。12月11日凌晨2时许，张太雷偕工农红军总指挥叶挺、秘书长恽代英等人来教导团驻地，主持起义誓师会议。3时半，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

天亮前，起义军已占领了珠江北岸大部分市区。清晨6时许，张太雷身穿戎装，系着红领带，在刚攻克的国民党广东省立公安局主持广州苏维埃政府工农兵执行委员会第一次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了苏维埃政府名单和《广州苏维埃宣言》。同时，中共广东省机关刊物《红旗》出版号外，起义总指挥部印发大量传单。广东省委、广州苏维埃政府都印发了告民众书，宣布起义胜利，号召工农兵群众继续斗争，并选举代表参加苏维埃政府。但是由于部分敌军据点尚未攻下，苏维埃政府成立伊始，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张太雷彻夜不眠，忙个不停。当晚，他主持指挥部紧急会议，讨论时局，决定以教导团为基础，迅速扩建工农红军，并将战线推到郊外。

12月12日晨，驻珠江南岸的敌军李福林部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分两路渡河，向起义军反扑，张太雷和叶挺等指挥起义军顽强抵抗，打退敌军多次进攻，并对珠江北岸的敌军继续进行扫荡。中午，在战火纷飞中，广州各界代表在丰宁路西瓜园广场召开广东工农兵拥护苏维埃政府大会，张太雷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

会后返回指挥部。不久，得到敌军从观音山向总指挥部扑来的报告，张太雷急忙同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纽曼以及警卫、司机共4人乘一辆插着红旗的敞篷汽车赶赴大北门指挥战斗。

汽车行驶至惠爱西路，前面突然出现了一群穿便衣拿枪的人，一时也看不清他们脖子上是否有红领带。缺乏经验的警卫和司机还以为是赤卫队员，没有防备。这批人却一声呼啸，散到路边举起枪射击，原来他们是工贼组成的称为“体育队”的反动武装。后座上的张太雷和前座上的卫士见状马上拔枪，张太雷边奋起还击，边喊：“保护共产国际代表！”最终，张太雷不幸身中三弹，倒在车内牺牲，一起牺牲的还有他的卫士和司机。纽曼有作战经验，枪响时缩在后座里，枪声过后便跳车飞跑脱险。

黄昏时分，工农红军总指挥叶挺和省委军委负责人聂荣臻到财政厅天台观察战况，分析形势。为保存起义有生力量，总指挥部下达了撤出广州城的紧急命令。部队分三路转移，他们把武装起义的火种传播到了各地，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红军骨干。

很快，敌人以十数倍兵力围攻广州，来不及撤退或准备就地隐蔽的工人赤卫队及革命士兵，坚守街垒，与敌人展开肉搏战。12 月 13 日，敌人重占广州，并疯狂进行大屠杀，一时间，忠骸遍地，血流成河，5700 多位起义者壮烈牺牲。

张太雷是中共第一个牺牲于战斗火线的中央政治局成员。聂荣臻后来很惋惜地回忆说：“太雷同志虽然是我们党内有威望的领导者，是一位好同志，但他是书生出身，缺乏军事常识，缺乏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就以他在 12 日中午出席西瓜园工农兵代表大会之后遇难这件事来说，对警卫工作没有注意，结果却给敌人的冷枪打死了。”

张太雷牺牲后不久，苏联《真理报》刊发了纪念他的照片。瞿秋白以无比沉痛的心情写下《悼张太雷同志》：“他死时，觉着对于中国工农民众的努力和负责，他死时，还是希望自己的鲜血，将要是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之源泉！”

1933 年，中华苏维埃政府决定在江西石城、瑞金、福建宁化三县边界设立太雷县，为中央政府直属县。

在广州的黄花岗，国民党前身同盟会的七十二烈士的遗骨和墓碑长存；而共产党先驱张太雷的归骨之所，迄今却无人知晓。当时的牺牲者都未及安葬，国民党军后来大都将其草草投入红花岗等荒地的坑中。如今的红花岗烈士陵园，正是建在那些无名者的忠骸之上。

广州起义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作为广州起义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张太雷的英名，将和这不朽的历史事件一起，永载史册。1981 年是建党 60 周年，胡耀邦在讲话中，提到了 12 位党的创始人，张太雷是其中之一。

（吴志菲）

# 恽代英

## 广州苏维埃秘书长

恽代英，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教官，1895 年 8 月 12 日出生于湖北武昌，192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后随起义军南下粤东再转移到香港，担任中共南方局常委、广东省委常委。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为广州苏维埃政府秘书长。起义失败后，转移到香港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中共五大和六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先后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和组织部秘书长。1930 年调任上海沪东行动委员会书记，同年 5 月 6 日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1931 年 4 月 29 日在南京监狱英勇就义。

### 怒斥国民党右派反共谰言

1926 年 1 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通过了继续执行孙中山的遗嘱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决议案及弹劾西山会议派的决议案，作出开除邹鲁、谢持国民党党籍，给予



恽代英雕像

林森、戴季陶警告处分的决定。

恽代英出席了国民党二大，是出席大会中共党团的干事，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他坚决赞成对那些破坏国共合作的右派首要分子给予党纪处分。

在大会上，他正气凛然地怒斥那些分裂统一战线的反共谰言，强调指出，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不是说空话，而是要执行，表示共产党人誓为实现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而奋斗到底的决心。他说，“如果本党丢了三民主义，我便要反叛起来，这是没有什么客气的。我的入党是因为想做官吗？想要认识某要人吗？我完全是因为国民党能反对帝国主义、军阀，为被压迫农工利益而奋斗所以来的。如果国民党有一天和帝国主义妥协，和军阀勾结，和大多数的农工反对，这是冯自由的国民党，已经不是总理的国民党了，到那时，我一定起来反对，和现在反对上海的伪中央执行委员会一样”。“总而言之，各位同志不要管我是不是共产党，只要问我是不是实行三民主义，如果有违背三民主义去做反革命的事情，便马上可以拿去枪毙，如果没有，便不能开除，我的理由这里说得很明白了，如果你说我是共产派，我这个共产派便是这样主张的。”恽代英这一旗帜鲜明、革命到底的坚定立场，铿锵有力的语言，不仅是对西山会议派和戴季陶之流的当头一棒，也是对隐藏在革命阵营内的反革命严重警告。

大会结束后，恽代英留在广州工作，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区委军委委员。继续与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分裂革命统一战线的新老右派作坚决斗争。同时他还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如1926年2月17日，出席欢迎省港罢工工友代表大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2月21日，应周恩来的邀请，出席东江各属行政会议，并巡视潮汕各地半个月，发表了《旅行潮汕的感想》，刊登在《人民周刊》第七期上，热情赞扬周恩来领导下潮汕各地取得的斐然政绩。他还应邀到李富春任主任的政治讲习班去主讲《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五四运动》。又到毛泽东任所长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讲《中国历史概要》和时事政策，到邓中夏任院长的广州劳动学院讲授《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等。并把这些演讲稿整理后，汇集成册，交由国光书店出版。

恽代英是著名的青年运动领袖，在广州期间自然十分关心共青团的工作，经常到团广东区委指导工作，热情为李求实主编的团区委机关报《少年先锋》撰稿，仅从《少年先锋》一至十期的统计，就发表了他的文章共14篇。这些文章

主要内容是教育广大青年正确认清形势，坚持革命斗争，树立远大理想，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恋爱观，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等。由于他的文章短小精悍，结合青年实际，深刻生动，所以深受广大青年的欢迎。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在《中国青年》上以“DY”的笔名发表文章赞扬：“《少年先锋》的文字是短劲的，一句一字都不是浪费的，尤其是恽代英的文章，好像只绣花针，只一刺就刺破了那大气球。”

## 开创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1926 年 3 月底，中共广东区委派恽代英到黄埔军校任政治主任教官、中共党团书记，以加强左派的力量。政治主任教官的职权是“督同各教官负责实施政治教育全部大权”。

他到任后，大刀阔斧进行教学改革，加强政治科的教学工作：一是把教育课程由原来的 14 门增到 26 门；二是在教学方法上，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除了课堂授课外，还采取政治讲演、讨论会、政治问答、政治调查等方式进行；三是成立宣传队、血花社表演文艺节目；四是编印参考资料发给学员和革命军阅读。恽代英亲自编写了《政治学概论》、《党纪和军纪》、《军队中政治工作方法》等。

在黄埔军校的学生中，思想很活跃，政治观点不同，斗争也很复杂尖锐，校内有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核心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左派组织和以国民党右派为骨干的孙文主义学会。两派矛盾很深，孙文主义学会还经常向青年军人联合会寻衅打斗，耍流氓，“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以所谓平息“党务纠纷”为名，下令取消这两个对立的组织，另外成立黄埔同学会，他亲自出任会长，这表面上貌似公平，其实不然，因为黄埔同学会的主要骨干绝大部分都是原来孙文主义学会的右派，把黄埔同学会变成蒋介石控制的御用工具。因而矛盾与斗争并没有解决。两派斗争的焦点是如何对待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态度上。因此，恽代英作为政治主任教官，在演讲或写文章时很讲究斗争艺术，在他编写的《军队中政治工作方法》一文中，就借解释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真谛来阐明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指明两者并不矛盾，并引用孙中山所说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句话进行详细解释：“本党因为实行三民主义，所以最注重农工运动，而有些人一听到人家说农工运动，便说他是共产党员，他来宣传共产主义了，难道农工便只是与共产主义有关系的么？党的宣言、国民政府的宣言，都明明说注重农工运动，保护农工利益，帮助农工组织，大家偏偏不懂。国民政府的宣言甚至还说过，土地是用来养人的，不应该占为私有，地主不耕田而收租，这是不当之利。这些话有几人敢为党宣传呢？我们天天讲三民主义，却是有一批三民主义的信徒，思想上根本是与三民主义相反的”。因此“我们必须使

一切士兵对三民主义有正确的认识，非此不能保证我们军队永远站在革命的战线上，为本党的主义奋斗到底。”这样就巧妙地把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宣传共产主义理论结合起来，不仅得到左派的支持，中间派也觉得有道理，右派虽内心反对，却抓不到什么把柄，只好哑口无言。

恽代英知识渊博，有很深的理论修养，是一位出色的宣传鼓动家，黄埔军校的学生最喜欢听他讲课和演讲。他主讲的课程有社会发展史、社会问题、帝国主义侵略史、国际政治等。他讲课的特点是很少坐在教室内，常常把学生带到操场上，中间摆放一张桌子，学生围坐在四周，他穿着长衫，戴着眼镜，站着讲。由于他善于理论联系实际，用对比方法，生动活泼，又诙谐幽默而且很有说服力，使学生听得津津有味，全神贯注，讲完每节课还容许学生提出疑难问题，然后，他一一作解答。

恽代英不仅讲课很受欢迎，演讲更为精彩。1926 年秋，在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举行毕业典礼上，恽代英向即将输送到前线革命军中去参加北伐的同学作临别赠言时，作了精彩演讲。他从世界潮流、国内形势，谈到乐观的革命前景，和可能遇到的困难，嘱咐大家到了前线，应该和民众打成一片，团结进步力量，讲究斗争的艺术，来逐步改造旧军队，使之成为真正的革命军队，才能实现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宏伟事业。由于他的讲演有针对性，亲切感人，两个多小时的讲话，就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全场二千多名师生专心倾听。

恽代英在黄埔军校工作虽然不到一年的时间，却成绩卓著，政治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开创了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新局面，他也成为最受学生爱戴的老师之一。为了把黄埔军校行之有效的一套政治工作制度推广到所有北伐军中去，他在 1926 年 10 月 28 日于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执委和各省代表联席会议上，极力提议并支持通过关于军队中必须设立党代表的决定，特别强调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 担任广州苏维埃政府秘书长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军于 1927 年 8 月 1 日，发动南昌起义，恽代英参与领导了这次起义，任由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并随起义军南下广东潮汕，然后撤退到香港。

10 月 15 日，恽代英在香港参加了中共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讨论在广东举行暴动的形势，制定“最近工作纲领”，决定将全省工农讨逆军改为工农革命军，废除青天白日旗，改用以斧头镰刀作标志的红旗，扩大土地革命，建立政权等十大计划。会议改组了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由张太雷、周恩来、恽代英、黄平、杨殷、彭湃等人组成新的南方局，张太雷为书记；广东省委由 36 人组成，张太雷兼任书记，恽代英为常委、宣传部长，负责

主编省委机关刊物《红旗》半周刊。1927 年 11 月 17 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讨论通过了《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会议改组了广东省委，张太雷、恽代英、张善铭、黄平、陈郁、黄谦、周文雍等七人组成中共广东省委员会，还决定加紧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11 月 26 日，张太雷由香港到广州，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作出了立即发动起义的决定，并成立了起义总指挥部——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张太雷任总指挥，周文雍、黄平为委员。28 日，张太雷给留守香港的恽代英和张善铭写信，通报关于省常委会议的有关情况，要他们将信报中共中央。

12 月 6 日，恽代英回到广州，参加了在六二三路调元坊一个地下联络站举行的省委紧急会议，张太雷主持会议，恽代英做记录，会议确定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人员名单，通过了由恽代英起草的《广州苏维埃政府告民众书》、《广州苏维埃政府宣言》等文件。会后，恽代英赶紧安排地下交通员到澳门我党的地下印刷厂印刷文稿和宣传材料。

1927 年 12 月 11 日凌晨 1 时多，恽代英陪同张太雷、叶挺等领导人往教导团举行誓师大会，教导团官兵大多数是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学生，恽代英曾经是他们的政治总教官，当他突然出现在面前时，大家精神为之振奋。在张太雷作了简短的动员后，恽代英接着发表讲话，最后，叶挺宣布了作战部署和任务。

恽代英简短有力充满激情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教导团官兵的士气。当 3 时 30 分起义的信号弹划破夜空之后，他们便英勇地投入了战斗。“夜半枪声连角起，广州工农兵起义”。教导团官兵分三路投入战斗后，梁秉枢等率领的警卫团，吴毅、王侃予等率领的黄埔军校特务营以及周文雍指挥的工人赤卫队，犹如万箭齐发，向各自的目标发起勇猛的进攻。花县、清远、广州市郊的农民武装也举行起义。经过数小时的战斗，起义军攻占了广州市公安局、国民党省党部和省政府等重要机关，控制了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地区。南海县和广州市郊的农民武装及广三线铁路工人赤卫队攻占了广州西南郊的石围圹火车站、大沥镇以及佛山外围地区。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部分革命者也参加了起义。

11 日上午 6 时许，在市公安局竖起了斧头镰刀的大红旗，广州苏维埃政府在这里宣告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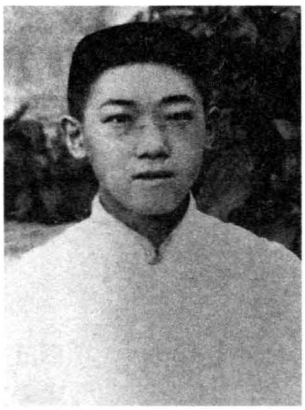
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恽代英任秘书长，留在指挥部处理各种紧急事宜，其他领导人都到前线指挥战斗。恽代英负责刚诞生的广州苏维埃政府的一切具体事务，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但他的心情却十分高兴。

起义的第二天，敌军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支持下，从各地向广州市区反扑，起义军虽进行英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难以坚持，加上张太雷又不幸牺牲，形势十分危急。这时恽代英已意识到，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应该及时组织撤退，转移到海陆丰与彭湃的农民革命军结合，再图发展。他把这种想法告知警卫团前来

联系工作的陈同生，要他回去转告警卫团的领导，作好转移的准备，等待指挥部的命令。到了12日黄昏时候，起义军总指挥叶挺和聂荣臻登上财政厅大楼天台观察战况时发觉，敌军已占据了观音山（即越秀山）制高点，东、西、南面的敌人已向市区反扑过来，形势万分紧急，便毅然作出起义军向市区北部转移，然后到东江与当地的农军汇合的决定，聂荣臻即回到苏维埃政府办公厅，将叶挺的决定转告给留守在那里的恽代英和陈郁。正好这时陈同生又前来打听消息，恽代英便将起义指挥部的决定告知，要他立即回去传达撤退的命令。恽代英和陈郁坚持在指挥部，通知起义军转移，直到13日上午，才最后撤退去香港。

## 寄语革命者应有韧性

恽代英到了香港后，即为中共广东省委赶写“广州暴动经过”报告给中共中央。继续主编省委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张太雷牺牲后，中央派李立三先以巡视员后为广东省委书记领导广东党组织。



恽代英是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

1928年1月，李立三在香港主持召开省委全体会议，总结检讨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他过分追究个人的责任，采取惩罚主义的办法对所有参加广州起义的领导人进行严厉的党纪处分。恽代英以“工作毫无成绩”，被开除省委委员、省委常委的职务。恽代英胸怀坦荡，不计较个人得失，顾全大局，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并从积极方面去考虑问题，提出“我们应该把广州暴动的经验总结好，向全党公布，让大家明了，从中吸取血的教训，学习更多领导暴动经验，指导今后工作”。不久，中央纠正了广东省委的错误决定，恢复了恽代英广东省委委员、常委的职务，继续留在广东工作。

关于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恽代英当时认为从客观上来说，敌强我弱这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但从主观上检查也有一些错误，比如没有更广泛发动群众，没及时镇压反革命等。起义失败后，他写了《广州起义与工会》的文章中就明确指出：“苏维埃政府宣布要做许多事，但自己的精力顾不到，又没有正式布告将权交给各工会去做……以致广州市工人、店员及一般贫民，虽有二三万人参加暴动，大部分群众仍旧没有起来，反动势力重新攻入广州，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恽代英以一个革命家的气概，对待革命过程中遇到的失败与挫折，他勉励身边一起战斗的杨广“努力干下去，革命是要有韧性的，要用百折不挠的精神去征服一切”。又对年仅20岁的陈同生说“挫折是不可避免的，要经得起挫折，只有

不怕失败的人，才有再战的勇气，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一定要从中学到东西”、“我们吃尽苦中苦，而我们的后代则可享福中福。为了我们最崇高的理想，我们会舍得付出代价的”。这一席富于哲理的话，陈同生一直铭记在心，终生不忘。

恽代英在广东工作到1928年8月，虽然领导机构作了多次调整，但他一直是省委常委。同年秋因工作需要，恽代英调往上海中共中央工作。他在广东虽然时间不长，却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至今广东人民还深深怀念这位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穿着长衫演讲的革命鼓动家——恽代英烈士。

（胡提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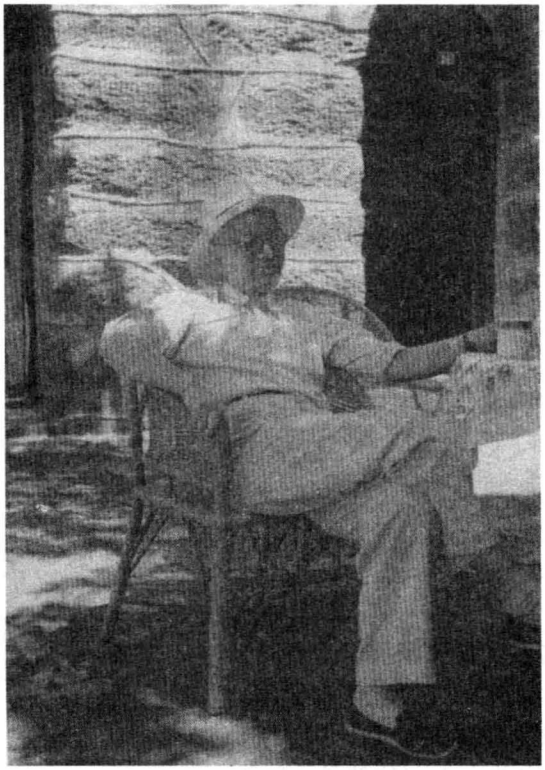
# 张闻天

## 肇庆“流放”记

张闻天，1900年出身于上海浦东一个农民家庭。“五四”时期是投身新文化运动的热情战士，蜚声文坛的青年文学家。先后留学日本、美国。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被派往苏联学习。1931年2月回国，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9月下旬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即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部长，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批判“左”倾军事路线，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上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从事外交工作，先后担任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批评“大跃进”和党内不民主现象，因而遭受错误批判，随后被撤销外交部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69年10月被遣送广东肇庆。1975年8月

离开肇庆迁居江苏无锡。1976 年 7 月在无锡逝世，终年 76 岁。

## 遣送肇庆



1959 年庐山会议期间的张闻天

1969 年 10 月 31 日傍晚，粤西古城肇庆。秋风习习，细雨霏霏，昏暗的街灯，稀疏的行人，显得一片萧条冷寂。

此时，一辆军用吉普车和一辆解放牌货车匆匆驶进城内，穿过城西一条陋巷，在市郊的牛岗山下戛然而止。车中走下数人，由一名持枪军人领路，缓缓地向山上行进。其中一位高瘦的年约七旬的男性老人，用手推了推压在鼻梁上的那副老式圆形眼镜，疲惫地抬头看看周围环境，口中喃喃自语："怎么送到这个地方来了？"

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就是张闻天。他是因何故来到此地的呢？

这要从"文化大革命"说起。"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当时还在北京的张闻天，遭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迫害，于 1968 年 5 月被监护审查，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69 年 10 月 20 日，张闻天与夫人刘英被带到审讯室。随后，一位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前来宣布：经批准解除监护，张闻天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战备紧张需紧急疏散，要"遣送"到广东中小城市，限三天内启程；张闻天的名字停止使用，另取化名；对外保密，除直系亲属外不准与别人联系。"遣送"就是"流放"，张闻天实际上被"发配"岭南。

1969 年 10 月 24 日，在专案组人员的监送下，张闻天和刘英带上年仅 10 岁的养女小倩，坐上了"北京—广州"的特快列车。26 日晚，他们抵达广州，被安排在广州军区第二招待所暂时歇息。几天后，由广州军区保卫干部监送到离广州 100 公里以外的肇庆。

汽车一路颠簸了三个小时才到达肇庆市郊。他们下车后，在肇庆军分区一名军人带领下，前往军分区干部宿舍大院。军分区干部宿舍大院坐落在一个叫牛岗

的小山包的半山坡上，他们还要走一条两里路长的小土道才能到达。小土道坑洼不平，周围一片荒凉。张闻天走着走着，顿觉得胸闷难受，只好停下来含了一片硝酸甘油，坐在土道上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气来。

张闻天一家的住处，被安置在肇庆军分区干部宿舍大院的一座平房里。从此，他们在那里度过了六年的“流放”生活。

## 身处逆境

“没有熟人，没有电话，部队设岗‘警卫’着我们的住所。从‘监护’到‘遣送’，我们只不过是从四壁密封的黑房换进了没有栅栏的‘鸟笼’。就这样，我们被抛弃在一边，开始了长达六年孤寂的流放生活。”张闻天夫人刘英的回忆，是张闻天当年流放肇庆的真实写照。

张闻天在肇庆期间，归肇庆军分区管理。军分区按照上面要求，作出“三不准”规定：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面人员接触；不准离开宿舍区，走出大院的门要报告，军分区机关放电影也需请示同意后才能看。在张闻天来之前，军分区领导跟大院里的干部、家属打过招呼，只说来了两位老人，一个姓张，一个姓刘，不要与他俩来往。当时，内部还有一项规定：军分区保卫科每月要把张闻天的思想情况和言行向上面作一次书面汇报。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这两句诗出自《诗经》中的《小雅·鹤鸣》。张闻天的名字是取其中之意。然而，他在肇庆的六年，除了军分区、地委和市委几个主要负责人外，谁也不清楚他的真实姓名，只晓得他叫“张普”。

“张普”，这是张闻天到肇庆后用的化名。

那是1969年11月，张闻天一家安顿下来后，养女小倩要上学读书了。学校发了一份入学简表要填写，其中有“家长姓名”一栏。该怎样填写呢，这难住了军分区的领导。若照实填写，就会违反“看管”规定。军分区领导经过一番苦思，突然想起张闻天的别名叫“洛甫”，于是灵机一动，要给他起个“张甫”的化名。张闻天淡淡地说：“既然我是普通劳动者了，那就叫‘张普’吧。”从此，“张普”这个化名一直伴随到他含冤去世。

张闻天离开北京，只带两大箱书和简单的行李，在肇庆安家时，真是家徒四壁。由于工资早在1968年受到“监护”时就已被扣发，存款也被冻结，他们身无分文，只好向军分区借了些现款，权充生活费用。三个月后，北京才规定发给他们每月一点“津贴费”。直至1972年5月，他们的原工资待遇才得以恢复。

张闻天年老体弱，患有严重冠心病，血压值高压达200mm/Hg以上，加上过去几年身心备受折磨，来到肇庆后病情不断加重。由于生活条件差，每到冬天，他就被冷得经常感冒发烧。为了保暖，他只能用破脸盆充当炭炉，木炭点燃时，

烟雾腾腾，呛得他连连咳嗽。

在肇庆最初的两年多时间里，两位老人要自己动手做饭和料理家务。刘英像家庭主妇一样，每天上街买菜，生火煮饭。当时，肇庆还没有蜂窝煤，做饭烧的是柴草。张闻天有时也学着生火做饭，结果弄得满屋是烟，做出来的饭不是焦糊就是夹生。直至1972年5月，在刘英的多次要求下，才允许炊事员黄关祥重新回到张闻天身边照顾生活。

从1972年起，张闻天多次向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要求回到北京。1972年4月，他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和中央，请求“早日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解决我的问题”，诉说到肇庆两年半来过着“非常孤寂和闭塞的生活”，“精神上感到苦闷”，言辞甚为恳切。

1974年10月18日，张闻天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能有机会到各地参观学习”，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要求了”。当时，毛泽东让身边人员签批：“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这个批示，使张闻天回北京的希望破灭了。

万般无奈之下，张闻天于1974年12月2日又给中央写信，要求以他的家乡上海为养老地点。他苦苦地盼了五个月，还不见答复，只好于1975年4月28日致函中央组织部，提出如上海去不成，苏州或无锡也可以。这个要求虽然最终获得批准，但到达无锡时，他留在世上的日子已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了。

## 请求工作

张闻天虽然受到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迫害，但始终坚定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渴望有生之年能够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

1972年，张闻天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并中央，请求“回到北京去，在党的领导下做些力所胜任的工作”。1973年6月9日，张闻天又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央，表示“如果没有别的工作可做，把我调回原来的工作单位经济研究所或其他研究所，当一名普通研究员我也愿意”。9月20日，他与刘英联名写信给毛泽东，重复以前的多次请求，希望早日回京，恢复组织生活，做点工作。毛泽东读了此信后发话：“可以让张闻天、刘英就地参加党的生活和工作”。但这个指示一直未能传达下来。直到1974年1月19日，周恩来看到一份有关张闻天情况的汇报材料时，批示中央办公厅主任江东兴：“我记得上次传达主席的话，让张（包括刘英）参加地方党的生活和工作，不知你通知中组部没有？”在周恩来这个批示的催促下，张闻天、刘英才得以恢复组织生活，允许在肇庆市委领导下做些调查研究工作，阅读发至县团级的中央文件。

1974年2月21日，广州军区保卫部副部长王奎贤、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白修成来到肇庆，通知张闻天和刘英：中央决定恢复他们两人的组织生活，今后他们的组织关系由地方来管，保卫则由军分区负责。并对他们说："中央同意你们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到工厂进行调查研究，可以写调查报告给中央。"



张闻天和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在一起

虽然得不到工作安排，但获得了调查研究的机会，张闻天感到十分高兴。他不顾年老体弱，忘记重病缠身，频频外出参观，认真开展社会调查。

1974 年 3 月 6 日下午，张闻天与刘英在警卫战士陪同下，步行来到肇庆通用机械厂参观。他兴致勃勃地看了一个又一个车间，到了下班时间还舍不得离开。由于过度劳累和机器噪音影响，他突然一阵心绞痛，豆粒大的汗珠从额头冒出来。他紧皱眉头，紧咬牙关。陪同参观的干部见状，立即扶他到一张长条凳子上坐下，递上一杯开水。他从衣袋里掏出一粒硝酸甘油片吞到肚里，休息了一会，病痛才有所减轻。工厂负责人提出要用汽车送他回去，他回答："不必了，我这是老毛病，吃了药就没事了。"于是，他又继续参观，直到把厂里所有车间参观完才步行回去。那天，他在该厂足足逗留了三个钟头。

1974 年 11 月，张闻天到广州拔牙和检查身体，在广州住了一个月。他利用这个机会，参观了广州新火车站、广州黄埔港区以及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火车站，他询问火车站全部设备情况，参观地下隧道和外宾候车室。在黄埔港区，他参观装卸工场、海员俱乐部，了解港区吞吐量和海员生活情况。在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他用了两个小时仔细地观看机械工业和农业这两个展览馆。他对陪同参观的工作人员说："通过参观交易会展览，可以更多地了解我国经济建设情况。"

每次参观，张闻天都十分认真，对工厂设备、产品质量、产供销、工人情绪和生活等情况，都一一作详细了解，并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来。1974 年 6 月 13 日，

张闻天来到肇庆火柴厂生产车间参观。该厂负责人指着一台正在运行的大机器介绍说，这是从武汉买回来不久的，取替了原来的几台残旧小机器，现在生产火柴的几道工序可以连续进行，既提高了工效，又节省了劳动力。张闻天听了十分高兴，叫刘英和警卫员扶着他，踏上70公分高的操作台仔细地观看这台大机器的生产情况。1974年10月15日，张闻天访问肇庆酒厂。这家酒厂生产的酒有20个品种，其中归圆杞菊酒和龙虎凤酒是出口品种，每年生产200吨。该厂负责人把这两种酒的样品摆在办公台上让张闻天观看，并拿来酒杯斟了一些样酒请他品尝。张闻天平时不喝酒，但这次破了例，“好，让我品尝一下味道。”说完，他先后拿起两杯不同品种的酒，放到嘴唇边轻轻地舔了一下。

据不完全统计，张闻天在肇庆一共参观了20多个工厂、街道和郊区农场。他通过参观调查，掌握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提供了一些依据。

## 保持本色

张闻天晚年虽然遭受劫难，却始终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发挥共产党员的表率作用。

勤俭节约，艰苦朴素，是张闻天一贯的生活作风。他衣着简朴，一件黑色云纱衬衣，穿了多年，变成褐色，还是舍不得丢掉。那件任驻苏大使时买的黑色大衣，穿了20多年，已经十分陈旧，但到了冬天，他还是照样穿在身上。看着这一身普通打扮，谁都想不到他是一个高级干部。

张闻天一家每餐吃的饭菜十分简单，青菜、豆腐、鸡蛋是他们的常年菜谱，每隔一个星期甚至半个月才买一次鱼吃。他有时外出参观在外边吃饭，每次都要带上一个空饭盒，把吃剩的饭菜带回来。一次，他与刘英到肇庆星湖参观，并在那里请陪同的几个工作人员一起吃午饭，饭后把吃剩的半条鱼和几只饺子装进饭盒带了回去。

张闻天省吃俭用，积蓄了大笔钱，并没有留给自己的亲属，而是无私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他和夫人刘英过去被扣的工资得到补发，在北京的存款也解冻了。当时他们商定：要把这笔存款全部用作党费。后来，张闻天在无锡去世，刘英按照他的遗愿，把他的4万元存款交给党组织，作为他的最后一次党费。过了几年，刘英也拿出自己的4万元存款捐赠中国儿童基金会，赞助儿童教育事业。

严于律己，廉洁奉公，这是张闻天又一突出的革命本色。1975年1月4日，肇庆市委派人为他安装了一个取暖电炉。他即提出自付安装费和电费，并嘱咐炊事员老黄到市委行政科结账。肇庆市委负责人认为替他安装一个电炉是应该的，

费用也不多，由公家报销算了。但张闻天与刘英说："这是我们自己用的电炉，费用理应由我们负担。"次日，他们写信给市委："请你们把这次安装的全部用款告诉我们，由我们支付。今后每月应交电费也请及时通知，以便按时交纳。我们这一请求，务请批准为幸。"他见市委不答应收款，在一次党小组生活会上又郑重其事地提出交款请求。市委负责人见他对待这件事如此的认真，十分感动，终于接受了他的请求。

张闻天严格要求亲属，坚持党的原则。他唯一的儿子张虹生在新疆工作了十几年，于1975年到肇庆探望父母，倾诉那里的艰苦生活，反映因父亲的问题受到株连及歧视的情况，要求父母向组织申请把他调离新疆，回到父母身边工作。张闻天语重心长地教育他："一个人要有奋发精神，要艰苦奋斗。在逆境中要有志气，不要消沉。不能以父亲的地位去要求组织解决工作调动问题。"虹生委屈地申辩说，他回到父母身边工作，照顾父母，这是政策允许的。张闻天明确地拒绝他的要求："我不能这样做。"经过父母耐心教育，虹生返回新疆安心工作。

张闻天晚年保持共产党人本色的那些平凡而感人的事迹，被肇庆人民传为佳话。

## 肇庆文稿

牛岗山上的行人小道两旁，长满了郁郁葱葱的相思树。当旭日东升和夕阳西沉，张闻天总要在这林阴小道上踱步和沉思。他在思考：我们的党和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这场"文革"灾难？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如何进行？

由于允许看书学习，张闻天把流放之地肇庆作为潜心研究马列主义的场所，重新阅读了从北京带来的马恩列斯著作。那时，他的视力已降到0.2度，并且患有老年白内障，但还是不停地阅读和做笔记，用旧台历和练习本制作资料卡片，写下了一沓沓卡片资料，并分类写上主题保存起来。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折戟沉沙。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破产。这时，张闻天看到了希望，萌发了撰写文稿的动机，要把潜心学习马列主义的心得和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写出来，从理论上总结"文革"教训，批判"左"倾错误，探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

张闻天克服重重困难，冒着随时可能遭受更大打击的危险，从1971年10月12日起，进行秘密而艰辛的写作。

张闻天写作文稿，既要同病魔作斗争，又要避开看管人员的检查。有时，他在写作中突然发病，连忙吞点药片，病情稍有缓解，就挥动颤抖的手，艰难地继续写作。他还把过去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一套方法使出来，写作时发觉看管人

员在附近，就故意拧开收音机麻痹他们的注意力；有时则叫夫人刘英在房子外面望风，一有情况就及时用暗号通知他。

就这样，张闻天流放肇庆期间，顽强地写下了《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学习笔记）》、《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四篇文稿，共八万多字。这些文稿，后来被理论界称为“肇庆文稿”。

1972年1月，张闻天在肇庆写的第一篇论文《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脱稿。这篇论文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但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必须经过的阶段，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离共产主义还很远，它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决不能越过这个阶段而企图直接进入共产主义，急于进入共产主义的尝试是错误的。张闻天的这种观点，中肯地批判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中超越阶段的种种“尝试”。

针对当时盛行的“政治决定论”，张闻天于1973年9月20日写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初稿。这是一篇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论著。针对林彪、“四人帮”天天高喊“突出”和“挂帅”的所谓政治，这篇论文指出：

> 总之，并不是任何政治都能“挂帅”，而只有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的政治，即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经济利益的政治，才能动员亿万人民群众行动起来。这又一次说明，把政治和经济对立起来，或使政治超越于经济甚至脱离经济的观点，是何等的错误。那些高谈政治，而怕谈经济的“政治家”，请仔细研究一下，什么才叫“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个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真正内容吧。

1973年12月8日，张闻天完成了《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学习笔记）》。在第六部分《关于正确解决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问题》中，提出了“群众的实践，是衡量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尺度”这个科学论断，这显然是针对“文革”中以“最高指示”为标尺的个人崇拜的。联想到1978年为打破禁锢、解放思想而进行的那场类似这个科学论断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大讨论，我们不能不佩服张闻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坚持真理的无畏精神。

这篇学习笔记的第六部分，还提出要正确建立党同国家的关系这个重要问题，论述了党和国家机关各自的作用。他指出：

> 党的领导的任务，只能集中于决定国家的政治路线和方针策略，动员群

众完成国家的决定和法令，并检查这些决定和法令在群众中执行的实际情况，总结群众在实践中的经验，改进国家机关的工作，从而加强对国家机关的领导作用。

这篇文稿里的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很有启发吗？

这篇学习笔记的第七部分《关于正确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问题》，提出了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方法。张闻天写道：

为了正确解决党内矛盾，首先必须懂得，解决这种矛盾，只能采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即思想批判或思想斗争的方法。党内矛盾不仅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且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革命同志之间的矛盾，因此决不能用镇压的办法去解决。

这实际上是否定和批判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经历了十年浩劫，我们再来读这段话，感到多么中肯和准确啊！

1975 年 5 月 19 日，张闻天写出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篇著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这篇遗著，全面、科学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私的、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公的、集体的利益。所以，我们党一贯提倡“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精神。

同时，他又提出：

社会主义社会中反对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或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的那种私，却不反对个人在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得到的个人利益的私。相反，社会主义社会的公的集体的利益不仅不违反这种私的个人利益，而且在公的集体的利益内就包含有私的个人利益，即是公中有私，而不是公中无私。这是公私利益基本一致的具体表现。

张闻天的观点，不但批判了当时社会上所刮起的那种反对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左”的空谈和做法，而且冲击了长期的传统教条观念。

以上所列举的，只是文稿里的部分要点，文稿论述了社会性质、经济建设、党的建设等许多问题，内容十分丰富，观点独特有见地。这些文稿，是难得的具有很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论著。只要读了这些文稿，就会看到张闻天的真知灼见和理论勇气。

“肇庆文稿”经过张闻天的亲属秘密抄写、收藏，后来又通过王震的保管，终于得以留存下来，这确实是值得庆幸的，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肇庆文稿”

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尽管一些地方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但文稿中的基本观点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其中许多深邃的见解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实际上已成为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1979 年 8 月 25 日和 27 日，《人民日报》先后公开发表张闻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这两篇文章，作为当时拨乱反正的重要思想武器。1985 年 8 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人民出版社出版《张闻天选集》。构成选集压卷之作的最后那五篇文章，就是从“肇庆文稿”中节选出来的。1987 年 10 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批准，又从“肇庆文稿”中节选了一篇题为《正确建立党同国家的关系》的文章，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闻天在肇庆》一书中首次公开发表。不久，《羊城晚报》对这篇文稿作了全文转载，还刊登了笔者所写的一篇评价文章。

张闻天的“肇庆文稿”公开发表后，在广大读者中产生强烈反响，理论界给予较高评价，认为这些文稿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十年浩劫期间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上批判“左”倾严重错误，论述社会主义特点和规律的代表作之一，是一座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丰碑。

## 告别肇庆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当历史的时针指到 1975 年 8 月，张闻天已经在岭南肇庆度过了难熬而苦闷的六个春秋。就在这年的初秋，广东省委组织部派人来肇庆通知张闻天：上面已批准他们要求，同意搬迁无锡。

此刻，张闻天的心思已飞往离别多年的江南故地。8 月 21 日，张闻天在接到迁居无锡通知的当天，就赶紧把以前所借公家的家具一一清点送还，然后收拾行装。22 日，他把从北京带来的一套 20 册线装书《国史列传》（又名《满汉大臣列传》），赠送给肇庆市留念。22 日晚上，他请同一个党小组的市委三位干部到家里吃饭。那天，张闻天夫妻双双下厨，对客人说：“今天不做广东菜，专门请你们尝尝我的家乡菜味道。”这顿饭，宾主都吃得非常舒心。

23 日早上 7 点多钟，张闻天偕同夫人刘英、养女小倩、孙女冬燕和炊事员老黄，坐上肇庆地委派出的一辆中型客车，由一名市委干部和军分区警卫员护送，坐车离开肇庆前往广州。中午到达广州后，为表示感谢，张闻天亲自点菜，请护送人员吃午饭，然后与他们一一道别。

24 日上午，张闻天一家由广东省委组织部派出的两名干部护送，登上了开往上海的特快列车。第二天晚上 6 点钟，火车抵达上海站。他们下车后，由江苏省委组织部和无锡市委派人派车接到无锡。从此，张闻天在无锡度过了他生命最后的十个月。

1976年7月1日晚，张闻天心脏病猝发，在无锡病逝，终年76岁。张闻天流放肇庆期间，曾对亲属们说："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就在张闻天逝世后不到100天，党和人民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张闻天等所作的错误结论。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追悼张闻天大会。追悼会由陈云主持，邓小平致悼词。悼词充分肯定了张闻天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庄严宣布："现在，党中央为张闻天同志一生的革命活动，作出了全面、公正的评价，决定为他平反和恢复名誉。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在张闻天同志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都应统统推倒。"

邓小平在悼词中还专门提到张闻天撰写"肇庆文稿"的情况："即使在林彪、'四人帮'迫害期间，他已完全失去自由，但仍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不顾衰弱的身体和严重的眼疾，写了批驳林彪、'四人帮'谬论的文章。"追悼会的当天，《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张闻天的"肇庆文稿"之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共享他在流放肇庆期间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

岁月悠悠，几度沧桑。川流不息的西江，因张闻天流放肇庆而见证了这位伟人坎坷曲折的一段人生经历；古老美丽的肇庆，因"肇庆文稿"的产生而竖立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辛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一座理论丰碑。

（陈立平）

# 杨殷

## 铁汉斗“田鸡”

山明水秀的中山翠亨村，不仅孕育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也孕育了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杨殷。杨殷于1922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工委书记、南方局委员、中共中央第六届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候补常委、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军事部长，是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在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中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在他的家乡中山市，传颂着铁汉杨殷斗“田鸡”（粤语“田鸡”与“滇桂”读音相近）的故事。

### 从同盟会员到工人领袖

1892年8月12日，杨殷出身于翠亨村的一户华侨家庭。1910年下半年，刚满18岁的杨殷参加了同盟会，一边在广州念书，一边做担任联络工作，奔走于澳门、香山、广州一带。他性格豪爽且武艺高强，臂力过人，在三合会等会党中威信甚

高，出色地完成了辛亥香山起义、广州起义等的联络任务。1917 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被举为大元帅。杨殷时任大元帅府参军处副官。


杨殷雕像

五四运动爆发后，杨殷开始研究马列主义，1922 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专门从事党的工作。他把自己的积蓄、老家的房屋田产和已故妻子遗下的首饰变卖后统统交给党，以解决党的活动经费。年底，党派杨殷赴苏联参观学习，回国后从事工人运动，并根据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需要，参加国民党组织活动，1923 年 10 月被选为国民党广州第四区分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以合法身份在广州、佛山、顺德等地以及粤汉铁路工人中组织工会，开展工人运动。

他担任铁路工人运动工作时，广泛结交工人朋友、关心工人生活和经济利益，使工人与之亲近，找他谈心的人很多，他的家成了不挂牌的工人俱乐部，工人亲切地称他“殷叔”、“殷哥”、“大哥”。他在工人中发展党员，组织“十人团”，引导组织工人团结起来，为争取政治权利、劳工保障以及向恶势力进行斗争。由于他是习武之人，肌腱发达、身壮力健，加上一身正气又平易近人，勇于维护工人权益，尤其是对付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部屡屡得胜，被不少青年工人视之为偶像，尊称他为“铁汉殷哥”。他在铁路工人中为党树立了工会极高的威望。工人们认识到有了工会力量大，很快就打破行会界限，成立了统一的产业工会——粤汉铁路总工会、广九铁路总工会和广三铁路总工会，并建立了工人纠察队。铁路工人在大革命时期是广东工人运动中一支强有力的队伍。

## “路路通的顾问”

中共广东区委根据“三大”的决议，积极推动和协助孙中山进行改组国民党工作。杨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被选为国民党广州第十区党部执委。1924 年 1 月 20 日，在孙中山的主持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开始。此后，杨殷以合法身份到铁路工人中去做宣传发动工作。

粤汉铁路原是商办，向有“香山会馆”之称，股东多为香山人。时任广三、广九铁路管理局长的陈兴汉也是四大都翠亨村人，1905 年加入同盟会，深得孙

中山器重。陈兴汉对刚正不阿的同乡晚辈杨殷很有好感。因此，当杨殷拿着孙中山的手谕去找他时，他就爽快地问："阿殷，好说，好说，你要当什么官？"杨殷也老实不客气地说："我希望能做个路路通的顾问。""没问题，我立即知照各部门。"陈兴汉拍胸口保证道。

由于北洋军阀吴佩孚依仗帝国主义的支持，于1923年2月7日在郑州等地血腥镇压参加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工人，京汉铁路工会委员长林祥谦和京汉铁路工会法律顾问施洋等共产党员和工人四十余被杀、千余工人被开除，铁路工会被关闭。"二七"惨案使各铁路的不少工人对参加革命活动心有余悸，工人运动一度陷入低潮。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以后，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工会运动问题决议案》强调"党的最重要的职任，便是继续不断地在产业工人里有规划地创设工会的组织"，提高他们的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领导他们把日常的斗争逐步"发展成为总的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

粤汉铁路工人中大多数是香山人，杨殷便以铁路局顾问加"乡里"的双重身份深入到铁路工人的家中访贫问苦，与工人们促膝谈心，耐心地对工人们进行启蒙、教育。他以大量中国工人受外国资本家的残酷压迫剥削的活生生事例，说明工人受苦的原因，说明工人们只有团结起来，形成强大的力量，才能跟资本家说理、斗争。为了易于接近工人，杨殷住进了靠近粤汉铁路车站的广州新安村。很快，杨殷争取了在粤汉铁路工作的香山四大都籍李连、李甫、陆枝等，又与中共组织早年安排在铁路开展工作的杨匏安、潘兆銮等一起物色了曾伟赞、杨文英等秘密组成"十人团"，为粤汉铁路团结工人、组织工会、开展工人运动迈开了可喜的第一步。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杨殷了解到粤汉铁路广州段当时的每天收入约为10000元，但其中绝大部分被军阀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据为己有，只拨回小部分资金给铁路局作维持修理、燃料等成本费用。杯水车薪，铁路局给工人的工资就更少了。工人有时只领到半个月的工资，有时甚至三四个月都领不到工资。工人生活发生严重困难，但又有冤无处诉。

滇军前身主要为云南新军暂编陆军第19镇。辛亥革命前夕，蔡锷接任第19镇第37协协统，许多同盟会员担任该协中下层军官，使这支部队成为发动昆明"重九"起义、推翻清廷的骨干力量。随后，蔡锷将军引领滇军率先反对袁世凯称帝，打响了护国战争的第一枪。1922年由杨希闵为滇军总指挥，同年9月孙中山委其为中央直辖滇军总司令，后因在广西大湟江白马屆会商讨伐陈炯明的战略和合作条件会上，被公举为西路讨贼前敌总指挥，1923年受孙中山密约，与时任西部讨贼军桂军总司令刘震寰率领滇桂联军挥师东下，驱逐陈炯明出广州，又击败沈鸿英军，孙中山因此得以返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由于杨希闵电请孙回

粤主政有功，先后被委为中央直辖滇军总司令、统一广东财政委员兼中央直辖滇军第一军军长、广东军务督办兼省长等职。亦因此，滇军在粤骄横跋扈，强抢豪夺，为所欲为。为顾全大局，孙中山也让他三分，更毋庸说粤汉铁路高层了。与之抗争，无疑是鸡蛋碰石头。

为了工人的劳工保障，铁汉杨殷豁出去了！他以“十人团”为核心，再去串连教育其他工人，又争取了公馀群旅俱乐部（当时的粤汉铁路工人群众组织之一）的骨干，团结机务、乘务工人，并以总工会的名义向铁路管理部门要求发还工资等形式作斗争。慑于工人的浩大声势，铁路当局只得发还欠压的工资给工人。工人们的生活得到初步的改善。

争取劳工保障斗争初战告捷，铁路工人竖起大拇指说：铁汉殷哥顶呱呱，我们信服你！

1924 年 4 月间的一天，驻防广州西关与粤汉铁路的滇军在调防时强拉民夫，铁路工人梁强也被滇军强行拉去当挑夫。工人们眼见自己的兄弟被迫害，个个义愤填膺。杨殷、杨章甫等因势利导，以工馀群旅俱乐部名义，出面组织发动全路罢工援救梁强，向广州铁路局负责人交涉，提出要求滇军立即放人，并保证工友人身安全。在工人的一致要求下，杨希闵不得不下令释放了梁强。工人们的斗争胜利了，梁强被送回广州。

斗争的结果使大家对“团结就是力量”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杨殷在铁路工人中的威信也越来越高。不久，杨殷被聘请担任中华铁路总工会广州办事处顾问。找他谈心，要求解决问题的工人络绎不绝。身兼国民党广州第十区部秘书的他，便将区党部也作为铁路工人聚集的场所之一了。

这天，一位青年工人气冲冲地跑到杨殷办公的地方来报告：“杨顾问，不好了，滇军在车站拉夫，打死了工人何炳祥！”杨殷一听，浓眉下的大眼睛睁得更圆了：“走！看看去！”他立即赶到事发现场。

看见工人兄弟的尸体横陈血泊中，杨殷的拳头捏紧了。他悲愤地走向机车，一跃而上，拉响汽笛。愤怒的工人及家属迅速从四面八方向机车涌来。怒目圆睁的杨殷站在机车顶上，挥动着他那粗壮的胳膊，扯开洪钟般的嗓门，一字一句是那么的铿锵有力：“兄弟们，姐妹们，军阀拉夫，打死了我们的兄弟，我们要他们偿命！”

“杀人偿命，血债血偿！”“保障工人的生命和生存！”人群中发出了一浪接一浪的怒吼。杨殷带领着觉醒了的工人群众，抬着何炳祥的遗体，洪水般涌向铁路局。

囿于工人愤怒的浪潮，粤汉铁路当局恐事态进一步扩大，一面向孙中山请示，一面急忙与杨殷及工人代表谈判。杨殷和工人代表提出了“杀人偿命”、“保障工人生命安全”等十二条条件。在孙中山的支持下，滇军被迫惩办了凶手，

铁路局破天荒地发给家属抚恤金和丧葬费。为扩大影响，根据杨殷等提议，由粤汉铁路总工会出面，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出殡仪式，广州各工会均派人前来公祭。

“杨顾问的确是一心一意为我们铁路工人的‘大佬’!”工人们更敬重杨殷了。大家都说：“今后，铁汉殷大哥说向东，我们决不会往西。”杨殷等终于把粤汉、广九、广三三条铁路的车务工会争取过来，使它成为一支坚强的革命力量。紧接着，杨殷等物色了一批工人的先进分子加入党、团组织，建立了三条干线的党团组织。李连、李甫、陆枝等成为首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粤汉铁路工人，并在日后的斗争中发挥了骨干作用。不久，全国铁路总工会广州办事处成立，在铁路工人中享有极高威望的杨殷被选为顾问。

## 打“田鸡”

杨希闵带领的滇系军阀和刘震寰带领的桂系军阀统称滇桂军，他们恃驱陈逐沈、收复广州有功，自入粤后，到处抢防地、勒索财物、把持税收，遍设烟馆、赌馆，其所作所为引起粤人深深的憎恶，暗地里骂他们是“田鸡”。

1925 年 3 月 12 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远居云南的原拒绝与孙中山和大元帅府合作的唐继尧，以为中山先生一去，南国无主，半壁江山非己莫属，遂于 3 月 18 日通电就任所谓“副元帅”职，声言将率 10 万兵假道广西入主粤政。唐之野心诱发起杨希闵、刘震寰之野心，在穗遥相呼应。杨即公开表示“拥唐入粤”，刘则亲自赴云南促唐出兵。5 月，杨希闵、刘震寰一边与唐继尧、陈廉伯以及段祺瑞、陈炯明派去的代表等在香港密谋颠覆广州政府之计策，一边乘广州兵力空虚，即调兵遣将，召其部队从韶关等地开赴广州及近郊各军事要地，占领了广州车站、电报局、全市制高点观音山（即越秀山）等。慑于滇桂军阀之势力强大，大本营代帅胡汉民欲与之妥协，派人赴港请杨、刘返穗共商改组帅府事宜。然杨希闵、刘震寰非但置之不理，还声言要“以武力贯彻主张”。一场军事叛乱于是酿成，广州再次陷入危难中。

广东革命政府被迫作出铲除内患的决定，乃于当日下令免除杨、刘所兼各职，并通电宣布其罪状。与此同时，急调东征将领许崇智、朱培德、蒋介石等回师广州讨伐杨、刘。

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约见廖仲恺先生，表示坚决支持革命政府肃清杨、刘之举。区委决定：由军事委员会书记周恩来联系黄埔军校和友军；由谭平山联系国民党左派；由杨殷负责布置广三、广九、粤汉铁路工人罢工，并切断敌军的电源和电话线路；由阮啸仙、彭湃等发动各地农会援助东征军回师广州。

杨殷接受任务后，与邓培、潘兆銮、杨章甫等在珠江对岸河南龙导尾设立

“罢工指挥部”，发动全广州工人大罢工，并协助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把政府机关迁往广州河南区。

6月5日晚上，杨殷在东堤雇了一只小艇，召集粤汉、广九、广三铁路各工人代表于珠江河面举行会议。他首先历数了刘、杨叛乱和在广州奸淫掳掠、为非作歹的罪恶行径，随即布置发动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的任务和拒绝为叛军搬运物资以破坏其调兵运武器，支援革命军的具体行动计划。会议结束后，三路工人代表即按杨殷的精心策划分头行事，挑选了部分工农骨干，组成宣传队和侦察队，在城内揭发桂军的罪恶行径，号召市民罢工罢市罢课。

为搜集叛军情报，杨殷亲自率领侦察队泅水登上海珠花园滇军驻地，摸清叛军的军事布防和搜集军事情报。为破坏叛军调兵运武器的计划，杨殷又布置铁路工人拆、卸火车头的机器部件。6月7日一早，在“不灭杨刘，工运不兴”的口号鼓动下，粤汉、广九、广三三条铁路的工人同时宣布罢工，所有火车头，能开走的一律开走，不能开走的全部拆毁。铁路运输道全部中断，滇桂军无法调遣，不能按计划集中广州。杨希闵急了，即到香港出10万元重金，雇聘工人开车，但无一人应聘。滇桂军无法用火车调动部队和运送辎重，军队只能零零星星徒步向广州前进。与此同时，铁路工人根据杨殷的布置，又在广九沿线快速干线装机，到石龙迎接东征军回师广州讨伐逆军，各军一到铁路沿线，铁路工人马上复工，抢运军火，让广州革命政府的东征部队能及时赶回广州。此举使杨、刘坐困一隅，在全国各地的叛军不能接应广州，滇、桂军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击之力，便迅速崩溃。

接着，杨殷领导的工团军与黄埔军校学生及农军，配合革命军向叛军发起总攻击。各方群众纷纷前来助战，郊区的农民主动向阵地的革命军送茶送水。由于滇桂军平时军纪涣散，盘踞广州市区的两年间，胡作非为，恣意掠取，居民早已恨之入骨。因此，战斗一打响，市区的居民手持铁棒、菜刀、扁担作武器，积极主动参加到“打田鸡”的行列中。罢工工人与工农武装积极协助革命军包围叛军，奋起平乱。他们高喊着：“打田鸡!”“打田鸡!”将杨、刘军陷于四面包围之中。

在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下，革命军势如破竹，迅速突破了滇、桂军设在龙眼洞、瘦狗岭、白云山等处的防线，攻入广州市区。滇军师长赵成梁被击毙，桂军师长陈天泰成了俘虏。杨希闵、刘震寰见大势已去，无心恋战，只好化装经沙面逃往香港。号称有四五万人的滇桂军，不到24小时即完全崩溃了。

讨伐杨、刘之役取得胜利，粉碎了滇唐趁孙中山病逝而入主粤政的野心，广州局势再次转危为安。

（郭昉凌）

# 苏兆征

## 以心换心情谊长

1925年6月，为反抗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的侵略和屠杀政策，20万省港工人奋起举行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在苏兆征、邓中夏等人的坚强领导下，罢工工人同仇敌忾，英勇不屈，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给予香港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使一向被誉为“英国女皇王冠上一颗灿烂明珠”的香港，变成了“死港”、“饿港”和“臭港”。在省港大罢工过程中，苏兆征关心工人群众，热爱同志，对广大罢工工人和战友们满怀深厚的感情和崇高的情谊，因而赢得了各方面人士的衷心敬仰和信赖。

### 暖人心的“用膳条例”和“万岁衣”

罢工爆发以后，香港各行业罢工工人陆续离开香港回到广州，经常聚集在广州地区的罢工工人就有七八万人。如何妥善地解决他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使他们情绪安定，斗志昂扬地参加反帝斗争，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繁复的工作。苏兆征



海员工人代表合影（前排右三为罢工领导人之一苏兆征）

十分重视这一问题，除委托干事局长李森全面负责外，对一些重大问题也经常亲自过问和主持解决。他时时嘱咐有关工作人员说："我们应该十分重视安排好工友们的生活问题。只有工友们生活上无后顾之忧，情绪饱满，也就能够斗志旺盛地与帝国主义作斗争。要是这些事情办不好，反过来就会给帝国主义者以可乘之机，使罢工斗争招致不必要的损失。"

苏兆征十分重视罢工工人日常的伙食问题，经常深入了解情况和过问此事，发现问题就及时与有关人员商量解决办法。在苏兆征、李森等关心下，干事局制订了各区饭堂"用膳条例"，对如何办好伙食问题做出明确规定，以保证饭堂秩序。经过不断努力改进，伙食越办越好；除罢工工人本身外，其家属的食宿问题也由罢工委员会负责妥善安排。这样，罢工工人对伙食方面十分满意，无后顾之忧，一心一意地坚持反英罢工斗争。

苏兆征等罢工领导人从罢工一开始，就预料到这场罢工将会是一次旷日持久的斗争，因此认为对各项工作都必须作长期打算。还在天气相当炎热的时候，苏兆征便及时与李森等商量，认为要及早为罢工工人准备好御寒用的衣服被盖等物，以保证罢工工人能吃饱穿暖，安心参加反帝斗争。在1925年9月22日召开的罢工委员会第六十八次会议上，苏兆征就如何筹划御寒被服问题提出报告，请委员们研究解决办法；在翌日召开的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他再就此问题提出报告。大会听了他的报告后，对罢委会的安排一致表示满意。

与此同时，苏兆征亲自与有关慈善机构等方面联系，筹措缝制御寒衣物款项。经过苏兆征等人的宣传发动，不少机构和企业热烈响应捐献。罢委会庶务部还同时购回大批布料、棉花等物，雇请广州车衣行业以及发动罢工工人家属参加缝制工作。第一批棉衣、棉被缝制好后，苏兆征指示有关工作人员及时做好发放工作。

由于居留广州的罢工工人人数较多，第一批购置的棉衣棉被远不能满足需要。罢委会也就继续为筹措御寒被服款项而奔波。在苏兆征等不惮疲劳努力奔跑下，继续缝制了棉衣4万件，棉被2万条，土布松花褥子1万床。罢工工人及时

领到了御寒衣物，感到十分温暖，激动地称呼这些棉衣为“万岁衣”，并深深感谢罢工工人的好当家人苏兆征。

## 妥善安排住宿和医疗

对于如何安排好罢工工人的住宿问题，苏兆征同样十分操心。罢工酝酿期间，经李森、林伟民等努力，并得到了广东革命政府廖仲恺等人的大力支持，征用了一批赌馆、祠堂、空屋等作为罢工工人宿舍之用。罢工爆发后，罢工工人相继返回广州，被分别安排在各处住宿。为便于罢工工人进行集体活动，经苏兆征、李森等人研究，对罢工工人所住宿舍及时作了一些合理调整，并安排了一批罢工工人和有关人员负责对各宿舍经常进行清洁打扫和维修等工作，以保障罢工工人的安康。1926 年 4 月间，连日狂风骤雨，一些罢工工人所住宿舍因破旧漏雨，影响罢工工人的休息与健康。苏兆征十分关心这件事情，嘱咐庶务部立即采取措施，“召匠修理，务使各工友得安住无患，庶尽维护之意”。

罢工期间，苏兆征更是时常关心着罢工工人及其家属的身体健康问题。罢工伊始，苏兆征等领导人就决定成立一间罢工工人医院，初时只设门诊部，不久再增设留医部和分院；此外还设有卫生队、救护队等，日常到各罢工工人宿舍巡回医疗，方便罢工工人及其家属就近看病和及时解决有关医疗卫生等问题。后来，医院又相继增设中医部、妇女留医室等机构。所有罢工工人及其家属看病，全部经费都由罢工委员会包起来。经过苏兆征等人的宣传发动，市内一些医院在反帝爱国精神感召下，也提出为罢工工人看病时减免医疗费用。广州一家妇孺医院表示“热心公益，乐行善举，允收纳工友家中之孕妇留医分娩，医药费用一概报销”。罢工工人群众对苏兆征等领导人如此关怀他们的身体健康非常感动和满意。

## 解决教育和培训问题

苏兆征对于罢工工人的宣传教育和学习培训等方面，同样十分重视。罢工期间，在苏兆征等人的关怀下，罢委会宣传教育委员会曾经开办过罢工工人宣传学校、罢工工人速成宣传学校以及劳动学院等院校，分别吸收有关青年罢工工人参加学习和培训，使之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能有机会结合学习政治理论和文化知识，不断提高水平。1926 年 3 月间，全港罢工委员会开办了一间速成宣传学校。邓中夏、苏兆征亲自担任名誉正、副校长。3 月 22 日宣传学校举行开学典礼时，苏兆征在百忙中抽空前往参加，并发表演讲，“勉励学员须负全港工会运动宣传责任，将来统一工会成功，宣传学校各同志应做很大之工作”。

为解决青年罢工工人以及罢工工人子弟的读书和学习文化知识的困难，罢委

会在广州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的支持配合下，又兴办了工人补习学校和罢工工人子弟学校多间，招收了800多名罢工工人子弟进入各子弟学校读书，年龄多在七八岁至十五六岁之间。在工人子弟学校的基础上，由省港青工代表大会发起，再组织成立了一系列的劳动童子团，让孩子们除了读书识字以外，同时接受加强组织观念、劳动纪律和提高工作学习兴趣等方面的训练。当各个系统劳动童子团正式成立或组织各种活动时，苏兆征都尽量抽空前往参加，勉励孩子们要立志做人，以后长大了要献身祖国的事业。一些参加过省港罢工斗争的老工人对于苏兆征如此关怀罢工工人子弟成长的情景，一直记忆犹新。

## 廉洁自律的当家人


苏兆征

苏兆征对待罢工工人如此关怀备至，但是对待自己和家属，却是十分严格。他自己手中虽然掌握了很大权力，却从没有以权谋私、假公济私，相反自始至终保持着大公无私、任劳任怨、艰苦朴素、与罢工工人同甘共苦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

罢工以后，苏兆征的妻子钟荣胜带着两个孩子跟随苏兆征从香港回到广州，一家人住在市内榨粉街的一间屋子里。他们的生活待遇与其他罢工工人完全一样，并没有因为自己是罢工领导人同时又掌握财权而享受特殊的生活待遇。他们家里经济很不宽裕，每隔一些时候，钟荣胜便返回家乡淇澳岛，带回一些咸鱼、杂粮等农副产品，以帮补家用之不足。罢工工人群众对此十分感动，称赞苏兆征大公无私，是工人群众所最信赖的当家人。

## 深厚诚挚的战友情

苏兆征与邓中夏、李森、林伟民等罢工领导人并肩战斗过程中，互相关心照顾，以心换心，表现了崇高而深厚的革命情谊，其情景感人至深。

从香港酝酿罢工时起，邓中夏与苏兆征两人便在一起并肩作战，互相之间配合得非常默契，关系十分融洽，成为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典范。工人称赞说：邓中夏能说会写，苏兆征在工人中有威信，两人一配合，力量就更大了。在领导罢工中，邓中夏与苏兆征两个人是分不开的。他们好像左右手一样，互相帮助。如果没有苏兆征在海员和香港各工会中的崇高威信，邓中夏很可能发动不起这次罢工；但如果没有邓中夏的雄才大略，苏兆征一个人也难以应付如此复杂的局面。

罢工工人赞誉他们“一个是运筹帷幄的老夫子（指邓），一个是抗强反帝的老英雄”（指苏）。

苏兆征对于邓中夏的丰富斗争经验和高超的领导水平非常钦佩，因此十分尊重他，经常主动向他请教。邓中夏亦十分尊重苏兆征，有关罢工斗争的事情，都注意主动与苏兆征研究，取得一致意见后，便同心合力地互相配合施行。有些该由苏兆征委员长出头的，邓中夏也十分尊重他的职权，决不包办代替。

罢工初期，邓中夏尚未结婚，苏兆征便请妻子钟荣胜主动帮他料理一些生活琐事，如清洗被褥、缝补衣服等。妻子从家乡带回一些食物时，总不忘记请邓中夏前来共享。当时苏兆征与邓中夏一同住在榨粉街的一座楼房，两人在罢委会处理完一天的工作后，经常在深夜甚至凌晨时刻，一起从罢委会步行回家，边走边就有关罢工斗争的事情交换意见。

邓中夏的夫人夏明后来回忆邓、苏两人之间的亲密友谊时说：“邓、苏二人，互相鼓励和帮助，互相关心和照顾，既是战友，又是兄弟。苏兆征曾对我说：‘中夏真是把自己的心换了我的心了！’”苏兆征有时因工作忙碌，以至几天都没能回家。遇到这种情况时，邓中夏一个人回家后，总是先到苏兆征的家，询问苏兆征的妻子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有时还特意买些玩具回来给苏兆征的孩子玩。

苏兆征与李森之间的革命情谊亦十分深厚。苏兆征十分钦佩李森的工作才能与政策水平，在工作过程中对他十分尊重与信任，注意主动与他商量和配合。李森是湖南人，初到广州时，语言不通，工作有些不便。向外联系工作时，苏兆征主动伴同他一道前往，介绍有关方面的人物与李森认识，互相配合得十分默契。

李森在省港罢工初期亦尚未结婚。苏兆征夫妇在生活上亦经常注意帮助和照顾他，经常邀请他到自己家中尝一点家乡风味菜。在罢工斗争过程中，正是由于他们两人互相配合得十分默契，所以把罢工委员会的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充满生机。罢工工人亲切地称颂他们两人在东园政府中，一位是“主席”，一位是“总理”。

苏兆征与林伟民之间的革命情谊更为深厚。他们两人是香山同乡，出身都很贫苦，很早就到外国轮船当海员，生活遭遇与经历基本相同。罢工爆发后成立罢工委员会时，时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的林伟民，代表全国总工会参加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并主持召开了罢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苏兆征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兼财政委员会委员长，李森为罢工委员会干事局局长。省港罢工举行不久，林伟民腿部不幸患了骨结核，长期在医院就医。苏兆征处处关心他，对罢工过程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情，都主动到医院与他商量研究，听取他的意见。林伟民在生活上的困难，苏兆征时常注意帮助解决。1922 年林伟民的妻子病逝后，遗下一个孩子长期跟随在林伟民身边。林伟民患病住院后，苏兆征夫妇时常关心他的孩子，帮他料理家务，关心孩子的学习和生活，使林伟民解除了后顾之忧，

安心在医院治病。

## 与廖仲恺的深厚情谊

苏兆征与廖仲恺之间的深厚情谊，一直为人们所称颂。

在省港罢工过程中，廖仲恺十分同情与支持省港大罢工。当苏兆征、邓中夏等罢工领导人经常因罢工斗争的事情与廖仲恺接触，并请求给予援助时，廖仲恺总是十分热情并态度鲜明地从政治、经济各方面给予巨大的支持与援助。另方面，当国民党和广东革命政府内部存在复杂尖锐斗争时，苏兆征等人亦旗帜鲜明地发动广大罢工工人做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的坚强后盾，配合国民党左派打击国民党右派以及各种反动势力。在频繁的接触中，苏兆征与廖仲恺之间的革命情谊亦不断加深。正如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后来所回忆的："很多工人农民运动的领袖，如彭湃、苏兆征、邓中夏等人，常常到我们家里开会，洽谈事务"，"仲恺始终与他们真诚合作"，"仲恺极力支持和协助这次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省港大罢工"。

1925 年 8 月 20 日，廖仲恺不幸为国民党右派势力所杀害。噩耗传来，苏兆征与其他罢工领导人感到十分悲痛。连日来，苏兆征亲自率领罢工委员会工作人员以及广大罢工工人参加了悼念廖仲恺的一系列活动，"藉表哀思"。8 月 23 日，在苏兆征主持下，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特为廖仲恺之死发表宣言，表示："廖先生虽永别吾人而去，但其反帝国主义精神，已永留于吾工人阶级之脑际，此后誓秉先生遗训，继续罢工到底，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反革命派，以完成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之目的。"

1926 年 8 月 20 日，廖仲恺逝世一周年。在苏兆征率领下，省港罢工工人参加了广州地区举行的纪念活动。苏兆征还以个人名义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题为《纪念廖仲恺先生》的文章。

## 对宋庆龄无限敬仰

苏兆征与宋庆龄之间的情谊，也是十分感人的。

1924 年 11 月 13 日宋庆龄陪同孙中山乘"永丰"舰，从广州到香港，转乘日轮"春洋丸"号赴上海，再转赴北京解决国事问题。因鉴于香港海员曾大力支持辛亥革命反清斗争事业，孙中山在香港逗留期间，曾专门接见了香港海员工会诸干事。当天，苏兆征等工会干事乘坐小轮船登上日轮"春洋丸"号。孙中山与宋庆龄在船上接见了苏兆征等人，与他们一一握手，同时说了一番嘉勉的话，后来还与他们照相留念。

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后，宋庆龄公开表示对于省港罢工的同情与支持，发表文章称赞此次罢工斗争正是“志（孙中山）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她还大力发动国内各界人士及海外华侨为省港罢工捐款共达10余万元之多。苏兆征对宋庆龄怀着无限敬仰和感激之情。1926年1月，宋庆龄从上海前来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期间，1月25日，苏兆征率罢委会委员们专程前往宋庆龄寓所，向她表示慰问，衷心感谢她对于这次反帝罢工斗争的大力支援。宋庆龄在会见时一再表示：“援助罢工乃国人之天职”，并谓“本人不日回上海，此后当对于罢工必尽其能力以帮助”。

同年9月间，省港罢工宣告结束前，苏兆征曾以罢工委员会名义致函宋庆龄，征求她对今后斗争方针等问题的意见。宋庆龄旋即复函表示：“此次罢工已逾一年，秉承先帅主义，与帝国主义者奋斗，力争我民族光荣，虽经政府提倡资助，而各工人热诚毅力，诚堪钦佩”；“惟念我同志百折不挠，功在党国，极愿倾谈以表佩慰，只以党国大会在即，苦无余暇耳！”以后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苏兆征代表中国共产党担任国民政府劳工部长，再与宋庆龄一道，在声讨蒋介石集团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为维护国共合作与大革命事业的斗争中，共同努力奋斗。

（禤倩红）

# 杨匏安

## 华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杨匏安，广东省香山县南屏北山村（今属珠海市）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的理论家和革命活动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在心理学、美学和史学等学术领域也有开拓性的贡献。他最早在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有“北李（大钊）南杨”之说。国共合作时期，杨匏安当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曾是国民党中央九大常委之一，同时也是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他在短暂的革命生涯中，与周恩来结下深厚的战友情谊。被国民党逮捕后，他拒绝蒋介石劝降，慷慨就义。

### 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

俄国十月革命后，杨匏安积极学习和钻研马克思主义。1919年下半年，在李大钊于北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他在南方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先后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40多篇文章。


杨匏安

杨匏安以《世界学说》为总题，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各种流派的哲学观点和社会学说，虽然其中有些论述未必尽皆精当，但在当时的文化学术领域，却也大大开拓了人们的眼界。

五四运动时期，我国理论界开展了一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宣扬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实用主义”，以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曾著文批判了胡适宣扬的实用主义。1919 年 8 月，杨匏安撰写文章简介“实用主义”，指出实用主义者认为“真理实为一种之手段而已”，是“一种调和说，又曰改良说”的错误认识。他给实用主义有力的批判，声援了当时李大钊对胡适的批判。10 月，他又撰写了《社会主义》这篇短文，概述了欧洲各种流派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热情地歌颂了马克思所著《资本论》实为“社会主义圣典”。他在这里，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改造密切结合起来。

杨匏安在《世界学说》各文中，篇幅最长，也是最重要的一文是《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该文发表于 1919 年 11 月 11 日至 12 月 4 日，陆续登载了 19 天。与李大钊发表于《新青年》的名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差不多同时问世。这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不失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名著之一。

杨匏安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学说。他热烈欢呼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歌颂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的杰出贡献，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伟大历史作用，精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潮流已臻于高峰。由此可见，在五四运动时期，杨匏安已成为我国南方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是继李大钊之后，我国第二个马克思主义宣传者。杨匏安还在学校、铁路教职工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和华南工人运动的结合，对促进广东党组织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认为，杨匏安的长篇连载文章《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了相当系统的介绍”，高度评价杨匏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起过重要的作用”。

1920 年 10 月间，杨匏安结识了在《广东群报》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谭平山。由于志趣相同，他们过从甚密，经常探讨马克思主义传播等问题。1921 年，经中共广东支部书记谭平山介绍，杨匏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嗣后，在党

的领导下，他英勇地为革命事业而斗争。

1922 年春，应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领导人谭平山的约请，他为广东青年团机关报《青年周刊》撰写了该刊创刊号《宣言》。他文笔犀利，在文章开头就开宗明义地说："现在新起的工商业社会制度，是不合理的，应当改造的，所以社会革命四个大字，就是我们的先行旗帜。"他旗帜鲜明地严肃声明："我们最服膺马克思主义！"他一方面指出，我们应注重"劳工运动"；另一方面，他强调论述"我们尤其注重的，是农民运动"。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出自农民（劳动），我们快要指导他们向着能变的道路走去。"由此可见，在五四运动建党时期，他已认识到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了。这一年 4 月 6 日，杨匏安在第一届青年团广东区委会议上，当选为青年团广东区执行委员会文书部中文负责人。接着，他在《青年周刊》第三至第七期连载发表他的长篇政治论文《马克思主义浅说》，文章引导广大团员、青年更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要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战斗。1922 年，中共广东区委成立后，杨匏安与区委负责人谭平山等以更高的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投入革命战斗。

## 参与改组国民党工作

1923 年，杨匏安受中共中央委派参加了国民党的改组，此后三年间在国民党中央当过第二届中央委员、中常委、中央组织部秘书和代部长，他以此身份帮助改组国民党，大力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和工农运动。

孙中山非常赏识杨匏安这位年轻干练的香山同乡。1924 年 1 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推举共产党员谭平山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杨匏安任组织部秘书，中央组织部不仅要选人员派往全国各大区、省、市，开展国民党的改组工作，而且还掌管军队、机关、学校、企业、海外以及广东各县、市的党务，工作十分繁忙。谭平山兼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后，中央组织部的日常工作实际上由杨匏安主持。1924 年 11 月，谭平山因出席国际会议，离职数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由杨匏安代理中央组织部长。

1925 年 8 月 20 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突遭枪杀，事件震惊全国，革命政府为审查廖仲恺被刺真相和惩办凶犯，成立了廖案特别委员会和革命法庭，由杨匏安、李章达等任审判员，执行审讯案犯工作。

杨匏安与廖仲恺早在日本时已经认识，杨对国共合作的中流砥柱廖仲恺被害无比悲愤，他抚棺痛哭，誓为廖仲恺报仇。委员会经过审讯侦查，查明刺杀案主谋，革命政府在压力下将国民党右派胡汉民、许崇智驱逐出广东，给国民党右派以沉重打击。

1925 年 11 月，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正式成立了广东

省党部。杨匏安当选为三个常委之一兼组织部长。在杨匏安的主持和建议下，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委派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兼任东江各届（惠、潮、梅）党务组织主任。由于杨匏安等人的积极工作，国民党广东党务获得迅速发展。至1926年1月，党员人数由1万余激增至4.8万多人。新党员绝大多数是工、农和学生，从而改变了国民党过去以海外华侨为支柱的社会基础。

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逝世。国民党中央于3月15日决定，任命杨匏安等16人为筹备委员，在广州召开了万人追悼会。他号召党团继承孙中山的遗志，把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杨匏安与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胡汉民、谭平山、林伯渠、陈公博、甘乃光一同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成为“九大常委”之一。杨匏安与常委谭平山、林伯渠共同组成秘书处，处理国民党中央的日常事务。他致力于发展国民党组织，在两年内，国民党在12个省建立了省党部，在海外华侨中，建立了新的支部。全国国民党党员约有50万名，其中也凝结着杨匏安的心血和辛勤劳动。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同日，杨匏安与武汉等地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讨蒋通电，指出蒋介石已公然背叛革命，号召全国人民“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同年4月，杨匏安出席了在汉口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同日，杨匏安与宋庆龄等22人在南昌《民国日报》上发表声讨蒋、汪反革命罪行的《中央委员会宣言》。

## 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之一

1925年，上海爆发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5月31日，杨匏安出席广东区委召开的党团员大会，参与决定组织临时委员会，发动工、农、商、学、兵各界群众援助上海反帝斗争。

这时，驻在广东的滇系军阀杨希闵、广西军总司令刘震寰在广州发动军事叛乱。杨匏安与刘尔崧、杨殷按照中共广东区委指示，迅即发动粤汉、广九、广三等三条铁路工人拆下火车头零件，举行罢工，拒绝为叛军输送兵员、武器弹药，使叛军断绝铁路运输。接着，他们又发动船上工人罢工，使叛军水路运输断绝。当周恩来等率领部分东征军回师广州郊区，准备入市内平定叛乱时，杨匏安、刘尔崧、杨殷又发动铁路工人立即把火车头零件安装好，迅速驾驶列车赴郊区，运送东征军进入市内，并发动广东工团军协助革命军队，于6月12日平定杨、刘军阀叛乱。

杨匏安曾多次到过香港，熟悉当地情况。6 月 13 日，按照国民党中央、中共广东区委意见，杨匏安以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财政部长兼国民党中央农工部长廖仲恺代表的身份到香港，与全总宣传部长邓中夏，国民党中央农工部特派员杨殷和全总委员苏兆征、何耀全等发动香港工人举行大罢工。

杨匏安等先后到西环香港工团总会、华工总会、山顶酒店、杏花楼、中环车衣工会、海员工会、电车工会等秘密召集香港党团员和 100 多个工会领导人开会，晓以民族大义，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教育他们宁可不领工资，也要参加罢工，以反抗英帝国主义在上海的“五卅”大屠杀，为中华民族增光，以夺取反帝斗争的胜利。

当时，香港各工会负责人以至工人，生怕罢工后无收入，回广州后生活无着。杨匏安说：廖仲恺已委托我做他的代表。如香港工人罢工回广州，由建国陆海军大元帅财政部保证安排食宿，解除了大家的顾虑。与此同时，他和香港党团、工会还大量印发了《中国共产党为“五卅”惨案告香港同胞书》、《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五卅”惨案告香港工友书》、《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五卅”惨案告香港青年学生书》，揭发英、日、美等帝国主义在我国各地屠杀工人、市民、学生的罪行，号召香港工人团结起来，以罢工作武器，反抗英帝国主义。杨匏安等还布置共产党员、国民党员、青年团员、工会会员拿传单到电车、汽车、天台等地到处散发，使广大工人都知道要罢工反抗英帝国主义。

经过苏兆征、邓中夏、杨匏安等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广泛发动，6 月 19 日，震动中外的省港大罢工爆发了。20 万省港工人加入罢工反帝行列，13 万香港罢工工人先后到广州等地组织武装工人纠察队封锁香港。香港还有许多善后事要做，杨匏安仍在香港处理这些问题。7 月 1 日夜 10 时，杨匏安在戴卓民家商议工作时被香港警探拘押起来，坐牢 50 天。因警方找不到他“煽动工潮”的确凿证据，他被释出狱，并被“驱逐出境”，由澳门转赴前山。

8 月 25 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在九曜坊广东省教育会隆重举行欢迎杨匏安出狱大会。27 日，他参与省港罢工工人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作了讲话。9 月 6 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第 55 次会议决定，并经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通过聘请杨匏安为全总省港罢委会顾问后又被聘任为香港工团罢工委员会宣传学校名誉校董，后兼名誉校长，支持和协助校长彭月笙培训工人运动干部。

10 月，杨匏安协助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和顾问兼全总秘书邓中夏发动省港罢工工人 3000 人，组成交通队、运输队援助国民革命军东征南征，为打倒军阀粤军总司令陈炯明、高雷琼崖钦廉罗阳八属联军总司令邓本殷，统一广东作出了贡献。

## 与周恩来深厚的战友情谊

周恩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总理，中国共产党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的领导者之一。

在杨匏安生前，周恩来敬重杨匏安，杨匏安英勇就义后，周恩来关心杨匏安的亲属，珍视杨匏安留下的精神财富，希望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以杨匏安为楷模。

周恩来是1924年7月从欧洲启程归国的，9月初到达正处于国民党、共产党合作推进国民革命之下的广州，10月即被任命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长。杨匏安时任中共广东区委监委委员，并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担任实际主持部务工作的秘书。周恩来与杨匏安就是在这时相识的。

他们刚刚相识，就共同参与指挥了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广东买办首领陈廉伯纠集各县商团，组织起一支商团军，于10月10日打死打伤100多名游行群众，发动了叛乱。正在粤北韶关督师北伐的孙中山得报，指令在广州成立临时军事指挥部统一指挥平叛。周恩来、杨匏安参加了这个指挥部。10月15日，临时军事指挥部下令向商团发起进攻，商团军盘踞广州西关顽抗。周恩来、杨匏安等指挥部成员决定，调集炮兵轰击商团军，以广州卫戍部队和粤军第二师等部分进合击，一举突破了商团军的西关阵地。陈廉伯逃跑，商团军溃散，叛乱被彻底平息了。

中共广东区委的工作范围并不局限于广东，还包括广西、厦门、香港、南洋等地。杨匏安主持下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党务也在向这些地区拓展，周恩来、杨匏安之间的日常工作往来是相当多的。那时候，广东区委领导人和从上海赴广东公干的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都经常来杨匏安的居所杨家祠，举行会议或商谈工作。

11月，周恩来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杨匏安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中共中央通知：黄埔军校招生时，应考的中共党员、青年团员先到杨匏安处报到，再由杨匏安介绍给周恩来。

1925年2月，周恩来随黄埔军校校军开始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为加强黄埔军校校军的政治工作，杨匏安将古大存等一批共产党员选调给周恩来，在东征军中担任政治宣传员。东征军所向披靡取得重大胜利，是与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分不开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交往，周恩来与杨匏安相互增进了了解，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周恩来赠送给杨匏安一方铜墨盒，盒盖上刻写了9个字："匏安兄文玩，周恩来志"。

6月，香港、广州数十万工人举行省港大罢工。杨匏安以国民党中央农工部

长、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的代表身份，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被罢工人代表大会聘为顾问。杨匏安亲赴香港指导罢工期间，一度被港英当局逮捕关押。周恩来此时已不再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而专任广东区委的军委书记。周恩来高度关注省港大罢工，多次到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报告，还为罢工工人纠察委员会选派了徐成章、陈赓等黄埔军校生担任纠察队的教练。杨匏安和周恩来同为省港大罢工作出了重要贡献。

杨匏安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期间，罢工委员会有时在杨家祠给罢工工人发放各界捐款。一次，杨匏安的孩子们在存放过罢工捐款的麻袋里拣到两角钱硬币，杨匏安吩咐把这两角钱立刻送到罢工委员会去。这件事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隔多年还对杨匏安的孩子回忆说："你父亲为官清廉，一丝不苟，称得上是模范！"

为追查刺杀廖仲恺的凶手和幕后策划者，国民政府组织了廖仲恺案检查委员会，周恩来和杨匏安共同参加了廖案委员会。周恩来撰写了《勿忘党仇》、《沙基惨案与廖党代表之死》的悼念文章，杨匏安亲自指挥侦缉行动，捉到了几名凶手，他与周恩来一起审问了凶手。在杨匏安与周恩来的密切配合下，廖仲恺案的真相被查明，国民党右派集团的阴谋被揭露，其越来越猖獗的气焰受到沉重打击。

9月，国民政府决定发动第二次东征，周恩来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东征军横扫地方军阀和陈炯明的残余势力，迅速平定了东江地区。在杨匏安的建议和努力下，周恩来被任命为国民党广东东江各属党务组织主任、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得以兼管惠（阳）潮（州）梅（县）和海（丰）陆（丰）各县的党务、行政工作；邓颖超为新设立的潮梅特别委员会委员。

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杨匏安成为"九大常委"之一。杨匏安并与谭平山、林伯渠组成秘书处，负责处理国民党中央的日常工作；还与邓颖超等共同担任提案审查委员。当了高官的杨匏安一如既往，不收受任何礼金、礼品，也不为亲朋故旧说情和讲情，保持了廉洁、朴素的作风，过着淡泊、清苦的生活。周恩来目睹耳闻这些情况，称赞杨匏安"为官廉洁，家境清贫"，时常以杨匏安的风范为例，教育共产党员和各级干部。

（刘利亚）

# 叶挺

## 毛泽东曾说叶挺完全可以授元帅衔

毛泽东曾说，叶挺完全可授元帅衔。

1896年，叶挺出身于广东惠阳县秋长镇周田村的一个贫寒农家。1919年，他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1924年秋他赴苏联留学，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于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1925年9月他从莫斯科回国后，担任了在肇庆组建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并任团长。1926年5月他率领独立团担任北伐先锋直捣湘鄂。6月初进军安仁、渌田打垮吴佩孚六个团，取得初战大捷。接着打醴陵，克平江，长驱疾进，夺“汀泗”，取“咸宁”，占“贺胜”，陷武昌，为第四军赢得“铁军”称号，他以英勇善战，身先士卒被誉为“北伐名将”，升任第二十四师师长。1927年8月1日，叶挺与贺龙、朱德、刘伯承等一起，发动了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在起义中叶挺担任前敌总指挥和第十一军军长。同年12月11日，他与张太雷、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总司令。广州起义



叶挺铜像

失败后，他忍受不了无理指责，在海外度过了十年的流亡生活。“九一八”事变，他从国外返回澳门。1937 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叶挺毅然接受了参加组建新四军的使命。毛泽东赞誉他“领导抗敌，卓著勋劳”，为抗日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绩。1941 年国民党顽固派一手炮制了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叶挺被扣押五年多，在狱中曾写下一首题为《囚歌》的诗，表示决不从“狗的洞子爬出”，要“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1946 年叶挺被营救出狱。4 月 8 日，他与王若飞、邓发、博古等同志乘机飞往延安时，不幸于黑茶山遇险机毁遇难，时年 50 岁。叶挺虽不幸遇难牺牲，但他的光辉业绩却永远闪耀在中国人民心中，载入我党我军的史册。

## 为剪辫子而被捕入狱的少年

叶挺从小就对封建宗法制度产生不满与反抗情绪。叶挺在本村腾云小学读书时，有一次，当念到内容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课文时他对同学说：“这些话毫无道理，没有人耕田，能有千钟粟吗?”当时由于乡中重男轻女的习俗相当严重，女孩子不准入学读书，只能在家里劳动干活。叶挺曾因此愤愤不平地对别人提出：“男人女人都是人，为什么女人不能入学读书呢?”对神权和迷信活动，叶挺更是憎恶。有一次，他由会水楼村去淡水圩，把沿途几个神庙中所有神像的眉毛、胡子都拔了下来，把一些神像的手指折断，还将一些烧香用的香炉砸烂。事后，村中一名乡绅怒不可遏地走上门来斥骂叶挺说：“你好大胆，连菩萨都敢打!”叶挺回答说：“我打了，又会怎么样?”那个乡绅见叶挺既不低头认错，还敢大胆顶撞自己，气得浑身发抖，说你这个小子，当心雷公劈你的手。叶挺并不畏惧，他说如果真有雷公，就让他来惩罚吧，我不怕!

在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少年叶挺英气勃发，立志救国救民，振兴中华。1911 年，叶挺 15 岁，考进惠州府立中等蚕业学校读书。他到惠州入学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夜，革命党人在惠州一带展开宣传活动，号召人们剪辫子。叶挺和不少青年人响应号召，当场把辫子剪掉。不久，革命党人在广州举行起义，受到清政府的镇压而失败，清政府大肆搜捕革命党人，连剪过辫子的人也不放过。惠州

城内不少人亦因此被抓起来。叶挺也不能幸免，曾一度被捕入狱。事后，有些人嘲笑他“自吃苦头”，并怀疑他是革命党人。叶挺泰然地说：“能做一个革命党人，不是更有志气吗！”

1916年叶挺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工兵科学习。当时军校是官费，免费供应食宿，但日常生活开支，仍要学生自己解决。叶挺家境贫困，因此平日生活十分俭朴。衣服鞋袜破了，自己动手补了又补。别人讪笑他寒酸，他毫不以此为耻，泰然处之。他对军校中一些出身于富贵人家的花花公子，平日不努力学习，整天沉迷于吃喝玩乐的行为，十分厌恶。他喜欢与一些出身贫苦而又刻苦学习、要求进步的同学如邓演达等接近，互相砥砺，共同进步。在保定军校学习期间，叶挺请假回家服侍母亲，后母亲不幸病逝。因家中一时筹不到安葬费用，只好向一位富有的同族借钱，但是这个同族却乘人之危，除索要高昂利息外，还提出要将叶家所住房屋抵押。这些遭遇使叶挺感慨万千，他悲愤地对家人说：我们可以看清楚，财主佬是没有半点良心的。我们穷人要想摆脱贫困的命运，一定要团结起来奋斗。

## 传唱后世的“铁军”军威曲

1925年9月，叶挺从莫斯科回国后，担任了在肇庆组建的、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针对团内少数下级军官中存在着任意打骂士兵、贪污克扣士兵粮饷等现象，叶挺在全团开展了一次反打骂、反贪污的活动。他抓住一些典型事例进行教育。有一个连长刘光烈，经常贪污办公费用和士兵的伙食费，粗暴地打骂士兵，叶挺批评教育他，但他拒不认错，叶挺便撤掉了他的连长职务。排长薛仰宗不仅任意打骂士兵，上街时也无理辱骂老百姓，破坏军民关系，后来又发现他到独立团工作是通过私人关系进来的，而未经团部审查批准，叶挺便及时将其撤职。后来，叶挺还在全团开展了一次反报假姓名、假籍贯的活动。

叶挺还派出部分官兵，组成治安巡逻队，维持社会秩序，打击破坏分子，有时叶挺亦亲自参加巡逻。当时驻肇庆的尚有其他一些军队，他们的素质很差，任意欺凌老百姓，群众恨之入骨。有一次，叶挺带领一些战士在街上巡逻，见一名其他军队的连长向农民买东西少付钱，还逞凶打人。他让巡逻队上前制止，那个家伙气势汹汹地说：你们是什么人？竟敢来管我！叶挺走上前去，递上自己的名片。那个连长看后知道对方原来就是叶挺，吓得浑身发抖，只好老老实实地接受巡逻队的处罚。

1926年5月1日，独立团由肇庆、新会出发北伐。7月10日，攻打泗汾、醴陵的战斗开始。张发奎命令独立团担任向泗汾、豆田（在泗汾以西）进攻的任

务。在当地农民群众的支持下，独立团迅速占领了豆田，并强渡渌水，与敌谢文炳增援部队千人相对抗，将敌击溃。独立团乘敌人溃退之际，于是日下午4时半首先攻占了醴陵。叶挺在醴陵城里等了一个多小时，张发奎方才率部队赶到。叶挺对张发奎说：我们今天是运用灵活的战术，把佯攻变为主攻，先入了醴陵城。张发奎无可奈何地说：你们打得好，我们也打得不错。你们是打得猛，追得快，我们是打得稳，追得稳。叶挺说：你们太稳了！太稳了！

叶挺为北伐战争胜利建立了赫赫战功，为第四军赢得“铁军”称号，他以英勇善战、身先士卒被誉为“北伐名将”。北伐战争的重大胜利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极大恐慌。1927年5月17日，驻鄂西南的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公开叛变，向武汉偷袭。叶挺受命后将叛军打退，武汉局势转危为安。叶挺在保卫武汉、平定夏斗寅叛乱的战斗中又一次立下了显赫战功。正如陈毅所称颂的：

脱颖自北伐，
初胜湘江曲。
秋风扫落叶，
铁军声威立。
江汉功更伟，
一战安群黎。

## 爱在海边遥望远方的人

广州起义失败后，作为起义主要领导人叶挺，却受到王明集团和米夫的横加指责及冷落，对叶挺在起义中提出的及时将起义部队转移到农村去的正确主张进行了荒唐的批判，指责他“政治动摇”等，叶挺忍受不了这样无理指责，在海外度过了10年的流亡生活。他在德国期间，生活清贫，有时要打零工，帮人在果园里摘果子，赚些钱来维持生活。历史已经证明，当时对叶挺的指责是错误的，周恩来后来说过：“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申冤。”叶挺虽然身居异国，但仍时刻惦记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一直努力争取与中共党组织和进步人士联系。他密切注意考察外国军事等方面的情况，进一步学习新的军事科学，为日后有机会返回祖国参加新的斗争作好准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叶挺从国外返回澳门，他千方百计寻找党组织，在此期间，国民党当局曾用高官厚禄对他进行利诱，叶挺严词拒绝，保持了革命者的崇高政治节操和品质。他虽然离开了党组织，仍然关心祖国民族的解放事业，并没有放弃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叶挺在澳门与家人生活在一起时，时常对

孩子们讲做人的道理。他喜欢带孩子到海边玩耍，他“总爱站在海边遥望远方”，“在思念自己的祖国”。



叶　挺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叶挺为祖国、民族处于危急关头而坐卧不安，恨不得立刻奔回内地投身神圣的抗日事业。于是他离开澳门前往上海，向周恩来倾诉了要求返回祖国参加抗日事业的强烈愿望，他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毅然接受了参加组建新四军的使命。叶挺在延安向党中央请示关于组建新四军的工作问题时，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他。延安特意举行了欢迎叶挺的大会。叶挺受到党中央如此隆重的欢迎与款待，心情十分激动。他在会上表示：“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

叶挺平日节衣缩食，总舍不得多花一块钱，带兵时坚持与战士们同甘共苦。他外出时穿着整齐的军装，回到家里时就换上破旧衣服。他有一条破呢裤子，曾送到军需处缝补了三次，仍舍不得弃去。他有一件衬衣早已破烂不堪，警卫员代他领了一件新的，他不同意，一定要警卫员把新衬衣退回去。他指着旧衬衣说：“旧的不是蛮好嘛，只要补一补领子，还能穿一段时间”，警卫员只好将不知缝补了多少次的破衬衣拿去，请附近一位大娘缝补，大娘惊讶地说：“哎哟，你们的首长还穿这么破烂的衣裳呀！”叶挺还自己动手，在营房附近种瓜种菜，劳动时把鞋子脱掉，赤着脚板，干得十分起劲。警卫员怕他累着，劝他休息。他笑着说：“只有经常劳动，才会有好的身体，才能懂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

叶挺有相当广泛的爱好，他喜欢照相，自己有一照相机，经常把一些精彩镜头拍下来；他更喜欢读书，经常阅读一些著名的文学作品，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在重庆期间，叶挺曾与吴玉章研究过关于拉丁化新文字的改进问题。吴玉章回忆说：叶挺“常与我谈拉丁化新文字的改进，并说将来一定要实行，对于中国文字革命有最大的信心。”吴玉章称赞叶挺不仅军事优越，而且文学高明。而叶挺写的《囚歌》更是充分展现了叶挺诗人的气质与水平。

# 愿与活棺材一齐烧掉的勇士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一手炮制了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在危难时刻，叶挺临危不惧，指挥部队突围。经过九昼夜的浴血奋战，我军终因寡不敌众，部队大部分无法突围出去。叶挺遵照党的决定，冒着生命危险，以个人的牺牲来保存革命的力量，下山与顽军谈判，但下山后被顽军非法扣押，先后囚禁于上饶、重庆、恩施、桂林等地。在此期间，国民党当局进行软硬兼施，威迫利诱，曾向他提出，只要发表一个皖南事变是共产党的责任声明，就可委以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甚至司令长官之职。叶挺当场拒绝，怒斥他们的卑鄙行径，坚决表示“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他写了一封致蒋介石的快邮代电，“愿以一死为部曲赎命。”“挺不愿苟且偷生，以玷前修，愿保其真情而入地狱”的庄严声明。

叶挺被国民党扣押期间，为了表示自己坚贞不屈的意志和斗争到底的决心，把头发蓄起来，胡子也不刮，长得长长的。有人劝他理发时，他就严肃地说：“不恢复我的自由，就不理发，不刮胡子！”他在囚室的堵壁、门板以至窗门上，都书写了“正气压邪气，不变应万变”；“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坐牢三个月，胜读十年书”等字句，以表达自己的心志。他还在居室的门前屋后，开垦了一片荒地，种了一些蔬菜，饲养了一些牲畜，通过经常性的体力劳动来磨炼自己的身体和意志，同时借此机会接触附近的群众。

叶挺被囚于重庆渣滓洞集中营期间，用自己的生命和血，写下了一首题为《囚歌》的气壮山河的不朽诗篇！表示决不从“狗的洞子爬出”，要“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
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

得到永生！

这首诗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坚贞不屈的崇高气节，令人震撼，传颂至今。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 年 3 月 4 日，叶挺同志被营救出狱，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他出狱后仅 10 个小时就向党中央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毛主席亲自修改复电称："你为中华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 20 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人民都已熟知你对民族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叶挺接到了党中央的复电后，曾向报社记者发表自己为什么请求重新入党的原因，他说在失去自由的五年零二个月当中，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考虑既往的事情。出狱后的第二天就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经过五年多考虑的结果。

叶挺的革命坚定性，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

（官丽珍）

# 邓 发

## 机智勇敢的工人领袖

邓发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1946 年 4 月 8 日，他与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人由重庆乘飞机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殉难。周恩来曾评价道："邓发同志是工人队伍培养出来的领袖，为中国工人阶级联合战线，同时也为世界工人阶级联合战线建立了光辉的成绩。"

### 巧遇良师

邓发 1906 年 3 月 7 日生于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中有兄弟姐妹十人，他排行第八，乳名"八仔"。1922 年他报名参加海员工会时，改名邓发。

1920 年初秋，家中没有钱继续供他读书，他就跟随五兄邓芳离乡别井，到达广州，在东区公安局当勤杂工。两个月后，他转到广州西湖路公益祥旅店，做茶房服务员，每天劳动十多个小时。



邓 发

是年深秋，秋风萧瑟，落叶纷飞，广州的早晚已有些凉意。在人来车往的公益祥旅馆里，住进了一位头戴礼帽、身着长袍、神态潇洒、温文尔雅的商人。他包了一间僻静的客房，说是要住两个月。这位商人的客房由邓发负责打扫卫生，提茶换水。时间长了，两人接触的次数也就多了。商人的举止，给邓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觉得这商人与众不同，没有那种财大气粗、盛气凌人的作风，对人温和，平易近人。商人每天早出晚归，却不见洽谈生意的客户来往，这使邓发感到有点神秘。商人亦觉得邓发性格耿直，忠诚憨厚，聪明伶俐，便时常与他交谈。邓发得知商人名叫苏兆征，虽还不知道他是正在从事工运工作的工人领袖，却已知道他是为穷苦百姓着想的好人，警察正在抓捕他。

苏兆征经过长时间观察，认为邓发出身于贫苦家庭，政治可靠，思维敏捷，有发展前途，是个栋梁之材，有心培养他为革命分子。于是苏兆征向邓发讲授革命理论，还讲述全国的革命斗争形势。他们时常聊到三更才睡觉，邓发在交谈中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

1921 年 3 月，苏兆征介绍邓发加入了中华海员工会联合会。接着，又介绍邓发到香港海员工会夜校读书。在夜校，邓发学到了更多的马列主义理论常识、中国革命理论常识。

1925 年 10 月，邓发经过革命理论学习和革命运动的暴风雨锻炼后，更深刻地领悟了马列主义思想的真谛，经苏兆征介绍，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 参加省港大罢工

1925 年 6 月 19 日，在陈延年、苏兆征、邓中夏等同志领导下，省港大罢工像汹涌澎湃的怒潮一样，在南海之滨的大都市爆发了。参加这次著名的震动中外大罢工的有香港和广州租界沙面的工人共 25 万人。邓发踊跃地参加了这次罢工斗争，是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当时，英帝国主义不仅拒绝罢工工人提出的条件，还宣布戒严，调动军舰示威，并对支持罢工的广东革命政府进行封锁。香港 13 万罢工工人万分愤慨，纷纷离开香港，回到广州。邓发和邓芳也随工人一起加入罢工队伍行列，坚决反对帝国主义。

6 月 23 日，邓发和罢工工人、广州工农商学兵各界群众 10 万人涌到广州东较场，声讨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大屠杀，并举行反帝示威大游行。游行途经惠爱路、永汉路、长堤，邓发和示威群众沿途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

平等条约!”“收回广州租界沙面!”等口号。当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到达沙基时，帝国主义军队在对岸沙面，突然开机枪、步枪扫射游行群众。泊在珠江白鹅潭的英、法、葡的军舰也同时开炮轰击示威群众，打死 52 人，重伤 177 人，轻伤无数。邓发目睹帝国主义制造这一骇人听闻的“沙基惨案”，怒发冲冠。他边劝导海员立即疏散转移，边对工人说：“我们必须坚持反抗帝国主义，讨还血债!”

省港罢工爆发后，在中共两广区委领导下，罢工工人建立了武装纠察队，有 2000 多人参加，以黄金源为总队长，邓中夏为训育长。邓发任下属的一支纠察队小队长。开始了他毕生以主要精力从事的政治保卫工作。他曾带领队员到珠江口岸执行封锁香港的任务。1931 年，他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任国家保卫局局长，保卫中央机关领导人的安全。在他担任保卫局长期间，没有发生一例中央领导人因保卫疏漏而落入敌方之手的事件。

## 上街头唱歌演戏

1925 年 7 月，在广州建立大罢工的领导机构——省港罢工委员会（地址在今广州市越秀南路东园横路 1 号）。

7 月底，邓发和邓芳到广州宣传学校学习。学习结业后，邓发由组织分配到省港罢工委员会宣传部演讲队第十七队，奔向广东增城等地开展宣传活动。他在广东城镇农村，宣传省港大罢工反帝斗争的重要意义和加强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号召各界群众支持工人的反帝正义斗争，密切了罢工工人和农民的联系，促进了城乡人民从思想上、物质上援助省港大罢工。

开始宣传工作不久，由于工作出色、革命政治思想高，邓发被任命为省港罢工委员会宣传部宣传队队长、支部组织干事。

邓发和队员们到马路上、公共场所进行宣传活动。活动开始时，一个队员高举“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宣传队”队旗，一个使劲摇铜铃。当群众围拢过来后，邓发和队员就唱革命歌曲，朗诵诗句。他们唱得最多的一首歌是：“军阀手中铁，工人头上血；头可断，肢可裂，革命精神不可灭；劳动群众们快起来团结。”他和队员放开喉咙歌唱，把附近的正在围观演杂技的观众也吸引了过来。邓发和三四个队员轮流讲，每人讲十分钟或二十分钟，宣传反帝反军阀的重要意义和工农商学兵大联合的重要性。有时，他们在繁盛的马路口或郊区农村以演短剧的方式，揭发帝国主义、军阀的种种罪恶，号召群众起来参加革命斗争。邓发还与队员到粤西云浮做革命宣传，通过化装演剧宣传，使边远地区群众都知道省港大罢工反帝的意义。

## 参加第二次东征和北伐

1925 年 10 月，广东革命政府举行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邓发带头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宣传队、运输队，随军出征，沿途在军内外进行宣传鼓动，鼓励军民英勇杀敌。

东征胜利后，邓发凯旋回到广州，继续在省港罢工委员会负责宣传工作。

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封建军阀，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先遣队，于 1926 年夏，首先出师，向湖南挺进。接着，国民革命八个军也誓师出发北伐。邓发积极参加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他根据中共两广区委指示，参加中国国民党，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北伐青年工作队长。

邓发大力发动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广东工农青年、社会各界青年踊跃参加革命军队，奔上沙场，为打倒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而战斗，为统一祖国而建功。他以我国汉代班超为例，鼓励知识分子青年投笔从戎，暂时放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穿上军装，为结束祖国的分裂局面而效力。他协助陈延年、苏兆征、邓中夏、何耀全等同志发动罢工工人 3000 名组成宣传队、运输队、担架队、卫生队，冒着酷暑，随军出征，支援北伐战争。他还协助彭湃、阮啸仙等同志发动广东农村青年援助北伐军。仅广东曲江县就有 3000 多农民热烈响应号召，加入运输队，为北伐军运送武器、弹药、粮食。

## 智脱敌捕

1927 年 4 月 15 日，广东的国民党反动派按照蒋介石的指令，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清党”大屠杀。

当天，住在省港罢工委员会宣传部（今广州市越秀区）的邓发，突然听到外面的嘈杂声，他顿时联想想三天前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情景，意识到敌人要对省港罢工领导机关和罢工工人下手了。邓发没有惊慌失措，他一边布置同志们赶快转移，一边急速清理文件。

同志们刚刚离去，文件还来不及烧毁，“嘭嘭嘭”，敲门声骤然响起。邓发毫不迟疑，顺手从桌上拿起常用的画夹，将文件往画夹里一放，打开窗子便跳下去。敌人很快发现有人跳窗逃走，紧追不舍。邓发跑到一个拐角处，突然停了下来，他坐到一户关了大门的门槛上，打开画夹，扮作画师，对着周边的景物聚精会神地画了起来。敌人放过身旁的“画师”，向前追过去了。邓发却不敢松口气，他叫开房门，见出来母子俩，便说要给小孩画像，小孩一听，欢欢喜喜地站着让他画。这时，敌人杀了个“回马枪”，冲进屋子里来了。面对敌人气势汹汹的盘

问，邓发从容不迫，对答如流，加上惟妙惟肖的画技，还有那对母子帮着说话，敌人只好无功而返。

## 参加广州起义

1927 年“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后，共产党组织批示邓发留在广州，担任广东油业工会中共支部书记，坚持地下斗争。邓发勇敢地接受了党交给他的任务。

1927 年 11 月，邓发协助周文雍、杨殷、李源、沈青等同志把地下工人武装“工人自救队”、“省港罢工工人利益维持队”、“义勇团”等统一改编为广州工人赤卫队，并发动有思想觉悟的青壮年参加。在这些工人中，省港罢工工人是最为坚定的力量。他还大力协助周文雍等同志输送长短枪、炸弹、手榴弹、标枪等武器到赤卫队下属的各个联队。为了做好起义前的思想教育工作，他还把广州市委内部秘密出版的《红旗》、《广州工人》等刊物送给准备参加起义的工人、赤卫队传阅，鼓励工人准备参加起义。

12 月 7 日，广州工人代表会在广州越华路秘密召开会议。会议由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主持。邓发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选出广州工农业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并通过决议：12 月 13 日举行武装起义。会后，邓发回到广州第五区，对工人及赤卫队传达会议决定。广大工人摩拳擦掌，准备参加暴动。

广州高涨的革命形势引起敌人的不安。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转告广东军阀，要驱逐赤卫队，搜查职工会，解散教导团武装。敌人还逮捕了一个掩藏起义武器的米店老板，知道了起义的消息。在这种危急情况下，省委和起义总指挥部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至 12 月 11 日举行。邓发迅即转告工人及赤卫队，提前参加起义。

1927 年 12 月 11 日凌晨 3 时半，广州起义爆发。起义时，邓发担任广州第五区副指挥兼广州工人赤卫队第四联队队长，协助广州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周文雍，第五区暴动委员会负责人李源发动赤卫队、工人参加夺取海员工会、广州工代会，包围汪精卫公馆的斗争。

起义枪声打响后，邓发率领广州第五区工人赤卫队员和广州工人赤卫队第四联队队员，带着长枪、短枪、棍棒、大刀等武器，消灭一批反动武装，占领一些反动机关。敌保安队狼狈逃窜。为扩大战果，他与李源率领工人武装在米市路五仙观附近战斗，清除敌人。起义武装经过二三个小时的战斗，消灭了市内敌人，占领敌反动堡垒——市公安局，并把它作为广州工农民主政府办公场所。广州回到人民的怀抱，到处一片欢腾。邓发非常兴奋，立即和一些赤卫队员，走到革命

政府所在地维新路附近街道上，张贴标语，悬挂庆祝胜利的大幅红布横额。

## 最后一个撤退

12 月 12 日，敌军进行反扑，张太雷在指挥战斗中壮烈牺牲。邓发听到这个不幸消息，非常悲痛。他决心继承先烈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邓发到起义总指挥部提出建议，加派军队、赤卫队到战斗剧烈的据点长堤和全市制高点——观音山（越秀山）作战，以击退反动武装的进攻。之后，他受命带领部分赤卫队员到长堤，与教导团、警卫团等革命武装在一起，守卫沿江阵地。敌第五军军长李福林在珠江对岸河南，以炮艇作掩护，不断派反动武装横渡珠江，妄图登陆。起义武装以门板、木板、水桶、石块筑工事，击退了敌人多次进犯。由于敌众我寡，革命武装人员也牺牲了一些。为保存革命力量，起义总指挥部通知起义武装撤退。邓发率领部分赤卫队从长堤转移到大德路、中华路（解放路）四牌楼附近。起义的主力武装教导团、赤卫队、警卫团等已先后转移，奔向海陆丰、粤北、广西等地。但是，当时街道战争正在打得难解难分。

邓发和少数赤卫队员正在阵地上同敌人展开巷战，已来不及撤退。他和工人赤卫队员一起，英勇地进行阻击，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反扑。13 日，敌第四、五军及其他反动武装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从四面八方进入广州市。最后，他和 3 个赤卫队员从阵地上撤出，分散摆脱。敌人追他，相距只有 400 多米。他突然转身走入陶街牌坊巷五号他的四叔公屋内，伪装肺痨病人，躲过了敌人的追捕。

邓发觉得长居四叔公家不是办法，于是乔装打扮为一个工人，通过熟人介绍，到市内西关卢巷南海中学任炊事员。十几天后，根据组织的安排，他转回云浮，继续隐蔽地开展革命工作。1928 年秋天，邓发被补选为省委委员兼全总南方代表。1929 年 11 月 23 日，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邓发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 转战粤东北

1930 年 11 月，邓发从闽西到达粤东，在潮（阳）、普（宁）、惠（来）三县边界的大南山负责召开闽粤赣边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

大会中心讨论怎样把三省边界根据地打成一片等问题。邓发和代表们都认为，我们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必须要有巩固的后方。会议还突出地提出“暴动是艺术”。这就是说，搞武装斗争必须有领导艺术，深入发动群众，联系群众，调动更多的群众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武装暴力，必须在巩固苏区的同时，向外发

展。大会还提示“开展两条战线斗争”。大家感到这个口号很新鲜。邓发耐心地向代表们解释，使代表们明白这是同敌人作战时所必须采取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斗争策略。会议开到中途，反动军队突然来袭击会议地点——广东省潮阳县南山的山溪村。邓发和代表们及早获得情报，迅速转移到山上附近各村。敌人扑了一个空。敌军不敢在山区森林密布地域逗留，赶快撤走。他和代表们返回原地又继续开会。会上，决定撤销立三路线时期的东江行动委员会，建立闽粤赣边区特委；选举了邓发为中共闽粤赣边区特委书记。

特委建立后不久，邓发等同志为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对广东东北各县、区、乡政党、政府和武装队伍进行整顿，健全各种机构。邓发深入到广东东北地区，恢复和建立了饶（平）和（平）（大）埔、潮（阳）澄（海）饶（平）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县游击队。在邓发等同志部署下，闽粤赣苏区特派员，中共西江分委书记刘琴西等主持建立兴（宁）五（华）龙（川）、蕉（岭）平（远）寻（乌）、梅（县）、丰（顺）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和县游击大队，并巩固了揭（阳）丰（顺）五（华）红色区域。这样，粤东北的红色据点就更统一团结起来，革命力量变得更强大。

1931 年 7 月，邓发离开闽粤赣地区。同年 12 月毛泽东、项英、张国焘签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号报告》，任命邓发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1938 年，又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李慧敏）

# 阮啸仙

## 阮誉传岭表

阮啸仙（1898—1935），广东河源市东源县义合镇下屯村人，是广东青年运动先驱，工人运动的先锋，大革命时期与彭湃齐名的著名农民运动领袖，人民审计制度的奠基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者之一。

阮啸仙自幼崇拜苏武、文天祥等民族气节坚贞的爱国志士，考入广东甲种工业学校后，积极投身反帝爱国斗争，是“五四”运动中广东学联的学生领袖之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后，他毅然参加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之一。作为广东党组织代表之一，先后参加了党的“三大”、“五大”和“六大”，历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农委书记。1933 年冬，赴江西中央苏区工作，先后任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赣南省委书记兼政委。1935 年 3 月在率部突围时不幸壮烈牺牲。

## 舍身救学友

1919年7月初，阮啸仙等“中上联”负责人，组织带领广州各校学生，发动市民上街游行，号召抵制日货。游行队伍一路高呼口号，并派人进入几家销售日货的“亡国公司”，搜出数十箱日货，集中在越秀南惠州会馆附近，当众放火烧毁。在场的数千名群众，齐声拍手叫好。

学生们的爱国行动，遭到了军警的镇压，并扬言要逮捕阮啸仙等组织游行示威的组织者。7月14日，当数千学生和市民到省议会请愿时，几百军警包围了请愿的学生和群众，并开枪打伤了10多人，拘捕了学生50多人。


位于河源市烈士陵园的阮啸仙塑像

阮啸仙等人并没有退缩，他与周其鉴、刘尔崧等“中上联”负责人一起，发动各校学生，连续几天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愤怒控诉军警镇压学生的罪行，号召全体市民坚决抵制售卖日货。

军警当局十分恐慌，派出大批军警上街，以“学生捣乱”、“维护社会治安”为借口，对示威学生再次进行镇压。广州市十几所学校近百名学生，先后遭到拘捕。

军警当局的血腥镇压，更加激起了广大学生的愤慨。

阮啸仙立即召集各校学生代表会议，共商营救被捕同学对策。当晚，他以“中上联”的名义，发动“甲工”、妇孺产科学校、广东公立法政学校、光华医药专门学校等500多名学生，到警察厅请愿，强烈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在警察厅，阮啸仙走在队伍最前头，领呼“爱国无罪”、“释放被捕学生”等口号，并要求警察厅长出来面见请愿学生。

警察厅长下令拘捕了示威学生，知道触犯了众怒。拘捕示威学生已经引起各界人士的不满，有些团体还派出代表慰问受伤和被捕的学生。他害怕事情越闹越大，后果难以收拾，不得不出来与请愿的学生们见面。

阮啸仙义正词严地质问：“学生爱国何罪之有？勾结洋人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无罪，学生爱国反而有罪，这是什么国法？”

警察厅长被问得哑口无言，涨红着脸，推脱道：“我也是受上峰指令办事的，请大家冷静……”

阮啸仙紧追不放，大声说道："就是你亲自下令拘捕学生的！今晚你若不下令释放被捕学生，我们将继续到广州军政府示威请愿！后果你自己负责！"

警察厅长见学生们情绪激动，也不敢再强硬。

由于阮啸仙等人的据理力争，加上强大社会舆论的压力，警察厅长不得不将拘捕的学生全部释放。

阮啸仙深感团结斗争的巨大力量，心中极为兴奋。

同学们虽分别只有几个小时，但劫后重逢，个个激动万分。阮啸仙与被释放的同学相互拥抱着、欢呼着，共同欢庆这来之不易的斗争胜利。

## 纸笔当武器

1921 年秋的一天，广州妇孺产科学校的学生、广东中专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宣传科负责人高恬波，来到"甲工"，与阮啸仙商量组织学生上街演讲宣传之事。在交谈完工作之后，高恬波详细向阮啸仙谈起了她的身世。

原来，高恬波是惠阳人，当时由父母包办，嫁给了一个浑身恶习的纨绔子弟。两年后她不堪忍受丈夫的打骂，仿效勇敢的娜拉，离家出走来到广州。在亲戚的资助下，她考入广州妇孺产科学校。

"你真了不起，仿效起勇敢的娜拉，离家出走到广州来了！"阮啸仙听完高恬波的经历，感慨地说。

"人家跟你说真的，你却取笑我……"高恬波嗔怪道。

"我不是取笑你，我是敬佩你，真的！"阮啸仙接着说，"封建礼教是迫害女子的罪魁祸首，我们青年，就要敢于冲破封建礼教，去争取自主的婚姻！"

在陈独秀等人影响下，这段时间里，阮啸仙不但反复研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等经典著作，还阅读了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的文艺作品，尤其喜爱苏俄小说。于是他萌发了用文艺的形式来进行革命宣传的想法。

高恬波离开后，她不幸的婚姻经历，一直在阮啸仙脑子里打转。中国妇女这种毫无自由、遭人摆弄的婚姻，令阮啸仙百感交集。对！应该拿起自己的笔，像郁达夫他们那样，用文学的形式，把封建礼教迫害女子的罪恶予以揭露！

当天晚上，阮啸仙一口气写了一篇纪实体小说，取名为《一个奋斗的女子》。此篇小说，阮啸仙以高恬波为原型，以"五四"广州学生运动为背景，用"我"第一人称，塑造了"产科医学生"、"学生联合会职员"钦道追求婚姻自主的艺术典型，形象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精神及肉体摧残的罪恶，热情赞颂了勇于反抗、追求幸福、争取婚姻自主的精神。

这篇小说，是阮啸仙诸多著述中唯一的一篇小说体文章，也是他采取文艺表现形式作为宣传手段的初次尝试。

第二天，阮啸仙把这篇小说给了刘尔崧、周其鉴等同学征求意见。大家都说，利用文艺作品，进行革命宣传，是一个好办法。并建议把它搬上舞台，让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年更容易接受革命道理。

当时，社会主义思潮在广东开始广泛传播，但新文学运动的新风却没有大规模地吹入广州文坛，官办的报纸杂志还充斥着旧文学陈腐霉烂的气息。此时，阮啸仙与刘尔崧等人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宣传新思想、新思潮的活跃分子，并以所就读的“甲工”学校为舞台，组织学校进步学生，开展了轰动一时的要求读书、整顿校务、改造学校、驱除校长的著名学潮，开始了“改造社会”的大胆尝试。从改造社会的政治需要出发，以文艺形式宣传革命，达到教育群众为目的，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阮啸仙接受了刘尔崧等人的提议，当天就开始构思创作。花了近两天时间，他又创作了一幕六场话剧，取名《爱情是什么?》

在这个剧本中，阮啸仙更多地致力于揭露社会问题。他把妇女争取婚姻自主的斗争与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结合起来，分析了个人婚姻悲剧的社会原因，并以剧中主人公的口吻，号召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团结起来斗争。

阮啸仙采用小说、戏剧等文艺形式作为宣传革命的手段，用最容易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方式描写现实生活和斗争，在广东新文学史上无疑是一个创举。1922年春，阮啸仙与张善铭、周其鉴又发起筹办了《工业杂志》，《一个奋斗的女子》、《爱情是什么?》同时发表在该刊创刊号上，引起广大青年的强烈共鸣。高恬波专门跑到“甲工”，向阮啸仙要了几十本《工业杂志》，带回妇孺产科学校，分发给各班组同学，大家纷纷争相传阅。

高恬波想不到，自己不幸的婚姻，竟促成了阮啸仙几篇大作的问世。

## 情牵众农友

1923年6月，党的“三大”在广州召开，阮啸仙和谭平山、刘尔崧、冯菊坡四人代表广东党组织出席了大会。大会决定我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阮啸仙与到会的多数代表，积极支持这一正确主张。

大会以后，阮啸仙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并受共产党的委托，在广州地区协助孙中山做好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被任命为国民党临时区党部执委会常委。为搞好改组宣传工作，阮啸仙起草宣传大纲，组织演讲队，发动党员、群众登记入党。他还积极协助委员会建立了会议制度，实行各种会议、决议执行情况检验报告等措施。孙中山对此很赏识，认为这是国民党未曾有过的好办法，值得提倡推广。

不久，阮啸仙调任广东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这年冬天，阮啸仙受党的

委派，赴花县开展农民运动。

阮啸仙到花县后，走村串户，足迹遍及全县各村。他首先团结教育了农村中苦大仇深的几户贫雇农，然后经过他们去广泛宣传发动群众。此外，他还经常利用两龙、平山等圩的圩日，上街公开揭露地主豪绅勾结贪官污吏、土匪恶霸盘剥农民的罪行，号召农民组织起来与他们作斗争。当时，他正身患肺病，但毫不顾惜自己，仍废寝忘食地深入到各村庄做工作。每到一村，必与群众同吃同劳动，同时向农民讲解成立农会的宗旨，发动农民组织起来。农民也把他当作知心朋友，常跟他拉家常。

一次，阮啸仙到元田村了解农民运动开展情况，忙完工作已是深夜了。时值盛夏，蚊虫特多。为了不打搅农民百姓，他坚持睡在乡村小学的书桌上，连蚊帐也没有。一个叫卢启辉的农民看见了，十分心疼："阮同志是我们自己人，是替我们穷苦百姓办事的大好人，怎好让他任蚊咬，我宁可坐到天亮，也要将蚊帐给他。"于是，他回家把自己家仅有的一顶蚊帐，送来给阮啸仙挂上……

在阮啸仙等人的积极帮助下，农会的影响很快深入人心。

1924 年 10 月 19 日，花县农民协会暨二区农民协会宣告成立。全县各地农协会员，从四面八方，兴高采烈地来到九湖的"显承堂"，欢天喜地地庆祝县农民协会的光荣诞生。

庆祝大会，气氛热烈。会场周围，贴满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工农团结万岁！"等标语。

阮啸仙结合会议内容和重点工作，亲自在会场门口编写了一副对联：

坚忍卓绝为吾人本色，
奋斗牺牲是我辈精神。

在阮啸仙等人的直接领导和热情帮助下，花县各地的农民协会逐步建立起来。

这次会议后，农协会员把这副对联带到四面八方，大大促进了各地农民协会的蓬勃发展。

当地的豪绅和地主，对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恨之入骨。他们组成"田土地权维持会"，用种种办法与农协相对抗。

针对此种情况，阮啸仙走村串户，到处向农民群众宣传农会的作用，号召农民组织起来，与地主豪绅们作坚决斗争。他说："地主的阴谋，说明我们的拳头已对准敌人，说明敌人已怕我们，因而妄想瓦解我们的力量。如果我们趁着敌人恐慌的时期，进一步把拳头打下去，我们必然获得更大的胜利。"讲话中，他还反复以"锄头不拿起，世人皆饿死；拿起锄头来，饿死了地主"的话，教育启发

农民起来同地主、豪绅斗争。

阮啸仙的讲话，极大鼓舞了农民的斗志，把花县农运推向高潮。此后，农民对阮啸仙也更加尊敬爱护，视为知己。

## 患难夫妻情

1924 年国共两党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后，阮啸仙积极协助孙中山进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并被任命为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执委委员、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组织干事，与彭湃、毛泽东等人一起，积极筹备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各项开办工作。

阮啸仙身兼数职，工作异常繁忙。由于过度劳累，他得了哮喘疾病，身体十分虚弱。1925 年 1 月，阮啸仙担任了第三届广州农讲所主任，是他工作最紧张的时候。他每天既要给学员们讲政治、讲时事、讲农民问题，又要对学员进行军事操练。学员每日半天上课，半天训练，晚上开会，他都要参加检查督导。

尽管工作繁忙，阮啸仙还是时时牵挂着远在河源乡下的父母妻儿。这年的下半年，阮啸仙拍了一封电报，要妻子到广州团聚。

徐琼荷接电报后，带着 5 岁多的儿子阮乃纲，从河源中山码头坐船，几经周折到了广州。阮啸仙将妻儿安排住在广州仰忠街兰畹（即现在的北京南路高第街尾）。

这是一栋三层楼房。楼下有一小杂院，院口有两扇铁栅栏，大门外有几家小杂铺。为防意外，阮啸仙全家住在三楼。

此时，阮啸仙的哮喘疾已很严重，遇到阴雨天，情况则更厉害，好几次还咳出一大堆血。徐琼荷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她曾试着用草药熬汤，硬“逼”丈夫喝过，但不见效；也请过郎中来家诊治，病情还是时好时坏。看着日渐消瘦的丈夫，徐琼荷心痛得直掉泪……

徐琼荷母子的到来，给了阮啸仙莫大的慰藉与快乐。阮啸仙经常早出晚归，但一有空就教儿子写毛笔字、拉风琴，最喜欢儿子为他捶背。阮乃纲也认为这是他与父亲“最快乐的事”。

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右派日益嚣张，到处派出密探，跟踪进步人士，预防“图谋不轨”。徐琼荷在兰畹住地，经常有人上楼探听，甚至深更半夜来敲门。

一天深夜 10 点多钟，两个带枪的特务，突然气势汹汹地来到兰畹阮啸仙住地，敲开房门。

此时，阮啸仙正好外出未归，只有徐琼荷母子俩在家。

“姓阮的在这里吗?”一个特务凶狠地问。

徐琼荷见来者不善，便一把将儿子阮乃纲拉到怀里，回答道：“这里没有姓

阮的，你们找错门了！”

“这不是阮啸仙的住房吗？”另一个特务转向孩子，厉声喝问道。

“你们别吓着我的孩子！”徐琼荷紧紧搂着阮乃纲，沉着机智地回答道，“我不知道什么姓阮（圆）姓扁的，这是我们徐家的房子！”

特务们呆了一会，没发生要找的人，嘀咕了一阵，便灰溜溜地走了。

徐琼荷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便叫儿子一个人留在家里看屋，自己悄悄地避开特务，独自走到街口偏僻处，等候丈夫归来。

当徐琼荷把家里刚才发生的情况告诉丈夫后，阮啸仙也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绕路到别处躲避去了。

几天后，为预防万一，阮啸仙把住地迁至兰畹七号二楼。出于安全考虑，阮啸仙嘱咐徐琼荷：“外面形势很严峻，我们对外不能以夫妻相称。”接着，阮啸仙告诉徐琼荷，以后见到外人，孩子叫父亲改称“三叔”，叫母亲徐琼荷改称“奶娘”。

再后来，国民党悍然发动了所谓“清党运动”，到处处于白色恐怖之中。为了不暴露身份，当时由党组织雇请来帮忙处理家务的工友，最多不超过一个月也要换人。阮啸仙几乎白天不在家，徐琼荷每天都在为丈夫的安全担忧，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面对这种状况，徐琼荷意识到，自己和孩子已成了丈夫的包袱。为了使丈夫安心工作，使他摆脱家庭的羁绊，徐琼荷决定带儿子回河源老家。考虑到当时形势的严峻，阮啸仙只好同意他们母子暂时回河源乡下。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反革命政变。4 月 15 日，广东的国民党反动派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也在广州出动大批军警，解除黄埔军校、罢工工人纠察武装，包围和查封各种革命团体及组织，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阮啸仙成了南京国民党中央执监联席会议通缉的 179 名共产党主要干部之一。广州全城，血雨腥风，一派肃杀气氛。

此时，广东党组织已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各地也因搜捕甚严，联络十分困难。为保存革命力量，经党组织研究决定，广州区委暂时秘密迁往香港，阮啸仙与冯菊坡、周文雍等留在广州，化整为零，继续秘密领导和部署广州的地下斗争。直到翌年春，阮啸仙奉命秘密转移到香港，参加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工作，被安排住在鹅颈桥一个很不惹人注意的地方。

到香港后，阮啸仙深知时局的严峻，与妻子见面的机会可能少得多。于是，他用花名抽空给远在河源老家的妻儿写了一封信，要他俩接信后立即到香港团聚。

徐琼荷接信后，立即收拾行李，带上儿子，水陆兼程，赶往香港。此时，阮乃纲已经 8 岁了，得悉又能再次见到分别两年多的父亲，真是高兴极了。

始料不及的是，国民党的魔爪已从广州伸到了香港。在港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关的关、杀的杀。就在徐琼荷母子俩风尘仆仆赶到香港时，阮啸仙接到党组织的指示，与其他在港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已经在一个星期前，就秘密紧急转移到了上海！

在人生地疏的香港，徐琼荷母子俩陷入了两难境地。回去吧，路费盘缠全部用完；不回去吧，住哪里？特别是阮乃纲，满怀希望地认为马上又要与父亲在一起了，听到此消息后，犹如一盆冷水浇头，不免顿生怨气。

好在徐琼荷沉着冷静。她在十分理解丈夫处境的同时，马上想起了丈夫的朋友有一个妹妹在香港工作。于是，徐琼荷带着阮乃纲，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这位“妹妹”住处，并被安顿住了下来。

不久，徐琼荷带着孩子回到了河源老家。从此，徐琼荷母子俩与阮啸仙天各一方，再也未曾谋面。

在以后的几年里，阮啸仙曾通过不同的花名和方式，给徐琼荷写过几封信，嘱咐她要“注意安全，保重身体，带好小孩”，并鼓励妻子，不论遇到什么情况，要坚强地活下去，坚信革命一定会成功！

## 信念坚如磐

1932 年 1 月底，阮啸仙的叔叔阮镜波，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的来信。这封信，是阮啸仙于 1931 年 12 月 27 日，写给镜波叔和几位兄长的。在信中，阮啸仙急切请求筹集钱款，以便帮助“寻找本行”！

原来，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的阮啸仙，在赴沈阳指导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中共满洲省委遭敌破坏，党的一批重要干部被捕。阮啸仙幸而走脱，并于 1931 年 12 月初，扶病抵达上海。意想不到的是，中共在上海的机关也遭敌破坏，阮啸仙因而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几天以后，他外出寻访党中央机关时，哮喘病发，倒于路上，不省人事。幸遇路人帮忙，被送海格路红十字医院，直至第二天才脱离危险。

此时，阮啸仙贫病交加，身无分文，可以说已到了山穷水尽、穷困潦倒的境地。望着上海城的万家灯火，他不禁想起了在家乡含辛茹苦、敬老扶幼的妻子，想起了千里远隔的父老兄弟及几年未曾谋面的儿子，想起了自己艰险重重、四处漂泊的艰难一生……于是，阮啸仙向家乡亲友写了一封请求救济的信。在信的开头，他详细叙述了自己沈阳脱险、扶病抵沪的情况，并暗示目前自己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艰险处境。接着，他表示了要继续寻找党组织的坚定决心。

家乡亲友收信后，立即分头筹款。此事被徐琼荷知道了，她也悄悄变卖了娘家给自己陪嫁的几件首饰，并把平时省吃俭用攒下的一点积蓄也交了出来。

阮啸仙收到家中汇款后，立即谢别了热心资助他在上海食住的朋友，继续四处秘密打听党组织的下落。直到1932年，阮啸仙才与党中央机关取得联系，并被调任全国互济总会救援部长。

对家乡亲人的慷慨解囊，阮啸仙十分感激。尤其是对妻子的深情厚谊，对儿子的“不尽职”，他更感到愧疚不已。为了革命事业，他长期居无定所，四处在外奔波，对妻儿父母照顾很少，甚至不知道儿子的年龄。在1933年3月收到已是13岁的儿子写来的第一封信时，他回信说自己是“对于自己儿子不相关的父亲”，心里觉得很“难为情”，希望儿子不要怨恨他。



阮啸仙故居东源县义合镇下屯村（陈雷刚摄）

饱含着对儿子的舐犊深情，对妻子的无限思恋，以及对父母、弟妹和家乡亲友们的牵挂，阮啸仙只能通过一封封家书，传递着牵肠挂肚的叮咛嘱托，展示了一个革命者“舍小家、为大家”的革命情怀与铁骨柔情。

阮啸仙在1935年3月率领赣南省党政机关及部队突围时，不幸壮烈牺牲。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的陈毅，在安全突围到达油山后，惊悉阮啸仙和中央苏区总政治部主任贺昌先后牺牲的噩耗，含泪写下了一首感人肺腑的诗篇——《哭阮贺》：

最近同志中，阮贺足称贤。
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
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
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全。

诗中“阮誉传岭表”，“审计呕心血”等句，正是阮啸仙革命一生的真实写照。

2009年，阮啸仙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这是党和人民对阮啸仙革命的一生的最高评价。

（陈其明）

# 萧楚女

## “工农兵中传播马列主义的标兵”

萧楚女，原名萧秋，1893 年 4 月出生在湖北汉阳鹦鹉洲一个破产的木材商家里。1911 年参加武昌起义，在战斗中被炮声震聋了一只耳朵。1920 年 2 月，参加恽代英组织的利群书社，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书籍，一年多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 年初萧楚女来到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干事兼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教授，并协助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编辑《政治周报》，同时在广东大学兼课。2 月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3 月参加筹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任专职教员，并先后兼任工、青、妇、华侨各领导机构举办的各种讲习所、训练班及黄埔军校的讲师。由于积劳成疾，萧楚女身患严重肺病。1927 年 4 月 15 日，在广州的反革命大屠杀中被从医院病床拖走逮捕，4 月 22 日被害。

萧楚女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杰出宣传家、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周恩来在给学生做的一次报告会上曾说：“萧楚女同志原是一个下层劳动者，经过勤奋学习和长期的革命锻炼，而成为当今在工农兵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标兵。”毛泽东也称赞萧

楚女能写得很漂亮的文章，并说："我是很喜欢他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教书主要靠他。"

## 与沈雁冰的第一次见面



萧楚女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1926 年 1 月下旬的一天，出席大会的代表沈雁冰来到东山。他是受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的派遣，去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报到，就任宣传部秘书职务的。

东山是别墅区，有很多豪华的洋楼。蒋介石就住在一所洋楼里，以鲍罗廷为首的苏联顾问团也住在附近的洋楼里，但毛泽东寓所却是一所普通的中式楼房。几天前，萧楚女入住到了这里。他是本月初受党组织委派到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检阅干事，并协助毛泽东编辑《政治周报》。

毛泽东领沈雁冰到楼下。这里用板壁隔成了里外间。外间已经住着一个人，只见此人黑黑的脸庞上，浓眉大眼，嘴唇宽厚而线条优美，显得敏感而富于热情。毛泽东介绍道：这就是萧楚女。沈雁冰与萧楚女同为中共早期杰出的宣传家，相互早已神交。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大家都毫不拘谨。萧楚女很热情又诙谐，他指着室中一架挂着蚊帐的单人木板床，对沈雁冰说："这是留给你的，我陪伴你。"李商隐诗云："帷飘白玉堂，簟卷碧牙床。楚女当时意，萧萧发彩凉。"黑脸汉子显然是调侃地自比神女，而把文学家比做云雨巫山的楚襄王了。三人都会心、欢快地笑了起来。

因为还有些《政治周报》的问题要商量，他们一起上了二楼会客室。所谓的会客室只是一堵未到顶的板壁隔成的外间，布置成会客室的模样。里间是毛泽东和家眷的卧室。待坐下后，主妇杨开慧出来准备给大家倒茶，萧楚女立马说："这茶嘛，我来倒。我这个茶博士资格蛮老哩！"说着，手执茶壶远远地一倾，茶水注入杯中，将满时略一抬手，好似打了一个句号，茶水盈而不溢。

第一次见面，萧楚女就给沈雁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半个世纪以后，沈雁冰还在回忆录中清晰地记下了这一幕。

## 为什么参加革命

1926 年 5 月 3 日，由毛泽东担任所长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了，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区的三百多名学员聚集一堂。萧楚女是讲习所唯一的专职教员，

他协助毛泽东分担了全所的领导工作。他不仅承担了“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等课程，还兼任了学员的生活指导。毛泽东对学员们说：“你们在学习中有什么疑难问题，生活上有什么思想问题，都尽管去找萧先生！”

有一个叫舒国藩的江西籍学员，为一个问题苦苦思索了好多天找不到答案，他就跑去问萧楚女。原来在入学时，毛所长问他为什么参加革命，他回答说：“我家很穷。我在工业校读书，三元的伙食费也缴不起。父亲没有办法，只得去当马褂，好歹敷衍一二个月。我还得借债。债主来讨债，同学们就把我藏在帐子里……总之，我太穷了，所以参加革命。”毛所长笑道：“你说的也对，但是不全对。”

讲完了事情的由来，舒国藩问道：“萧先生，我想了好久，还是不知道错在哪里。所以向您请教。”

萧楚女看着这个18岁的前工业校学生，笑了，亲切地回答说：“依我看，毛所长的话对。穷人，工农大众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穷得活不下去，只有起来革命，推翻剥削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完成国民革命。所以工农大众是革命的基本力量，革命只有依靠他们才能取得胜利。作为一个革命者，一个要启发工农大众的阶级觉悟，领导他们起来革命的人，仅仅因为家里穷才参加革命，就远远不够。穷才参加革命，一旦不穷了，是不是就要退出革命呢？马克思家里穷不穷？不穷。列宁家里也不穷。恩格斯家更有钱，他父亲是大资本家。而且他们都受过很高的教育，要在社会上找一个清高的职位，比方说大学教授，过舒舒服服的生活，是很容易的。为什么他们不那样做，而是参加了革命？这是什么原因呢？”小伙子结结巴巴地答不上话。

“那是因为他们深切地同情过着牛马一样痛苦生活的工农大众。恩格斯就考察过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他亲眼看见了英国工人生活在人间地狱里……”

萧楚女站起身，在屋里来回踱步，过后在舒国藩面前站定，眼里闪着炽烈的光：“这种热烈的爱和同情，就是他们抛弃荣华富贵的生活，而选择了艰难、危险的革命道路的第一个原因。这种对工农大众的爱和对人间地狱制造者的恨，可以说是他们参加革命的感情基础。但是，作为一个革命者，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单有感情还不行，还必须有理智。对社会，对世界，乃至对宇宙，要有一个唯物的社会观、世界观，用以指导我们的行动。这就好比航海必须有罗盘一样。什么学说、什么主义能作为我们革命的罗盘呢？只有马克思主义。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必须懂得马克思主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定，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那就应该努力奋斗，促其实现。所以，归根结蒂是一个信仰问题，世界观问题。现在，你明白，因为家里穷才参加革命是不够了吧？”

舒国藩高兴地点头说：“嗯，我明白了！”

## 感人的蜡烛人生观

繁重的工作，紧张的生活，使萧楚女身体日益消瘦，肺病终于发作了。有一次，他在农讲所讲课时，讲到6月23日英法帝国主义在广州沙面租界用大炮轰击游行到沙基的广大徒手群众，使用开花炮弹大量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时，由于心情激愤，突然吐血了。学生们又焦急又难过，搬来椅子请他坐下，给他递上一杯热开水，劝他休息。他喝了一口开水后，用嘶哑的嗓音慢慢说道："你们劝我休息，谢谢同学们的关怀。但是，你们负有重大使命，在这里学习的时间不会很长，总希望多学点东西，回去发挥更大的作用。各省的农民运动，等着你们去开展。我能够回去安心休息吗？"萧楚女决然地摇了摇头，他继续说："人是应该利他的。做人要像火，给人以光明，以温暖。一个人的能力有限，至少也应该像一支蜡烛，在黑暗中照耀别人。一支蜡烛如果没有风吹，可以多亮些时间，若是遇到风吹，就要缩短照亮的时间了。但是在熄灭以前，应该努力发光。我们都要有这种精神！"说完又以惊人的毅力，精神抖擞地给学生继续讲课。由于课堂里没有扩音器，为使300多人都能听到，他竭力提高嗓音讲课，结果又气喘咳嗽，再次咳出了殷红的鲜血。为了不影响同学们听课情绪，他悄悄地将咳出的血吐在手帕里。后来随着病情越来越重，他的手帕都被血浸透了。学生们看到萧楚女为革命呕心沥血的高尚品德，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下课回来，萧楚女坐在西院天井的藤椅上，很久都换不气来。学员们派代表去看望他。他们看见萧先生穿着衬衣坐在藤椅上，西装裤的背带离开他的前胸，犹如弓上的弦。学员们眼眶发热，劝说萧先生今后好好休息，别去上课。萧楚女爽朗地笑了："你们放心，我的病还没有到不能上课的程度。莫像绣房小姐，多愁善感。好好学习去吧！"

萧楚女这种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是一贯的。早在1924年间，他便曾说过："人（生）的意义之表现，究竟要怎么样呢？这，就莫过于诸葛亮所说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两句话恰当了"。"古今中外的伟人、哲士、贤者、英雄"，"哪一个不是把自身做成一支蜡烛，点起'为他'的爱之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让他蜡尽成灰完事？"这就是他著名的蜡烛人生观。

## 萧楚女照镜子

在广州农讲所里，萧楚女是毛泽东最欣赏的教员和最得力的助手。这个从未进过学校门、在茶馆里当跑堂出身的人，是怎样成为能说善写的优秀革命家的呢？萧楚女曾经对农讲所的学员们说："我们搞农民运动要学好革命的理论，还

要学会演说、写文章，困难是很多的，但如果我们不怕困难，勤学苦练，就一定能做到。”这实际上是他的经验之谈。

萧楚女在重庆国立第二女子师范教书的时候，因为初次当上教员，尽管备课非常认真，但还是担心上不好课。怎么办呢？只有一条路——下苦功练。于是，每天天刚拂晓，他就跑到山上来，找个僻静的地方，掏出一面小镜子挂在树枝上，独个儿对着镜子练习演讲。天大亮了，朝霞映红了大地。镜子里清晰地映出萧楚女的脸形。只见他对着镜子反复讲着，仔细观察自己的表情和动作是不是表达了演讲的内容，能不能引起学生听讲的兴趣。就这样练呀，练呀，天天如此，风雨无间。很快地，萧楚女的演讲水平就有了显著提高。

在云集广州的各界名流中间，萧楚女的演说艺术是出类拔萃的。沈雁冰说“楚女之演讲，有如进军鼓角”，“纵谈沉酣时，每目嗔而脸歪，口沫四溅，激昂凄厉，慑震四座”。每逢集会，那些怀着仰慕心或好奇心的青年们总是急切地打听：“萧先生来了没有？”

## 平生第一窘事

第六届农讲所于 1926 年 9 月结业后，党派萧楚女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在黄埔军校任专职政治教官期间，只要萧楚女演讲，操场上必定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满学员，他总是不得不提高嗓门。有一次发生了一件过后好笑但当时极其窘迫的事情。

因为听课的学生达到二三千人，大礼堂容纳不下，于是转移到操场上。由于当时没有扩音设备，萧楚女几乎是边喊边讲。他原本是粗嗓门，声音够洪亮，但是后排的学生唯恐听漏了萧教官的话，一再叫嚷“再大点儿声！”萧楚女略停了片刻，吸口气，运足了劲，把声音提到最大限度……突然，“嘣”的一声，他只觉腰间陡然一松，裤带崩断了。他急忙按住了裤子。台下的人都聚精会神地听讲，丝毫没有察觉到他的窘迫。可怜的萧教官只得一手护腰，一手挥臂，连汗也顾不上擦了，好歹讲完了 90 分钟的课。

事后，他对朋友说：“此为平生第一窘事。”此后，他再也不使用腰带，改用了保险系数更大的背带。

## 不能照相

黄埔军校的教官楼是一栋浅黄色的两层楼房，坐落在黄埔岛北边，紧傍着珠江。这里原先是海关所在，所以人们习惯地称之为“海关楼”。恽代英、萧楚女、张秋人等政治教官就住在这里。学生总队第一总队和第二总队的政治指导员李元

杰和毛泽覃也住在这里。

皮武装带、皮绑腿、皮鞋、皮包、皮鞭，当时人称“五皮主义”。三民主义的信仰加上“五皮主义”的装扮，再时髦不过了。进步青年李元杰虽然鄙弃这种装扮，但他也还是没有摆脱年轻人的爱美心与虚荣心。一天，他在关东买了个银框相架，放进自己的戎装相，摆在宿舍的书桌上，心里美滋滋的。刚好代英和楚女进来了。

“哟，抖起来啦！”楚女一眼就看见了这尊自我陶醉的偶像。

“还用银框哩！”代英皱起了眉头。

“你怕别人不晓得你的尊容吗？”楚女又尖刻地补充一句。

年轻人一下子神情尴尬，不知所措。

代英的口气缓和下来：“当然年轻人嘛，照张相片，用个银框，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你把它摆在桌上，却忘记了我们今天的处境，周围有敌人哪！甚至在这个海关楼上就有。万一被他们弄去，一旦有事，不正好按图捉拿吗？”

李元杰满脸通红，扫兴地收起了相片。代英向他要过代收的书信、期刊，转身走出屋子。楚女忍不住放声大笑，好像看了一场令人绝倒的喜剧。

年轻人回过神来，反唇相讥：“你才是‘尊容’哩！你不能照相，你眼红！”

“眼红不如你的脸红。有什么不能照相，不就是麻子吗？若非天公之爱我，为何脸上打连圈？老弟，把你的偶像好好收起来吧。等功成名就，天下太平之日好挂到凌烟阁上去呀！”

“背时的‘嚼精儿’！”李元杰斗不过他，把当年泸州的同学们给楚女取得绰号当盾牌使了。

## 革命与恋爱的关系

到黄埔军校学习的学生，多数是为了追求进步，寻求革命道路而来的，但也有不少人却是为了升官发财而到军校的。入学动机不纯的人，往往醉心于“谋参事”，望着什么“尉”“校”的官阶而垂涎，或沉湎于恋爱，弄得神魂不定，寝食不安，早已把“筑城”“地形”“放哨”“守卫”等知识技能抛之脑后了。为此，军校政治部请萧楚女出来帮助学生正确认识与处理革命与恋爱的关系问题。

萧教官本来是不想发表什么意见的，他很坦率地说：“因为我已是过三十岁的人，一来怕人家说我不知趣（这是一个青年的问题），二来自己也着实不感兴趣”，但考虑到好些学生确实因为这些问题处理不好，进而影响到革命工作与学习时，便毅然挺身而出。他撰写了《黄埔学生之恋爱与革命问题》一文，阐述革命与恋爱的正确关系，指出在私有制的社会里，剥削阶级视女人为玩物，老婆就是他的洗脚水，泼了一盆又一盆。有的富有者常有十个八个姨太太，无所谓恋

爱。无产阶级则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死且不暇，更何有于所谓恋爱。我们黄埔学生每日三餐，吃的是人民用血和汗换来的，却沉迷于恋爱，把革命理想抛到九霄云外，又怎能对得起在东征、南讨和北伐诸役中阵亡的同学呢？“我们既来革命”，就“应该以革命为圆心”，决不能“以恋爱为圆心向外画弧，把革命去做恋爱的牺牲品。”他还自嘲说：“我这个人虽然被人家叫为‘好人’，却是‘缺点’太多，也不配讲恋爱——所以只好让青年们去‘各言尔志’，我自己只是‘默尔而息’！”

一些学生看了文章后，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一名叫董树礼的学生写了《读了〈黄埔学生之恋爱与革命问题〉以后》一文，说：“萧教官底那篇文章，引起我不少的感慨，我看了那篇文章以后想到……已经为中国的自由平等而死去的同学，又怎样希望我们继续他们未了的工作，醉心恋爱的同志们未免太堕落了吧。”萧楚女看后觉得董树礼的文章对革命与恋爱问题的分析还不够全面，在发表此文同时，加上了按语，指出：“董同志此文，似乎在主张‘非礼勿视’的禁欲主义”。他在按语中还论述了正确处理革命与恋爱问题的重要性，要求每个革命者既不应该恋爱至上，也不应是禁欲主义者，更不能视正当地谈恋爱的人是“堕落”。

## 烈士的桂冠



位于昭和小学的萧楚女生平展厅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解散上海总工会等革命团体，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装，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4日晚广州全城戒严。15日凌晨，国民党反动派开始进行反革命大屠杀，搜查工农革命团体，逮捕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当他们杀气腾腾地冲进东山医院病房时，萧楚女笑了，对他们讲道：“我是个病得要死的人了，难为你们赠送一顶烈士的桂冠。不胜荣幸之至！”

4月22日夜，敌人将关押在广州市公安局内的萧楚女等一批共产党人和关在南关戏院的革命者，押解到天字码头，用两艘军舰载往南石头惩戒场监狱。蒋介石电令秘密处决萧楚女等人。广州反动当局因害怕群众暴动，赶紧增派军队防守，并立即下令驻扎在南海县盐埗圩的第四军补充团第一营营长周东（又名周弼

夫），率领一连士兵，赶往南石头监狱警戒。同时白鹅潭上的国民党军舰也升火游弋待命。经过一番周密准备之后，萧楚女同其他40多名革命同志被押往刑场。负责行刑的国民党营长周东狡黠地对他说："萧教官，你这根蜡烛快要熄灭了，在这生死一瞬间，你愿意悔改吗？"萧楚女以锋利的目光盯住这个屠夫，说："你们杀吧！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不怕死的，共产主义运动是镇压不了的。总有一天，人民会审判你们这班狗豺狼！"接着他和其他同志一起高呼"打倒国民党！""民族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罪恶的枪声响了，萧楚女等40多名共产党员、革命者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血洒珠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魏雅丽）

# 董必武

## “我的作用就是坐在那儿！”

董必武是中共著名的“五老”之一，在党内享有崇高的威望，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尊称他为“董老”。上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董必武因病与广东结下不解之缘。而这几年，正是林彪、“四人帮”祸国殃民最猖獗的时候。这位耄耋老人一边承受打击，一边以独特的方式抵制和抗争，其豁达、正直和朴诚勇毅的高尚品质，给广东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第一次打击：次子离奇入狱

1966年“文革”爆发时，董必武已经81岁，身患冠心病、肺气肿、糖尿病等多种疾病。广州的冬天不太冷，适合治疗和休养。每年冬季，董老都会到广州住上一段时间，翌年五一前后才返回北京。这年的冬季，他照例又来到了广州。

当时，政治风暴已席卷全国。从北方不断传来令董老震惊的消息——许多曾经同生死共患难的老战友、老朋友被打成了



董必武

叛徒、反革命！董老对他们的安危很是牵挂，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无限忧虑，然而却束手无策。当时董老虽然还挂着国家副主席的头衔，但已不再做具体工作，在政治上没有话语权。因为德高望重，且年老体弱、无权可夺，所以没有被打倒。然而，困惑和忧虑无时不在煎熬着这位一生倡导“朴诚勇毅”的老人，他时常独坐一隅，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

打击终究还是降临了。

1966 年 12 月中旬，董老忽然接到从北京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是中央叫他通知次子董良翮立即到公安部门投案自首。什么原因？没有人向他解释。

董老革命大半辈子，经历过无数惊涛骇浪。知道自己 60 岁才有的这个心爱的儿子出事时，他异常镇定，叮嘱夫人何芝莲说：“打电话回家，叫良翮按中央的要求去投案自首。”董老耳朵有点背，打电话和接听电话一般都由夫人或秘书代劳。

接电话的是女儿董良翚。良翚一听就懵了，弟弟天天和自己呆在一起，并没有发现他做过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啊！她十分震惊和不解。何芝莲的心情和女儿是一样的，但又能怎样呢？她又急又难过，话语便显得有点口吃：“陪……陪弟弟一起去，一……一定要听话，去吧。”

良翚是懂事的孩子，第二天一早，便“押”着弟弟良翮投案自首去了。投的什么案，他们也是稀里糊涂。

姐弟俩骑着自行车，来到公安部。没人搭理他们，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说话的人，两人只好到市公安局试一试。

到了市公安局门口，恰遇红卫兵围攻公安局。一大群臂戴红袖章的学生高呼着“砸烂公检法”的口号，使劲往里冲，公安战士手挽手、肩并肩，死死把守在大门前。姐弟俩被汹涌的人流挤在当中，显得有些不知所措。这时，一个穿干警服装的人挤到他们身边，轻声问道：“你们怎么也来了？”原来这个警察曾在中南海做警卫战士，认识姐弟俩。良翚说“中央叫我弟弟来投案”。他听了很吃惊，连问了两个问题：“你们家搬了吗？”“家里电话撤了吗？”得到否定的答案后，这个警察有些困惑，因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说明董必武被打倒了，子女变成“狗崽仔”就很正常。见这对仍属“红五类”的姐弟俩执意要投案，他犹豫了一下，帮他们走了一个“后门”，把他们带到一个四十多岁的警察面前做笔录。做笔录的警察听了仍在读高中的良翮坦白交代所有“罪行”后，大惑不解，因为良翮虽然参加了一些造反活动，但似乎还没有违法，于是警察把他们打发走了。

姐弟俩一回到家，立即打长途电话到广州向父母报告情况。妈妈长舒了一口

气说："好嘛。"到了晚上，董老忽然请秘书打来电话，说良翮必须再去投案。姐弟俩很诧异，将投案的情况又仔仔细细地说了一次。秘书过了一会儿再次打来电话，叫姐弟俩将投案过程报告周恩来总理值班室备案。

半个多月过去了，良翮平安无事。董老和家人都以为这只是一个误会。然而在1967年1月4日，良翮还是被捕入狱了，仍然没有人对董老作出任何解释。

3月5日，董老在广州迎来了82岁生日。往年的这个时候，三个子女都会赶来，全家其乐融融聚在一起，倘若有谁来不了，也会及时寄上一首小诗、一个小礼物之类的表示心意。这一年，因爱子入狱，董老的生日过得极为寡淡冷清。

良翮被关了半年后放了出来。他想不通为何入狱，心中异常苦闷，便开始学抽烟。有一天，他正抽着烟，被突然进门的父亲发现了，吓得手足无措，因为父亲反对抽烟是全家上下都知道的事情。有一次堂叔抽烟时见父亲来了，连忙把烟拢在手心，缩入衣袖，结果烟头把手心烫出了一个水泡。良翮以为这一次必定会遭到父亲严厉的批评，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父亲只是深深地看了他两眼，叹了一口气走开了。

## 第二次打击：次子再次无端入狱

1968年3月5日，董老在广州度过83岁生日。良翚和良翮提前到了广州陪伴他。良翮自出狱后一直呆在家里做"逍遥派"，不参加任何"革命行动"。

3月底，良翚和良翮一起坐火车返回北京。在火车上，有两个男子如影随形，粗心的良翮当时并未多想。火车刚一到站，两个男子突然亮出手铐，二话不说就把良翮铐上，迅速将他押下车，塞进早已停候在站台上的一辆小轿车绝尘而去。良翚和前来接车的哥哥良羽，还有弟弟的女朋友云云，看着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得目瞪口呆。等回过神来时，他们知道良翮又被捕了。

要不要将这个坏消息告诉年迈多病的父亲？他能再次承受打击吗？三人内心很纠结，连公共汽车也没心情坐了，三人低着头，默默地走了很长的路回到家中。刚进家门，妈妈的电话打来了，三人同时冲到了电话机前。良羽是老大，他神情凝重地拿起话筒和妈妈说话，良翚和云云则把脑袋凑到话筒旁边。妈妈焦急地问："良翮还好吗？"良羽犹豫了一下，告诉了妈妈实情。妈妈长叹了一口气说："良翮他们走了一个多小时后，黄永胜司令员来找你爸爸单独谈了话。黄说中央命令逮捕良翮归案。原因不清楚。"又一个原因不清楚！而且逮捕时间掐算得那么精确——走了一个多小时后！那时良翮已在车上，车上没有电话，有人想通风报信也不可能了，瓮中捉鳖是肯定的。

次子接连两次被捕，对董老和夫人打击非常大。董老耳朵重听的毛病越发严重，步履也变得蹒跚起来。何莲芝在痛苦中也学会了抽烟，记性大不如前，性情

也变得焦虑烦躁，常为一些小事发脾气。每逢夫人伤心难过时，董老总是默默无语，仰着头，双手叉腰，在房内来回踱步。有时则开解夫人道："气什么？就算没生这个儿子嘛！这不就想开啦？"

董老其实早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已经让他预感到风雨终究会来临。

那是1967年初夏的一天，董老参加完中央的一个会议正准备回家，周恩来总理把他留住。"你女儿在北京吗？"总理轻声问董老。"在呀！"见日理万机的总理问起自己的女儿，董老觉得有些奇怪。总理小声告诉他："有人说，你女儿最近从叶向真手里接收了一支小手枪，枪是贺龙的。那人还说，贺龙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到你女儿那里拿枪，来暗杀主席的。"董老一听，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虽然他对自己的女儿非常了解，相信她不会做如此荒唐的事，但这里面竟然牵涉到贺龙和叶剑英的女儿，非同小可。他连忙与总理道别，匆匆赶回家中。

董老把良晕叫到屋里，用平常聊天的和缓语气问道："是不是贺老总给了你一把枪？""是的。""这枪是不是叶向真在'文化大革命'初交给你的？说是替贺老总收藏的？""不是！"董老如释重负般舒了一口气，叫女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说一遍。

原来，大约在十年前的夏天，良晕跟着哥哥良羽，和一群半大孩子一起去看望喜欢热闹的贺龙叔叔，那群孩子当中有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宁和女儿叶向真。男孩子们向贺龙要鸟枪玩，贺龙时任国家体委主任，对射击运动很支持，听说孩子们对射击有兴趣，自然一口答应。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去选择自己喜欢的鸟枪，只有良晕怯生生地站在一旁。贺龙见了，对旁边的一个人说："去把那支小手枪给女娃娃拿来！"良晕得到了贺龙送的一把小手枪，这手枪泛着蓝光，像玩具一样小巧精致。良晕兴奋不已，拿回家后请妈妈包裹好珍藏起来。毕竟是女孩子，对枪的兴趣不大，没过多久就把这支枪给忘到脑后了。

董老说：把枪找出来，交到警卫局。将事情的经过写个全面的材料，我看过后交总理办公室。

良晕在妈妈的帮助下，翻箱倒柜把小手枪找了出来。剥开层层包裹一看，手枪已完全锈蚀了，连枪栓都拉不开。也许正是因为这支手枪已锈成一块废铁，再加上有良晕的说明材料，才使得贺龙的"罪行"少了"谋杀主席"这一项，良晕也因此躲过一劫。

企图"一石三鸟"的人险恶用心未能得逞，自然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没过多久，董老家一间屋子的窗门离奇地被人从外面用木方条钉死了，董老一家只好搬出了中南海。

董老在广州的临时住所很简陋，但与北京的家一样，在客厅靠窗的位置摆放着一把躺椅，那是董老阅读的地方。只要坐在那儿，董老的手中一定拿着书报。

有一天，良翚看到父亲一声不响地坐在躺椅里，双手搁在扶手上，手中却没有书报，这是良翚没有见过的情形，便问父亲："爸爸，你在想什么?"董老长叹一口气说："无缘无故地抓人，就像给你弟弟这样的青年人背上插了一刀啊!"沉吟良久，董老又说："你弟弟是代我坐牢呀!"

良翚后来写文章说，弟弟被捕后，妈妈会突然打来电话，开口就问："良翚你没事吧?!"妈妈是担心魔掌会继续伸向女儿。良翚回忆说："林彪和'四人帮'整人，手段因人而异。对贺龙同志，捏造了'二月兵变'；对陈毅同志，搞了个'二月逆流'；对这批人用'叛徒集团'，对另一批人用'走资派'，真是名目繁多，花样百出。对我爸爸，因为无权可夺，于是对他老人家进行精神折磨。"其实，次子为何两次入狱，董老心中早就有了答案。

良翮第二次入狱关了半年多，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被放了出来。在狱中，他一直追问："我究竟犯了什么罪?"没人理他。直到释放前，才有人告诉他说："回去问你的爸爸!"他"享受"单间待遇，一两个月都没人跟他说一句话，毒打倒是有过几次，腰和手都受了伤，身心备受摧残。

出狱后父子相见，悲喜交集。董老只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回来了?!坐吧。"第二句是："究竟为什么抓你呢?"良翮一听，泪如雨下，说："我还以为你知道，结果你也不知道?!"董老看着眼前的儿子，久久说不出话来。

不久，全国掀起上山下乡热潮，董必武动员良翮下乡当农民。在儿女面前以"党的抹布"自诩的董老，向来要求孩子们做普通老百姓，要甘于"跑龙套"，不要老想着出人头地。良翮到了河北省晋县周头公社。他牢记父亲的教导，安心在农村养猪、种地。因表现出色，生产队党支部要发展他入党。董老知道后，由夫人出面提出了反对的两个理由：一是良翮下乡仅两年多，还得再考验一段时间；二是他曾两度入狱，原因不明，没弄清楚之前不宜入党。朴实的农村党员们坚持认为良翚符合党员条件，但为慎重起见，还是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了解情况，得到了有关证明材料。不久，良翮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身边的人都还不知道他是董必武的儿子。

## 以独特的方式抗争

尽管心情压抑，董老还是不顾个人安危，尽最大的努力保护那些和他共同战斗过的老同事、老战友。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被冠以"特务"、"叛徒"、"反革命"等罪行打倒了，有的被关进了监狱。董老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书写证明材料，努力帮助他们洗脱"罪名"，避免遭受更残酷的打击和迫害。"文革"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后来回忆："在这个时候呢，我被处分呀，被囚禁起来了，没有董老我可能就不好过去了。只要有些人来找我的麻烦，董老就站出来了，董

老就帮我。”

1969年春，董老从广州返回北京参加中共九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董必武特意要求在所属的党支部会议上讲党史，回顾并高度赞扬了毛泽东、朱德等许多老革命家的历史功绩，足足讲了三个半天。在当时老干部纷纷被怀疑、被打倒，政治形势极为险恶的形势下，董老做这种“不识时宜”之事，足见这位84岁的老人非同寻常的勇气和胆略。

这一年的10月，在“加强战备”的背景下，董必武夫妇和朱德夫妇被疏散到广东从化，两位老革命在广东携手度过了一段风雨飘摇的日子。

董必武和朱德同一年出生，董必武比朱德大9个月。两人性情爱好迥异，但关系十分融洽。董必武外表温和而性格倔强，朱德外表严肃而性格温和。据说两人在广东时，曾有过一次“斗嘴”。朱德喜动，每天拄着拐杖在住所四围溜达；董必武好静，总爱呆在房里看书、写诗、练字。朱德担心他的身体，对他说：老进士，生命在于运动，你不运动不行啊！董老呵呵一笑，不予理会。朱德见劝说无效，便用激将法。他说：你这样，肯定活不过我，看来我得给你送花圈了！董老依然笑笑，说：我练字，好比练气功，说不定你没我长寿呢！

董老给自己规定了每天的“运动量”：写寸楷字一百个。楷书方方正正、落落大方，与董老做人的原则非常一致，故最得他的钟爱。练字时，他总是全神贯注、一丝不苟，不写完一百个字不罢休。他要和朱德“较劲”，看谁活得好、活得长。

两人的“较劲”，其实在某种意义来说，对党和国家起着并不寻常的作用。因为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被写入党章。五名政治局常委中，有毛泽东、周恩来，另外三人分别为林彪、陈伯达、康生。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帮派中的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许多功勋卓著的革命家被排斥在外。在动乱的局势中，董必武、朱德等老革命依然坐着中央政治局的交椅，对稳定大局和安定人心多少起到一点作用，让人们看到了一些希望。两位老人健康地活着，对党和国家就是一种贡献。

董老的住所门前冷落，很少有人登门，只有朱德还时常来看看他。两人见面，更多的时候却是相对无言。一个说“来了?”另一个说“来了，看看你”。然后两人都坐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切尽在不言中。静静地坐上十来分钟或半个小时，一个站起来说“我走了”，拄着拐杖走了，另一个说“走好”，柱着拐杖送到门口，看不见了才回来。

有一次，董必武病重，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朱德来看他，他立即强打精神对朱德说：“我现在能吃饭了，是稀饭。”然后叫家人拿来稀饭，勉强吃了两口，见朱德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便又低头努力地再吃两口。朱德默默地站了一会，又默

默地离开了。两位老人心灵相通、肝胆相照，以特殊的方式相互支持，相互分担痛苦和忧愁，共同支撑着一个相同的信念。

1974 年 12 月，董老在广东休养，佛山地委的领导去看望他，请他题词。董老沉思片刻，提笔凝重地写下了三个字："群言堂"。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有记录的题词仅有四次。除了为佛山地委题词外，还先后为良翮下放劳动的河北晋县周头公社题词、为谷牧和王震题词，四次题词的内容无一例外，都是"群言堂"三字。这三个字，是这位党的创建者之一对我党五十多年奋斗史进行总结和思考后发出的呐喊，是对党的民主作风的呼唤和对"文革"的无声抗议，积蓄了这位老人生命的全部力量。

## 期盼"举酒送瘟神"

18 岁考中秀才的董老是写诗高手，毛泽东有"董老善五律"的评价。从 1939 年到 1975 年，董老保留下来的诗共有 1300 余首。这些诗散见于各种旧信封、旧日历、过时的请柬及大小不一的废纸上，由秘书和家人收集整理才得以保全。董老勤俭节约是出了名的，从不浪费一张纸、一支笔。

在留下来的诗作中，写广东景物的诗不下 20 首。其实，"文革"期间董老在广东写的诗远不止这些，只是没能留下来。儿子两度入狱那段时间，董老表面看平静如水，每天依旧写他的字、作他的诗。他性格非常坚定，是一个泰山崩于前也不会为之动容的人。身边的人见他不停地在旧报纸上写写画画，都以为他是在练字，其实他是在写诗，以诗寄情，抒发心中的忧愤。他在报纸上先横着写，然后竖着写；先写小字，然后写大字，最后谁都看不清楚报纸上究竟写了什么。

1973 年，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复出主持工作，全国局势稍稍向好，因破"四旧"停办的广州花市也得以重见天日。春节前夕，董必武到了广州，见到花市百花齐放、繁花似锦，市民们喜气洋洋逛花街，忍不住连声叫好。回到住所，挥笔写下《一九七三年春节羊城重开花市》一诗：

除夕在羊城，重临盛会新。
四时花似锦，万众面皆春。
锣鼓喧霄汉，云霞出海滨。
南邻庆胜利，举酒送瘟神。

1974 年 10 月，董老接到一个通知，请他参加翌年 1 月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时他正患重病，身体状况非常不好，医生担心他北上会加重病情，力劝他留在广州治疗。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劝他听从医生的意

见，但董老执意返京参会。面对医生、家人和工作人员的反复劝阻，董老最后说了一句话，让大家的劝说戛然而止，那句话是："我的作用就是坐在那儿！"

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中，董老"坐在那儿"意义确实重大。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两年后的1973年8月，党的十大召开。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当年已80岁高龄，副主席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5人。周恩来75岁，刚查出患有膀胱癌，而以"打砸抢"起家的王洪文被确定为接班人。9名政治局常委为（按姓氏笔画排列）：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虽然当中"好人"多了，且有一部分刚被"解放"的老干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但同时也有一批野心家、投机分子、帮派骨干分子进入了中央委员会，江青等人随后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兴风作浪，局势非常严峻。董必武深知自己虽然年迈体弱，做不了多少工作，但只要坐在那儿，就仍是"四人帮"篡党夺权必须逾越的一面"墙"，就能阻挡着他们的去路。

在北京期间，董必武还出席了党的十届二中全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党的重要会议。当时他的病情已十分严重，体重锐减，医生初步诊断他患有肝癌。为了不让他知道详情，会议结束后，经周恩来批准，工作人员按原定计划将他送往广州。经过广州医院检查，董老被确认为肝癌晚期。

3月5日，董必武的90寿辰到了，全家人都从北京赶来广州祝寿，他们预感到这可能是老人的最后一次生日了，心情都非常沉重。董老见到亲人，心情显得很愉快。其实他从自身的状况和人们的言行中，早已明白了自己病情的严重性，但他从不询问、不打听、不谈论。他非常配合医生的工作，治疗时虽然很痛苦，但从来没有哼过一声。

他坚持要和身边的所有工作人员合影，和全家人合影。在每一张合影中，他总是笑得那么亲切，那么和蔼、安详。

像往常过生日时一样，董必武那天又为自己写了一首诗：

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嗟跎。
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
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
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诗作好后，董老逐句逐字向家人作了解释。第二天，董老被紧急送返北京救治。1975年4月2日，董老在北京去世，遗言中有这么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党中央开了会，中央还有绊脚石……"

（游慧冰）

# 彭德怀

## 彭大将军激战粤北佳话

彭德怀，湖南省湘潭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领导人之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彭德怀先后率领红五军、红三军团转战粤北，虽然时间都不长，但对革命的影响和贡献是很大的，不仅震慑了国民党广东省当局，使围剿苏区的国民党粤军乱了部署，而且有力地打击了地方反动势力，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湘赣根据地和苏区的革命斗争向前发展。

### 奔袭南雄城

为了打破敌人对井冈山的第三次“会剿”，红军前委于1929年1月4日在宁冈的柏露村召开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边界各县委和部队团以上干部联席会议（史称柏露会议）。会议决定由红五军和红四军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牵制和打破敌人对井冈山的第三次



彭德怀塑像

“会剿”。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挺进赣南后，红五军及红四军三十二团执行会议决定留守井冈山。此时，敌人调集了20个团，以优势的兵力向井冈山发动猖狂的进攻。在强大敌人的进攻面前，彭德怀、滕代远指挥井冈山军民奋起抵抗，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消灭了大量的敌人。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红军又孤立无援，不得不突围出井冈山。3月底，红五军在江西于都与红四军会师。这时，蒋桂战争爆发了，江西省军阀内部也矛盾重重，“会剿”井冈山的湘赣敌人也已退走。因此，前委决定红五军利用这一时机，回师井冈山，恢复湘赣边区。4月下旬，红五军回到了井冈山，在很短的时间内，井冈山又重新恢复了原来生机勃勃的面貌。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基本恢复后，红五军军委和湘赣特委共同确定了“向外发展，在发展中巩固苏区”的方针。5月20日，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和王佐特务营共千余人，离开井冈山，转战湘东、粤北。红五军首先攻占了湘东的酃县、桂东等地，筹措了一批现款和物资，释放敌军“会剿”井冈山时被捕的大批同志和群众。接着又攻占了粤北仁化县的城口，缴获枪械200余支，子弹3万余发，筹款3万元。然后经仁化县长江、扶溪，准备攻占仁化县城，后来得知南雄没有国民党正规军的防守，只有民团、警卫队等地方武装，战斗力不强，于是决定改为奔袭南雄，并立即向南雄进发。

红五军经过仁化的闻韶（闻韶当时隶属南雄）、南雄的百顺、苍石，于6月1日下午抵达南雄县城。国民党南雄县长方新听说红军来了，吓得惊慌失措，急忙剃须化装逃跑，民团、警卫队亦闻风而逃。红五军没有经过大的战斗，就顺利地占领了南雄县城。

中共南雄县委得知红五军来南雄的消息后，率领游击队攻打了坪岗、里溪、水口一路的民团，然后，进城与红五军会合。

红五军占领南雄县城后，分别住在上武庙（现八一路小学）、下武庙（现人民医院门诊部）等处。住下之后就开展宣传工作，在下武庙门前、孔圣庙（现南雄市政府）、福音堂（现南雄市中医院）门口等处召开群众大会，由中共南雄县委委员周群标主持大会，彭德怀、滕代远在会上讲了话，着重宣传党的政策、红军的宗旨以及革命事业必胜的道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欺压群众和地主豪绅剥削贫苦农民的罪行，激发广大劳苦群众的革命热情，号召广大群众团结起来，打倒

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和官僚资本家、地主豪绅。

红军战士生活艰苦，沿街住宿，但精神抖擞，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他们主动为群众挑水、搞卫生。吃了居民的粮食和菜，烧了居民的柴，都按当时市价付了银元；借用了群众的门板、禾草等都清还，损坏的都赔偿。红五军居住、经过的地方打扫得干干净净。红五军的行动，群众看了都十分感动地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于是自动帮助红军解决生活困难、提供情报，积极参加红五军召开的群众大会。

对于那些作恶多端、罪恶滔天的反动官吏、土豪劣绅，红五军坚决打击。他们根据南雄地下党提供的情况和群众的要求，镇压了国民党南雄县党部执行委员、县警察署训导董芳辉，县政府科长梁绍恒，土豪劣绅钟荣伟、刘伯陶等，烧毁了国民党南雄县署。同时，没收了四家与反动官吏串通一气、欺压群众的商号的财物，分给贫苦大众，还打开监狱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和革命群众。

南雄的地下党和游击队，在县城协助红五军发动群众，筹款、购物。红五军在南雄住了5天，筹款3万多元，因地方反动武装早已闻风逃匿，只缴获枪械300支左右。他们将筹得的款项在南雄购买了大批药品、食盐和布匹，还集中全城的缝衣工人赶做了一两千套灰布军装，充实了部队的供给。

6月5日，红五军离开南雄城，向江西崇义转移。

南雄县城陈继灏老人对红五军占领南雄有过这样的回忆：

> 1929年，我在五凤楼当印刷工人，红军在北门进城，是中午进城的，红军进城之前，五凤楼对面挤满了老百姓。当天下午，红军来五凤楼印文件、布告等宣传品，一个姓胡的红军工作人员来印刷厂校对印刷的宣传品，他问我们有多少印刷工人，我们说20多人，红军要我们四五天内印出几千张布告等宣传品，印完文件后，红军给我们印刷工人发五个光洋，当时五个光洋很有用，我们很高兴。1929年，红军来南雄是在福音堂（现在南雄市中医院）开会，开会时红军政委滕代远介绍彭德怀军长。当时文庙（现南雄市政府所在地）、武庙（现八一路小学）都驻有红军。这次入南雄的红军约有四五百人。敌人则有商团一二百人，民团近千人（没有什么战斗力）。彭德怀率领的红军在南雄县城住了五天，我记得很清楚，红军转移时，当天下午三点钟，我还送文件去上武庙。红军在南雄牛皮塘附近杀了警察局督察董芳辉，杀了县政府民政科一个姓梁的科长。

红五军来到南雄，对南雄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作了具体的指导，促进了南雄革命武装的发展，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为在暴动失败后遭到国民党反动派严重迫害的革命人民增添了斗争信心，有力地推动了油山根据地的创建。

## 挺进仁化县


彭德怀（画照）

彭德怀善于打游击战、运动战，从困境中找到敌人弱点，常以少胜多，以弱胜强。1932年三四月间，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进至上犹、崇义、桂东、营前一带，扩大崇犹苏区，但受到国民党军6个师和2个旅以及航空兵的配合围攻，形势险峻，不仅难于推进发展，甚至有被围歼的危险。为了走出困境，彭德怀主持红三军团指挥员会议，果断地分兵向国民党军力薄弱的粤北进军，在运动战中，调动国民党粤军回粤，减轻崇犹苏区的压力。

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直属队及其属下的第五军第二师、第三师，每个师3个团，共5000余人，4月25日从江西省崇义县聂都出发，经洛洞三进仁化县。当日下午，红三军团前锋600多人进至长江圩北郊，与国民党粤军独二旅某团的第一营第一、二连以及从扶溪前来增援的第二营第七连交战，战斗激烈，国民党军招架不支，节节败退。战至下午6时，红三军团占领长江圩。这次战斗，歼灭敌军100多人，缴枪200多支、弹药一批。接着，彭德怀率领军团直属队再次驻长江广州会馆，指挥全军武装斗争活动。

26日，红二师从长江出发，直插扶溪圩，原镇守扶溪的国民党军某团第二营闻风丧胆，不敢应战，弃阵出逃，退守白石岭。27日，红三师分兵一部，经沙坪、浒松、东坑，占领城口圩。同日，红二师分兵一部，由扶溪出发，经双合水、大小狐狸坝、东罗，出水东，过锦江，占领恩村一带。28日，红二师又分兵一部，由恩村出发，经马岭，下厚坑，出塘村，过四十八旗，前锋占领董塘境内的赤石迳。红三军团第二、三师所到之处，占领有利地势，加强警戒，构筑工事、战壕，摆开阵势，造成佯攻董塘，包围仁化城，进迫韶关的态势。

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占领长江、城口、扶溪等地后，派出小分队进行宣传，做群众工作。当群众得悉这是彭德怀率领的红军部队后，如见亲人，格外高兴。有的向红军战士问寒问暖，有的主动为红军排忧解难，有的为红军提供情况，有的向红军部队控诉当地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罪行，迫切要求给予严惩。红三军团部根据群众的迫切要求，因势利导，既向群众宣传中共“六大”精神，讲解“十大纲领”，又在群众的指引下，捉拿地区乡、保政权的贪官污吏、恶霸、

土豪、反动资本家100多人，游街示众，展开斗争，没收其财产。将其粮食、衣物、糖、油、盐等分给群众，对其中80多名罪恶累累者，实行逮捕，押往湖南，另行处理，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与此同时，红三军团也筹措给养，计筹款30多万银元和物资一批，尤其把没收来的布匹，集中起来，雇请了一批衣车工人，日夜加工，制作了军服5000多套，补充了红军的供给。

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在出发时曾召集军团政委及师委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建立粤北白区的秘密组织及粤赣交通线的问题。他们帮助中共城口特别支部进行整顿，使其改进斗争策略和措施，克服困难，坚持为中央、苏区做好地下交通工作。

自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进入仁化后，国民党粤军总司令陈济棠对此一度恐慌，重作部署，调兵遣将，对驻仁化的红三军团进行堵截和包围。28日，粤军第二旅调出二个营，进入仁化县城镇守；乐昌调出一个营，进入董塘镇守。29日，粤军独立旅长陈汉光率领三个团从韶关出发，急进董塘，向赤石迳、四十八旗、塘村、厚牛坑一线窥进；粤军第二旅旅长陈章调、梁荣球团和罗策群团从南雄出发，经百顺、闻韶向扶溪急进；国民党第三航空队配合侦察红军的部署和动向，进行轰炸。此外，粤军从大余向崇义推进，以制我后；粤军李汉魂师、李振球师、叶肇师、张梅新蚌肺以及国民党二十八军罗卓英师、周至柔师辈在赣南为接应。红三军团仍三面受强敌围堵，形势于我不利。为保存有生力量，彭德怀又率领在粤的红二、三师向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韶西北面，实行战略转移。5月1日，红三师前锋从地处北端的城口出发，向湘省桂阳推进，逐日依次往北转移。迄至5月5日，殿后的红二师沿着红二师前锋线路撤出仁化，全部进入桂阳、桂东一线作战。

## 策应“水口战役”

1932年7月8日，红五军团在南雄县水口弱过村与粤军第四师打响，拉开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著名的“水口战役”的序幕。

彭德怀率红三军团继续在大余牵制粤敌第一军，对红一、五军团不断击溃水口敌军起着策应作用。彭德怀奉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指示，率领红三军团增援，以第七军为先头部队，在是日下午从大余城北郊出发，经游仙转出南雄县的邓坊，至10日下午4时到达水口时，敌我已退出战斗，粤敌军退守南雄县城。聂荣臻说：“水口战役结束后，我见到了彭德怀同志，他告诉我，一、三军团分兵以后，他们在湘赣边界扩军四十个营，我们可以放手打，兵员不成问题。”如果早调红三军团来水口参战，定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历时三天两夜的水口战役，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敌人再也不敢轻

举妄动，使中央根据地的南翼基本得到稳固，为红军主力机动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这大好形势下，中央军委主席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指示："我军以后的新任务，要以积极和坚决的行动，首先消灭陈（济棠）、罗（卓英）南下之敌，夺取赣吉，向北发展，配合全国革命斗争，争取江西首先胜利"。"应须有十天的准备时间，筹措相当的给养，使红军得到稍事的整理和补充，以保证今后的胜利。"彭德怀遵照这一指示，率领红三军团于7月14日从水口一带出发，进到南雄县乌迳以东、信丰河以西地区，以老界址为指挥中心，占领乌迳，新界址（属南雄县）、支河圩、正平圩、九渡水、报富圩（属信丰县）驻营，进行休整。

在休整中，彭德怀整编队伍，进行主力战略训练，另派出小分队及工作组到圩镇、农村去，收缴地方反动武装，发动群众斗土豪劣绅，分地主财产；动员青年参加红军，扩大红军队伍；筹备款项，备足给养。7月下旬，彭德怀奉命率领红三军团撤离南雄县向江西信丰转移。

红三军团、红五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经过一年多的艰难战斗，锻炼得日趋成熟，积累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验。

（李秀珍　肖　锋）

# 陈 毅

## 难忘岁月谱写《梅岭三章》

在战争年代，陈毅在广东战斗过；在和平年代，陈毅在广东工作过。广东留下了他的足迹，闪烁过他的身影，回响着他的声音。下面叙述陈毅在广东的二三事。

### 攀藤附葛，偷渡大梅关

1935 年 2 月，陈毅与项英、贺昌、邓子恢、谭震林等人组成中央分局，项英任书记，陈毅任中央办事处主任。他们的任务是在南方八省坚持游击战争，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留守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了几个月后，实行了突围，大部分同志在项英、陈毅等的带领下，辗转到达了赣粤边的油山。在油山，敌人采取搜山、烧山、移民、并村、封坑、包围等等手段，进行最残酷的“围剿”。陈毅 1936 年春写的《赣南游击词》：“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叹缺粮，三月肉不尝。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靠人民，支援


陈　毅

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就是最好的佐证和史实。

尽管如此，陈毅和战友们还是革命意志坚定，不断克服风餐露宿、昼伏夜行的困难，坚决依靠群众的支援和掩护，开展灵活的游击战争。

一天半夜里，陈毅等同志在转移中来到了赣粤交界处——梅岭大梅关。大梅关地势极为险要。国民党在关上驻扎了一个连。他们到了大梅关北沿，往下一看，两壁就像刀切斧劈似的。左边无路，右边虽有一条小路，但又直通敌营。他们只好静悄悄地逼近关隘，依着靠近隘口的建筑物往下降。但因坎高，身体较弱的同志往下跳就比较困难。陈毅这时挺身而出，他一脚踩着石壁，一脚踩着建筑物的墙壁，抓着同志们的手，一个一个地往下放。他们过了关隘，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向右岔爬上了仙人岭的顶峰。这时眼界豁然开朗：北面江西方向的大余、青龙、黄龙的万盏灯火，与天上的繁星交相辉映，分外耀眼；南面广东方向的南雄、始兴也传来了阵阵鸡鸣，犬吠。天快亮了，再继续前进就有被敌人发现的危险。于是，他们就躺下休息。一夜的急行军，大家都困倦。他们就头朝广东，脚向江西，在敌人的头顶上呼呼地睡了起来。睡醒后，陈毅同志很风趣地说：“我们真了不起呀，一身压着两个省呢！”他这么一说，大伙都乐得直笑，好像一夜爬山越岭的疲劳全部消失了。这就是有名的偷渡大梅关。陈毅曾写诗道：“敌垒穿空雁阵开，连天衰草月迟来。攀藤附葛君须记，万载梅关著劫灰。”

## “北山事件”中，与项英脱险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消灭红军游击队，除加紧军事“清剿”外，还竭力利用共产党的叛徒进行破坏。“北山事件”便是广东军阀陈济棠利用“红军第一叛将”龚楚破坏红军游击队指挥中枢的阴谋的一部分。

龚楚原是中央军区参谋长。1935 年春，他带领红二十四师七十一团突围转移到湘南宜章后，获悉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失利，损失惨重的消息，便于 5 月 2 日在湖南省郴县黄茅地区，亲手打死七十一团政委石友生，带领七十一团的部分部队叛变投敌。粤军首领陈济棠很赏识他这位同乡（龚楚是广东乐昌人），封他为少将“剿共游击司令”。由于当时联络中断，项英、陈毅和特委尚不知道龚楚已经叛变，曾数度设法与他联系，但一直未能联系上。

10 月中旬，龚楚带着伪装成“红军”的卫队，沿着他原先走过的路，从湘南来到赣粤边。他一路走一路打探消息。他到了北山龙西石地区，几天后和余汉

谋的一支部队乒乒乓乓假打一阵子，“击溃”了“敌人”，在龙西石出了名。最终骗得一个交通员的信任，带他找到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这时何长林还不知道龚楚已叛变。他们两人原本相识，交谈中把很多情况告诉了龚楚。这时，龚楚才获悉阮啸仙在突围中已经牺牲，没有来赣粤边，而项英、陈毅来了赣粤边，与特委机关一起在北山地区。龚楚获得这一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便精心设计破坏特委机关，捉拿项英、陈毅的圈套。期间，龚楚还先后同中共赣粤边特委驻龙西石秘密交通员赖文泰、北山红军游击大队大队长贺敏学等进行了接触。龚楚乘机大肆吹嘘他在湘南的“战绩”，声称他这次来是要接项英、陈毅去湘南加强领导，迫切需要见到他们。何长林还告诉龚楚：项英、陈毅他们行动秘密，和北山游击队不发生直接联系。要找他们，可写封信由交通员转交，请项英、陈毅到龙西石来会面。龚楚一听顿觉正中下怀，心想送上门比找上门更好下手。陈毅和项英看了交通员赖文泰转来何长林等人签具的信，非常高兴，这是突围后第一次和其他游击区取得联系。但陈毅又想：龚楚是湘南游击队的主要负责人，怎么可以丢下游击队到这里来“汇报”呢？早在中央革命根据地，陈毅对龚楚就有所了解，此人一贯骄傲自大，目中无人。第三次反“围剿”中，他拒不执行彭德怀命令，使湘赣军区的部队受到很大损失，被降职当团长。今天，他怎么变得谦虚起来，要项英、陈毅去“加强领导”呢？斗争残酷，人心难测，陈毅建议项英，过一段时间再会见龚楚。

龚楚通过何长林，要求在北山龙西石召集游击队和干部开会。何长林没有请示特委，就听从龚楚的要求，擅自通知附近的地方干部和游击队来开会。10 月 13 日，在北山龙西石开会时，龚楚的国民党卫队按照预先的安排把会场包围起来。龚楚在讲话中逐渐撕下了假面具，竟说中央红军已经失败了，不存在了，当共产党、游击队没有出路，劝大家向政府投诚，以保全身家性命。大家识破了叛徒面目，才知上当，有些人满腔怒火，举枪就打，边打边往外冲。但是，在敌人预伏火力的封锁下，30 多名游击队员和干部当场牺牲了，只有大队长兼政委贺敏学和小队长刘矮牯（外号猛张飞）等八九人带伤杀出重围脱险。何长林被俘后也就跟着叛变了。

这两个叛徒，破坏了后方机关之后，就由何长林带路来寻找特委。但何长林只知道特委机关在帽子峰一带，并不知道具体位置。他们在帽子峰山区转来转去，转了几日也没有找到。直到 5 月 20 日，偶然遇到外出运粮的特委侦察班班长吴少华。何长林认识吴少华，假惺惺地声称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是刚从湘南来的，有重要事情要向周同志（项英化名）和刘同志（陈毅化名）汇报，企图诱骗他带路寻到项英、陈毅驻地。他们惟恐吴少华生疑反抗，把他的驳壳枪缴去，吴少华却抗议说，红军为什么还缴自己人的枪，你们恐怕是反动派吧？他们为了取信于他并利用他达到目的，不得不还一支枪给他，可这枪偏偏是被打死的游击

队一队长的枪，吴少华认得，保持高度警惕的他已知就里，并机敏地设法对付。吴少华走到距岗哨不远处时，一个箭步跑到哨兵面前，指着后面说："他们是反革命！"哨兵立即打了三枪报警。吴少华和哨兵朝特委驻地相反的方向跑，以便引开敌人。

当时，陈毅和项英正在下棋，听见报警枪声，来不及收拾东西，立即转移。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和警卫人员也快速离开棚子，转移到后面山上隐蔽。当天晚上大家在预定的地点会合后，分析敌情，估计叛徒惧怕游击队实力雄厚，又已报警，不敢贸然往下冲，只得撤回去了。第二天清早，派警卫人员去驻地侦察，发现一切原封未动，连未下完的棋子都照旧摆在棋盘上。叛徒确实没有下山来。敌人的阴谋终归失败。

项英、陈毅考虑到敌人已发现特委机关的所在地，必定还会派兵来"清剿"，决定立即从北山转移到油山去。果然不出所料，敌军对北山地区疯狂地进行"清剿"，敌人在北山地区连续搞了三个多月，使北山地区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北山地区活动的5支小游击队都被打散了，伤亡很大，革命群众遭到很大损失，史称"北山事件"。但是，敌人妄图捉拿项英、陈毅，破坏特委领导机关的阴谋终究未能得逞。

## "梅山事件"，写下《梅岭三章》

1936年，更为复杂艰苦的斗争来临了，赣粤边游击区处在黎明前的最黑暗时刻中。是年冬天，发生了一件极为惊险、严重的梅山事件。

那时，陈毅他们正住在离大余城约十五公里的梅岭的一个山沟里。一天下午，被原湘鄂赣省委派到敌军四十六师做兵运工作的陈海（又名陈宏），送个条子上山来，说中央派人来了，带来了重要指示，要负责同志到大余县城去接头。与党中央失去了一段时间联系的陈毅等同志，自然十分高兴。为了探明虚实，陈毅决定亲自到大余城走一趟。次日黎明前，他和区委书记黄占龙下山来到陈海家，陈海的老婆正在洗衣服。黄占龙问："陈海先生在家吗？"她因不认识陈、黄两人，就告诉说，陈海到团部去了。大余县广启安糖铺是秘密交通站。陈毅把"团部"听成了"糖铺"，就和黄占龙一起，向广启安糖铺走去。他们刚拐过弯，就看见国民党军队直向那个糖铺跑去。这时，糖铺的一个老工人从茶馆后面走了进来，贴着陈毅的耳朵说："快走，陈海叛变了！"陈毅沉着地离开了大余县城。

这时，陈海已经把告密信送出。敌人迅速包围了陈毅等同志的住地——梅山的斋坑。山上的项英等同志听到枪声后冲出棚子，钻进了密密的茅草里，可陈毅还不知道山上被围，恰巧赶到山上，天气骤变，敌人刚要撤走时，陈毅撞进了包围圈内。敌人问："你是干什么的？"陈毅十分镇静地回答："是我呀！"敌人的

态度有点缓和了，又问："你是不是带路的向导？"陈毅机灵地说："是呀！"敌人又说："下大雨了，走啊！"陈毅连忙说："你们先走吧，我要屙屎！"陈毅装模作样地钻进了树丛里。敌人走后，陈毅凭着他多年的经验，很快找到了隐蔽在林子里的同志，并与同志们迅速转移。到了梅岭北面的山上，已经是半夜了。刚休息下来，果然不出陈毅所料，敌人的大队人马又开进山里来，把同志们原先住过的那个棚子的十几里地又包得严严实实。这次，敌人把狼犬、探照灯都带来了。敌人扑空了，同志们说陈毅料敌如神。陈毅风趣地说："那是托马克思的在天之灵呀！"敌人当晚在棚子周围没有找到陈毅他们，仍不甘心，又继续增兵，一直把梅山围困了二十余天。这期间，陈毅历尽艰险，伤病复发，生命安危，系于一发。但他始终充满共产主义战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机智、勇敢地领导着同志们与敌人周旋于梅山，直至敌人一无所获而解围。

当陈毅隐藏在茅草丛中，敌人就在附近号叫着搜捕时，他视死如归，写下了气壮山河的《梅岭三章》："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表达了他在险恶环境中革命到底的坚强决心。

## 科学的春意，陈毅的"广州会议讲话"

1962 年 3 月，一个虽寒还暖的季节，春意盎然。春雨沥沥，滋润着南粤大地。3 月 2 日，全国科学家座谈会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同时在广州召开。周恩来在会上作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重新肯定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发挥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3 月 4 日，周恩来由于公务繁忙，会议没有结束就提前从广州返回北京。临行前，他嘱托在广州参会的陈毅在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转达他的一段话：我们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受周恩来的委托，陈毅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广州会议讲话"。

此时，陈毅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科学文化工作。分管科学与文化，就要了解知识分子，自己就得热爱知识，尊重知识。陈毅对知识的追求是如饥似渴的。战争年代，他的行囊或大或小，多半是书。和平年代，他与书为友。由于他知识丰富，而且能作胸襟宽阔、目光精微的分析评价，因此许多知识分子愿意接近他，希望和他交朋友。陈毅在科学、文化界的朋友不仅量多，而且质高；不但是知友，而且是诤友。"广州会议讲话"就是他分管科学文化的"施政"演说，是他对知识分子政策的"万言书"。

3月5日，陈毅在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作报告。他系统、全面地讲了科学工作怎样发展这个问题。他首先肯定了建国十二年来科学家的贡献。他说："建国十二年来科学家的表现是好的，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支持党，做了工作，有贡献。"说到此处，他激动地提高了声音，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声浪盖过了他的声音。他顿了顿，也跟着鼓起掌来。然后以更高昂的声音继续说："特别是近四年来，尤其是一个重大的考验，绝大多数人是爱护党，爱护人民，支持我们出了力的。应该说有了一支很好的人民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队伍。"他说这番话是有所指的。因为反右倾运动使大批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很多知识分子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陈毅这番话等于是为知识分子平了反。他坚定有力地说："我认为今天还把科学家、文学家看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对的"，他们应该"是人民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联盟一部分"。他还形象生动地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比喻为"国家的三只脚"，说：知识分子"是三大部分之一，是国家的一只脚"。

3月6日，陈毅在广州召开的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上讲话。他说："科学家、作家们，对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革命，已经有了贡献，应该受到我们的尊敬。"还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说到这里，他站起来向大家鞠了一躬。全场掌声雷动。

在"广州会议"的小组会上，科学家、剧作家倾诉了几年来遭受"左"倾思潮迫害的痛苦；被"拔白旗"点名批判，乃至开除党籍遣送劳改的人数，竟占了与会代表的大部分！陈毅得知后又惊又怒，他大声疾呼："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不能够经过了12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合乎实际情况。"陈毅饱含深情地继续说："12年的改造，12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带来的考验，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着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陈毅毫不客气地说："十年八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十年八年十二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今天我们团结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陈毅把科学和科学家提到"国宝级"的高度："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真正有几个能替我们解决问题的人，一个抵几百个！……愚昧是个很大的敌人。帝国主义是个敌人，封建势力是个敌人，愚昧——几万万人没有知识、没有科学知识，也是很大的敌人。"

陈毅的性格特点就是直爽。他在广州会议上直截了当地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有些党的领导机关"和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矛盾，伤了感情，伤了和气"。"这里面有个是非，总有一方面对一方面不对。只有弄明哪一方面主要是对

的，哪一方面是错了，才能够团结起来。如果来一个两边都对，或两边都不对，各打50大板，不能解决问题。”明确地说“有些党的领导机关”是“错了”，而“对的”却是知识分子。这是我党要注意的问题。

当然，陈毅敢于在广州会议上做这样的讲话是因为1962年1月毛泽东已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陈毅广州会议上的讲话鲜明地引用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话：“你们要相信过去三年有时候我们是做蠢事呀！我们是很蠢的呀！”陈毅还坦白地说：“我参加了中央七千人的扩大会，我才敢讲。”

陈毅在这篇著名的讲话中还就领导科学工作的方法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讲到了“无为而治”。这四个字后来成了陈毅的一大罪状。这里特地引用他的原话，让大家了解他真正的用意。

> 在井冈山的时候……一个战斗的布置，我们大家都参加，军事指挥员：军长、师长、团长，有时营长、连长都参加，我们（党代表）也参加。战斗一发生了，毛主席就说：“我们走，你跟我来。让他们（军事指挥员）去指挥。我们在那里很麻烦，弄得指挥员很难下决心。你在那里，他要征求你同意，不征求你同意，独断专行，将来要受批评，打了败仗，说他目无党代表。要征求你的同意呢，商量来商量去，丧失时机。让他一个人在那里，当机立断，马上就进攻，或者是撤退，或者迂回，或者把预备力使用上去。避免多头指挥。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实际作战的指挥经验，我们只抓作战计划，定下来就行了，以后就让他们有经验的人去搞。”——唉，我很长知识呵！因为我这个人，恰恰就是什么都要干涉，也是仿佛有那么个精神：把革命的一切都要包办完的。很多指挥员最恼火我。经毛主席这么一搞，把我这脑筋就搞得通了一点，以后我就好办了。所以有很多事情，看来是可以无为而治的。什么事情都去领导一番，反而会领导坏了，有些不去领导，反而好一些。要懂得，领导有领导成功的，也有领导失败的。有把握领导成功的就去领导，没有把握就不去领导，就让有经验的去搞，自己“坐享其成”。……党委领导业务，也是要通过党的专家来领导，和专家合作，取得他们的帮助来实现领导。毛主席讲过，共产党员不懂自然科学，怎么办呢？通过专家，委托他们来领导。或者帮助专家提高政治，吸收他们入了党，通过他们来领导。

显然，陈毅所主张的完全不是放弃领导。相反，他对怎样实现领导有很正确的严格要求。他以军队的一个班作比喻：“人民解放军的班长，打仗冲锋，班长是第一个……其余的人跟了来，这个领导，是带头。分东西班长最后分，……吃饭，人家装满了，班长才去装了来，什么领导？你要讲领导，就是要带头，吃苦

在前，享乐在后。……所以现在领导这两个字，要加以正确的解释。讲党领导一切。主要是路线、方针、政策……至于专业问题，最好不要乱干涉。”

从以上讲话可以看出来，陈毅的意思是如何改善党对科学家和科学界的领导。科学工作者听着这样的讲话，怎能不欢欣鼓舞！笑声、掌声……当年的纪录稿注明，在陈毅这篇3万余言的讲话中，会场里响起60多次掌声和笑声。

（肖　锋　肖燕明）

# 徐向前

## 元帅危难见英豪

徐向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为新中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徐向前先后任诞生和战斗在广东红四师第十团的党代表、红四师参谋长、师长等职，指挥部队连续攻下陆丰、甲子港、惠来县城、普宁县果陇、和尚寮等反动据点，帮助普宁、惠来县成立县苏维埃政府，创建大南山革命根据地，坚持近一年的东江游击战争，揭开武装斗争的新篇章，在广东大地上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 报考黄埔军校

出生于山西的徐向前处于一个内忧外患的年代，清廷腐败，列强入侵，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广大劳苦大众身受欺凌盘剥，饥寒交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徐向前的



徐向前元帅铜像

父亲徐懋淮以教书为业，微薄的工薪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故徐向前10岁才有机会上学读书。他聪明好学，学习成绩优秀，但因家境困难，15岁时便辍学。少年的徐向前在家帮助母亲拾粪、背煤、捡柴火，后经人介绍，到河北阜平县一家书店当学徒。1919年，他考入太原市省立国民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他受到“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和进步思想的熏陶，从此立志爱国，改革时弊，拯救中华危难。1921年毕业后，他到一所小学任教员。他在教书期间，因向学生传播进步思想，曾两度被校方辞退。

1924年1月，徐向前怀着救国救民的志向，串连了几个同乡，到上海投考黄埔军校。5月初，他又到广州参加复试，终于被录取，成了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被编入学生第一队参加学习。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亲自创办的一所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军校中还有周恩来等一批共产党员在军校中任职任教。严格的军校生活，革命理论和军事技术的学习，使徐向前受到极大的锻炼。黄埔军校是徐向前革命生涯的起点。

同年9月，徐向前参加孙中山的卫队，随同孙中山前往韶关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大会。11月底，徐向前以优异成绩在黄埔军校毕业，随即被安排在第三期入伍生队第三队任副排长，不久即升任排长。

1925年2月至6月，徐向前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对反动军阀陈炯明作战。他作战勇敢，爱护士兵，屡立战功，深受战士们的爱戴。同年夏，他被派到河南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混成旅任教导营教官，后又调任旅司令部参谋、第二团团副等职。紧张的战斗生活和工作的实践，使徐向前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和进步。

## 参加广州起义

1927年3月，在蒋介石即将反叛革命的前夕，徐向前经樊炳星、杨得魁介绍，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党的革命事业奋斗终生。4月，他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少校队长。7月底，他随张发奎部开到九江。八一南昌起义后，几经波折，奔走武汉、上海，终于找到党组织。9月，他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派往广州，参与筹备广州起义。

徐向前到广州后，便深入到工厂中去，在工人赤卫队中秘密进行军事训练，提高工人赤卫队的军事素质，并担任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队长，为举行广州起义作准备。

12月11日凌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武装起义枪声打响了，徐向前率领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冲进警察所，控制了几条街巷。天亮后，他又率工人赤卫队配合教导团二连在观音山（今越秀山）一带阻击敌人薛岳部的反攻。

参加广州起义的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广东工人赤卫队七个联队，还有近邻的部分农民武装，经过十多小时的激战，起义部队占领了广州市区的绝大部分，成立了以苏兆征为主席（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代理）的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镇压地主豪绅”的政治纲领，颁布了“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一切土地归农民”等法令。这时，敌军张发奎主力已从肇庆、梧州一带回师广州，围攻起义部队。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军不可能坚守广州。到起义的第三天，张太雷和许多革命战士英勇牺牲，起义遭到失败。徐向前也只好率工人赤卫队撤出广州，退到花县，与其他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师（简称红四师），徐向前任第十团党代表。

随后，红四师奉命开赴海陆丰地区，与南昌起义部队改编的红二师汇合，帮助海陆丰举行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府。在向海陆丰开进途中，徐向前升任红四师参谋长。

## 围歼果陇地主武装

1927年12月下旬，中共普宁县委根据广东省委和东江特委关于“通令各县举行年关暴动”的指示，结合本县情况，制订了年关暴动计划。从1927年12月30日至1928年1月2日，在普宁县委的领导下，全县人民掀起了年关暴动的高潮。成千上万的农民群众，在县工农革命军第六团队和各区乡赤卫队的配合下，提筐挑箩，组成雄赳赳的革命队伍，像潮水般冲向官僚、地主的门庭，处决了一批反动地主分子，没收了他们剥削农民得来的财物、稻谷，焚毁了一批田契、租簿、债券，革命风暴席卷全县。

在农民武装暴动革命潮流冲击下，反动地主阶级和势力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利用手中掌握的治安队、保安队等反动武装，与革命农民武装相对抗，因此，年关暴动出现了严酷的战斗局面。位于普揭公路旁边的大村果陇乡，人口1万多人，由反动地主庄大泉组织地主武装民团数百人，猖狂与革命武装对抗。1927年10月上旬，他们曾带领国民党陈济棠部军队在池尾莲花山截击八一南昌起义军，使起义军遭失严重损失。他们还与洪阳县城方十三的反动地主武装狼狈为奸，互相呼应，使果陇成为阻碍全县革命运动的反动据点。

普宁县委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和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拔除这个反动据点。遂于1928年1月3日，以第六团队和一、二、九区赤卫队共5000多人，兵分三路围攻果陇。经激烈战斗虽攻陷果陇外围5个小村庄，直迫果陇大寨，但因天气严寒，风雨交加，指挥失当，致使南北两路总指挥何开云、周犹虎均在激战中阵亡。攻打失利。

1928年1月3日，红四师第十一团300多人，在师长叶镛、参谋长徐向前的率领下，从陆丰行军进抵普宁赤水村，协助普宁开展年关暴动。随同部队前往助战的有海丰县委选派的200名赤卫队员及陆丰南塘的赤卫队。当天晚上，叶镛、徐向前等出席了普宁县委召开的紧急会议，听取普宁县委书记陈魁亚介绍普宁当时的斗争情况，会议决定先攻打果陇地主武装。

2月1日清晨，徐向前指挥红四师主力和县工农革命团第六团队从流沙出发，包围果陇乡；另一路由十一团一部及五区农军袭击横溪村，以牵制陇头、旱塘等民团援果陇之敌；第三路由二、九区农民赤卫队集结在鸡笼山、乌墩洋等处，作为声援。

上午8时许，徐向前指挥红四师十一团向果陇地主民团发起进攻，约一个小时，占领果陇外围，并击毙在阵前指挥作战的民团总指挥庄启照，随后屡攻不进。因为寨内除庄大泉保安队外，还有县保安队和外乡民团。民团凭借环村的溪河和碉楼作为屏障，垂死顽抗，战斗十分激烈。次日，红军组织强攻，攻陷协成、和兴等民团据点，并击毙了县保安队长方思国。徐向前指挥的红四师十一团，由原教导团改编，指战员战斗技术高超，枪法特准，给地主武装很大的杀伤力。当晚，县保安队和外乡民团见势不妙，于午夜逃走。第三天，红军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强攻大寨，并与民团展开激烈的巷战，终于消灭了地主民团120多人，反动头子庄大泉在破寨时混在群众中仓惶逃命。至中午，果陇这个反动据点终于被红军攻克。农民赤卫队愤怒地放火烧了地主几十间房子，并捕获了50多个反动分子。下午2时许，徐向前率红四师和工农革命军在万众欢腾、歌舞鼓乐夹道欢迎中，班师回赤水村。与此同时，攻打横溪的红四师十一团一部及农军也攻入村内，缴枪200余支。

在攻打果陇战斗中，红四师伤亡20多人，其中师党委书记唐澎也不幸中弹牺牲。徐向前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有颗子弹打进他的肚子，血流在里面致命的，身上一点血迹也没有。他是四川人，黄埔学生，工作勤勤恳恳，平易近人，是个好同志。"

攻打果陇之后，中共东江特委书记彭湃率红二师到普宁，并在他的指导下，于2月13日在陂沟村召开全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普宁县苏维埃政府，领导全县人民掀起土地革命的高潮。

## 攻克惠来县城

1928年2月中旬，为了牵制敌人，支援海陆丰军民的反“围剿”斗争，彭湃、徐向前和叶镛率红四师的第十、十一团，先后攻克惠来县的葵潭、隆江等重镇。3月10日，他们又挥师进抵距离惠来县城10华里的东陇镇苗海村，并在村里的沈氏公祠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攻城指挥部”。当晚，彭湃在苗海村广场主持召开惠来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惠来县苏维埃政府。

3月11日夜，攻城指挥部发布“向惠来县城进攻”、“攻下惠来县城，免捐免税”及“土地归农民，政权归工农兵”的命令和口号。

3月12日，徐向前指挥红四师主力部队，在惠来县工农革命军第五团的配合下，发起攻城战斗。为了截断敌军救援，徐向前命令普宁工农革命军第六团守候在盐岭，又调潮阳第三独立团入惠来，在潮惠边界伺机伏击敌人。

惠来县城城墙高6米，宽3米多，周围长2000多米，设东、西、南、北四门，还有护城的壕沟。此时，城内敌军有七十六团一个营，他们发现红军和赤卫队攻城后，只能倚仗城墙，居高临下，负隅反抗。红军向敌人发起政治攻势以瓦解敌军。四乡农民群众也赶来登上城郊山头，呐喊助威。早先潜入城内的革命人员秘密组织部分工农武装进行骚扰，在敌军驻地扔炸弹，一日数发，使敌人心惊胆战。

3月14日晚，敌军惊魂未定，从东门狼狈逃跑。徐向前即指挥红军和赤卫队于15日凌晨占领惠来县城，放出狱中的革命同志和农民，并放火焚毁国民党的县衙。

3月15日，敌七十六团逃至距县城40里的锡溪乡村，与从普宁前来增援的敌七十七团向卓然部相遇汇合。他们随即折回向惠来县城反扑。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徐向前指挥红军和赤卫队主动撤出惠来城。

敌军自恃有两个团兵力1800多人，气焰十分嚣张。3月19日早晨，向卓然亲率一个营进犯红军阵地，被红军发现，徐向前指挥红军设伏让敌军进入包围圈，然后一齐开火，毙伤敌军不少，余敌逃回县城。

3月22日，红四师在叶镛、徐向前率领下退到苗海村，与彭湃带领的红二师汇合。彭湃即召集红二、四师领导人会议，重新部署攻城计划。针对敌军军心涣散，决定在发动军事攻势的同时，加强政治攻势，其中包括采纳农民的建议，用风筝向城内散发传单。传单系在风筝上，当预先绑在风筝的香火烧断了束在传单上的绳子时，传单就哗哗撒在城中，引起敌兵纷纷抢来看，一时秩序大乱。敌七十七团团长向卓然见势不妙，登上城墙察看，被红四师的神枪手击毙。在攻城战斗中，敌七十六团团长颜鼎臣也被击中腹部。

23日拂晓，敌军残部见两个团长一死一伤，无心守城，弃城仓惶向潮阳逃窜。红二、四师和惠来革命武装再次取得占领县城的胜利。此后，惠来县苏维埃政府领导各区乡建立苏维埃政府，并领导农民开始分配土地。

## 大南山养伤

1928年4、5月间，敌人调集重兵围攻潮普惠苏区，红二、四师的处境越来越困难，部队有耗无补，越打越少，两个师各剩下五六百人，徐向前只好带领红四师坚持在山区打游击。而敌军整天搜山、放火，杀害群众，红四师的处境日趋困难，只好分散游击。红军人数越来越少，有的是在战斗中牺牲的，有的是被敌人抓去杀掉的，有的是病死的，有的是负伤没药治疗致死的，有的是活活饿死的，有的是被山洪暴发卷走的……

徐向前带领红四师部分官兵整天在山上与敌人周旋，没有粮食，又缺医少药，处境十分艰难。4月底，在一次与敌人的遭遇战中，徐向前的腿部负了伤，因天气炎热，伤口化脓，部队战士赶紧用担架把他抬到位于大南山腹地的锡坑村吴爷宫进行治疗。这里是红二、四师野战医院，在缺乏消炎药的情况下，多亏医生采用青草药捶烂敷上，过了个把月，伤口才愈合。锡坑村是普宁的革命老区村，群众基础好，群众对红军医院的伤病员给予热情关心和照顾。养伤期间，徐向前也受到群众的细心照料，因此，他对这里的红军医院和革命群众留下深刻的印象。1985年2月，他应邀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四师野战医院旧址”亲题匾额，普宁市委党史研究室又在旧址内开设红二、四师史迹展览，使这个红军医院旧址成为当地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28年6月中旬，红四师师长叶镛因患严重疟疾，不能行走，隐蔽在海丰西北山区白木洋的山洞里，被敌人搜出杀害，遇害时年仅29岁。此后，由徐向前接任师长，带领一二百人坚持在海陆丰山区进行斗争。

8月，中共广东省委派常委陈郁到东江了解情况，才知红军的处境如此艰难。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省委决定把剩下的红军分批转移，保存力量。

1929年1月，徐向前带部分红军人员撤出海陆丰，经惠州转移到香港九龙，然后到上海，从此走上新的革命征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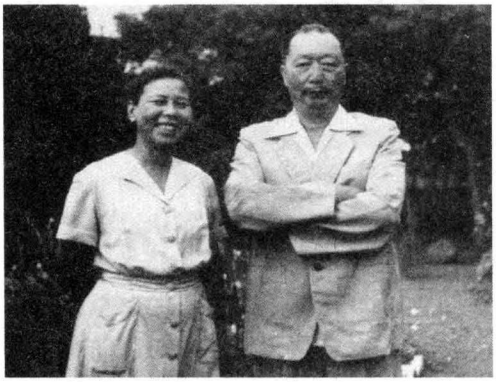
（王宋斌）

# 聂荣臻

## 元帅初起与广东革命的风雨沉浮

提起聂荣臻元帅，人们每每谈到的大多是其在八年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一次次横刀立马、勇冠三军的赫赫战功，及建国后其主管国防工业时，为“两弹”科技攻关所做出的不朽功勋！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样文武双全的一代儒帅，其早期革命事业的起点就是在广东开始的。1925 年他从莫斯科学成归国，由组织安排到广州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1926 年中山舰事件后离开黄埔军校，任职中共广东区委，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 年组织参与南昌起义，随后带领部队南下广东，并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1928 年在香港任职广东省委军委书记、省委常委；1929 年 10 月任东江巡视员，巡视东江地区党的工作；1930 年接受中央调令离开广东。1925—1930 年这段时期在广东的活动经历，奠定了他的革命和军事思想的基础。广东之于聂荣臻，有着特殊的记忆和感情。

# “学生”教官耀黄埔



聂荣臻和夫人张瑞华

1925 年 8 月，一艘轮船行驶在茫茫东海上，朝着上海方向驶去。船甲板上聚集一些年轻人，低声谈论，举目远眺，似乎在憧憬着什么，又仿佛在接受着未来的挑战。这其中，就有刚刚接受共产国际派遣、万里迢迢坐火车穿越西伯利亚从海参崴坐船回国的聂荣臻。

此刻的广东，各派势力齐汇于此，已经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革命的热情高涨！然而，革命洪流中已经出现了不和谐音符，中山先生的辞世让内部纷争渐起，两党内部左派与右派的斗争十分的激烈，戴季陶等公开反共，廖仲恺这时也被暗杀。盘踞在广东各地的大小军阀亦不甘心失败，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不断地进行各种骚乱。在轮船上得知这些消息的聂荣臻对民族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深感忧虑。

几经周折，化装成学生模样的聂荣臻和同学们于 9 月辗转到达上海，经当时的中共中央的安排，聂荣臻来到了广州，进入了黄埔军校，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秘书兼政治课的教职。

虽然已经有了五年的旅法旅苏勤工求学的经验，当时复杂的形势，对初次投入国内革命洪流的聂荣臻来说，仍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少年老成的聂荣臻，勇敢地挑起了这个重担！在周恩来的指导下，聂荣臻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利用一切机会，积极开展党团活动，教育党团员，争取进步青年，扩大党的影响。因为年龄相仿，有着共同的革命激情，加之本身质朴的性格，聂荣臻很受学生们的欢迎，大家都乐意听这个长他们几岁的大哥哥讲述他在欧洲游学时的各种经历和见闻，以及对国际国内革命形势的分析。聂荣臻更是从这些学生们的身上感受到了对中国革命无与伦比的希望和信心！

为了创造更好的氛围，充实自己的思想和知识的宝库，以感染、动员更多的人向党组织靠拢，聂荣臻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汲取更多的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那段时间聂荣臻一有机会每周都要往返广州市区一次，有时甚至是两次三次，要知道那个年代从黄埔到广州市区还是有很辛苦的一段路程。他一方面向区委汇报情况，接受指示；另一方面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接受听取当时在广州的革命名流的演说和报告，诸如苏联顾问鲍罗廷作的形势报告、毛泽东的演讲等等，

回到学校后又马上组织大家学习和讨论。正是靠着像聂荣臻这样优秀干部们的不懈努力和进步，使得党在学校政治工作方面威信很高，很多人正是在这种氛围的感召下，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成为其中的一员。

当时的政治部还负责安排学校的政治教育，聂荣臻在他的任期内，在学生课程安排中将政治课设置占相当大的比例。每个学期累计上百节课程，除了专职的政治教官如很受学生们欢迎的恽代英、萧楚女、高语罕等，还有很多兼职教官。聂荣臻本人就兼过几次，没有什么现成的教材，就动手自编讲义自己讲，讲社会发展史，讲帝国主义论。他在学生面前畅谈革命理想和青年责任，在学生们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短短的六个多月时间里，聂荣臻的教学给同学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47 年 10 月，清风店战役胜利结束后，被俘虏的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就自称是聂的学生，并请求见见老师。这就证明了当时聂荣臻的影响力。

随着共产党革命力量的壮大，蒋介石集团的反共面目逐渐暴露。1926 年 3 月 20 日，蒋介石一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事件发生后，以陈延年、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广东区委极力主张反击，聂荣臻完全同意和支持周恩来的想法，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接受了蒋的条件。结果 250 多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聂荣臻被免去了黄埔军校的职务。

聂荣臻离开黄埔军校后，到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工作，为北伐战争作准备。1926 年 5 月初，叶挺率领独立团为北伐先遣队，率先从广东省新会、肇庆出发，开始北伐。广东区委军委决定让聂荣臻任军委特派员，向带兵的共产党员传达中共中央和军委的指示，把下面的情况向上反映，帮助解决北伐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并沟通军队和各地中共组织的联系，派遣共产党员到北伐军中工作。

## 纵横赣粤，南昌起义第一枪

1927 年，宁汉合流，蒋介石、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此宣告失败！在这紧要关头中共中央断然决定发动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聂荣臻当时担负的是动员第二十五师起义的任务，这个任务非常艰巨，因为行动的成功与否关系到起义的主力能否顺利到位。

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是张发奎的亲信。该师辖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 3 个团。第七十三团的前身是叶挺独立团，团长周士第是共产党员。第七十四团团长是张发奎的人，第七十五团副营长孙一中，是黄埔一期的学生，当时任第七十五团中共支部书记，实际上掌握着这个团的领导权。根据这些情况，聂荣臻判断，是无法一下子把整个第二十五师全部拉走的。聂荣臻首先拉第七十三团。他与周士第商定，先把辎重装火车运走，部队接着向德安集中。他随后到第七十五

团。第七十五团与师部驻扎在一起，行动不便，他与孙一中确定，以野外演习的名义，只拿武器弹药，把该团三个营的部队拉出来，在第七十三团后面跟进。至于第七十四团，只带出一个侦察连，这个连的连长是共产党员。就这样，在聂荣臻等人的谋划下，整个行动环环相扣、一丝不苟，最终带出了二十五师绝大部分兵力。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2日拂晓时，革命的旗帜飘扬在南昌城头上，起义成功。聂荣臻到起义军指挥部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很高兴，说："没想到把第二十五师大部分拉出来了。"

起义后聂荣臻被任命为第十一军党代表，与叶挺一起领导十一军的工作。按照既定部署，起义军没有休整，于8月3日起，南下广东，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

起义部队9月中旬由福建进入粤东境内，几天时间已占领了大埔、潮州、汕头等地。随后，除留下部分部队留守外，主力部队集结到揭阳县城。其时，敌东路军代总指挥陈济棠率三个师和潮梅警备部队共15000多人，向丰顺进逼，企图与起义军决战。9月28日，战斗在揭阳汾水（今揭西县属）打响，起义军消灭敌军3000余人，自身也伤亡2000余人，无力再战，只好撤出战斗。这时，潮州、汕头及三河坝的起义留守军也相继失利。

这时面临的问题是：部队往哪里撤？聂荣臻和叶挺商量，叶挺说：去海陆丰不是好办法，因为我二十四师伤亡太大，二十五师又被隔在三河坝失去联系，向福建方向撤较好，那里敌人薄弱，只有张贞的一个师，又可以找到二十五师。这本来是个好主意，去福建自然别具慧眼，情况诚如叶挺所说，而且叶挺跟随孙中山时曾到过福建，对那里的情形有所了解。但是，若挥师北向，就与西去海陆丰的队伍分开了，最主要的是没有接到命令。作为党代表，有一种强烈的组织纪律观念，所以考虑再三，聂荣臻坚持认为，必须得到党的指示才能行动，这是基本原则绝不能变！最终，他们带着二十四师向西，经揭阳向普宁流沙撤退，到那里去找周恩来。

10月3日，部队抵达普宁流沙，与贺龙部、周恩来及前委委员李立三、恽代英等会合并开会总结。会议经过激烈讨论，最后决定实行周恩来提出的善后办法——丢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的旗帜，搞土地革命，武装人员撤至海陆丰，与当地农民武装会合，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非武装人员能留的留，不能留的就地解散，由当地农会会员带路向海边撤退，然后走水路撤往香港或上海。

会议正在开着，敌人突然袭击，突围中，周恩来、叶挺和聂荣臻三人一直在一起，他们最终在中共东江特委委员杨石魂的帮助下，在约半个月后的10月下旬，由杨石魂一路护送，挤在一叶扁舟中，在茫茫大海上颠簸了两天一夜，好不

容易才到了香港。他们也是最后一批离开东江的起义军领导人。

## 果断决策，广州起义挽狂澜

1927 年 11 月，到达香港后，省委安排聂荣臻到广东省委军委工作。这时，广东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正紧张地进行广州起义的组织准备。

事前，对于应不应该举行广州起义，省委内部曾有过争论。聂荣臻态度非常明确：不同意起义。他说："总的说，南昌起义刚失败，没有配合的余地；另外一方面，广州的工人纠察队已经解散，革命已经进入低潮"。事实上，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虽然粤、桂军阀为争夺广东地盘正在厮杀。但一旦举行起义，他们仍然会掉回头来一致对付革命。这些都是明显的事实。尽管发动广州起义也有些有利的条件，但两相比较，不利因素显然要大得多。当时的广东省军委委员黄锦辉也非常赞同他的意见。但广州起义是中央早就决定的，在当时，不同的意见只是说说而已。起义的准备工作仍在积极进行，省委的同志陆续离开香港，前往广州集中。起义前约一星期，聂荣臻和杨剑英也一起赶到广州。

起义原定在 12 月 13 日进行，但由于运送手榴弹的行动暴露，导致起义提前到 12 月 11 日凌晨。而起义军事总指挥叶挺按照省委事前的指示，起义前的几个小时才赶到广州。当时，教导团首先行动。天亮前，因为出其不意，起义军顺利占领了广州市珠江北岸包括市公安局、观音山、省长公署、火车站等几乎所有敌人据点。聂荣臻和起义其他领导人按原定计划进入公安局，将起义军指挥部设在这里。11 日午后，敌军一团进行反扑，占领了观音山，一度冲到了离公安局不远的公园前，后来聂荣臻和指挥部人员亲自参与了战斗，将敌人击退。

11 日晚，聂荣臻和叶挺就起义后的军事形势交换了意见。二人一致认为，当前局面务必谨防敌人的反扑，以及及时做好战略撤退的准备。但这个明智之见，遭到不懂军事又盲目乐观的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诺依曼的反对，认为这是想去当土匪，而张太雷等领导人也不懂军事，叶挺的正确主张没有被采纳。

果然不出聂荣臻和叶挺所料，从 12 日开始，形势越来越恶化。当天下午，张太雷遭敌伏击不幸牺牲，黄昏时观音山也失守，情况继续恶化。危急时刻，聂荣臻挺身而出，与叶挺一道果断决策撤退。关键时候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和黄锦辉同志分头向教导团和工人赤卫队通知撤离。最终，保全了这支革命队伍中的中坚力量——教导团的大部分同志，起义军约 1200 余人顺利撤退到花县，并进行了整编，被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师。随后按计划撤往海陆丰，为坚持海陆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聂荣臻在安排了教导团、警卫团撤退之后，便返回八旗会馆住地。此时敌人

已经在各个路口设立关卡，搜查路人，聂荣臻身上的钢笔也被搜了去，还好有惊无险，顺利通关。在住地停了几日之后，返回香港的省委机关。

在广州起义中，聂荣臻在起义策划的时候，就表现出了过人的判断和军事素质。在服从组织决定后、具体执行起义的过程中，他也表现出了过硬的军事本领和决断能力。

## 白色恐怖，香江蛰伏龙潜底

1927 年底，广州起义失败，聂荣臻回到香港。“在香港，因为兼省军委书记的张太雷同志牺牲了，省委决定，由我担任省军委书记、省委常委。从此以后，在香港两年多点的时间里，我们坚持着艰苦而又复杂的地下斗争。……在香港两年多的地下斗争，也是充满了危险的。……我们在香港先后被捕和牺牲过很多同志。我自己也三次遇到危险。”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如是回忆。

1927 年底至 1930 年初的两年多时间里，聂荣臻和他的战友们，潜伏在同样危险的香江彼岸，通过组织各种行动、调配革命力量，有力地支持了广东、广西的白区地下工作，为革命的胜利积蓄着力量。

期间，以聂荣臻为首的广东省军委，除了主要承担指导武装斗争、做敌军工作外，还组织、主持了以下几件重要工作：

第一，办理军事训练班。

到香港后，聂荣臻在其主持省委军委工作期间，为了解决当时军事人才奇缺的问题，他组织了军事训练班。训练班开始培训的是广州起义失败后到香港收拢的同志；后来主要培训两广来的同志。鉴于广州起义中我们同志普遍不懂军事技术，训练班把学习军事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聂荣臻亲自讲课，以自己经历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为例，结合黄埔军校工作和北伐战争的经验，并且引用太平天国的一些例子，娓娓道来，既是授课，也是对过往军事斗争工作的总结，期间培养了不少军事人才。

第二，办报。

聂荣臻还参与了省委主办的《香港小日报》的工作。这个报纸是公开发行的，虽然是以灰色面目出现，但对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劳苦大众说话发挥了一定作用。后来，办了大概一年后，还是遭到查封。、

第三，反“左”。

1929 年“五一”前夕，统治中央的李立三、向忠发命令香港党组织一定要搞“五一”游行活动。参与组织指挥的聂荣臻在游行前夕看到参加游行的很多都是骨干，有的还是各个区委的负责人，一旦游行就全部暴露，敌人一旦反扑，有一网打尽的危险，于是当机立断说服邓发，果断叫停。后来被李立三、向忠发等

人指责为“临阵脱逃”。聂荣臻据理力争，他们最终也无话可说。

第四，巡视东江苏区。

1929年10月底，聂荣臻以省委巡视员身份代表省委由香港前往东江苏区指导工作。他不顾个人安危，通过了敌人的一个个关卡来到东江，召集党、团特委领导人会议，听取汇报并有针对性地指示东江特委要利用当时红四军正在梅县、丰顺一带活动的有利条件开展秋收斗争，发动广大农民，扩大游击战争的区域，并对东江特委领导机构不健全的情况及时作出了调整，增强了东江特委的领导力量。回港后，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巡视东江所得的经验与教训》的文章，以“木”为笔名发表在1930年1月1日出版的、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学习》半月刊上。

## 身系革命，铮铮铁汉也柔情

1928年，为革命东奔西忙的聂荣臻，29岁依然孑然一身。由于香港的环境相对稳定，已近而立之年的他便开始在工作之余考虑物色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了。他眼前不时浮现出张瑞华的靓丽身影。

张瑞华，河南信阳人，1909年生，比聂荣臻小10岁，长得眉清目秀。原在信阳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北伐军打到武汉后，她投笔从戎，就读于武汉军校，开始了革命生涯。她那时已是中共党员，常到中和里军委机关。聂荣臻就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张瑞华，初次接触，张瑞华给聂荣臻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一年以后的广州起义中，聂荣臻在总指挥部再次见到了张瑞华，对她坚持请求参加危险性极大的肃反工作钦佩不已。

此时，张瑞华担任广东省委的机要交通员，来往于香港、广州两地，和聂荣臻的接触更多了。多次见到张瑞华，聂荣臻的心里泛起了涟漪：张瑞华不正是自己最理想的终身伴侣吗？他想了好久，决心试探一下姑娘的态度。

一天，两人见面后，聂荣臻鼓起勇气对张瑞华说：“瑞华同志，我在武汉时就认识你了，以后在广州暴动中又碰到了你。你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坚定、勇敢。不知道你对我的印象如何？”聂荣臻一口气说完一直憋在心里的话后，用热切的目光看着张瑞华。

聂荣臻的坦诚令张瑞华羞红了脸，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聂荣臻见状，心里有点底了，大胆表白：“我对你印象很好，你我都是共产党员，我们能不能建立比同志更进一步的关系？你考虑考虑，过几天回答我也可以。”

张瑞华的脸更红了，脑子像放电影一样，他的处事果断、有条不紊、指挥若定、英武神勇早已在她心里烙下难忘的印记，只是没有想到他作为自己上级的会如此率直地表白。这样的人，怎么不值得自己信赖呢？沉默片刻之后，她微笑地

抬起头，看到他热切真诚的眼睛，低声回答道："那好，我考虑考虑。"

两天后，聂荣臻再次问张瑞华时，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1928年4月，聂荣臻和张瑞华结婚了。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他们把各自简单的行李合到一起就开始共同生活了。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夫妻长期两地分居，他们年幼的女儿聂力被寄养在嘉定县一位贫苦农民的家里。一家三口最终团圆，则是1946年的事了。

在那疾风骤雨的年代，哪有过多的时间谈情说爱？斗争环境、革命工作决定了他们的恋爱是在特定的条件下进行的，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对革命忠诚而相互高度信任的基础上的。生死患难，相濡以沫，一路相伴走过64个春夏秋冬。

1930年1、2月间，聂荣臻被调往天津中共顺直省委工作。此后，他南征北战，为中国革命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成为一代名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孙莉娜）

# 叶剑英

## 与名人要人的故事

广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之一，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叶剑英元帅的故乡，也是他长期生活、战斗和工作过的地方。他为广东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广东，曾经留下了叶剑英的心血和汗水，留下了他的追求和向往，留下了他的忧伤和欢乐，同时也留下了许多反映他传奇人生和独具特色的个人魅力的故事。

### 保卫孙中山

1919年冬，叶剑英从云南讲武学校毕业后返回广东。他本想追随孙中山革命，但那时孙中山已被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军阀排挤，去了上海，孙中山组建的援闽粤军已出征到福建。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拒绝桂系军阀的拉拢，毅然离开广东，到漳州投奔粤军。

1921年秋，援闽粤军根据孙中山的指令，打回广东，驱



叶剑英

逐了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于1920年11月29日重新组织军政府。1921年4月7日，中华民国政府在广州成立，孙中山被选为非常大总统。

这期间，叶剑英接受军政府副官长吴铁城的邀请，参加副官处工作。不久，由吴铁城介绍，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孙中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的就职仪式上，叶剑英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他聆听了孙中山的就职演说，受到极大的鼓舞。

1921年10月15日，孙中山率领北伐军3万余人，到达桂林，准备取道湖南北伐。他将大本营设在桂林，并在这里开展了教育改造旧军队的整军工作。叶剑英以大总统随员身份，随孙中山到了桂林，被分配到军官教导团任连副，参加整军工作。

1922年2月3日，孙中山颁布动员令，命令各军出师北伐。可是，受孙中山委托留守广东的陈炯明野心勃勃，他不但与湖南军阀赵恒锡结成反对孙中山的联盟，阻挠北伐军通过湖南，对孙中山委托的留守后方接济北伐军的任务阳奉阴违，还派人刺杀积极接济北伐军的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

面对这种情况，孙中山决定暂回广州坐镇以稳定后方。这期间，孙中山组建了海军陆战队，归新任江防舰队司令陈策指挥。叶剑英被任命为海军陆战队营长。

听到孙中山要回广州的消息，陈炯明在惠州制定了谋害孙中山的计划：一是杀害于途中，二是杀害于火车站。这两计都未达到目的后，就部署公开的叛乱。

孙中山是6月1日回到广州的。6月16日清晨，陈炯明的亲信、粤桂边防督办叶举断绝交通，占领要害机关，以4000名士兵围攻广州观音山（即越秀山）前的总统府，炮轰孙中山的住所越秀楼。总统府顿时成了火海，孙中山急命60余人的卫队顽强抵抗。

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孙中山的秘书林植勉和参谋林树巍不顾一切，强架着孙中山走出越秀楼，冲出叛军的包围，向长堤天字码头奔去。

枪声四起，陈炯明叛军到处烧杀抢掠，羊城一片混乱。

当时，驻守在天字码头附近的海军陆战队打退了几股叛军的袭扰，还弄不清叛军作乱攻击的目标。叶剑英凭着自己学过炮兵的经验，判断出炮弹的落点在总统府方向，十分焦虑。他到海防司令部去见陈策，得知通往总统府的电话早就断了，情况不明，陈策急得团团转。于是，叶剑英和陈策商量决定派人去接应孙大总统。陈策下令派出几个小分队，从几个方向向总统府搜索前时，寻找孙中山的下落；同时命令叶剑英亲自带一个连守在码头岸边，随时接应孙中山登上“宝

璧”舰。

市区内枪声越来越紧，浓烟滚滚。叶剑英眼望着总统府的方向，时刻挂记着孙中山的安危。过了一会儿，只见几个人护卫着乔装打扮的孙中山走了过来。叶剑英迅速迎上前去，配合卫兵护送孙中山一行数人，乘小艇登上停泊在江中的“宝璧”舰。这是一艘内河浅水军舰，武器装备较差，攻防能力较弱。当天下午，陈策和叶剑英等护送孙中山转登“永翔”舰，第二天又改乘“永丰”舰。“永丰”舰后来改名为“中山”舰，是中国近代海军史上一艘有名的炮舰，抗战时期沉没，1997 年被打捞出水。

孙中山上“永丰”舰后，命令舰队移驻黄埔，并召集海军司令温树海、海军陆战队司令陈策以及各舰长官开会，决定令北伐军迅速回师戡乱，号召全军讨伐陈炯明。为配合北伐军回师，他还决定第二天亲率舰队沿珠江向广州市区挺进，狠狠打击叛军，“以保正义之不屈，政府威信之犹在”。

由于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告密，叶举调集大炮部署在珠江两岸，孙中山即下令各舰向白鹅潭进发。已升任大本营中校参谋的叶剑英，和“宝璧”舰舰长李芳一起，指挥全体官兵破浪前进。

在接近白鹅潭的时候，孙中山命令各舰开炮轰击大沙头、白云山、沙河、观音山、五层楼等处的叛军。叶剑英不但指挥，还亲自操炮、瞄准，一发发炮弹在观音山爆炸，顿时升起团团浓烟烈火。

叶举部署长堤、珠江岸边等地的部队，也一齐向孙中山的舰队开枪开炮。一发炮弹首先击中“永丰”舰，紧跟其后的“宝璧”舰也连中两发炮弹，甲板上起了火。叶剑英和李芳从容站在甲板上，边指挥炮手开炮还击，边命令舵手全速前进，终于到达白鹅潭。

孙中山率领的舰队刚到达白鹅潭，叶举的部队即集中炮火猛烈轰击舰队。入夜之后，整个白鹅潭陷入一片火海之中。枪弹、炮弹划出一道道亮光，落在军舰四周，爆炸溅起的浪花四处飞溅开去，落在人们的脸上和身上。

叶剑英命令“宝璧”舰紧靠“永丰”舰，做好应付各种不测的准备。他的用意十分明白，那就是一旦“永丰”舰上出现意外，可以随时接应大总统孙中山，保卫他的安全。他命令士兵们：“严密监视，防止敌人偷袭旗舰。”

叶剑英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夜色迷蒙的岸上，晃动一小股敌军，正向“永丰”舰发射炮火。叶剑英发现后，叫上几个士兵，说：“跟我上小舰。”小艇离开“宝璧”舰，悄悄接近敌人，突然发起猛烈进攻，将其击溃。

局势越来越紧急。而在这时，海军司令温树德又被陈炯明收买，公开背叛孙中山，使形势更加严峻。被困在“中山”舰上的孙中山，电令北伐军总司令李烈钧和总指挥许崇智班师返粤，急电在奉化祭奠其母亲逝世一周年的蒋介石返粤。

时间一天天过去。时值盛夏，骄阳似火，无遮无拦的军舰晒得像蒸笼一样。

因为被封锁，给养无法补充，缺米少盐，军心日渐不稳，不时有人开小差。“宝璧”舰的船体本来就小，又骤然增加了陆战队的人员，更加拥挤。白天烈日照晒，夜晚蚊虫叮咬，处境越来越艰难。

叶剑英既是大本营的参谋，又兼管着海军陆战队，奉命率领“宝璧”舰和陆战队的官兵担负着巡逻的任务。

一个多月过去了，无论官兵们如何艰苦奋战，形势的发展仍然对孙中山不利。他指望返粤的北伐军屡屡失败，不得不向江西和湖南退却。眼看北伐军回师讨逆的愿望落空，孙中山遂召开各舰长会议，决定离粤赴沪。8 月 9 日，孙中山乘炮艇转道香港去上海。

孙中山在广州蒙难的 55 天，叶剑英作为孙中山的追随者，率领士兵保卫着这位民主革命的伟大领袖，充分表现了他对孙中山的赤胆忠心。

## 敬佩周恩来

叶剑英与周恩来的交往始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4 年 9 月初，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的周恩来奉中共中央指示，来到大革命策源地广州，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长。

就在同一时期、同一地方，叶剑英作为一名普通的国民党员、追随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者，也正以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的身份，活跃在广州军界、政界，满腔热情地支持和参加国共合作的伟大事业。

周恩来回到广州，第一件大事就是坚决维护孙中山主持的革命政府的权威，参加指挥平息商团叛乱的作战。叶剑英奉命率建国粤军第二师部分官兵，同其他革命军一起，也参加了平叛作战。这次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是叶剑英第一次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参加战斗。

不久，周恩来调至黄埔军校，先任教官，后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在周恩来到来之前，已经担任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并亲自授课，成为当时黄埔军校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周恩来到黄埔军校后，立即投入政治部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向教职员工和学生灌输革命思想，教育他们不贪财、不怕死、精诚团结、救国救民，实现孙中山提出的武力与民众相结合的建军宗旨，使军校的政治工作日趋活跃，卓有成效。在办校和教学的过程中，叶剑英通过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直接或间接的交往，深深感觉到了共产党人的磊落胸怀和远大抱负，从而产生了敬佩之情，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是，他第一次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但是，由于中共党内有些同志认为他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不能轻易接收入党，因而使其愿望未能实现。

1925 年 1 月，盘踞在广东东江流域的广东军阀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之机，

依靠英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段祺瑞的军事援助，纠集反动军队准备进犯广东，妄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在中共区委的推动和支持下，广东留守政府决定出师东征，讨伐陈炯明。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黄埔军校，是东征军的中坚力量。周恩来作为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参加东征军的领导，负责政治工作。他领导政治部制定了严明的纪律和战时的宣传计划，在东征军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东征军分为左、中、右三路军。张民达任师长、叶剑英任参谋长的第二师，隶属右路军，充当先头部队参加作战。第二师于1925年2月底从广州沿广九路向淡水进发。出发前，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叶剑英制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并根据周恩来的要求，向部队官兵讲明此次作战的目的和意义，鼓励部队发扬猛进、猛攻、猛追、猛扑精神，奋勇进击。

部队连战连捷，很快到达淡水城郊。叶剑英实地考察地形，了解敌情，制定了完善的作战方案，向蒋介石、周恩来和苏联顾问报告，拟定与黄埔军校联合进攻淡水的作战计划。周恩来谦逊亲切的态度、机敏周密的思考，使叶剑英受到启发和教育。特别是在作战中，周恩来与各级党代表率先垂范，鼓励黄埔军校英勇杀敌的精神，更使叶剑英敬佩不已。淡水一战，革命军大获全胜，淡水转危为安。

艰难显奇才，困境识真知。叶剑英更深一层认识周恩来，是在淡水战役之后的白芒花镇。

当时，就下一步作战计划产生了激烈争论。以何应钦为代表的黄埔军校的军官们主张先打惠州。他们认为惠州是东江的支撑点，只要打下惠州，东江就不攻自破了。第二师师长张民达和参谋长叶剑英则力主对惠州围而不打，先以主力东进攻取潮汕，再回军取惠州。

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蒋介石站在何应钦一边说："攻克潮汕，这个意见好。不过要攻克潮汕，必须先攻克惠州。若先打潮汕，惠州之敌必倾巢而出，陷我于首尾应敌的处境。我军先打下惠州，就可以免去东征的后顾之忧。这是浅显的用兵之道，你们应该是懂得的！"

叶剑英仍然反对，他说："惠州城有'铁链锁孤舟，飞鹅水上浮。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之说，从来易守难攻，现在又有杨坤如的三四千人凭险防守。我军力量单薄，再加上连续战斗，官兵疲惫，后方的联络、供应有困难，一时难以攻下。洪兆麟、叶举部尚有两万余人，也离我们不远。我若先打惠州，他们就会来援，我军就会更加被动。要争取主动就得先追歼洪、叶部，直捣潮汕，然后回师，惠州自破。"

一个黄埔军校的军官说："惠州固然难攻，但以攻克淡水的精神，可一鼓破之。如果孤军深入潮汕，则免有后顾之忧。"

叶剑英针锋相对地说："潮汕是陈炯明军队的根据地，我们集中兵力打下那

里，他就没有了立足之地，这不能算是孤军深入，也不会有后顾之忧。”

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谁也说服不了谁。周恩来冷静地听取了双方的理由，认为暂时放弃惠州，集中兵力歼灭当面军事力量，夺取最后胜利，是正确的作战方针。虽然蒋介石是黄埔军校校长，周恩来是军校政治部主任，但周恩来以共产党人的特殊身份，果断地支持了叶剑英和张民达的意见，加之总司令许崇智和苏联顾问加伦也支持叶剑英和张民达的主张。于是右路军乘胜追击，攻克海丰，横扫潮汕，占领兴宁、梅县。结果，困守在惠州城的杨坤如部，见大势已去，便自动献城，不攻自破。

战役的结果表明，叶剑英、张民达的意见是正确的。周恩来在白芒花镇争论的关键时刻反对蒋介石的意见，支持叶剑英等的意见，这表明了周恩来坚持原则，具有雄才大略和深邃的智慧，使叶剑英由衷敬佩。

## 不让陈赓再“受委屈”

叶剑英和陈赓，是上世纪20年代平定商团叛乱和讨伐陈炯明东征的老战友。1947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叶剑英指挥解放广东的战役，率领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等主力部队向南挺进。

9月3日，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在江西的赣州迎接叶剑英的到来。久别重逢，重任在肩，两人都感到格外亲切。他们召开了作战会议，并联名将广东战役计划上报中央军委。叶剑英考虑到自己是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不仅要管军队，还要管地方的事情，难免分散精力，便向中央建议由陈赓统一指挥兵团和两广纵队的作战行动，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一致赞同，表示坚决服从陈赓的命令。陈赓不负使命和众望，指挥大军一举攻破国民党的所谓“湘粤联防”，很快就解放了广州。10月14日上午，陈赓电告叶剑英：第四兵团先头部队已接近广州市郊，守敌刘安琪的第二十一兵团已向南逃窜，他已命令第四兵团不进广州，直接向佛山、三水、四会、高要方向追击。叶剑英赞扬地说：“他这是把入城的光荣任务留给十五兵团。这个陈赓，虚怀若谷，大将风度！”

10月21日，叶剑英、方方等及第十五兵团负责人进到广州市。

陈赓指挥第四兵团以每天75公里的速度，连续五天追击，在阳江、阳春全歼国民党军的第二十一兵团，胜利结束了广东战役。10月27日，陈赓从曲江到广州向叶剑英汇报情况和请示下一步的作战。

得知陈赓要来，叶剑英让人在广州市东山找了一座原国民党官僚的公馆，一是让陈赓好好休息一下，二是作为他的临时司令部。

陈赓到达公馆后，看见房子宽阔华丽，内心很感谢叶剑英的精心安排。进入房后，随行人员安排住宿时叫苦不迭。原来不知是谁的疏忽，公馆内的家具全被

搬走了，连一张床都没有。警卫员好容易找到一把椅子，十分疲惫的陈赓坐到椅子上，看着部下愁眉苦脸、无计可施的样子，哈哈一笑说："不用忙了，赶快将地图铺在地板上，至于睡觉嘛，打地铺就挺好的，比山沟强多了。"按照陈赓的吩咐，参谋在地板上摆开地图，陈赓趴在地图上面研究敌情，夜里就睡在地板上。

第二天早晨，叶剑英和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以及邓华赶去看望。陈赓忙搬过椅子让叶剑英坐，自己和方方、邓华却站着。

"你也坐。"叶剑英坐下后，看到陈赓、方方、邓华仍然站着。再看看，整个屋里就只有一张椅子，便站起来，到各个房间看了一遍，每个房间都没有椅子，也没有桌子和床。

陈赓忙说："别看了，快听我给你汇报吧。"

叶剑英问："陈司令，你夜里就睡在这地板上?"

"不能睡？我的参座，这比初进上海的同志睡在大街上好多了。"

"你的身上可是有很多伤啊!"叶剑英说完看看方方和邓华。

方方不好意思地说："不知哪个单位干的，把家具全搬走了。"邓华说："太对不起你了，陈司令！你打到城边不进城，我们进来住下了，你来了却连张床也没有准备下，都怪我。"

叶剑英动情地说："陈赓呀！我们在广州接管了原国民党 137 个政权系统，78 个银行、工厂、仓库，83 个电业、工厂单位，还有 100 多所大中小学和 87 个军队医院、仓库，竟让你这个多次负伤、为解放广州立下大功的人来到这里第一夜睡在地板上，实在太不应该了!"

陈赓说："参座呀，你这样说我可就担当不起了。我只是临时在广州住几天，有无家具都无所谓，你们何必这样呢!"接着他还打趣道："这样可以保持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尽管陈赓对他在广州的第一晚就睡地铺这件事毫不在乎，但叶剑英一直把这件事记在心里。他知道陈赓连续作战一个多月，而且身上有几处伤，是应该让这位功臣好好休息的。

同年 12 月初，陈赓指挥大军在廉江一带阻击桂系张淦兵团后，准备按中央军委的部署向云南进军。为了筹备向云南进军的军需物品，陈赓再次来到广州，叶剑英事前特地叫人安排一处好房子让他好好休息。这时，朱光从长春调来任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组织上给朱光安排了一栋房子，但他尚未搬去住。于是，叶剑英就指示将这栋房子打扫干净，配齐家具先让陈赓居住。陈赓在这里舒舒服服地住了几天，暂时告别了疲劳。

进入 12 月份的广州，天气已经明显变冷。一天傍晚时分，气温开始下降，叶剑英边走边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去看看陈赓，这次可不能再让他像上次那

样受委屈了!”

叶剑英见到陈赓就说：“这次没有再睡地板吧?”

“谢谢参座的关心。”陈赓说，“这里睡得这么舒服，我真的不想回前线了。”

“那可不行，云南那边还等着你去指挥解放呢，我有再大的胆子也不敢留住你陈赓呀!”叶剑英说。

“让你参座说对了。”陈赓说，“所以你光让我睡好觉还不行，我这次可是来向你化缘的。”

叶剑英十分明白陈赓的意思，说：“讲吧，要什么我都满足你。”

陈赓：“我们在廉江把桂系张淦的兵团吃掉了，军委要我向云南进军，我需要一些军需用品。”

叶剑英：“没问题，你让人列个单子，我叫他们给你办。”

这时，叶剑英听见隔壁房子有人在争吵，原来是陈赓兵团的一名干部要求华南分局筹集数万双军鞋，但华南分局的一位干部表示有困难，双方各有理由，互不相让，便争了起来。叶剑英马上示意警卫员把他们喊过来，问清了情况后，对华南分局的那位干部说：“毛主席指示我，解放广州要依靠强大的第四兵团，广州解放后，要大力支援第四兵团向广西、云南进军。后方要服从前线，再大的困难也要想办法克服。”

那位华南分局的干部说：“是，我们一定做到。”

叶剑英加重语气说：“这是大局，做不好就是失职!”

“没那么严重。我也是没办法才来化缘的，请你们尽量帮助解决。”陈赓笑着对那位干部说，然后又转向第四兵团的干部说，“这里刚刚解放，也有很多困难，你应该体谅。有些问题可以慢慢再解决。”

叶剑英：“你那里是前线，广州比你好办得多。”

陈赓朝那两个干部说：“你们去商量一下吧。”

随后，叶剑英指示有关部门，克服重重困难，终于为第四兵团配备了数万双军鞋，为陈赓部队进军西南提供了后勤保障。

## “放跑”蒋介石

1949 年 4 月 21 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军进军的命令，从 20 日子夜起，第二、第三野战军在东起江阴，西至九江东北的湖口，长达 1000 里的战线上，胜利强渡长江天堑，彻底摧毁敌人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美国政府和国民党的“划江而治”以阻止中国革命前进的计划终于破产。当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时，原在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慌忙撤往广州。4 月 23 日，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延续 22 年的国民党反对统治的覆灭。

随着蒋家王朝的覆灭，蒋介石也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蒋介石于1949年5月逃到台湾后，仍妄图保住西南地区，建立以昆明、重庆为中心的西南根据地。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飞抵重庆，在山城活动了28天。9月22日，飞抵广州，主要是布置华南军事。10月3日飞回台湾。11月14日，蒋介石又从台北飞抵重庆。此时解放军已对重庆形成包围之势。11月29日，蒋介石所住的林园附近枪声大作，惊魂未定的蒋介石被迫连夜逃往机场，第二天飞抵成都。蒋介石的飞机刚刚起飞半小时，解放军就进入市区。12月7日，特务们截获一份情报，中共地下党组织已经成功地策反了第九十五军副军长杨晒轩，由他组织了一支“捉蒋敢死队”，准备在蒋离开市区去机场的路上活捉他。



叶剑英雕像

成都再也不能住下去了，12月10日下午，蒋介石在恐慌中从凤凰山机场升空。此时的蒋介石已经真正成为“惊弓之鸟”。

这时，解放军十五兵团已经解放了广州，并且接管了飞机场，但机场仍留有国民党人员。蒋介石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前，成都机场人员与广州机场联系，了解广州方向的天气情况。由于他们过去都在一个系统，互相很熟悉，所以无所顾忌。广州白云机场问：“是谁的飞机呀?”

成都方面说：“是蒋总裁的，下午2时从成都起飞，大约3时左右到广州上空，直接飞往台北。”

白云机场问：“坐什么飞机?”

成都方面说：“三架运输机，总裁在第二架上。”

白云机场得知这个信息，立即就报告到第十五兵团副司令兼参谋长洪学智。广州白云机场解放军接管负责人的意见，一是用战斗机把蒋介石座机迫降下来，二是干脆打下来。洪学智把他们找来，问他们把握性如何?

他们说：“机场现有战斗机，而且有好飞行员。飞行员中有一个原来是国民党空军中的‘四大金刚’之一，飞行技术很好。已经征求过他的意见，他说不成问题，积极要求执行这次特殊任务，争取立功。如果拦截不成，我们就用高射机关炮将它打下来。”

洪学智问：“你们觉得把握大吗?”

他们说：“没问题。”

“军中无戏言，你们把准备工作做扎实，我去请示参座。”

于是，洪学智到了叶剑英住的小楼。叶剑英正在找人谈话，洪学智把他叫出来，报告了情况。

叶剑英沉吟一会儿问："我们有这个能力吗？"

洪学智说："有一个解放过来的飞行员，原是国民党空军的'四大金刚'之一，飞行技术不错，他愿意执行这个任务。"

叶剑英说："这是大事。"

洪学智说："有点像西安事变。"

叶剑英说："倒是应该让他下来看看。"

洪学智说："那就这么办吧。"

叶剑英说："得请示中央。这样，你把此事报告中央。我们意见用战斗机迫降，或者打下来。"

洪学智说一声"好"，立刻去机要科发报给北京。

可是中央的指示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眼看飞机就要飞过来了，机场不断打电话催问。洪学智也很着急，就去同叶剑英商量。

叶剑英先问洪学智："北京有回音吗？"

洪学智说："没有呀！"

"没有，就不能干。"

"干脆先斩后奏，先打下来再说。"

"那样也不能干。"

"让头号战犯跑掉，太可惜。"

"可惜也好，不可惜也好，反正中央没有回音就不能干。"

"我们只是拦截下来，不伤害他。"

叶剑英还是摇头说："这也不能干。"

没有得到中央批准，叶剑英就不同意打蒋介石的座机。于是，洪学智只好放弃了打蒋介石的方案。蒋介石终于逃了一命，顺利地飞往台北。

（黄子云）

# 陶　铸

## 南粤执政十五年的第一书记

陶铸的名字，与广东紧紧地连在一起——这是不可剥离不能割断不能回避的历史。离开这个名字，广东的现代史就无法撰写。

中国，当年只有二十几个省，中国共产党的精英有数以万计，而只有陶铸，也只能是陶铸，才能在广东一待就是十五年，几乎一直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后来升为中南局第一书记，很长时间仍兼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陶铸的确也跟广东有缘。十几岁就从家乡湖南祁阳老家奔黄埔军校就读。然后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沿着粤北山间小道逃回老家。经过二十多年的苦斗，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满载广西剿匪荣誉又再回广东，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协助叶剑英主政华南。而后不久，叶剑英上调中央，他就为华南分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从此，他一生的黄金时代就在广东度过，一待就是整整十五年。

陶铸到广东没几年，毛泽东就问他："陶铸，你们那里110个县，你去了几个?"



陶铸夫妇

陶铸答："主席，我去了104个。"

毛泽东问乐昌县委书记："你们高山顶上那个卫生村，你去了吗？"

县委书记回答："我还没上去，陶书记上去了。"

许多广东当年的干部回忆，陶铸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只要能抽出时间就马不停蹄地往乡下跑。于是，广东的乡野田间，时常见到了陶铸的身影。

陶铸对广东的山水草木是十分有感情的。他远视路旁的松树，写出了《松树的风格》；他仰视广东蔚蓝天空的太阳，写下《太阳的光辉》……至今仍广为传颂。

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回忆她父亲主政广东的历史时曾说："我觉得父亲在广东15年的工作应该是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

而广东人对陶铸有何评说？归纳起来，认为陶铸对广东主要有三大功，有二过。

## 一大功：发展农业动真格

1953年，中央调叶剑英主持中南局工作，陶铸就接任主持广东省工作。这一年，也正是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陶铸把主要精力放到生产建设上来，他明确提出："发展农业是第一位任务。"

当时广东水利条件不好，每年种植水稻面积3000万亩，真正有水利设施灌溉的仅900多万亩。在陶铸的主持下，1954年全省开始兴修水利。在珠江三角洲，将许多单薄低矮的堤围，实行联围筑闸，塞支强干，加高增厚，兴修了樵北大围、增博大围、北江大堤等工程，以及一些引水、蓄水的小型农田水利。随着生产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转向修建大、中型水库工程。全省有名的水利、水电工程，如流溪河水电站、新丰江水电站、松涛水库、鹤地水库、高州水库、合水水库、南水水电站、汤溪水库等以及深圳水库、东深引水工程、珠江三角洲电动排灌系统，都是陶铸亲自决定的。全省24座蓄水1亿立方米以上的水库，几乎都有他视察留下的足迹。由于大兴水利，至1965年，全省80%以上农田都有了灌溉设备，再没有发生像1955年那样的全省性大旱和1959年东江那样的洪涝灾害。

陶铸十分重视农业科研工作。过去，广东水稻品种都是高秆的，遇到大风大雨常造成倒伏，严重影响产量，每亩产量只有四五百斤。1958 年，潮阳农民选育出矮脚南稻。翌年广东省农科院培育出广场矮、珍珠矮等矮秆高产良种，秆矮粗壮，每亩多施几十斤化肥，刮八九级大风也不会倒伏，因此亩产可以达到七八百斤，甚至一千斤。陶铸非常高兴，对农业科学家黄季芳、黄耀祥和农民育种家洪群英等给予大力表扬和鼓励，对全省农科工作是很大的推动。

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但是由于“左”的错误影响等原因，中央这一正确路线没有能够得到贯彻执行。但是陶铸和广东省委对于经济建设，仍然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用了最大力量发展农业生产，全省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到了 1965 年，粮食产量达到 244 亿斤，比 1949 年增长了 100 亿斤。解放前，广东每年要吃 11 亿斤泰国和外省大米，到这时不但实现了自给，每年还可调出 10 亿斤大米。蔗糖、芝麻、畜牧、生猪、水产品都增长了几倍。

为了抓好农村、抓好农业，陶铸注重培育农村先进典型。像清远的洲心、阳江的海陵岛、潮安枫溪的陈桥、东莞的虎门、花县的花东和花山、南海的大沥、中山的圣狮、万宁的华侨农场、兴宁的合水水库、乐昌的九峰山、新会的圭峰山、澄海的外砂大桥、肇庆的西江林场、湛江的雷州林业局、电白的博贺等地都是他精心培育和必去之地，或去蹲点调研，或去视察。1955 年广东大旱，为了解决粤西地区抗旱，他亲自到茂名、化州一带，总结和推广龙首的经验。1957 年他走了几十里山路到乐昌歧乐村，总结核对改善农村环境和卫生条件的经验，并向全省推广，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了取得第一手材料，在 1959 年他还亲自兼任一个时期中山县委书记。直至今天，这些单位的许多干部、群众都怀念与陶铸在一起的生动故事。

## 二大功：为中国改革开放探路

广东毗邻港澳，建国初期，香港的经济与广东相差不了多少，但仅仅十几年，香港就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而广东却仍十分落后，这主要是国内的政策问题。陶铸在沿海前沿，深深感受到国内的政策需要改革，管理体制需要改革。如何下手，他在那时已经做了一些大胆的探索。

由于生活差距大，宝安大批百姓逃港。为了制止逃港风，宝安县委经过反复研究，制定了一个适当放宽边防管理的“三个五政策”，即：农民一个月可以去香港 5 次；每次可以带回 5 块钱的东西；可以带 5 斤重的物品。这个政策于 1961 年 8 月 27 日以报告形式上报省委。9 月 25 日，广东省委给予回复，认为可以根据“管而不死，放而不乱，既有利于国家，又有利于群众”的原则进行管理，并

适当放开小额贸易，并要求边防线外的大队不得直接进行小额贸易。最后只允许沙鱼浦、文锦渡、罗湖、沙头角、沙头、蛇口和大铲七处为小额贸易进出口特定地点，贸易品种除水产鱼和收音机两项外，还有一些生产用品。

由于省委基本同意了这个报告，初次尝试开放的宝安县发展迅速。在当年全国进入困难时期，宝安竟然取得了大丰收。据1963年1月份宝安县召开的县三级干部会议上公布的数字，1962年全年总收入达到了3233万元，同比增长了17%，粮食达到了224万担，达到了历史上最高水平。1962年春节，沙头角公社批准656个社员出港探亲，春节后只有12个人没有及时返回来，但是随后这些人都陆续回来。此外，实施开放政策仅四个月，已有3099名外逃人员回来。

而这次宝安能够开放，前前后后都得到了当时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的默许甚至支持。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李富林回忆，宝安要求开放的措施报到省委后，陶铸不便于公开表示支持，但也没有反对。公开资料显示，在1959年至1964年之间，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曾六下宝安，为当时宝安县的发展“支招”和撑腰。

1961年5月1日，陶铸到宝安检查工作时批示，要“利用香港，建设宝安”，努力把深圳镇建成游览区。1个月后，陶铸再次视察宝安县，他说：“香港和宝安是城乡关系，香港是宝安的城市，宝安是香港的郊区。在深圳要建立游览区，让香港人到深圳游览。”宝安集资兴建了当时全国一流的深圳戏院、新园宾馆以及和平路、人民路等。陶铸十分高兴，让省建委的几位正副主任来深圳考察学习。

不管怎么说，在国内大唱社会主义赞歌的岁月，陶铸敢于默许宝安县委做些对外开放的探索，而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虽然后来迫于大形势而叫停了，但毕竟还是一场第一个吃螃蟹的探索，为1979年后的改革开放做了一场破冰式的探索。

在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实行按劳分配上的改革进行探索方面，大家印象最深的有三件事。

一是三年困难时期，他对办公共食堂，“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等“左”的错误，开始觉醒，并提出怀疑并逐步加以纠正。他在1960年初就开始调查研究，先后到东莞、新会、澄海、饶平和海南、湛江等地调研，多次到食堂中与群众吃饭、谈心，弄清了农村的真实情况。以陶铸为“第一把手”的省委下决心纠正“左”的错误，对全省发出了重要指示，还得到毛泽东的批示，转发各省市。为抓落实，从省市地县机关抽出几万名干部去开展整风、整社运动，恢复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决纠正“共产风”。凡是平调生产队的粮物，一律退还，由财政拨出1亿多元，进行退赔；各部门、企业无偿占用的农民土地，一律退还；迅速恢复农民自留地，占到耕地总面积的5%～7%；恢复开放自由市场，允许

农民家庭副业和自留地生产的产品上集市自由贸易；凡群众不愿参加的集体食堂可以解散。同时，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农业第一线，坚决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重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同时，还加大对农业的投资，有计划地提高63种农副产品的价格，给农民增加收入2.1亿元。陶铸亲自主持确定的这些有力措施，使广东农村在1961年发生了转折性的重大变化，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这比全国各地要早一年到两年。

二是1961年全省农村经过贯彻《人民公社六十条》，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陶铸到清远洲心公社蹲点，推广了联系产量责任制，即各户承包责任田，评定产量，超产奖励，有的按比例奖励，有的全奖全罚的做法。后来，在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上，报告了毛泽东，经中央批准，在新会、清远、惠阳、廉江、潮安、花县等八个县进行试验。在试验中，这种承包方法受到群众普遍欢迎，有些地方未经批准，也自发地搞起来了。但终因当时“左”的错误影响，不得不半途而废。到1965年，虽然结束了试验，但给干部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打下了思想基础。

三是陶铸敢于主张在经营管理上放宽放活。广东在财政方面，大体上都是包干上交，超收的大部分留给市、地、县作为地方建设资金。在粮食方面，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就实行了一定几年包干不变，各县完成上交任务后，多余粮食可以自由经营和处理。在外贸出口方面，各市、地、县组织出口收到的外汇给地方一定的留成，以用于地方进口农业生产资料，投入发展农业生产。60年代，广东鼓励发展水果生产，陶铸还兼任水产生产委员会主任。那时潮州柑生产始终起色不大，主要是国家规定的收购价格太低，以致种潮州柑收益不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64年，当地群众要求每斤柑提高一角钱的价格，这样农民才有利可图。但要改变收购价格，在当时是很难的事，因为柑橘价格权在中央。陶铸听了汇报后，果断决定采取灵活的办法，每斤柑给予一角钱的补贴。于是大大提高了种柑的积极性，扩大了面积，加强了管理，到1966年，潮州柑的产量达到解放以来的最高水平。

## 三大功：对知识分子情有独钟，广东文教事业大发展

当年广东省主抓意识形态的王匡回忆说：“陶铸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眼光和惊人的魄力，忠实地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尊重知识、爱惜人才，这些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就是陶铸首先提出来的。

许多知识分子对陶铸当年无微不至的关怀仍然记忆犹新。陶铸对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的爱护，就是团结高级知识分子的范例。陈寅恪在北平解放前夕，被傅

斯年和胡适强促南行，本想赴台湾，但到广州后就住下来，傅斯年曾多次催电，他一口回绝。有人劝他去香港，他说："香港是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于是他便留在岭南大学，以后又在中山大学任教。全国政协邀请他为政协委员，他谢绝了。郭沫若专门到广州敦促他到北京任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二所所长，他婉谢不就。

陶铸知道后，在1956年的一次全省高等院校教职员工的集会上，陶铸说："陈寅恪教授不去台湾，蒋介石要他去他都不去……我看他是好人！"这番话很快传到陈寅恪的耳朵里，这位正直的老知识分子深受感动，隔不久他找人对中山大学领导人冯乃超说："请你转告北京，全国政协委员本人愿意接受。"

在此期间，陶铸经常去看望陈寅恪，知道他因为用脑过度，常为失眠所苦，陶铸便嘱人从香港买进口的安眠药。1962年73岁的陈寅恪不慎跌断右腿，住进医院，陶铸便指示给他派专门护士，精心照顾，并亲自探望。为了方便他工作生活，吩咐学校为他配助手，以抄录文稿。在陈寅恪还未完全失明时，陶铸还指示中山大学在陈寅恪经常散步的院子里，修一条白色通道，以免他迷失方向。

陶铸关心知识分子，还有许多的美传。陶铸听知关山月作画，广州没有优质宣纸，他趁去北京开会时，专门跑到北京的琉璃厂买宣纸、买墨，回来后送给关山月。他去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大，回国没有给自己的女儿买一件小礼品，却用自己为数不多的出国津贴，为广东粤剧团买回一台放字幕的幻灯机。当他听知香港粤剧著名演员红线女要求从事电影事业时，他亲自做她的工作，劝她从事粤剧表演，并在广州妥善安排她，从而使红线女在粤剧战线上发挥更突出的作用，成为一代粤剧"皇后"……

陶铸尊重知识分子，也突出地反映他十分重视文化建设。他1951年调到广东，办的第一件事就与文化教育有关，就是在中山纪念堂附近，盖了一座当时来说还颇具规模的科学馆。珠江电影制片厂的筹建，也是他亲自决定的。《羊城晚报》的创办，是他提议和促成的。暨南大学的复建，是他一手支持的。他在广东工作多年，每年春天和秋天，必定要和广大教育工作者见面一次，谈形势，征求意见，听取批评，他把这种例会形成一种制度，戏称"春秋二祭"。

人无完人，正像陶铸的《太阳的光辉》所说：太阳也有黑点，何况人乎。陶铸在广东，也做了一些错事，而且有一些错事一直得不到广东人的谅解。若按陶斯亮的说法，其父应有三分过的话，笔者以为，主要是两点：

其一在土改问题上。广东解放较迟，土改开展也较迟。而且，广东华侨众多，一些属地主的家庭，其财产不光是靠剥削农民得来的，有许多是海外华侨汇来的钱购置的田地。再则，许多华侨在战争年代就倾资支持革命，广东长期的革命斗争，尤其在抗日战争，都得到华侨的无私的大力支持，他们是我们统战的对

象。所以，如何划分地主、富农的成分就很复杂。叶剑英、方方、古大存、冯白驹他们在解放初开展土改时，在把握政策上十分谨慎，认真区分辨别，对恶霸地主的掌握也特别严格，于是土改的速度就达不到中央的要求。

这时的新中国，形势真有些时不我待。解放不久，朝鲜战争爆发，蒋介石又在台湾住得不习惯，嫌寂寞、不够味，加紧反攻大陆。毛泽东再三要求广东加快土改的步伐，尽快把土地分到农民手中，像其他解放区一样通过分田分地，让农民盼望了几千年的“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得到实现，以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分享新中国建立的喜悦，把他们的热情调动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上来，创造财富，支援抗美援朝。这时，毛泽东嫌叶剑英他们的做法有些谨小慎微了，就耐不住了，立即派了在广西以速度快和手段果断著称的陶铸来加强广东的领导，任命他为华南分局第四书记，协助叶剑英主持华南工作。当然，陶铸那时只不过是“协助”，“主帅”仍是叶剑英，而陶铸在广西、东北那套土改方法与叶剑英那时的土改方法有些不同，因而产生了一些矛盾是十分正常的。于是毛泽东就把叶剑英调到中南局任第二书记。华南分局的书记就由陶铸当了。不久，毛泽东又派了大批的南下大军加强广东的土改工作。这样，广东土改就按陶铸的思路大刀阔斧地进行，这就伤害了一些华侨的利益。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习仲勋他们落实平反政策，才重新把当年没收了的华侨的房屋退回给华侨。

其二在“反地方主义”问题上。“反地方主义”有两次。第一次是1952年，主要是反以方方为首的“地方主义”。其实所谓“地方主义”均属子虚乌有。因为那年代，动不动就喜欢挂上什么“主义”的帽子，同时又加上什么“集团”。

那时的广东，上述已讲，因叶剑英、方方、古大存、冯白驹他们基于广东是著名侨乡，情况特殊、复杂，开展土改小心翼翼，步伐太慢。毛泽东不满，派了陶铸来，而后又派南下土改大军来，“要以大军挂帅”，把各地、市、县的第一把手通通换上南下大军，在使用干部等方面也注重“大军”，而忽视地方干部。

叶剑英一走，方方便被打成“地方主义”分子，受到了严厉的处分，最后调离广东。受株连的有一大批省、地、市、县干部。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逐渐予以平反昭雪。

1956年，海南区一些干部对陶铸他们对海南区和琼崖纵队的做法不满，海南区一些干部向中央、毛泽东写信反映情况，陶铸受不了，于是酿成第二次反“地方主义”。开始打击的是冯白驹等海南籍干部，接着又把矛头转向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副省长的老红军古大存。古大存、冯白驹经过激烈的斗争，最后在强大的攻势下，不得不违心地承认“错误”。结果，冯、古二人均被撤销省委书记、副省长职务，下放乡村劳动改造。冯白驹无法在广东生活下去，向中央申请调离广东。

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受极“左”路线打击近二十年的习仲勋到广东主

政，在习仲勋和继任省委书记任仲夷的主持下，冯白驹、古大存“地方主义”冤案才得到平反昭雪。

另外，反“瞒产”、搞“浮夸风”也应算为过。1958年，全国范围内头脑发热，搞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广东也同样犯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的错误，陶铸赞成支持“鼓足干劲搞生产，放开肚皮吃干饭”这个口号。农业生产遭受很大损失。1958年晚稻的高度密植，大批农业劳动力抽去大炼钢铁，使农业生产严重受阻；接着又大反“瞒产”，实行“吃三顿干饭不要钱”。到1959年4、5月，三顿干饭吃不下去了，许多农村吃稀粥都有困难，城市供应更紧张。这一年更错误提出“少种、高产、多收”的口号，造成种植面积减少几百万亩，加上东江地区严重水灾，农业大幅度减产。1958年各地报产量时开始出现虚报，出现“千斤水稻万斤薯”。陶铸亲自到东莞抓点，反对“瞒产”，促使他们虚报产量，促使全省“浮夸风”盛行，造成“吃三顿干饭不要钱”的假繁荣，没几天就吃光了米谷。粮食吃光了，加上饥荒，1960年全省与全国一样，在艰难困苦中苦度，全省不少地方饿死了人。

陶铸在反“瞒产”、“浮夸风”问题上勇于承认错误，迅速纠正错误，并采取有效措施，带领全省各级干部群众艰苦奋斗，终于渡过难关。对此，大部分广东人民还是对他谅解的。

## 结束语

值得庆幸的是陶铸有一个好女儿陶斯亮。

陶铸长期在广东工作，女儿亮亮是在广东长大的。陶铸的清廉作风对亮亮的成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就是亮亮到上海上大学后回广东度假，也被陶铸带到乡下体验生活。“文革”期间，陶铸被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亮亮在上海读书，当父亲撒手西去的时候，亮亮仍未见父亲最后一面。

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暗无天日，亮亮有冤无处诉，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亮亮以他父亲遗传的文学基因，写出了一篇《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在《人民日报》发表，其情其景，震撼了全国人民的心，唤起了全国人民对陶铸这位老一辈革命家的同情与共鸣。

（王国梁）

# 逸闻五则

## 电白与“电绿”

陶铸在广东重视绿化，全国出名，也造福千秋。目前，在南粤大地，还传颂着很多佳话。

先说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一次，听说越秀山的广播电视塔已建起来了，陶铸带领大家去检查。这个塔修建得真好呀。陶铸站在高高的越秀山上往下望，啧啧称赞着。但是，他的眉头又紧锁了：他见到对面的山坡，开得七上八下、零落不齐的梯田，山脚下的马路也不整洁，马路边上也没有绿化。他叫住身边的广州市长曾生说：“曾生同志，你这个市长看看，这边是雄伟壮观的铁塔，对面和脚下是零乱无章的一堆，太不雅观了。”曾生说：“我们正在计划整修!”他以为这一应付就可以过关了。没想到陶铸来个逼宫：“我不听你的计划，我要你半个月之内把路边栽上水竹，把对面的梯田整理成高级水平梯田。有什么困难?”市长说：“那要给我10台拖拉机和10台翻斗运输车!”陶铸爽快说：“好！我给你！半个月后，我来检查。”

陶铸说到做到，半个月后，他又登上越秀山，看到路边水竹翠绿欲滴的，远处的梯田错落有致，心里十分的高兴，对曾生赞不绝口。

有一次，在广州开辟一条新马路，路上有一棵榕树。为了调直马路，需要除掉这棵树。可是这棵百年大树，枝叶扶疏，已是自成一景。除掉又觉得不好，在广州市委领导犹豫不定的时候，陶铸听知了，一个电话挂到市委，他说：“这么一棵树，百年方能长成，从别处搬也搬不来。不要动他，把两边展宽就是了。”可见，陶铸对于美化环境，真是无微不至。目前，广州成为一个美丽之城，可说陶铸功不可没。

又有一次，他到粤东某县检查工作，白天下乡，回到县城吃饭后，与县委书记数人上街散步。陶铸看到马路两旁新种了树苗，因怕行人攀折，用竹子编成竹筐，倒笼树苗，但竹筐只放在地面，不少筐歪歪歪斜斜，有的倒了，把树苗也压倒。陶铸一见，很恼火，对县委书记说："种树，不能马马虎虎。你们就是不认真，连马路的树都种不好，荒山荒地种的树更不用说了。种下树苗，必须围好，保护好。竹木护栏，必须插入地中。要有人专管，旱时还要浇水。"

那位县委书记被批得满脸通红，哑口无言。

陶铸接着又问："这种的是什么树？"

当时公路旁大多种的是大叶桉，干部大都懂。不知这位县委书记是真不懂，还是被批懵了，一时回答不出来。

陶铸更火了："你连桉树都不懂，还当什么县委书记？你知道桉树有多少种么！按树有数百种。现在南方就有大叶桉、细叶桉、柠檬桉、蓝桉、白皮桉、千层桉数种。你连最普通的大叶桉都不懂！"

陶铸一路上又见到树苗歪歪斜斜，保护好的很少，他越见越火，越气越批，越批越气。这位县委书记被批怕了，放慢了脚步，跟在后头，不敢同行了。

回到汕头时，陶铸对当时的地委书记罗天说："你们那位县委书记不行吧！不懂桉树，工作马马虎虎，请地委去了解考察，不行就调换！"

可是，他对知识面广的干部常常称赞不已。他对电白的王占鳌就赞不绝口。

有一次，陶铸到电白视察，对王占鳌他们说："你们电白有一首民谣：'天雨未晴土先干，十日太阳旱煞人，风来沙尘遮天日，大好良田变沙滩。'就是灾害多嘛！你们一定要注重造林，兴修水利，防风防旱。"

他又问王占鳌："你们电白县的名字有什么来历呀？"

王占鳌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电白多灾多难，一穷二白，所以叫电白；另一种是传说电白有一大山，叫浮山岭，山中有一龙潭，水深莫测，投石潭中，电闪雷鸣，一片光白，故叫电白。"

陶铸说："你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搞好植树造林，实现大地园林化，下决心把电白变电绿呀！我见你们的《电白县志》有这么的记载，清初，电白沿海刮了一场台风，因沿海一带是一片海滩，没有树林，因此暴风一来，飞沙走石，淹没了房屋和农田，过后，清朝皇帝派了一个钦差大臣来，强令沿海居民搬迁，后撤40里，而群众就是不听，他们恋故土，就是不搬。我们共产党人一贯主张改造世界，要思变，不能思迁呀！"

在陶铸的引导和支持下，电白的绿化终于搞起来了。没几年电白处处绿树成荫，沙滩上都种上防风林带，成为海滨上的绿色长城。陶铸一见，满心高兴，当即作诗。

诗曰：

电白竟成绿化城，
何处植树不成荫；
沧海也教精卫塞，
只在无心与有心。

## 还乡自省

1958 年底，陶铸回到自己的湖南老家祈阳县调查研究。

这几年，他常常地感到：反右、“大跃进”之后，“左”的指导思想逐渐形成统治力量，敢讲真话、讲心里话的人不多了。他在广东下去摸情况，已不像从前那样，能随时随地听到下面的心声了。于是，他决定回自己的老家看一看家乡的实际情况。

这时，正值隆冬，山野阳光明媚，白云缭绕。他一行人来到石门公社石峰大队第四生产队，去看他们的公共食堂。

陶铸笑着说：“怎么？你们对我这个祈阳老乡，还不敢讲真话?”他坦率地和乡亲们拉起了家常：“吃公共食堂、男女老少，人这么多，有的要吃干的，有的要吃稀的，口味也不一样。再说，家家养个猪还要馊水，到底方便不方便？现今政策哪些好，哪些不好，你们怎么想就怎么讲。”

社员一看，陶铸这么亲近随和，就你一言，我一语的说开了。

有的说：“好吆事啊，早先敞开肚皮吃，吃饱了，睡懒觉。现在公共食堂连清汤稀饭也喝不上了，哪还想到馊水喂猪喽!”

他们一行又来到归阳公社。陶铸看到几个过路的农民，便亲切地与他们打招呼：“你们是哪里来的啊?”

一位农民回答说：“祈阳潘阳埠的。”

陶铸自我介绍说：“我们是老乡啊，你认得我吗?”

“没见过，不认得。”那个农民回答说

陶铸又说：“我叫陶铸。”

农民听说是陶铸回来了，就放下挑子，坐下聊开了。当陶铸发现他们有的得了水肿病，他亲手去一个个摸着，按着他们发肿的腿脚，心情沉重地说：“潘家埠是个好地方，搞成这个样子，是我的工作没做好，我对不起大家。”说着，他浓眉紧锁，焦虑不安，好像有块石头压在心窝上。

家乡这一行，让陶铸深深自省：造成三年自然灾害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出了问题，不严肃认真检查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不从主观上找原因，一味推客观，这绝不是共产党人的风格。他首先想到的是：在“大跃进”的“浮夸风”

铺天盖地的卷来时，他脑子发过热。记得1958年7月在中南五省农业协作会上，各兄弟省之间互相攀比增产指标的情况相当严重，其中尤以河南提出的高指标最为惊人，而广东相比明显“落后”了。陶铸顶不住了，回到广东对省委其他负责人说：“再不浮夸，就是态度问题了。”于是“浮夸风”就在广东开始泛滥了。为了实现高指标，广东盲目提出水稻高度密植。广东连县星子乡田北庄放了一颗“卫星”，把60亩即将成熟收割的禾穗集中在一亩田里，加上重复过秤，放了一颗亩产30218公斤的所谓“特大卫星”。这些不可置信的“奇迹”在报刊上大肆宣扬。他头脑一时发热，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召开的全省干部大会上，号召农民“放开肚皮吃三顿干饭不要钱”，他还说过“现在我们手上的粮食，已经多得没地方放了”。就这次大会后，全省大办公共食堂，有的地方，还搞了“吃饭比赛”，高用粮，高估产，高征购和随之而来的取消自留地和农民家庭副业，共产主义的“穷过渡”使刚刚吃上饱饭的广大农民，又陷入人为的灾祸之中……

家乡的冬日西斜了，晚风凛冽，吹得陶铸一个打颤。他头脑清醒了：真的，我们共产党员再也不能干傻事了！

回到广东，他亲自向党和毛泽东主席作了书面检讨，认为他在1958年领导的广东工作中“估计高了，用粮多了，战线长了”。

后来，毛泽东作了批示说：“早在1959年初，就有两个省向中央作了检讨，这两个省就是广东、湖北。”表扬陶铸、王任重敢于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敢于说真话，勇于承担责任。对于“大跃进”、“浮夸风”的错误，在1959年潮州万人大会上，陶铸就首先向群众作公开检讨。在这之后，他在党内外三番五次地进行自我批评。

## 培育“洲心经验”

为了抓好农村，抓好农业，他十分注重培育农村先进典型。像清远的洲心、阳江的海陵岛、潮安枫溪的陈桥、东莞的虎门、花县的花东和花山、南海的大沥、中山的圣狮、万宁的华侨农场、兴宁的合水水库、乐昌的九峰山、新会的圭峰山、澄海的外砂大桥、肇庆的西江林场、湛江的雷州林业局、电白的贺博等。

清远县洲心公社实行产量责任制的经验，就是陶铸一手扶植和推广起来的，曾得到毛泽东的肯定，里面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上世纪60年代的洲心公社是广东清远县的一个粮产区，是先进公社之一。这个公社为了寻求解决生产责任制的途径，进行了较长时期的探索。从1961年早造开始实行“田间管理到户的评比奖罚”的生产责任制之后，过去管理工作“打大捞”的情况有所改变。但是还不能彻底改变农活的质量问题。田间管理的质量要求虽然规定了一套详尽的标准，可是执行中往往流于形式。为了进一步改

进生产责任制，1961 年晚造，洲心公社部分大队在“田间管理到户”的基础上，订出了“到户田”的产量指标，交给社员管理，每一个社员对自己所管理的农活都要负起产量的责任，并且规定了超产奖励，只奖不罚。这样一来，社员积极性甚高，纷纷为“到户田”加工加肥，争取超产。群众普遍欢迎这种做法，说这才是真正的责任制。于是该公社各生产队都相继实行，到 1962 年早造已逐步发展成为一套比较完整的产量责任制。即是在生产队统一核算的基础上，实行水稻田间管理固定地段，包工定产，对产量负责，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1962 年，洲心公社早造在遭受严重洪水灾的情况下，全公社粮食总产量比 1961 年增产 21%，社员超产粮 55 万斤。1963 年虽然遭受到近百年罕见的大旱，全社早、晚两造仍获得大丰收，总产量比 1962 年增加 19.6%；亩产平均 852 斤，比 1962 年增加 12%。

1962 年 6 月，夏日炎炎，陶铸身着衬衣，大汗涔涔地带着工作组来到洲心公社调研。他十分赞赏他们的做法，将这种做法誉为“洲心经验”。陶铸在深入各大队、生产队调研时就满心欢喜地说：“‘洲心经验’就是把私人的积极性和集体的积极性高度结合起来”。1962 年 7 月 27 日，广东省委向全省转发《介绍清远县洲心公社实行的产量责任制——批转省委工作组的一个调查报告》，肯定：“洲心公社实行固定地段，包工定产，对产负责，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是一个好的管理制度。这种制度是当前生产队经营管理工作中的一项值得重视的经验。”于是“洲心经验”就在全省范围内普遍推广起来。

1962 年 6 月 6 日至 7 日，陶铸、王任重又来到广西桂林专区的龙胜县进行调研，访问了日新公社都坪大队更坪生产队和中岭生产队。这是一个深山区，因为土地分散经营，没有受到“大帮哄”的冲击，除了交粮纳税，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还未遭受饥饿之苦，陶铸从这个生产队的经验中更深深感到“洲心经验”的成功之处。他就决心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道路。

广西龙胜调研后，陶铸返回广东。时任中南局第二书记的王任重就赶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这次调查的情况和与陶铸商定的意见。

听完王任重的汇报后，毛泽东问：“陶铸的意见呢?”

王任重说：“陶铸主张实行分户管理，耕种统一，联产计酬，增产归个人。他们那里的清远洲心公社就是这样干的。”

毛泽东说：“对，是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

毛泽东接着阐述他的观点：“什么叫所有制呀？既然是自留地，农民愿意种什么，就种什么。既然归农民所有，他烧掉也可以。所有属于农民的东西归农民。”

毛泽东又问：“有些山区，居住分散，你估计单干户有多少?”

王任重答："也可能是10%，也可能低于这个数。单干，也是像广东那样，采取田间管理，包产到户。"

毛泽东"哦"了一声，点头同意。

王任重连夜给陶铸打电话："主席赞成你的意见。"

陶铸接电话后，第二天就找中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著名记者李普向中央写龙胜县的调查报告。李普以座谈记录的形式，以《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的问题》为题，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在农村建立生产责任制的建议。

毛泽东仔细地研究后，极为重视，在1962年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作了批示：

> 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各同志。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讨论。
>
> 毛泽东
>
> 七月二十二日

会议期间，毛泽东还特地把陶铸和王任重找去谈话，并交代陶铸、王任重："你们代中央起草一个包产到户的决定。"说罢，毛泽东又补充说："不是分田单干，包产到户还是集体经济的经营形式。"

陶铸和王任重回到住处，对决定的内容交换意见后，即由王任重执笔起草。

这时，有一个大区的负责人向毛泽东进言："可不能搞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单干就两极分化。我们那个地区，搞了单干，两极分化很厉害。"

毛泽东听后，对陶铸、王任重主张的包产到户又犹豫了。陶铸、王任重把决定的草稿送呈毛泽东后，也就再没有下文了。

陶铸本来还将广东清远县洲心公社实行的"田间管理到户评比奖罚"的生产责任制的典型材料，带去北戴河会议。然而，随之在北戴河会议上，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刚刚提出的要纠正"左"的思想，突然政治方向逆转，陶铸带去的"洲心经验"也就"死于腹中"了。

料不到，二十年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国农村改革成功了，而改革的成功所在还是土地经营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即是陶铸培育推广的"洲心经验"的再生，而且是更加发展和成功的形式，是适应和促进当前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形式。

# 白色甬道

上世纪60年代初，位于广州珠江畔的中山大学美丽校园，有一条并不十分引人注目的白色甬道，著名教授陈寅恪常常在清晨或黄昏的时候，在这里散步，从自家院子里走出，沿着白色甬道，来来去去，显得十分悠闲和自在……

这条白色甬道，就是陶铸指示大学专门为陈寅恪教授修的。陶铸为什么这么关心陈教授呢？说来话长。

陈寅恪教授是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解放前执教于清华大学。北平解放前夕，陈寅恪被傅斯年和胡适强促南行，抵广州后就不想再往台湾。当时广州尚未解放，傅斯年屡次电催他赴台，他一口回绝。有人劝他去香港，他说："香港是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于是陈寅恪先生便留在岭南大学，以后又在中山大学任教。

当时，陈寅恪教授因患眼疾，只求能在安定的晚年从事著述和学术研究，所以对一些社会活动一概不予过问。全国政协邀请他为政协委员，他谢绝了；郭沫若派专人到广州敦促他到北京任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二所所长，他婉言谢绝。这些本来是很正常的事，当时引起了一些人的闲言杂语，如何看待这样的老专家，是疏远他还是亲近他？而且有些人并不了解他，几次运动的锋芒几乎就要朝向这位学者身上。但是政务缠身的陶铸却把这事挂在心上。

1956年一次全省高等院校教职员工会上，陶铸说："陈寅恪教授不去台湾，蒋介石要他去他都不去，这本身就是爱国行动，应该叫爱国知识分子，我看他是好人！"大概这番话很快传到陈寅恪的耳朵里，这位正直的老知识分子为此深受感动，隔不久他找人对中山大学领导人冯乃超说："请你转告北京，全国政协委员我同意授受。"

从此，陶铸常常去看望陈寅恪。听说他因用脑过度，常为眼疾所苦，陶铸即嘱人从香港买进口的安眠药，交主管文教的王匡亲自送去。1962年，73岁的陈寅恪不慎跌断右腿，住进医院。陶铸得悉这一消息后，便指示给他派专职护士，轮班照顾。住院的第三天，他亲自到医院探望，并让专职护士长期照顾他。当时有人对此提出非议，陶铸义正词严道："陈教授双目失明，要不要配备一名护士？双目失明又摔断了腿，要不要再配备一名护士？瞎了眼睛还著书立说，要不要再配备一名护士？我看护士派少了，而不是不应派。"此后，为了老教授工作生活上的方便，陶铸还吩咐有关方面为他配备了助手，解决了抄录文稿之事。

不久，陈寅恪教授的双目完全失明了。陶铸知道后，便指示中山大学党委，在陈寅恪经常散步的院子里，修这条白色甬道，以免他迷失方向。

这一条普普通通的白色甬道，而它却是体现党关心知识分子友谊的桥梁。

陈寅恪教授，只是陶铸关心知识分子的一个生动例子。其实陶铸在广东工作，对知识分子的关爱，真是不胜枚举。在广东，他有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的朋友，例如知名教授、专家、学者杜国庠、陈耀真、毛文书、蒲蛰龙，都是他的知己，他经常亲自登门求教，促膝谈心。刚调入广州时，他住在北京路东四条一座小院，他就请著名作家刘白羽、华山跟他一起住；他一家在汉口洞庭湖街100号住了一年多，也把作家陈荒煤、王阑西请来一起住，经常推心置腹，谈理想、谈人生、谈文学，无所不谈。在60年代经济生活困难的日子，他亲自提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和归侨、港澳同胞中上层知名人士实行分级特供名单，每人每月一斤油，两斤猪肉，要广州市委负责保证供应。他对知识分子的关照，特别是对他们的研究创作，可说是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他到北京开会，还利用在会议的间隙，抽空到北京的琉璃厂买宣纸、买墨，送给画家关山月。他去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大，归国没有给自己的女儿买一件小礼品，却用自己为数不多的出国津贴，为广东粤剧团买回一台放字幕的幻灯机。当听知香港粤剧著名演员红线女要求从事电影事业时，他亲自做她的工作，劝她从事表演，还在广州妥善安排她，生活上关心她，从而使她在粤剧界上发挥突出的作用，成为一代粤剧“皇后”。

## “罢宴”与修宅

1960年秋日，南粤大地仍是艳阳高照。陶铸来到花县了解农村情况。吃早餐时，便发生了陶铸“罢宴事件”。

陶铸一贯要求自己很严格，地、县委领导当然早就知道，不敢给他大盘大碗的筵席。今天的早餐，是一盘肉包子和白粥。可是，陶铸都很生气道：“眼下农民生活很困难，都什么时候了，还给我吃这个！”说罢，拂袖而去。

这一来，弄得县委的同志十分尴尬，向秘书老丁“诉苦”：“我们又没准备什么，领导同志来，怎么难也得让大伙吃饭呀！这怎么是好？”并嘱随行的同志把准备了的早餐吃掉。陶铸都罢吃了，随行的虽然好长时间已缺油水、馋得厉害，但谁也不敢碰一下。老丁给县委同志出了个主意，弄点番薯，芋头来。

陶铸一见，便高兴起来，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大家和他一样，吃得津津有味。

尽管不是经济困难时期，陶铸也反对大吃大喝，最多就给个“四菜一汤”，多了就要挨批评，甚至“罢吃”，在陶铸周边工作的人，大都知道他这一脾气。有一次，他到梅县下乡，发现跟在他车后面的车子，带有肉类和汽水，他十分恼火。

他对县委书记说：“难道我们不能跟基层干部吃同样东西吗？为什么要带食品下乡？！”

县委书记赶忙把东西送回县。

在经济困难时期，陶铸为自己立下规定："不吃肉！"

陶铸对自己要求极严，真像他的名作《松树的风格》所说的一样，给别人的极多，要求别人的极少。

陶铸在广州，为珠江两岸的三万多水上人家建起了陆地住宅。当他晓得一些作家、画家、音乐家连工作室都没有时，他便指示广州市领导划出十几幢房子的湖边新村分配给作家、艺术家。可他自己从1951年调到广州工作后，却一直住在广州军区大院十九号一所并不宽敞的房子里。这座房子相当陈旧，碰上阴天，白天进屋还要开电灯，更很少见阳光。

有一天，王任重的女儿王小平找陶斯亮。她一进亮亮的房间里就说："亮亮，你们家的房子怎么这么黑？"

晚饭时，亮亮把这话告诉了爸爸。

陶铸笑着说："我们这房子蛮好嘛！"

其实，机关同志都知道这房子真的不行，因年久失修，早已属危房，曾多次提出要为他维修或换房，他都不答应。他常安慰家人道："这已经很不错了。生产上不去，住那么好的房子，吃那么好的饭，心里不过意，群众也不答应。"

直到1965年春，曾志身患多种疾病，医生坚持要她多晒太阳，他这才同意对这所住了近15年的旧房子进行维修。这也是陶铸四十多年来的革命生涯中，第一次同意改善一下自己的住房条件，也是人生的最后一次。

房子维修完了，陶铸外出开会回来，就把他和曾志多年节省下来的一万五千元全部上交组织，作为维修费。机关觉得公家维修房子，要私人出钱，不符合收支规定，表示很为难。

陶铸说："这房子既是给我个人修的，我就该自己出钱嘛！"

房子维修好后，他一天也没住过，就奉令上调北京去。

（江　凤）

# 李富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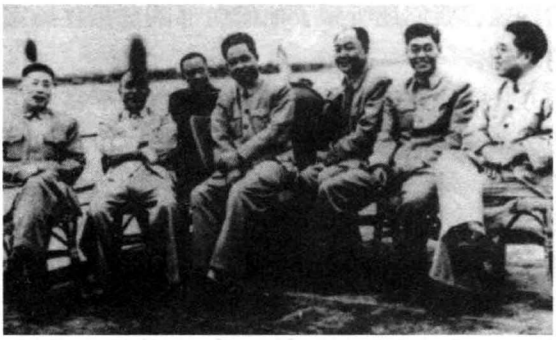
## 横刀立马撑危局

李富春在广东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自1925年7月从苏联回国后，到大革命失败这两年时间里，他在广东从事军队政治工作，整治湘军，组织政治讲习班，参加北伐；大革命失败后，他在上海坚持秘密工作，并于1929年10月到达香港，重新参与广东省委工作，历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代理书记、省委书记，1931年5月调离广东赴中央苏区工作。建国后，李富春作为财经领导人，曾陪同国家领导人到广州开会和视察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还被遣散到了广东。本文将以李富春在广东的这些经历为主线展开叙述。

### 南粤群英铸利剑

时光穿梭让我们回到从前。

1925年12月的一个夜晚，广州中山三路。冬夜的广州已经有些寒意，而这时的国民党中央党部附近的一座大葵棚内，气氛却很热烈，200多名青年男女聚集一堂，聚精会神地听着



1958年，宋世穷（左起）、李富春、余秋里、张霖之、赵尔陆、王鹤寿、彭涛在广东。

讲台上一位教官的集合训话。这位教官的年纪其实和台下的学员差不多大，瘦削精干的身材，宽宽的脑门，双目炯炯有神。他说话声音不大，严肃中却透着一份兄长式的循循善诱和随和。他的话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地将革命的三民主义思想娓娓道来，鼓舞大家坚定为革命献身的决心，提醒大家注意锻炼身体，培养吃苦耐劳、不怕牺牲的精神。这个青年教官就是8月刚从苏联回国不久、时任这期政治讲习班的班主任李富春。

学员中很多人对这位年轻的班主任已经不陌生了，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和他一样来自湖南，还有一部分人是湘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时的编余人员。他们知道这位教官虽然年纪轻轻，却在刚回来不久就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荣领国民革命军中将军衔。

他的讲话刚结束，学员们就使劲地鼓掌着。他们知道，这就是他们的榜样。在广州这初有寒意的季节里，他们却感觉到了如火一样的热情。革命的热火正在熊熊燃烧，他们知道，终有一天，他们会像这位青年教官那样，投身到这革命的洪流，干出一番波澜壮阔的事业。他们之中，就包含有黄克诚、段德昌、李天锡、洪涛、曾希圣等闪闪将星。

激情火热的1925！透过时光的广角，我们的眼睛依稀看到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忙碌在南粤大地。他们挺着胸膛，扬着青春的脸庞，迈着矫健的步伐，穿行在那喧闹的军营中。

我们看到在他们周围，逐渐聚集了一批同样优秀的青年。他们充实着李富春构建的第二军党代表制度架构下的各级岗位：在军、师两级政治部，在党务科、宣传科，在团、营、连党代表的岗位上，他们意气风发地工作着。他们实践着李富春提出的各级政治工作人员兼任各级党部领导工作的方针，将军队的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有效统一起来。他们或许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些实践和经验将会对今后党建设自己的军队起到多大的作用。

我们还看到李富春和他的伙伴们年轻的身影，总是出现在第二军各营地那些带有浓厚军阀习气的军官，以及来自底层阶级的士兵中间。我们仿佛看到了他们在台上的慷慨激昂，又仿佛看到了他们席地而坐的谆谆诱导。我们仿佛听到了他们在向官兵讲解三民主义，分析老百姓贫穷受苦的原因，以及要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道理；我们仿佛听到了他们宣传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

策，指出这些具体政策是革命成功的保证；我们还听到了他们向部队官兵宣扬官兵平等、军民团结、遵守革命纪律的道理。

我们依稀看到，在军长谭延闿的办公室，在副军长鲁涤平的家里，李富春是多么的谦让谨慎。他的沟通，让这两位老军阀头都感到了真诚和尊敬，由衷地对李富春表现出赏识和信任。于是我们看到，那些本有抵触情绪的官兵的转变是多么的迅速，效果是多么的明显。

……

历史对这些作了更为清晰的记录：

1925 年 7 月，李富春和蔡畅根据党的指示离开莫斯科回国，9 月抵达广州，不久，李富春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政治部主任、军法处长，领中将军衔。

1925 年，李富春到第二军后，立即着手健全各级党代表制度，组织军、师两级政治部，第二军下辖的第四、五、六师，分别由共产党员李六如、方维夏、萧劲光任党代表、政治部主任。军、师各有一名苏联顾问。政治部设党务、宣传（科），选派共产党员或进步青年军官从事宣传或党务工作。各团、营、连设党代表，负责基层政治工作。同时明确规定，各级政治工作人员兼任各级党部领导工作，使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统一起来，一切重大的军事、政治任务通过党部进行。这样做，既合法，又有力量，是李富春当时总结出来的一条重要的政治工作经验。当时国民党规定不准在国民革命军中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共产党支部，一切政治思想工作通过国民党各级组织去贯彻执行。实际上，在李富春领导下，军、师都建立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李富春担任第二军共产党党委书记。

1925 年底至 1926 年春，国民党中央决定举办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并指定由湘籍高级领导人所组成的湖南政治研究会具体领导。该会推举谭延闿、程潜、陈嘉佑、鲁涤平、毛泽东、林祖涵、李富春七人为理事，李富春为主任。根据李富春的建议，政治讲习班设置的课程主要有：国民党史、国民党政纲、三民主义、职工运动、国际主义与民族问题、帝国主义之由来及其性质、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国北方政治状况、广东农民运动实际状况、军事学、农民运动等 23 门课程。

……

不久以后，我们就能看到了这支改造后的军队爆发出的力量。我们仿佛在 1926 年 6 月 6 日，和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和李富春及他的伙伴们一起，见证了北伐誓师的历史时刻；以及后来势如破竹攻克新余、南昌、杭州和南京的战绩。

历史证明，1925 年秋天开始的由旧湘军改组而成的国民革命第二军，12 月底开始的主持政治讲习班，这两项由李富春主导的工作，都是党在南粤大地上展开轰轰烈烈革命行动中的浓墨重彩的画笔！这些工作实践，不仅为将来党的军队

政治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而且为党的军队工作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干部和人才。

## 横刀立马撑危局

1931 年 1 月 14 日夜，香港。宁静的街道传来几声狗吠，一群荷枪实弹的军警包围了一座民家二楼小院，紧接着从里面带出了几位身着长衫的男子。接下来几天，香港城里风声鹤唳。到 1 月 18 日，由于叛徒莫叔宝的出卖，广东省委机关 10 处被破获，52 名同志被捕。省委主要领导，除李富春外，全部被捕，押送到广州。

那是怎样的一个艰难岁月！大革命还在如火如荼的时候，不和谐的音符已经出现。

早在 1925 年 11 月 23 日，国民党右派召开西山会议，决议开除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国民党党籍；次年 3 月 20 日，国民党右派集团策划“中山舰事件”，共产党受到打击；1926 年 5 月 15 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会议，通过整理党务案，限制中共在该党内的活动；而 1927 年是中国革命最低潮的一年。这年 4 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接着李济深在广州大肆捕杀共产党人；5 月 21 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6 月，冯玉祥清除内部共产党员；7 月 15 日，汪精卫发动反共政变；12 月，广州起义爆发，张太雷牺牲；接下来的日子，恐怖气氛依然延续。1928 年 2 月，共产党员周文雍和陈铁军被国民党杀害于广州黄花岗；4 月，罗亦农被国民党杀害；5 月，向警予遇难；1929 年 10 月，彭湃被国民党杀害。

危难时刻已经到来！何去何从？如何挽回局面、摆脱危局？摆在年轻的李富春面前，是巨大的困难和压力。我们依稀可以感受到 80 年前的一个冬夜，他那焦虑而沉重的心情；我们依稀看到他那清癯的脸庞，焦虑中又透着镇定和坚毅。

他的夫人蔡畅此刻也伴随他左右，他们已经这样如影相伴了 10 个年头了。他们的女儿特特也已经 6 岁多，从还在襁褓中长成现在活泼可爱的小姑娘了。时间过得真快！看到身边可爱的女人和孩子，一直跟随他左右，一路迁移、奔忙、躲避、出生入死，不由得心中泛起了阵阵愧疚之意。他的内心也许不下一千次的慨叹和祈祷：我的女人啊，等我们把这旧社会不平等的枷锁打碎，等我们驱赶了那压在劳苦大众身上的贫穷、压榨和欺凌，等革命胜利了，人民幸福安居乐业之时，我一定要好好补偿你们！

这是怎样的一种信仰！这又是怎样的一种坚毅！即使只剩下一个人，还要去战斗！历史的记录明白地告诉我们，面对这样的白色恐怖，李富春丝毫没有退缩，让我们来看看他那临危不惧、力撑大局的行动吧。

1931 年 1 月 16 日和 22 日，李富春两次署名大盛，电告中共中央，即刻重组省委机关，由他、杨捷芳、袁策夷暂组常委进行工作；并明确指出，特科问题很严重，需要黎克明或其他负责同志的支持。他自己也曾提到这些工作的危险性：我一人兼接头、会议、交通，将省委各方面组织与县市委组织连接起来，无时不在危险中。

重组组织之外，李富春还及时进行总结：指出省委组织不严密，秘书处的工作更疏于形式；负责同志的行动随便，不懂得秘密工作的方式和方法，尤其对同志工作分配调动不注意，成为被破坏的主要原因。

经过一个多月在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3 月 20 日，回到香港后，李富春再次对混乱的省委工作提出总结和自我批评。在这短暂时间里，省委在贯彻四中全会决议、指导检查全省工作、营救被捕同志、秘密工作等都发生了大的问题，他说："在这种状况下进行工作，是艰苦万状，不但要在政治上奋斗，而且要在技术工作很小的问题上奋斗。"此时他主动要求留在广东省委继续工作，尽管当时他已经向中央说明，自己不懂广东话所造成的工作困境及中央已同意他调往更艰苦的苏区工作的请求（此刻国民党已经在对苏区进行围剿）。

李富春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和措施，通过检查和布置全省党组织的工作，建立组织与布置机关，加紧各地工作指导，派人到琼崖和东江恢复党的组织，布置红五月工作并制订相应计划，等等。到 1931 年 5 月初，广东省委党团组织关系已完全恢复，地下工作秩序也回归正常。

历史是这样记载李富春在中共广东省委的工作成绩的：

大革命失败后，从 1929 年 10 月到 1931 年 5 月，李富春主持广东省委的工作。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李富春经历了省委遭受大面积破坏、生命遭受危险的大危难之局，他在短暂的任期内组织了多次工人运动，并经受了党内斗争的考验。

1930 年，李富春领导下的广东省委，先后组织了广州五一游行罢工；反对机械工会行动；领导顺德丝厂工人运动和农村武装斗争；组织香港工人罢工援助上海"四·八"惨案，以及糖房、铁厂、同德、码头等工会反工头的斗争；组织粤汉路工人集会要求即日发粮的斗争；领导汕头印务工人斗争；海口海南数据纪念五一罢工；组织潮汕船业工人同盟罢工；等等。他还到广州市委参加会议，布置"五卅"示威和"六·二三"总示威活动。

1930 年 9 月参加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李富春立即停止了"立三路线"在广州等地的执行，取消各级行动委员会，恢复各级党团组织。1931 年 1 月 29 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派巡视员李震瀛到香港，进行反对四中全会的活动。广东省委决定"在省委未有接到中央已开四中全会通告及四中全会决议案以前，省委对四中全会的政治上组织上的决议无从讨论"，并于 2 月 1 日将此情况报告中央，使罗

章龙一派的分裂活动在广东没有造成不良后果。

“战退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这漫天的白雪，白色的恐怖，就当作是战退玉龙落下的残甲！坚定的信念支撑着李富春和他的同伴们，他们力撑危局，苦战严寒，因为他们相信有一天，这玉龙终将要被击退，革命的艳阳天一定会到来。

## 经世济国栋梁才

1954 年 11 月的一天，静静的珠江水缓缓流淌着。一眼望去，对面江中的二沙岛上还能看到很多绿色，虽然已近初冬，但南国的冬天似乎来得更晚些。李富春漫步在江边，看着似曾相识的景色，感慨万千，心情和 20 多年前在广州的时候大有不同。

此刻的李富春已经年过半百，头发有些花白，开始变得稀少。只是身材还是那么清瘦。风霜已经在雕刻他的脸庞，但是他的精神还是那么饱满，双眼充满睿智和祥和。

这段时间，他不像其他人那样放松，对晚上举办的舞会和电影也没有太多的兴致。因为此刻的他，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这次广州会议要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上了。

这次会议可谓巨星云集，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在内的几十位中央高层领导和 100 多名随行干部出席，目的就是为了给新中国制定第一个恢宏远大的五年发展计划。

一锤定音的时刻到了！李富春不由得回想起前几年的点点滴滴。他想起了 1950 年初夜以继日工作、商谈的两个月：那是新中国成立之初，1950 年 1 月中旬，由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展开的一次重要外交访问，在他们离开莫斯科之后，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李富春统筹会谈，和苏联达成了第一批 50 项大工程的援建项目，可谓硕果累累；他又想起了 1952 年 8 月起长达 10 个月第二次在苏联访问、商谈的日子，又是在他的总负责下，和苏联达成了援助我国建设大中型项目 91 项；他还想起了几个月前，他和来我国访问的苏联领导人米高扬会谈，再次达成援助我国建设大型项目 15 项。这三次会谈，确定了“一五”时期的 156 项工程。

现在，是时候对这些巨大工程定策了。想到这里，他不由得兴奋起来。那些辛苦，那些审查计划任务书、选择厂址、编制设计任务书、组织施工的艰苦日子，他都一一抛在了脑后。

历史告诉我们，“一五”计划非常成功！156 项工程的顺利建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也可以说，是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

基础。

后面的日子，在李富春的主持下，国家的“二五”计划和“三五”计划都相继制定和执行。其中，为了经济更好的运行，李富春在50年代中对毛主席提出的“多、快、好”的经济方针，还加上了一个“省”字，其为经济稳定有效运行的苦心一目了然。“大跃进”后，他又提出了“调整、巩固、提高”的方针，经周总理增加“充实”后，形成了著名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为国民经济的好转提供了政策指引。

多年的财经工作经验使李富春眼光超前。早在1958年，他在视察海南岛的时候，就提出了建设环岛铁路的设想。而如今，这个设想已经变成现实。

自1936年在陕北根据地时期开始，到后来的东北解放区，再到新中国，李富春一直奋斗在财经工作的岗位上，至其1975年逝世，前后跨度达40年之久。实际上，李富春是我国经济工作的第一代领军人物之一。他的辛勤工作和无私奉献，为共和国经济今后几十年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凛冽寒风有傲骨

1969年是寒风刺骨的一年。这年的10月20日上午，一架苏制伊尔18专机从北京起飞，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中午1点多钟，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机上一共有7户30多人，是这次从北京疏散到广州21户中的第一批，其中就有朱德、董必武和李富春。

李富春这时已经年近古稀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种种运动和风波，让老人忧心忡忡。这次被疏散到广州，他的心情非常差，睡眠也非常不好。他的牙齿不好，假牙坏了，让他吃不好饭。真是寝食难安。

更折磨他的，是思想上的痛苦。国家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个巨大的问号一直在李富春的脑海里，久久不去。在他的心里，这种疑问和他心中根深蒂固的信仰激烈的碰撞着，斗争着。他无法理解，也拒绝改变。

时光让我们回到1967年那个疯狂的年代，我们仿佛听到，2月的一天，在中南海怀仁堂里，对着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迸发出的一连串的怒问：运动要不要共产党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发出这些怒喝的，是一群真性情的汉子，在那个疯狂时代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的真汉子！李富春就是其中之一！

尽管后来被诬蔑为“反党俱乐部主任”、“三老四帅两帮凶”中的“三老”之一，又被扣上所谓“二月逆流”的帽子，李富春从来就没有后悔过，也没有动摇。他坚信心中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信仰，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就像他这几十年戎马生涯所经历的一样。他坚信那一天最终会到来。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1969 年 10 月到 1970 年 9 月，李富春和他的家人，在广东从化度过了近一年的艰难时间。

## 心持柔情更英雄



李富春和蔡畅在延安。

1975 年 1 月 8 日，中午，北京医院。冬天的阳光从窗户上透过来，让人感到一丝暖意。李富春躺在病床上，也感觉到了这份特别的温暖。但他只能一动不动、非常虚弱的躺着，晚期肺癌使他呼吸非常困难，只是意识还是清醒的。他平生第一次感到如此的无助，他知道，上天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白色，周围全都是洁净的白色，让人安静的白色。昨天，“姐姐”蔡畅来看过他，告诉他邓小平将要出任国家领导的消息，他高兴得一晚上都没睡好。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知道这个重大变化，想象着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党，又将重新走上正轨，心里很是激动。他已经没有太多的牵挂了，唯一让他割舍不下的，就是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他的爱人和女儿。

“姐姐”今天没来，她感冒了。她上午还给他来过电话，他告诉她一切都好。他是不想让她担心，而他知道，她没来是不想传染给他病菌。想到这里，他嘴角笑了一下，这个“姐姐”，还是那么心疼自己。

一想到“姐姐”，他就止不住自己的思绪。其实“姐姐”只比自己大 7 天而已，但是这个称呼，自己却叫了 53 年。是啊，53 年了！时间过得真快！这 53 年里，她只有他一个爱侣；而自己也一样，一生只被这一个女人吸引。

大家都说“姐姐”娴静慈爱，但是他知道，“姐姐”一见到他，总是变得热情洋溢。他总是忘不了“姐姐”的一个习惯动作：每次相隔一段时间没有见面，她总要捧住自己的两腮，细细地打量、抚摸，那个感觉真的妙不可言。

他的思绪继续飘飞，回到那段疯狂年代，不管他受到何种冲击，“姐姐”总是一直站在他身边，成为他坚持下去的支柱。他想，他是幸运的。

他的思绪又回到建国后那段忙碌而快乐的日子，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却还是保持了彼此的感觉和关爱。他想，他是充实的。

他想起了在延安那段简单而朝气蓬勃的岁月，他和她一起，也富有激情和朝

气。他想，他是快乐的。

他又想起了在广东战斗的那段岁月，那段火热和恐怖交织的岁月，她和他一起，出生入死，同甘共苦，不离不弃。他想，他是幸福的。

他的思绪继续飘啊飘，飘到了53年前遥远的法兰西国的塞纳河畔，在那里有他和“姐姐”的第一次亲吻，有和“姐姐”一起河上泛舟的背影。他和“姐姐”一起划着船，划啊划，一直划到了大海，消融在海天相交的一际……

1975年1月9日凌晨，李富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75岁。

（孙莉娜）

# 罗 明

## “罗明路线”让他名扬党内外

中共历史上30年代初曾发生一场矛头指向毛泽东的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罗明”就是出生于广东大埔的罗明。地处粤东北的大埔县，是个美丽的地方。这里山重水复，绿树成荫，进可攻，退可守，驻可藏，堪称天然的游击战场，是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央苏区县”。在大埔革命老区里，传颂着一位革命老人“为革命一生奋斗路坎坷，忠心为党留风范”的动人故事。

### 因所谓“罗明路线”被撤职

罗明，又名罗亦平，字善培。1901年9月出生在广东省大埔县平原乡岩下村。因家贫，7岁被卖至本县枫朗乡坎下村。1920年中学肄业后在大埔县百侯中学代课。这时，他受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追求革命真理，关心中华民族的兴亡。1921年夏，往福建厦门集美学校求学，备受革命思想的熏陶。

1924年1月24日，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国民党于广州



罗　明

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序幕揭开后，黄埔军校创建、“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广东反帝反封建运动风起云涌，成为全国工农革命运动的策源地。为了献身工农革命，罗明决定自筹经费前往广州。赴穗途经汕头时，遇团广东区委负责人之一、金山中学老同学蓝裕业，在他教育和启发下，罗明的思想更趋成熟，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服从革命斗争需要，赴厦门集美学校从事革命活动。

1925年6月19日，为声援上海工人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省港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罗明闻讯，从厦门起程经汕头，于7月初到达广州。

罗明到广州找到团广东区委后，被全国总工会期刊《工人之路》总编辑蓝裕业聘为省港工人罢工委员会采访员。为“全总”《工人之路》采访地方新闻尽力工作。同年9月，罗明根据团广东区委领导的指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广东大学。入学后几天，即加入学校团委组织的“新学生社”，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10天后，经饶卫华等介绍加入共青团组织，不久转为中共党员，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此后，罗明在中共广东大学支部的领导下，积极从事学生运动，带领学生参加反帝斗争。10月下旬，他奉任共青团广东区委宣传部干事，后兼任团广州地委宣传部长。为了做好团的宣传工作，他上午在学校读书，下午到宣传部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团组织的编写宣传小册子、兼管书报等任务。他还及时发展罗扬才、李党民等加入中共组织。并建议广东区党委将广东大学学生党员罗秋天转入福建厦门大学读书，并亲往厦门发展党团员，建立党团组织，招收农讲所学员，促成了闽南第一个共产党支部于1926年2月在厦门大学诞生。

1926年4月，罗明奉命返广州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秘书，负责主办地方党员干部训练班的同时，印发各种宣传资料，协助宣传部长张太雷出版《人民周刊》。

同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影响、推动和组织下，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为培养骨干，发展工农运动、罗明受中共广东区委指派，到汕头传达“开办东江工农人员养成所”的指示，并留汕头协助中共汕头地委创办“东江工农人员养成所”。

罗明在汕头协助中共汕头地委创办“东江工农人员养成所”期间，多次到校授课，向学员讲述汕头的历史，介绍广东各地工农运动情况。8月，罗明任中共汕头地委书记，成为党的一名成熟的领导干部。他深入潮梅各地，发动群众，组

织运输队，为北伐军挑粮草、运弹药、抬担架，以实际行动迎接北伐军。在罗明的领导下，潮梅地区革命形势蓬勃发展，汕头市成立了学生联合会、教师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在各系统建立工会的同时，成立了以杨石魂为委员长的汕头总工会。仅汕头地区就拥有三万余工会会员。农村出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大好形势。农会组织发展很快，仅澄海县 10 月份就发展农会会员一万多人。

汹涌澎湃的工农革命运动，引起了国民党右派和反动官僚的极端仇恨，他们互相勾结，制造事端、扣发运输工人的薪饷，殴打捕杀工农骨干。罗明发现这一情况，及时组织群众反击国民党右派势力，并决定由杨石魂亲率工农群众到国民党汕头留守司令部门前示威，迫使右派势力接受工人提出的抗议和正当要求。打击了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气焰，维护了工农群众的合法利益。为了提防国民党右派发动突然事变，罗明根据区党委的指示在潮梅工农运动发展较快的县建立了一万余人的秘密工农武装——自卫军，并在此基础上在各县建立农军模范队，发给洋枪。是年 10 月国民革命军在闽面失利。罗明得讯，立即和地委领导分赴粤东各边县，组织工农武装，突出的有饶平上饶狙击反动军阀，配合了北伐军的军事行动。

12 月中旬，潮汕工运领袖杨石魂往揭阳参加工代会期间，被右派势力绑架与监禁，罗明闻讯，立即与彭湃等人研究对策，组织工农群众，通过合法斗争，逼使国民党右派势力释放了杨石魂。不久，罗明接受党的决定，赴福建任中共闽南特委书记。

1927 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身在闽南领导革命斗争的罗明，仍然非常关心广东的革命斗争，他积极帮助粤东中共大埔县部委发展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打击反动土劣，整顿党组织。6 月上旬，中共大埔县部委组织农军，举行攻占大埔县城的军事行动，罗明亲率永定县农军来到大埔县城茶阳。

为帮助大埔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右派第一枪，罗明和黄埔军校毕业的罗法胜等，精心策划，使党领导的大埔县城第一次暴动取得成功。并建立了工农革命政府和县军事委员会。同时，他还通过中共大埔县委发展在广东大埔青溪保灵寺小学执教的张鼎丞加入中共组织，并及时派张鼎丞回闽西永定，后来成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

1928 年 6 月，罗明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会议，回来后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等职。在李立三“左”倾错误统治时期，由于他提出了对福建革命形势分析的不同意见，被指责为犯了“右倾错误”。但他革命信念坚定，继续根据福建的革命实际领导土地革命斗争。1930 年冬，为配合创建中央苏区，闽粤赣根据地成立，罗明历任中共闽粤赣特委组织部长、闽粤赣省委宣传部长、执行委员、省委书记等职。1932 年春，闽粤赣省委改为福建省委，他就任福建省委书记。在配

合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中，他在闽粤赣根据地内坚决执行毛泽东的一系列战略思想，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后方闽粤赣苏区作出了不少符合斗争实际的决策，为中央革命根据地赢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特别是对粤东北地区如何在中央苏区前沿开展斗争，配合苏区腹地的反“围剿”战争费心尽力，贡献了聪明才智。

1933 年 2 月，王明为推行“左”的冒险主义路线，导演了一场以反对毛泽东的政治军事战略思想为旨的所谓反“罗明路线”，罗明因此而被撤销职务。后调任中央党校教育处长。1934 年 10 月，参加长征，途中负伤后，经组织决定留贵阳郊区从事农运工作。在与当地党组织接不上关系的情况下，到上海找党组织。1935 年 10 月，在上海不幸被捕而失去组织关系。

## 坚持革命的离群孤雁

1936 年春，罗明出狱后回广东大埔，不久进入大埔县百侯中学任教员。

罗明在百侯镇任教时，除专心育人教书外，还时刻惦记着党。此时，他积极想尽办法寻找党组织，通过努力终于实现了愿望。1937 年暑假期间，罗明带着一部电台到福建龙岩，向闽粤赣省委领导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汇报了他被捕前后的情况，要求恢复党籍。虽然党组织还未能解决他的党籍问题，但他不灰心，而且经常与省委和地方党组织保持联系，按照党的指示进行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受聘任大埔百侯中学代校长，他非常关心当地党组织的工作，与党组织紧密配合，为大埔地下党组织解决了许多新问题。为了加强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他联络大埔几个中学的校长，发起组织了“大埔县各社团抗日救亡联席会议”，拟定纲领，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他鼓励学生参加青抗会、学抗会、妇抗会、战时美术宣传队、时代剧社等群众抗日团体，并亲自带领抗日宣传队，深入城乡，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还积极发动各阶层群众募捐，支援前线抗日。他注意做好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团结他们为党的抗日救亡工作共同出力。

主政百侯中学，他施行抗日救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五项教育方针，在校内部署改编补充适合抗战需要的各科教材，增购进步书籍报刊，悬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孙中山等人的画像。在他的努力下，该校为革命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人才。

1939 年，国民党右派掀起反共高潮，颁布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在形势急剧逆转的情况下，罗明当机立断，决定减少对校外的政治活动，加强对文化科学知识的教学，同时征得地下党同意，让大埔百侯中学部分师生集体加入国民党，借以应付敌人掩护革命。学校经济困难时，他带领全校教师自动减薪。并两

度到海外，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大埔百侯中学、石云中学筹措办学经费。

1942 年，中共南委受破坏时，局势十分恶劣，他按照中共南委书记方方的指示，冒着再次被捕和丧失生命的危险，配合地下党组织保护电台、掩护党的领导人转移。还通过杨德昭等上层人物的关系，把一批百侯中学的进步学生转移到外地。

1943 年，大埔早春大旱，加上日军侵占潮汕，大批难民沿韩江而上，广大群众啼饥叫苦。时又值南委事件后，党组织实行隐蔽精干，多数党员分散外出，罗明毅然挑起组织群众筹粮度荒的重任，深得民众褒赞。

当时罗明不是党员，但积极为党和人民担风冒险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怀疑，行动受到了监视。抗战胜利后，他摆脱国民党的监视，绕道平远大柘，经广州、香港，辗转新加坡等地。在海外，为抗日解放战争捐募了一批款物，由香港办事处转交，并为大埔石云中学等筹集建校和办学经费，为祖国、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 忠心为党留风范

1949 年 6 月，罗明受党的召唤回到广州。7 月，任潮梅行政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是年冬，他参与创建南方大学并任南方大学副校长。任职期间，他既关心学员的政治思想，又注重抓好教学工作，并想方设法改善学员的生活条件。呕心沥血地为培养党急需的大批干部埋头苦干，被师生们赞为“老黄牛”。1950 年 5 月，罗明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高等教育工作会议”，并作“关于南方大学政治思想教育”的发言，得到党中央的表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还单独接见了这位中央苏区时期，因王明导演的以反对毛泽东的政治军事战略思想为旨的所谓反“罗明路线”，被撤销福建省委书记职务改任中央党校教育处长的罗明。

1951 年，罗明被中共华南分局委任兼广东省土改工作团副团长，与李坚贞等率土改工作团深入到兴宁、龙川、揭阳等地领导土改试点工作，为广东全面铺开土改运动和建立一支庞大的土改工作队伍打下了基础。

此后，罗明的人生路途并非一帆风顺。次年，在“三反”运动中，他蒙受不白之冤，被诬告为“贪污分子”，受到审查、关押、批斗、撤职。毛泽东主席亲自对叶剑英、陶铸、方方作出指示：罗明一向艰苦朴素、作风好，为什么说是“大贪污”？应该复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心下，罗明被重新安排工作。1953 年 1 月任广东省民族学院筹备处副主任、副院长，后又受命赴海南岛筹建自治州首府。

1954 年，罗明任广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两年后升任主任。主政期

间，他深入实际，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曾随同工作组深入广西东兴各族自治县、十万大山等地体察民情、解决民族纠纷。

罗明在广东工作期间，还历任广东省人大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副主席和全国政协第三、四、五届委员，第六届常委。

在“文化大革命”中，罗明这位1925年入党，土地革命时期因思想、政见和毛泽东相同而被王明污蔑为“罗明路线”被撤职的老革命，更有着常人没有的苦难经历。他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在体弱多病的情况下，仍被强迫劳动。有一次在白云山植树劳动时，因疲劳过度，失足跌入深树洞中，三根腰椎骨折，致多年卧床不起。在跌伤得不到治疗，且仍受批斗、游街、管制的逆境中，罗明始终保持老革命战士的气节，坚持原则，维护革命利益，实事求是地为张鼎丞入党问题写了证明，为邓子恢的党籍问题，为陶铸、方毅、叶飞、方方、连贯、陈丕显、王德、曾志等人的某段历史写证明材料，保护了革命干部。1970年12月，罗明还及时向到广州指导工作的叶剑英揭发了陈伯达历史上的反共事实，维护了党的利益。

1980年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恢复了罗明的党籍，党龄从1925年算起。离雁归伍，他感到莫大的安慰，决心用有生之年为党多做工作，贡献余热。他积极撰写革命回忆录，参加党史研讨会，为存史、资政、育人忘我操劳，1981年完成《有关所谓“罗明路线”的真相》、《遵义会议前后》等回忆录和党史资料。1982年至1986年先后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华南七省市党史资料征集会议”，在广州召开的“闽粤赣边党史会议”、在龙岩召开的“闽粤赣党史征集会议”。重病住院期间，他深知为党工作的时间不长了，带病坚持修改各地寄来的党史文稿，为党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史料。他还积极动员华侨支持乡梓各种建设，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87年4月28日下午3时零5分，罗明因病情恶化，在广州与世长辞，走完了为党和人民奋斗的最后旅程，终年86岁。

（余　敏）

# 邓颖超

## “新娘子”与周恩来在粤海风雨泛舟

在邓颖超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天津是她革命活动的起点，广东则是她早期革命活动的“第二站”。她于1925年8月初抵广州，1927年4月下旬离开。她在广东虽然生活和战斗仅一年零八个月，却以其卓越的才能、丰富的妇女运动经验和辛勤的工作，对广东的妇女运动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也经历了逃脱广东“四一五”反革命政变遭敌人追捕的惊险一幕。

### 南下初到广州

1925年夏，邓颖超奉党的指示，离津南下，取道上海，前往广州开展妇女运动。在上海停留数日后，经过两天的海上颠簸，8月初她来到了广州。

邓颖超兴冲冲地下了船。码头上人山人海，她提着手提箱，在人群中挤来挤去，焦急地寻找那张她十分熟悉的英俊的



1925 年邓颖超的照片。

脸庞。可找来找去，就是不见周恩来的身影。她便叫了一辆人力车径自向周恩来寓所走去。

原来，这一天周恩来因为工作太忙，自己实在脱不开身，便一早急匆匆把一张邓颖超的照片交给警卫副官陈赓，要他代表自己到码头上按照片去接人。在码头上，陈赓也是急得大汗淋漓，在人群中穿过来穿过去，拿着照片找人。不巧的是，他们擦肩而过。

邓颖超到达广州的第二天，就去中共广东区委报到。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陈延年接见了她，并说明组织上安排她担任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还告诉她，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她同时要到国民党广东省妇女部，协助部长何香凝做广东妇女工作。最后，陈延年详细向邓颖超介绍了广东的复杂形势，希望邓颖超来了之后，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以外，要很好地配合周恩来，照顾好他的生活。

8 月 8 日，邓颖超与周恩来在广州结婚了。他们原本不准备举行什么仪式，也不准备设宴请客，一切从简。但黄埔军校的许多同事知道了这件事，非要见一见新娘子，还闹着要他们请客。周恩来见推却不了，便在自己的住所请了两桌客人。他们当中有国民党人邓演达、何应钦、钱大钧、张治中等，还有共产党人恽代英、熊雄、高语罕、陈赓、张婉华等。刚到广州的李富春和蔡畅也急急赶来参加。

新婚不久的邓颖超，很快便投入紧张的工作之中。她首先去拜访了何香凝。通过何香凝的介绍和指导，邓颖超很快便熟悉和了解了广东的妇女运动状况。她不辞辛苦，帮助何香凝制定各种妇女工作计划，起草报告、总结、电文等各种文稿。有时还主持妇女部的会议，代表何香凝出席各种会议。邓颖超与何香凝配合默契，经常一起参加活动，出席会议。何香凝只会粤语，不会普通话，当时汇集到广州的全国各地人都有，许多人听不懂粤语，常常由邓颖超做何香凝的翻译。在工作中，邓颖超与何香凝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也促进了党的妇女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

1925 年 8 月 20 日，发生了廖仲恺被暗杀事件。邓颖超十分震惊和悲痛，她立刻赶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去看望和慰问何香凝。当天下午，邓颖超出席了省港罢工工人会议，并发表演说。当说到廖仲恺先生不幸牺牲时，她希望工友们“负起民族解放的责任，作国民革命的先锋”，化悲痛为力量，踏着廖仲恺先生的血迹

前进！

邓颖超还无微不至地关怀何香凝的生活和健康，主动把妇女部的工作全部承担起来，不使何香凝分心。广州新学生总社召开悼念廖仲恺大会声讨国民党右派的罪行，邓颖超出席大会，并讲话。会后率领新学生社女学员去慰问廖夫人何香凝。当为廖仲恺举行国葬时，邓颖超搀扶着何香凝，陪伴她一起步行到临时墓地。对于缉凶的态度，邓颖超、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十分坚决，给何香凝以巨大的支持。

## 潮汕妇运的奠基人

1925 年 10 月，广东国民政府决定进行第二次东征，以平定盘踞在东江、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卷土重来、企图进攻广州的军阀陈炯明。周恩来担任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党代表。11 月下旬，邓颖超以广东国民党省党部潮梅特派员的身份来到潮汕，协助周恩来整理党务，指导妇女工作。

11 月 22 日，汕头市妇女界召开妇女联欢会，邓颖超代表广东省妇女解放协会，作了题为《今后的妇女运动和对汕头妇女界的希望》的报告。

邓颖超着重分析了中国发生妇女运动的原因，介绍了中国妇女运动发展的概况，并明确提出今后中国妇女运动的策略问题。“如果不注意最有力的工农阶级，最有力的妇女工农阶级，单靠几个知识界妇女的活动，是没力量的。况且本身全无组织，则发展零碎而进攻方略不一，既无总枢纽以指挥，阵线不免松懈而缺乏强烈之表现。因此今后妇女运动的基础，自不应建筑在几个人身上，而要包含广阔的加到工农妇女身上”。

她还针对实际情形，提出今后妇女运动发展的道路。“把自本地以至于广东以至于全国各个组合都统一起来”，“妇女问题是中国国民革命之一部分工作。妇女问题在国民革命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想要取消一切的压迫，不能不走国民革命的路，不能不引导所有妇女走到国民革命队伍中”。

随后，大会决定广东妇女解放协会潮汕分会，并通过了保护妇女利益的协会大纲。12 月，广东省妇协潮汕分会宣告成立，邓颖超、吴文兰被推举为正、副会长。

东征军占领汕头市后，又在闽边消灭了陈炯明军队残部，胜利结束了第二次东征。11 月 25 日，邓颖超参加了潮安县工农商学 1 万多人举行的庆祝东征胜利大会。会上她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号召潮安各界同胞“与国民革命军联合”，鼓励妇女“要帮助革命军打倒一切恶势力，以求达到中国之自由与平等的目的”。下旬，她还在潮州扶轮堂召开妇女活动分子座谈会。

1926 年 1 月，潮安县妇协成立。邓颖超亲临指导并赠送了会旗，还与当选执

委合影留念，给潮安妇女鼓舞很大。她在吴文兰的陪同下到澄海指导妇运。她深入到澄海中学、同善祠和岭亭村等地，召开青年和妇女骨干会，了解她们的要求，指明出路，并指示应把妇运工作迅速推广到农村中去。在潮汕妇协的推动促进下，惠来、揭阳、普宁、潮阳等也先后成立了县妇女解放协会。在邓颖超有力的领导和推动下，潮汕地区的妇女解放运动发展迅速，农村中也掀起运动热潮。会员从几百人到成千人不等，其中有三分之二是农村妇女。

1926 年 3 月 8 日，潮汕各界妇女云集汕头明星戏院，庆祝国际“三八”妇女节。来自各县数十团体约千余人参加大会。这是有史以来潮汕妇女第一次盛大集会。周恩来、邓颖超出席会议并讲了话，给到会妇女极大鼓舞。邓颖超向大家阐述了“三八”节的由来和意义，介绍了国内外纪念“三八”节的情况，并动员潮汕地区各阶层妇女全力支持国民革命。会后 1000 多名妇女上街游行，散发《广东妇协潮汕分会国际妇女日宣言》和“三八”特刊及各种传单，晚上还在明星戏院开游艺会，充分显示潮汕妇女组织起来的巨大作用和伟大力量。

邓颖超虽然在广东潮汕地区只工作了几个月的时间，但她以高昂的革命激情，忘我工作，广泛宣传、发动、组织广大妇女积极支持、参加国民革命，极大地推动了潮汕地区妇女运动的蓬勃发展。

## 统一广东妇女运动

“三八”节后不久，周恩来调离潮汕，邓颖超也随调广州。她从汕头回到广州后，立即着手开展统一广东省妇女运动和妇女组织的工作。

广东是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妇女运动和妇女团体都较其他省份活跃。但一直缺少联络，各自分散进行，而且妇女运动中也存在不同的派别斗争。邓颖超深感妇女运动不能团结统一，势必影响国民革命的力量。

1926 年 1 月 1 日，邓颖超曾在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和广东省党部合办的刊物《妇女之声》上发表《民国十四年的广东妇女运动》一文，总结广东一年来的妇女运动，提出统一广东妇女运动问题。她指出统一广东妇女运动极其重要、十分必要：“广东的妇女，不但已走上打倒帝国主义的战线，不但注意对外的奋斗，尤其注意进行严整的队伍与组织之统一。”，“一年来的妇女运动，虽然有相当的发展，日倾向于革命，但离成功之日尚远，全国的真实的联合，尚未实现。”

何香凝、蔡畅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于是在她们的共同推动下，1926 年广州市举行“三八”节万人大会，通过统一广东妇女运动的决议案，指出“妇女运动是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应该有联系的、统一的妇女运动……应谋广东各妇女团体之联合，应使广东妇女运动统一起来，以开统一全国妇女运动之先声”。决议案还号召广东、全国妇女运动的统一。

邓颖超从汕头回来后，联同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和广东省党部妇女部，召集广州市的妇女团体、女校学生和女工党部一起开会，成立广东省妇女联合会筹备会。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8月6日，广东妇女联合会正式成立。参加联合会的有五十余个妇女团体和工、农、学、商各界妇女。大会通过了会章，选举产生国民党中央、省、市三级妇女部，广东妇女协会等十三个妇女团体为执行委员，市立职业学校、车衣女工会等五个妇女团体为执行候补委员，并进行了工作分工。自此，广东省的妇女运动初步实现统一，有了统一的组织和领导机构，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 支援北伐战争


1925年8月8日邓颖超与周恩来结婚照。

广东国民政府在肃清陈炯明、邓本殷等军阀势力后，又经过1926年初的“梧州会议”，初步实现两广的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在中共广东区委的推动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于1926年6月4日通过出师北伐案。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

6月14日、21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第十师（师长陈铭枢）分别在黄沙车站出发北伐，邓颖超召集各界妇女前往车站欢送。何香凝、邓颖超也亲往致辞，并致送纪念旗。北伐军登车，各代表齐唱国民革命歌欢送，革命精神慷慨激昂。广东各界妇女还致书国民革命北伐军：“虽然是格于习惯，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不能够持枪挟弹，去战场上杀敌，但是我们愿本我们的热诚，去做救护、宣传的工作，辅助你们大功早成!”。她们除宣传慰问外，还组成妇女运输队、救护队，随军出征，热诚为北伐战争贡献力量。

北伐战争期间，何香凝、邓颖超等还十分注意培养妇女干部。邓颖超曾指出：“妇女运动之发展与否，当视本党妇女人才之多少为断。”6月6日，广东省立女师同学会召开成立大会，邓颖超代表省妇女部出席并发表演说：“以团结精神领导一般妇女，成为有组织有训练的妇女团体，从事革命工作。”

为加强培养和训练妇女干部，邓颖超同何香凝、蔡畅商定，以国民党中央党

部妇女部的名义，在广州举办一个妇女运动讲习所，以培养妇女运动骨干。9月15日，妇女运动讲习所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后楼正式开学。何香凝任所长，蔡畅为教务主任，邓颖超负责讲授“广东妇女运动”。这个讲习所只办了一期，为时半年。学员毕业后返回原地区从事妇女运动，成为该地区的妇女运动骨干。

与此同时，邓颖超还从广东妇女运动的情况出发，建议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与中山大学特别党部合办一个妇女运动人员训练班讲习所，专门培养广东妇运人才。她亲自担任所长，由陈铁军主持日常工作，学员由广州和各县妇女选送。10月11日，该所在中山大学西讲堂开学，为期3个月。学员共五十七名。学习内容有《帝国主义侵略史》、《妇女运动》、《社会问题》、《党的组织》、《宣传方法》等十多门学科。

这两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虽然办学时间较短，人数不多，但经过培训的学员素质都大大提高，在各地的妇运工作中均发挥了骨干作用。

## 羊城脱险离粤

1927年4月12日，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下令血腥屠杀共产党。4月15日，广东的国民党右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广州城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当时，邓颖超已住进广州市西关长寿路一家德国教会办的保生妇产医院。因难产，婴儿不幸夭折了。邓颖超十分悲痛，身体又极其虚弱。此前，周恩来已从广州调到上海的中央军委和组织部工作，并直接负责组织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广东“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中共广东区委立即指示所在地区的党员紧急撤离。凌晨时分，时任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秘书长的陈铁军冒着被军警抓捕的危险，装扮成一位贵妇人，并请一位叫沈卓清的党员扮成女佣，来到这家保生医院，找到邓颖超的病房，通知她赶快撤离。

此时，邓颖超刚动手术，身子十分虚弱，至今还不能下地走路，生活都是由自己的母亲照顾，说到转移，又谈何容易。无奈之下，只好求助主治医生王德馨女士。

王大夫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不过问政治，但人很正直，心地善良，对共产党印象不错。她知道邓颖超是广东妇女运动的领导人，又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夫人。在整个住院期间，邓颖超很尊敬她，与她建立很好的关系。随后，在王大夫的帮助下，邓颖超母女被迅速转移隐藏在医院后院的一间小屋里。

果然不出所料，邓颖超刚刚离开病房不久，一名军官带着许多士兵就冲进了

医院，问王大夫："你们这里住着的邓颖超在哪个病房？"王大夫沉着而又巧妙地回答："是有一位姓邓的产妇，她生下孩子后，在三天前已经出院了，你们不信就搜吧。"当时吵嚷的声音很大，医院的德国院长听到吵嚷声，马上出来了。他用严厉的声音说："这里是德国教会办的医院，不允许中国军队无理搜查！"那个国民党军官一看是一个洋人出来说话了，有点害怕，灰溜溜地带着士兵走了。

军警虽离去，但为了安全起见，王德馨女士每天派自己最贴心的护士长韩日修给邓颖超母女送药、送水、送饭。经过半个月的疗养，邓颖超的身体日渐恢复，可以自己下地走路了。

但是，反动派的搜捕并没有停止，且愈益加剧，邓颖超的处境越来越险恶。王德馨决定利用医院定期派人去香港采购药品的机会，将邓颖超母女送出广州。经过一番精心准备，邓颖超化装成护士，她的母亲杨振德扮成女佣。随后，王德馨女士又派护士长韩日修亲自护送邓颖超母女到沙面码头，登上一艘德国领事馆开往香港的电船，欲经香港乘船抵上海。

1927 年 5 月初，邓颖超机智勇敢地摆脱敌人的追捕，由香港转道来到上海，与周恩来团聚，夫妻相伴，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

（张启良　赵金地）

# 王震

## 名副其实的“实干家”

王震在战争年代是一名革命猛将，在和平时期又是一名建设闯将。他勇于并善于开创工作新局面，是我党著名的实干家。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他受命率领铁道兵在技术、装备落后的条件下修建铁路，为了保进度、抢工期，他把铁道兵总部从首都北京搬到现场。在他的有力指挥下，黎湛、鹰厦两条铁路相继提前建成投入使用，开创了中外铁路建设史上的奇迹。改革开放初期，面对各种不同的声音，王震以老一辈革命家的非凡气度和远见卓识，大力支持广东经济特区的建设和广东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他雷厉风行的实干精神，给广东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铁道兵司令员受命抢修黎湛线

1954年2月28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命令，任命王震为铁道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是我军陆军诸兵种组成部分。这是一支从战火中诞生、修路中成长的

铁道工程技术部队。

为加强海防建设，打破海上封锁，中央于1954年夏秋，决定抢建黎（塘）湛（江）、鹰（潭）厦（门）两条铁路。7月初，周恩来总理召集王震等铁道兵领导同志研究部署。周总理指出，这两条铁路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一条靠近台湾，一条靠近海南岛；在敌舰封锁东部海岸，阻挠我国对外通商的严重情况下，加紧抢建黎湛铁路，开辟湛江港，尤为重要。7月23日，中央军委向铁道兵下达了抢建黎湛、鹰厦铁路的命令。

8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召见王震，了解抢建黎湛、鹰厦铁路的准备情况。主席递给王震一本孙中山的《实业计划》，说："你翻翻这本书，倒是有些意思的"，"这位孙博士相当偏爱铁路啊！"

王震答道："是的，他辞掉临时大总统，去当铁路总裁。"

"书里有整整一章讲铁路，设想很大呢！"

"对对，包括黎湛线，鹰厦线也在规划之内。"

"规划归规划，实现不容易，这回要不是洋鬼子逼迫，还上不了马！"王震明白主席指的是抢修这两条铁路线的问题。主席很关心铁道兵这支部队目前的状况，能不能完成任务。王震想了想，向主席说明了目前的情况，部队多数已经从朝鲜战场回来，但是普遍想休整一下，建设正规化的国防军，不愿拉到山沟去修铁路。针对这个情况铁道兵党委已安排结合过渡时期总路线教育，深入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动员部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当前就是要集中兵力抢建黎湛、鹰厦线。

毛主席听后说："关键是快，要用抢修的精神，战斗的姿态！"

王震说："为了加强工程领导，我们准备把铁道兵总部机关也从北京搬到铁路工地去。"听见他这样讲，毛泽东接连说了三个"好、好、好！"

王震在接受了中央的任务后立即召开党委紧急会议传达中央和军委的决策，讨论实施中央决策的具体措施，并在会议进行中就发出调兵命令，调集铁道兵主力，分别从西北、东北等地向东南、华南进发。8月11日，王震立即飞往南宁，与广西省委领导商讨抢建黎湛线的问题，14日到达黎塘，抢在部队进入之前勘察现场。

黎湛铁路起自湘桂铁路的黎塘，向东南经贵县、玉林、陆川到广东河唇、廉江而达雷州半岛湛江港，全长317公里。它对于开辟新的出海口，巩固华南海防，支援海南岛和加强华南建设，都有很大作用。尤其湛江港位于广州湾内，是南方一个优良的深水港，与非洲、欧洲和东南亚近70个国家和地区互通海运，在中国对外贸易远洋海运网中占有重要地位，很有发展前途。早在1938年国民党政府就说要修这条铁路，还发行了铁路股票，可直到其垮台也没有正式开工。现在要用一年左右时间将它修通，其困难可以想像。王震本着繁荣经济、方便群

众、少占良田的原则，和勘测设计人员一起，凭借军用地图和十几年前的草测资料，从黎塘到湛江踏勘了沿线各个主要工点。

踏勘中，王震通过一个一个工点地察看现场，审查设计，周密计算，就地划分了各师管区，决定调集铁道兵六个师零一个团，并由广东广西动员5万民工，加上铁道部西南设计院第三勘测设计总队，共同抢建黎湛铁路。在工程指挥上，采取设计、基建、施工统一领导，现场定线，发现问题，就地解决，这就减少了矛盾，加快了设计和施工进度。部队8月接到命令，当月开到工地，9月底就全面展开施工。各师、团和民工队伍从黎塘到湛江一线摆开，分段突击，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真是“你追我赶逞英豪，三百公里红旗飘”。

在修建铁路的过程中，王震还不忘绿化铁路。王震说：“修铁路本身是件好事，好事应当做到底。光有铁路，没有树木，铁路也不好维护，将来旅客们坐在车上，看到两边光秃秃的也不舒服嘛！我们是共产主义者，考虑问题应当想得更远些，想到我们的子孙后代。我想，只要把这一点向部队讲清楚，大家也会同意的。为了下一代的幸福，我们多流一点汗，多付出一些劳动也是值得的啊……”王震亲自执笔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为了绿化黎湛铁路沿线的指示》。指示发下去后部队迅速掀起植树造林热潮，兵部机关也在清明节全体出动植树。当时天很旱，土地干裂，天也无雨，同志们带上锅瓢，盆桶，从湖里、河里提水浇树，司令员、副司令员、副政委和处长们都出来参战，大家展开挑水比赛，打着赤脚，挑着水桶跑来跑去，一时间路基两侧川流不息，欢歌笑语。

经过铁道兵指战员和广大民工奋勇拼搏，仅用10个月时间就高速度高质量地建成了铁路，1955年7月1日，黎湛线正式通车。王震亲自拉响了第一辆开往湛江的火车的汽笛。黎湛线是新中国修建的一条堪称模范的铁路，速度快、造价低、质量好，被祖国人民称之为“革命速度”，并赞誉铁道兵为“祖国铁路建设的突击队”。

## 促成深圳首批省部级单位投资办企业的项目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提出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试办出口特区。时任分管国防工业的副总理王震非常关注经济特区的建设，考虑如果能够在特区开辟一块地方，既可以加快发展国防工业，又可以利用国防工业的技术优势支持特区的建设，将是一件双赢的好事。

王震一贯说干就干，国家试办经济特区的决定话音未落，他就立即率领国防工办主任洪学智以及国防工办系统的航空工业部、七机部、八机部、电子工业部、兵器工业部等20余位部级领导，来到深圳进行实地考察。当时的深圳还是祖国南端一个不起眼的渔村，新成立的深圳市委就设在原宝安县委所在地新园。

市委招待所条件很简陋，食堂是用铁皮刚刚搭建起来的，里面仅能够摆两三张饭桌。王震并不计较这些，就下榻在这个简陋的招待所里。

到达深圳的当天下午，王震就在招待所会议室听取了第一任深圳市委书记张勋甫的汇报。张勋甫说："深圳市是新成立的市，城市规划很重要，但是缺少这方面的人才和力量。"王震听到这里当即表示："这方面我们可以支持你们，回去后就抽调设计人员。"汇报结束时，王震鼓励深圳市的领导说："办特区是中央的决定，是新生事物，一定要搞好。现在你们已经做了不少工作，有了自己的设想和打算，这些都是好的。办特区没有先例，只要你们按照中央的指示去做，相信一定能够办好。"在视察完深圳市区后，翌日中午，王震来到蛇口工业区视察。他认真地看过蛇口工业区的平面设计图后，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他指着图上那条工业大道说："这条道路加虚线 28 米，要考虑公路两旁的绿化，是不是就按 28 米考虑，不要使以后尘土飞扬。"另外，他还指着工地北面的山，说："这些都可以给你们招商局，要把这些山都开发出来。"王震说到做到，离开深圳以后的一个月内，他立即为深圳抽调了一百多名城市规划设计人员。这批专家陆续来到深圳，马上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为深圳的地质勘探和最初的城市设计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震此次带领国防部相关人员来深圳考察是有所考虑的。国防工业要发展，必须采用先进的技术，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它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必须通过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才能迅速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国防工办组织国防工业系统积极扩大对外技术交流与合作，通过派团出国考察、邀请国外科研人员到中国进行技术交流谈判等，增加对国外科技动态的了解，获得了大量经济和社会信息，在技术交流合作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王震、洪学智有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能在深圳特区开设窗口，设点开办军工企业的对外贸易，对深圳本地的经济和国家国防工业的发展大有好处。经国防工办党组和各有关工业部领导几次研究，决定组织各有关工业部副部长，由国防工办副主任王辉带队先到深圳实地考察、论证、选点。王辉等在深圳调研了半个多月，商定了在深圳设点的初步方案，并向洪学智作了汇报。洪学智听了汇报后很满意，当即与王辉向王震作了汇报。王震表示完全同意。

王震这次带领洪学智和各有关工业部的部长南下深圳，向深圳市领导介绍国防工办和各有关工业部军工企业准备在深圳开设窗口，设点扩大对外贸易的意向。开会时，王震对深圳市政府的人说：我们中央单位五个部，建设特区你们要大力支持。深圳市政府当即表态：房子由你们自己找，喜欢哪里就可以买哪里。后经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国防工办和国务院各有关工业部抽调人员组成工贸结合的进出口公司，先后在深圳设点，直接对外经营进出口业务，成为国防工业对外贸易和技术交流的开端。不仅如此，王震分管的国防工业战线的这几个

部，后来成为中央各部、全国各省中第一批到深圳特区开辟荒地，投资办企业的部（省）级单位。他们为深圳特区带来了资金、技术，带来了各方面的人才和力量。在各工业部的影响带动下，一批又一批内地有实力的企业纷纷来深圳投资办厂，为加快深圳经济和城市建设起到了先锋队的作用。这些当年在深圳创办的企业，如今仍然是深圳的大型支柱企业。

## 珠海制定西部发展战略后，最早深入实地考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对于与深圳经济特区同时设立的珠海经济特区，王震非常重视，曾先后多次到珠海视察。1981 年 3 月，王震陪同叶剑英来珠海视察，这是王震第一次来珠海。此时，珠海经济特区刚开始起步，对如何办好经济特区尚处于摸索阶段。王震坚定不移地对珠海的领导们说："对外开放没有错。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想这么做，只是条件不成熟，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封锁我们。你们胆子要大一些，要当好对外开放的窗口。"

1988 年秋，珠海市委、市政府经过反复论证，决定开发西部，在珠海西部修建深水港、机场、广珠铁路，建设大电厂、大水厂和市区通往西部的快速干道。1988 年 11 月到 12 月间，王震来到珠海视察。王震大力支持珠海市委、市政府发展西部的战略，他说："对楼堂馆所和非生产性建设要坚持压缩，对重复性建设也要下决心停下来。但是，对增加有效供给的项目，对交通、能源和原材料项目，还要大力发展。珠海西部的开发，是一个宏伟的计划，反映了珠海市党政领导在开发和建设特区中的雄心壮志。珠海西部的开发不仅对特区的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对整个华南地区的经济搞活和发展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管是珠海的城市还是乡镇，街道还是企业，都曾洒下王震辛勤奔波视察的汗水。珠海平沙镇位于珠江三角洲南端，东临鸡啼门，西濒崖门口，是珠海市西部的重点经济开发区之一。王震对平沙能用三十多年时间，围海造田，把荒滩变成良田，造出一个繁荣的乐园给予了高度评价。王震在观看珠海市湾仔滨海区规划设计方案图时指出：新区建设规划要把中学、小学、幼儿园等教育设施考虑进去。王震还考察过珠海协和电子工业有限公司海霸表厂。在考察中，他了解到这家由美国协和集团与珠海合办的企业，1988 年 1 月开始讨论可行性计划，5 月份就生产出第一批海霸表，并已出口美国、西欧等地。王震对珠海的这种特区效率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为海霸厂题词："海霸表扬名全国"。王震是珠海制定西部发展战略后，最早深入实地考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 改革开放来之不易

改革开放之初，经济特区这一新鲜事物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意，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在这样是是非非的争论中，王震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充分显示出老一辈革命家的坚定信心和睿智，支持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

1982 年，深圳新一任市委、市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城市基本建设和吸引外资的改革开放措施。这时，社会上出现了种种议论。有人认为，深圳引进外资、外商，把资本家从香港请进来，就是引进资本主义，搞资本主义那一套。还有人说什么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变成解放前。针对社会上的议论，1982 年 2 月，王震在深圳视察时指出："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你们可以大胆地试验，不要前怕狼后怕虎，那样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了。"短短几句话，给特区领导增加了极大的信心和力量。

1983 年 3 月，王震到广州视察。期间，他特地派身边工作人员和记者到深圳进行调查。当听说北京有人到深圳考察后认为建立特区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时，王震生气地说："这些人比清末那些办洋务的还落后，还不如那时的郑观应。说什么走私增多了，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不开放时就没有走私啦？照样有，关键看你怎么管。"针对有人责怪毛主席不早搞对外开放、思想保守、"闭关锁国"的说法，王震严肃地说："毛主席一点也不保守，他在延安时就对我说过，革命胜利后，他的最大的心愿之一便是到工农业生产发达的美国看一看，以研究如何发展中国的经济。很可惜，帝国主义很怕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强大，长期对我国实行政治、经济、军事封锁。有人说，毛泽东闭关锁国，那不对，是帝国主义从外边把我们的国门锁上了，不让我们开。毛主席千方百计与美国等西方强国建交，就是为了搞对外开放，学习和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为我们今天的对外开放打下了基础。"记者问及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时，王震显得很兴奋，他说："我们现在的对外开放政策，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就确定下来的一项基本国策，小平同志继承和实现了毛主席这一思想。实践证明这是非常正确的，我们一定要对外开放才有前途，闭关自守只能造成落后。""我们谈改革开放，不能割断历史。要不是毛主席领导我们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打开中美建交的大门，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国际地位大大提高，谁会把中国放在眼里？我们今天又怎么能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地对外开放？又怎么能走向世界、引进先进呢？我们今天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是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来之不易呀！"

1984 年一二月间，王震和杨尚昆陪同邓小平视察了深圳、中山、珠海、广州、厦门、上海等地。邓小平对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的发展状况给予

了高度评价，分别作了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回京后，王震向中央写了《关于陪同邓小平同志视察广东、福建、上海的情况报告》。在该报告中，王震对改革开放的成果及特区的现状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王震在报告中感慨地写道："这一次陪同小平同志视察，感触颇多，主要有：一、小平同志提倡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对外开放政策及兴办经济特区的决策时完全正确的。""1979 年 12 月，我任国务院副总理时，曾带领国务院几个部长到蛇口考察。那时，蛇口是一片海滩和荒山，路面坑坑洼洼，连厕所和洗脸水也没有。这次陪同小平同志视察，深圳和蛇口的面貌就大不一样了，高层建筑林立，道路四通八达，万吨级码头，直升机场开始使用，电讯、供水、供电、防洪、供气和处理污水等设施初具规模，一个现代化的工业新城在我国南海崛起。看到这情景，心情十分兴奋。不禁想起一句古语：'士别三日，须刮目相看'。二、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都很好。三、党中央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很多群众说：'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大好，关键是我们有一个好的党中央！'小平同志是我们党中央的领导核心。""这一次小平同志每到一地，都受到群众自发热烈地欢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党中央很快印发了王震的这一报告。1984 年三四月，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这个报告又被作为主要文件印发，供与会代表学习。

"我们谈改革开放，不能割断历史"，"一定要对外开放才有前途，闭关自守只能造成落后"，"我们今天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是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来之不易呀！"一句句掷地有声的话语，让我们不得不敬佩这位老革命家的睿智和气魄，他实事求是，敢于创新的实干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周　珺）

# 宋庆龄

## 孙中山赠联“精诚无间同忧乐，笃爱有缘共此生”

### “为建设新中国，新家乡共同努力吧！”

在中国版图的最南端，在海南省文昌县昌洒镇，顺着一条乡村小道，通过一片山青水秀的田园，在一座山坡的半山腰隐藏着一个果园般的村寨——古路园村，名字奇特，尤富诗意。椰子树下掩映着两幢传统小民房，住宅前，阳光下，椰子树悬挂着累累的椰果，有绿油油的，也有暗红暗红的，宛如一串串彩色的灯笼。微风下，椰子树摇动着顶端的羽状阔叶，泛起一片翡翠光波，婀娜、娴静，透出灵气。这是宋庆龄的故乡，她的“根”之所在。

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字耀如，出生在宋氏祖居主人房的一张古式木床上。他本姓韩，原名韩教准，父亲是个贫苦农民，仅有一亩三分地，常挑椰子绳出售，或做点烧窑活过日子。他是怎样变成姓宋的呢？原来因家境清苦，父母亲决定将



宋庆龄与孙中山合影

教准送给婶母的弟弟收养，婶母的弟弟姓宋，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开了一家茶丝商店。少年的韩教准由这位姓宋的舅父带到美国，收为养子，后改姓宋，名耀如，英文名字是查理·琼斯宋（Charles Soon）。宋耀如在美国求学，并皈依了基督教，还进神学院深造，取得了牧师资格。

1886年1月13日，宋耀如回到上海当传教士兼营商业。1897年，在上海与浙江余姚县人倪桂珍结婚。倪桂珍是我国明朝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第十六代子孙。婚后，他们生了宋蔼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三男三女。尽管离家多年，宋耀如对故乡仍一片情深，常常嘱咐儿女："做不成人，不能回文昌认祖宗，见父老！"

父亲对故乡的眷恋深深地影响着宋庆龄。宋庆龄因国事在身，公事繁忙，一直未能回故乡走走，但她一直关心、热爱着故乡。

1949年9月27日，北京，秋天。天空晴朗，阳光和暖。

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代表们互相握手、致候，互认同乡。

这一天，宋庆龄身穿一件黑色旗袍，格外庄重、典雅、秀丽。她与来自故乡、海南文昌籍将军张云逸原先并不认识，互报年龄后，张云逸亲切地说："按辈分你应叫我哥哥哦，庆龄妹妹！"

宋庆龄可乐了，风趣地说："好呀，好呀，云逸哥！"

张云逸伸出右手与宋庆龄握手问候，宋庆龄微笑着对张云逸说，"我为有这样的哥哥而感到荣幸！"

"谢谢你，妹妹！"张云逸回应道。

"为建设新中国，新家乡共同努力吧！"宋庆龄满怀豪情提出倡议。

张云逸愉快地接受了倡议。

从此两位伟人在各自岗位上为建设家乡贡献力量。

转眼间，5 年过去了。1955 年故乡文昌闹严重旱灾，宋庆龄以私人名义汇寄稿费 500 元给文昌县人民政府救济灾民。在她的身边，珍藏着一枚刻有“琼英”字样的印章。它的意义是，来自于海南岛的姑娘，“琼”即海南岛，“英”即象征女人，海南的女人起名字喜欢用英字。睹物思人，每当见到印章，宋庆龄眼前仿佛呈现家乡那金黄金黄的海滩，像铺开的玄黄锦缎，绣上无数朵金银装饰品；海岸边的椰子树，在大海雄浑的歌声中，纵情起舞，婀娜多姿；碧绿碧绿的乡村田野，抬头见蓝天，低头见牛羊。

1959 年 6 月的一天，宋庆龄收到海南寄来的一批咖啡，如获至宝。她品尝着带有浓浓乡情的咖啡，并将它作为礼物，送给《中国建设》杂志社英国籍专家爱泼斯坦妻子邱荣莉，写道：“希望你欣赏这些上海牛乳糖和从我的海岛，海南来的咖啡”。她写“海南”二字大些，并加了着重号，表达了她对海南的特殊感情。

宋庆龄对她的秘书说：“海南文昌是我的老家，祖父烧过窑，父亲少年用的枕头是海南生产的漆枕……”宋庆龄曾托人捎带海南出产的漆枕给她。

## “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

宋霭龄辞去孙中山的秘书工作后，与孔祥熙闪电结婚，由宋庆龄接替秘书工作。她很快进入了角色并与孙中山相爱了。但此事没有一点蛛丝马迹，只有宋家大小姐宋霭龄凭第六感官察言观色到，并将此事告诉了双亲。

1915 年 6 月，宋庆龄从日本回到上海探望双亲，并坦陈和孙中山的婚事，征求双亲的意见。

宋耀如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和孙中山是老朋友，认识孙中山时宋霭龄 4 岁，宋庆龄 1 岁，他无法接受这桩婚事，望着脸蛋稚嫩的女儿，以父亲的尊严，神情严肃地说：“孙先生是一位伟人，可他又是一个老人，他已 49 岁，而你才 22 岁。他年长你一倍多，你怎么能跟他结婚呢?”

宋庆龄脸色通红，说：“孙博士年纪大了点，又怎样呢？年岁大就不能结婚吗？他领导人民推翻封建王朝、建立共和国，这样的人，难道不值得尊重，不值得爱吗?”

宋耀如火气越来越大，发出了最后通牒：“你要是和孙中山结婚，败了宋家的门风，就别进我的家门，宋家容不下这样的女儿!”

宋庆龄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如此“无情”，举家都反对她的婚事，想到这里，她用手拍打胸口，仰天椎心泣血，鼻子一酸，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怆然泪下。

宋耀如以为这是女儿的一时痴迷不悟，执意说服她。大姐宋霭龄立即为她在

上海找了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名门子弟，匆匆忙忙来宋家相亲后就由宋耀如宣布宋庆龄订婚的消息。

宋庆龄再也掩盖不了心中的憋气，她勇敢抗议道："在这样的家庭里，还出现包办婚姻，什么打倒封建，什么实现民主自由，都是假的！还口口声声谈论革命，都是假革命！"真是字字铿锵铮铮。

温和文雅的宋庆龄坚决要维护她的婚姻自主权，宋耀如一气之下就把她反扣在房间内，由女仆看管起来，没有结婚之前绝不能随便乱动，不许离家半步，不许与外界接触，让时间和距离淡化她和孙中山的感情距离。

宋庆龄感到十分惆怅、痛苦，她整天在"禁房"里闷坐，沉默寡言，踱来踱去。她悄悄给孙中山写信，问现在是否需要她，女仆同情宋庆龄的境况，秘密将信送往邮局。孙中山马上回信说，无论事业或感情都需要她。宋庆龄感动得流下眼泪。她决定：离家出走，远走高飞。

这天夜里，静悄悄，宋庆龄趁着身边无人，收拾衣服，准备去东京找孙中山。忽然，窗外响起了母亲的脚步声，她抬起头看，是母亲的背影。宋庆龄望着母亲的身影，心里反反复复犹豫着，纠结着，难道就这样离开善良的母亲远走高飞了吗？母亲变得苍老了许多，这是为她的婚事忧郁造成的。宋庆龄对自己的母亲爱得深，而在母亲的心目中，宋庆龄是最聪明的孩子，最受家人喜爱。顿时，宋庆龄拿不定主意，下不了决心。毕竟，父母亲付出了辛劳，养活了她，如果她离他们而去，会使他们失望和痛苦。但是宋庆龄又十分崇敬孙中山，非常想和他一起去探索救国富民之路，这恰似一团火在她的心中燃烧着，无论怎样也无法扑灭。

宋庆龄抱着正在收拾的衣服，泪水噗噗地往下掉。

在女佣的帮助下，宋庆龄从窗户里逃出，企图连夜乘船前往神户。但两次都被发现，失败了。

在一个封建帝制下的中国，对一个少女来说，这是一个极有勇气的革命行动，因为这样做有违亲情，触犯了传统的孝道。

是以中华民族伟大事业为重，还是固执孝道呢？宋庆龄毫不犹豫选择了前者，含着泪水作出了决定。在女佣的帮助下，留下一封告别信以后，借着夜色，跳窗逃了出去。乘坐海轮离开上海，向日本奔去。

得知宋庆龄第三次私自出走后，宋耀如毛发倒竖，一肚子气，匆匆乘船赶往日本横滨。26 日，宋耀如出现在孙中山的寓所。他恼羞成怒，当女儿出现时，宋耀如刷地跪在地上，"我的不懂规矩的女儿，就拜托你了，请千万多关照！"

宋耀如本想赶来阻止这桩婚事，但一切都晚了，宋庆龄拿出一份已经签字生效的《婚姻誓约书》，宋耀如接过愣呆了，只见婚约书写道：

此次孙文与宋庆龄之间缔结婚约，并订立以下诸誓约：

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

二、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

三、万一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永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之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上述诸条誓约，均系在见证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誓约之履行亦系和田瑞从中之协助督促。

本誓约书制成三份：誓约者各持一份，另一份存于见证人手中。

誓约人　孙文（章）

誓约人　宋庆龄（章）

见证人　和田瑞（章）

耶诞 1915 年 10 月 26 日

宋耀如默然，他愤怒、失望、伤心……不可名状的复杂情绪，使他心灰意懒，几乎不能自持。

宋耀如并未因此而罢休，他找到日本政府请求帮助，说宋庆龄尚未成年，是被迫成婚的，请求撤销婚约，日本政府回答《婚姻誓约书》符合日本法律，不能干涉。

宋庆龄和孙中山向一直支持孙中山革命的父亲保证：一定共同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在中国实现奋斗到底。

正在美国读书的弟弟宋子文和妹妹宋美龄，获知二姐的婚讯，简直不能相信。宋庆龄立即写信给他们说：“自己仅有的欢乐，只有和孙博士在一起工作时才能获得。”

“我从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情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活动的中心。”

宋庆龄也给美国的同学安德逊写信告诉她的婚姻：

“婚礼是再简单不过了。因为我俩都不喜欢铺张和各种繁文缛节之类的东西。我很幸福。”

孙中山也给他的老师詹姆斯·康德黎写信说：

“我的妻子，是受过美国大学教育的女性，是我最早合作者和朋友的女儿。我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是我过去从未享受过的真正的家庭生活。我能与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助手生活在一起，我是多么幸福。”

宋耀如和倪桂珍并没有与女儿宋庆龄脱离父女关系，仍然爱着自己的女儿。后来父母送给宋庆龄和孙中山一套家具，一条百子图被面，一件锦绣长袍。几年

后，宋耀如赠送给宋庆龄兴建在庐山的一套别墅。这座别墅也可以说是宋耀如留给女儿宋庆龄的惟一遗产。

宋庆龄与孙中山的革命伴侣无疑在广州蒙难中得到充分体现。

1922 年上旬，孙中山指挥北伐军三路进袭江西，却遭到陈炯明的极力阻挠。他阳奉阴违，断绝北伐军的后方供给。孙中山看透了陈炯明的庐山真面目，下令免去他的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和内务部长职务，只保留陆军部长职务。陈炯明退守惠州，并派心腹叶举进驻广州，孙中山部队大多出征北伐，广州实际上被陈炯明的部队占领。6 月 1 日，孙中山从韶关返回广州，意在说服陈炯明转变。但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决心已定。

6 月 15 日凌晨约 2 时，叶举在白云山粤军司令部向粤军将领们进行作战部署："诸位，顷接陈总司令自惠州来电：命令驻惠粤军于 16 日凌晨，炮轰总统府，活捉孙中山。"

宋庆龄在酣睡中被孙中山叫醒，"陈炯明果真已叛变，赶快整装逃入战舰，在舰上指挥，剿平叛军"。

宋庆龄忧虑地说："难道陈炯明真的会有二心?"

总统府外，响起阵阵号声，"总统府的卫队官兵听着，我们两万粤军已经把总统府团团围住，快把孙中山交出来，陈总司令赏现款二十万!"手持话筒的军官在对总统府喊话。

突然，炮弹在粤秀楼前爆炸。

宋庆龄接过衣服给孙中山穿上，"先生，你先走，我留下，我们一起走，目标过大，增加危险"。

孙中山惊讶说："什么?"

宋庆龄："庆龄若与先生同行，不唯要慢些，而且还容易被识破，危及先生。"

孙中山说："不行，我怎么能丢下你，丢下大家，只顾自己呢!"

宋庆龄急中生智说："先生，莫为庆龄耽误大业。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啊，先生!我要让叛军知道，宋庆龄和孙中山仍在粤秀楼，这样，好掩护先生撤退!"

经宋庆龄再三请求，孙中山才同意先行，但先命令 50 名卫队全部留守总统府，掩护宋庆龄，然后逃离粤秀楼。

孙中山化妆成出诊医生，在秘书和参军林直免等人的护卫下撤离粤秀楼，辗转至珠江边天字码头，登上军舰"楚豫"号，17 日转登"永丰"舰，领导反击叛军。

宋庆龄在孙中山一行撤离粤秀楼后，毅然命令卫队将大楼里的电灯全部打开，造成总统仍在府内的假象，以吸引敌人火力，掩护孙中山一行撤退。

约半小时过后，叶举指挥三四千人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总统府，一个师的兵力正面攻击粤秀楼。叛军迅速占据观音山，居高临下，左右夹击，向粤秀楼射击，并大喊："打死孙文！""冲进总统府赏洋50元！活捉孙文赏洋20万元！"

宋庆龄在两位卫士和孙中山的侍卫姚观顺的掩护下，从粤秀楼撤退进总统府，一路上，流弹迎面飞鸣，不时从宋庆龄的耳际穿梭。进入总统府大院时四周已是炮火轰鸣。下午4时，总统府的大门被攻破，叛军蜂拥而上，有敌兵用刺刀同时指向宋庆龄和卫兵，登时将他们手中的包裹抢去。大家拼命地乱抢东西，宋庆龄飞快地逃脱走出总统府大门，冲进小巷。忽然从小巷窜出一队兵，对着宋庆龄等人就是一阵射击，机智的宋庆龄倒地装死。叛军居然没有察觉，继续往前跑，宋庆龄等人爬起又跑。

枪声稍停，宋庆龄化装成村妇，卫士化妆成贩夫，离开小巷。几经周折，来到长州要塞司令马伯麟在广州市同福路家中住宿一夜，那夜仍炮声不绝。当宋庆龄欣然听到了"永丰"舰的炮声，始知孙中山安全无恙。

第二天，宋庆龄仍化装成村妇，在自来水厂友人家夜宿，再到中山大学校长钟荣光家。在这里，宋庆龄与孙中山的孩子不幸流产。6月18日，在"永丰"舰终于见到孙中山，真如死别重逢。

广州蒙难后，孙中山深情地题赠宋庆龄："精诚无间同忧乐，笃爱有缘共死生。"

## "忘恩负义者，决无好下场！"

1932年是宋庆龄十分繁忙的一年，在她领导下，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蔡元培、鲁迅、杨杏佛、胡适和林语堂等参加。该组织的主要纲领是：争取释放国内政治犯，反对到处盛行的监禁、酷刑和处决的制度，予政治犯以法律辩护和援助。该组织曾成功挽救陈赓的生命。

宋庆龄与陈赓识于大革命时期。那时，陈赓在黄埔军校学习时聆听过孙中山先生的演讲，参加了孙中山指挥的平息广州商团暴乱的战斗。南昌起义后，起义军在广东潮汕遭重创，陈赓在会昌战斗中负了重伤，左腿的胫骨和腓骨都被打断。在上海中共地下党帮助下住进了牛惠霖骨科医院。宋庆龄叫他的表兄弟牛惠霖大夫一定要把陈赓的腿伤治好，并亲自到医院看望陈赓。这时期，陈赓的战斗生活主要是在广东，在共同的理想下，在战斗中，宋庆龄与陈赓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33年春，陈赓因叛徒告密在上海被捕，关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受拷打，他坚贞不屈，还把来劝降的叛徒顾顺章骂出去。

东征时，陈赓救过校长蒋介石的命，此事使他一夜成名。蒋介石得知陈赓被

捕后亲自出马探望。

“陈赓，你瘦了。”蒋介石满脸堆笑说。

“瘦吾貌而肥天下。”陈赓右手拨弄一下胡子，拉拉带有血迹的囚衣，并面带嘲笑地补了一句，“校长，你也瘦了。”

“国家如此，生灵涂炭，寝食不安哪！”蒋介石很是惭愧，答道。

“身为一党一国领袖，校长瘦而天下瘦，这是为什么呢？”陈赓反问道。

蒋介石无以为答，转而许愿师长之职，“我不当你的狗官！”陈赓横眉冷对。

蒋介石恼羞成怒，愤然而去，便动了杀机。陈赓等政治犯的生命危在旦夕，十万火急！

4月1日，陈赓由巡捕房引渡给南京政府，并把陈赓和廖承志同关在一个监牢里。在监狱，他遭到逼供诱降，严刑拷打。

这一天，宋庆龄立即发表声明《告中国人民书》，声明称，罗登贤、廖承志、陈赓等人“不是罪犯，而是中国人民最高尚的代表人物”，并且“号召全国人民起来要求释放他们，要求不使他们遭受酷刑与死亡”。

4月2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召开联席会议，当场成立营救政治犯委员会，并派出宋庆龄、杨铨、沈钧儒、伊罗生4人为代表，到南京继续营救陈赓他们。当日，宋庆龄和蔡元培联名打电报给南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司法部部长罗文干，指出罗登贤、陈赓、余文化、陈藻英等4人“由公安局解京，罪证既不成立，移提久禁，已属违法，务望力争，由正式法庭审判，勿用军法刑讯，以重民权而保司法独立”，要求释放陈赓和罗登贤等人。

4月5日，宋庆龄等人到达南京，找到蒋介石，当面指斥说：“陈赓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东江之役一直跟着你打仗，你打了败仗还是陈赓救了你一命，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现在你要杀他，简直是忘恩负义！你天天说的礼义廉耻哪里去了？”

蒋介石被骂得理屈词穷，俯首哑言，但仍不愿放人。

宋庆龄等人又找到汪精卫、罗文干，要求即刻释放陈赓等政治犯，并书面提出四项要求：（一）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二）废止滥刑。（三）给予政治犯阅报读书之自由，禁用镣铐及改良狱中待遇。（四）严惩狱吏敲剥犯人及受贿行为。

4月5日晚上，宋庆龄等人到监狱中探望陈赓等人。随同前来的还有《中国论坛》杂志的记者。

陈赓向宋庆龄等人当场揭露监狱里的严刑拷打和恶劣待遇。《中国论坛》记者得以了解真实情况后，报道说：“他们刚来的时候，并不在这儿。他们七八人一屋地挤在小而潮湿的洞里，只是上一天才被搬到这里来。”

宋庆龄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员不断营救，并多次到南京探望陈赓，使蒋介石未敢遽然加害陈赓。

宋庆龄营救陈赓等人的同时，还通过新闻界告诉全国人民："被引渡给国民党的五个人，正如所有与他们遭受同样命运的同志们一样，不是罪犯，而是中国人民最高尚的代表人物。因此，我号召全中国人民起来要求释放他们，要求不使他们遭受酷刑与死亡。如果我们容许这些革命战士们被逮捕、被监禁，甚至被害，那就是容许了可恶的反动势力摧残中国民族生命的根苗。释放他们，释放几千个与他们一样的人，就是释放中国民族革命精神的不可征服的力量。没有这个力量，中国就不能像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一样地生存下去。"

在宋庆龄和中共党组织等人的积极营救下，5 月底，陈赓在地下党的协助下逃脱，到了中央苏区，找到了中共党组织，回到了红军队伍。

许多年后，陈赓跟同关在一个监牢里的廖承志开起玩笑："你有一个好妈妈（何香凝），你就比我早出狱，提前开溜了。"

廖承志也幽默一下："宋庆龄亲自出面营救你，你不是很快就在地下党的帮助下，从监狱中溜走，回到红军中了吗！"

陈赓夫人傅涯对宋庆龄出面营救陈赓这段历史曾这样描述："1933 年春天，陈赓由于被叛徒出卖而被捕，和廖承志、罗登贤等同志一起被关押在帝国主义租界的巡捕房。在狱中，陈赓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泄露中共的机密。正在这时，担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长的宋庆龄同志和杨杏佛先生，不顾个人安危，带着许多新闻记者到狱中探视罗登贤、廖承志和陈赓等人。巡捕房慑于宋庆龄的威望，被迫停止了酷刑。"

共产党员宋庆龄——20 世纪的伟大女性，于是，有诗人留下这样的诗篇——

巴黎有一座圣母院，
纽约有一尊"自由"女神，
但那些都是装饰品，
还带点宗教迷信。
在我们首都北京，
却有一个真正的圣母和女神。
——我们尊敬的名誉主席，亲爱的同志宋庆龄！

（欧大军）

# 熊雄

## 黄埔军校第七任政治部主持人

1925年7月底，熊雄结束旅俄留学生涯回国。9月3日抵达上海，由中共中央分配工作。9月中，熊雄与叶希夷、聂荣臻等12人到达广州，受到中共广东区委陈延年等的热情接待。熊雄和聂荣臻被安排去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

### 一

熊雄到校后，即参与第四期招生和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工作，负责接待各地中共组织介绍的报考军校的青年，并为青军会刊物《中国军人》撰写文章。

二次东征，熊雄调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秘书（兼总指挥部政治部秘书）、中共一军支部书记，协助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筹组东征军政治工作。

二次东征的政治工作较一次东征有了新的发展。一是政治部组织严密，设置秘书处、社会运动科，处理部务、指导社会运动和100多人的宣传总队工作。二是内容更加充实，发布了



熊 雄

《战事宣传大纲》，规定了军队中的政治宣传包括对本军的、敌军的、民众的3个方面。三是方法更加周密，向政治工作人员提出多项注意事项。

10月1日临出发时，熊雄又被任命为归总指挥部指挥的宪兵营的党代表。宪兵营任务是“在于维持全军的军纪、风纪及地方治安与临时特别任务”（蒋介石语）。

6日，熊雄率宪兵营随总指挥部出发，每日行军之暇，他都“信笔直书”战地经历和感想。11月4日整理出1.7万字的《惠州战役日记》，具体记录了行军驻营、战地宣传、节日活动、攻克惠州、维持治安、警戒巡视、管教俘虏等项工作和工农商学对东征军拥护、支援以及控诉陈逆殃民罪行。

13日上午9时开始攻击惠州，宪兵营尚在博罗，熊雄未接到前进命令，“踌躇者久之，最后决定”营部与第一连10时出发前方，12时至白沙堆，已听见前面大炮声。下午5时抵达飞鹅岭。东征军经过一日多激战，14日下午4时20分攻克惠州。“战破惠城后，各师团队俘虏的敌人，都交到我营（宪兵营）看守，予恐有敌人官长混在里面，如果不严密查出……难免不发生意外，因此即往俘虏收容所，将俘虏各个查问，并晓以党义。”熊雄问：“你知道你们的总司令和香港的英国政府，干的勾当么?”俘兵答：“听说香港的英国人要给我们总司令一万支枪，五百万子弹，二百万块钱……”“我们的总司令说，如果我们不打仗，就是永远不发饷；如果我们打到了广州，不仅可以月月发饷……可以特别允许我们大抢三天……哪一个不想发财呢?”熊雄感慨道：这士兵的话，谁听了，都要毛骨悚然。凡我革命军人，应勇往向前，将久受压迫的同胞，早日解放啊!

## 二

1926年1月6日，熊雄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同时，他还是中共广东区委执行委员和军委成员，是中国共产党在军校的主要负责人。

3月，熊雄兼任潮州分校政治部主任，12月14日代理军校政治部主任。政治部分管全校政治教育、宣传活动和党务，工作人员由过去20多人增至70多人。政治部建立和健全各项工作制度，制订和颁布了政治教育大纲，聘请专职和临时政治教官各10余人，特设政治主任教官，系统施行政治教育。学生队设置政治指导员，“为贯通政治部一切政治工作之枢机”。颁布了政治部服务细则、政治指导员条例、宣传队组织条例、政治工作人员惩戒条例和政治研讨会规则等，创办了八开报纸《黄埔日刊》，使得军校政治部工作臻于完善。

2月，国民革命军各军开办的军事学校合并到陆军军官学校，陆军军官军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军校更名，意味着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并重，培养学生成为懂军事懂政治的人才。这时，第四期入伍生升学，第五期入伍生招考。熊雄主持政治科学生入学考试，选拔了政治科学生500人，占第四期学生的20%。

政治部聘请了高语罕、安体诚、恽代英、张秋人、韩麟符、熊锐、萧楚女、孙炳文、李求实、刘侃元等担任政治教官。同时，还请校负责人、政治教官和社会名人谭延恺、何香凝、刘少奇、鲍罗廷、周恩来、毛泽东、邓中夏、苏兆征、吴玉章、鲁迅等作专题演讲。定期组织政治讨论、政治问答、政治测验、政治演讲竞赛和对士兵民众进行政治宣传实习等，以巩固学生的政治训练成果。规定各营连长和政治指导员随时考查学生的品性、思想及主义，作为政治教育实施之参考。不定期地组织学生参加民众运动。

为了报道学校情况，总政治部《军人日报》副刊上辟有《黄埔周刊》。军校改组成立后第三天，政治部创办《黄埔日刊》，报道国内外要闻和全校工作动态、交流师生教与学心得等。每逢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事件，还发增刊、专号等。刊头下方刊登（孙）总理遗嘱及关于时局、形势和任务的口号，使师生明了当前的局势和工作。《黄埔日刊》刊行量达26000份。

宣传活动，一般是组织宣传队、印发告民众书、宣传标语口号等进行。宣传队是常设的学生组织，总队长由政治部指导股股长兼任。

总理纪念周，熊雄等政治教官经常就时局和任务发表演讲。熊雄在一次国际政治问题演讲时，指出将来的世界会有苏俄、美国和中国三个大国，这是由于他们人口、幅员和资源等因素决定的。中国的前途是无限的。当时有同学问：英国不是“太阳不落”的国家吗？熊雄说，世界形势是发展的，在可见的将来，英国的殖民地有的会独立，有的会脱离宗主国，一些后进的国家会迎头赶上、会压倒它的。

3月初，政治教官高语罕在演讲时，触犯了蒋介石即遭免职。高离校前，《黄埔日刊》发表了他的诗作《夜泊黄埔》，道出了他离别黄埔的悲愤心情。两天后，熊雄在《黄埔日刊》刊出他的《黄埔杂诗》：“人世斗争几日平，漫漫也应到黎明；听潮夜半黄埔客，充耳哭声和笑声。”表达了共产党人坚定的乐观态度和革命必胜的信念。

## 三

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军校受到蒋介石调来的军队严密的监视，师生不能随便出入学校。在这突发的事件面前，熊雄命令政治部全体人员保持常态，静候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使这一事件未能波及政治部。

军校内，初有不公开的中共支部，负责党的组织工作。中山舰事件后，中共广东区委将军校中共支部改为中共特别支部，下按校内部处、学生科别成立支部，另设中共党团，统一领导党在军校的工作。以熊雄为书记，恽代英、安体诚、杨其纲为干事。区委调区委宣传部助理饶来杰为区委驻军校特派员，协助工作，公开身份是政治部图书室管理员。

7月26日，蒋介石对军校教育长、各部处主任官训话，即席写了几个口号当面交与熊雄，嘱印布全校，含沙射影地攻击共产党。一时校内的反动势力甚嚣尘上。8月13日，熊雄在《黄埔日刊》上公布了蒋介石“几个口号”，写了《对于校长“临别赠言”的说明》。文中说：“综合校长几个口号的意义，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统一意志，团结精神’，换言之，就是要‘团结革命分子，集中革命势力’。”指出，坚持孙中山“在改组大会主张容纳各派革命分子”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严格地说：“以我在青天白日的旗帜之下，参加工作十五年之经验来看，党内时起纠纷，对外屡遭失败，并非敌人真正强大，实际我党太不健康，太不革命化了。”要求“各能认清合作的原则”，“对于破坏党的组织的人，就应认作我们的公敌，即拿起对付军阀同帝国主义的精神与之奋斗。”

8月25日，军校举行师生拥护省港罢工大会，师生表示要以“铁血为后盾”，坚决支援省港罢工。《黄埔日刊》刊出《拥护省港罢工专号》。熊雄在《省港罢工的面面观》一文中，分析了省港罢工的原因及其意义，指出“破坏罢工，摧残工农，尚不乏人，狡英未屈，关系革命根据地的安危甚大”。

北伐进军几个月，光复了湘、鄂、赣三省，急需大批的军事和政治干部，由此，第四期学生2000多人提前毕业上前线，第五期入伍生3000余人升学，第六期入伍生招收4000余人，另设学生军和军士教导总队，开办各种军官学习班。在武昌、长沙两地新设分校。此时，军校官生兵夫有2万余人。军校声名远播域内外，慕名前来参观、访问和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凡来校的国内外宾客，均由军校政治部派员接待。

1926年秋，熊雄以铁血笔名为《黄埔潮》写了《国家主义派与西山会议派之过去及现在》、《孙文主义与列宁主义之比较观》两篇长文，介绍孙文主义与列宁主义相得益彰的关系，从理论与实践批判国家主义派与西山会议派。

1926年冬，校本部第五期政治科和炮兵科、工兵科迁往武昌。熊雄对政治科学生作了最后的训话，要求“继往开来，给武昌分校在一切思想行动为他们的表率，要做进攻内外敌人的先锋队，成为真正革命军的指导者，实现孙文主义的全部，完成国民革命，担负起世界革命的重任”。对炮工两科学生作了临别训话，指出：“若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死，为了恋爱而死，为了军阀做走狗而死等等毫无意义之死，即使死了成千成万也不相干，并且还是死于非命。若是为了革命而死，只是死一人，意义是很大。”

北伐胜利进军中，革命内部种种矛盾也日益显露。留在军校的黄埔同学会更是秘密调查和监视军校师生中共产党员的行动，而对第四期学生揭露队上官长虐待学生、贪污不法以及驻军压迫农民工人等情事则坐视不理，指诬学生这些正当的意见是“校政治部主任熊雄有计划的策动”。黄埔同学会秘书曾扩情急忙书面密报，并派陈超同学面送南昌总部蒋介石。

1927年元旦，熊雄在《黄埔日刊》增刊上发表了《一年来本校之政治工作》，简明地回顾了政治部一年来的工作。

1月21日，《黄埔日刊》出版了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专号，发表了熊雄等人的纪念文章。熊雄在《列宁与黄埔学生》文中，简述了孙文主义和列宁主义相得益彰的关系，要求黄埔学生“应是最勇敢的校总理的化身”，“应是最勇敢的列宁精神之模仿者”。

2月7日，军校纪念“二七惨案”四周年，熊雄在《“二七”在国民革命中之意义》文中指出，黄埔学生应更明确认识“中国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之先锋队”，“黄埔学生是代表革命民众——尤其是工农利益而奋斗的先锋队”，要求黄埔学生“以血来拥护总理的农工政策！以铁来打倒一切反革命派！完成国民革命，实行世界革命！”

军校影响日益扩大，国内外人士参观访问者迅速增多。仅1927年1月份就有86个团体1700多人，每日三至五批，熊雄参与了多次较有影响的内外宾接待。

3月1日，军校改组一周年纪念时，熊雄发表了《我对于本校“三一”纪念的希望》。他说，“本校在中国国民革命进程中占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即是本校改组后，由单纯的军事学校而变成政治军事并重的革命党员制造所”。

3月8日，熊雄在《本校开学周年纪念之意义》中说，本校“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之打成一片，即为本校生命之根本所在”。要求今后负责军事工作的人员“都能把学科和术科打成一片”，负责政治工作的人员“都能把理论和行动打成一片”，“更要求军事工作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打成一片，共同努力，以实现我们所负的使命！”

在阴霾四布的广东，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于4月3日举行了全体党员大会，“一万五千武装党员一致提拥护中央四大方案和改选反革命的广东伪省党部的议案”，“反革命的新军阀李济深等于此时遂含恨入骨”，熊雄代表大会主席团致答词，他说，今天各阶级各团体代表讲出了他们的痛苦，解除他的痛苦是我们革命的责任。全体党员同志务必看清自己的责任，加紧自己的工作，发扬黄埔精神，不然黄埔就会变成反革命的大本营。会后，广州工农群众举行了为保卫革命胜利果实的游行示威。

## 四


1926 年时的熊雄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尔后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熊雄等 193 人被列在“南京国民政府第一号通缉令”上。

14 日晚 6 时，国民党广东当局策划广州的“清党”反共，决定 15 日 2 时行动，并派出军舰监视黄埔军校附近的海面。在与军校代校长“熟商”、“处置”军校共产党人时，李济深说，黄埔不是共产党的大本营嘛！代校长认为：“军校政治部诚然被共产党把持，根深蒂固”，熊雄是“公开的共产分子”，然“此举关系全校安危，稍一不慎，难免不演成流血惨剧”。特别是逮捕熊雄，“深恐赶狗逼墙”，“难保不打草惊蛇，暴动起来，激成大变”。“熟商”结束，已是 15 日凌晨，市内“枪声四起，交通断绝”，代校长便去人伍生部，“执行逮捕”。

15 日深夜，代校长找熊雄谈话，妄图逼迫就范。熊雄当即斥责蒋介石叛变革命，是不共戴天之仇，“要将一腔热血洒在黄埔岛上，与黄埔共始终”。代校长害怕熊雄的行为引起师生反响，乃劝熊雄“出国留学”，并派汽艇“送去香港”。熊雄提出“要光明磊落离开黄埔，行前与师生谈一次话”。16 日，代校长召集师生在校本部礼堂，熊雄勉励师生恪守孙中山的遗嘱，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话后，到会师生列队将他送至码头登艇。

熊雄所乘汽艇驶至珠江江心，船工谎称：“机件失灵，停下检修”，监视黄埔附近海面的“中山”舰即将熊雄秘密逮捕。

5 月初，熊雄被转移到南石头监狱。自知为党工作时日不多，熊雄仍然抓紧时间，争分夺秒地向被关押的黄埔学生宣传干革命总会有牺牲，团结起来争取出狱，革命最终必胜等等道理。一天放风时，宋时轮至熊雄囚室前，说他是六期人伍生，听过某政治教官讲话，熊雄立即明白宋是党员，便约他谈难友的情况。原来，被囚禁在南石头监狱的黄埔学生等有数百人，大家有不安和恐怖情绪，觉得自己投身革命，还没有直接同帝国主义和军阀走狗搏斗，年纪轻轻的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去，心中很是惋惜，但同时对于反革命的野蛮屠杀，均显示出非常的愤慨。

第二次，宋时轮向熊雄谈了狱中难友这些思想情绪，熊雄没有直接作答，而是询问宋时轮家乡的情况，从中进行教育。最后，熊雄讲到他自己：“现在已被

国民党捉到手，我是迟早要被他们处死的。我除感觉到对党做的事太少以外，我对自己毫不可惜，更不可怕。因为我们所做的事业是正当的，是为劳动阶级谋利益的。熊雄虽死，将会有千百万个更好的熊雄继续干革命事业。革命事业将来一定要胜利，一定会成功的。你们大家自始至终都要坚持这个正义的事业，才是唯一正确的光明大道。”

第三次，熊雄问宋时轮“想清楚了没有”？宋时轮作了回答。熊雄高兴地说：“这样就好。同人家讲事情，要讲大家懂得的事情；同年轻人讲事情，要讲年轻人熟悉的事情，这样才会有作用。切忌讲别人听不懂、又不熟悉的事情，更不能讲大话、吹牛的话，要把各人熟悉的、所想的引导到当前的紧迫的问题上来。社会最根本的毛病是什么？在哪里？中国社会的毛病只有用革命的方法才可以治好。我们黄埔是干什么的？就是干这个事情的。”

5月17日晚上，狱方叫到熊雄的名字。熊雄意识到国民党对他要下毒手了。他以革命军人的气魄高声地说：“好！我走了。”难友们都静静地站在各自牢房的窗口处默默地望着，心中满是悲愤。

1988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编撰的《南石头监狱的斗争》一书这样写道：政治犯最早解到南石头监狱的是黄埔军校的人伍生。……熊雄一到，即分别和他们接触，并争分夺秒地和他们谈话，一再告诉同志们说：“此次的事件，不是一时的风波，而是中国革命关头的转折点，大家要做好长期的打算，组织起来，团结群众，实现‘监狱是革命者的学校’。……你们定要千方百计的寻求与狱外党的联系……”他在英勇就义之前给我们留下了“组织起来，团结群众，巧妙斗争，迎接光明”的教导，点燃了狱中斗争的火把。

熊雄被害后，遗体被装入麻袋沉入监狱旁白鹅潭内。

（熊巢生）

# 刘尔崧

## 南粤天空璀璨之星

翻开早期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发展、广州工人运动的历史，刘尔崧是个绕不开的名字。刘尔崧是广东早期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其短暂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革命，不仅改造了当时广州地区为资本家服务的“黄色工会”，使工会成为一支有影响的革命力量，而且成功组织、领导了沙面洋务工人罢工和省港大罢工。抚今追昔，南粤大地传颂的刘尔崧的革命故事仍然可以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那个激荡时代中的淳朴与激情，并由衷地敬佩那些站在热血沸腾、风起云涌的故事背后的革命前辈。

### 勇斗“红色甲工”校长高仑

1918 年 3 月，家境贫困的刘尔崧以优异成绩考入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以下简称“甲工”）。此时，正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五四”运动前夕，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马克思主义学说广为传播。刘尔崧在“工业救国”思潮


刘尔崧

的影响下，勤奋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并很快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顺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刘尔崧在甲工读书期间大量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随着知识面不断扩大，他逐渐不满足于“做一个有知识的奴才”，开始投入到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中去。刘尔崧曾在青年学生会上发言说：人类社会必须有一个政府。没有政府，谁都随心所欲，个人喜欢怎样干就怎样干，那什么事都做不成。1921 年，刘尔崧在逐步接受共产主义理论后毅然加入了共产党。加入共产党后，他在甲工学校领导了一次反对校长高仑的斗争。

1921 年，中国社会风云变幻，正处于一个伟大的转折时期。当时的甲工学校校务废弛，设备残缺，学生不能安心读书。面对这种状况，4 月 12 日，刘尔崧和阮啸仙、周其鉴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在大会上，刘尔崧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要求校长高仑务必采取措施，改变现状，以尽快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和稳固教学秩序。但是，趾高气扬的校长高仑对刘尔崧等提出的要求嗤之以鼻，置之不理。

面对高仑的顽固不化，刘尔崧他们并没有泄气，4 月 18 日，他们再一次召集学生到学校的大操场举行全校学生大会。在大会上，学生们畅所欲言，积极讨论，最终，在刘尔崧等学生领袖的带领下，大会一致决定：第一，上书广东省教育委员会，请求派员整顿甲工；第二，请校长高仑自行辞职；第三，上书广东省省长陈炯明，请求撤换校长。4 月 19 日，他们还组织学生前往广东省长公署和省教育委员会请愿，刘尔崧从请愿一开始就积极站在请愿队伍的最前面，带领学生高呼口号：撤换高仑、整顿甲工。学生们被刘尔崧的激昂情绪所深深感染，请愿一直坚持到深夜才结束，没有一个学生提前离开。在省教育委员会递交请愿书时，陈独秀接见了刘尔崧等人，表示支持学生的正当要求。4 月 24 日，刘尔崧等再次带领部分学生代表到省署和省教育委员会递交了第二次请愿书。

在甲工校园内的斗争日趋白热化之际，4 月 27 日，学校当局紧急召开全体学生大会，以平息学生的请愿和罢课行为。在学校的严厉警告下，刘尔崧、阮啸仙等丝毫不惧，领导部分进步学生与校长高仑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学生们对学校当局肆无忌惮地攻击刘尔崧、阮啸仙等学生干部的行为愤怒不已，追到校长室质问高仑，高仑在学生的质问下沉默了很久，突然间，他慢慢地走向办公桌，从办公桌掏出一把锋利的短刀，径直走过去并刺向前面三位学生，三位学生顿时血流如注，倒在地上，后面的学生们立刻涌上来，夺下高仑手中短刀。高仑不理智的行为立刻在全校引起轩然大波。

高仑身为校长，却公然行凶，严重违背师德，这瞬间点燃了学生们的怒火。刘尔崧、阮啸仙等学生干部决定带领同学，向广州市法院提出控告，控告高仑用刀故意伤人的行为，要求将其绳之以法。但是，省长陈炯明竟然助纣为虐，签发省署布告，指责甲工学生。学生们看到报告后义愤填膺、群情激愤。为了使社会各界人士了解甲工事件的真相，5 月 9 日，甲工的学生邀请广东学联、各校学生代表，甲工前任教职员等来校参观，呼吁社会舆论支持学生们的正义斗争。但是，由于陈炯明偏袒，学生们的奔走呼号，一次又一次的上书、请愿都毫无结果。

面对艰巨而又复杂的斗争，刘尔崧、阮啸仙、周其鉴和张善铭等学生干部毫不气馁，没有退缩一步。刘尔崧等一些学生领袖经过一晚的秘密讨论，决定发动同学中的先进分子组成“退学团”，用“集体退学”的行动表示反抗。5 月 24 日，“退学团”在甲工的大课室里，举行全体师生参加的“集体退学告别会”。在会上，刘尔崧再一次慷慨陈词：“与其容忍苟活，恋此虚有其名的工校，认此不明不白之校长，不特有碍学业，抑或丧失人格。”刘尔崧的发言感情真切，动容之处，声泪俱下，与会师生无不为之感动。他们大声高呼：“患难相扶，生死与共”，坚决支持继续反对高仑，直至其下台。最终，集体退学的学生有 200 多人，他们离校后向广州社会各团体、报社发送《退学宣言书》，列举学校当局侵吞公款、延搁校务，破坏学制的无耻行径和高仑玩忽人命、剥及秋毫的罪状，呼吁各界支持“退学团”的斗争。刘尔崧等人的正义行动，大大震动了广州社会各界。广州各大报刊纷纷刊载这一消息，纷纷表示同情学生、支持学生、谴责高仑。6 月 20 日，高仑向省署提出辞职。“退学团”终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将不合格校长高仑赶下了台。

高仑在辞职前宣布将包括刘尔崧在内的七名学生开除，高仑的这种报复行为，使学生们进一步加强了团结，为恢复刘尔崧、阮啸仙等七人的学籍继续斗争。5 月 20 日，甲工新校长召开校务会议，恢复了七人的学籍。这场斗争充分锻炼刘尔崧的领导能力，增长了其斗争实践才能。此后，甲工成为广州学生运动的中心，有了“红色甲工”之称，刘尔崧和阮啸仙、周其鉴、张善铭等四人，则被誉为“红色甲工”的“四大金刚”。

## “爱群通讯社”的“大傻瓜”

1922 年秋，广东甲种工业学校的第一届学生毕业了。这些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年，在甲工学习了四年，斗争了四年。当他们拿到毕业文凭时，都十分高兴。在毕业之际，同学们非常珍惜四年共同的学习时光，常常聚在一起讨论未来的前途和去向，有条件升学的同学，准备继续深造；家境不好的同学则想方设法找工作，以维持家计。有的同学为了工作甚至找到了原甲工校长黄强。那时，黄强当了兵工

厂的厂长，颇有权势。他们便想求他举荐，谋得一官半职。正当很多同学纷纷为毕业前景奔走的时候，刘尔崧等人却丝毫没有动静，并有不同的想法。

刘尔崧被殴打过，被追捕过，被开除过，已经与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过初步的斗争。他深深地认识到，在这黑暗污浊的社会中，被视为学问象征的“文凭又值几何呢?”他认为，毕业后，应该更加努力奋斗，改造这黑暗的社会。当同学们纷纷兴高采烈地去领取毕业文凭时，他却全然不在意。有个同学好奇地问他：你为什么还不去领文凭？刘尔崧意味深长地说：“干革命工作的人，是用不着文凭的。”作为共产党员，他决心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一生。创办爱群通讯社是刘尔崧革命生涯中的一大亮点。

爱群通讯社位于广州市惠福中路玉华坊中 20 号之二。刘尔崧从甲工毕业后，与同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成员的冯菊坡一起创办爱群通讯社，作为劳动组合书记部对外进行公开活动的机关，这是刘尔崧正式从学生运动转向工人运动的一个标志。

爱群通讯社由广东总工会内的油业、轮船、革履、机器工会等团体组成，刘尔崧经常出入这些工会团体，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了解工人阶级中存在的问题；他还到农村中去，了解与农民、青年、妇女等有关的问题，将调查来的第一手资料写成稿件，投向各个报馆。他还在经济窘迫的情况下，通过捐款出版了《星期报》指导工人的政治斗争，并于 1922 年以爱群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前往顺德大良镇，组织各行业工人进行斗争，发展和培养了一批党员，创办了当时广东县一级最早的党组织。

刘尔崧任爱群通讯社的记者期间除了微薄的稿费之外，别无其他收入来源，生活极其窘迫。但是，刘尔崧丝毫不介意，没有任何退缩，也从来没想过改行。刘尔崧作为甲工的高材生，毕业之后完全有机会找一份薪金优厚的工作，但他却坚持去干这种奔波劳碌而又收入微薄的记者行当，很多人感到十分不解。有人问刘尔崧：“你为什么要干这一穷光蛋的职业呢?”刘尔崧回答说：“我为的不是个人的饭碗，而是工人大众的饭碗。”在场的工人听了，无不为之感动，这时一个工头正好路过听到刘尔崧的话，他哈哈大笑，略带讥讽地说道：“你这个大傻瓜，你太伟大了吧?!”刘尔崧听到后，回击道：“那就让我做个大傻瓜吧!”

此后，刘尔崧婉谢了很多好心人帮他介绍好工作的主意，更加努力地从事爱群通讯社的工作，照样当他的“大傻瓜”。刘尔崧积极到各处采访，介绍各地工人运动经验，促进工人运动的发展

## 参与发动省港大罢工

1925 年 1 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会议制定了开展群众运动的计划。会

后，中共广东区委为贯彻四大的决议不遗余力，积极指导和发动各地工人运动的开展。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工委书记的刘尔崧非常忙碌。他常常与区委书记陈延年、军委书记周恩来，以及穆青、张太雷、彭湃、阮啸仙、邓颖超、蔡畅等区委委员一起研究华南地区如何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问题，主要的精力则从事工人运动。刘尔崧自己经常深入基层了解工人运动情况，指导工人运动的开展。

5月30日，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有光荣反帝传统的广东人民更是义愤填膺，决心与凶恶的帝国主义者进行坚决的斗争。

6月2日，广州各界群众举行援助“五卅惨案”示威的万人大会。刘尔崧带领工人队伍参加了大会，会后又率队游行。一路上，他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带领工人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沙面租界”等口号。游行一直坚持到晚间结束。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进一步发展反帝爱国运动，中共广东区委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派出有从事工人运动经验的同志到香港和广州沙面去发动工人进行罢工斗争，以给帝国主义沉重的打击。邓中夏、杨殷被派到香港，刘尔崧、冯菊坡、李森等被派到沙面。刘尔崧到达沙面后，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发动、组织工作。他首先召集青年工社、职工会、文员工会等领导人召开座谈会，会上，刘尔崧强烈控诉了帝国主义者压迫、奴役、残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他还说：“我们要趁热打铁，与香港等地工人一起进行罢工斗争。”

6月19日，香港海员工会首先发难，宣布罢工，其他行业的工会纷纷响应。6月21日，广州沙面租界的3000多名工人举行大罢工，离开沙面小岛，回到广州市区。在刘尔崧等人的指导下，“沙面中国工人援助上海惨案罢工委员会”成立，委员会发表了刘尔崧草拟的《宣言》，愤怒控诉了帝国主义者的罪行：“帝国主义不但饮我中国人民之血，而且食我中国人民之肉。”上海人民“一日不胜利，我等一日不返工。为上海案而奋斗，为解除我等自身痛苦而奋斗！特此宣言!”刘尔崧起草这篇酣畅淋漓的宣言表达了广州工人阶级进行反帝斗争的顽强意志和要求最终解放自己的不可动摇的决心。

沙面工人的罢工，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罢工委员会号召：所有在英、美、法、日企业的中国工人一律罢工。东山、芳村、白鹅潭两岸的洋行、工厂的中国籍工人迅速响应，纷纷加入罢工队伍，队伍不断壮大。为了给帝国主义者以更大的打击，刘尔崧还吸取过去斗争经验，组织工人纠察队，封锁沙面连接广州市区的东桥和西桥，困住了沙面。于是，许多生活在沙面帝国主义者日常生活供给也变得十分艰难。与此同时，刘尔崧还亲自率领工团配合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在珠江上检查来往船只，防守海关，捉拿破坏罢工的走私奸商，对保卫罢工

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刘尔崧参与组织领导的沙面大罢工，是省港工人罢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香港工人的罢工一起，成为有20万工人参加、坚持了16个月、震动国内外的省港大罢工的序幕。

## 勇斗工贼曾西盛、陈森

工人运动要胜利地向前发展，不仅要反对反动资本家、封建军阀、帝国主义这些外部敌人，而且还必须坚决彻底地揭露隐藏在工人队伍内部的工贼。刘尔崧深深体会到，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与工贼永不妥协地进行斗智斗勇的斗争。

曾西盛原是共产党员，担任广东油业总工会主席后，利用职权，挪用工会经费近5000元到粤东地区搞非法买卖，牟取暴利。他还勾结政府，承包政府征收的各种捐税，从而勒索百姓，鱼肉人民，中饱私囊。曾西盛劣迹斑斑，刘尔崧在调查、核对之后，对曾西盛进行了严厉批评，并希望他能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但是，曾西盛利欲熏心，对刘尔崧等人的话根本听不进去，对其治病救人的态度根本不以为然，鬼迷心窍地继续与政府勾结在一起。为了维护工人群众的利益，刘尔崧等人忍无可忍，在一次工会代表会议上，毅然地将曾西盛贪污、勒索的事实予以揭露，得到了广大代表的拥护，很多代表更是站出来高声说道："将工贼曾西盛从油业总工会主席的位子上拉下来。"面对众多证据，曾西盛无法抵赖，并在随后举行的民主选举中落选。但他不思悔改，继续以各种手段破坏工运，后被开除出共产党。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并教育广大工会干部，刘尔崧要求广大工会干部从曾西盛堕落的例子中吸取教训，不谋私利，全心全意为工人群众服务。

北伐战争之后，反动资本家和工贼竭力拉拢、收买一部分工人，并拼凑成立自己的工会，以达到分裂工人队伍、破坏工人运动的目的。那些反动资本家和工贼对刘尔崧等人在工人队伍中的宣传活动倒打一耙地讥讽说："加入工会是个人应有的自由，为什么纠众强迫别人加入?"刘尔崧听到后，立刻对工人群众说："老板组织的工会是假工会，只是为了维护老板的利益而成立的，因此，我们希望大家多做宣传，并带头加入自己的组织，不要参加老板建立的假工会，这是正当的行为，今后仍然要本着这种正确的方法去做。"由于工作得力，进步工会的队伍日益扩大，而由反动资本家、工贼把持的"工会"则门庭冷落车马稀。

工贼们面对这种状况，无能为力，他们很快就露出凶恶的面目，经常殴打进步工会的工人，捣毁进步工会的会所。1926年7月13日，工贼陈森指使爪牙在广州杀害了两名牙刷抿扫工人，引起了工人们的强烈义愤。为了打击工贼陈森倒行逆施的行为，在刘尔崧的主持下，7月16日，《工人之路》公开发表了《广州

工人代表大会对工会纠纷宣言》，宣称要为被害的工人申冤，要惩办残杀工人的工贼陈森，以维护社会的安宁。7月18日，愤怒的工人们将陈森扭送至警察局，要求依法惩办。国民党右派包庇工贼，暗中将陈森放走，让他逍遥法外。刘尔崧得讯，立即和工会干部组织2000多工人到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请愿，抗议公安局未经审讯即释放杀人犯陈森，要求立即通缉陈森，为被害工人昭雪，并解散反动资本家、工贼组建的“假工会”。刘尔崧组织的勇斗工贼的斗争狠狠地打击了工贼的反动气焰。

## “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广东的形势骤然紧张。14日，刘尔崧召集全市各工会负责人开会，传达中共广东区委指示，布置应付紧急事变的具体措施。当晚，反动军警实行戒严。在这危急时刻，刘尔崧仍不顾个人安危，星夜召集部分工会负责人开会，组织工人武装自卫队。

15日凌晨，反动军警在广州大肆搜捕革命同志。刘尔崧闻讯，立即转告附近同志转入地下。这天上午，刘尔崧正准备外出赴会时，广州工代会秘书陈功武匆忙赶到刘尔崧住宅，一见面就说：“糟了，全市已经戒严了。现在反动军警到处搜捕革命人士，许多同志都已经被捕，你赶快到外面去避一避吧。”话还没说完，门外就传来一阵急促的撞门声，并伴随着“快开门！快开门！”的大叫声。

刘尔崧的老婆陈六马上意识到情况不妙，马上从房里走出，将刘尔崧推入厨房，她正要将陈功武也推入厨房之时，警察已经破门而入了。一个警察用手揪住陈功武，厉声问道：“快说，刘尔崧在哪里?”陈功武装作莫名其妙地说：“我是外边人，只是来问问有没有东西卖给我，什么也不知道。”这个警察也不认得刘尔崧，就没有再追问陈功武，就到处望了一下，还探头探脑地伸出窗外去看了看，什么东西也没有发现，正准备进入厨房时，刘尔崧突然从厨房里走出来。他气宇轩昂、神态自若地站着，两眼怒视着这群警察。为了不连累陈功武和自己的妻儿，他昂首对敌，大声地说：“我就是刘尔崧!”一个警察立即用手铐将刘尔崧的双手铐住，并阴阳怪气地说：“啊！你就是刘尔崧，你平时讲打倒买办资本家，你现在去打吧!”刘尔崧立即厉声斥责：“你们不要太得意！总有一天，要把你们这些豺狼消灭掉!”

反动警察急着去邀功请赏，顾不上陈功武和陈六，押着刘尔崧兴高采烈地走了。刘尔崧被捕后，国民党反动派迫不及待地在报上发表消息：“广州共产党首要刘尔崧已被捕落网”，并将刘尔崧列为重犯，关押在伪公安局监狱中。

第二天，陈六以送被单为由来狱中探望刘尔崧，夫妻相对，泪眼婆娑。刘尔崧深情地望着妻子，对陈六说：“回去吧，用心把孩儿抚养长大。”陈六泣不成

声，正想启口说话，狱卒强硬地把她拖开，这对夫妻最后一次见面，不到两分钟。

反动派深知刘尔崧是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千方百计想从他的口中打听到共产党的内部消息。他们对刘尔崧严刑拷打。他们哪能料到，刘尔崧虽是一副书生模样，但铁骨铮铮，始终不低头，不屈服。反动派见硬的一套不行，便来软的。他们对刘尔崧劝道："你何必自找苦吃呢？你是国民党省党部委员，二大代表，又当过工人部长，是我们国民党的骨干，只要你声明脱离共产党，回到国民党里来，我们可以担保你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刘尔崧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是共产党员，我决不离开共产党，要我投降，那是白日做梦……我已被捕，你们要杀要斩，随你们便。"敌人恼羞成怒，只好悻悻地走开了。

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将刘尔崧转到珠江南岸的南石头监狱。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都关押在这里。刘尔崧在狱中坚持战斗，鼓励难友们保持革命气节，他对难友们说："我们的斗争是正义的。革命一定会胜利，决不能向敌人屈膝投降，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他写了一封信，通过秘密关系送交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的同志们，告知狱中的情况，要他们提高警惕，鼓励他们坚持斗争。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收到他的来信后，得知他还未牺牲，决定实施营救。于是决定发动市内工人罢工，散发革命传单，以迫使反动派放人。

正当广东党组织和广州市工人代表大会积极活动营救刘尔崧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却已经决定将刘尔崧杀害。4 月 19 日，监狱突然宣布，要将刘尔崧转押到别的地方。当凶恶的敌人喊到他的名字时，刘尔崧神态自若，从容不迫，信步走出狱门，他频频回望狱中的难友。突然，他大声地说道："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刘尔崧用唐朝太守张巡的名言，表明自己宁死不屈的坚强意志，并作为临难遗言，留给狱中的难友。

这一天，南粤的夜空划过一道闪亮的流星，著名工运领袖刘尔崧被杀害于珠江白鹅潭，时年仅二十八岁。

刘尔崧在遗作《晨曦》写道："有了一线的光明了！东方渐渐地白了！山尖上的云儿渐渐地去了！睡乡中的人儿渐渐地醒了！"刘尔崧用生命换取了中国民众的觉醒和广东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1927 年 10 月，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恢复活动时，有一位工人勇敢地提议："全场起立默哀三分钟，追悼我们死难的工人领袖刘尔崧！"，顿时间，全场肃静，人人起立默哀，沉重悼念自己的领袖。1929 年 4 月 8 日，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红旗周刊》刊登了《悼刘尔崧同志》一文，热情赞颂刘尔崧对革命的贡献，号召革命同志继承先烈遗志，将革命斗争进行到底。

（陈雷刚）

# 周其鉴

## 农民武装运动的先驱

周其鉴是中共建党时期的党员，曾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及区委农委委员、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常委、广东农军副指挥。1927 年参加中共领导的“三大起义”中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是农民武装运动的先驱。广州起义失败后，周其鉴转移到清远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后不幸被捕，被反动派秘密杀害。

### 到广宁开展农民运动

1924 年 4 月 8 日，中共广东区委派遣周其鉴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率领一支由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共 30 多人组成的队伍，到广宁开展农民运动。

消息传出，地主豪绅民团惊恐失措，群起反对。民团头目慌忙派出民团数十人，一连两晚放哨戒严。周其鉴率人找到民团团长，申明国民党扶助农工、准予成立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的政策，并拿出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函件，迫使民团团长立即



周其鉴

撤除岗哨，县农民协会筹备处得以按计划进行工作。

周其鉴等为了发动和组织农民，经常扮作外出耕种或走访亲友的农民、沿村叫卖的小贩、捕鱼捉蛙的贫困者，深入平原圩镇、山村僻壤，利用圩期演讲，入户个别谈心，揭露地主压榨农民的罪行，宣传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谋求翻身解放的道理。他与贫苦农民兄弟促膝谈心，同吃番薯度日，共住茅屋过夜。地主豪绅对他恨之入骨，悬赏千元白银多次雇凶要杀害周其鉴。周其鉴坚定地表示："田主们纵使杀了一个周其鉴，也杀不尽千千万万个周其鉴！"

经过艰苦深入的思想发动，贫苦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组织觉悟不断提高，许多人要求参加农会和农军。仅仅头半个月，江屯、潭布等5个区，就有3000多户农民参加了农会，一批青年农民参加了农军。同年9月底，农会组织发展到19个区57个乡，会员万余家，农军常备队300多人。其中的22名积极分子还被选派到广州农讲所学习。

1924年10月6日至7日，周其鉴在广宁县城召开广宁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在各区发展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进行减租运动和青年农民教育问题等决议案，决定成立广宁县农民协会和县农民自卫军，周其鉴当选为广宁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0月10日，在县城隆重举行广宁县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和庆祝游行。中共广东区委代表阮啸仙、广东总工会代表杨殷等到会热烈祝贺，授旗授印，指示广宁党组织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

广宁县农民协会和县农民自卫军正式成立后，加紧发展农会和农民自卫军，在秋收适时开始减租运动。一场中共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运动，在广宁县轰轰烈烈地展开。

周其鉴、陈伯忠等领导清醒地预料到，激烈的武装斗争不可避免，于是把加强农军建设作为一项紧迫的重大任务：积极组建各区乡农军，千方百计购置和筹缴枪支弹药，开始得到驳壳、左轮、土打单响、粉枪、长龙等200余支和土炮5门，严格紧张训练农军。从此，农军在数量上和素质上都得到很大提高，战斗警惕性显著增强，为后来应对突然事变做了充分准备。

## 围歼地主武装

形势的发展果不出所料。正当农民运动开始大发展的时候，各地的地主与民团、官僚、国民党右派、土匪流氓等相互勾结，蜂起攻击农会，企图扑灭农民运动。

1924年11月16日至12月中旬，地主民团武装数百人，分兵进行武装收租，围攻古楼营区农会，袭击社冈区农会所，劫掠社冈区洞尾乡农民财物，偷击塘迳乡农军步哨。早有准备的农军奋起还击，将地主武装一一击退。

在武装斗争开始的紧张时刻，以周恩来为委员长的中共广东区委，派遣彭湃（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和郑千里到广宁协助周其鉴，并成立由陈伯忠、谭鸿翔等组成县农军行营总挥部，到第一线指挥农军战斗。

这时，地主民团按照其原定总攻击的部署，调兵遣将，各地民团向潭布移动。大地主江汉英在其坚厚炮楼内布防精兵强将，外围设置三道防线，扬言固若金汤，谁也攻不破。

12月初，共产党员廖乾五（党代表）、徐成章（队长）、周士第（副队长）、赵自选（军事教官）指挥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驰援广宁。县农会执委会及时成立由周其鉴、彭湃等组成的县农会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农军战斗。

12月11日晚，周其鉴、彭湃召开县农会军事委员会会议，分析当前形势，讨论进攻计划，决定12日晨6时出动包围潭布大地主江汉英炮楼，由农军任前锋，铁甲车队相机协攻。计划集中力量专打潭布地主炮楼，以免他方面助敌。俟解决潭布之敌后，再下手其他。潭布大地主炮楼高6层，有双墙，用石料灰沙筑成。楼内驻有地主民团武装守护，装备有新式步枪、驳壳、水旱机关枪，储备有大批武器、粮食，是广宁大地主的重要基地。

12日晨7时许，县农会军事委员会指挥农军开始出击，计划先扫除潭布外围之敌。进至敌第一道防线（距潭布5里）时，与敌遭遇。农军分三路围攻，战斗两个多小时，铁甲车队到援，组织冲锋队击退敌军。随即又击退由江屯来援之敌。农军乘胜追击，围攻岩头地主炮楼至次日凌晨1时，因该楼坚固，未能攻陷。农军撤回社冈大本营，再行计议。

1925年1月9日、10日，县农会军事委员会指挥农军和铁甲车队1000多人，围攻潭布大地主炮楼，连发6炮，虽击中炮楼之正面侧面及楼顶，但只伤其外皮，楼坚未倒。围攻暂时停止。

县农会军事委员会利用战斗间隙时间，加强农军的军事政治训练，同时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对敌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地主豪绅勾结国民党右派县长召开所谓“业佃双方和平会议”。周其鉴率领50多名农民代表毅然赴会，准备在会上揭穿地主豪绅的政治欺骗，教育农民群众。右派县长见势不妙，以“田主代表未到，改期开会”为借口，被迫取消会议。

国民党右派县长勾结县民团总局，企图用“设宴会”圈套，诱杀农军领导人。彭湃、廖乾五、徐成章经过周密研究和安排，不顾个人安危，身藏短枪，武装赴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席间智擒县民团总局长，由农军押着游村示众。与此同时，周士第和赵自选率领埋伏在周围的铁甲车战士，突然冲入县民团

总局，解除该局武装，缴枪42支。

县农会军事委员会还派遣罗国杰、谭鸿翔赴“神打团”驻地，宣传农运政策，说明农会农军的任务，诚恳地解释农军和“神打团”成员同为贫苦农民兄弟，呼吁他们站到农会一边，不要被地主欺骗利用。

通过加强军事准备和一系列政治斗争，增强了农军的斗志和胜利信心，迫切要求再战。

1925年2月初，县农会军事委员会指挥农军和铁甲车队，采取围城打援、火攻炮楼的战法，再次发动攻势。

农军和铁甲车队1000多人，围攻潭布大地主炮楼，周其鉴、彭湃率领杨进第等12名工程兵，冒着敌人密集炮火，夜以继日挖掘地道，准备用火攻炸毁地主炮楼。陈伯忠、薛六带领10多名农军掩护工程兵，徐成章、周士第率领30多名铁甲车队战士在炮楼背后山冈多次打退楼内地主武装的反扑，保护工程兵挖掘地道。农会组织工程队、输送队、传达队、巡查队、救护队、侦察部，输送传达巡查，络绎于道，声势浩大。

与此同时，赵自选等指挥铁甲车队和农军1000多人，英勇阻击从螺岗、江屯、井窟和企山等地千余来援之敌，截断敌来援之路。螺岗农军以14人击退地主武装200余人，农军死1人伤4人仍坚持战斗，誓死保卫区农会。江屯农军在敌众我寡枪劣弹缺粮绝的艰苦条件下，仍坚持战斗5昼夜，并迫使潭岭坑和井窟炮楼的地主武装走出炮楼，打着白旗向农军投降，经缴枪教育后释放，以便集中力量打击主要之敌。

工程兵经过10天日夜挖掘，将深7丈长300余丈的地道通到地主炮楼底部，用棺材装载大量炸药运进去，两次点火炸楼；成千男女农民，不顾敌人疯狂射击，抱着一捆捆柴草堆放到炮楼周围引火焚烧。楼内外的熊熊烈火，卒将坚固炮楼炸毁。地主民团无计可施，守不住，跑不掉，被迫投降农军，答应农会提出的条件，解除武装，赔偿及减租。次日，附近炮楼的地主武装，也相继投降农军。

这次周其鉴、彭湃等指挥农军和铁甲车队围歼地主武装之役，以潭布为中心，波及古楼营、井窟、江屯、社冈、石咀、县城东南西3区、企山等10多个区乡，历时两月余，歼敌800多，缴获枪支、土炮1000多件，没收地主仓谷600余石，取得了重大胜利。中共广东区委农委负责人阮啸仙称赞：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军“第一次武装帮助农军之伟举”。

## 打退地主武装的进犯

1926年1月初，高要县地主豪绅武装反抗农民运动，杀害农会会员和农军，劫掠农民财物，制造了震惊全省的“高要惨案”。

为了惩罚地主豪绅，保护广大农民群众，中共广东区委派遣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农委委员、广东省农民协会执委会常委及省农会驻西江办事处主任周其鉴、中共指挥的叶挺独立团前往高要县处理。

周其鉴率领400多名广宁农军、叶挺率领独立团周士第营（随即增加一营）立即赶到高要，采取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上下配合的策略，从多方面进行工作：

1．深入到农军、农会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中，调查了解惨案真相和地主豪绅杀害农军农民的恶行。

2．先后向中央农民部、广东农民协会执委会提交5次报告，以大量事实揭露高要地主武装的罪行，提出严办祸首，解除地主武装等建议。周其鉴等还在肇庆市等地向各界人士接洽宣传，揭发地主豪绅的罪恶，争取社会同情与援助，孤立地主豪绅。

3．率领干部赶到岭村，慰问伤员和被害家属。

4．报请广东国民政府成立高要绥靖委员会，全权处理高要案件。

5．组织和训练农军，加强战备，动员农民支援地主豪绅武装的斗争。并积极做大刀会群众的争取教育工作，使他们不再被地主豪绅利用，站到农会一边来。

狂妄的地主豪绅拒绝绥靖委员会提出的条件，扬言与绥靖委员会决一死战。1926年3月初，地主豪绅又纠集地方民团、土匪、大刀会成员5000余人，围攻高要县伍村农会。

叶挺、周其鉴指挥早有戒备的独立团和农军官兵，奋起抵抗。独立团组织冲锋队，冲散敌人前锋。独立团和农军大队伍随即跟进，击败来势汹汹之敌，乘胜追击直捣地主民团巢穴罗建村，血战竟日，火攻至晚，毙敌150多人，伤敌无数，余敌狼狈逃窜；拿获祸首4人，罚款2000多元，其他地主豪绅慑于独立团和农军威力，被迫交出赔款5万多元，枪300余支。

“高要惨案”的解决，沉重地打击了地主豪绅的嚣张气焰，大长了农军的威风，促进了高要与附近各县农民运动的大发展。

## 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

1927年4月中旬，国民党右派集团在上海、广州等地制造反革命政变。为反击国民党右派集团、挽救革命，中共广东区委调派干部到各地组织武装暴动。周其鉴到清远县传达区委指示，改组农会，成立以周其鉴、叶文龙、赖松柏为领导的“非常时期特别委员会”，率领清远、英德农军攻占清远、英德县城，成立英德县工农兵政府。

4月下旬，清远、英德、曲江、始兴、南雄、乐昌、仁化等县农军，北江农军学校学员和甄博亚、李甫率领的粤汉铁路130多人组成的工军共1200多人，在韶关市集中，组成广东农军（又称“北江工农军”），指挥罗绮园，副指挥周其鉴。

5月1日，广东农军在韶关市宝林寺举行隆重的誓师大会。会后，广东农军移师湖南，跋山涉水，不畏艰险，冲破敌人的拦截，历经20余天，抵达永兴县。到永兴不久，接到中共中央命令，迅速北上武汉。6月中旬，广东农军平安抵达革命力量尚占优势的武汉。

遵照中共中央安排，周其鉴率领600多名农军打败国民党右派收编的阴谋，机智地离开武汉，在贺龙第二十军协助下，经九江于7月30晚顺利进入南昌市，与叶挺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教导团同驻在一个营房。

此时，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7月31日下午，起义总指挥下达起义命令，给各部队规定战斗任务。广东农军的任务是：守备新营房驻区，相机增援第二十四师教导团消灭新营房敌军。周其鉴立即召开干部会议，作出战斗部署，进行战斗动员。

8月1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领导起义军举行南昌起义。广东农军配合第二十四师教导团迅猛冲进敌第三军第二十四团营房。敌人毫无准备，从梦中惊醒，手足无措，被迫缴械投降。农军满怀喜悦，协同教导团押送战俘，抬着缴获的大批枪弹，返回驻地。广东农军配合叶挺指挥的部队，不费一枪一弹，一举歼敌第二十四团，在南昌起义中作出了积极贡献。

南昌起义胜利后，广东农军编到正规部队，一部分编入贺龙部第三师第六团，一部分编入政治保卫处特务队，一部分编入粮秣管理处运输队，随起义军大部队南下广东。

1927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联席会议，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制定今后工作计划，改组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赖松柏、薛六等当选为省委委员，周其鉴当选为省委候补委员，不久补为省委委员。

11月上旬，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决定，开始准备广州起义。

12月初，周其鉴、赵自选、叶文龙、宋华等离开香港回到英德、清远、花县等县开展工作，贯彻执行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广州起义的指示。他们在清远会同先期从香港潜回的农军赖松柏、汪耀以及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刘清等，把党组织、农会和农军重新组织起来，组成了以汪耀为队长的破坏队，破坏敌人粤汉铁路交通线，并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独立团，赖松柏任团长，宋华、刘清任副团长。广州起义前夕，独立团在花县农军支援下，曾一度攻占清远县城，夺取敌人一批枪械武装自己，惩处反动分子，释放被禁在县城的革命者，打击了敌人，并且牵制了

北江地区敌军向广州调动。随后，英德县又有六七百农民武装举行起义。

广州起义爆发时，北江农军接受广州工农红军总指挥叶挺的命令："在粤汉铁路沿线扰乱敌人后方及毁坏铁路"。广州市郊农军从东西南蜂拥入城，周其鉴带领一批精干农军进入市区准备接受新任务。因起义军突遭强敌疯狂反扑，撤出广州转移到海陆丰等地，支援农民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周其鉴扮作市民，撑开伞从楼上跃下，机智地离开广州城返回北江地区坚持革命斗争。他在极其艰险的条件下，深入到清远、英德等县，协助中共北江特委和县委，整顿和发展党组织，指挥农军在英德等地举行暴动。

## 提出现代农民运动理论

周其鉴在革命实践中，注重研究革命理论，总结革命经验教训，用以指导自己的行动。



周其鉴故居

他撰写了《广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广宁高要农运状况》等论著，总结农民运动尤其是农民武装运动的经验，提出现代农民运动理论。毛泽东主办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聘请周其鉴当教员，并将周其鉴撰写的《广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彭湃撰写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等编入《农民问题丛刊》。毛泽东在丛刊序言中明确指出：广东的这8份材料，是丛刊中"最精粹部分"，它给了我们懂得农民运动的性质和做农民运动的方法。毛泽东要求全国农运干部仔细研究这些材料，做好农民运动。

周其鉴为谋求工农翻身解放，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尤其在农民武装运动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党和人民的赞扬，而地主豪绅对他恨之入骨。1928年2月1日，当周其鉴在清远县发动群众，重整旗鼓，准备再武装暴动的时候，不幸被敌人捕杀，壮烈牺牲。

周恩来曾赞誉道："广东农民运动掌握领导者是彭湃，在武装运动上，开始领导是周其鉴同志。"广宁人民在县城高竖周其鉴巨型雕像，创办"周其鉴纪念中学"，表达对周其鉴的无限景仰和深切怀念。

（陈万安）

# 周文雍 陈铁军

## 革命者爱情的绝唱

在那长夜漫漫、风雨如晦的岁月里，有多少忠贞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视死如归，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捍卫党的事业。1928年2月6日，在广州红花岗畔的刑场上，两个青年男女革命者，面对敌人的枪口，从容不迫地举行结婚典礼。他们就是在中共党史上被称为生命与爱情之绝唱的周文雍、陈铁军。

### 铁心拯中华

周文雍，1905年8月出生于广东省开平县的一个贫穷知识分子家庭。1922年在亲友资助下考入广州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在这个人称“红色甲工”的学校里，周文雍读到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等革命书籍。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秋，拥护孙中山的军队与反孙的陈炯明部队在距广州不远的石龙镇激战，周文雍等团员组成慰劳队去前线时突遇机枪火力封锁，周文雍带领大家低身前进冲过铁桥，还缴获了一挺轻机枪。这次表现轰动一时，周文雍自然



周文雍和陈铁军临刑前的留影。

地成为广州重要的学生领袖。中共三大后，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到广州新学生社工作。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 年省港工人大罢工之前，周文雍被派往沙面洋务工会担任领导职务，很快就打开了局面。在此期间，周文雍经受了锻炼，并被选为中国广州市委委员和中国广东区委工人运动委员会的成员。1926 年夏，他担任了共青团广州地委书记，在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时，他把青年工人组织起来，成立担架队、运输队等，与省港罢工工人一起，有力地支援了北伐军。

面对生与死的抉择，很多人往往会选择退缩，但周文雍毅然选择了一条与死亡相伴，充满艰辛的革命之路。1927 年 4 月，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广东的反动派也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大批共产党人被捕或被杀害，白色恐怖笼罩着广州。周文雍也被通缉，但他无所畏惧，坚持战斗，并受党的委托，担任了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主席。他把各工会自发组织的武装队伍统一起来，扩大地下武装，亲自指挥青年武装开展对敌斗争，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他在广州起义中任赤卫队总指挥，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委员、省委常委。

## 改名以明志

陈铁军原名陈燮君，1904 年出生于佛山镇的一个归侨富商家庭。她在这个家庭里，不愁吃不愁穿，却苦于被浓厚的封建思想所管束。正当她遨游在新文化和新思想中，小学还没毕业的时候，包办婚姻向她袭来。她父母早早就将她许配给门当户对的富商何合记盲公饼老板的孙子。何家借口老爷患病，要娶孙媳妇“冲喜”。两家商定“重孝在身，只能拜堂，不能同房”。男家催她完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旧社会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何况对方又是富甲全市的巨商呢？不管铁军如何反对，家里也不肯给她取消婚约。连她的老师也劝她可以跟对方见见面，要是有共同的思想基础，还是可以慢慢建立感情的。铁军只好答应了。在行礼、拜堂之后，铁军落落大方地跟对方交谈，发现对方竟是个庸俗不堪的小老板，她毅然决定回娘家去，继续完成学业。小学一毕业，何家就催促她回去当少奶奶，哥嫂施加压力，不再给学费。陈铁军不屈从，变卖首饰、衣物，到广州求学。

铁军到广州读书时正赶上大革命风起云涌时期。她与区梦觉等同学一起组织“时事研究社”，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时事政治。她将自己的思考在报刊上发表，《世界革命与民族革命之关系》等文章，反映她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妇女解放的道路。考上中山大学后，她参加了广州声援“五卅”运动的示威游行。她手挥小红旗，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等待在她面前的是沙面租界英、法帝国主义者疯狂的扫射，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沙基惨案”。面对敌人暴行，陈铁军深深地体会到：不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打倒，人民永远不会得到自由幸福，妇女也不会得到解放。为了表示自己立下铁石心肠干革命的决心，她将自己本来的燮君改为铁军，还劝导妹妹燮元改名为铁儿。1926 年夏，陈铁军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的事业奔走。

1927 年 4 月 15 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凌晨，大批军警包围了中山大学。在这紧急关头，陈铁军坚定沉着，勇敢地攀上大树，翻越墙头，逃出了敌人的魔掌。然而，她并不是只顾个人的安危，而是马上执行组织的命令，经过巧妙的化装，逃过军警的耳目，从城内跑到西关，通知因难产而在医院留医的中共广东区委妇委负责人邓颖超立即撤退。在该医院医生王德馨和护士韩日珍的掩护下，陈铁军帮助邓颖超撤离了广州，取道香港转移到上海。几十年后，邓颖超还带着深深的怀念说，如果没有陈铁军相救，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任务完成了，但是铁军却和党失去了联系。在阴森的白色恐怖中找寻党，那是多困难而又多危险啊！哥哥想方设法找到她后劝铁军说：“革命已无可挽救了，你何苦去冒杀头的危险呢？你是个好学的人，我就送你到外国留学去。你也该为自己的幸福打算了。”铁军断然回答说：“正是革命到了紧急关头，才需要不怕危险的人。为大众的幸福而被杀头，也就是我的幸福。”

## 革命假夫妻

“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周文雍在广州转入地下活动，因单身容易引起怀疑，组织上于 8 月间派陈铁军到他身边假冒夫妻，协助周文雍建立广州暴动委员会机关。在“家庭”内，他们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同志关系。对富家出身的陈铁军来说，穷学生出身的“丈夫”的忘我工作精神很快就吸引了她。

不久，周文雍领导工人示威游行被捕。周文雍是市委委员，又是准备中的广州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省、市委立即组织力量营救周文雍。当时周文雍被关押在维新路的公安局，身份尚未完全暴露。公安局戒备森严，党组织经过缜密的考虑，制定了“智取”的方案。陈铁军以“妻子”身份探监时，将营救方案秘密传进监狱。周文雍立即和难友们一起采取措施，积极配合行动。周文雍吃了大量从狱外传送进去的用生姜和辣椒煎炒的食物，又不饮用茶水，借以引起病

状。没几天，他果然发高烧，呈现出重病状态，他便借机整天不停地高声呻吟，甚至发狂地喊叫，要求送医院治病。同狱的难友也跟着起哄，不分昼夜地叫嚷："他是伤寒病呀！会传染的，我们都要陪死啦！""病得这样厉害还不送医院，太不人道啦！"陈铁军也加紧在外面活动，她打扮成富贵的少奶奶去给监狱医生送厚礼，叫他证明周文雍病情严重，非住医院不可。反动头子们听到周文雍得重病，害怕他死了无法得到共产党的重要秘密，另一方面也迫于公愤难平，便无可奈何地表示同意。周文雍被送进市立医院犯人留医处留医。

反动派为了加强看守，在医院的大门口特设了一个警哨，日夜监视。我们则布置了一个同志假装病人，在紧挨着周文雍的病房住下，又派一些人装作病人家属去医院探望，从中打听消息，摸清情况，并与周文雍定好逃走计划。11 月下旬的一个晚上，一辆小汽车来到医院门口停下，走出几个人，一个扮作探望病人模样的同志接近了哨位，抽出腋下藏着的手枪，，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敏捷动作，对准哨兵大喝一声"不准动。"门警乖乖地缴了枪。另几个人立即闯进医院，跑进关押周文雍的病房，用白布单把周裹好，由一个同志背出大门，坐上事先准备好的停留在医院门前的一辆无牌小汽车，开足马力飞奔。

汽车经红花岗驶向沙河，在一个农家门前停下。陈铁军出来接应，就在那里隐蔽下来。第二天，广州和香港的私营报纸在头版头条报道："无牌小汽车，劫走共党周文雍"。一时，共产党英勇机智劫走周文雍的传奇式革命故事，传遍全市，吓得反动派急忙调动大批反动军警，到处搜捕。陈铁军日夜悬心，像妻子那样日夜照顾着受到刑伤的周文雍，周文雍深深被感动。两人的感情发展到近似夫妻，只差最后一句话未说破。

反动派的搜捕稍稍松懈之后，同志们曾劝周文雍暂时到香港去避避风。可是，他坚决不同意，豪迈地说"怕危险，还干革命"，不顾身体虚弱和严重伤痛，顽强地为准备广州起义而紧张地工作着。陈铁军则执行秘密运送武器给工人赤卫队的惊险任务，应付自如。从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录《奔向海陆丰》，仍可以看到她勇敢、机智、沉着、敏捷的英雄形象："我们开始研究巷战的战斗动作。不多会，走进一位年轻的、提着一篮子的女同志。她包着头，只露两眼，一声不响地把菜篮子放到桌上。党代表老陈猛地站起，高兴地说：'武器来了！'这时，那个妇女把盖在篮子上的菜掀掉，露出两支手枪、几个手榴弹。大家早有思想准备，没嫌少。只有一个同志问了一句：'还能多给一点吗？''没有了！'那位女同志说：'暴动起来以后要多少都有。'说完就走了。"

12 月 11 日起义爆发，周文雍担任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协助张太雷、叶挺组织作战。周文雍指挥一部分敢死队员摸到公安局后侧墙下，用搭人梯的办法攀上围墙，翻身跃入墙内，里应外合砸开了公安局的大门。周文雍打开公安局的军械库，把枪发给参加起义的工人群众。两小时后，广州大部地区均被起义军占领。

黎明，起义总指挥部移到广州市公安局。周文雍把一幅红布横额挂在公安局的门楼上，上面是他亲笔书写的七个大字：广州苏维埃政府。周文雍出席了由张太雷主持的苏维埃政府的第一次会议，并出任人民劳动委员兼教育部长。起义爆发之后，陈铁军则担当周文雍的联络员，勇敢地完成联络各部队的任务。起义第二天，长堤方向告急。警卫团的领导不会粤语，难以同工人协调，到指挥部要一名翻译。周文雍看看身边只有陈铁军可派，在枪炮声中两人面对可能的生离死别，只是深情地互道珍重而分手。

## 临终比翼情



周文雍和陈铁军牺牲地。

起义失败后，两人分别都潜往香港，无数战友牺牲的悲痛和工作难题，又使这对恋人来不及再谈个人感情。20 天后，周文雍打扮成南洋华侨商人，在海员的掩护下返回广州，提前从香港回来的陈铁军把他从西壕口码头接到“家”里。这个“家”实际上是党的秘密联络机关。周文雍和陈铁军仍假扮夫妻，陈铁军的妹妹，她嫂嫂的妹妹和他们住在一起，帮助并掩护他们工作。两人主要任务是联络失散的同志。在白色恐怖的广州，周文雍和陈铁军勇敢机智地避过敌人的耳目，跑了许多地方，寻找失去联系的同志，重新建立秘密的联络点。周文雍还化装成苦力工人到工人区找工会骨干，研究如何重新组织工人继续进行斗争。听说“周文雍又回来了”，大家奔走相告，增添了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可是反动派听到这个消息，又怕又恨。当时盘踞在广州的桂系军阀，为了防止革命运动的再起，便加紧白色恐怖活动，密切注视着周文雍等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因叛徒告密，一天傍晚警察来抓捕他们。当时在家的陈铁军听到动静，让同样是地下党员的妹妹陈铁儿从阳台逃走，自己留下搬动窗台的花盆发出信号。不幸的是，周文雍未看见警告，跨进门后，二人同时被捕。由于他们事先已把秘密机关里的一切文件收藏或销毁了，敌人翻来覆去地搜查，却什么也捞不到。

反动派有“无牌小汽车”的前车之鉴，不仅给周文雍加上了沉重的脚镣与手铐，还用粗大的铁链锁着，关进公安局特别监狱的单人牢房里，派大批军警日夜监视。在狱中，他们受尽酷刑，坚贞不屈。敌人以死刑相威胁，周文雍大义凛然

地说："死并不能吓倒共产党人，当然，我很想活，因为活着就可以和你们斗争！"敌人用酷刑、高官、金钱、"自由"，都无法达到他们的目的，就强迫周文雍写自首书。他满腔怒火地接过笔来，淋漓尽致地揭露反动派的滔天罪行，并在监牢的墙壁上慷慨激昂地写下："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周文雍以这首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诗，表达了对党对人民对革命的无限忠诚，表现出他在手执屠刀的敌人面前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警察局局长朱晖日亲自提审周文雍。他见周文雍毫不动摇，下令用"放飞机"、"坐老虎凳"、"插指心"等酷刑逼供。周文雍多次昏厥，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在女监牢里，敌人用同样的办法对待陈铁军。他们从陈铁军这儿所得到的，和从周文雍那里所得到的是同样的结果。陈铁军受审时面对威胁利诱也毫不动摇，只关心"丈夫"的情况。反动派用尽严刑，耍尽阴谋诡计，可是一切都落了空，敌人恼羞成怒，为了恐吓群众，决定公开处决这对"共党夫妻"。

周文雍在广州名气很大，广东军阀公开审判时为掩盖拷打痕迹，为他脱下血衣换上半旧西装。周文雍紧紧地抓住这难得机会，把敌人的法庭当作宣传革命的讲坛，打击敌人的战场。他慷慨陈辞，历数国民党反动派背叛孙中山，反对人民的种种罪行，指出：工农一定得解放，革命一定得胜利。当反动法官宣布他的死刑时，他昂然挺立，神色自若。当问到他最后还有什么要求时，周文雍毅然回答："只要求和陈铁军同志一起照张相。"留下的这张照片上的周文雍大义凛然，只是手势不正常，显然是受刑后造成的结果。陈铁军则披着四五尺的宽围巾，呈现出一副安详的样子。周文雍和陈铁军这两位优秀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服从革命的需要，党派他们同住一个机关，名义上是一对夫妻。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和志趣，彼此间的感情也非常深。但是他们为了革命的利益，还顾不上谈私人的爱情，因此，一直只保持着纯洁的同志关系，没有结婚。当他们马上要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献给党的时候，他们才拍下了这幅双人照片，最后表明了他们是一对革命的情侣。国内许多同志看到报纸上的这张照片，为之深深感动。

2月6日早晨，反动派用手拉车把周文雍、陈铁军解赴刑场。在路过市区时，两人态度从容，毫无惧色，放声高呼"打倒国民党新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并高唱《国际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反动派却异常紧张，如临大敌。他们非常害怕人民群众接近，马路两旁形似戒严。尽管如此，沿途市民还是闻声而来，越聚越多。不少人为他们的英勇牺牲表示敬佩，不少人被他们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感动得热泪盈眶。在朝向刑场的大路上，自然地形成了一条极为悲壮的送别行列。在红花岗上，他俩最后用青春的火花，写成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诗篇：周文雍快步走上小坟堆，用略带四邑口音的广州话，高声向群众说道："同胞们！我们共产党要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要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新中国。现在他们要杀害我们了。我们共产党是杀不尽、吓不倒的！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他的话还没有讲完，就被敌兵扯下坟堆。这时，陈铁军迅速走上去，站在周文雍站过的地方说：“人们都说我和周文雍是夫妇。其实，我们是同志关系，只是由于革命工作需要，我们假扮夫妻住在一起罢了，工作上的互相帮助和生死与共的斗争，把我们的心也紧紧联系在一起，但是为了革命利益，我们顾不上谈个人爱情，因此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同志关系。”她停了一下，深情地望望周文雍，又继续说下去：“现在我向大家宣布：当我们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献给了党的时候，我们就要在这里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同胞们，同志们，永别了！望你们勇敢战斗，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未来是属于我们的。”说完，她走到周文雍身旁，挺起胸脯，对刽子手喝道：“开枪吧！”周文雍也接着说：“是呀！开枪吧！”可是，刽子手还不开枪。一个军官把陈铁军拉开，拔掉插在她身上的标明枪决的木签，又对她作最后诱降。只听得陈铁军大声说：“你们休想从我口中得到什么东西！”她又奔回周文雍身边深情地说：“我们要同生共死！”她显得十分娴静。她看见周文雍的白衬衣的领子向内折，就温柔地为他整理，并且说：“我们要整整齐齐、精神奕奕地就义。”周文雍把珍藏在胸口衣袋中的起义时使用的红领巾从容系在陈铁军的脖子上。一股暖流冲击着陈铁军，她幸福地微笑着，轻轻拭去周文雍脸颊上的血迹，周文雍细心地抚平陈铁军的一丝乱发，同时提起她的围巾的一端搭在自己的肩上。于是两人共围一巾，共同高唱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这悲壮的歌声，在祖国上空缭绕不绝。

反动派枪声响了，罪恶的子弹穿透了周文雍、陈铁军的胸膛，热血染红了他们的衣裳，染红了泥土和绿草……宁死不屈的周文雍，在还未绝气的时候，再一次顽强地挣扎着坐了起来，用尽最后的一点力气呼喊“同—志—们—革—命—到—底！”红花岗是他们的刑场，是他们的战场，也是他们举行庄严而高尚婚礼的礼堂。这是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史记。这是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绝唱。一对风华正茂的青年，为了追求真理，建立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新中国，在刑场，面对反动派的屠刀，面对与爱侣的生离死别，凛然不屈，视死如归，定格了中国革命史上最悲怆、最壮美的一幕。“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古往今来，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为了正义与真理，为了民族与人民从容就义、壮烈赴死的民族脊梁，中华民族才生生不息，繁衍壮大。

时光匆匆，飞逝如电。今天当我们回首已经尘封的这段历史时，仍能感受到强烈的震撼。周文雍和陈铁军的婚礼，没有鲜花彩车，有的只是敌人的囚车和刺刀；没有祝贺的鞭炮礼花，有的只是反动派的狰狞和枪声。对照今天新人们婚礼的欢乐与幸福，不能不对先烈们产生深深的崇敬。我们应当永远牢记他们为后人的幸福所做出的巨大牺牲。

（陈永红）

# 郭沫若

## 一代文豪与广东大学

我国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杰出的诗人、作家、戏剧家、学者郭沫若，这位在中国文坛上驰骋了60多年的文化巨人，曾经多次风尘仆仆到达广东各地，从事革命活动，与广东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中山大学的前身——广东大学，就是其曾经任教、战斗过的地方，虽然时间短暂，却留下了令人难忘的战斗足迹，在中大校史甚至广东近现代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 众望所归，南下国立广东大学任教

1925年下半年至1926年初，国立广东大学由于各种政治势力在其中的明争暗斗十分激烈，学校的情势显得极为混乱和复杂。校长邹鲁违背孙中山制订的三大政策，成为“西山会议派”，被免去校长职务。顾孟余被任命为新任校长，但迟迟未到任，校长职务暂由陈公博代理。然而，广东大学一些教授对陈公博的上台十分反感，一部分教授辞职北归。学期尚未结



1927年春，总政治部成员郭沫若（前左二）、李富春（前右一）、林伯渠（后左三）。

束，辞职教授们所担任的课程全都因为一时找不到代课教师而停了下来，连陈公博作为代理校长都不得不亲自兼任因陈钟凡的辞职而空缺的文科学长职务。校长的罢免、新任校长的久不上任、部分教授的辞职北归等不稳定因素，引起了广大学生对大学的运营管理表示出前所未有的关注。自1925年12月起，学生们不断地召开学生大会及师生联合会议，议论校长的人事更迭和教授集体辞职等问题，并推选出代表请求国民政府主席的接见，为此汪精卫不得不专门到广大跟学生代表谈话并对诸事件进行说明。而广东大学的文科学生则强烈要求学校早日聘请一个“有学问肯负责”的人来做文科学长。

这一切把新上任的陈公博折磨得焦头烂额。对身处汪精卫麾下、以左派自诩的陈公博来说，这时广罗人才，壮实左派力量，解决部分教授辞职而余下的教职位空缺，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和稳定，则是当务之急。因此他呼吁“全国的革命的中坚分子和有思想的学者们全集中到这边来，作革命青年的领导”。

却说郭沫若当时已经成为文坛上的著名诗人，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名将。1919年至1920年，他发表的第一部诗集《女神》，轰动了整个文坛，成为当时诗坛上一颗闪烁炫目的明星。1923年他在日本九州福冈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后，回到上海，与成仿吾、郁达夫等组织了著名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出版了文学杂志《创造》季刊等。他在我国第一个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中国历史，也是第一个公开打出“无产阶级文学”的革命旗帜，连续发表许多诅咒旧社会，向往光明、向往新生的热情澎湃的诗篇。对郭沫若这样一位适应国民革命新思想而且颇具影响力的文学家，广东大学上自校长下至广大师生员工，当然是求之若渴，翘首以待的。所以当林伯渠向陈公博作了推荐（据说1925年经蒋光慈介绍，郭沫若认识了瞿秋白，瞿秋白回到广东后通过任国民党中执委要职的林伯渠向陈公博作了推荐），陈公博便迫不及待地致信郭沫若，热切盼望他急速南来：“无论何人长校，我们对于广东大学都有十二分热烈的希望，于十二分希望中大家都盼望先生急速南来。……现在广州充满了革命紧张的空气，所以我更望全国的革命的中坚分子和有思想的学者们全集中到这边来，作革命青年的领导。深望先生能刻日南来，作我们的向导者。”广东地区的媒体也对郭沫若南下给予了极大的关注，2月3日的《广州民国日报》报道说：“闻广大拟聘郭沫若为文科学长。查郭乃日本九州帝国大医学士，回国后从

事文艺创作，其作品之妙，几乎无人不知。”至于文科学生们热切期待的心情，自不待言。

而郭沫若当时对广东这个国民革命的“策源地”是抱有憧憬的。他在1926年4月22日夜半草于广大宿舍的《我来广东的志望》里说：“我这次到广东来，本是抱着两个小小的志望来的。第一个，我是想在国民革命的工作上实际贡献一些绵薄。……我在中国这个时代，这个环境里面，能够担当国民革命这个工作的，只有我们广东。……第二个志望是想在珠江流域的文化上加添一些涓滴……”所以当郭沫若接到广东大学的来信，便跑去找刚从武昌大学辞职回到上海的郁达夫，与他商量一道南下。接着又去找常云湄和蒋光慈，“但他们有职守，一时不能离开”。郭沫若随即给广大回了信，接受广大的聘任，并建议学校同时聘请郁达夫以及从法国留学归来的王独清。

1926年3月18日，郭沫若、郁达夫、王独清三人乘船离开上海，3月23日晨抵达广州。已经先一步到任的文科兼预科教授成仿吾到码头迎接。成仿吾把郭沫若一行从码头接到旅馆住下后，按事前安排，他们去了林伯渠家里。在林伯渠的寓所，郭沫若第一次遇到毛泽东，并听了毛泽东关于当时广东现状的分析。当天下午，在林伯渠、成仿吾陪同下，郭沫若三人又来到广东大学接上关系。一切就绪后，28日搬进学校。郭沫若被聘为文科学长兼史学系教授，郁达夫被聘为文科英国文学系主任兼教授，王独清被聘为文科教授。此时的代理校长已改由褚民谊担任，陈公博在2月中旬以兼职过多为由辞了职。

对郭沫若一行的到来，学生们欢欣鼓舞，觉得文科从此有了革新的希望。他们召开欢迎大会，迫不及待地想请郭沫若在会上宣布整顿文科的计划。3月26日，《民国日报》记者以“本报专访”的形式对此作了报道：“全国仰慕之革命文学家郭沫若，及其同志成仿吾、郁达夫等，均已先后抵粤，就广东大学之聘。闻广大各学生，以郭、郁等此次南来，深为荣幸，特发起于本星期日（廿八）开一欢迎大会，欢迎郭、郁、成三位，并及其他信赖教授黄尊生先生等，届时且请郭先生宣布其整顿文科之计划。又，记者昨晤郭先生，据云于廿三日抵校，同行者为郁达夫先生；至关于文科今后之计划，则因本人初到广州，对于此间情形，不大熟悉，须俟与褚校长及杨寿昌学长详细商订，乃能确定云。”从这一专访中，不难看出郭沫若在28日的欢迎会上没有仓促宣布整顿文科计划，而是表现得谦虚、稳重和含而不露，这不免会让充满期待的学生们有几分扫兴。然而在3月30日广东大学举行的追悼北京“三一八”殉难烈士大会以及4月15日召开的广州学联大会上，郭沫若以他那富有感染力和煽动力的讲演，却深深地打动了莘莘学子们的心，增添了他们对这位革命文学大师的景仰和崇拜。

## “有学问肯负责”，从容面对“择师”事件

针对当时学生对于文科教学改革和清理不良教员的诉求，郭沫若深感责无旁贷。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在取得代理校长褚民谊许可和签名下，郭沫若于4月20日发布告示：“对于所有功课一律从新改选。改选结果，如有必修科目停开时，将来有重开机会，可以再行补修；如无重开机会，本学期中所有必修科目之学分可以如数核减。”郭沫若万万没有想到，自己“颇思效命”的文科教学改革，居然在在校内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这一告示立即引起了以黄希声为首的26名教师的强烈反对。4月22日，他们联名致函褚民谊，认为郭沫若“蔑视校章，捣乱学程，侮辱全体教员，不胜文科学长之任”，请求立即罢免其职务，同时声明自即日起，“文科学科，一律停课”。为了扩大声势，他们还把“致校长函”交给广州《民国日报》发表，把状告到了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还在校园里张贴了“敬告广大文科同学”书。

面对黄希声等咄咄逼人的态势，郭沫若并没有畏缩退让，而是展现出“有学问肯负责”的大师风范，坚持有理有节的斗争。4月23日，他致函代理校长褚民谊，明确指出：“乃该教员不待校长处决，不待沫若剖辩，竟于今日将原函公诸报端，以扰乱社会观听，实属存心破坏，毫不以顾全大局为前提。”重申：“此次奉命来粤，非为素餐而来。力虽绵薄，对于教务之革新，颇思效命。”并详细说明推行改革的原委：“且查本学期之课程，其凌乱杂沓，实令人有难言之痛。中等学堂之科目，滥竽大学，商业学校之薄证，充乘文科，以致选课者，每多人数三名，而讲授者则复笑话百出。学生在此情形之下，其所受痛苦如何？自有累次热烈之要求可以佐证。沫若初到校时，课程业已排定，欲改无从编改。教员之不称职者，亦因有待遇教员规则为其护符，不能即时商请斥退。此之，故只得因陋就简以待暑假。然学生之要求愈激愈烈，而学生之痛苦愈久愈深。不得已，始有四月二十日之布告，以为调剂。”强调：“沫若行事，以校长为依归，以学生为本位，以良心为指导，自信毫无恣肆。”随后，他召集文科没有参加罢课的55名教师召开紧急会议，恳请他们分担了那些因为罢课而停了的课程，从而堵住了导致事态朝最坏方向发展的漏洞。

代理校长褚民谊为了学校的安定，召集26名罢课教师开会，一方面解释郭沫若实行改革是事先征得了校方同意，同时也严正声明其改革与校规并行不悖，故不能接受他们对郭沫若进行革职处分的要求。然而以黄希声为首的26名罢课教师一意孤行，根本不听校长的劝告，也不理农、理、法、医、预科各教员代表的调停，一面开会进一步策划，一面奔走于各科系，企图串联更多的教员加入“驱郭运动”。

令郭沫若深感欣慰的是，广大文科学生和左派党团始终态度鲜明，坚决支持他的文科教务改革，这给了他以无限的信心和鼓舞。当黄希声等人的罢课对抗行径发起后，文科学生立即表现出极大的愤怒，在校园里贴满了“解决饭桶，煽动罢课”、“打倒一切饭桶，无论西式、基督教徒、古董、八股先生都要打倒”、“文科此次择师运动与良教师无涉”等标语。4 月 22 日，主要骨干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国民党广东大学特别区党部召开大会，决定：援助文科同学的择师运动；拥护为学生谋利益的褚民谊、郭沫若以及他们的改革文科计划；普遍择师运动于全校。4 月 23 日中午，文科本科、预科全体学生在大礼堂聚会，成立了文科革新委员会，并通过《文科全体学生宣言》，拥护郭沫若的革新计划，请求校方辞退黄希声等人。后来，这个学生搞起来的委员会不断活动着，成了支持郭沫若的中坚力量。

纸面上的“文科整顿计划”演变成了沸沸扬扬的“择师运动”。眼看学生运动一天天蓬勃起来，国民政府教育委员会于 4 月 27 日紧急通过了《限制学校休课条例》，规定“各校校内学生一切集会应于星期日或休息时间举行，集合时间须先由该校长核准”，首先拿学生运动开刀。4 月 28 日，仍然是学生的行动促成了罢课问题的最终解决。这一天，褚民谊收到了文科革新委员会递交的意见书，指出“罢课的 26 名教员中有石光瑛等 11 名教师是属于受蒙蔽被人怂恿的好教师”，希望“校方请他们返校复课”，并请校长“辞退风潮主动，及毫无学识之不良分子黄希声等十五人”。褚民谊随即授意郭沫若分别致函石光瑛等 11 名教师，请他们返校复课。郭沫若受命后马上照旨行事，分别向 11 位部下发出了恳请从速返校复课的函。4 月 30 日的《民国日报》报道了这 11 位教师全体复课的消息。5 月 3 日，褚民谊上书国民政府，提出对“择师事件”的处理意见：“尚有十一位为学生公认良好教师者，迭函请求挽留，业经职顺从公意，函请一致返校照常上课”，“至其他罢课教员，应得罢课之罪，拟请从轻处分，即日免其职务，不使借本校教员名义在外煽动，以正学风”。5 月 12 日，国民政府同意褚民谊提出的处理意见，将一直拒绝复课的 15 名教师全部解雇。长达 20 多天的广东大学文科部分教师罢课事件，至此宣告结束。

郭沫若作为文科之学长，最终还是没能跟那 15 名一意孤行的部下和解。尽管在这一事件中郭沫若不断受到恶意诽谤和人身攻击，甚至还受到来自上级部门的不辨是非的压力，但最终还是由于坚持正义得到了公正的评价，并在学生、左派党团的极力拥护和传媒的大量追踪报道下获得了大学教育改革之英雄的名声。广东大学国民党特别党部后来利用传媒发表公开信，将郭沫若推行的教务改革以及学生“择师运动”评价为“广东青年界革命化之象征”，并对其进行了三项定位：第一是“谋青年本身利益之运动”，第二是“实现中山大学之运动”，第三是“打倒反动派之运动”。

## 支援革命运动，向“广大”党组织申请入党

在广东大学短短的几个月，是郭沫若积极投身革命洪流，完成“戎马书生”巨大转变的重要准备阶段。在来广东之前，他的“生活和意识是以创造社为中心的”。到了广东以后，这种情形逐渐改变了。虽然创造社的朋友穆木天、郑伯奇等也都先后到了广东，并在广州和汕头成立了创造社的分社，同时创造社的书籍在广州畅销，剧本在广州上演，可是他的意识却和它渐渐疏远了，几乎是绝了缘。因为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革命事业上，正如他在《我来广东的志望》里说的，来广东“是想在国民革命的工作上实际贡献一些绵薄”。

郭沫若发挥革命文学家的特长，积极参与各种会议，发表演说，激励学生，唤醒工农。3 月 29 日，也就是搬进学校后的第二天，他参加了祭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活动。3 月 30 日，在广东大学追悼北京“三一八”殉难烈士大会上，他发表演讲，从孙文主义的理论高度对北京知识界名流章太炎、胡适的“帮凶行径”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出要“拼死命打倒”屠杀无辜学生的段祺瑞政府。他呼吁“国民政府早早出兵北伐，为民请命，打进北京，夺回一切政权，交还人民”。4 月 15 日，他出席广州学联会欢迎各地代表大会并发表演说，殷切“希望广州学联会永为学生领导之机关”，“希望我们的学生群众都武装起来，大家都练成冲锋陷阵的学生军，以抵抗帝国主义和军阀之屠杀，以解放我中华民族”。5 月，他接受毛泽东的邀请，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他曾对学员讲授“革命文学”，听课者十分踊跃，济济一堂，受到很大的教育。5 月 5 日，他出席由广东全省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等团体共同发起的在广东大学礼堂举行的马克思诞 107 周年纪念大会，演讲马克思生平及其学说，以及中国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当晚，他又马不停蹄地参加由中国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及广东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联合在农讲所召开的马克思诞生纪念大会，在发表演讲时，工农代表精神奋发，掌声雷鸣，全场高呼：“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世界革命成功万岁!”“共产主义万岁!”6 月 23 日，郭沫若与褚民谊一起出席在广大礼堂举行的纪念沙基惨案大会，并继褚民谊后发表演讲。郭沫若在讲演时，“哀痛逾恒，上坛未几，即泣不能成声，斯时满座同时泣下，空气为之肃穆”。6 月底 7 月初，郭沫若还为在广东大学举办的北伐战时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作报告，他在以《国民革命与各阶级合作》为题的报告中，指出国民革命是中国民众解放之福音，国民革命是走向世界大同的唯一的路径。

在蓬勃发展的广东革命形势的影响下，郭沫若向广东大学党组织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广大党总支成立于 1925 年底，下设文理学院、法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和杂务公社等分支部。郭沫若在校内期间，曾向广大总支书记徐彬如提出要

求入党。据徐老回忆，“郭沫若写了申请书交给中大总支，经总支讨论，同意郭的申请。学生运动委员会对郭的入党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郭还需要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一段时间。总支和学委会的意见，由毕磊汇报给粤区区委，陈延年同意学委会的意见，恽代英提出最好让郭到军队去，或到黄埔军校。陈延年让毕磊将区委的意见转报郭沫若，又派恽代英代表区委正式找他谈一次话，郭沫若当即表示完全接受组织意见，并要求尽快派他到军队中去”。1926 年 7 月 21 日，郭沫若辞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的职务，改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随军参加北伐，这当与广东区委和广大党总支的意见要求有着重要的关系。后来，郭沫若在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随起义部队南下至瑞金时，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 被聘为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书写中大“第一首”校歌

郭沫若在广东大学任文科学长期间，除了改革整顿文科，积极参与各种革命活动外，还参与广东大学改名中山大学的筹备委员会，为筹备委员之一。1926 年 4 月 13 日，在郭沫若、陈树人、陈其瑗等 30 余人参加的第二次筹备会议上，讨论通过了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章程。至 6 月 17 日第十次筹备会议，最终讨论通过了《中山大学章程》。6 月 19 日，国民政府正式批准了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名单，由褚民谊、陈树人、陈公博、蒋中正、许崇清、郭沫若等 40 人组成，并有特聘委员林伯渠、孙科、蔡元培、于右任等 30 人。8 月 17 日，当郭沫若作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随北伐第一军攻陷湖南省平江县的时候，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正式宣布将国立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

郭沫若还受筹备委员会的委托，订定中山大学校歌。他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为指导，书写校歌歌词如下：

浩然正气此长存，霹雳一声天下惊，叱咤风云卷大陆，倡导三民主义首民族，此乃吾校之衣钵，此乃吾校之衣钵。

白日青天满地红，新兴文化作先锋，匪行之艰知之艰，倡导三民主义重民权，此乃吾校之真诠，此乃吾校之真诠。

中原之中中山大，扶植桃李满天下，博审慎明还笃行，倡导三民主义济民生，此乃吾校之光荣，此乃吾校之光荣。

这首歌词发表于 1926 年 4 月 27 日的广州《民国日报》上，从整体上看属于较为工整的七言，欢快而豪迈，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和办学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

郭沫若订定的校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激励和团结中山大学广大师生员工和校友，勤奋学习，奋发自强，努力贯彻伟大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在中山大学校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谢东江）

# 张文彬

## 战时省委书记的正气歌

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爆发。在这国难深重的紧要关头，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了全民族的抵御外侮的反侵略战争。8 月，张文彬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洛川会议”。会议结束后，张文彬奉党中央之命，南来广东，组织领导广东人民进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伟大斗争。

### 一

党中央派张文彬到广东，主要有四大任务：一是迅速恢复发展广东的党组织，以适应国共合作抗日的形势；二是发展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是建立各阶层各界人民群众的抗日团体；四是推动国共合作进行抗日战争。9 月间，张文彬抵达香港。这期间，中共广东地方党组织领导机关刚刚恢复不久，党的力量十分薄弱。张文彬来粤以后，经常往返广州、香港之间，深入到党的基层组织和群众中去进行调查研究，同党内的



1938年，萧克（左一）、朱德（左五）和张文彬（右一）等在延安党校。

同志们一起商讨如何开展党工作，增强党内团结，以及开展武装斗争等问题。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查和了解，在摸清了情况以后，他决定先从整顿党的组织入手，在整顿、巩固党组织的基础上，发展和壮大党的组织。1937年10月，张文彬在香港主持召开了党的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亲任书记，以统一领导广东的党组织。

张文彬初来广东时，看到基层党组织不太健全，于是积极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状况。当时广州市各大中学校有许多是在学校外面入党的跨单位的党员，平时都不在读书的学校党支部中过组织生活。张文彬感觉到这样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都很不利。为此，他在各基层党组织中间多次强调党的组织原则，重申党的纪律，要求这部分党员尽可能回到各自的学校支部过组织生活，以便组织的管理和监督。他还经常深入到各基层党组织中去，与党员们谈心，研究工作。他曾多次参加过中共中山大学支部的支委会议，传达文件、指示，作形势报告。为了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他还抽调了一批党员骨干充实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增强党的战斗力。1938年2月，张文彬在香港出席了中共香港市委的扩大会议。会上，他决定充实香港市委的领导力量，并通过选举的方式，将原来市委委员由3人扩充至7人，使香港市委的领导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1938年4月18日，张文彬在广州主持召开南委干部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抗战爆发以来广东党组织开展工作的情况，并根据抗战的新形势对广东党今后的工作作出了新的部署。会议还遵照中共中央和长江局的指示，决定撤销南委，成立以张文彬为书记的中共广东省委。

中共广东省委成立后，张文彬集中全力突出抓党的建设工作。他明确提出，广东工作应以建党为中心，一切工作以党组织的结果为目的。他多次在党的会议上强调要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的指示，反复督促各地党组织积极落实执行省委决议，大力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为了确保建党工作的顺利发展，张文彬乘着抗战初期群众抗日救亡运动蓬勃高涨的大好时机，大力开展群众运动，以争取群众团体的合法地位。同时，他还派遣了大批党员到以国民党当局名义组织的群众团体中去任职，将其中的先进分子吸收入党，从而建立和扩大各级党的组织。经过了一番努力，广东建党工作显见成效，党组织发展迅速。至1938年5月仅一个月时间，广东全省就先后建立了中山县委、东莞中

心县委、南（海）顺（德）工委、新会工委以及南雄、韶关、惠阳等地中心支部，有许多过去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县、市，这时也相继建立起一批党的组织。党员数量也大为增加，以香港一地为例，至1938年6月间，就已发展有党员500人，其中中共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属下的党员就有六七十人，有90%是工人。

1938年8月21日，张文彬主持召开中共广东省委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会上，他又提出了为建立强大的群众性的广东党而斗争，为全省发展一万党员而奋斗的新任务，继续把建党工作作为省委的重要工作之一。由于省委的重视和各级党组织的积极努力，至同年10月，广州地区和香港的党员人数骤增至2500余人，潮梅地区发展到2000余人，琼崖地区则发展至5000余人。其他地区也有较大的发展，基本上实现了发展一万名党员的预期目标，而且这期间发展的党员，后来大都成为广东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抗日武装的主要领导人和骨干。

## 二

张文彬在大抓党的组织建设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他除了抽调一批党员骨干分别在香港、广州等地参加省委举办的党员训练班之外，还要求各地市、县党组织也举办各种类型的党员训练班，以提高党员的素质和理论水平。

在省委举办的党员训练班中，张文彬除了派有专门人员负责管理外，还亲自给训练班的同志们讲课。他曾给训练班讲授抗战的政治形势、统一战线工作以及保密工作等课程。有时还给训练班的同志讲长征故事、武装斗争以及革命烈士的英雄事迹等。他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他经历丰富，平时认真看书学习，勤于思考，注意积累，加上口才好，语言生动、通俗，所以他讲的课针对性强，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侃侃而谈，娓娓动听，颇受同志们欢迎。

在对党员加强思想教育的过程中，张文彬尤为注重对党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有一次，他在对国民党第四战区内的中共特别支部的党员作抗战政治形势报告时，听到参加报告会的一位女同志的名字和原上海全国救济总会负责人黄励烈士的名字谐音相同，颇有感触，就含着眼泪向同志们介绍了黄励烈士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直至临刑前还高呼“共产党万岁”的英雄事迹，使在座的同志深受教育。

以张文彬为首的广东省委还通过举办训练班的形式，给党内的同志讲解游击战争问题。张文彬强调：党训班除开设马列主义、党的建设、统一战线等课程外，每期必设置游击战争课程，并要求学员们多做沙盘作业，使理论更好地联系实际，以适应抗日武装斗争的需要。同志们在训练班中学到了基本的理论和知

识，又回到实际工作当中具体实践和应用，大有长进，效果显著。

## 三

张文彬正确地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很重视也很善于做统战工作。他正确分析了国民党广东地方当局内部矛盾重重，派系林立，钩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状况，认为广东国民党的统治阶级不统一，派别分歧，中央与地方之间矛盾很大，国民党中央插足广东时正是抗日救亡运动开展之时，各人（派）都以进步口号团结群众，特别是余（汉谋）企图联合我们拒绝国民党中央势力的增长，我们在这些矛盾中开展我党的工作是非常有利的。于是，他针对这一基本状况，提出了我党在华南开展统战工作的方针和策略。他明确指出，要在抗战过程中埋头苦干，积蓄力量，建立强大的群众实力，准备敌人进攻华南与持久战的最后阶段时，我党有力量参加保卫华南的战争。

由于以张文彬为首的广东省委审时度势，正确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利用国民党内部的各种矛盾，并根据广东地区的斗争实际，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做法，使抗战初期广东抗日救亡运动蓬勃高涨，许多群众抗日救亡团体都为我党所领导或控制，如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市学联（即“市学抗”）、香港学生赈济会以及潮梅、惠阳、韶关、佛山、南路、西江等地大批群众救亡团体。这些团体名义上是国民党领导，实际上是我党在起作用。这不仅发展了广东抗战初期的革命斗争形势，而且也扩大了我党的影响。

1938 年 1 月，以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为总编辑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该报以“建立统一战线”为号召，争取国民党广东当局余汉谋、吴铁城等的支持。当时，张文彬亦指定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饶彰风以作家身份与该报来往，使该报在宣传上配合广东省委的工作。1938 年夏，国民党第四战区政治部成立了负责军队文化宣传工作的第三组，中共广东省委通过该政治部主任秘书、地下党员左恭，派进步教授尚仲衣（后加入中共）担任第三组组长，还派党员石辟澜、孙大光、司马文森等进入第三组，并成立了由张文彬直接领导的党小组，在四战区广泛开展抗日政治宣传工作。

## 四

1939 年 1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以领导华南和西南各省的党组织。张文彬被委为南方局委员。

这期间，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已因广州沦陷而迁驻韶关，中共第四战区特别支部的同志也随同张发奎部抵达韶关。为了便于配合开展工作，周恩来和南方局决

定中共第四战区特别支部与张文彬建立组织关系，接受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

此后，张文彬每个星期与特支的负责同志见一次面，一起分析形势，交流情况，商讨工作，研究问题。他勉励中共特支的同志做好张发奎的统战工作。他认为，这是一步很好的棋子。因为张发奎在北伐战争时期就曾经与我党有过密切的合作，是尝过第一次国共合作甜头的一位国民党将领。党中央和周恩来在其部队中设立中共特别支部，就是从历史实际和现实情况考虑决定的。他要求特支的同志要珍惜它，把这一步棋下活。

1939 年秋，韶关基督教青年会在进步人士李章达、张文的推动下，举办了一个时事讲座。张文彬要求中共特支负责人左洪涛利用这一机会，以合法的身份和名义莅会作一次关于“民主与宪政”的演讲。那时，正值国民党反动派秘密颁发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制造平江惨案，为投降、分裂做准备的严重危机时刻。鉴于当时的形势，张文彬深谋远虑，注意斗争策略，他叫左洪涛先向张发奎打个招呼，并搞个讲话提纲送给张审阅，让张点头应允，来个“先奏后斩”。这样，既表示了对张发奎的尊重，又可由此取得合法名义，把“尚方宝剑”拿到手。

这次讲话后，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丘誉等反动分子极为不满。他们争相鼓噪，大做文章，说左洪涛的演讲“出格”、“越轨”，有“散布共产党言论”之嫌。但张文彬胸有成竹，沉着机敏。他要求中共特支的同志不要与这些反动家伙打笔墨官司，搞正面冲突，而是静候张发奎出面裁决发落。果然不出所料，不数日，在一次当地党政军负责人联席会议上，张发奎指着丘誉的鼻子训斥说：“左洪涛秘书应邀到青年会讲演，是我同意的。他的讲话提纲也经我审阅过。他是我的秘书，你们攻击他就是攻击我。你们对团结抗战宣传动员工作横加诽谤，是何居心?”张的训斥，使丘誉木然肃立，连声称是认错，还向左洪涛赔礼道歉。事至于此，张文彬看到目的已经达到，又指示特支的同志“适可而止”。

1939 年初，为了做好余汉谋的统战工作，以张文彬为首的广东省委趁余汉谋拟加强其部队政治思想工作之机，先后动员了 800 多名青年（内有共产党员 120 名）到该部的政工总队去。同时，还派了一批党员骨干到余汉谋部队的上层机关中任职，开展军队的政治宣传工作。国民党广东省主席李汉魂的夫人吴菊芳出面筹建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时，张文彬也亲自派出共产党员区梦觉、杨衡芬等到该会去工作，以团结国民党上层官员眷属和知识妇女，推动其进步。这些对于加强我党的统战工作和掩护我党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均起了积极的作用。

正当国共两党团结合作抗日的形势有所发展时，1938 年 9 月，国民党顽固派开始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反共论调，广东的顽固派亦步亦趋，不遗余力，遥相呼应。为了揭露反动分子的反共阴谋，以张文彬为首的中共

广东省委决定，除了在报刊上撰文公开批驳反击外，同时由廖承志出面，在广州永汉路（现北京路）一酒家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坚持我党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对国民党顽固派鼓吹的“三个一”谬论予以驳斥，重申我党团结抗日的立场和方针，使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制造分裂。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阴谋无法得逞。事后，党内有些同志对这次座谈会持有歧义，认为这样做将会影响国共两党团结抗战，张文彬坚持原则，严肃地批评了这种只讲团结不讲斗争的糊涂认识和错误思想。

1939 年冬，当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逆流冲击广东时，张文彬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地制定了“政治上的进攻和组织上的保守（密）”的策略。他在省委第五次执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在这反共逆流翻滚而起的形势下，全党应改变斗争策略，“实行组织的转变、群众工作的转变和严密党的组织”，“既要坚持反逆流斗争，又要在斗争中积蓄（我们）力量”。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张文彬对统战对象余汉谋也开始有所警惕，并把当时余汉谋的政治态度已经有所变化的新情况，及时地向党中央作了汇报。他在 1940 年 4 月 23 日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对余汉谋及其部队，“也不能有过分的幻想”。尔后，他赴重庆南方局汇报广东阶段的工作时，又再次谈了这个问题。他的这一正确的观点得到了周恩来的赞扬。

## 五

武装斗争是我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一大法宝。在那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年代里，以张文彬为首的中共广东省委始终亮出武装斗争这面旗帜，与日伪进行了长期英勇的搏斗，顽强地支撑着华南抗战的斗争局面，使华南成为全国三大敌后战场之一。

1938 年 4 月，在中共广东省委成立的会议上，张文彬就把军事工作问题提到党委议事日程进行讨论。决定各地党组织应把建立自卫团等人民抗日武装作为当前一项中心任务，共产党员必须积极参加人民抗日武装。此后还多次在党内提出：党员要军事化，要注意军事工作。学习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论和战略战术，学习《论持久战》等文章。每当省及各市委举办各种类型的训练班，他都选派干部去宣讲游击战争，并指示各地党组织应利用各种关系，采用各种办法，建立武装，掌握武装。为了加强党对武装斗争的领导，省委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专门负责军事工作，具体领导全省抗日武装斗争。

1938 年八九月间，张文彬奉命赴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翌年春天，他从延安南返广东，带回了一批干部充实各级党组织的领导。1940 年 6 月，张又向党中央提出请求，调来了梁鸿钧、李振亚、谢立全、谢斌、庄田等一批军事干部，加强了广东各地抗日游击队的军事领导。同时，他还派出刘向东、严尚民等

到吴勤领导的“广游二支队”去，把该部改造为我党直接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武装。1940 年 10 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张文彬被调任南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 六

1941 年 12 月，香港沦陷。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电示张文彬和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廖承志，要求尽快从香港把一批陷入虎口的知名民主人士和重要文化人抢救出来。

张文彬坚决执行中央指示，迅速组织力量，全力以赴进行抢救工作。他与廖承志、尹林平、梁广等先后在香港、惠阳等地，召开有香港、东江地方党组织和部队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精心部署，周密筹划，制订了具体可行的抢救方案和措施。经过研究商妥，在港九市区内由地方党和八路军驻港办事处选派专人，分别同被援救的人士联系转移，到了界限街南后，就由东江纵队派出便衣武装人员护送。营救方案确定后，张文彬坐镇宝安游击区，亲自抓方案的实施工作。当大批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陆续被抢救出来以后，张文彬又指派干部做好接待和沿途的护送工作，尽量做到周密细致，万无一失。

在当地党组织和东江部队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克服了种种的艰难险阻，将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数百位知名民主人士和重要文化人从香港日军的严密控制下抢救出来，安全地护送往大后方。在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经过宝安游击区期间，张文彬还遵奉党中央的指示，带着烧酒和几只肥鹅，前往泥坑、深坑等地，代表党中央向这些脱离“虎口”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表达深切的慰问。张文彬直接参与组织和领导的这一场“秘密大营救”行动，震动了国内外，受到了党中央的通电表扬。

## 七

1942 年春，张文彬还深入到东江纵队两个多月。在此期间，他广泛接触部队干部、战士和群众，调查研究，了解部队各方面的情况。他遇到了好的经验和做法，就认真总结，及时推广。发现存在问题，则追根溯源，查寻原因，然后对症下药，加以解决。

为了统一东江和珠江地区敌后武装斗争的领导，张文彬代表南委决定成立广东军政委员会，并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对部队体制进行了全面的整编。

在那敌、伪、顽交欢合流，结盟反共，共同围攻我抗日军民的艰苦岁月里，

有些同志提出这样的建议，说："敌人向我们进攻，如果情况不妙或处境危险时，可以把枪藏起来，等情况好转时再拿出来干。"张文彬对这种错误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坚定不移地说："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枪收起来，不能停止武装斗争。"

张文彬怀着对革命必胜的崇高信念，勉励全体军民团结一致，前仆后继，克服困难，去争取胜利。他说："熬过困难就是胜利，熬过困难就会大发展。"他还用毛泽东所讲的《老子》、《礼记》等典故来教育同志们："不为天下先"，可以"后发制人"；"退避三舍"，诱敌深入以分散敌人兵力；"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他勖勉广大干部和战士，一定要紧握枪杆子，从积极奋斗中去求得生存和发展。

## 八

张文彬返回大埔县南委机关驻地以后，1942 年 5 月下旬，南委获悉原中共江西省委被破坏的消息。南委书记方方和张文彬等马上研究对策，部署机关撤退工作，决定南委机关分头向闽西、东江等地转移。

6 月初，张文彬由交通员伴随，离开原南委所在地向东江游击区方向撤退，途经高被镇，在一间旅馆中住宿时，适逢叛徒郭潜（原南委组织部长）引领特务前来破坏南委机关。张文彬住宿的地点很快被叛徒所窥悉，叛徒郭潜旋即带领特务捉拿张文彬。当时，张文彬看到郭潜忽然来找他，料知有异，只好勉强应付，准备趁机逃走，但郭潜却将他死死缠住，紧抓不放。张文彬极力反抗，终因寡不敌众，被前来捉拿的特务抓获。

张文彬被捕后，于 6 月 20 日被押解到江西省泰和县马家洲国民党监狱囚禁。特务头目冯倚、庄祖芳等从叛徒郭潜的供述中了解到张的身份，如获至宝，因而绞尽脑汁，企图通过种种手段，从张文彬身上打开缺口，以便探悉我地下党的全部情况。冯、庄曾多次找张文彬进行所谓谈话，攻心诱降。说什么"共产党破坏团结，破坏抗战，没有前途"，要求张文彬转变立场，与国民党政府携手合作。特务的无耻谎言均遭到张文彬的严词痛斥。他正气凛然地说："真正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是你们国民党，你们逮捕我们共产党人才是破坏团结、破坏抗战，是土匪汉奸所为。"特务不甘心就此罢休，后来又三番五次提审张文彬，挖空心思，巧施手法，但到头来仍是枉费心机，终未能使张文彬低头屈服。有一次，国民党中统局驻赣观察员、特种工作办事处总干事庄祖芳提审张文彬，庄对张低声下气尊称："张先生，近来身体好不好。"张文彬对这种假惺惺的言词感到恶心，只是鄙视地冷笑一下，"嗯"了一声，算是给庄作答。当庄问道："近来考虑得怎么样了？"张文彬干脆不予理睬。庄讨个没趣，万般无奈，只得又送张文彬回牢房。

张文彬原来就患有肺病，身陷囹圄之后，由于监狱条件恶劣，加上特务的酷刑折磨，致使其病情更加恶化。惨无人道的国民党法西斯分子不但不给治疗，反而加紧迫害，并以此要挟说："只要你放弃立场，不但可以获得自由，而且还可以给你治病。"可是，张文彬铮铮铁骨，不为所动。特务的如意算盘又落空了。对于张文彬的坚贞不屈，国民党特务们曾经发出"虽经各任先后多次进行说服，终未成功"的哀叹。

张文彬在生命垂危之际，还十分想念党，想念与自己共同战斗过的同志。他向国民党监狱的负责人要求允许他最后一次与同牢的廖承志见面。当廖承志来到张的身边时，张的心情非常激动。他挣扎着起来对廖说："我现在身体不行了，不能为党继续工作了，心里感到很难过。"又说："我一生为党工作，坚信马列主义，坚信党，现在生命快到尽头但我死而无憾。将来你（指廖）出去时，请将我在狱中的表现转告给党中央、毛主席。"最后，他还用嘶哑的声音哼唱起《国际歌》与廖承志告别。

此后，张文彬的病情愈来愈恶化，身体瘦弱，形容憔悴。其情状连狱医都感到于心不忍，曾建议特务机关给予治疗，但特务认为张文彬"思想固执，态度毫无转变"，不但不给治疗，反而套上镣铐，加重刑罚。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张文彬还念念不忘对周围的难友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他鼓励狱友说："对党要忠贞，要坚持下去，咬紧牙根，渡过难关，就能胜利！"1944 年 8 月 26 日，张文彬在国民党的牢狱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终年 34 岁。

狱中人员在检查张文彬的遗物时，发现他生前留下的一封题为"我誓死不能转变"的信。信中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已四十七岁了（实际年龄应是 34 岁），又犯（患）了严重的肺病，生的时期不多，吃苦也快到尽头，因而更是誓（视）死而（如）归，乐于就义，愿为江西人，尤其为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儿女留些正气吧！"

（叶文益　刘树新　杨　建）

# 陈郁

## 他打响了省港大罢工第一炮

广东深圳宝安人氏，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广东老省长陈郁，是一个一生艰险曲折，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

### “第一怒涛”中显身手

1921年，20岁的陈郁在香港经人介绍，到英国“亚洲皇后”号轮船上做海员。在苏兆征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2年1月12日，香港海员要求增加工资，遭到英国资本家拒绝后，就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领导下，开始举行大罢工。罢工前，当时已经是新成立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太平洋航线分会负责人的陈郁、陈权和“亚洲皇后”号支部的两位负责人参加了工会活动分子大会。

会上，苏兆征叮嘱陈郁、陈权：“你们船是这次罢工的先锋，事关罢工成败的大局。阿郁回船做好一切准备，阿权跟我到昌兴公司谈判，并留在总会负责联络，谈判一旦破裂，陈权就回船通知你们行动！”



陈 郁

会后，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50多名代表，分成15个小组，分头向各轮船公司送达条件。但是，各轮船公司老板共同制定了“不谈判、不让步”的强硬对策，并把他们豢养的工贼、流氓、黑社会人物动员起来，准备封锁各轮船码头，并往各艘轮船增派打手，禁止海员登陆。港英当局也给他们撑腰打气，“保证维持秩序”。

在送交“要求书”一天之后，苏兆征已对资方不抱任何幻想。他在1月11日晚上召开紧急会议，命令各分部、支部一听到“亚洲皇后”号的汽笛声立即开始罢工。

陈郁在“亚洲皇后”号进行了紧张的准备。他把水手部工会大组的工人组织起来，作为本船示威游行的先锋队，由他们举着大旗和横幅在前面开路。

11日深夜，陈郁一直守候在舱门入口处，等待陈权的消息。船主也察觉了海员有“暴动迹象”，命令高级职员一齐回船，并把联结趸船的悬桥拉了起来。

12日清晨，陈郁看见码头上三三两两聚集了不少形迹可疑的人，有的还带着棍棒、九节鞭之类的凶器。不一会儿，一队英国警察也来到了码头。陈郁焦急地告诉讯号员：“快上瞭望塔，一见到陈权就告诉我！”讯号员拿着望远镜登上了瞭望塔，认真地观察着。时钟缓慢地移到7点55分，还不见陈权的影子。陈郁急得坐立不安，他看见工人们脸色严峻，心里也“扑通扑通”跳个不停，这是他第一次面临这种关系到千百人命运的决斗。忽然，讯号员一声大叫：“陈权来了！”只见陈权穿着一件水手上装，在寒风中奔跑过来，他满头大汗跑进码头，跳上趸船，却见悬桥高高挂起，就大叫：“罢工！罢工！”陈郁立即将一个啤酒瓶子用力摔在船头，砰的一声炸响。守在驾驶室的工人立即拉响汽笛。“亚洲皇后”号洪亮而深沉的汽笛声，像滚滚巨雷，响彻香港海空。附近的“美国皇后”号和“泽生”号也拉响了汽笛，海湾里的五六十条船只，一齐拉响了汽笛，这震天撼地的汽笛声，是英国帝国主义侵占香港以来的第一声惊雷。它激励起受苦受难的海员工人的斗争勇气，唤醒了50多万在殖民地统治下呻吟的香港市民的爱国热情！

为了防止船主及其打手干涉工人的行动，陈郁指挥船上的“防护破坏罢工队”怒不可遏的队员手执船上的消防斧、大扳手、铁铲、水桶堵住过道，谁敢过来就同谁拼命！船主及其走狗们被气壮山河的汽笛声吓得面无人色，被严阵以待的工人队伍镇住了。他们费尽心机准备的镇压手段，竟然一件也施展不出来。

陈郁率领船上的罢工队伍，昂首挺胸，高呼口号，冲上码头。他高举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白色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头。岸上的警察一片慌乱，打手们

在汹涌而来的工人浪潮冲击下，望风而逃，躲进了人群。

以“亚洲皇后”号海员罢工队伍为先锋，太平洋航线海员工会分部很快集合起1500多人的队伍，他们身着海员制服，高举标语，大步前进。其他各个分部的海员罢工队伍4000多人，跟在他们后头。浩浩荡荡的罢工大军，像海啸掀起的排空巨浪，在香港的大街上滚滚奔流，所向披靡。香港英国当局和各大轮船公司的老板这时才感到工人的力量。他们惊恐万分，调集大批警察到主要大街路口，用警棍和水龙组成防线，不让工人进入主要大街。

苏兆征身穿水手服，在陈权和郑沃根的护卫下，走在大队的前头。警察头头跑过来要他们退回去，否则就要开动水龙。苏兆征大吼一声；“走开！海员还怕水吗?”队伍加快步伐整齐地向前行进。当走近警察防线30多米处时，警察头子一声令下，10条消防水龙一齐射向罢工队伍。苏兆征高呼：“冲啊!”陈郁高举大旗，呐喊着冲上前去。“防护破坏罢工队”的年青队员们，赤手空拳向警察扑过去，与挥舞着警棍的警察展开搏斗。在陈郁高举的旗帜引导下，罢工队伍突破警察的封锁，向香港繁华大街奋勇前进。罢工队伍一边高呼口号，一边散发传单，沿途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不少人主动加入他们的队伍。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工人的支持下，香港工人的罢工斗争坚持了56天，使英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利益遭受巨大损失。3月8日，罢工谈判协约签字，港英当局被迫接受海员们提出的条件，明令取消公布的封闭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命令，送还被拆除的工会牌子，释放被捕工人，并答应抚恤在罢工中死难的工人，增加工资15%～30%。至此，香港海员大罢工胜利宣告结束。这次罢工被邓中夏称为是“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第一怒涛”。

## “我去！我是深圳人，地熟人也熟”

1925年6月19日，为声援上海“五卅”惨案，香港工团委员会下达罢工令，陈郁领导的太平洋航线的海员工人首先行动，打响了省港大罢工的第一炮。霎时间，汽笛长鸣，响彻云霄。各行业的工人相继响应，一队队示威游行的队伍涌上街头，在15天中，参加罢工的群众达到25万人。

港英当局慌了手脚，连忙宣布戒严令。海军陆战队全体登陆，军舰在海面上日夜待命，大炮脱去了炮衣，炮口对准了港九，街头、屋顶上架着机枪，铁甲车横冲直撞。

为了对付港英当局的镇压和封锁，坚持长期斗争，工团委员会下令罢工工人向广州转移。工人们毫不犹豫地执行撤退命令，纷纷离开香港返回内地，一天达几万人。车站边，码头旁睡满了等着撤退的工人群众。九龙到深圳的铁路线上，也是一片火热的景象。英帝国主义把票价提高了五倍，也阻挡不了涌来的人群，

火车连车厢顶上都坐了人。有人等不及了，就三五成群结队徒步返回。他们不顾全副武装的印度兵的阻拦，奋勇地冲过边界。

返回深圳的工人越来越多，挤满了街头巷尾。工团委员会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在深圳建立接待站，做好香港工人的接待、安置住宿和转车等工作。但是派谁去好呢？正当苏兆征等犹豫不决时，陈郁立即自告奋勇地说："苏大哥，我去！我是深圳人，地熟人也熟，我带上十来个兄弟去完成这个任务。"苏兆征说："好！你马上动身。"

陈郁担任深圳接待站站长，深知责任重大。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到接送工作上。他在深圳火车站售票处贴上"罢工工人接待站"的牌子，组织接待站工作人员分别负责转车、住宿、吃饭、治病等工作。人手不够，陈郁就回自己家乡南头村，把从香港回家的海员组织起来，又发动一批群众，参加接送工作，很快就使深圳的接送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半个月内，就将十多万工人送回了广州。

在紧张繁忙的接送工作中，陈郁每天从早到晚到处奔波，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饿了就吃几块饼干。他家靠近深圳，几次路过村子都不进家门。当接待工作安排顺当之后，才三步当作二步地回家探望母亲。

接送工作的头几天，困难很多。工人意见最大的就是等着拿罢工委员会发的免费乘车证明。工人们排着长龙等着郑沃根、李山两个人在证明上盖章。陈郁看了十分着急，他正在琢磨办法时，突然见到了香港美华纱厂工人杨杏娥，立即挥手叫她说："杏娥，你赶快回家找几个番薯给我。"杨杏娥二话不说，飞快地跑回家，挑了两筐番薯交给了陈郁。陈郁对工友们大声呼喊："谁会刻图章？请来帮忙！"一下子就有3个工友拿着刻刀走了上来。陈郁指着番薯说："来，快用这些刻制一些图章。"3个工人立刻动手干了起来，转瞬间，一个个番薯印章刻好了。陈郁和杨杏娥就把一沓沓油印纸条发给刻章的工人，叫他们帮忙盖印。工人们很快都拿到了盖上番薯印的免费乘车证明，高高兴兴地上了列车。十多天紧张忙碌的接送工作结束后，陈郁动身前往广州，向苏兆征汇报工作。

苏兆征说："从香港回来这么多工人，解决好生活问题非常重要，这不仅是个繁重的事务工作，也是一件复杂的政治工作。只有把这个工作做好了，才能稳定工友们的情绪，才能坚持长期斗争，才能战胜帝国主义。"为解决罢工工人到广州后的生活安置等问题，陈郁等想方设法，从烟馆、赌馆、妓院、木材厂等地方借或买了一大批床板。一两天内，用卡车运到了罢工工人住地，工人们高兴地卸下床板，铺好床位，把住地打扫得干干净净。为了解决生病工人看病问题，陈郁积极与各医院联系，取得了许多医院的支持和帮助，使一些病号及时得到免费治疗。在省港大罢工的大风大浪中，陈郁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处处为工人的利益着想，为解决工人们的困难到处奔走，深受工人群众，尤其是广大海员的拥护和信赖。当时，不仅是先进工人，就是香港一部分受到黄色工会影响较深的工

人，也为陈郁这种大公无私、热心苦干的优良作风所感动。他们逐步接近和拥护省港罢工委员会，坚持罢工斗争。这年8月，陈郁经陈权、梁祖贻介绍，在广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 “这是太雷同志最后的党费，我们要好好地保存它”

1927年，广州“四一五”事变后，陈郁每天打开报纸一看，映入眼帘的尽是捕杀共产党人的消息，同志们向他汇报的也都是战友们牺牲的情况。陈郁遵照党组织的指示，继续领导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同时参加广州市委和广州工代会的领导工作，在险恶的条件下坚持斗争。

8月20日，张太雷在香港主持召开中共广东省委会议。陈郁出席了这次会议。张太雷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党中央对广东省委的指示。会议一致决定积极准备组织武装起义，配合南昌起义军，建立广东工农民主政权。会议决定正式成立省委，并选举了省委委员和常委，陈郁被选为省委常委兼任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会议结束后，陈郁返回广州，负责对工人赤卫队的整顿、编组、武装和训练工作。他通过在石井兵工厂任工会副主席的郑沃根，不断获得武器弹药，为起义做准备。

起义前夕，广州市委工委书记周文雍突然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广州市公安局监狱里。陈郁和黄平等省委常委商量营救周文雍。陈郁负责指挥营救工作，他派人利用探监的机会，通过在押的同志，把一包鸡心辣椒送到了周文雍手中，并通知周文雍立刻吃下，使其面红耳赤，口腔红肿，体温升高，说是急病发高烧，要求立即把他送往教育路广州市公安局开办的监狱医院检查。周文雍照组织指示办了，很快被带往监狱医院。陈郁早已挑选了几名年轻力壮、有勇有谋的海员工人赤卫队员，让司机梁梅枝驾驶汽车，在医院附近等候。这时，医院门口只有两名警察站岗，陈郁带着沈厚堃等几名海员突然冲进医院，把站岗的两名警察关入医院一间病房，背起周文雍坐上汽车，开到地下党在东山的联络站。周文雍获得了自由后，继续参加发动广州起义的各项活动。

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随着“轰、轰、轰”三声炮响，接着教导团“砰、砰、砰”一轮排枪信号，震撼中外的广州起义的战斗提前打响了。各路起义大军按原定计划向敌各主要据点发起猛烈攻击。陈郁率领工人赤卫队一部和教导团一部直捣广州国民党虎穴——广州市公安局。公安局局长朱晖日听到四面猛烈的枪声，狼狈爬墙逃跑。

当日6时，广州市公安局楼顶上升起了铁锤镰刀大红旗。陈郁叫郑沃根在大门上挂起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红布横额。广州工农兵民主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建立起来了。

12月12日中午，起义军民在丰宁路西瓜园广场召开群众大会，热烈庆祝起义胜利和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庆祝大会结束不久，国民党军队开始向起义部队反扑，战斗十分激烈。

张太雷与第三国际代表赶到大北门指挥战斗。当他们来到大北直街（现解放北路）附近时，突然遭到一小股敌人的伏击，张太雷身中数弹，倒在车上。陈郁闻讯后，立即带领何潮等人赶赴现场。陈郁跳进汽车，把张太雷从血泊中抱起来。张太雷已不能说话。他费力地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只怀表交给陈郁。陈郁知道，这是他唯一的“财产”，要在临死前交给党。陈郁赶紧把他抱上另一辆汽车，送往医院急救。但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而壮烈牺牲。陈郁把烈士的遗物交给了何来，对他说：“这是太雷同志最后的党费，我们要好好地保存它。”

## “我要回去还债，为广东人民奉献余生”

新中国成立后，陈郁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燃料工业部部长，为我国的燃料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7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同意中共广东省委的请求，调陈郁回自己的家乡广东省工作，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省长。

陈郁去广东之前，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找他谈话，要求他到广东后，协助陶铸同志，团结广大干部、群众，把广东各方面的工作搞好，力争走在全国的前列。陈郁表示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不辜负中央的希望。

离京前夕，周恩来总理打电话请陈郁到家里谈心。周恩来对陈郁说：“我很舍不得你调出北京，但是，广东的同志硬要你去，说你到广东具有天时、地利、人和三大优势。中央经过再三斟酌，决定满足广东省委的要求。你在煤炭部的工作很好，我听说他们不愿意放你走！广东同志向中央要一个在广东人民中有威望、有能力的同志去当省长，这就不是任何一个同志可以代替的，他们指名要你。毛主席赞成，中央作出了决定。广东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广东人民在革命斗争中牺牲很大，贡献很多，无数广东仁人志士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时常想，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是永久也还不完对广东人民的欠债的！你是广东人，你又目睹广州起义失败后几千革命者悲壮牺牲的情景，你的这种感情一定会比我更加强烈！”陈郁紧紧握着周恩来总理的手，激动地说：“总理的话我终生牢记，我要回去还债，为广东人民奉献余生！”

他向周恩来总理告辞，请总理留步，但总理硬要送他一程。总理说：“你到广东还有一个特殊任务，就是要把当地干部和外来干部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你要充当两部分干部之间的桥梁。广东干部很有基础，坚持斗争几十年红旗不倒，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革命老人何香凝听说陈郁要回家乡工作，非常高兴，特设家宴替他饯行。宴后，陈郁告辞出来，何香凝老人在廖承志搀扶下站在门口，深情地、高兴地反复说："阿郁要回去替广东人民办好事了！阿郁要回去替广东人民办好事了！"

这年8月，陈郁带着中央的期望，领导同志的指示和革命老人的叮嘱，离别了工作8年的首都，踏上了新的征途。

陈郁到广州不久，就到当年广州起义激战过的几个重要战场凭吊，徘徊、沉思，久久不愿离去。他建议省委宣传部门组织力量搜集、整理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等斗争史料。在他的关怀下，1962年正式成立了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的专设机构。他亲自查询参加过海员大罢工、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幸存者的情况，要党史工作部门逐个登门拜访，登记造册，请他们回忆当年的斗争情况。他两次会见从香港、澳门请来座谈的革命老人，要他们不忘过去的革命斗争历史，支持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并嘱咐港九工会联合会的领导人，要照料好这些老人的生活。他又叮嘱省委有关同志说："把那些参加过革命斗争的老人的情况调查一下，居住内地生活有困难的，要给予救济，在港澳地区无依无靠愿意回来的，要接回来养老。在党最困难的时候，他们没有忘记党，现在党不能忘了他们！"

## "让我们同心协力，共同来为香港市民办好事吧"

香港是陈郁革命生涯的起点。在中国革命处于极端困难的时候，香港人民始终同情革命，同情我们党。陈郁对港澳同胞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出任广东省长后，对港澳同胞的生活十分关注。20世纪50年代末，香港一般市民的生活还相当困苦，地少人多，求职困难，生活毫无保障。尽管内地的市场供应也很紧张，但陈郁还是要求省属有关部门，要坚决保证香港市场对大米、食油、猪肉、鲜鱼、鸡鸭、蔬菜、衣服以及布匹、日用品等的需要。特别在香港物价飞涨时，他更是注意督促把香港急需物资及时运去，使基本生活物资的价格稳定。他对同志们说："米、油、肉、菜、布等物资涨价，只会肥了官商大贾，苦了普通市民，祖国是港澳同胞的可靠的靠山，我们要尽同胞的责任！"

在港澳同胞遭到天灾人祸的时候，陈郁总是亲自组织内地人民给予救助。木屋区发生火灾了，山洪冲毁居民住宅了，陈郁就号召广东人民支援港澳灾民，把大批米粮，衣物，器材，慰问金，通过港澳进步社团，分发给当地灾民。一包包白米，一沓沓慰问金，都是祖国人民节衣缩食无偿地送给港澳同胞的。祖国的关怀，温暖着港澳同胞的心。

香港弹丸之地，四面环海，人们用水极其困难，尤其在干旱少雨季节，水贵如油。1963年，华南地区遭受60多年未见过的大旱，内地旱情严重，香港更是危殆已极，农田龟裂，水塘干涸，工业减产，民不聊生。港英当局被迫严厉控制

用水：由一日供水数小时，改为隔日供水，最后改为四日供水一次。

在这紧急的时刻，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向祖国求援。香港中华总商会、港九工会联合会于5月24、25日致电广东省省长陈郁，请求帮助解决香港的严重水荒。当天，陈郁与省委其他领导同志研究后，决定全力以赴，帮助解困。他紧急电令深圳水库给香港额外供水7亿加仑，广州市免费赠送自来水2万吨，并同意香港派运水工具回内地取水。祖国的支援，大大缓和了香港的水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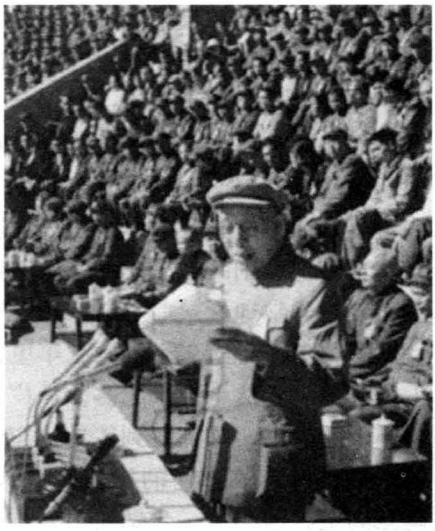
为了根本解决香港同胞的用水问题，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决定修建东江——深圳供水工程，把东江水引到香港。1964年2月，陈郁主持供水工程协议签字仪式后，对香港方面代表说："让我们同心协力，共同来为香港市民办好事吧！"

他亲自指导和组织了这一重大工程的勘探、设计、施工。他同广东省水电厅的负责人一起，昼夜操劳，亲自到供水工程沿线调查研究，进行现场指导，八级提水站的每一站，都留下了陈郁的足迹和汗水。经过不到一年的奋战，终于把83公里之外的东江水，经过八级提升，越过深谷山陵，引到新建的深圳水库。东江之水越山来，明净江水到香港，流进了急需用水的工厂，流进了家家户户，香港人民一片欢腾。

供水工程表达了祖国对香港人民慈母般的关怀，也表达了陈郁对香港人民的似海深情！

## "广东找不到石油，总理要批评的"

1959年，陈郁到海南岛检查工作时，当地同志向他汇报，在海南岛的西南方向，即莺歌海海面上，渔民经常发现有油花，这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回到广州后，陈郁立即指示省燃料工业厅派人调查，发现那一带很可能是一个断层，下面有石油。陈郁十分高兴。他想，广东煤炭储量有限，地质条件又不好，如能在海上找到石油，将是解决广东能源不足的一条重要途径，对全国也有重要意义。当时，我国陆地勘探石油已积累了不少经验，而在海上钻探石油，还从未进行过，既无设备，又无技术人员，怎么办呢？陈郁经过了解，决定用浮筒架钻机的办法进行钻探。这种简陋的钻探办法，成了我国最早的海上石油勘探，开创了南海石油勘探的



陈郁在大会上讲话

先河。

初探南海石油因设备、技术力量缺乏未能成功，这没有使陈郁灰心。1960年大庆油田的开发，及以后江汉油田、渤海湾油田的发现，又给陈郁在南海及雷州半岛找油增强了信心。海上勘探没有钻井船，他就让茂名石油公司地质勘探队在雷州半岛的海康县、遂溪县及湛江市郊钻探。他曾数次前往钻探工地，和地质队的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研究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他心急如焚，终日盼望着好消息的到来。

1969年，还处于十年内乱最动荡的时期，他也念念不忘在南海找油。趁去北京出席中共“九大”的机会，陈郁特地找到地质学家李四光，对他说：“你是老专家，对全国的地质情况了如指掌，广东究竟有没有石油？南海究竟有没有石油？”李四光笑着说：“哎哟！在这样的场合谈石油，你不怕人家说你唱反调吗？”陈郁说：“怎么是唱反调呢？毛主席教导‘抓革命，促生产’嘛！”李四光被他诚挚的态度所感动，就向他简要地介绍了中国的大地构造，说从松辽平原到江汉平原，再向南延伸到北部湾，这是一个地质构造条带，三大盆地有油田生成的条件。现在松辽、江汉都找到了油，南海及北部湾等地也应当能找到石油，问题就在于我们的工作做到了没有。李四光的一席话深深打动了陈郁的心。他高兴地握着李四光的手说：“南海要是找到了油，你就立了头功！”陈郁在会议休息时间，把李四光的意见报告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兴奋地说：“李四光同志说南海有石油，那就一定会有！就看你们能不能找到它了！”

1970年，陈郁向李四光和地质部的领导同志谈了加强南海石油地质调查力量的设想，地质部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定从华东把第二海洋地质调查大队调到广东湛江。他们没有船，陈郁又与海运局商量，租借一条大船进行了改装，这条船，在南海及北部湾海域，做了大量海上地质地震探测工作。

只作调查，陈郁还感到力量太单薄，时间太长，于是向石油工业部呼吁，请他们重视和加强南海石油地质勘探力量。石油部很重视他的意见，很快从大庆、四川、华北等地调集了大批的人员、设备，从此拉开了南海石油勘探会战的序幕。当陈郁看到高耸入云的钻机架在雷州半岛、北部湾以及西沙群岛竖起的时候，兴奋异常地说：“当南海喷出石油的时候，我们广东省的经济就活了。”

从1970年至1974年的五年里，陈郁不顾年届古稀，一次又一次地来到勘探工地，前后竟达十数次之多。从广州至雷州半岛，路程数百公里，坐汽车需要整整一天的时间，陈郁每到工地，忘记了行程的疲劳，马上爬上井架，了解钻探的第一手材料。1971年的初夏，他从广州来到茂名，一刻没休息，又赶到湛江的南三岛上，他爬上一台钻机，查看钻探情况，适逢工人正在吊装套管。突然，几百斤重的一个套管从几十米高空跌落下来，眼看要砸在陈郁的身上，旁边的人眼疾手快，将他往机房一推，才避免了一场大事故。陈郁若无其事地说：“工人们

都不怕，我怕什么！”但事后他对干部进行了谈话，要他们注意安全生产。他说：“当一个好干部，就要爱护工人，注意工人的生活及安全，不注意工人生活及安全的人，不是一个好干部。”

陈郁每到一个工地，都把当地党政负责同志找来，一起研究解决地质队在工作、生活中的各种困难。他日夜等待着钻井队传来胜利的喜讯。

1974 年 3 月 21 日，在他弥留之际，他还在断断续续地说：“要研究……石油问题，这是……大事……广东有石油……广东找不到石油，总理要批评的……”这是他日夜挂念的一件大事，也是他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这是对广东人民的嘱咐！

（林 益）

# 陈赓

## 东征救蒋，而他只有“一个主义一个党”

陈赓，1903年2月27日出生在湘乡县二都柳树铺一个殷实家庭。192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和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1928年起在周恩来领导下参加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为保卫中共组织的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爆发后，陈赓任八路军129师386旅旅长，参与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等许多有名的战斗，为缔造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同样战功卓著。1949年3月，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4月；率部横渡长江，解放南昌，继而挥师两广，指挥第四兵团协同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解放广州。

建国后，陈赓担任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后兼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61年3月16日，因心脏病在上海逝世。

## 话剧天才



抗日战争初期的陈赓

1924年5月，陈赓与其他三百多名学员一起步入了黄埔军校的大门，开始了新生活。

入学不久，陈赓就在同学中崭露头角。这是因为陈赓在湘军当过兵，又在长沙当过铁路小职员，丰富的阅历和乐观幽默的性格使他成为学员视线的焦点。

一天，刚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正要迈步进入学员宿舍进行视察时，看到这个宿舍的全部学员正围观着一个学员，不断有笑声从里面传出来，周恩来便好奇地凑了过去。原来一名学员正在表演小品“饥不择食的矮子吃长面”。只见他顽皮的脸上做着各种表情，一会儿饿得愁眉苦脸，一会儿看见面条又喜上眉梢，伸长脖子直咽口水，接着他用双手比画着，端着一个并不存在的大碗，先是站在地上，哧溜哧溜地吸着面条，那面条越吸越长，越长越吸得带劲，整个身子随着面条不住地向上延伸。可面条太长了，总是吸不到头，干脆他嘴含着长面站到板凳上，看看还是不行，接着他又站到桌面上，使足劲吸。似乎面条进入喉头并不顺利，他不停地用手捋着喉头，帮助面条往肚子里走……突然间他不住地打嗝，看来面条卡住了喉咙。“嗝”的一声，他两眼瞪得溜圆，挺直着身子就往后倒。学生们被逗得前俯后仰，笑出了眼泪。

表演节目的正是陈赓。就在大伙笑成一团时，陈赓看到了周恩来，急忙抓起军帽，整理好服装，立正、敬礼。周恩来欣喜地把陈赓拉到身边，高兴地说：“你演得真好！我在南开也演过戏，可没你演得像！你这个水平能进戏班子了！”

周恩来看了陈赓表演的小品后，认为陈赓不但是学生当中的骨干分子，而且对文艺也在行，就决定让陈赓挑头成立一个剧社。他让陈赓从青年军人中选了几位能演戏和懂乐器的学生，并给剧社起了个名字叫“血花剧社”。陈赓成为剧社主要负责人之一。

有一次，“血花剧社”排练讽刺剧《皇帝梦》，由于没有女演员，陈赓自告奋勇，男扮女装饰演袁世凯的五姨太。当五姨太出现在舞台上时，马上就响起了一片掌声和哄笑声，因为这位“五姨太”扮得还真艳丽。只见“她”不胖不瘦，中等个头，脸施粉黛，头上插花，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袁世凯的皇冠，一面迈着

“金莲步”，一面扭着“水蛇腰”，走来转去，还不时向台下挤眉弄眼，暗送秋波。观众被逗得大笑不止。究竟是哪位男学生扮演的？台下许多官兵猜不准。演出结束后，大家才发现“五姨太”竟是陈赓扮演的，“哗”地又响起好一阵掌声和喝彩声。就这样，经过几次业余演出，陈赓在黄埔军校名声大振。

## 深入虎穴侦察敌情

就在陈赓第一期学习期满毕业之际，盘踞于广东省东江地区的陈炯明部队叛变，广东革命政府组织东征军，分三路讨伐陈炯明叛军。陈赓积极参加了革命军的第一次东征。在周恩来的指挥下，第一次东征取得了胜利。然而到6月初，驻在广州的滇、桂军乘黄埔学生东征的机会，勾结北洋军阀，发动叛乱。东征军司令部闻讯后，立即指挥部队返回广州。时任黄埔军校第二期入伍生连长的陈赓奉革命军指挥部指派，渡过珠江侦察敌情。

此时，市区已为军阀所控制，只有沙面一带留下了空子。于是陈赓换了一套西装，戴了一枚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的徽章，雇了一条小船，从沙面北渡珠江。划船的是一位渔家姑娘。船到江心，两岸的军队突然隔江射击，船家姑娘脸吓白了，不敢再划。陈赓再三安慰她，鼓励她，指着说，“看，子弹不是朝我们打的”，“它是打当兵的，不会打我们老百姓”等等，姑娘终于把他送到了对岸。

在闹市区，陈赓发现几个人正沿街散发反共反苏联的传单，有的一捆捆丢在地上还未拆开。他灵机一动，顺手拣了一些带在身上。没有想到，这东西比通行证还管用，遇到叛军拦路，拿出传单就能通过。陈赓眼明脚快，仅仅3天时间就将广州叛军的主要设防情况摸得一清二楚，而且很快绘出了叛军火力阵地及部队驻扎的详细情况地图。

正当他即将返回东征军指挥部时，路过惠爱中路第一公园，突然遇到一股滇军，举着“拿获共产党就地正法”的令牌，气势汹汹地迎面走来。陈赓躲避不及，被他们拦住，此时他手里已经没有反动传单了。但他镇定自若，指着胸前佩戴的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的校徽，说自己是这个学校三年级的学生，又说：“我是去散发欢迎你们的传单。”滇军士兵将信将疑，带他到学校去对证。由于叛军在广州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百姓对他们十分厌恶，都希望革命军早日打回来。所以当叛军问学校的门房老头陈赓是否他们学校的学生时，老人说：“他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和几个同学出去没多久。”滇军信以为真。陈赓终于得以脱险安全返回。

根据陈赓深入虎穴所获得的情报，革命军很快制定出合理的作战计划，向叛军发起了进攻。陈赓率领他的连队，冲过珠江，一口气打到北较场，并通过工会中的党组织，动员火车司机逃跑，使上了火车的杨希闵残部，因没人开车而走不

动，全部被歼。6月12日，进攻部队肃清了广州市内全部叛乱滇军，歼敌2万余人。国民政府重新又控制了广州。

## 东征救蒋

在黄埔军校期间，陈赓是学校师生公认的“黄埔三杰”之一。当时学校有这样的说法：“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快不过陈赓的腿！”他曾用快腿救过蒋介石的命。

1925年10月，广东革命政府为打倒军阀陈炯明，举行第二次东征。蒋介石任东征军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周恩来任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陈赓在第二师第四团当连长。在夺取惠州的战斗中，陈赓身先士卒，率领所部奋勇冲杀，大败敌军。惠州大战的胜利，大振了东征军的声威，也给蒋介石脸上增了光。陈赓的英勇善战，使蒋介石打心眼里喜欢、赏识。因此，蒋介石马上指定陈赓率部到他的东征军总指挥部担任警卫。

不久，继续东进的第三师在华阳附近与敌主力遭遇，陷入重围。前来督战的蒋介石感到形势不妙，连忙命令陈赓到前沿阵地传达他“不许退却”的命令。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该师全线崩溃，总指挥部的人员也被冲散了。面对十分严峻的形势，蒋介石命令陈赓：“你代理第三师师长，立即收容溃散的士兵，重新组织抵抗。”陈赓临危受命，尽全力挽救战局，无奈部队伤亡过半，残兵不听指挥，潮水般败退。蒋介石见大势已去，心灰意冷，说：“我唯有杀身成仁，否则无颜见父老百姓！”说着拔出手枪。陈赓上前抓住蒋介石的胳膊，一面命令连长带着仅有的附近人马立即占领阵地，阻挡敌人的追击，一面亲自背起蒋介石向河边撤退，并找到一条民船迅速渡河，总算逃出了险境。

蒋介石得救后，想到要跟第一师何应钦、周恩来他们联系，于是，他带着探询的目光问身边的几个军官：“我要同何应钦他们取得联系，你们谁辛苦一趟，去送个信。”军官们深知此行凶多吉少，都不吭声。陈赓自告奋勇，挺身而出。蒋介石歉疚地说：“你太辛苦了！”然后，写好信交给陈赓，并叮嘱道：“你装扮成农民，一路上要多加小心！”凭着机智和勇敢，绕过重重险阻，陈赓终于及时把信送到了。何应钦与周恩来见信，立即派出一支部队前往，把蒋介石接了回来。这样，陈赓英勇救蒋及只身冒险送信的行为，顿时在黄埔军校传为佳话，其胆识、才华也备受蒋介石的器重。蒋介石曾经在黄埔军校向师生训话时说道：“什么是黄埔精神？陈赓就是黄埔精神。”

当时蒋介石尚不知陈赓是共产党员，所以随着蒋在广州国民政府地位的提高，出于对陈赓临危救命之恩的感激，更视陈赓为自己的心腹学生，亲调陈赓为其侍从参谋，可以随便出入其居室。东征军打下汕头以后，总指挥部设在崎碌

“适宜楼”。蒋介石住一楼，陈赓跟周恩来住在二楼。

有一天，陈赓在蒋介石的桌子上发现一本黄埔军校军官和学生的花名册，翻开一看，大吃一惊。所有共产党员的名字上都有一个红圈，下面还有一句话。自己的名字下面写着：“此人是共产党员，不可带兵。”而蒋介石原来给陈赓的评语是：“此生外形文弱，但性格稳重，能刻苦耐劳，可以带兵。”陈赓立即将此事报告了周恩来，请示该怎么办？周恩来说：“你给他递个条子，辞职不干，看他如何处置！”第二天，陈赓就托词母病请假回家，蒋介石看过他的条子，狡黠地问：“不是这样吧？你看了我的什么东西了吧！”陈赓没有吭声。过了一晚，蒋介石叫人送来船票、路费和一张“委任状”，委任陈赓为陆军军官学校中校队长。陈赓随即离开汕头，回到广州。

## 一个主义一个党

1926年全国各地革命形势风起云涌，引起大资产阶级和蒋介石的仇恨与恐惧，革命阵营内部分裂加剧。蒋介石依靠他纵容扶植的以反共为目的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与共产党领导的左派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相对抗。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亲手策划了反共反苏的“中山舰事件”，逮捕了李之龙等许多共产党员，广州形势异常紧张。

这天夜里，黄埔军校的党组织召开支部大会。因为据传闻，有一支国民党右派控制的部队，正由陈继承带领，要在黄埔登陆。所以，支部决定立即动员全团官兵，不许陈继承登陆，公推陈赓负责指挥。陈赓把两个连的兵力布置开来，做好战斗准备，结果当夜没有发生什么情况。

第二天，团长肖友松来问陈赓：“为什么夜里把队伍拉出去?”陈赓脑子一转：“夜间演习，是早已定下的课目!”机智地应付了过去。过了几天，蒋介石找陈赓谈话，问：“你最近看什么书?”陈答：“常看《三民主义》、《建国大纲》，也看马克思主义的书。”蒋又问：“你把队伍带出去做什么?”陈赓故意装糊涂，说：“听说校长被右派扣留……”蒋介石当然不信，但他做贼心虚，就没再说什么。

过后没多久，蒋介石召集军校中的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两派代表开会，大肆宣扬整理党务案之精神，动员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并暗示蒋先云、陈赓等能带个头。蒋先云首先站起来，说：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这更坚定了陈赓的信心。在返回黄埔的路上，蒋介石的得意门生曾扩情凑近陈赓，不停地讲：“蒋校长是国家民族的惟一领袖，继往开来的大圣贤，我们不追随他还追随谁!”并从文件夹中取出一张国民党党员登记表，递给陈赓，轻声说：“校长可是一直没忘记你啊。现在是非常重要的时

刻，‘识时务者为俊杰’……”陈赓被激怒了，他停下来，高声道：“本人现在当着众位同学的面宣布，我曾经是个跨党分子，但我现在郑重声明：本人是一个主义——共产主义，一个党——共产党！”蒋介石的图谋失败了。

## 惊险的旅程


陈赓夫妇与周恩来夫妇在一起

1927 年 8 月 1 日，为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进攻，中国共产党在南昌举行了震惊中外的武装起义，时任营长的陈赓参加了这次重大军事行动。但敌强我弱，3 天之后，起义部队被迫退出南昌，向广东潮汕方向转移，陈赓奉命率部掩护大部队撤退。8 月下旬的一天，起义军在会昌同强敌遭遇，激战至下午 1 时许，陈赓不幸左腿两处中弹，被打断了脚腕骨和膝盖处的筋，血流如注，完全失去了行走能力。

陈赓的腿伤因得不到彻底治疗而日趋严重。起义军一路行军，他都是被抬着走的。1927 年 9 月 23 日我军占领潮州。在潮州，第三师司令部驻在电报局里，他就住在隔壁的韩文公庙小学。说来有趣，这个住处使他后来遇到紧急情况时找到一个掩护的借口。

9 月 24 日，起义军先头部队到达汕头，陈赓被送进日本人开办的“博爱医院”接受治疗，但日本人在得知他是一位革命军人后，便在治疗上百般刁难。9 月 30 日，国民党部队从四面八方拥向汕头，起义军又被迫撤离。临行前，周恩来派人给陈赓送去一笔钱，但没有送到。从此，他们就同部队失去了联系。不久，国民党部队占领了汕头，日本人就借机下逐客令，说：“你是共产党，我们对你的安全不负责任！”此时，陈赓伤势仍然很重，不能行动。医院一个姓李的护士和打扫病房的一名工人怀着同情之心，与陈赓的警卫员卢冬生一起，偷偷地把他抬到工人房藏了起来，国民党军队来搜查时才免于被捕。10 月初的一天上午，在李护士和那名工人的护送下，陈赓、卢冬生终于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离开了汕头这片血雨腥风的是非之地。

陈赓坐的太古公司的轮船，是我军在潮汕失败后从汕头到香港的第一艘船，不少起义军的同志都在船上。快要到香港时，船上发出一种特殊的讯号，意思是说这里有危险，要岸上的巡捕快来检查。船一靠岸，腿脚灵便的人没等巡捕上船

就迅速离开了。陈赓因伤重还留在船上。巡捕问负的什么伤，并气势汹汹地说："你一定是汕头失败的共产党！"陈赓早就想好了说法，他用不太熟练的广东话说："我是潮州人，在电报局做事。那里打仗时，我慌忙逃跑，跳楼时跌伤的。"对方又问电报局在什么地方。回答说在韩文公庙隔壁，他们便放他过去了。

陈赓到香港后，仍无法立足，又乘船去上海。轮船在去上海的途中，要先绕到汕头停泊一下，上人装货。陈赓所坐的这条船，恰好又是我军失败后从香港到汕头的第一条船。汕头还在戒严，在反动派统治下一片杀气腾腾。自己刚刚逃出，忽又折到这里，他的心中甚为紧张。船刚靠岸，又有起义军的许多同志上来。这中间就有第三师师长周逸群同志，他是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后没认出来又逃出的，汕头有个慈善团体给他一张船票。他一上船，就挟着一张烂席子找到货舱里，倒头就睡。陈赓正躺在那里看报纸，见他进来非常高兴，就和他开一个玩笑，用报纸遮着脸小声嘀咕道："这鬼记者的消息真灵通，周逸群还没上船，报纸上就登出来了。"周逸群大惊失色，竖起耳朵听，立刻就听出是陈赓的声音，两人一阵好笑。以后他们一起到上海找到了党。

这一年，陈赓同志刚满24岁。

## 挥师南下

二十多年后，时任任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陈赓再次来到广东，为解放广东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10月2日，陈赓指挥第四兵团与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和两广纵队军部三路大军由赣南南下，揭开了广东战役的序幕。大军越过五岭，多路挺进粤北。防守韶关、翁源之敌不战而逃，粤北门户洞开，人民解放军乘势合围广州。广州之敌为摆脱被歼命运，于13日炸毁海珠大桥弃城向西南方向逃跑，企图经雷州半岛逃往海南岛。

身为前线指挥的陈赓科学分析战场情况后认为，敌人虽然逃出百公里之外的开平、台山地区，但敌争相逃命，必然队形混乱、拥挤堵塞，行动迟缓，只要我军不失时机地勇猛追击，定能追歼逃敌于广东境内。于是他率第四兵团过广州郊区而不入城，长驱直追，各部队以每日七八十公里甚至更高的速度前进，有的部队两天才吃上一顿饭，指战员们忍着饥饿、疲劳，经过约一周的强行军，终于在濒临南海的阳江、阳春地区，对3万多逃敌构成合围，消灭了余汉谋集团主力，圆满实现了中央军委预期的战役目的。两阳围歼战结束的次日，林彪等四野首长致电陈赓、郭天民、刘志坚，嘉奖第四兵团全体指战员："庆祝你们全部歼灭由广州向西南逃窜之敌主力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对于解放琼崖和解放广西均有重大意义。对于你们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的精神，连续十昼夜穷追猛打的精神，特

予表扬。”在后来广州的祝捷会上，广东军区司令员叶剑英也高度评价了陈赓的灵活指挥及第四兵团广大指战员在战斗中表现出的英勇精神，他特别指出：“这支部队深受毛泽东思想的哺育，有觉悟，广州这么大的城市，物资又这么多，部队到了城边，发现是空城，不进城而去猛烈追击逃敌，如果没有很高的觉悟是做不到的。”

（魏雅丽）

# 冼星海

## 一曲《黄河大合唱》流传千古

春和风丽日，今年少有的好天气，我兴气冲冲地来到星海音乐院——位于小谷围岛的广州大学新城一个十分有艺术气质的大院。袁东艳教授告诉我，这儿七十年前，有一座迎风屹立的茅屋，儿时的冼星海和母亲就住在这里。透过呼呼的海风，仿佛又听到冼星海那悠扬悦耳的洞箫或小提琴优美的声音。

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决策者故意的选择，一个纪念伟大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国家音乐学院跟南粤十个一流的大学的新校园，就选择了七十年前一位还在饥饿中挣扎的伟人的茅屋处！而今优雅的、雄伟的、气派的现代大学城与昔日风雨飘摇的孤零零的茅屋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反差啊！

历史是前进了，历史不会忘记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一代人民音乐家！

年过不惑的袁教授显得十分年轻。她的练歌厅跟她性格一样优雅。她那些年轻飘亮的男女学生真是艺术的精英，歌唱得很好。我到他的练歌厅，她伏在钢琴上起劲地弹，她的学生唱的是广东各地的民歌，有客家山歌、有滨海渔歌、有潮州民

歌、有粤语小调。个个都唱得十分动听，我听着听着，几乎忘记我今天是来干什么的！啊，今天的孩子们，你们真幸运。

一个南海县来的女生何姑娘，唱的是粤语歌，甚是优美，我觉得十分像《冼星海》电视剧中冼星海儿时赤着小足，在海滨上边拾贝壳、边放声歌唱的渔歌：

头帆推起尾声正正——罗——
中帆推起船要行——罗——
大船细船云到了——罗——
放掉俺好无心情——罗——

是的，冼星海就是从这湿漉漉的南海滩上走出去的，经历了人世间说不尽的艰辛而成为一代人民音乐家的。

冼星海的一生，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即：穷顿、痛苦、奋进、辉煌。

## 一

穷顿。这几乎伴随冼星海的一生。冼星海原籍广东番禺县（现广州市番禺区），1905 年 6 月 13 日生于澳门贫苦的船工家庭。他出生前父亲就去世，靠母亲做佣工和祖父接济生活。祖父去世后，星海与母亲流落到马来西亚。星海从小喜爱音乐，13 岁时，回广东考入岭南大学附中学习小提琴，从附中到大学 6 年时间，基本靠半工半读维持学业。

其实，冼星海从马来西亚回国到岭南大学附中就读时，母子俩身无分文，交不了学费，开初在岭南基督教青年学会所办的义学就读，靠母亲的佣金度日的，但不久，母亲被解雇失业了。城里无法居住，面临着生活的绝路，母亲收起一个破包袱，领着孩子，搬到岭南大学对岸的一个小岛（据说就是今天的广州大学城所在地），拣来些树枝、木板、铁皮，搭起一个茅屋。每天傍晚，星海放学，就揽来一些脏破的衣服交给母亲，第二天早上他又把母亲缝补好的活计带回学校去。茅屋遮不住风雨，母子俩常常在昏暗的夜里紧紧拥抱在一起，躲在屋



冼星海

角里忍受着风雨吹打……

冼星海要到法国求学，因穷要凑足路费，到新加坡先打工几个月。他教书，抄乐谱、做杂工，但那可怜的路费老是凑不足，最后，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在一艘开往法国的轮船上找到工作。工作是沉重和卑贱的，他也不在乎；工作几乎没有什么报酬，这他也不在乎。重要的是他终于可以免费坐船，用苦力换来船票，开始了新的万里征程……

冼星海志存高远，他奢想把音乐技巧学得很好，成为国际的音乐家。虽然在马思聪的介绍下向世界著名的提琴师奥别多莫尔学习，大师知道他穷困，不收他的学费，但他自己仍是三餐难度。艺术不能当饭吃，为寻温饱，他在巴黎大街四处奔波找工做，当过餐馆跑堂、理发店杂役，做过西崽（BOY），做过看守电话的佣人和其他各种被人看做下贱的跑腿。在当餐馆跑堂时，有一次，因为白天上课弄得太累，回来又一直做到晚上九点，最后一次端菜上楼时，因为晕眩，连人带菜都摔倒，被骂了一顿之后，第二天就被开除了。他自己曾回忆说："我失过十几次业，饿饭，找不到住处，一切问题都来了。有几次又冷又饿，实再支持不住，在街上软瘫下来了……"（冼星海的《我学习音乐的经过》）。他经过非常人所难以经受的苦难奋斗，终于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得到了荣誉奖。他们送给他物质的奖励品时，问他要什么？（即你需要什么就可以奖励什么），而饿坏的冼星海一开口就令教授们张口大笑——他要的是一束饭票啊！……

## 二

痛苦。即是痛苦的思考，痛苦的追求，几乎也伴随着冼星海的一生。

星海出生的时代，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他懂事时，看到的就是盛气令人的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欺凌。饱食终日的富人对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穷人的欺凌，世道的不公，民族的自尊心令冼星海对社会、对人生、对祖国的未来的痛苦的思索。

音乐的艺术，能给人美的享受，能给人心灵的陶冶。而现实的饥馑，令这穷孩子要追求他的理想比常人要付出几倍、几十倍的代价。是图碗饭吃、图温饱，像一些平庸的艺术家一样凭自己一技之长图个眼前的富贵，还是写出能振兴民族、推人奋发，鼓舞民众与侵略者战斗的传世之作？这更是冼星海长期的痛苦追求，并为之而献身的理想追求……

当冼星海要离开岭南大学对面的小岛时，革命者黄大哥为他送行，紧紧握住星海的手，充满感情地低声说："兄弟，希望你能为穷苦的人们都有好歌儿唱，去学本领吧……"

离开黄大哥时，他脑海时不时闪现出这句话："要让穷苦的人们都有好歌儿

唱!”在南海的残霞映照中，他倚在船舷的栏杆上，沉思着，沉思着……

“要让穷苦的人们都有好歌儿唱!”这是一位令他尊敬的长者对他的期盼，也可说是一代中国受苦人对他的期盼!

冼星海在法国巴黎音乐院学成回国，就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虽然母子生活穷顿，但心如火般炽热。有一位老板闻知他的大名，要出巨资聘他为“桃花江是美人窝，桃花千万朵……”“早行乐，人生寿命能几何……今朝有酒今朝醉”作曲时，他把他们送来的支票撕掉，斥道：“你们有钱，总以为艺术是可以用钱买来的。但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并不这么看!”

冼星海在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毕业时，他本就是著名作曲家杜卡斯的高足，成绩优良又出自名师门下的音乐家是不愁没人聘请的，音乐院也曾表示愿他留下继续做研究工作。这似乎是一条平坦大道：成功的创作，个人的音乐会，还有法国女友温暖的家，一个温暖的小家庭，真是到了“吃了苦中苦，今成人上人”的时候了，但他放弃了这一切，选择了回祖国，他决心把自己学到的东西贡献给祖国。他知道，灾难沉重的祖国需要他!

## 三

奋进。冼星海，他心中有一盏明亮的灯，就是音乐艺术的最高目标。他决心为艺术而献出自己的一切。因而，贫穷、饥馑、屈辱，非人的折磨、他都咬紧牙关挺过来。于是，他终于成为伟大的人民艺术家。

星海是在母亲怀中，听着柔和的催眠曲中爱上音乐的。饥饿的母亲没有足够的乳汁，小星海饿了、哭了。母亲轻轻唱道：

> “杨树叶儿哗啦啦，小孩睡觉找阿妈。乘乘宝贝你睡吧，蚊子来了我打它……”

听着听着，小星海咧了咧嘴——笑了，渐渐地入睡了。

渐渐长大了，星海随着当水手的爷爷，海滨上那些阿哥、阿姐、叔叔伯伯们学唱渔歌，而后，又喜欢上他们闲暇时吹弄的乐器，高亢的喉管，流畅的二胡和清脆的扬琴。有时唱“龙舟”的民间艺人走来了，更激起孩子们的欢乐，他们随着艺人挨家挨户地走过，模仿着他一手托着龙舟，一手敲打着小鼓小锣的姿态，又调皮地随着他的声音哼哼地唱起来……

星海到南洋几年，接触了过去很少机会听到的西方音乐。从教堂里发出纯正和声的咏诗班，到英文学校里外国老师演奏的音调绵绵的小提琴和洪亮的铜号，铿锵的钢琴，这些都使这个稚气的孩子发生了深厚的兴趣。他不知不觉爱上了音

乐，他要去窥探这音乐的大花园。为什么人的指头能够发出那样奇妙的声音，为什么音乐令人陶醉？……从此，他常常到人家的窗外偷听人们弹琴唱曲，室内琴声已经停止好久，而小星海却听得露着笑容熟睡了。母亲寻到他，才轻轻地把他抱回家去……

小星海13岁时，从南洋回到祖国，在岭南大学附设中学读基督教义学时，在一名颇有造诣的教授调教下，他的演奏水平大大提高，尤其是管乐方面已颇有造诣，被人们誉为“南国箫手”。但在一次听到了几个从菲律宾来的管乐师的乐队演奏后，他羞愧万分，觉得自己的水平差距太大了，没有勇气上台演奏，于是他下决心闯出去深造。

他闯出去了。他先到北京投考了北京音乐传习所。这是国内最早的一个音乐教育机构。它的主持人是1920年从德国留学回来的肖友梅博士。他在学校半工半读。他在生活上除了免除饥寒再也没有别的要求，所以得到的一点工资还可以节省一部分向一位外国音乐家学习小提琴。他又一次把自己埋在书斋和练琴室里。他更加坚定地确信“有志者事竟成”。他兴奋地写信给母亲和黄大哥，报告他顺利地达到了学习的目的，他要做一个音乐家的理想。

1927年11月底，北京音乐传习所被军阀解散，他又转到刚成立的上海“国立音乐院”就学。这也是肖友梅博士一手筹办起来的。蔡元培还挂名任院长。但因冼星海等学生不满学校刻薄对待学生，闹了学潮，冼星海等一批骨干被开除了。

国内不行，到国外去！在一些穷朋友的支持下，星海凑足了路费，先行到了新加坡，在这里打工挣了点钱，然后就“以工换票”搭上往法国的轮船——终于踏上往“音乐家的圣殿”——巴黎音乐学院他向往已久的神圣目标。

到了巴黎，他吃尽苦中苦，考上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被杜尔斯收为学生，还拜了奥别多菲尔为师，经过七年艰辛努力，终于成为作曲、小提琴的优等生，还成为演奏指挥家——音乐的荣誉桂冠离他越来越近了！

## 四

绝响。《黄河大合唱》是中国音乐史的绝响。前无古人，今无来者，念天地之悠悠，唯沧然而涕下！

没有珠江边上那风雨飘摇的茅屋传出来的洞箫声，没有新加坡窗外跟着屋里琴声悄悄的絮语，没有巴黎音乐院一鸣惊人的《风声》，没有上海滩上振奋人心的《救国歌》、《热血》、《黄河之恋》、《青年进行曲》、《拉犁歌》、《流民三千万》、《茫茫的西伯利亚》、《夜半歌声》……就没有《黄河大合唱》的绝响！

毛泽东称冼星海是人民的音乐家，充分肯定了冼星海用音乐为中国人民的解

放事业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在上世纪30年代，他放弃国外那由他自己的血汗，毅力获得的音乐界的成绩理应得到的优惠的生活待遇和美好的艺术前景，毅然回国参加拯救中华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而后，又带着妻子直奔革命圣地延安，直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他以广泛的题材，表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抗日斗争精神，对全国抗日军民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他在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武汉“三厅”时，组织了星海歌咏训练班100多个歌咏队，亲自带队到街头演出，每当群众围拢来，他首先站在车上教歌。一次，周恩来在武汉对“三厅”的文艺宣传全体人员作一次形势报告，号召大家到敌人后方去开辟根据地，扩大实力，将抗战进行到底。赵启海连夜赶写了《到敌后方去》的歌词。冼星海看后，非常振奋，立即构思谱曲，创作出雄壮豪迈、极富号召力的战歌。此后这首歌传遍全国。太行山游击队以它为队歌，老百姓、小孩子都会唱。

1938年10月1日，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冼星海与新婚的妻子钱韵玲双双离开武汉，便于1938年11月3日到达延安。不久，应邀到毛泽东的窑洞作客。毛泽东鼓励他继续走本民族、本国家学派的艺术道路。

冼星海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一职，并在延安“女大”兼课。在鲁艺，他负责音乐理论、作曲的主要课程，还教授音乐史及指挥。这位音乐家每天都跟着鲁艺师生一起上山开荒，手上打满了水泡。在延安的一年半，他进入创作的巅峰期，谱写了《军民进行曲》、《生产运动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在太行山上》等作品。在政治上，他追求进步，于1939年6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这个时期在延安创作的，是他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一部代表作，可说是中国音乐史上一个不朽的里程碑，在世界也有很大的影响。

1931年1月，诗人光未然不慎坠马，住进了延安边区医院。冼星海去医院看望他。光未然向他朗诵了长诗《黄河吟》，冼星海顿时被激动人心的诗句所吸引，请求光未然把《黄河吟》改写成《黄河大合唱》歌词。众人听完最后一句“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时，窑洞里面一片安静。顷刻，掌声响彻整个窑洞。掌声中，冼星海激动地站起来，一把将歌词抓在手里说：“我有把握把它谱好！我一定及时为你们赶出来！”

冼星海回到窑洞，五天五夜，沉浸在对祖国的黄河，对祖国河山的浓浓情意之中……

正像他自己所描述那样：“我生长在祖国南方的海边，祖父和父亲都是水手。我从小就听惯了水手们在无边无涯的海面上唱的歌。歌声是辽阔、奔放的，从这里我们能够体会到劳动者对祖国山川江河的深厚感情，也体会到他们是用什么样的音乐语言表达这种感情。前些日子，有个同学从黄河边上回来，给我描绘了九曲十八弯的黄河的壮丽风景，也唱了一支他从老水手那里学来的歌……”

“听，珠江和黄河，迢迢千里，但它们的歌声在精神上是多么相近！虽然一个更悠扬，一个更淳厚，但都同样表现了它的作者——劳动人民开朗的心胸。我常常这样想：劳动人民是多么有才能啊，他们常常能够用最经济的材料表现出一种呼吸宽阔、意味深长的感情。这是值得我们专业的音乐作者学习一辈子的。”（引自马可《黄河的颂歌》）。

……

1939 年 5 月，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观看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那山呼海啸、震撼大地的音乐效果鼓舞了听众，人们为民族的苦难抑制不住流下了热泪，更为祖国的解放、革命的胜利而欢欣鼓舞。演出结束，冼星海带领全场观众一起高唱《保卫黄河》，礼堂响彻了“保卫黄河”的震天怒吼。歌声一停，毛主席站起来高兴地连声说：“好！好！好！”还特意单独接见了冼星海，热情称赞《黄河大合唱》写得好，并送给冼星海一支派克笔和一瓶派克墨水，勉励冼星海为人民谱写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自那以后，无数人就是唱着“风在吼，马在叫”走向了抗日战争最前线的。

但是，不幸的是，我们人们的音乐家冼星海，却因为著名摄影家吴印咸拍摄的《延安与八路军》纪实影片往苏联配制音乐（苏联制版设备比我国先进）时，因战乱奔波，旧病复发，抢救无效，在莫斯科医院逝世，终年只有 40 岁。骨灰埋在莫斯科市郊公墓。

1945 年 8 月 16 日，郭沫若得知冼星海在莫斯科病逝的消息后，十分悲痛，当即写了《吊星海》的文章，发表在重庆的报刊上。延安各界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挽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几行大字赫然在目；周恩来 1939 年 7 月回延安时给星海的亲笔题词是：“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写呼声！”

1983 年，苏中友好协会应冼星海家属请求，将其骨灰移交中国。1998 年 7 月，江泽民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冼星海赴苏联时因战乱在此居住近一年），亲笔为冼星海的故居题词：“忆星海，黄河涛声蒙回耳；访邻邦，友谊之花绚丽夺目。”

午饭后，袁东艳教授和她的高足们陪我一起参观了校园。

春光融融，白色的楼房，绿色的甬道错落有致，处处透出现代化校园的气息。因是艺术学院，设计师们在艺术造型上更花了许多心血，让人感到整座校园就是一块精致的艺术品。

大门口的左侧，是一尊高大的冼星海雕塑像，乳白色，像他那纯洁的心灵一样。我以崇敬的心情瞻仰这位用特殊的武器战斗，用优美、高昂、激越的旋律鼓励一代中国人民为民族的解放而战斗的伟大的人民音乐家！

此时，我脑际似乎闪现出七十多年前杂草丛生、野藤盘错、昏鸦低旋的荒岛上那个风雨飘摇中的小茅屋。里面华发早生的母亲，弯着腰，在昏黄的灯下缝补着星海揽来的永远缝不完的脏破衣服。母亲身边那瘦弱的小星海，歪着脑瓜，起劲地吹着还不十分熟练的洞箫，而渺渺之音，时而像波涛骇浪，时而像高山流水，时而像丛中莺鸣……

我回头望望教授身边穿着整洁而高雅的十分勤奋的现代化大学生，刚才饭桌上听到他们生活无忧，住宿宽裕，而且大部分已领到汽车驾驶证，美好的艺术未来，美好的人生未来在等待着他们。我不禁感慨道："人民的艺术家，你值！你早日为之奋斗的理想在这新一代人中实现了。你一人倒下去，千千万万的新一代音乐家崛起了。他们会在幸福的社会环境中茁壮成长，完成你未竟的事业的！"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王国梁）

# 许世友

## 读书治军有良方

1973年12月，毛泽东一声令下，解放军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开国上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直到1980年1月专任中央军委常委止，他整整在广州工作、生活了六年之久。这一时期，他的革命业绩全党、全军公认："1974年1月，他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期间，指挥西沙自卫反击战，严惩了入侵的南越军队。1979年初，越南霸权主义者不断向我国边境挑衅进犯，许世友同志为保卫祖国边疆，保卫四化建设，不顾年逾古稀，在广西方向指挥边防部队胜利地进行自卫反击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为人民再立新功。"（《许世友同志生平》，《人民日报》1985年11月1日，第四版）"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后，他和广州军区党委'一班人'坚决贯彻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大刀阔斧地对军区机关和部队实施精简整编，在'消肿'的基础上，组织开展作风纪律整顿，着力解决各级领导班子中的'软、懒、散'问题，使班子建设和部队的精神面貌得到改观。他根据广州战区担负的作战任务，狠抓战场建设和战备工作落实，多次组织诸军兵

种抗登陆作战、渡海登陆作战、山岳丛林地进攻等大规模演习，使部队的综合素质和实战能力得到提高，取得了边海防斗争的主动权。”（《铁血铸丰功　丹心镌青史——纪念许世友同志诞辰100周年》，南京军区、广州军区，《人民日报》，2006年2月24日，第八版）

作为一代名将，许世友在坐镇广州、守卫祖国南大门的同时，在广州留下了许多为人津津乐道的轶事。

## 党小组发言



开国上将许世友

广州留园7号，原来是党内元老董必武居住的别墅，1973年12月之后，它的主人是许世友。除了开会外出之外，许世友大部分时间工作、生活在这里，并且要求身边的所有工作人员也全部生活工作于此。

因为全体工作人员都是党员，部队政治机关出身的秘书孙洪宪建议成立一个党小组，把组织生活规范起来。1974年3月的一天下午，当得知许司令员不必外出的消息后，大家决定趁人员齐整赶紧开会，开始酝酿党小组长人选，发言也相当热烈。突然，许世友推门而入，大家赶紧起立：“请首长指示!”随后，满场鸦雀无声。“什么指示？不懂规矩，党内一律平等嘛!”许世友听说工作人员中要选党小组长，便顺手拉过一张硬板凳坐下，说：“既然开党小组会，我也得发发言!”大家当然说好。他的目光如炬，不停地在所有工作人员身上扫来扫去：“党小组长是个很重要的角色，一定要选一个有能力，负责任的。”他口中喃喃自语：“选谁合适呢?”

很快，他的目光定在了孙洪宪和另外一位秘书身上：“你们两个秘书大人，有文化、有知识、戴眼镜、夹皮包、能总结、会提高，讲思想一团糟，打起仗来往后跑（讽刺张春桥的话），你们说，当组长合适吗?”很多人都忍俊不禁，许世友依然是一脸严肃，陡然又把目光停在笑得尤其灿烂的两个警卫干事身上：“瞧你们两个还笑！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每次出去呼天抢地，鸣锣开道，狐假虎威，回去保卫你老婆还差不多。你们当党小组长合不合适?”

这一下，大家实在憋不住，屋内响起断断续续的笑声。接着，许世友又不动声色地把目光对准司机：“你们这两位司机大人，可真是了不起，驾驶技术相当过硬，加足了油门，那车跑得比牛车还快，那车也很听你们的话，不是上树，就是掉沟。你们自己说，是不是干组长的材料?”

两个保健医生刚想把头低下，许世友的调侃已经直接向他们射去："你们两个可是绝对的医术精湛，号称蒙古大夫。给人看病，一蒙二估，肚子痛擦碘酒，头痛贴膏药。我看你们就不错嘛！"

"还有你们两个大师傅，不仅烹饪技术好，而且厨房的卫生搞得尤其出色，把里面的苍蝇抓起来，充其量也就五六斤吧，你们当小组长怎么样？"

大家的笑声还没出口，许世友"呼"地站了起来，大家顿时安静，静候指示，他却撂下一句："你们开会吧，我走了。"说完，推门飘然而出。

工作人员面面相觑，而后哄堂大笑，边笑边回味着许世友的话。笑累了，回味够了，会议才进入选党小组长的正题。

直到今天，孙洪宪仍然佩服并且感激许世友在不知不觉间上的一堂做人之课："尽管觉得非常好笑，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首长并不是在寻开心，而是在给每个人打预防针，提出善意的批评。干工作，不能陷于事务主义，不能仗势狐假虎威，不能采取应付主义，不能降低工作标准，这是首长的言外之意！"

## 广州补文

1973 年 12 月 21 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花了一小时二十分钟，他在讲话中主要还是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并对中央军委委员、广州军区政委韦国清说："老朋友，你不是韦国清吧！样子变了嘛，胖了嘛。你要多帮助许世友同志。他到那里，人生地不熟啊！"接着，他感慨系之："到一个新地方有很多困难呢，不熟人，不熟地方，不熟党，不熟军，党政军民都不熟。"见毛主席对自己如此关心，许世友诚恳表态："有党，有同志们，可以学习。"毛泽东亲切地问："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吗？"

"看了，全部都看了一遍。"

"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

许世友实话实说："那没有看那么多，我还刚看一遍呢。一定坚持看下去。"

毛泽东谈兴甚浓："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你就只讲打仗。"

许世友由衷折服："主席讲的这个话，确实打中要害。"

毛泽东指示："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汉书里边有汉高祖和陆贾的传，那里边说的：'常恨随陆（指随何、陆贾，汉高祖的文官——笔者注）无武，绛灌（指绛侯周勃、大将灌婴，汉高祖的武将——笔者注）无文'。"

许世友接受："应该搞点文。"

"你能够看《红楼梦》，看得懂吗？"

"大体可以。"

“要看五遍。”

许世友郑重表态：“坚持看五遍。”

毛泽东笑了：“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这个人也是厚重少文。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

许世友大声回答：“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

毛泽东临别赠言：“不怕啊！你就做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

许世友调到广州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开始静下心来阅读《红楼梦》、《天体运行论》（在南京军区时，毛泽东曾托他给紫金山天文台捎过一册合译本的书，包括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等，并嘱咐许世友：“你也要认真看一看这类自然科学书籍”）以及《汉书·周勃传》。当时，毛泽东给他带了三十本《天体运行论》，他发给了军区常委，还发给身边的工作人员人手一本。无论会上会下，许世友总是颇为自豪地强调：“读这些书是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你们也得看一看。”

那一段时间，许世友散步的时间明显比在南京军区时减少，也很少去打猎了，没事就坐在屋里认真习读《红楼梦》。许世友看书也显得极其耐心和投入，左手拿着放大镜，右手握着红蓝铅笔，每天看完以后，就把精彩的诗词背下来，在大家面前“卖弄”一番。在开常委会的时候，许世友也会时不时宣布：“我已经看了第一遍了。”“我已经看了第二遍了。”

一开始，许世友读的是一种小本子的《红楼梦》，后来中央寄来了线装本《石头记》。许世友年龄大了，眼神有些不太好使，看了一段时间后，他把秘书孙洪宪喊到面前，把书往他面前一推：“小孙，你先看，把精彩的地方给我抄下来。”接下来的日子，孙洪宪除了日常工作之外，就是夜以继日地读《红楼梦》，抄《红楼梦》。为此，他还专门设计了一种稿纸——16 开大，每页只可容纳 120 字，字体明显大多了，许世友对此相当满意。到孙洪宪离开许世友，他抄书的稿纸堆起来足有半尺多厚，每次看完一部分，许世友都会在稿纸空白处签上一个大大的“许”字。就这样，孙洪宪陪伴着许世友完成了毛泽东交给他的读书任务。当时，有人“揭发”：许世友不服从毛泽东指示，看书还要秘书帮忙！许世友引用毛泽东的语录反击：“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公允地说，许世友学文的效果还是有的，连诗都能作了。1976 年春天，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对“四人帮”不屑一顾的许世友写了《莫猖狂》一诗：“娘们（指江青——笔者注）秀才（指张春桥、姚文元等——笔者注）莫猖狂，三落三起理应当。谁敢杀我诸葛亮（指邓小平——笔者注），老子还他三百枪。”矛头直指江青反党集团，形象地把三落三起的邓小平比喻成诸葛亮，表示了坚决要保护邓小平的决心。

## 遣子造棺

1976年，许世友的七十大寿在广州度过。七十大寿后，许世友的大儿子、专程从河南新县老家南下拜寿的许光在广州多住了两天。许光是将军前妻李氏所生，童年在奶奶膝前长大，没过一天好日子。作为父亲，许世友感到有很多对不住他的地方。这天晚上，许世友处理完公务，与儿子唠起了家常。

“黑儿（许光小名），你奶奶的坟修得怎么样？高不高？”将军深情地问。

“我和家属、孩子，每年清明节去扫墓，添添土。”许光回答。

“其他时间不去吗？”

“去得很少，因为从县城到咱家五六十里，山路也难走。”

说心里话，将军是欠母亲一笔债的——那是感情债。母亲病重的电报发到部队后，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将军军务缠身，日理万机。母亲埋葬那天，他又没能去与母亲告别，这成了他一生的遗憾。直到今天，他也没能到母亲的坟头拜一拜。

“我现在真的很想回家，看看你奶奶的坟头，添两锹土。他老人家一生太不容易了，我一生尽忠革命有余，报效老母不足啊！”将军说到这里，动了感情，眼圈湿润。

“爸，那您就请个假，跟我们一块回去吧！”许光诚恳地说。

许世友摇摇头，陷入沉思。良久，他突然发问：“咱山里的松树伐光了没有？”

说到伐树，那是20世纪50年代初的事。将军的家乡地处大别山腹地，山高坡陡，原始林木参天，道路不通，几乎与世隔绝。家乡需要公路，但苦于无钱修建，而部队需要木材，无路也难运出。这时，将军做了牵线“红娘”，派出一个工兵团，首先修起了公路，运出了部队伐下的100亩红松。这样，部队和家乡各有所得。家乡人深深地感谢将军，念念不忘他的恩德。

“没有。过去伐过的地方新植的松树也有大碗口粗了。”许光回答。

“如有红松，买它两棵。”将军又道。

许光感到诧异：“买树干什么？”

将军看了一眼儿子，回答：“人老了，得想后事了。爸爸今年七十，已是高寿了。”

许光明白了爸爸的心思，但他又想不通爸爸为啥还要土葬，于是又睁大眼睛问：“中央不是有明文规定，提倡火葬吗？据说毛主席、朱德、刘少奇等都签了名，是真的吗？”

“有这回事。”许世友不无幽默地回答：“不过，那是提倡，爸爸没有签字

啊。我生前尽忠革命，死后要陪伴老母！”

“两棵树能花上多少钱？”将军十分认真地问儿子。

“我也说不大清楚。”许光回答：“爸爸，您不是要做棺材吗？这个事情儿子包下啦。”

“我知道你工资不高，也不富裕嘛，钱我得出，事情你去办。”将军语气十分肯定，说罢便朝兜里掏钱，半天，只掏出10元3角钱，他叹口气说：“我记性不好，昨天通信员给我买了5瓶茅台酒。”“你先回去，过几天，我让通信员把钱邮回去。”

许光回到大别山老家后，不到半个月，果然收到了父亲从广州邮来的50元钱。信中特意叮嘱：“倘若不足，我可再邮。”

许光取出钱后，心里有说不清的酸楚，泪水止不住往下流。他理解父亲，更理解父亲待儿的一番真情。父亲一生清白，从不以权谋私，占便宜与他无缘。

许光接到钱后，认真地筹办父亲交给的“任务”。在新县田铺乡林区，他在乡领导陪同下找到了一棵古松，上前张了张臂，量了量，树围三抱粗，“我看这一棵足够了，就定这棵吧”。

古松伐下了，又请来了特级木匠，精心设计，精心制作，精心雕刻，很快做成了。许光一封信发到广州，报告父亲，棺木做好了，请他回来验收。将军看了家信很高兴，写信告诉许光说，等他打完了对越自卫反击这一仗，只要不死就回来。若是战死了就用这口棺材，不需要再验收了。对越自卫还击战结束后，许世友由广州到南京紫金山“稻香村”安家。

许光又亲自去父亲那里探望，询问父亲什么时候回家？父亲告诉他：“县长也请我回去哩，干脆一块捎带吧！”

春来秋去，花开花落，将军几度许愿几度落空，直到他在南京军区总医院逝世的时候，也没有见到他花50元买的棺木是个什么样子，这不能不说是他一生中的又一个遗憾！

## 将军农民

三面环水的广州留园7号，原来是接待中央首长的地方：楼后，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微风乍起之时，一阵婆娑之声；楼前，是一片经过花工精心打理的草地，就像平铺的一张柔软的绿色毛毯；院落里的亭台楼阁，也错落有致、风采各异。总之，这里的环境即便不是人间仙境，也绝对优雅怡然。

许世友进入留园7号后，背着手绕楼转了几圈，然后把所有工作人员叫到一起：“楼后的竹林圈起来养鸡，水里面养鱼，草坪开出来种菜，楼顶上搭棚养鸽子，就这么定了，你们抓紧行动。”工作人员怎么也不敢相信，要把这么优雅的

环境毁掉，去种菜养鸡，起初还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一个个站在原地发呆。


农民出身的许世友对庄稼有特殊的感情

军令如山！1974 年 2 月，就在许世友到海南视察之时，所有工作人员加上军区警卫营的一个警卫班，木耙、铁锹、镐头齐上阵，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垦荒”运动。他们狠狠心拔去那些美丽的花草，一个星期时间便把那块美丽的草地翻了个底朝天，又到嘉禾农场拉来一车猪粪覆盖一层，再翻一遍土。很快，原来的一片花红草绿，很快就变成了三分良田。工作人员又骑自行车到菜农那里，找来小白菜、菜心、辣椒、茄子等菜苗及时种上去。路两边的地也开垦出来，准备种地瓜、玉米、高粱、黄豆等。

20 多天后，许世友从海南回到留园 7 号时，那些栽种的菜心、小白菜在工作人员的精心呵护下已经返青，青翠欲滴地泛着油光。许世友的心情好到了极点，一张大嘴更是笑得合不拢，他围着菜地转来转去，嘴里不停地重复着一个字：“好！好！好！”

“种菜不施肥，等于瞎胡混。”冷不丁，许世友冒出一句话来，“施肥最好还是农家肥。”于是，在广州东山区的闹市街头，就出现了这样离奇一景：五六个军人推着一辆拉粪车，大街小巷里四处转悠，寻找公共厕所沟粪。老百姓见了好生奇怪：别的沟粪车由市内往市外拉，而这几个军人却把粪车拉进了百姓心目中非常神秘也非常神圣的军管别墅小区。这种场景每星期都会上演一次，吊足了百姓的胃口。

因为许世友“治菜”严格，他的菜地里一根杂草也找不到，因为养分充足，灌溉及时，很快就迎来了累累硕果。那些菜苗开始生长较为缓慢，但成熟季节一到，就像疯了一样猛长，自给自足已绰绰有余，剩下的就大筐大筐地送人，军区首长、警卫连都享受了他们的劳动果实。“看看，摆弄蔬菜就是比摆弄花草实惠得多，什么屁高雅，高雅能当饭吃吗？”抚弄着满地的菜苗，许世友振振有词。

许世友不仅种菜有招，并且养鸡有术，他在南京时养鸡就很出名，据说他家里养了一群良种鸡，下的蛋七个就有一斤。来到广州后，许世友早就盯上了留园别墅后面的那片竹林，命人围好后，他就从南京把那 100 只良种鸡运来，圈在竹林里放养。因为这些鸡他都侍弄过，所以哪只快生蛋了、哪只身体不适，他指指点点的如数家珍。他还亲自示范教工作人员把吃剩的骨头和鱼刺敲碎，拌在饲料里喂鸡，每天至少给鸡喂一次青菜。果不其然，他养的那些鸡只只精神焕发，生

的蛋也特别的大。秘书孙洪宪回忆说："有一只蛋居然三两多，打开一看，里面有三个蛋黄。"这件事后来越传越神。慕名前来参观许世友养鸡的人越来越多，还有人联系买鸡蛋。对于来买鸡蛋的，许世友制定了土政策："一定要问清楚，如果买鸡蛋用来吃，多少钱也不卖，如果是用来孵小鸡的，无偿奉送。"许世友喜欢养鸡，也支持机关干部养鸡。如此自力更生、"垦荒"造田之后，一大家子人还真正做到了丰衣足食，为国家节约了不少开支，在那个买什么都要凭票的困难时代，他们的生活标准一直保持得不错。回首许世友在留园种菜、养鸡，孙洪宪深情地说："将军出身农家，知道'民以食为天'的道理，种菜、养鸡说明他老人家仍然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曾有一些外国媒体报道他种菜、养鸡之事，称赞他是'将军农民'，这是对他的高度褒奖！"

（夏明星）

# 廖承志

## 他钟情于南粤家乡热土

2008年9月26日，廖承志的长子廖晖，饱含着热泪，把父亲的骨灰千里迢迢送往家乡广东惠州，安葬在美丽的红花湖畔。廖承志虽然不在故乡广东惠州市仲恺高新区陈江街道幸福村出生，但是，他钟情于这片土地。他生前曾经在南粤这块热土上生活和工作过多年，演绎许多动人的故事。

### 精彩的演讲

1937年冬，廖承志奉党中央和周恩来之命，到香港组织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担任主任，并参加中共广东省委的工作。为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活动，他常常行色匆匆来往穿梭于穗港之间。

廖承志能言善辩，口齿伶俐，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十分透彻。1938年2月4日上午，春寒料峭，广州市知用中学里却热气腾腾，座无虚席。他们是来自广州各界的人士，聚集在这里聆听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做形势报告的。这位带着



廖承志

镣铐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廖仲恺先生的公子，在广州的群众中早已大名鼎鼎，如雷贯耳。到会的许多人中，有不少是慕名而来的。

上午八时许，当年仅30岁的廖承志风度潇洒地步入礼堂时，会场内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他从分析国内外的形势入手，强调全民抗战乃大势所趋。他的演说深入浅出，妙语连珠，深受听众的欢迎。

廖承志这次题为《一切服从抗战》的演说，从四个方面分析了抗战以来的收获及军事上失败的原因，目前抗战中所碰到的困难，以及由于困难所引起的危机。他还指出要克服危机，必须提高民族的警觉性，一切服从于抗战，抗战高于一切，即必须树立必胜的信心，精诚团结，真诚合作。

1938年的广州，虽然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实现，但极少数的国民党顽固派仍然制造矛盾，不断挑起事端。为了挫败顽固派的阴谋，贯彻中共的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廖承志为此大声疾呼。同年夏天，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封闭广州新华日报分馆的行径，廖承志决定在广州哥伦布餐厅召开广州市进步文化界人士、爱国青年和群众组织的代表座谈会。

国民党顽固派得知消息后，派出许多特务分子混进会场，分散在各个角落，企图浑水摸鱼，搞乱会场，以达到破坏会议之目的。

廖承志走进会场时，进步青年报以热烈的掌声，混在人群中的特务则发出阵阵怪叫。廖承志走到讲台前，若有所指地说："富丽堂皇的餐厅，怎么会有老鼠在吱吱怪叫?"特务们不敢吱声，总不能自报家门，承认自己是"鼠辈"啊!

座谈会一开始，一位青年人以"左"的面目出现，抢先发言。他在发言中控诉了国民党在大学里搞法西斯军训，最后并提出"我提议我们大家团结一致反对国民党，反对军训"!他的话音刚落，听众席上立即响起了一片喝彩声。

廖承志没有鼓掌，他挥了挥手，会场顿时安静了下来。他平静地说："我不同意这位先生的意见。现在全民抗战，作为青年学生，学习一些必要的军事知识，是准备武装抵抗侵略的需要。至于军训中有什么不足可以提意见，以便把军训搞得更好一些"。这一番求同存异的发言，博得了一片掌声，扭转了可能产生的偏激情绪。原来，这位发言者是奉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之命来这里发言的。

这时，省党部的一位科长猛地站起来，盛气凌人地大唱"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陈词滥调，并大肆污蔑共产党"破坏团结"等等。他的言行大大激怒了听众，许多人高声喊打。这时，潜伏在楼梯旁边的特务打手，正想大打出手，捣乱会场。

廖承志意识到如果双方厮打起来，正中顽固派的奸计。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他大义凛然地说："请大家安静，我们要枪口对外，团结抗日。有什么不同意见都可以讲。但是，无论是谁，都不能动拳头。这位先生讲的话不对，大家愤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开会是完全讲道理的。"接着，他坦然说道："我就是共产党员，我们是坚持抗日的，是坚持团结抗战的。倘若日寇有一天打到广东来，我们共产党员一定要到前线浴血奋战。像这位先生大概是国民党员，希望你也同我们一块去战斗。到时你会在哪里呢？请你用事实来回答吧。你刚才讲的话是破坏团结抗战的，也是违背你们蒋委员长的讲话的。我们谁爱国，谁坚持团结抗战，人民和全世界都会看得清清楚楚的。"他的这番话，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主张，深得与会者的支持和拥护。散会时，大家高呼"拥护中国共产党"等口号，连在场的政府人员都一齐为廖承志精彩的演讲而鼓掌、喝彩。

事后，中共广东省委通报表扬廖承志，号召全体共产党员要学习廖承志的革命性、高度的原则性和斗争的灵活性，以及他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和艺术。

## 指导发展抗日武装

廖承志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任上，不仅坚持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十分重视抗日武装的建立和发展。在他看来，这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1939 年 9 月，日寇为策应武汉的攻势和切断我国对外联络的补给路线，便抽调兵力，组成南支派遣军，准备侵占广州。狡猾凶恶的日寇选择大亚湾为登陆点，然后沿惠博公路直逼广州。10 月 9 日，日寇主力船从马公起航，于 11 日黄昏到达大亚湾口。国民党的守军不战而逃，日寇得以登陆，东江的形势十分危急。

同年 10 月 13 日，廖承志接到中共中央关于要在东江日占区后方开拓游击区的指示。当天，廖承志通知中共香港海员工会书记曾生立即到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家里开会，研究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

廖承志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在东江一带开辟游击区的指示精神。他强调说："中央要求我们，迅速在东江敌后组织人民武装力量，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我们要尽快从香港抽调一批得力干部，由市委或海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带领回去"。吴有恒和曾生听取了党中央的指示，都摩拳擦掌，神情振奋。

在讨论到应该由谁带队出征时，曾生和吴有恒互不相让，争着带兵上前线。

吴有恒振振有词："理由很简单，我会打枪，曾生不会打枪。"听完吴有恒的发言，曾生无言以对。

廖承志沉吟片刻，然后问吴有恒："惠阳一带是客家地区，你懂客家话吗？"吴有恒感到茫然，摇摇头。

“你在那边，有一个熟人吗?”廖承志接着又问道。

“没有”。吴有恒答道，表情有点尴尬。

这时，廖承志一锤定音：“曾生去。来不及请示中央了，就这么定吧!”曾生紧锁的眉头这时慢慢地舒展开了。

经过反复磋商，决定从香港澳门的750名共产党员中，紧急选调200名党员以“惠宝临时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到惠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廖承志任命曾生为“惠宝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1938年10月下旬，曾生带领60余名共产党员、进步工人、青年、学生，带着借来的25支枪，分批到达坪山，按照与廖承志商量的计划，以“华侨惠阳青年会回乡团”为基础，成立了100余人的惠阳抗日游击队，活动于惠阳、淡水一带，发动群众建立了一块抗日根据地。

广东惠阳县坪山附近驻有国民党陆军第151师温淑梅旅和地方部队罗坤大队。为了取得合法身份，有利于长期发展，曾生根据廖承志的吩咐，和刘宣到坪山龙岗大井村，以回乡救亡工作团的名义拜访旅长温淑梅。温淑梅见了曾生，热情设宴招待，并即席挥毫写下对曾生的委任状，使这支抗日武装队伍，取得了合法地位。

后来，这支队伍在战斗中不断壮大，发展成为惠宝人民抗日总队。当时缺乏军事干部，廖承志还委派懂军事的郑天宝去总队担任参谋长。当时这支抗日部队的伙食和其他费用，均由廖承志、吴有恒他们在香港筹措。这支武装队伍逐步发展成为拥有11000余人的部队。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1943年12月，将番号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大队，这支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与廖承志的指导、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廖承志对广东南路地区的抗日斗争也十分关注，并给予大力支持与帮助。他通过与张炎的统战关系，帮助张炎建立起抗日武装，为我党在粤西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打下了基础。

张炎是广东吴川县人，原是19路军爱国将领，1938年1月，张炎回到南路地区，任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一区统率委员会主任，同年10月，任广东省第十一游击区司令。他有心抗日救国，但国民党政府并不信任他，他没有自己真正的武装。于是，张炎便到香港寻找共产党的帮助。

1939年1月的一天，一位海员向吴有恒报告说，有一位从茂名来的，自称是张炎代表的人要找曾振生（曾生）。当时曾生去惠阳打游击后，香港的海员工作由吴有恒兼管。吴有恒知道张炎是爱国将领，有进步的表现，便决定约见张炎的代表。吴有恒明确告诉张炎的代表：“曾振生到惠阳打游击去了，找别的人和你谈行不行?”张炎的“代表”问：“谁?”吴有恒答说：“廖承志。”张炎的“代表”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连声说：“那更好了，太好了!”

廖承志很快便接见了张炎的“代表”。廖承志接见时，才知道所谓“张炎的代表”，其实就是张炎本人。张炎向廖承志提出，要派人回南路帮助他搞抗日，廖承志当即愉快地接受了张炎的请求，决定派人去。但是，派什么人去呢？这使廖承志、吴有恒绞尽脑汁。在香港的“茂名、湛江同乡会”并没有什么势力，经再三考虑，决定组织由26人组成的华侨回乡服务团到南路发动民众抗日。服务团以香港学生赈济会名义发起并出经费，由共产党员刘谈锋、黄络思任正副团长，到南路各县乡村发放救济物资，给贫苦农民送医送药，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不久，许多乡村的儿童团、大刀队、救护队等，在服务团的精心组织下，也纷纷建立起来。服务团还协助中共广东省委派到南路的工作队，在各县、乡村发展党员，建立了党组织。不久，南路各县委组织均恢复起来，中共广东省委派了周楠任南路特委书记。服务团同张炎的关系也相处得很好，张炎还聘请服务团的正副团长担任政治教官，从而使南路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廖承志还十分关心珠江三角洲人民抗日武装的创建和发展。“珠江纵队”的建立，与廖承志的支持和帮助有很大的关系。广东省南海县有一位名叫吴勤的人，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当过南海农团团长，后来逃往南洋，是个江湖人物。1938年初，他路过香港回到乡下。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曾派人去跟他联系，请他组织抗日武装，结果，广州沦陷，联系中断。1939年初，吴勤到香港找到吴有恒，说他有2000人的队伍，希望党组织派人到他的部队工作。这时，刚好张文彬到香港传达党的六中全会精神，吴有恒便向张文彬和廖承志汇报，他们两人均很赞成。吴勤在廖承志的关怀下，发动爱国青年在广州郊区成立了颇有实力的抗日义勇队。这支抗日武装在廖承志的支持下改编为广州市游击第二支队（简称“广游二支队”）。为了把这支抗日部队改造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廖承志在一次中共广东省委会议上提出要派党员干部到广游二支队去。他还提出在改造这支抗日武装时，要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既要提高警惕，又不要“过河拆桥”。11月下旬，廖承志派廖锦涛带队的澳门各界救灾会回乡服务团，到广游二支队工作。

在党的领导下，在廖承志的关怀下，广游二支队与中山、顺德抗日的游击队在抗日的烽火中，得到发展壮大，成为活跃在华南抗日战场的三大主力之一。与此同时，廖承志还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亲自指导冯白驹领导的琼崖工农红军改编为抗日游击独立总队的谈判工作。结果，该部改编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取得了公开合法的地位。

广东人民的抗日武装，在中共广东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积极打击敌人，接连收复失地，威震南粤，名扬海外。活跃于广东的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琼崖纵队等各支抗日队伍的发展和壮大，无不渗透着廖承志的心血。

## 为落实侨务政策鼓与呼

新中国刚刚诞生，廖承志便参加了我国侨务方面的领导工作。1949 年 10 月，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被任命为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廖承志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协助其母领导我国的侨务工作。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许多政策需要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具体意见，以便协助中央制定一系列的政策。广东是著名的侨乡，因此，廖承志经常到广东来，了解侨情，以便为周恩来总理出谋划策。

1951 年冬日的一天，廖承志突然接到广东省侨委同志的报告，得知香港爱国人士、律师莫应桂的妹夫郑伯龄，因在故乡广东省中山县三乡镇购置有十几亩田地，土改时被划为恶霸地主且被定为死囚，郑伯龄的妻子莫芷馨请澳门爱国人士马万祺出面，向广东省领导人反映情况，说明郑伯龄并无恶霸行为，请求人民政府复核审查。

廖承志还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广东省个别地方的工农干部错误地认为“凡是华侨都是有钱的，都不是好东西”。由于农会干部队伍不太纯洁和单纯经济观点作怪，侨乡土改扩大化，仅仅根据侨汇多少划成分，错误地把一些没有一分土地的华侨划为地主，没收侨眷的房屋，甚至把侨眷抓起来任意吊打罚款，限期三、五天写信向海外要钱，过期不交就加倍罚款，台山、开平两县都发生了吊打整死侨眷的现象。有的地方甚至追余粮追到国外，根据在国外的财产定地主成分，一时间华侨怨声载道。

廖承志得知这个情况后，感到事态严重，马上向妈妈汇报。此前，何香凝已经从秘书廖承慧那里了解到由于广东、福建等出现“左”的偏差，在国际上产生了负面影响。听了儿子的汇报后，她嘱咐廖承志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廖承志组织“中侨委”的工作人员南下广东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于 1951 年 12 月 20 日亲笔写出《坚决纠正侨区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差》的报告，呈送周恩来。在这份报告中，廖承志明确提出“乱划成分者，应宣布其原划的阶级成分无效，进行重划。严禁以侨汇收入之多寡而任意提升和任意确定侨眷的阶级成分。”

党中央和政务院认真考虑了廖承志的意见，决定由叶剑英、张铁生、廖承志开会拿出解决方案。三人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了专门解决土改中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意见，规定除没收海外华侨多余的土地外，其他财产一律不动，这一意见后来作为政务院文件下发到各省进行。

中央的红头文件是下达了，但执行起来阻力却很大。为此，廖承志带领工作组到了广州。他了解到虽然问题在下面，根子却在上面。他耐心地与广东省的领

己陶铸密切合作，在
华南分局第一次华
补缺点，改正偏
勺土改偏差，在

委会副委员
勺岁月，

口
、，
不卜 仑，
廖承元
广为 日
下午，春寒 纪
念堂外面绿草， 市
直属机关科以上自 任
廖承志作报告的。
廖承志在报告中指
华侨基本上是爱国的。他，
管你什么菩萨，他都爱这个卜
接着，他说解放后最高的一年侨，
了："哎呀，你们真厉害，1.8 亿美上 的
关系："华侨工作标志着什么东西呢？ 。国
内政策端正的时候侨汇就增加；如果国内卜 下降。
从来没有像这个东西这么见效。这个东西像风 ，就值得
深刻思索一下，哪一方面的工作是不是出了毛病.

廖承志话锋一转，单刀直入地指出妨碍党的侨 的最大障碍就是"海外关系论"。他说："我们已经与中央组织部、国务卜 事局、公安部一齐研究过，就是要消灭这样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只有四个大勺 ，叫做'海外关系'。这个说法是没有分析的，是有害的，是主观主义的东西。"他指出这种提法在方法论上的错误。然后，他联系自己，说他的海外关系很严重，但中央仍然信任他。他语重心长地说："谈到海外关系，最严重的是我。大家知道美帝国主义过去有一个叫陈纳德的航空队长，参加蒋介石集团运输队进攻我们解放区的，他看见我要叫我做舅父，因为他的老婆，就是我的外甥女。你们看我还不严重呀?!

与美帝国主义有血缘关系。我向你们交代，我在香港有多少亲戚呢？如果在香港我要计算我的表妹、表弟、表姑丈、表姨夫什么乌七八糟的通通算在一起有400个。这就是我的海外关系。”廖承志讲到这里，会场爆发出阵阵笑声。他接着说：“如果真正要根据这个海外关系的话，那么，我廖承志这个人是华侨事务委员会的主任，还要审查、审查啰。但是据我知道中央并没有这么看。我这个人水平也很低，我过去在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有许多缺点，过去由于资产阶级出身的关系，学会了两三句这个英文，那个英文，因此，中央感到还可以用，有些时候也派给我出国的任务，那么，我就去，我就抱着这么一个海外关系大摇大摆地进行国际活动。所以，现在根据中央扩大会议的精神，既然我也可以有这么个海外关系，那么别人有海外关系这个矛盾就不能解决了?!”

廖承志进而列举“海外关系论”对华侨所造成的种种危害：“第一，只要他有‘海外关系’，参加党就难了，参加团也困难了，甚至结婚都困难。如果他不是寄托马克思、列宁在天之灵保佑，在机关工作，一旦发现了海外关系，马上就考虑这个人下放劳动，这是第二。第三，尽管这个‘海外关系’已经怕了，说‘我不要啦，我不要啦’，但不行，到了晚上还有一个穿黑衣服的很神秘很严肃的人来问：你这个钱是从哪里来的？我看这个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廖承志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剖析“海外关系”的提法，认为这种提法不科学。他说：“‘海外关系’这个提法是错误的。如果他在海外有国民党关系的话，那么，这个关系就不是什么‘海外关系’，而是国民党关系，还要区别清楚是历史的问题，还是现行特务？就是现行特务与他本人并不相同。”针对“海外关系论”肆虐的情况，廖承志恳切地拜托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大家对‘海外关系’这条，应该把它干净、彻底、全部消灭掉。”同时“也向大家呼吁，对于华侨收到侨汇，不要给他加一个帽子：‘资产阶级思想。’”报告结束时，在中山纪念堂内外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文革”期间，党的侨务政策遭到严重摧残，不少华侨、侨眷惨遭迫害。粉碎“四人帮”之后，在1977年12月20日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廖承志发表了题为《落实党的侨务政策》的讲话，当他讲到“文革”中，有些华侨被迫离开祖国，走出深圳市罗湖桥，一步一回头，仰望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时，他的眼睛湿润了。

1978年1月4日，廖承志在《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所谓“海外关系”问题的反动谬论》的长篇文章，从理论上批判“四人帮”所炮制的谬论，揭开了我国侨务战线拨乱反正的序幕。

1983年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彭光涵南来广东进行调研，回去向廖承志汇报，当他讲到广东有些权势的人物仍然拒绝执行中央的政策，不愿意退还侨房时，一向和蔼慈祥的廖承志，再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愤怒，用力地敲着桌子

说："对这种人，就是要绳之以法！"

廖承志知侨爱侨，为了落实党的侨务政策，真是心力交瘁啊！

（蒙光励）

# 方 方

## 南粤大地好男儿

方方是广大干部、群众熟悉和爱戴的优秀领导干部，是南粤大地的好儿子。

“我偏要姓方，就叫方方！”

方方原名方思琼，1904 年农历 4 月 18 日出生于广东省普宁县洪阳镇的一个小商家庭。少年立志救国救民，投身“五四”爱国运动。1924 年考入第二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和教育。1925 年 5 月，加入共青团，任普宁团支部书记，积极带领进步青年开展革命活动。

他曾写下一首《述怀》诗：

欲抽越王弓，慷慨射潮汐；
欲挥鲁阳戈，回首止落日。

此诗反映了他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精神面貌。

1926 年春，方方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立下“为党牺牲（自己）一切”，革命到底的决心，开始了他的一往无前、义



方 方

无反顾的革命生涯。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方方在潮汕等地参加了许多重要斗争，曾参与领导普宁10万农军攻打县城反动集团的斗争。经过血与火的锻炼考验，迅速成长为一位出色的革命战士，受到彭湃的赞扬。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广东当局也制造“四一五”事变，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笼罩各地。方方毅然在潮安等地组织工农武装英勇反抗敌人的屠杀，被指名通缉。退至普宁，参加消灭进攻农会的敌军一个连的战斗。同年12月，组织潮安农军暴动，策应广州起义。向世人宣示共产党人不怕流血牺牲的英雄气概。

1929年，方方到八乡山参加中共东江特委召开的各县代表会议，讨论地方暴动和建立红军问题，会后调任东江特委宣传委员、职工委委员。秋天，他回到普宁，先任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后任县委书记，认真贯彻党的“六大”决议精神，专心致力于发动群众工作，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使普宁县的工作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成立了全县农代会。1930年，先后调任汕头市委书记、潮阳县工农革命委员会党团书记。在潮阳大力发展革命武装。当年中共广东省委向中央报告工作时指出潮阳等县均与敌作激烈斗争。红军、赤卫队发挥较大作用。方方参与创建的东江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与中央苏区相互配合，彼此呼应，促进全国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方方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土豪劣绅的极大恐慌，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扬言要把他开除出方氏家族，甚至要杀掉他来“祭旗”。

方方得悉后，毫不畏惧，一笑置之，说：“我就是要革他们的命！不给姓方，我偏要姓方，就叫方方！”他还对家人说：“我就是烧成了灰，也要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从此，方方的名字响彻南粤大地。

## 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派邓发和广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富春到大南山召开闽粤赣边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方方任大会秘书长。大会讨论了把三省边界根据地连成一片和扩大红军等问题。会后，他随邓发进入闽西苏区，任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职工委员会书记、《红旗报》编辑、汀连县委书记，发动群众参加苏区各项建设。

1932年，方方先后任杭武县委书记、上杭中心县委书记兼杭永岩游击纵队

政委。他坚决贯彻毛泽东关于加强上杭河西游击战争指示，有力地配合
军反“围剿”斗争，为巩固中央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1933 年春，方方在发动群众生产支前和扩大红军工作上都获得优异成绩。他领导的才溪乡，100 个青壮年中就有 88 人参加红军。全区共动员 2400 多人加入红军，在瑞金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表扬了他的工作，赞扬才溪乡是模范乡。冬天，他调任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兼武装部部长，不久，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后奉命任红军第九团军事委员会主席兼政委，率独九团在连城、宁洋、龙岩三县的边界，建立了一个纵横 300 余里，人口四五万的游根据地，并破坏敌人的漳宁筑路计划，有力地配合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

中央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军队对闽西游击区采取各种最毒辣的手段，
红军游击队于绝境，部队既缺弹药又缺粮，战士有病无药医，不少同
英勇牺牲了，队伍内部又出现叛徒。在这艰苦的岁月里，方方始终
观主义和坚定的革命意志，率领红九团冲出敌军重围，与张鼎丞
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方方任常委兼政治部主任。在张鼎丞、
方方领导下，红军胜利地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量。

1937 年四五月间，方方受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
请示工作，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闽西南游击战
说，“你们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
了二十万亩土地，保卫了苏区广大群众利益
斗有很大的功绩”。

1937 年 9 月，方方从延安回到闽
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指示，要求
当，克服了领导层中一些合法迁就
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此时方方
记，参与创建新四军二支队，
练班，亲自讲课，并做好部队
的扩大与顺利开赴抗日前线，

## 

新四军二支队北上后，方方根
特点，提出了“巩固闽西南，大力
体，闽西南农会发展到 10 余万人，潮
闽西南、潮梅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后，方方根据党中央关于华南工作“一切为着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布置各地党组织发动群众，开辟农村与山地的游击支点，并亲临潮汕，布置在潮汕铁路沿线开展游击战，抗击日军的侵略。在此前，到香港帮助广东省委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授课培训干部。

1941年春，方方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领导粤北、粤南、闽西、闽南、潮梅、广西、琼崖、江西、湘南等地区党的组织和抗日斗争。这时，蒋介石加紧其反共活动，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皖南事变”。方方根据党中央关于“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立即撤退已暴露的干部，把党的组织由原来的党委制改为特派员制，党员则实行社会职业化。他还与南委副书记张文彬一起研究对琼崖、东江抗日游击队的工作进行指导。香港沦陷后，方方在大埔南委机关，通过电台与党中央、南方局以及东江游击队等方面保持联系，参与指挥营救和安置香港的文化人士，为保护大批文化精英作出贡献。

由于江西、粤北党的省委机关于1941年、1942年相继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敌人带着叛徒到大埔妄图破坏南委机关，搜捕南委领导人。此时，原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关押的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和夫人王勖弃子越狱，经长途跋涉跑回南委，向方方报警。方方镇定而果断地组织干部撤退和隐蔽，并坚决贯彻周恩来同志《对南委行动的指示》，停止国统区党组织活动，制止了事态的发展，使党组织免受更大的损失。方方指出：“撤退不是溃退，组织不能散。”他布置各地留下联络员，为后来恢复党组织活动和发展打下基础。

## 领导华南地区的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方方任叶剑英将军的政治顾问、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第八小组的中共首席代表、少将，到广州执行停战协定和解决华南抗日游击纵队北撤问题，使部队胜利北撤，保存了有生力量。

全面内战爆发，党中央为加强华南党组织的领导，开展华南游击战争，发展民主人士、海外华侨、港澳同胞的反美蒋统一战线，调方方到香港任中共中央代表，不久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后为华南分局）书记。他的夫人苏惠负责组织工作。他们在香港尼敦道180号的小楼上，建立了一个有老人、小孩的家庭机关。由于经费紧张，他们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苏惠怀孕，想吃一个橙，方方也舍不得花钱给她买；父亲生日，也只是加了一个炖鸡作菜，以示祝贺。方方全副身心都用在了领导华南革命斗争之上。

为配合全国的解放战争，他和林平等同志坚决执行党中央指示，积极筹划在华南地区全面恢复武装斗争。根据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实际，方方提出“实行小搞，准备大搞”即稳步发展武装斗争的方针，领导广东、广西以及福建、湖南、

江西、云南、贵州部分地区的党组织和群众开展声势浩大的游击战争。

在游击战争发动的初期，党内对斗争方针有不同的意见。某地区主要领导人认为方方不敢斗争，“胆小如鼠”，主张大搞武装斗争，一哄而起，结果很快遭受挫折。方方把他调回香港，帮助他认识到不但要敢于斗争，而且要善于斗争，并为此作了检讨。这在华南地区斗争史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它既纠正了该地区的斗争方向，而且指导华南的游击战争健康稳步发展，粉碎国民党军队多次“清剿”，先后建立了粤赣湘边、闽粤赣边、琼崖、粤桂边、粤中、粤桂湘边、滇桂黔边七大块游击根据地和七支游击纵队。

其时，方方和香港分局派了大批干部到各地组建部队和加强领导。这位犯过错误的干部以为自己骂过方方，肯定不会受到重用，殊知方方却委他以重任，派他担任某纵队司令员，还把他的小女儿接到家里抚养，为的是让这位干部与夫人安心回内地指挥游击战争，直到广东解放。谈起此事，这位干部内心充满感激之情。

经过三年多的游击战争，到 1949 年秋，华南地区的武装部队达 10 多万人，仅广东的武装力量就发展到 8 万人，解放了 1350 万人，占全省人口的 40% 以上，在 1/3 的地区建立了人民政权，为南下大军解放华南、广东，追歼残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发展华南游击战争的同时，方方大力开展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1948 年 5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号召，他和分局的同志积极推动以香港为中心的新政协运动的发展。随后又精心安排护送 100 多位著名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与中共共商建国大业，受到中央嘉许。

毛泽东 1949 年 9 月 8 日致电称赞方方等同志领导的华南党组织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嘱请新成立的华南分局对此作出“足够而适当的评价”。

## 配合南下大军解放广东全境

1949 年 8 月，方方北上赣州迎接南下大军，与叶剑英同志率领的南下大军会师，并参加了 9 月在赣州召开的华南分局扩大会议。

会议通过组成以叶剑英为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的新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并制订了进军广东、支前、会师等具体部署。会后，方方领导各地党组织全力做好迎军支前工作。同时指挥各地方武装配合南下大军作战，解放广东全境。为做好支前工作，专门成立广东支前司令部，林平任司令员，方方任政委。在北上赣州途中，方方挥笔书写《欢迎老大哥》一诗，由文工团谱曲，教部队传唱，表达了广东人民欢迎南下大军的激动心情。

## 协助领导广东经济建设

广州解放后，方方任广东省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协助叶剑英同志主持广东的工作。这期间，他为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做了大量的工作。

1950 年，方方兼任广东土改委员会主任，他根据《土改法》和中央的部署，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土改运动，以推翻封建剥削土地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他协助叶剑英从广东的实际出发，主持制定了《广东省土地改革实施办法》、《土改中华侨土地处理办法》等重要文件，提出保护华侨、保护工商业、保护民主人士的具体政策，并亲自领导兴宁、揭阳、龙川三县土改试点，取得经验，指导全省，使广东土改健康、稳妥地进行。

方方宝贵的贡献还在于，在党内较早认识和正确分析广东地处东南沿海，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特点，开创性地提出重视华侨、保护华侨的政策思想，可以说是今天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区先走一步的有益探索，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辉。

## 协助主持党和国家的侨务工作

1955 年，方方奉调到北京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全国侨联副主席等职。

他到中侨委后，积极地协助何香凝、廖承志主持中侨委的日常工作。为了团结广大华侨参加祖国的建设，他亲自深入侨区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地听取各阶层华侨、归侨、侨眷、侨务干部的意见。他总是根据国务院有关侨务政策的精神，从侨务工作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有效措施，推动侨务工作的开展。他遵循侨务工作要“根据特点，区别对待，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方针，既坚持原则，又实事求是地处理好华侨问题。他和廖承志联名写给中央《关于海外关系问题》的报告，对于纠正“左”的偏差，做好华侨工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1960 年，国务院发出关于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的批示，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委员会，负责统筹归国华侨的接待和安置工作。并任方方为委员兼办公室主任。

为做好这项工作，他遵照国务院关于安置华侨的方针和政策，多次到南方各省，亲监指导，具体部署，推动有关地方增办了几十个国营华侨农场、林场、华侨投资的工厂企业，增办华侨中等补习学校以及暨南大学、华侨大学，既使归侨

得到妥善安置，又使归侨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发挥所长。他多次到广东的港口码头迎接归国难侨，帮助侨胞背驮、手提行李，到医院看望住院的归侨，把祖国对华侨的关怀送到他们心坎上，使归侨感受到祖国处处无限温暖。由于他时时事事作华侨、归侨、侨眷的贴心人，因而深受他们的尊敬和爱戴。

（刘子健）

# 古大存

## 他是“带刺的红玫瑰”

毛泽东在延安时，曾称古大存是“一朵红玫瑰花，带刺的”。

曾长期担任古大存秘书，后来任广东省副省长的杨立在他的著作《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中生动地解释：毛泽东的意思说他是朵玫瑰花，很香，但是有刺，就是说革命性很强，很敢讲话，毛主席对他的评价是很形象、恰当的。一来他确是一朵玫瑰花，很香，是一个好同志；二来他是有刺、会刺人的，不好惹。

毛泽东也曾对古大存过于刚直，作了婉转的批评。有一次几个人在座，毛泽东讲应当搞好团结时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古大存后来对别人说：“毛主席讲的这话，实际上是批评我的。”

1956年的那场反“地方主义”像一阵寒夜的猛雨，把这朵“带刺的红玫瑰”吹落地，一阵狂风，“落红飞到秋千去！”

# 红十一军长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访问时，曾经谈到过彭湃和古大存。毛泽东说："彭湃领导的海丰苏维埃运动失败后，它的军队的一部分，在古大存指挥之下，离开那区域，与李德和我取得了联系，后来成了红军第十一军的基本队伍。"（见斯诺《西行漫记》）

红十一军的创立，是东江革命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光辉的一页。古大存被任命为红十一军军长，这既是他在东江革命根据地享有了巨大的声望，也是中央对他莫大的信任。

东江组建正式红军，始于1927年红二师的建立，发展于红四师到来之后。这两支正规红军驰骋海陆惠紫，转战潮普惠，为创建东江革命根据地浴血奋战，立下卓著战功。后几经挫折，损失严重，令人痛惜。1929年春，随着东江革命的复兴，东江各地的工农革命军独立团队有了相当的发展。同年夏，省委请示中央同意，成立红军第六军，下辖五个团和一个教导大队。但由于团以上没有成立师部、军部，各团红军又分散在东江的西北、西南、东南各个区，很难集中统一指挥行动，影响了红军的战斗力。于是，同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东



古大存等接见汉剧演员

江红军编制成立为红军第十一军的指示，并对红十一军的行动方向和补给等问题作了规定。并任命古大存为军长，颜汉章为政治委员，严凤仪为参谋长，罗欣然为政治部主任。下辖5个团，一个教导大队，一个独立营，全军约3000人。

红十一军成立后，在古大存、颜汉章等的领导下，采取有效措施，加强了军队建设。一是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二是加强连队政治思想工作；三是建立了新型的官兵关系；四是统一指挥和加强军事训练。这些措施，促进了东江红军和地方武装的建设，加强了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使红军更有战斗力，成为保卫和发展东江革命根据地的支柱。

在大好形势下，由于东江特委领导人执行了李立三和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致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遭受到严重损失。古大存在这危难关头，力挽狂澜，带领仅存的红军上了大南山。从此古大存在大南山、八乡山，在敌军的重重围困下，坚持红旗不倒。

最艰难的时刻到来了。1931年春以后，敌人加紧对八乡山进行围剿。闽西根据地陷落，中共东江特委所在地大南山等地也被上万敌军重重围困。此时，坚持在山上的红军只有100人左右。新上任的东江特委书记李崇山逃跑了。古大存带了这支和上级失去联系的部队，在丰顺桐梓孤军作战，后来转移到大埔山区。此间，他们曾多次派人到闽西找党。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也曾派人来联络，但均未接上头。八乡山革命根据地便于1931年6月全部被敌人侵占。苏区人民遭受到敌人“三光”政策的摧残，古大存的妻子等数十名干部、战士遭到杀害。

1935年，古大存的队伍只剩下17人，他继续艰苦卓绝地带领战士们坚持斗争。同年秋，他们由丰顺辗转到大埔县南部的老苏区重新发展武装……

古大存和战士们同甘苦，共命运，根据当地多种情况分析，应付敌人，又经常注意时间的重大变化，及时进行斗争策略转变，从公开转为隐蔽，在最艰苦的岁月里表现出一位共产党人的坚定意志和斗争精神。

古大存从1926年10月领导五华农会，创造五华第一支农民自卫军常备大队起，到1938年上延安止，长期在东江地区坚持革命斗争，一生身经大小数十次血战，多次受伤。在战斗中沉着果断，敌人恨之入骨。广东军阀到处贴布告：活捉古大存的赏银2万元，击毙古大存的赏银1万元。但深得群众拥护、爱戴的古大存，到处得到群众的支持、拥护。敌人见悬赏无用，就在游击队经常出没的雨亭、路口、大石上写诗劝降，进行利诱。一次，古大存路过一座大山，见大石上写着劝降诗。诗曰：

共产十年闹翻天，上山游击苦难言；
山穷水尽已无路，赶紧投降莫迟延

古大存看后，即以木炭题诗一首在“劝降”旁以驳斥之。诗曰：

幼习兵戎未习诗，诸君何必强留题。
终须有日分胜败，且看先生拱手时。

在长期斗争中，古大存和群众打成一片，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国民党在一本小册子中说：“古在粤东盘踞多年，妇人孺子，无不知之，亦足证其名之著也。”

## 执政广东

古大存他自己也料不到，在经过半世戎马生涯之后，已经被初定在北京任中国交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的他，却因叶剑英的推荐，回到广东任副省长。而这一回来，便成为继方方之后的广东“地方主义”的头子，受到无边的打击，最后含冤而死。广东的干部，每想起这位当年坚强地在崇山峻岭中挥师与敌人周旋战斗、英勇不屈的红军军长，却在自己共产党内的无情打击中屈辱地低下头，承诺本人无中生有的冤案，表示“永远不翻案”时，都知道他内心的无限痛苦，都会不禁流下同情的热泪！

叶剑英曾对当时升任国务院总理之后的赵紫阳说：“广东的问题，我说不清楚，你也说不清楚。”叶剑英一向宽容，但对他在广东的问题，仍积压在心头。他曾说他“挨了一记闷棍”。叶剑英不计较，更加没把账算到赵紫阳头上。叶剑英不想去说清楚，也为赵紫阳开脱了。陶铸去世了，谁也说不清楚。

既然叶剑英都说不清楚的问题，我们还能说清楚吗？

为了使读者了解当年古老的委屈，还是把一些重要情节记述一下吧！

古大存到广东，开初分工的是主抓政府的工作，兼民政厅厅长。朝鲜战争开始，他负责支前工作，老区建设工作，真是日理万机。但他仍十分关注土改工作。一是土改是全党的中心，二是他曾在东北搞过土改，很有成绩，也很有经验。后来还因诸多考虑，让方方任此职。广东兴宁、龙川、揭阳三县土改试点开始后，他十分关注，后来，自己还组织省政府在英德、台山二地搞了两个点，进行土改。当陶铸、赵紫阳调任广东之后，南下大军与地方干部发生矛盾，出现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方方成为第一次反“地方主义”头子，受到处分，由第三书记降为第五书记，古大存也曾受到批判，但因他不是土改主帅，幸免处分。而后，土改便在陶铸、赵紫阳主抓下开展起来。

1953 年，古大存在全省各地检查工作时，发现土改方法不对，乱抓乱斗人，甚至侵犯华侨户、工商业者的利益的违法行为比比皆是，刑讯逼供。他在惠阳县

潼湖区检查时，有的干部还沾沾自喜地说："地主不捉不怕，不打不服，不吊不出（即交出财产）。"有的村还有所谓"三吊三出"、"六吊六出"的错误经验，结果盛行村村吊打之风。

古大存对这些违法行为进行耐心的说理劝说，有的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从土改、镇反开始，一桩桩牵涉到民主人士、社会贤达以及军属生命攸关的案件，接二连三地反映到古大存那里，他忍不住，亲自前去阻拦、协调、处理。

在海丰，彭湃烈士的妈妈被当作"地主婆"来斗争，古大存听知后，亲自登门拜访久别重逢的老妈妈，给予安抚，指示当地领导人不能搞那一套，要保护老人家，便准备接彭老妈妈到广州，因她怕增添政府麻烦不同意。古大存便把身上带来的二百元给老妈妈，她老人家感激不已。

当听知东莞厚街的农民进城要抓省政府副主席、爱国民主人士李章达回家乡接受退租时，他急忙去接待前来的东莞农民，向他们解释说理，说李章达年纪轻轻就出来读书，从青年时代就追随孙中山先生反对满清统治，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救过我们许多同志，是我党的好朋友，终于说服东莞农民，心诚口服地回去。

英德县有人写信给华南分局和广东省人民政府要求镇压爱国将领莫雄，而且省公安厅已同意，报赵紫阳也已批准，要立即处决了。莫雄生命危在旦夕，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古大存挺身而出，他找了陶铸，一开口就说："莫雄不能杀，共产党决不能干过河拆桥之事。"他陈述了莫雄为党所做的贡献："他是我党的一位老朋友，今后还可以为党继续出力。叶剑英同志当时在香港把他叫回来，安排他的工作，还是出于对他的信任。这个人绝对不能杀，我们一定要把他保护下来。"

陶铸对莫雄的过去是有所闻的，但没有古大存他们对他那么了解。他接受了古大存的建议："莫雄是广东民主人士的排头兵，把他杀了，以后的事情就不好办了。我同意你的意见，不能杀。"

莫雄终于被保下来了。他被分配到广东人民政府参事室当参事，政协广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后来，在反右中，莫雄又因在《南方日报》发表了《社会主义孝道》一文，差点被划为右派，古大存刚好正被批斗，但为了保莫雄，他又挺身而出。莫雄虽然保下来，但古大存自己却被打倒了——打成第二次反"地方主义"的头子，即"古、冯反党集团"的头子。

## 蒙冤受屈

事情的起因是冯白驹不再兼海南区委书记、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后，陶铸要派省人委秘书长林克泽前去海南任区党委副书记、行署主任。并要他初拟出任党委

班子名单。他因冯白驹系海南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又是现职省委书记、副省长，并把拟就名单呈给冯白驹征求意见，信末附上：古老（即古大存）向来对海南较关心，此信是否也给他看看。好心的林克泽哪里想到，这封信会是反海南地方主义和“冯、古反党联盟”的一首前奏曲。

这封信，古大存一直没有看过，也没有交到冯白驹的手上，而是被冯白驹的郭秘书转给了陶铸。

这可不得了，本来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时，陶铸就把古大存、冯白驹列为“地方主义”分子，只因那时还没成火候，而今叶剑英已走，方方也被打倒后调离了，广东的地方干部“领袖人物”就是古大存和冯白驹，他俩而今竟结成联盟，这封信就是证据。于是陶铸以这封信作为突破口，把古大存、冯白驹列为“冯、古反党联盟”，发动“广东历史问题大辩论”，对其进行猛烈的批判。

在会议上，古大存气愤地作了辩解：“我不知道这封信，更没有看过这封信，与我何干！”但都无济于事，古、冯反党联盟这个结论早在这个会议之前的广东省委第八次（扩大）会议上便已作出了。会上一致通过《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错误决定》。古大存被撤去了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常委、广东省副省长之职，并决定他下放增城县去任县委副书记。

1962 年 2 月，党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的正反经验教训，要求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踏踏实实做好调整工作。七千人大会之后，广东省委在从化温泉召开省一级干部谈心会，即所谓“神仙会”。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会上保证“三不”，即一不抓辫子，二不打棍子，三不戴帽子……这一番话说得信誓旦旦，许多人信以为真，至少是古大存把它当成真言，以致又一次上当受骗。

古大存在会上袒露了心曲，谈了自己受委屈的内心世界，最后希望党能对他 1957 年所犯的错误予以复查。但古大存还是白费口舌，而且带来了新的麻烦。

古大存没想到，这竟是一场“引蛇出洞”的大骗局。在古大存、冯白驹发言之后，陶铸迫不及待地到从化拿了他们的发言稿，匆匆忙忙把它刊在一个会议简报上，目的是要将它作为他们翻案的铁证。

陶铸掌握了这些“罪证”后，立即召开会议，草拟了一份“对冯白驹、古大存同志不予平反”的意见书，上报中央，得到批准后，他讨到这支令箭后，便决定对冯白驹、古大存大动干戈。

现摘录《峭壁苍松——古大存传》的一段令人扼腕的记述：

> 那天，省委礼堂密密麻麻坐满省直处以上赴会干部。会议一开始，台上台下便有人大声鼓噪：“不准古大存翻案，要古大存低头认罪。”许多不知情的与会者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刺耳的鼓噪，不知所以，目瞪口呆。坐在主席台

上一侧的古大存也被闹得不知其所以然，他忍受着人格上的凌辱，铁青着脸，沉思着。

这时，坐在主席台上的陶铸站起身，疾步冲到古大存的眼前，气势汹汹地质问："古老，你在从化谈心会上提出要翻案，现在还翻不翻？要翻就像冯白驹那样立案审查。"

到此刻，古大存才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他顿时怒火直冲脑门，他想臭骂陶铸一顿，是他花言巧语要人向党交心，倾吐苦水的，又是他信誓旦旦，提出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又是他要大家不计前嫌，同舟共济，踏踏实实做好调整工作……原来这都是骗人的谎言，是一个阴谋。他怒目圆睁，盯住陶铸，忍不住就要发火了，但他环视一下周围，看见台下那一双双傻愣愣不知所措的眼睛，他又不得不把怒火压了下来。他在心里对自己说："现在你们操着大权，我要翻案，又翻得了吗？在大庭广众中争吵，太没意思了。过去省委领导核心之间的不团结，已经给工作带来了损失。现在再这么争争吵吵，干部会怎么看，影响会有多坏？为了党的利益，个人的凌辱又算什么？"于是他坦然地答道：

"不翻案！"

"不翻案，那好，你必须具结。"陶铸步步紧迫。

"具什么结？"

"写份保证书，"陶铸气焰迫人地说，"马上就写。"

古大存找不到纸，就从自己的笔记本上撕下一页，伏首挥动那千斤重的钢笔，歪歪斜斜地写下这样一行字：

"我今后决不翻案。"

陶铸接过古大存交来的那张保证书，洋洋自得地走回主席台自己的位置，口对麦克风向全体与会者朗读起来：

"我今后决不翻案，古大存。"

读罢，又交给在座的省委委员传阅。

台下那些首先高喊"决不让古大存翻案"的鼓噪者们，露出得意的微笑，为他们的发难所取得的成果而沾沾自喜。

这场特殊的表演，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它在干部中引起强烈的非议：

"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手段来对待一位老同志，这太不合情理了。"

"早知道开这么个会，我就不来。"

……

这是一场耐人寻味的活幕剧，但归根到底还是一场催人泪下的悲剧。

此后，古大存就赋闲在家，或看报读书，或吹吹箫解闷，或住院治高血压糖尿病。

转眼“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又受到人生一次致命的打击。

一天，他拿起《中南通讯》第一期，很觉新鲜，突然他看到里面出现了一行触目的文字：《评古大存〈齐王求将〉一诗中的反毛泽东思想》。文章批判作者假以歌颂齐后无盐的爱国精神，攻击齐宣王的昏聩无能，以此来影射毛泽东，攻击毛主席昏庸。

古大存一见，不觉大为光火：

“我反对毛主席？放你的狗屁。我对他老人家从来都是尊敬的，我在哪里反对他呀！”

那是1962年8月的事，珠江电影制片厂放映曲艺片《齐王求将》（汉剧），古大存应邀和著名戏剧家田汉前往观看。当时，台湾国民党正大肆叫嚣要反攻大陆，这个时候，放映《齐王求将》正是时候，以教育国民要提高警惕，不能有和平麻痹思想。他很喜欢这出戏，便和田汉当场各写了一首七律，赞扬这出戏。古老的诗这样写道：

齐王昏聩七年中，
犯境秦兵一振聋。
爱国无盐终未死，
匡君田相为先容。
惊惶失措方求将，
忠愤高怀许整戎。
舞态歌神传妙肖，
现身心与古人通。

古大存写此诗的心迹，是告诫国民不能有刀枪入库、放马南山的思想，要紧握手中的枪，随时准备反击来犯之敌。哪有想到有人蓄意篡改他的原意，诬说这是一首影射攻击毛主席的黑诗！他止不住的两行泪从他那苍老浑厚的脸庞上缓缓地流下来。

他痛心地哭了。

这位在枪林弹雨中闯荡过来的刚强铁汉，在他遭受两次党内“左”倾路线迫害，险些丧命时，他也从没有在人前流过泪，这次他竟然痛心地哭了。的确，对这位一贯追随共产党、追随毛主席的忠心耿耿的老人，还有什么诬陷他反对自己的领袖更令他痛心呢？

……

1966年11月4日下午4时，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古大存同志，终于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历程，含恨离开人世，享年69岁。

## 雨过天晴

历史是公正的。“文化大革命”中广州北京路街头贴了大字报，争论“古大存的骨头是红的还是黑的”，周恩来到广州，红卫兵要他回答，他意味深长地说：“古大存的骨头是红是黑，由历史来作结论吧。”

1986年，胡耀邦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在叶剑英同志的悼词中说：“……他在领导广东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同广东省的实际相结合所制定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1983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广东省委1957年《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地方主义反党联盟》一案进行了复查，弄清了真相。大量的事实证明，古大存、冯白驹只是在党内某些方针、政策上以及在处理干部之间的关系上与当时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等人有不同的看法和纷争，这是党所容许的，并没有组成什么联盟来反党，反对广东省委，更没有一个反党集团存在。所谓古、冯地方主义联盟是极左路线的产物，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中纪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广东省委1957年对冯白驹、古大存的处分决定是错误的，应予撤销，恢复他们的名誉。中共中央批准了中纪委的报告，并发出了恢复古大存、冯白驹名誉的通知。通知还指出：“冯白驹、古大存都是我党的老党员，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对党和人民有重大贡献。”

我党是英明伟大的，我党的眼睛是雪亮的。广东人民也是英明伟大的，广东人民的眼睛也是雪亮的！

（王国梁）

# 冯白驹

## 引领大军渡海作战的“探照灯”

### 顺应潮流，力主解放全琼崖

1949年，中国革命形势浩浩荡荡。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性战役，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犹如给东北虎当头棒。

2月至3月，解放军百万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胜利渡过长江。4月23日，解放南京。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对中国22年的统治被推翻。

在琼崖，琼崖纵队由防御转入进攻，从1948年9月至1949年8月，冯白驹指挥发动秋春夏三大攻势，给琼崖国民党守军韩汉英部迎头痛击，横扫敌军如卷席。

“浩浩荡荡”的局势，冯白驹似乎想起海南人民的母亲河南渡江的波涛，浩浩荡荡奔流而去，势不可挡。

1949年4月的五指山区的毛栈村，正值春天。

几只黑亮黑亮的燕子在司令部所在茅草房扑扑翻飞，呢喃



冯白驹

的细语在空中回响；山坡上的野花也睡醒了，只见它们伸伸腰，抬抬头，争先恐后地纵情怒放；成群结队的蜜蜂，呼扇着黄色的翅膀，嗡嗡地忙着采蜜。

24日晨，冯白驹获得南京解放的消息，欢喜若狂。他立即召集琼崖纵队副司令员吴克之、马白山，琼崖区委副书记，琼崖临时人民政府副主席何浚、副政委黄康、参谋长符振中及政治部第一副主任符荣鼎、副主任陈青山，琼崖妇联筹委会主任刘秋菊等到他的住所，召开庆祝南京解放座谈会。

“南京的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死亡，中国人民获得了空前胜利！”

“集中全力迅速歼灭琼崖残匪，解放全琼崖！”这是冯白驹反复强调的主旨，也是冯白驹第一次提出解放全琼崖！

渐渐地，五指山区进入了秋天。

蓝蓝的天，白白的云。

果园里的芒果树，芒果熟了，芒果像一个个胖娃娃挂在枝头，扒开绿叶笑眯眯地往外瞧。

菠萝蜜树上，挂着一个个圆圆的小脸，冲着你点头微笑。

一排排整整齐齐的黄色高粱，宛若持枪列队的仪仗队，昂首挺胸，微笑着欢迎解放军野战部队渡海作战。

按照中央的指示，冯白驹派出琼崖代表马白山、王国兴、李独清和黄大仿，跨过了敌人的层层封锁线，渡海闯关辗转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典礼。

10月1日，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这一天，琼崖党政军领导成员、干部以及黎、苗、汉族群众1000多人，在白沙县的毛栈举行盛大集会，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冯白驹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她宣告了旧中国的灭亡，新中国的诞生。”

“我们要把一切工作做好，配合南下大军，肃清反动势力，完成解放全琼崖！”

庆祝大会后举行宴会，杀猪、杀牛庆祝，冯白驹招呼警卫员端来黎族风味山栏酒，“我提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干杯！”

大家互相碰杯，“干杯！”

夜幕降临，村子里一片劝酒歌，浓香扑鼻，酒不醉人人自醉。欢笑声，热热闹闹。

10月10日，林彪致电中央军委：以四十三军及四十军准备攻琼崖。这是林彪也是第四野战军第一次提出解放琼崖！

这个时候，四野与冯白驹尚未建立直接电台联系。但君子之见略同，冯白驹与林彪准备进攻琼崖的看法是惊人的一致。

10月14日，广州解放。琼崖人民沉醉在愉悦、兴奋中。冯白驹立即命令部队鸣枪庆祝。

15日上午，琼崖党政军民再次举行庆祝广州解放大会。

巍峨庄严的主席台上招展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高悬着毛泽东、朱德两幅巨像，主席台上坐着冯白驹、吴克之、黄康、符振中、符荣鼎、陈青山等党政军领导。

冯白驹作重要讲话。

“广州解放，是人民解放军过琼的前夜了。我们的大军，不久就要渡海了。‘共军过不了海’，这是琼崖反动派在绝望中挣扎的嚎叫。”

冯白驹振臂高呼：“迎接南下大军，解放全琼崖！”

冯白驹讲话一结束，热烈的鼓掌和高呼声响彻五指山的太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毛主席万岁！”

10月17日，毛泽东致电林彪并转叶剑英、陈赓：

广州敌逃跑方向不是向正西入广西，就是向西南入海南岛。我四兵团似应乘胜追击，歼灭逃敌一部或全部，使十五兵团易于攻取海南岛消灭残敌，平定全粤。

10月19日，冯白驹就琼崖的情况向叶剑英等报告：“我们迫切要求兄弟军来琼帮助我们早日完成解放琼崖的任务。”

在此前后，冯白驹领导琼崖军民进行紧张而有序的筹粮和搜索敌军情报。

国民党残敌败逃琼崖后，便疯狂地抢粮。11月2日，冯白驹请示华南分局及中共中央：“如琼崖不早日解放，则琼崖人民必罹巨大灾难，琼崖情况也可能暂时走向恶化。”

“请你们考虑这个情况，在雷州半岛解放后接着布置解放琼崖战争。”

## 敢为人先，率先提出渡海作战方针

时机决定战争成败，方针是实现目标的纲领，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冯白驹考虑解放全琼崖的同时，在10月中旬就开始思考渡海作战的方针问题。作战方针是渡海作战能否取胜的决定性因素，不是一挥而就的，必须经过反

反复复，深思熟虑，才能正确提出。

渡海作战的方针问题考虑基本成熟后，冯白驹征求吴克之、黄康等领导人的意见，“大军怎样过海？是大批过海如一两个军，还是先偷渡过小股部队，如一个营？”

吴克之、黄康面对冯白驹的提问进入沉思。

“如果一次渡过一个军或两个军，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船只，这么短的时间怎么搞到这么多船？一两千条船不是短期能解决的，如果搞不到船只必定会错过战机，特别是到了明年的五月以后刮起北风，那后果不堪设想。”冯白驹中肯分析，“再来是大军大规模过海后，如此众多的人马，食宿怎么解决？”

“是呀！我们总不能让大军露宿风餐，风淋雨晒呀。”黄康右手轻轻抬举眼镜说。

“还有食的问题，秋收后敌人更加疯狂抢掠粮食，造成粮食高度紧张，”冯白驹神情沉稳，“还好在公军粮的抢收和收藏我们行动早了些，但是还不能满足大部队的作战需要，尽管大军也会备上几天的粮食，还是饥不择食。”

吴克之接过话茬，话锋一转，说：“一次过海的人员太多，目标过于集中，一旦暴露，敌机敌舰以及海防部队就会集体火力进行围攻我渡海部队，必造成大伤亡，在我琼纵的接应下，即使能登陆，但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

“综合各方面因素，从琼崖的具体情况考虑，还是采取‘分批偷渡’的方针更好，它可以避免‘集中偷渡’的弊端。”冯白驹总结道。

经大家举手表决，一致同意冯白驹“分批偷渡”的方针构想。冯白驹决定派参谋长符振中，携带海南岛的作战地图、电报密码等偷渡过海，向十五兵团传达琼纵关于渡海作战的建议。

在澄迈县委书记张光兴和马村党支部支委马建台以及地下工作人员马家恕、女商人孙玉梅的帮助下，符振中到达了雷州半岛海岸，并找到了四十军军长韩先楚。

韩先楚见到符振中，眼睛一亮，伸出双手，与符振中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双手瞬间一握，一种内在的激情和真正军人的特有的敏锐，从两位功臣两双圆亮的眼睛里放射出来。它向战士们展现南下大军与琼纵配合作战的序幕！

12 月 18 日，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不顾风寒感冒，亲自草拟给林彪电报：

> 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 3 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自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

毛泽东的渡海作战意图很明确，就是必须集中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的兵力过

海作战。这与前线作战指挥冯白驹、十五兵团和林彪的“分批渡海”方针截然相反。

根据毛泽东的命令，四野司令部决定，以十五兵团的四十军、四十三军，并配属两个炮兵团和部分工兵、通信、防坦克兵共10万余人，组成渡海作战兵团，由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等统一指挥，准备攻占海南岛。

12月下旬，四野第四十军和第四十三军陆续开进雷州半岛集结，第四十军配置于徐闻、海康、合浦一线，第四十三军配置于海安、湛江、阳江一线。

几天后，身在雷州半岛的符振中随韩先楚驱车前往广州，参加于1950年2月1日由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主持召开的海南岛作战会议。与会者有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十二兵团副司令员兼四十军军长韩先楚、政委袁升平，以及北京参加政协会议归来的琼纵副司令员马白山。

在广州的一幢灰色二层小楼里，群英荟萃，战将云集，会议在热烈而庄重的气氛中召开。

符振中用半咸半淡的“海南普通话”汇报琼崖纵队的迎接大军渡海作战的布置情况，叶剑英给他当了一回“翻译”。

“为迎接大军渡海作战，我琼纵部队三个总队兵力重新作调整，一总部署在临高儋县一带；二总部署在文昌琼海；三总部署在南部崖县陵水一带。琼崖群众一听说大军过海，神情振奋，干劲十足，在冯白驹的直接领导下，设立了秘密接应小组输送供应站和固定的情报站，广大人民群众自动成立了慰劳队，筹够了保证大军生活二个月以上的粮款。热情欢迎大军尽快过海，消灭国民党残敌，这是琼崖人民的心声！”符振中向在座首长投向期待与信赖的目光。

符振中望着个子并不高大的兵团副司令韩先楚，流露出一种钦佩的表情，韩先楚示意他按携带的作战图介绍，符振中用小竹竿按住作战图中的木船和机帆沉声说：“敌我作战的态势是，琼纵驻扎在五指山根据地一带，有一定的作战能力，群众基础较为牢固，有即将过海作战的强大大军，但我们的劣势是没有渡海作战的必备武器装备飞机、兵舰。”

“是呀，新中国刚成立，我们还很穷啊！甭说飞机、兵舰，就是机帆船上的发动机也得进口呀！”韩先楚整个身心感到一种沉重，他渐渐提高嗓子，“难怪，林总电告毛主席要兵舰时主席说一艘都没有！看来，渡海作战只能是木船对兵船，这在我军历史上还是头一回——真是大姑娘坐轿呀！”

符振中疑惑地问：“一两个军，没有登陆艇，全靠木船？”

韩先楚拿起木船模型说：“还要一次渡过！你看要多少条木船才够？弹药、干粮要多少？”

符振中接过木船模型，仔细端磨着，他发现韩先楚将军具有过人的胆识、恢宏的气度和刚正坚毅的气质，但他又深感与冯白驹的两条建议尚未吻合，他沉思片刻，诧异道："这样行吗?"

"冯白驹怎么配合?!"韩先楚望着符振中，征询道。

符振中转达了冯白驹同志的两条意见："一是先偷渡一批兵力，加强琼纵的接应力量；二是若这样行不通，就派一批干部和技术人员把枪支弹药运过海，充实琼纵力量，里应外合夹击敌人。"

韩先楚顺应说："好呀，冯白驹的建议，我赞成！尖刀渗透战术，陆战，我们游刃有余，但渡海作战，还是头一回蛮新鲜的，轻举妄动都要不得，我以为分批偷渡成功后还需要主力部队正面强攻，才能解决全岛战斗！"他坐下，抽出一支烟点燃。

叶剑英反复考虑冯白驹的意见，说："是否派小部队偷渡过海?"

突然，洪学智打破沉默，面对叶剑英说："马白山、符振中能带人过海，琼纵还派那么多船过来，我们为什么不能派部队偷渡过去?"

叶剑英的脸上马上露出了笑容，高兴地说："是啊！我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先派小部队过去，是一举两得，既可支援琼崖纵队，又能加强岛上的力量，接应大部队过海。"

"冯白驹先接小部队偷渡是对的，打个里应外合。"赖传珠说。

"这个冯白驹真不简单哪，不愧是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叶剑英赞许说。

这次广州会议最后确定的渡海作战方针是："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

十五兵团马上将会议拟定的作战方针和方案报告四野前委。2 月 10 日，四野前委转报中央军委，也就是上报毛泽东，提议："海南岛作战，我军如一次以一军登陆，则船只问题极难解决。同时又无法对付敌之海空军扰乱。因此，建议在此期间内，先行以小批偷渡办法，到达海南岛后即与冯部会合，打小规模的运动战与游击战，然后大部队再设法渡海。"

2 月 12 日，毛泽东很快复了电："同意四十三军以一个团先行渡海，其他部队陆续分批寻机渡海，此种办法如有效，即可提早解放海南岛。"

关于渡海作战的方针，依次由冯白驹、十五兵团及"四野"首长提出，叶剑英同意，最后由毛泽东批准的。

刚开始，前线指挥员特别是冯白驹提出的渡海作战方针和毛泽东的渡海作战指示大相径庭。毛泽东没有因为冯白驹等人提出的渡海作战方针与其不同而执意要求前线指挥员执行，更没有临阵换将，或给小鞋穿，而是从战争实际情况的变化进行修正。这个决策过程体现了毛泽东作为解放军最高军事统帅的高风亮节。

广州作战会议确定的渡海作战方针和毛泽东的指示，对海南岛战役起了关键

作用。

## 背后杀出琼崖纵队："声东击西，里应外合。"

兵贵神速。渡海作战方针确定后，十五兵团立即电告冯白驹：抓紧当时尚有北风的有利条件，由两个军先以一个加强营兵力，分别向海南岛东西侧实施偷渡。

冯白驹接到十五兵团的电示后，立即向十五兵团和四十军发出电报，提出登陆地点应明确决定，便于琼纵接应配合。

"选择哪里作为登陆点呢？敌人在整个海南岛防御的工事坚固如磐石，怎么办吗？"冯白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形势图前沉思。

敌人正集中主力向我琼西解放区进攻，在儋州的海头港到白马井之间近百里的海岸线上，敌人仅有一个步兵团防守，其中有一个营正在沿海地区加紧修筑工事。建议野战军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向白马井至海头港一带海岸潜渡。准确判断敌情后，冯白驹马上将这一建议分别电报十五兵团和四十军。

经研究，十五兵团采纳了冯白驹的建议，决定先由四十军派出一个加强营，于3月初起航，预定在白马井西南一带海崖岸登陆，电告火速到达冯白驹："立即命令接应部队迅速向白马井一带隐蔽运动，准备接应渡海大军。"

"用兵之要，先择于将臣"，冯白驹深知这其中之真谛。这次接应四十军先锋营，派谁去？冯白驹想到了政治部副主任陈青山。

这是一位血气方刚的归国华侨青年。1941年8月，他与其他爱国华侨一道登上机帆船偷渡琼州海峡，参加琼崖抗日。在琼西地区，他与黎族同胞"歃血为盟"，杀"国贼"，光复黎寨。

接到命令后，陈青山带领电台台长黄运明、报务员夏克光、机要员黄循明和苏梅英，离开总部，向一总队进发。其任务是直接与渡海部队和冯白驹联系。

到达驻扎在屯昌县的藤寨市一总队后，陈青山与一总队队长陈求先、副总队辜汉东、副政委林明组成的琼西接应领导小组，并马上商定接应部队的战斗方案：由黄岐山与九团团长周永吉、副团长羊志诚、政委崔懋峰率该团三个营包围排浦两侧敌人的两个据点，阻击从白马井来援之敌；由八团团长伍向华、政委李恩铭率该团两个营进至新地村南面通往那大、海头的公路交叉地段，警戒从那大、海头出来的敌人；由陈求光率总队警卫连埋伏在新地村，拂晓时直接插到海边接应；指挥部由陈青山和副总队长辜汉东率八团的另一个营留在猛村。

1950年3月5日，四十军一一八师二五二团渡海先锋营799人，木船13只，在师参谋长苟在松、琼纵侦察科长郭壮强、352团团长罗绍福、营长李永康、教导员张仲先率领，从雷州半岛西南端的灯楼角起航出征。

次日中午，渡海先锋营的勇士们终于到达白马井海面，并与敌人展开激烈战

斗。当船距岸 100 多米远时，渡海先锋营的勇士们马上登陆。陈求光率领的接应战士从敌背后奋勇向前冲杀，与海滩上的登陆部队紧密配合，前后夹击守敌，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敌人狼狈溃逃，坚如磐石的薛岳“伯陵防线”终于被撕开了一个缺口。

“顶呱呱！老大哥，辛苦啦！”

“你们也顶呱呱，顶呱呱！”

渡海先锋营的指战员们，和琼崖纵队战士们热烈拥抱着，狂欢着。海滩上一片胜利的欢呼声。

3 月 10 日，四十三军一二八师三八三团一营和配属的团炮兵连、警卫连、侦察连各分队共 1000 名指战员，由团长徐芳春率领琼山县第三区长林栋协助，乘坐 21 条船，离开硇洲岛，向海南岛进发，预定次日在文昌赤水港至铜鼓岭一带海岸登陆。

冯白驹立即命令活动在琼文地区的独立团前往接应登陆部队，并指示文北县委书记叶明华、县长李光邦率干部和民工前往接应。11 日上午 9 时前后，在琼东北的赤水港至铜鼓岭一带登陆。

先锋营在琼东北再次登陆成功，像是给薛岳重重的一记左勾拳，薛岳深感难堪。解放军发电，薛岳也在发电。不过所不同的是，前者是贺电，后者则是催命电。

3 月下旬，两军经过周密准备，发起第二批潜渡。

“这回的登陆地点设在哪？”冯白驹的目光紧盯着地图，不停地吸烟，“我军两个先锋营已在东、西两侧上陆，敌人肯定要加强两侧的防御，阻止我军前进！”冯白驹判断说：“第二批偷渡的地点要改变。”他设想了几个方案：“一是两军各以一个团，分别在琼西北和琼东北登陆；二是两军各以一个营至一个团，分别在琼西北和琼东北登陆。”

“如果登陆点再选择白马井至临高一带的话，由于第一次潜渡后，敌在白马井一线防御已得到加强。如果选择琼东北，薛岳已加强了防御，也不宜。”冯白驹反复进行比较，第一方案明显存在缺陷，如进行多点登陆呢？冯白驹似乎来了灵感，“如两军各以两支部队分别在琼西北和琼北正面两侧、琼东北和琼北东面实施多点登陆。其好处在于，它们之间可以起到战略或战役上的配合，使敌人无力同时对付各方向的登陆，从而使敌渡于奔命。”

“多点登陆还可以分散敌人的兵力，使登陆易于成功。各点登陆能确保即使一些方面受挫，其他方向还是能够成功的。”黄康双手不停地比画着，情绪亢奋。

“多点登陆的缺陷是什么呢？”冯白驹右手托着下腮。

“多点使兵力过于分散，如敌人集中兵力对付我军一部分，然后各个击破我军，我琼纵接应部队兵力又有限，接应不上呢？”吴克之走到地图前说着。

这个晚上，冯白驹与吴克之、黄康研究得很晚很晚，最后确定以两个加强团

偷渡规模，从琼北正面东西侧登陆。

第二天，冯白驹将偷渡构想电告四十军和四十三军渡海作战指挥部。正值，邓华、韩先楚、洪学智和李作鹏也正在研究登陆地点的问题，他们的想法与冯白驹的建议恰好吻合。

3月26日下午7时35分，四十军一一八师加强团，共2937人，乘坐81只船，在刘振华、马白山率领下从雷州半岛灯楼角起渡。冯白驹立即电示第一总队和渡海先锋营接应。次日拂晓，登陆部队在澄迈县玉包港海面成功登陆。

四十军加强团登陆成功，对四十三军加强团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3月31日22时30分，四十三军一二七师一个加强团3733名指战员，乘大小船88只，在师长王东保、政委宋维栻的率领和琼崖党政干部陈说、徐清洲的协助下，从雷州半岛博赊港起渡，冯白驹命令琼纵第一团、独立团和渡海先锋营，共同配合接应。次日拂晓，在琼山县塔市乡的卜创港一带成功登陆。

四十军加强团、四十三军加强团的登陆成功，象征着渡海部队正以排山倒海、势不可挡之势，追击琼崖守敌。

1950年4月10日，十五兵团发出起渡命令，向海南岛发起总攻。

4月16日下午19时30分，四十军6个团，由军长韩先楚等率领，符振中协助，从雷州半岛的灯楼角一带海岸起航，预定次日在临高角一带海岸登陆；四十三军共两个团，由副军长龙书金率领，谢应权等协助，从雷州半岛南端起航，预定次日在澄迈县的玉包港一带海岸登陆。

接到十五兵团接应野战军主力登陆的指示后，冯白驹、吴克之、黄康立即命令五总队队长潘江汉、副政委林豪率六团和四团（欠一个营）占领王五圩，以牵制那大和大成一带的敌人，并切断白马井向东增援之敌，给敌人制造假象：我军将在白马井登陆，使敌人作出错误判断，调集兵力守卫儋县白马井一带。

14日早晨，潘江汉和林豪率五总队主力出现在儋县西海岸，给敌人一个假象：五总队此举是接应在排浦至海头一带海岸登陆的野战军大部队。

蒋军中计了。敌人错误地认为，我军企图向白马井以西海岸展开，接应渡海大军主力登陆。一方面调兵遣将，急忙向王五镇合围。另一方面加强排浦至海头一带海岸的防御力量，从而吸引、牵制了敌军近一个军的兵力，策应了野战军登陆作战。

渡海部队主力于4月16日晚，万船齐发，大举向海南岛进发，17日拂晓，渡海部队在临高、澄迈海岸胜利登陆，突破海岸守军的封锁，向海南岛纵深发展。

4月30日，在琼崖纵队的配合下，四野解放军解放了榆林、三亚，海南岛战役胜利结束，五星红旗插到了“天涯海角”。

（欧大军）

# 王首道

## 他那四化建设的战略眼光令人敬佩

王首道同广东的关系，始于1926年。当时，他在毛泽东举办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4年任交通部部长后，多次南来考察，足迹遍及西江、北江等南粤大地。1964年秋，从交通部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旋即去湖南澧县参加农村“四清”运动，1965年底回到中南局，至1978年夏，在广东工作前后14年。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环境下，他为广东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呕心沥血，尽职尽责，作出了无私的奉献。

### 为稳定祖国南大门不遗余力

1966年“文革”爆发。翌年初，群众组织夺了省委的权，并以批判“崇洋媚外”为由，宣布要停办当年春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这一消息惊动了中央，周总理亲临广州，在珠江宾馆接连几个晚上召集广州地区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开会，苦



王首道同志在读报

口婆心地劝诫他们：广州是祖国的南大门，毗邻港澳，不能搞乱。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不能停办。并且指着在他身边就座的两位地方老干部，向群众组织的头头和与会的军代表宣布：我代表中央，正式提名陈郁同志、王首道同志出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成员，参加革委会筹备工作，共同维护祖国南大门的稳定。

在十年特殊岁月中，王老始终牢记周总理的嘱托，千方百计，为维护广东社会经济秩序，稳定祖国南大门而不遗余力。

## “农讲所是我的引路人”

“文革”初期，广州农讲所的庭院里，经常挤满了男女青年、机关干部或中小学生，他们在这里聆听一位老干部作报告。这位老干部满头银发，身穿一套褪了色的蓝色中山装，脚穿布鞋，神情严肃，他就是王首道。他向青年们讲述自己在毛泽东举办的农讲所学习时，毛泽东向他们授课的情景。那是1926年3月，王首道被党组织派遣，从长沙经武汉转途上海，来到了当时中国国民革命的中心城市——广州，参加广州农讲所学习。其时，在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农民运动如火如荼。为推动全国农村大革命高潮的到来，毛泽东主办了第六届广州农讲所，亲任所长。这一届的教师，有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彭湃、张秋人等中共名人。扩大了招生范围，在全国各地共招收327人，为全国培养农民运动干部。课程既有政治，也有军事，共25门，主要是农民问题以及中国革命各个方面的基本知识。毛泽东亲自主讲《中国农民问题》、《农民教育》、《地理》等课程。特别是《中国农民问题》，是学员们学习的核心内容。农讲所还专程组织学员赴海丰参加农民运动的实习。毛泽东把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形象地比作一座多层的宝塔。“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的“宝塔图”、“反帝说”、“敌友论”、“上品下品论”，给王首道深刻启蒙，为他以后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王首道在农讲所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党小组长，在火红的党旗下庄严宣誓：“服从纪律，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严守机密，永不叛党。”当年9月毕业后被党组织派去湖南祁阳县领导农民运动。

1986年5月，在“纪念毛泽东同志主办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60周

年”活动中，应广东省委邀请，80岁的王首道和第一届至第七届还健在的20余位学员再次欢聚广州农讲所。抚今追昔，感慨万端。他深情地说：“这是我参加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广州农讲所学习的60周年，是我参加革命的60年，也是我参加中国共产党的60年。农讲所是我的引路人。”并挥毫题写：“六旬丰功永在，四化大业将兴。”

## 重视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

省革委会成立后，他分管科教文卫、工青妇等工作，为省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倾其全力。他关心和爱护知识分子，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他们创造工作条件，发挥专业所长。著名眼科专家毛文书、陈耀真，著名防治血吸虫病专家陈心陶，粤剧艺术家红线女等许多专家、学者、艺术家都得到过王老的关怀、保护和帮助。酆云鹤是著名的纺织专家，王老积极支持她进行苎麻变性混纺织布和利用甘蔗渣制人造纤维的研究，还特意把广州绢麻纺织厂定为自己的蹲点单位，经常去厂了解情况。1970年王老提出恢复大学招生，亲自拟定优先招收优秀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招生原则，使广东成为全国第一个在“文革”中恢复9所大学招生的省份。

重视推广农业科技，促进农业发展，是王老经常关注的课题。王老经常深入各级农科院所，同专家们一起研究如何普及农业科技。他每次下农村调研，一定要去当地农科所、种子站、试验田察看。他强调要全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大力推广水稻高产良种，鼓励各地农科所、种子站在海南建立良种培育基地，还多次到海南慰问大陆去的育种科技人员。

1971年冬，全省农业植物保护工作会议在佛冈县召开，他带领会议代表参观该县四九公社群丰大队举办的农业植物保护展览馆，推广他们长期开展农业植物保护、优化品种、除虫灭病的经验。

7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他从惠阳回广州，路过博罗县杨村柑橘场时，听说果场发生大面积病虫害，即刻去现场考察。回广州后，又立即组织中山大学昆虫研究所蒲蛰龙和省农科院吴东江等专家教授，去现场解决防治病虫害问题。后来还责成省农科院及时总结推广蒲蛰龙教授以虫治虫防治柑橘病虫害的经验。

## 重视侨务工作

广东是著名侨乡，又毗邻港澳。“动乱”年代，侨务工作遭受严重干扰，他深感不安。他利用各种机会开展侨务工作，深入台山等著名侨乡，登门拜访侨属，听取他们对清退侨房、兑现侨汇购物、落实华侨捐赠等各项侨务政策的意见

和建议。有关清退侨房所需资金，王老主张由省地县财政拨出，省出大头，专款专用。

在开平参观时，他得知一间由旅美华侨捐建的塑料制品厂，设备和原料都是进口的，由侨属私人经营，办得很成功，便大力宣传这个典型。这在“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动乱年代，这样做要冒风险，但得民心。他还充分利用自己担任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主任的有利条件以及出席全国和省的人大、政协会议的机会，广泛接触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听取他们的意见，宣传侨务政策，鼓励他们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促进侨乡经济发展。由于抓紧落实清退侨房、保护和鼓励侨汇的政策，广大华侨、港澳同胞反应强烈，全省侨汇收入 1978 年近 3 亿美元，相当于 1965 年的 5 倍，占当年全国侨汇总收入的 70%。

## 重视对外开放港口口岸的建设

港澳朋友反映广东对外开放口岸太少，港澳同胞来往内地极为不便。王老很重视这一意见。当时，广东只有罗湖和拱北两个陆上口岸同港澳相通，而增开对外开放口岸的决定权在中央。

粉碎“四人帮”不久，王老向主管港澳事务的廖承志副委员长汇报了港澳朋友的想法，得到廖公的积极支持，并且亲自同香港小轮公司总经理刘定中先生直接连系。在中央、省和香港各有关方面的努力和配合下，不久，趁廖公在广州的机会，刘定中先生亲自驾驶着一艘飞翔水翼船来到了广州黄埔港，邀请廖公和王老登船在珠江口海面游览一番，亲身体验航行中船上的舒适程度。

这次试航成功后不久，1978 年正式开通了广州黄埔港至香港的第一条海上客运直通航线。当时粤港直通火车还没谈成，罗湖口岸是香港同内地的唯一通道，穗港海上直航的开通，无疑对以后加快对外开放口岸建设，促进粤港交流和合作，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之后容奇、中山、九洲、蛇口等客运港口同香港通航，王老都曾亲临视察指导。

## 支持盐田港等港口码头建设

王老任交通部长时，就在老战友陈郁省长陪同下，走遍了广东的西江、北江和珠江流域，关心河道整治，提高抗洪能力。

改革开放后，王老以老交通部部长的慧眼和对广东的深厚情怀，积极支持广东发展港口码头建设。1988 年为珠海斗门港奠基、题字。

深圳盐田港的建设，王老更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盐田港创建早期，为了立项、建设，他排除各种反对意见，为其讲过不少话，写过不少信，批过不少报

告。1982 年底，在盐田港还是一片海滩时，他不仅推荐了交通部水运所苏宁、李德山等几位建港专家参加早期筹建工作，还亲自写信给梁湘书记，把自己的小儿子维柏推荐给了盐田港。1989 年，又将老部下——原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副院长陈大强推荐给李灏书记。为争取尽快立项，他亲自找国家计委、交通部、外经部等有关部门协调，分别向总书记胡耀邦、总理赵紫阳、副总理李鹏等领导人反复说明建设盐田港的重要作用。王老的夫人易纪均大姐和女儿维滨还带着文件资料到李鹏副总理的家里汇报。终于，1986 年得到中央批准立项。1987 年 12 月 14 日，王老专程从北京南来，参加了盐田深水港的奠基典礼。因建港工程缺乏启动资金，1987 年，王老找到交通部部长钱永昌。听完老部长的陈述，钱部长二话不说，当即决定拨款 300 万元以解建港燃眉之急。“因为建设资金不太充足，我建议工程最好分步走，先搞一些起步性工作，进行全面规划，然后分期实施，由小到大。”王老向李灏提出建议。

1991 年初，王老再次视察盐田港后，对盐田港发展成长，很有感慨，亲笔题词：“人间好事自多磨，盐田建港困难多。苦学三论常实践，勤劳总会出成果。”

1994 年王老 88 岁大寿，深圳市副市长朱悦宁应邀聚餐，王老详细询问了盐田港的发展情况，指出一定要抓好营运。朱副市长为表达对王老的敬佩和感激之情，书七律一首，最后两句是：“飞鹏壮志存盐田，更为四化建奇功。”

1996 年王老辞世，李灏去北京花园村王老家吊唁时，怀着十分感慨和难忘的心情对王老的子女说：我刚去深圳市委工作，王老就对我说，一定要排除异议，努力争取国家和有关方面的支持，把盐田港建设好。后来王老多次来深圳，都很关心盐田港的建设。盐田港的发展，凝聚了王老多少心血和智慧啊！老部长、老领导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实在令人敬佩！

## “学大寨，要把农业搞上去，让老百姓得实惠”

广东是农业大省，但是，70 年代农业相当落后。农业学大寨，王老巧做“文章”，当作打农业翻身仗来抓。1969 年冬，王老去肇庆地区检查工作，历时 28 天，走遍各县社。他大讲山区学大寨，一定要把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搞上去，发展工副业，增加农民收入。如何把山区农业搞上去，增加农民收入，他提出要解决 10 个问题，意味深长的是，在当时那个“造反有理”、“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他能够把问题点到实处。如：讲“抓革命，促生产”，他明确要求山区农村要“以革命化带动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山区学大寨，要因地制宜，统筹兼顾，讲求农民实效”，“山区办水利，要因地制宜，小型为主”，“山区农村要大力发展林业，粮林并重，不能一味强调开荒种粮”，“山区农民要发展养

猪，发展工副业，多种经营，增加收入”，等等。

1975 年 8、9 月，王老带领省文教部门领导去大寨考察 8 天，去陕西、天津“农业学大寨”先进县社参观，10 月在北京出席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11 月省委召开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在 4 日下午的总结大会上，新上任的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代表省委作会议总结之前，王老即席讲话，明确指出：去大寨学习 8 天，得到很多启示。农业学大寨，主要靠干，靠科学种田。大寨人说得好：既要讲革命也要大干社会主义，只讲不干不是真正搞社会主义。大寨、昔阳把过去的“三跑田”（土、肥、水）改造成为“三保田”，靠的就是实干和科学种田。王老坚定地说：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号召的。学大寨，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老百姓得到实惠，局势就能稳定，搞形式主义，就是破坏学大寨，影响局势稳定。

1977 年夏，王老率领省地市县主要领导 139 人，赴山东、湖南学习大面积粮食高产和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的经验。在湖南，特地参观了桃源县枫树公社劳模李光庆的大面积水稻高产试验田，学习他长期从事水稻杂交高产研究的经验。李劳模的研究目标是“人过七十，粮过三千”。王老去参观的那年，李劳模已 72 岁，水稻亩产达 3403 斤。这年秋，省委决定大种冬小麦，把冬种当做一造来抓。王老多次亲临南海、中山、东莞等 6 县现场，指导落实珠江三角洲百万亩冬小麦的种植。在王老的推动下，山东、湖南大办农业、创粮食高产的经验很快在南粤农村开花结果。

## 身处逆境，坚定信念

王老在广东经历了“文革”整个过程。他最早站出来参加“三结合”，对比其他许多长期被关在“牛棚”、“靠边站”的老干部来说，王老可算是幸运者。但他长期处在“文革”大逆境中，面对着许多倒行逆施、是非颠倒，王老深感迷惘、苦恼、焦虑。然而他坚信，一个老共产党员，要在逆境中坚定信念，相信真理。如同自己 1933 年被错误撤销湘赣省委书记一样，身处逆境不气馁。在十年“动乱”中，他不计个人荣辱，不怕困难挫折，讲究斗争策略，注意工作方法，为广东的安定团结、经济发展而呕心沥血。

面对林彪、“四人帮”的祸国殃民，王老内心既愤慨又焦虑。有人篡改历史，说毛林井冈山会师，王老内心非常愤慨！“9·13”事件发生，王老很快知情，因为当时广东处于极端复杂的情况下，周总理向他和陈郁第一时间打了招呼。我至今还清楚记得，9 月 14 日那天，陈老来到王老家，在王老的睡房兼办公室，闭门谈话，整整一个上午没有出门，我和警卫员不敢上楼惊动首长。9 月 21 日，“9·13”事件还属高度保密的时候，王老到从化温泉宾馆，向正在疗养的陈伯

钧、周士第、陈奇涵、熊伯滔、叶司令等老将军透露了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消息，他们怀着既震惊又愤慨的心情揭露控诉了林彪的许多罪行。陈伯钧讲了林彪在平型关战役中被阎锡山部下误枪打伤的真实情况，熊伯滔控诉了林彪对他长期迫害的情形。“9·13”事件使他们更加坚信毛主席和党中央。

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举国上下万分悲痛，省委在旧礼堂设灵堂悼念。“四人帮”控制下的“中央办公厅”却发电报通知各省市不设灵堂，已设的要撤掉。王老接看来电，悲愤交加，指示省委办公厅，不传达，不撤灵堂，也不组织，让干部群众自发地参加悼念活动。

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没过几天，王老奉召上京出席中央“打招呼”会议，抵京当晚就被接上西山叶帅家，同叶帅等领导人喝茅台酒，以此表达其无比振奋和万分感慨的情怀。

对改革开放、特区建设，王老坚定不移地支持。1982年广东的改革开放、特区建设面临很大压力，有人甚至提出指责：特区已经资本主义化了。3月，王老到深圳、珠海特区考察，所见所闻，令他非常兴奋。他坚定地指出：这是一条富国富民的光辉大道。回京后，写了题为《希望之路》的调查报告，旗帜鲜明地指出：短短3年的特区实践，证明中央确定的开放政策和办经济特区的决策是必要的、正确的。试办经济特区是中央给予广东有关对外开放的特殊政策与灵活措施，吸收外资、引起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是经济特区对外开放的一种特殊方式。特区获得一定的条件，可以发挥一般对外经济活动所不能发挥的作用，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经济特区的这种地位和作用，不单直接为特区本身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间接地支援了内地的经济发展，促进了对内联合，体现了特区与内地经济发展中的相辅相成关系。

以后，王老几乎每年都要南来广东感受改革开放的春风。1988年1月，82岁的王老考察了中山、顺德、斗门、珠海等地。这些市县，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王老经常来，情况很熟悉。看到改革开放的累累硕果，王老赞不绝口。

1月18日，王老给顺德县委、县政府题词：“岁逢戊辰，龙腾虎跃；四虎齐奔，顺德最俏。”在顺德一家合资的灯饰厂参观时，王老进入样品展览厅，听着介绍，欣赏着琳琅满目的各色灯饰，情不自禁地流露出非常满意的欢笑。我抓住这一瞬间，赶紧按下了相机快门，为王老摄下了一帧特写照片，王老非常满意，认为是他许多个人照片中最珍爱的三帧照片之一。此照后刊印于《王首道传》封面和《王首道文集》扉页，她真实地记录了王老对祖国改革开放、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满怀信心的崇高理念和远大胸怀，也真实地记录了我对老首长的深切怀念。

（孙铁钟）

# 李坚真

## 毛泽东赞她“不简单”

毛泽东1930年6月入闽时，向闽西特委领导人张鼎丞提出要见一个人，此人便是李坚真，中央苏区第一位女县委书记。她人长得高挑清秀，却以泼辣能干闻名——带兵打仗，进山剿匪，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堪称女中豪杰。一见面，毛泽东紧紧地握着她的手，称赞道：“你这个女同志不简单啊！”

李坚真1907年出生于广东省丰顺县山区一个贫苦农家，19岁时，受“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的影响投身革命。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她由一个童养媳成长为叱咤风云的女县委书记、中央局妇女部部长、中共粤中区委第一书记，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32位女红军战士之一。上世纪50年代初，李坚真随叶剑英返回广东工作，先后担任广东省监察委员会书记、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这个“不简单”的女同志，在南粤继续干出了“不简单”的业绩，被誉为“华夏女杰”。

## 唱着山歌干革命的客家女子

与丰顺县贫困山区绝大多数女性一样，李坚真也没能摆脱做童养媳的悲惨命运。出世8个月时，她被作价8吊钱，卖给了一个朱姓穷苦人家，由媒人抱着拜天地“成亲”。李坚真从小勤劳聪慧，在田间劳作时，跟乡亲们学会了唱客家山歌；接送“小叔子”上私塾读书时，在窗外“偷”学了一点文化。

参加革命后，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李坚真发挥她擅唱山歌的特长，将革命道理编成山歌唱起来。在一唱一和中，群众的觉悟提高了，踊跃参加农会。有一次开大会，李坚真给群众讲话，后面的人看不到她，便喊她站高一点，她见身边有一张桌子，便蹬了上去。讲话结束时她唱了一首山歌：

担子担起来呀！
担起团团圆哪！
建立呀！苏维埃！
穷人有靠山哟……

这支山歌歌词简单易懂，旋律铿锵有力，深受农民喜爱，后被广为传唱，成为当地游击队的队歌。李坚真的歌声未落，便赢得热烈的掌声。但细心的李坚真依稀听到有人在喊“俏货！俏货！”（即“骚货”之意）。循声望去，她看到叔婆正瞪着双眼骂她呢。原来，迷信的叔婆认为自家的八仙桌被女人踩了，会把桌神赶跑。大会结束后，李坚真诚恳地向叔婆道歉，得到了老人的谅解。

有一次，国民党部队扫荡马图村，把革命群众的房屋付之一炬。看到家园只剩下断墙残垣，许多群众哭了。李坚真忍着泪，反复吟唱一首山歌：

唔使气来唔使愁，
自有云开见日头！
等到革命成功日，
烂屋烧了盖洋楼！

曲调由开始时的低沉悲壮，逐渐转为激昂高亢。群众从她的歌声中，感受到了希望、勇气和信心，纷纷抹去泪水，跟着她哼唱起来。

凭着山歌开路，李坚真把群众工作做得有声有色。1929年冬，张鼎丞到饶和埔中心县委视察工作，发现了这位“很会做群众工作”的女同志，把她调到闽粤赣特委工作。由于工作出色，李坚真被任命为长汀县委书记，成为中央苏区第

一个女县委书记。

1934 年 10 月，李坚真参加长征。在艰苦卓绝、九死一生的征途中，李坚真一路以山歌鞭策自己、激励战友，“爱唱山歌的客家妹子”成为红军战士们喜爱和尊敬的人。

1950 年，李坚真担任广东省土改工作团总团长兼党组书记。这个会唱山歌的女领导，时常抽出时间和农民一起对唱山歌，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土改的意义和党的政策，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山歌向来被视为“下里巴人”，不能登大雅之堂，可李坚真从来不掩饰对它的喜爱。即使后来身居高位，只要有适当的机会，她也还是要唱上几句。晚年身患癌症饱受病痛折磨时，她总是哼唱山歌为自己提神鼓劲。在人们的眼中，她既是身经百战的红军女战士、德高望重的高级领导干部，也是一位爱唱山歌的朴实可亲的客家女子。

## 敢说实话的“工农干部”

李坚真从不讳言自己是“工农干部”，无论地位有多高，她“工农干部”耿直坦率、敢说实话的“真”品性始终不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李坚真主管广东省的监察工作。某地搞“四清”运动，制定了“四清”队员不能吃肉的规定。李坚真出差刚好到了那个地方，听说有人因为和“三同户”一起吃肉而受到处分，觉得这种做法不妥，便向当地领导指出：“如果‘三同户’吃肉，而‘四清’队员偏不肯吃，这岂不是脱离群众不近人情？我认为，只要和‘三同户’吃一样的饭菜，没有搞特殊化，就不应该给予处分。”

得知有的地方对敌情估计过重，把一些无辜的人也当成坏人抓了起来，李坚真说：“我们的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哪有那么多坏人！对干部队伍要有个基本的估计。”有人提出，没有参加过“四清”的人没资格办案。李坚真明确表示反对，她说：“如果那样，连我这个监委书记也不能办案了！我们还是要按党章、按宪法办事。”

在那样一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李坚真个人的力量虽然无法扼制“左”的倾向，但她仗义执言，敢说真话和公道话，对纠正“左”的思想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也保护了一些干部。

有一位老干部向她状告广州市一位领导，说这个领导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影射批评他，心中愤愤不平。李坚真很重视，立即找来那位领导的讲话稿，从头到尾认真阅读了一遍，然后请来了那位老干部，很坦率地对他说：“讲话稿我看过了，他说得没有错啊！你看，他说我们老干部应关心爱护青年干部，要老马识途，不



李坚真

要做老狗挡道。难道我们应当老狗挡道?”通过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这个老干部消除了误会，解开了“心结”。

1958 年，广东同全国一样，开展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严重泛滥起来，一些地方虚报粮食产量亩产 5000 斤甚至上万斤。李坚真从小在田里耕种，知道这是不大可能的事情，而且她也知道虚报的后果将是多么严重。为了弄清真相，她特制了一根刻有尺度的手杖，跑了七个县，亲自到稻田里丈量和计算。在证实了自己的判断后，她逆潮流而行，在一片浮夸声中大胆地向省委报告：粮食产量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

李坚真说话做事干脆利落，从不拖泥带水，更不矫揉造作。上世纪 60 年代初，她召集一个会议，有一位同志就会议讨论的问题发了言，李坚真一听，觉得他讲得很好、很全面，立即表态：“他的意见正是我想讲的意见，他的这个发言可以当作我的发言。”省去了这种会议通常不可缺少的环节——领导长篇大论的总结性发言。

李坚真有一位下属，在起草文件时，曾写过学习毛主席著作要“着重领会精神实质”，“不能仅死记只言片语”等句子。“文革”爆发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揭发他攻击主张“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林副主席，要将他打成“反革命”，并责令李坚真命此人停职。李坚真说：“他起草的文件是经领导同意的，怎么能叫他一个人负这个责任!”由于拒不处理那位同志，李坚真被戴上“包庇三反分子”的罪名受到批判，那位同志则被勒令清扫省委大院。有一天，他们两人在大院内偶遇，李坚真在与他擦肩而过的一刹那，突然左眼一眯，下巴往上一抬，做了一个滑稽可笑的鬼脸，以无声的语言跟他打招呼，送去了安慰和支持。

由于李坚真敢于坚持原则、实话实说，“文革”中没少挨批斗。在一次批斗会上，有人要给她一点“教训”，趁她站起来说话时悄悄把凳子抽走，结果她往下一坐，重重跌落在地，摔成脑震荡。后来病是治好了，但敢说真话的“毛病”却一点也没有改。

## “不是亲妈胜似亲妈”

1935 年冬，参加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李坚真与战友邓振询结婚了。邓振询是江西省兴国县人，先后担任过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兼劳动部部长、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苏南区党委书记等职。1943 年 8 月，在苏南横山地区反击日伪“扫荡”的战斗中不幸牺牲。

李坚真和邓振询未生育孩子，但邓振询在老家时曾有过一段婚姻，育有一子。邓振询的前妻 1929 年被国民党飞机炸弹炸死，死时儿子邓东林不满一岁，与爷爷奶奶相依为命。谁知祸不单行，东林染上了天花，好不容易活下来，不久爷爷死了，接着奶奶又死了，东林从小投亲靠友、饱尝艰辛。

1949 年 6 月家乡解放，东林辗转打听，联系上了邓振询生前的亲密战友刘少奇。刘少奇回信告诉他：你的父亲已经牺牲，但你有一个妈妈叫李坚真，你可以写信给上海副市长曾山，请他将信转交给李坚真。东林立即写信给李坚真，李坚真很快给他回了信。

1951 年 8 月，奉调广州不久的李坚真把东林接到了身边。见东林脸黄肌瘦，李坚真想方设法为他增加营养。过了一段时间后，东林还是那个样子，李坚真便把他叫到跟前，问：“东林啊，是不是想家？想家的话，我就买些你想要的东西，让你带回家？”东林说：“妈妈对我那么好，我不想回家。”李坚真说：“是不是身体有什么毛病呢？做个检查吧？”东林去做了体检，没发现有毛病，李坚真笑逐颜开，说：“那好！正巧南方大学就要开学了，帮你报个名吧？学好文化，有了真才实学，才能继承父亲的革命遗志，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从小失去母亲的东林感受到了浓浓的母爱，心中洋溢着幸福的暖流。

邓振询牺牲时留下五件遗物：怀表、手表、私章、饭盒、驳壳枪，李坚真走南闯北一直小心保存着。东林接到南方大学录取通知后，李坚真对他说：“你爸爸牺牲时没留下什么财产，只有五件遗物。枪是组织留给我保管使用的，私章和怀表，我想应该交给你保管了！”还郑重其事地送给他一张旧毛毯，说：“东林啊，这张毛毯，是长征时我们八姐妹共用的。”在校学习期间，每逢天气变凉，李坚真总不忘托人给东林送去衣服。

东林从南方大学毕业时，李坚真与他长谈，讲了毛泽东要求从苏联回国的毛岸英去当农民的故事。说：“东林啊，你工作的问题只能由组织来安排，一切都要靠你自己努力，千万不要靠老子的影响和靠妈妈吃饭。”李坚真还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带东林到广东造纸厂和广州氮肥厂参观，让他体验工人的辛劳。

1952 年底，东林被分配到省总工会工作，翌年，被派赴潮梅矿务局平岭锡矿，当工人文化速成班教员。东林毫无怨言地离开省城到了偏僻的矿山，学习工

作都非常努力，先后被评为全省、全国工会工作积极分子，还赴北京参加了表彰大会。李坚真鼓励他说："你做得好！但有了成绩可不能骄傲啊！"

东林心甘情愿地做革命的"螺丝钉"，先后被派往揭阳、从化、惠阳、丰顺、肇庆、广州等地工作。但无论他在哪里，李坚真的心总是记挂着他。结婚时，李坚真亲自为他选购结婚用品；妻子生孩子时，李坚真寄去小孩用品和钱。东林感慨万分："我的妈妈，不是亲妈胜似亲妈！"

## 关注"小乞丐"的"大人物"

1969年夏，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进行中。有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独自一人在破旧的大货车上颠簸了十几个小时，从粤东山区大埔县来到广州。他穿一件背心，光着脚丫，痴痴地在省委门前守了三天三夜，目的只有一个：见"大人物"！谁是"大人物"？怎样才能见到"大人物"？他全都不知道，他只知道父亲是勤奋工作的"南下干部"，却在一夜之间被打成"叛徒"、"特务"，被拉去批斗、游街不说，还被关进了牛棚。妈妈跟着也被停了职，家中没了任何经济来源。在沉重的打击下，妈妈病倒了，接着又瘫痪在床，曾经幸福温暖的家转眼间土崩瓦解。他觉得自己是个男子汉，在这个时候应该挺身而出，为父亲讨个说法。

第三天傍晚，一个身材高大的奶奶忽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奶奶温和地问他："孩子，你叫什么名字，有什么事？"小男孩说："我叫云立，我要为父亲上访申诉！"奶奶一听，对身边的一个叔叔说："请你带他去洗个澡，吃晚饭，然后让他来我办公室一趟。"独自"流浪"了三天的云立此时已是污头垢面、饥肠辘辘，活脱脱一个"小乞丐"的模样，奶奶几句温暖的话让他热泪盈眶。他跟随叔叔进了省委大院，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再到机关食堂如狼似虎地吃下两份饭菜，把小肚子撑得圆滚滚的，才来到了奶奶的办公室。奶奶详细地询问了他父亲的情况后说："你带有材料来吗？"云立说"有！"奶奶和颜悦色地对他说："小弟弟，你把材料放下来，安心回去吧，你父亲的事情，要相信党、相信组织，问题是会得到解决的。"云立感觉到这个慈祥的奶奶一定是个"大人物"，对她充满了信任，便爽快地答应回家。

云立眼前的这个"大人物"正是李坚真。其实，李坚真"文革"一开始就受到冲击，此时早已"靠边站"了。

李坚真自己掏钱，给足了云立回家的费用，并吩咐那个叔叔负责照顾他，把他送到汽车站。云立上车前，叔叔问他："你知道接待你的那位领导是谁吗？"云立说："不知道。"叔叔说："她就是省里的领导李坚真！"

云立牢牢地记住了"李坚真"这个名字，回家后告诉了妈妈。妈妈似乎看到

了希望，身体居然逐渐好了起来，慢慢地竟能够站立、行走了。第二年，妈妈来到了广州，也幸运地见到了李坚真，之后还和李坚真通过信。正是李坚真的鼓励、安慰和支持，让云立一家度过了那段痛苦难熬的岁月，等到了“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的好消息，盼来了父亲平反并补发10余年工资的大喜讯。

## 敢作敢为的“当家人”

1950年10月，李坚真奉命率领1500多人，分别到兴宁、揭阳、龙川三个县搞土改试点。她坚决贯彻党的土改政策，对广东一些特殊问题的处理，她既坚持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比如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对工商业者的政策、民主人士和起义人员的问题等等，她在请示华南分局同意后，都作了比较合理而稳妥的处理，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有一次，兴宁县土改工作队员发现，有些国民党起义人员在祖屋里存放有枪支弹药。一些工作队员神经高度紧张起来，主张立即把这些人抓回来批斗。李坚真听取汇报后未轻率表态，而是领着大家到群众中去深入了解情况，得悉这些武器是起义人员在起义前留下的，情况比较特殊。于是，李坚真果断拍板：坚持执行党有关起义人员的政策，不予追究。

1978年4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的李坚真兼任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在任5年，是“文革”结束后广东的第一位纪委书记。在省委的领导下，她带领纪检队伍啃下了四块“硬骨头”：一是组织清查与两案（林彪、“四人帮”案）有牵连的人和事，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应当处理的人。全省受处理的人，没有一个进行过申诉。二是平反冤假错案。全省先后约有20万人的问题得到解决，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对广东地区影响很大的所谓“广东地下党”冤案重新作了审查，对“文化大革命”中制造的冤假错案全部作出结论，给有关人员平反昭雪并作出妥善处置；对“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历史遗留问题，主要是50年代广东两次反“地方主义”、反“右倾”问题以及华侨房屋被挤占问题等，也作出了较为妥善的处理。三是协助省委狠杀不正之风。改革开放之初，广东出现了党员干部利用职权送子女到港澳地区、在住房问题上以权谋私等现象，李坚真不怕得罪人，秉公办案，查处了1100多宗违纪违法案件。四是担任广东省“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斗争领导小组”组长，狠狠打击在改革开放之初出现的严重经济犯罪，查处走私贩私大案，使包括原海丰县委书记王仲在内的一批违法犯罪的党员干部受到法律的制裁。

1979年12月，李坚真当选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人大“开张”之初，人员和经费奇缺，没有办公地点，租用了省政府招待所的几个房间办公，人大的牌子都没有地方挂。为尽快让省人大“运转”起来，李坚真一样一样去“争”。

当得知某部队招待所闲置无人使用时，李坚真要求将招待所划归省人大作为办公用房，但遭到拒绝。她不气馁，通过各种渠道坚持不懈地做疏通工作，终于在1981年6月“争”到招待所一半多的地盘。初时省人大办公经费只有28万元，定编60人，到位的只有12人，无法保证正常工作的需要。李坚真多方奔走，终使省人大机关定编为100人，后又增至120人，1981年省财政拨款200万元。在李坚真的领导下，省人大各方面的工作迅速步入正轨，真正发挥出权力机关的作用，为促进广东的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 老区群众的贴心人

海拔1560米的铜鼓嶂是粤东第一名山，李坚真在山下出生、成长，并开始其革命生涯，得到过当地群众无私的帮助。建国后，李坚真多次回去看望乡亲们。她曾对身边的同志说起过这样一个故事：1928年2月，她率领农军配合工农革命军发动潘田年关大暴动，在战斗中左腿中弹负伤，被乡亲们秘密护送到铜鼓嶂一个叫七仙岩洞的山洞里疗伤，一同疗伤的还有30多位伤员。他们的食物、药物和护理全都依靠山下铜山村的群众。国民党当局探听到消息后，连续三次进铜山村围剿，烧杀抢掠，抓了8个护理过农军和革命军伤员的群众，对他们严刑



1949年3月25日，全国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期间，李坚真在北平西苑机场迎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

拷打，威逼他们说出七仙洞所在地，但均被严词拒绝，8 个群众全被杀害。

1973 年冬，李坚真回到故乡看望乡亲们，中午在公社饭堂吃饭。她对公社干部说："请帮我找一个人，名叫朱俊明，把他请来一起吃饭。"人们有些奇怪，一个省委书记，为何邀请一名普通群众吃饭？后来才知道，朱俊明也是李坚真的救命恩人。早年她在家乡从事革命斗争，反动派对她又怕又恨。有一天，十几个团丁荷枪实弹前来捉拿李坚真，经过一个小食店时，一位顾客问熟悉的团丁去干什么，团丁小声说："捉李见珍（李坚真原名）！"恰巧在一旁的朱明俊听到了这句话，他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开，甩开团丁后一路狂奔，迅速把消息告诉了正在村子里做工作的李坚真。李坚真不慌不忙，找来一条产妇用的围巾把脑袋裹个严实，顺手抓过一个竹篮子，里面放一些婴儿换下来的屎尿布和衣服，扮作刚生完孩子的产妇去溪边洗衣服。刚走到村口，迎面碰上了那伙团丁，团丁们捂着鼻闪开，李坚真淡定自若地离开村子，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

1980 年，铜鼓嶂下一个名叫简炳秋的大队党支书跑去找公社领导，说想去省城拜见省委书记李坚真。他说："乡亲们生活实在太困难了！李坚真心里有我们老区人，又见多识广，或许能帮我们想个办法。"公社领导觉得有些为难，不置可否。有些人听说了这件事，便取笑简炳秋："你一个农民，想见省委书记？真是天大的笑话！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简炳秋一听，偏就要做一回"癞蛤蟆"了。他四处打听，还真的联系上了李坚真，她还邀请他到家中做客呢！这让他喜出望外。

简炳秋原以为省委书记家里的摆设一定非比寻常，没想到进门一看，竟跟普通人家没什么两样——一张旧桌子，几把旧椅子，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吃的也和平常人家一个样。李坚真和颜悦色地问："有什么要求吗？"简炳秋说："乡亲们吃不饱。想多打粮，没有化肥，很难。"李坚真把他的话记在了心里。没多久，帮忙落实了 20 吨化肥。简炳秋把化肥分到各家各户，并积极落实大包干责任制，粮食连续几年大丰收，吃饭问题解决了。接着他又组织乡亲们修路、建电站和学校，大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李坚真对老区人民关爱有加，对自己的亲属却显得有些"冷酷无情"。她的家庭是革命家庭，许多亲人对革命有过贡献。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将她家的房子烧了，建国后才重新将老屋修建起来。1969 年，她的兄弟到广州告诉她，老屋已破旧不堪，看能不能在支持老区建设的资金中适当照顾一点钱，用于房屋修缮。李坚真说："不行！这钱是建设老区的专款，一分都不能动。"1986 年，台风将她侄子家的房子吹坏了，侄子想请她跟县里说句话，弄点钱修补房子，可李坚真还是那句话："不行！要靠自己！"

有一次，李坚真回丰顺检查工作，她老家所在公社的领导得知她要回家看看，便从公社民政救灾款中拨出 400 元，用于修建她家破烂不堪的老屋。李坚真

得知消息后，脸色大变，非常生气，说："你们知不知道，救灾款是国家专项开支，任何人都不能随便挪用？这是一条铁的纪律！你们在我回家时，拿我开刀，打着我家特殊困难旗号，以我的特殊身份搞特殊，随便开支动用救灾款，这是违反政策、破坏纪律的坏先例。哪怕我家无屋住，亲属至今仍住茅草房，我也感到光荣。你们必须马上纠正错误，将这笔钱收回来！"在她的坚持下，公社领导立即派人把这笔救灾款收了回去。

李坚真的一个侄子有一回和县里某局的领导到广州办事，买了一些家乡的土特产作礼物，登门拜访李坚真。看到他们手中的礼物，李坚真又生气了，她深知老区目前仍很困难，每一分钱都应该用到刀刃上才对。她严厉地批评侄子说："你们这不是用公款买来的东西吗？用公款请客送礼，你们不知道是犯错误吗?!"侄子和某局领导被说得面红耳赤。李坚真坚持让家人拿钱还给侄子，说："下次来，不能这样！"侄子不敢违命，只得把钱收下。打这以后，家乡人去看望她时，再也不敢带礼物了。

（游慧冰）

# 改革风云篇



# 邓小平

## 他十八次莅粤，编创了中国春天的故事

邓小平一生中曾18次来广东，解放前3次，解放后15次（含改革开放后来的5次）。他编创了中国春天的故事，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 冬梅绽放布馨香

1930年春，中央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的总起义和全国红军向中心城市总进攻的“左”倾冒险计划，并于当年10月2日派南方局代表邓岗（邓拔奇）来广西红七军传达。红七军主要领导人邓小平、韦拔群、张云逸等人对此怀疑，雷经天还为此被撤销一切职务及开除党籍。随即，“左”倾路线在红七军中得到贯彻执行。

11月10日，红七军主力两个师共7000余人离开河池县，之后在两个多月的军事征程中连遭挫折，非但没有攻下一座大城市，全军还减员2/5，整个部队情绪低落。

1931年1月3日，邓小平在全州关岳庙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决定放弃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部队转移至广东小北江一带建立根据地。会后，邓岗、陈豪人离开部队，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邓小平开始主持红七军工作。他首先对部队进行整编，将原两个师四个团缩编为三个团，改变硬打攻坚战略，从而扭转了危局，完成红七军历史上生死攸关的重大转折。

1月5日，红七军由全州出发，经道州、江华、贺县，在粤桂湘边三省交界处的鹰扬关进入广东，并于1931年1月19日抵达连县县城，接着于2月1日抵达乐昌县梅花圩。

当午，邓小平听取了乐昌县委宣传部部长谷子元的汇报及传达去年9月下旬在上海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得知中央已纠正攻打大城市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鉴于革命形势的变化，邓小平召开前委会议。会议决定，红七军重新整编，将全军三千余人缩编为五十五和五十八两个团，军师首长兼任团营指挥员。在部队休整期间，大力发动群众，实现开辟小北江根据地的任务。

正在这时，侦察员来报，国民党粤军邓辉一个团从连（县）宜（章）方向追踪而来，前委决定给尾追之敌以迎头痛击，以此打开被动局面。随即，红七军立即派员观测地形，修筑工事，开展群众宣传工作，拨出部分枪支武装群众，并于次日上午召开军民动员大会。

2月3日午后，战斗首先在五十五团阵地打响。敌军前卫部队控制了一个制高点，掩护两侧敌军向我方进攻。警卫连政委王天、连长覃亮之勇敢指挥，打退敌人一次次进攻。随后，李天佑带领的特务连也及时赶到增援，顽强坚守阵地。

下午五时，从湖南宜章赶来的湘军第十九师唐伯寅团及陈龙团（郴县、宜章的部分地主武装）联合粤军围攻红七军，由老坪石方向经西仙桥直奔梅花圩。敌军增援部队一到，立即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这时，红七军领导才得知，我军侦查的敌情报告有误，敌军不是一个团，而是三个团，人数有近万人。

在激战当中，军长张云逸亲临前沿指挥，他命令集中所有火力掩护一、二营从左右两侧穿插增援，并连续击退敌人的六次进攻。

邓小平政委、李明瑞总指挥也亲临前线，参加了五十八团的作战指挥。为减轻正面压力，李明瑞命令李显营长迂回敌后反击，不料却与偷袭的大股敌军相遇，双方展开激烈的遭遇战。一营虽坚守住了阵地，但伤亡惨重。

经过五个小时的激战，红七军前委经认真分析，红军如继续坚守，非但不能打退敌人的进攻，甚至有可能遭受全军覆灭的危险。这时，邓小平等领导果断决定，立即撤离战场，并于当晚十时撤到大坪村杨家寨宿营。邓小平立即召开前委会议，决定放弃在小北江建立根据地的计划，部队迅速离开粤北，前往江西与中央红军汇合。前委还重新调整了干部。

梅花一战，敌军伤亡1000余人，但红七军也伤亡700余人，除李谦、章健等牺牲外，团长龚楚（原师长）、营长袁也烈（原团长）等均负重伤。邓小平在《七军工作报告》中所写："全军干部损失过半，真令人痛哭。"以至于六十多年后的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不无感慨地说："我戎马一生，打过不少漂亮仗，但梅花一役，却是我参与指挥的战斗中损失最惨重的一仗。"

2月5日上午9时，红七军向东转移，奔赴至乐昌县长垅村（今长来镇）强渡武江，由于缺乏警惕，招致驻守乐昌粤军两个团的阻击。已经渡过江的五十五团及部分五十八团部队由邓小平、李明瑞率领，仓促之中只能与敌展开激战。五十八团见渡口已被敌军占领，在渡江无望的情况下，其主力五六百人由张云逸率领，立即撤回到黄坪洞。

当晚，已渡过武江的红七军在仁化县石塘村宿营。该部随后翻越过大庾山，于2月10日在江西省崇义县与当地游击队汇合，并与县委取得联系，随后攻下崇义县城。不久，邓小平离开红七军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张云逸率领的五十八团，以后在乐昌县北面约九十华里的罗家渡越过武江。该部经艰难跋涉，于三四月间，在江西省永新县与先期到达的五十五团重新会合。

同年7月，红七军在转战近7000华里后，途经桂、湘、粤、赣4个省，历时10个月，英勇顽强地战胜了敌人多次围追堵截，终于在江西省于都县桥头圩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之后，红七军保留下的2000余人，被编入红三军团建制。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他在闭幕大会上亲手将绣有"转战千里"的锦旗授予红七军，以此表彰红七军指战员的卓著功勋。

## 改革开放燃星火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顿时举国欢腾，人们都翘首企盼一个新时期的到来。但是，这种企盼却迟迟未能见到。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学习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正式提出"两个凡是"。

1977年夏，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他开始沉思，如何打破这一僵局……

1977年11月11日，邓小平乘专列抵达广州。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也于11月11日由北京乘专机飞抵广州。

邓小平在广州与叶剑英多次密谈交换意见，他还批示了多份中央文件，并同叶剑英一道主持过两三次会议。17日下午及18日上午，邓小平在苏振华、罗瑞卿、梁必业等人陪同下，分别听取广东省委负责人韦国清、王首道、焦林义、李坚真及广州军区负责人许世友、向仲华等人的汇报，并发表谈话；18日下午，

邓小平、叶剑英等在珠江宾馆一号楼前广场接见了广东省、广州市局级以上和广州驻军师职以上干部共1800余人。在此期间，叶剑英还先后同许世友、韦国清、苏振华、罗瑞卿、姚依林、梁必业等人谈话。

11月20日及12月3日，邓小平和叶剑英分别乘飞机返回北京，他们又开始新举措的筹划。

邓小平这次南方视察的主要成果，概括起来有如下内容：

（1）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把党的中心工作转到经济建设上来。

邓小平在谈话中比较全面地谈到了发展工业、农业、旅游、外贸，认为抓好生产，解决好群众的生活，可以解决许多问题。现在提以揭批“四人帮”为纲还可以，但这是暂时的，很快就要转，要结束这一提法，要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今后不能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口号了。

（2）要解决“三农”问题。

邓小平在谈话中多次提到“三农”问题，涉及了农业生产方式、分配制度、农民负担等。他的谈话精神为以后农村率先改革及鼓励农民的首创精神提供了理论支撑。

（3）政策是关键。

邓小平在听取汇报时谈得最多的就是政策问题，指出：“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这也是个全国性的问题。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可以恢复的就恢复，不要等中央。”他还希望广东能“先走一步”，即“看准了的”可以“不要等中央”。针对边防部队防止不了偷渡逃港问题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

（4）要抓紧平反冤假错案。

邓小平针对金敬迈要求落实政策问题时指出：“你们要查一查。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四人帮’打倒了，政策到现在还没有落实。”在邓小平等人建议下，1977年12月10日，中央任命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全国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终于有了实质性的开端。1978年4月，中央批准摘掉全部右派分子的帽子，并随之开展改正错划“右派分子”工作。11月14日，宣布为四五清明节悼念周总理事件平反。以后，又为彭德怀、陶铸平反，直至为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平反。随之，其他的冤假错案的平反也就迎刃而解了。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的第一次外出巡视便是广州。在这次巡视中，他开始产生了改革开放思想的雏形，提出了许多前瞻性观点，实际上点燃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把火。紧接着，小平又在四川和东北点了两把火。1978年5月，他领导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思想解放的熊熊烈火终于燃烧在中华大地上。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举行，又一次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一个新时代终于在这火的涅槃中诞生！

## 寒风料峭木棉红

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世人对开办经济特区还有异议的似乎已经不多，但在特区开办初期，可以说是处处步履维艰，事事非议满天。

1979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从此将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从此走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大道。

在这一重大历史变革时期，广东省委在全国率先解放思想，提出了一些前瞻性的建议。1979 年 4 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习仲勋、杨尚昆带着广东全省上下求变创新的呼唤，决定到这个历史潮头的风口浪尖“先行一步”。

习仲勋在 4 月 8 日中南组发言中，首先发出惊人之语，强烈要求中央给予广东改革开放的特殊政策，请中央授权或放权，让广东先走一步，并提出一些具体要求。他在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时，还大胆批评说：“现在中央的权力过于集中，地方上感到事情很难办。没有权，办事很难。”在种种不同声音的争议中，习仲勋还趁着会议间隙专门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赞扬了习仲勋敢于创新的大胆想法，并同意开办经济特区的建议。接着他又说了一番名言：“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 年 1 月 3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在宝安县蛇口公社境内建立工业区。同年 7 月 1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省委报告，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1980 年 8 月 26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由此，广东省特区建设的大幕在紧锣密鼓中开张了。

在蛇口工业区，他们率先引进国外通行的竞争机制，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推行公选管理层领导。经过短短两三年时间，深圳特区建设已初具规模。与此同时，广东省为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而开始进行放开物价的改革。

这一切，不但一次次引起国人新奇而又疑惑的目光，种种非议也接踵而来。在参观深圳后，有的人情绪低落；有的人愤愤说：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得来的土地，竟被你们一下子卖掉了；甚至有人议论说：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飘扬外，已与资本主义“没什么区别”。

1982 年 1 月 18 日至 2 月 9 日，邓小平在广东冬休。时任省委书记的任仲夷曾独自一人去看望他，并趁此机会向他汇报工作一个半小时。这次他只是简单说了这么一句话：“这说明中央确定的政策还是正确的，如果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



1984年1月24日，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左一）在深圳火车站接待邓小平。

这一年的1月，中央发出《紧急通知》，针对广东一些沿海地区干部出现严重的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等现象，要求严厉打击。2月11日至13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问题，气氛越发紧张。会议印发了反走私等文件，还有中央政策研究室编写的材料《旧中国租界的由来》。3月29日，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此文，4月8日，《解放日报》又发表《痛哉！〈租地章程〉》，两文矛头直指改革开放的决策和特区开拓者。

会上，任仲夷和刘田夫省长代表广东向中央书记处作汇报。他们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详细汇报了广东出现的上述情况，以及省委采取的措施；同时还谈了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下一步的打算；他们还恳切希望中央不要收回已经给予广东的特殊政策。

但会上有的中央领导批评很严厉，说："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甚至还有人说："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任仲夷和刘田夫不同意这一结论，指出：应当划清因经验不足而造成工作失误和违法犯罪的界限；走私贩私、投机倒把同正确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界限；在处理罪责时，应划清个人贪污与非个人贪污的界限。基层干部出现工作失误，与省的政策有关的，应由省委、省政府承担责任。

可是两省座谈会结束后没几天，胡耀邦就给任仲夷打电话，说中央书记处将两省会议情况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政治局常委认为广东的同志思想还不通，并要求任仲夷和刘田夫再次进京面谈。这次，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先向他们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指示。接着，胡耀邦向任仲夷询问了许多具体问题，他均一一作了解释。当时一位政治局常委认为，广东的工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头了。要任仲夷对下面严加管理。遵照胡耀邦的建议，任仲夷写了他自参加革命以来唯一一次向中央的自我检查。他们的这次进京，被称为"二进宫"。

任仲夷认为，数天前邓小平在广东冬休之所以不便于表态，证明他知道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对广东的批评。事后他还得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书记处汇报两省座谈会情况的会议上也一言不发。

根据中央指示，广东应立即召开省地县三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中央会议精神。该如何传达，任仲夷想起他曾就此在第一次进京时专门征询过胡耀邦的意见，胡当时回答得很干脆："哪些话可以传达，哪些话不可以传达，由你自己定。"任仲夷认为这是耀邦给他的尚方宝剑。

在那次会议前，许多县委书记都准备好了作检查及挨批评。但任仲夷开场即明确表态说，这不是一次杀气腾腾的会，而是一次热气腾腾的会。会上，他主动承担责任，还表明对下面干部，只要不搞违法乱纪和犯罪活动，工作上就允许犯错误。于是，在广东三级干部会议上，任仲夷没有传达那些不利于广东改革开放，不利于在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甚至容易引起党内外思想混乱的话。相反，他根据中央精神，在这次会议报告中提出了"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以及"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坚定不移"，以后又提出"执行让人民群众富裕起来的政策坚定不移"。正是由于任仲夷没有"如实"传达他"二进宫"的"中央精神"，而又适时提出了"三个更加"和"三个坚定不移"，这才挽救了广东和全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否则，中国的改革开放不知要倒退多少年。

为总结建设特区的经验教训，并针对非难，端正人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同年6月7日至14日，广东省经济特区学术讨论会在深圳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就改革开放与特区建设发表了真知灼见。同月16日，广东省在深圳又举行特区货币问题座谈会，特区建设的先行者、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庄世平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发言，指出我们现在这样做，与"复辟资本主义"和"卖国"根本挂不上钩，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

尽管广东省当时采取了许多措施，但当时广东在全国的形象确实不怎么好，一股股寒风不断吹向广东。如果不能抵挡住这一攻势，不但广东就连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都将有夭折的危险。就在这历史紧要关头，邓小平又来广东了。1984年1月24日上午，邓小平乘坐的专列抵达广州，他在广州火车站停留时对刘田夫（中顾委委员、原省长）和梁灵光（时任省长）说："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

在深圳，邓小平听取了市领导的汇报，参观了深圳市容、商贸区、蛇口工业区、多家企业，以及渔民村。在整个过程中，他情趣盎然，还为即将开业的明华轮游乐中心题写了"海上世界"。26日，邓小平离开深圳前往珠海、中山参观。29日，他在珠海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31日，他在广州参观中国的第一家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后题词："白天鹅好！"2月1日，他在广州为深圳特区题



1984年1月30日，大年三十，邓小平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

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同日晚，他出席广州地区军民春节联欢会，与各界人士一起欢度春节。2月5日，邓小平乘专列离开广州前往厦门，并于2月9日在厦门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邓小平在广东及厦门的一系列题词，肯定了特区建设，也肯定了广东改革开放政策，这对于统一全党全国的思想认识起到了巨大作用。

2月14日，邓小平在上海进一步阐述说："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2月17日，邓小平回到北京。24日，他在同中央领导同志谈话中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他还进一步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

邓小平讲了这番话后，料峭的寒风在岭南散去，火红的木棉开始迎春怒放。此后不久的1984年4月，沿海14个港口城市全面对外开放，1988年又成立海南省，并直接被宣告成为特区。此后的20年间，先是出现了上海浦东，而后接连出现了各种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加工出口区等效仿经济特区运行体制的"经济特区"。特区建设终于由点连成了线，又铺开了面。

邓小平的这次南方视察不但掀起了广东改革开放的新高潮，也为中国全面进入改革开放铺下了奠基石。

## 春风浩荡遍神州

1984年邓小平南方视察后，广东迎来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大潮，深圳特区仍然走在了最前列。他们率先实行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建设工程招投标，建立证券市场、外汇调剂中心和保税区，进行政府审批制度改革，以及综合配套改革等，并就建立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体系、国有资产运营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市场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等进行了多番试验。这些改革都大获成功，进而在全国推广。历史证明，深圳特区跳出现行体制之外的创新，充当了中国经济

体制改革的探路尖兵。

正在中国改革开放阔步向前发展的时候，1989 年国内发生“六四”风波，西方各国普遍对中国实行封锁和孤立政策，采取经济制裁措施。外商见状普遍止步观望，许多人抽掉投资资金或将其转移到东南亚等地，全国外贸出口严重下降，旅游业萎缩。接着，1991 年又发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西方也乘机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中国面临严峻挑战。

这时候，中国政府以“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为主来治理整顿经济，要求很急，力度过大，致使经济下滑、市场疲软、生产萎缩，发展速度受到严重影响。与此同时，“左”倾思潮东山再起，甚至有人提出要“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提出要以“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为内容的“双重任务论”。在这一时期，人们心中普遍笼罩着一种沉闷、压抑、疑虑及无所适从。特区还要不要办？改革开放如何进行？

就在这时，邓小平于 1992 年 1 月 18 日至 2 月 21 日，先后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邓小平这次南方视察是于 1 月 19 日上午 9 时直接抵达深圳，于 29 日晚由广州乘专列赴上海。他在粤 11 天，除休息两天外，其余时间都在深圳、珠海、顺德、广州等处实地考察。他不顾年事已高，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谈。

2 月 28 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这次南方视察期间的谈话要点作为中央 1992 年第二号文件下发全党。概括起来，这些谈话要点包括六个部分：（1）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2）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大胆地试，大胆地闯；（3）抓住有利时机，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4）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5）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6）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他的这次南方谈话，无疑是在寒冷的冬季，给人们送来了和暖的春风。

邓小平南方谈话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是改革开放的行动指南，其最大功绩就是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可以说，南方谈话是小平同志对全党全国人民庄严的政治交代，是他老人家的政治嘱托，是他对继续进行改革开放的呐喊与呼号。没有他这次南方视察，中国的改革开放可能很难进行下去，所以称他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当之无愧的。

邓小平在广东留下了他巨人的足迹，广东人民将世世代代讲述那春天的故事。

（高宏的）

# 叶剑英

## 经济特区的主要奠基者

广东经济特区是指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产物。广东经济特区借助改革开放的春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和在邓小平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充分利用国家赋予的各项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在改革开放中探索创新了许多新鲜经验，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广东经济特区能有这一切，是与叶剑英分不开的。从广东经济特区的创办过程乃至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我们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叶剑英的大力支持，才有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复出，才有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正是由于叶剑英对广东经济特区的创建一直给予热情的关怀和大力支持，才有了广东经济特区的创立和发展，才有了经济特区的今天。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叶剑英是广东经济特区的奠基者。

## 叶剑英力主邓小平出山，为中国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1976年，是中国遭受“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最后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伟人相继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篡党夺权活动。在这危急时刻，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团结政治局多数同志，争取华国锋主席拍板，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果断作出重大决策，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十年的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正如胡耀邦代表党中央在叶剑英的悼词中所说，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薄一波对此也曾作过这样的评价：“在粉碎‘四人帮’这场斗争中，叶帅是核心人物，他办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叶剑英从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尤其在1975年与邓小平共同进行整顿的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邓小平确实是个治国安邦的帅才，从毛泽东、周恩来多次赞扬邓小平“人才难得”、能担当大任中更加深和坚定他的观点和看法。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为邓小平复出、担任中央重要领导做了大量工作。叶剑英最早、最坚决、最积极请邓小平复出，“就在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叶剑英提出，应该赶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可是，这一提议却遭到了拒绝”。他多次找华国锋做工作，说明邓小平具有治党治国的全面经验，是党内难得的人才，应尽快请邓小平复出。由于华国锋对叶剑英很尊重，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建立了共命运、同生死的关系，如果没有叶剑英的决策和担任总指挥，就不可能得到军队的支持，打垮“四人帮”。如果没有叶剑英大公无私的帮助（粉碎“四人帮”当晚，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华国锋提议由叶剑英担任党中央主席，主持中央的工作，叶剑英坚决推辞，并提议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也不可能当好党中央主席和



叶剑英同邓小平在广州合影

军委主席。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情况下，华国锋终于同意邓小平复出。1977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定》，邓小平重新担任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

叶剑英不仅最终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而且“主动让位”，积极支持和协助邓小平成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叶剑英在许多场合以实际行动为邓小平成为党的领导核心创造条件。1977年5月14日，叶剑英八十寿辰，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粟裕、王震等前往叶剑英住地为叶剑英祝寿。邓小平赞扬叶剑英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亲切地称叶剑英为“老帅”，叶剑英对邓小平说：“你也是老帅嘛，你是我们老帅中领班的。”在老同志面前突出邓小平。1978年12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叶剑英在会上积极做工作，主动让位，全力支持，确立邓小平在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功不可没”。在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胡耀邦当总书记期间，叶剑英一直是政治局排名第二的常委，位次高于邓。他后来曾提议，政治局常委排名，把邓放在自己前面。1981年6月，叶剑英给中央写信，请求改变中央政治局常委名次的排列，将他的名字排在邓小平的后面，党中央经过慎重考虑，没有同意他的请求。

尽管如此，叶剑英仍大力支持邓小平，使邓小平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的核心，领导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原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指出：叶剑英“在这个时候，他主动让位，再三请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他总是大事不糊涂，这一点非常了不起，非常伟大。”原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恩茂也指出：“粉碎‘四人帮’后，小平同志之所以能成为党中央领导核心是由各种因素形成的，但是叶帅起了主要作用。粉碎‘四人帮’后，全党全国的形势，叶帅的历史、功绩、地位、身份、威望、影响、作用等，都大大不同一般，他对邓小平的支持是举足轻重的。”

## 叶剑英关心、支持和推动广东经济特区创建

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产物，在经济特区的创建过程中，叶剑英大力关心、支持和推动特区的创建，为特区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叶剑英是经济特区的奠基者。

在经济特区的酝酿创建过程中，叶剑英对经济特区十分关注，并给予大力支持。1977年11月11日至12月3日，叶剑英在广州调查研究和休息。其间，听取了广东省委和梅县地区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并作重要讲话。叶剑英提出要“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广东要搞好经济建设”。叶剑英要求大家眼界放高一点，他强调指出：“既要埋头工作，又要抬头看看世界。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影响全世界。”其间，叶剑英听取了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姚依林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托到宝安调研处理香港同胞对深圳口岸工作的反映

的调研汇报，对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提出的建议把宝安建设成向香港提供鲜活食品的外贸生产基地的做法给予确切的支持。叶剑英指出："在珠海、宝安搞出口商品基地比较好。姚依林同志和我谈话时，他同意在这些地方进口粮食发展养猪、养鸡业……我看，这样做好。"

1978 年 12 月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拉开了全国改革开放的序幕。1979 年 1 月，叶剑英在广州会见了香港、澳门知名人士马万祺、何贤、柯正平、李菊生等，希望他们为广东的经济发展作贡献，激发了这些港澳知名人士回家乡投资建设的积极性。叶剑英还会见了省委书记吴南生等，要求广东的负责人想办法改变广东的贫穷面貌。带着叶帅的嘱托，吴南生按照省委的安排，回老家汕头开展调研工作。2 月，吴南生在征求了汕头地委和许多老同志及各界特别是从海外、港澳回来的人士的意见后，给广东省委发了一份长达 1300 字的电报，提出办类似出口加工区和自由港的一些设想，得到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的支持。习仲勋和吴南生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汇报了广东先走一步，在深圳、珠海、汕头建立出口加工区的设想，叶帅听了汇报后，非常高兴，很支持，说你们要快些向邓小平同志汇报。

1979 年 6 月 1 日，叶剑英在广州接见参加广东三级干部会议的地、市、县委书记，在同省、地委书记座谈时说："我同谷牧同志讲，发展经济不能顾北不顾南……中央决定广东、福建先走一步，把广东作为试点。广东搞好了，可以推动全国，促进全国。如果搞不好，也会搞乱全国的。大家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加倍努力搞好……中央对广东抱有很大的希望，同志们要努力工作，要带好头，争取一年一年取得新的成绩。"1979 年 6 月 23 日，叶剑英在北京参加了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的广东代表团讨论会，并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要求广东要充分利用发展广东的有利条件，如："海外关系多，是发展广东的一个有利条件……我们要合理地加以利用。""省内还有亚热带气候的自然条件，都要很好地加以利用。""要很好利用海外的条件，把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搞好。要重视这批人才，包括重视这方面的外汇、资金的利用，发展交通、火电、水电和沼气发电，等等。"叶剑英的讲话，对广东经济发展，特别是对经济特区创立和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 叶剑英对经济特区的发展给予大力支持

1979 年 7 月中央 50 号文件颁布，明确批准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各划出一定区域试办"出口特区"。广东经济特区开始进入了创建时期。1979 年 7 月蛇口炸响了轰动全国的"开山第一炮"，拉开了广东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序幕，风靡一时的"蛇口模式"也成为深圳经济特区起步开发的主要模式。

由于经济特区是新生事物，在建设发展的过程中，有些人仍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对经济特区的创办不理解，有位抗战时期曾经在这里打过游击的老战士面对蛇口的做法泪流满面、痛心疾首："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得来的土地，给你们一下子卖掉了。"这些言论从四面八方铺天盖地传来，就连国家某部门一位官员也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图上又少了一块！"

就在深圳等经济特区面临风风雨雨时，1980 年 4 月，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的叶剑英最先来到深圳、珠海经济特区视察，对经济特区做法给予充分肯定。27 日至 28 日，在副省长王宁、叶选平及省委秘书长杨应彬等陪同下，叶剑英到深圳、珠海视察。叶剑英来到罗湖桥和文锦渡，向正在值勤的边防公安干警表示慰问。在蛇口工业区，听取了香港招商局副总经理郭玉骏及工业区副指挥许智明的汇报，在了解工业区"五通一平"的进行状况及当前存在的一些困难后，仔细询问工业区要不要修铁路、与外商签订了多少合同、有何经验、谷牧上月份到蛇口工业区时将上述问题汇报了没有以及谷牧有什么意见等问题后，对蛇口工业区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说"你们的汇报很好，我回京后将这些问题向有关同志说一下，祝你们成功，很快把工业区建设好"。叶剑英还应蛇口工业区之邀题名："香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

28 日，叶剑英到珠海视察。在住地唐家湾要塞部队司令部的招待所，叶剑英与珠海市委书记吴健民交谈，听取珠海设市后的基本状况和试办特区的一些准备工作。叶剑英关心特区人民的生活状况，仔细询问了香洲渔民的生活状况："你们这里的渔民生活现在怎样了？""香洲的人口增加到多少了？""你们养蚝的生产好吗？"……还询问了香洲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他鼓励特区大胆改革，引进外资，发展工业及旅游业，肯定特区的发展道路。在吴健民等的陪同下，叶剑英视察了珠海市和拱北海关，对珠海的做法给予肯定，再次紧紧抓住吴健民的手说："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做得很好，很好。"

1981 年 3 月，84 岁的叶剑英到珠海市和中山县视察，鼓励两地的同志要按照中央指示大胆改革，勇于创新，并强调要大胆利用外资。在中山宾馆会见了港澳知名人士霍英东、何贤、柯正平、何鸿燊。考察了珠海特区市容及拱北海关，对珠海市的发展情况感到满意，再次肯定珠海特区实行改革开放的做法。

叶剑英视察深圳、珠海经济特区，是对经济特区在极端困难下的极大支持，经济特区进入了更快的建设发展时期。尤其是蛇口工业区牢记叶帅的嘱托，充分发挥企业自主权，通过实行招标建设、订立奖罚合同、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等办法，调动各方积极性，运用经济办法建设，短短的两年在荒滩上完成了整个工业区企业的建设，开始了一系列工厂企业的建设，建设速度快，创造了高效率的"蛇口方式"，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一面旗帜。

叶剑英对经济特区的大力支持还表现在他主持和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

例》等，为经济特区提供法律保障。

作为新生事物，在经济特区的创建过程中，许多人对之心存疑虑。如经济特区政策会不会经常变？对经济特区投资有没有保障，会不会把投资当做资本家来对待？中央决定试办特区之后，一位海外朋友对负责经济特区工作的省委书记吴南生说："无法可依，无规可行，要人家来投资，谁敢来？特区要同国际市场打交道，就不能开国际玩笑。"吴南生等认识到特区要同国际市场打交道，起草一部围绕特区的有权威的法规是当务之急。《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起草工作在中央50号文件出台半个月后正式启动，由吴南生总负责。经过一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特区条例"的初稿终于完成，并提交省委讨论修改。1979年12月广东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原则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草案）并作进一步修改。至1980年4月，先后经过13稿修改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草案）最终获得广东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按常规，作为一个地方法规，省的人大通过就算是已经立法有效了，但由于广东实行对外开放，建立经济特区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事情，与外国打交道会涉及很多超出广东范围的事情，《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如果由全国人大立法通过，将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对特区工作更加有利。于是广东省领导将这一想法向正在广东视察工作的叶剑英委员长汇报，请求全国人大安排审议《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进行立法。叶剑英非常支持，将广东的意见通知全国人大办公厅。全国人大认为《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是一项广东省地方法规，由全国人大来讨论通过一项地方法似无先例。广东得知这一情况后，吴南生代表省委再次向叶剑英陈述条例通过的必要性，强调"办特区这样一件大事，不能没有一个国家最高立法机构批准的有权威的法规"。据吴南生后来回忆，叶帅听了他的电话，只说了三个字："知道了。"叶帅把吴南生的"道理"摆到了全国人大："特区不是广东的特区，特区是中国的特区。"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亲自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作为地方法规，破天荒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通过。至此，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并有了法律保障。广东三个经济特区在法律上完成了立法程序。《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颁布后，引起了国外和港澳地区工商界人士的强烈反响和极大重视，纷纷前往各经济特区进行参观考察和洽商业务，使经济特区的对外经济活动更为活跃，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和经济效果。

1981年11月26日，叶剑英主持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建议授权广东、福建两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的议案。会议决定授权广东省、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有关的法律、法令、政策规定的原则，按照各省经济特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

规，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备案。正是有了这个尚方宝剑，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根据经济特区建设发展的需要，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经济特区的单行法规。这些法规涉及中外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外商投资等方面，连同国家颁布实施的一些法律法规、暂行规定等，共同形成了一个较完善的、全面的经济特区对外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对外商在经济特区的投资优惠待遇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保证了外商在经济特区投资的合法权益，从而吸引了大批外商到经济特区投资建设，这一切，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特区的对外开放和发展。

综上所述，叶剑英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和智慧，带领党中央在粉碎“四人帮”后，积极促成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出山，使中国改革开放有了坚强的领导。他关心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也关心支持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他亲自到深圳、珠海经济特区进行视察，给经济特区以极大支持。他主持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从立法程序上为经济特区提供法律保障，为经济特区的创立倾注了大量心血。叶剑英对经济特区所作的具有远见卓识、切合实际的指示和工作，对经济特区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叶剑英是经济特区的奠基者。

（陈宪宇）

# 陈　云

## 他对南粤别样情

陈云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和奠基所建立的功勋尤为卓著。他曾多次来到广东，在南粤大地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陈云经过广东红色交通线抵达中央苏区。新中国成立后，陈云长期主持财政经济工作。1951 年两次莅临广东，召开会议，指导建立华南橡胶生产基地。1957 年再次亲临广东见证了第一滴乳胶的流出。1962 年 9 月八届十中全会后，陈云不再主持经济工作，在政治上受到了冷遇，“靠边了”，陈云就以养病为主，1964、1965 连续两年的冬天到从化温泉疗养。1973 年 10 月，陈云最后一次踏上南粤大地，考察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并视察了黄埔港。在考察期间，提出了一系列的真知灼见；主张研究资本主义、引进外资、利用商品交易所做期货买卖。他数十年来，对南粤格外的关爱，充满真挚的感情。

## 共产党万岁！这回总算到家了！

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白色恐怖蔓延，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背叛，临时中央局艰难支撑，难以立足，领导人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周恩来、张闻天先后撤出上海，奔赴苏区。从上海到中央苏区，过去曾经有几条秘密交通线。由于国民党的封锁破坏，这时只剩下一条保持畅通，那就是从上海—香港—汕头—广东大埔—福建永定—瑞金。

1933年1月，大埔阴冷潮湿，寒气逼人，两位身着长袍，带着呢帽，商人模样的客人风尘仆仆从小电船上匆匆而下，他们就是从汕头乘火车，坐大船，转小船奔赴苏区的陈云和博古，这是陈云第一次踏上广东这片南国之地。等候在岸边的，是专程前来迎接的中央苏区保卫局执行科科长卓雄，他们谨慎地四处张望，在确定没有人跟踪盯梢后，快速走进一间客栈。这是一间靠山面河的两层杂货铺，陈云吃点糕饼饮点茶，并观察到周围没有什么可疑情况后，便从后面山坡跑上楼，居高临下，俯瞰四周。驳壳枪队近十名武装人员就在那里整装待发，准备随时迎接敌人。夜幕降临，陈云换上轻便的着装，马不停蹄赶路，攀山越岭，走上四五十华里，必须一个晚上赶到下一个站点。



1954年7月，陈云同毛泽东在北戴河海滨。

为了安全，交通队白天把陈云和博古安置在偏远的山区隐蔽，躲在“马架子”下。所谓“马架子”，就是“人”字形的木棚、竹棚，上面用树枝伪装，人挤在里面休息。晚上天黑下来后，有人送一点红米、红薯、南瓜之类东西给他们充饥。饭后，他们就在当地一名交通员引导下，走荒无人烟、树木杂草丛生的羊肠小道。带路的交通员之间互不相识，站与站之间也没有横向联系，每人只负责引导一站，再由别人接替。

尽管这样谨慎，他们还是遇

到过危险。进入苏区边界时，卓雄把陈云和博古安排在一个废弃的煤坑里休息。当时寒风凛冽，雪片纷飞，不巧碰到国民党军队搜山，满山遍野都是敌人，而卓雄手下只有十几个青年武装交通队员，他急中生智，带领两个交通队员绕到另一个山头打枪，把敌军吸引过去，趁着夜色如黛，大雪纷纷扬扬，另一批队员带着博古、陈云突围，总算化险为夷。

1月下旬，陈云一行历尽艰险，终于由上杭县的才溪乡进入中央苏区。陈云曾对他的秘书朱佳木说，他进入苏区后问接应的同志，是不是已经到了苏区？接应的同志说，已经到了。这时一向性格深沉含蓄的陈云，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躺到地上，面朝天空大喊了三声："共产党万岁！这回总算到家了！"

## 现在不是没有胶水，这是大有希望的嘛

1957年的春天，新中国橡胶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春天。华南垦殖局植下的第一批橡胶，当时世界上纬度最高的胶林（北纬21.6度），在这个春天流出了第一滴胶乳。中国橡胶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在现场目睹了橡胶开割的历史性场面。

广东雷州半岛化州县城附近的建设农场沙垌队，一大片胶林的新叶已从古铜色转向青绿，形成浓密的树冠，绿伞一样在直直的树干上撑开。

约莫8点左右，几辆小车开到队里，车上下来十几个人。里面有粤西农垦局和建设农场的领导。场领导在前面引路，粤西农垦局的领导在后面陪着两位首长，其中一位个子不高，身体略瘦的首长穿着蓝色风衣，头戴同样颜色的解放帽。这身装束在广东很少见，这位首长就是从北方来的陈云。紧跟在陈云后面的就是华南农垦总局局长李嘉人。农场领导带路去看一颗老胶树，看完后又去看队里种的橡胶树。陈云兴致勃勃地看橡胶幼树，比刚才看那棵老树更开心。队里的胶林沿山势定植，是梯级式的。陈云在梯田里走上走下，一边看一边夸胶树的长势好。

看完七里队的胶园，陈云就到沙垌队去了，在沙垌队的胶园，场领导庄重宣布试割开始。男侨工手握胶刀，将刀刃贴到树皮上，环树身斜斜地推过去，随着刨花似的树皮屑纷纷落下，树干上留下一条弧形浅沟，这叫做割线。在割线下方尽头安好"鸭舌"（用来引接胶水的铁制导器），开割的第一刀算完成了。

陈云仔细地看着胶工的动作。当第一滴胶水滴进胶杯，他笑了。他回过头来，对在场的人说："有的人说我们种橡胶没有胶水，现在不是没有胶水，这是大有希望的嘛。"接着，他又对李嘉人和粤西农垦局的领导说："要一胶二林，有林就有胶。农场要边整顿，边发展，稳步前进。"

说完，陈云亲切地望着操刀的胶工，笑了笑，把视线落到他手中的胶刀上，

又做了个割胶的手势。跟随陈云的一位同志会意，走过去拿过胶工的胶刀，对他说："首长想亲手割一刀。"

陈云接过胶刀，在割胶工的指点下往开好的割线上试割了一刀，已经沁出了胶水的割线上，胶水像珠子一样，一颗一颗，汇成一串往下流，一滴一滴通过鸭舌滴落胶杯里。

激动的时刻，成功的喜悦，让时光回到了当初决定在华南种植橡胶的峥嵘岁月。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植物学研究表明，在北半球，超过北纬17度，橡胶树就不能生长存活了。中国自然也就被排除在天然橡胶种植区之外。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橡胶是其中最重要的禁运物资。为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中央作出在华南地区建立天然橡胶生产基地的重大决策，这项事业就是由陈云主持的。1951年9月的一天，广州骄阳似火，热浪滚滚。这天，越秀山南麓的广东省人民政府大院一间宽敞而简朴的会议室里，呈现出一种不寻常的气氛，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召集的一个高层会议，马上要在这里举行。这个会议似乎与往常不一样，在长条会议桌旁落座的，除了华南地区的一些高级负责人，还有中央和地方林业工作的领导人、专家及三位金发蓝眼的来自苏联的林业和机务专家。一个大人物的到场证实了这个会议的非同寻常。通常，华南分局的重要军政会议，都是由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亲自主持。这一次，当叶剑英走进会场时，他身边多了一个人。他个子不高、脸部消瘦，身穿白布衫、灰色裤子，脚穿软底黑色布鞋，步履和动作沉稳干练。在他出现的那一瞬，除了那三个苏联人，所有人都认出了他——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务院第一副总理兼国家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叶剑英与陈云微笑着和大家打过招呼，两人一齐走向主位。一落座，叶剑英就向大家说："今天，陈云同志是专程来主持我们的会议……"陈云摆摆手，插话："不，是剑英同志和我一起主持。"他把脸转向叶剑英，语气诙谐："参座，你先说。"

寒暄两句后，叶剑英神情庄重地宣布会议内容："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战略物资禁运，中央已作出决定，一定要建立我们自己的橡胶生产基地。陈云同志受毛主席、周总理委托，来和我们研究筹备成立华南垦殖局，尽快在华南地区建立橡胶生产基地。"叶剑英的一席话，使大家陷入了沉思，会场鸦雀无声。

陈云打破了会场短暂的静默："发展橡胶生产是一场封锁与反封锁的斗争，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桩大事。中央很重视这项事业，有剑英同志领导，我们一定能把这项事业办好。"会场活跃起来。陈云一直神情专注地静听着整个会议的发言，他对会议议论的情况已经心中有数。他也到海南实地考察过，那是去年的秋季。而在上个月的2日，他还在中财委主持了一个专门会议，对发展橡胶生产的可行性做了全面的分析、研究。政务院在8月31日通过的关于扩大培育橡胶

树的决定，依据的就是中财委提交的可行性报告。这时，他乘着叶剑英的余音，不失诙谐地接上去说："同志们，现在大家缺少经验，我破例先给钱和物资，不限制你们。但拿不到种子，拿不到橡胶，要打屁股！"

## 这是历史，照样保留

1958 年 4 月 25 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陈云、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拟于近日研究工业问题，请即南来广州，开四天会。27 日，陈云同周恩来等从武汉乘专机赴广州。在省委办公厅警卫处停泊于小岛旁的一艘小船，毛泽东召开会议，会议讨论研究工业建设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安排等问题。会后，陈云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广州黄花岗烈士陵园。

那是一个春和景明的早晨，广州一派欣欣向荣，广州黄花岗烈士陵园墓道两侧的菊花开得非常灿烂。陈云站在入口处的高大牌坊前，负手而立，仰头望着孙中山题写的"浩气长存"四个贴金大字，端详良久才转过头来，向周边随行人员颔首示意并穿过牌坊，沿着宽敞的墓道走向烈士墓。他缓步前行，随行的广东省委副秘书长欧初向他简要介绍了陵园的历史。1911 年 4 月 27 日，同盟会在广州策动起义，拟分兵多路，同时攻打两广总督署以及重要军警据点等。起义不幸失败，同盟会会员潘达微冒死收敛 72 具烈士遗体，葬于广州白云山南麓一座小山红花岗。后来红花岗改名黄花岗。辛亥革命成功后，此地即辟为墓园，主要建筑于 1935 年竣工，解放后改为纪念公园。

陈云一边默默听欧初介绍，一边稳步登上石阶。到烈士墓前，陈云低头肃立，向烈士致敬。绕过烈士墓，便见到造型奇特的"纪功坊"。1921 年建成的纪功坊，由前后各 72 块青石叠成崇山形，象征 72 烈士。每块青石分别镌刻当时国民党海外各地支部名称或个人的姓名，纪念他们捐款建设墓园有功。纪功坊上方，有章炳麟书写的篆文横额"缔结民国 72 烈士纪功坊"。青石堆顶上屹立着一尊自由女神像，表达自由平等的理想。

欧初指着自由女神像说："神像的手原来举着一个国民党党徽，解放后砸掉了。有人认为那个徽和这个自由女神像都是国民党的东西，不能保留。"向来心思缜密、言简意赅的陈云抬起手臂指着纪功坊，一字一顿地说："这是历史，照样保留。"

听到这句话，随行的人十分兴奋。黄花岗历史意义非同小可，有关部门一直希望完全按原貌保存，可是不断听到反对的声音；现在有了陈云的明确表态，保护黄花岗的工作看来会好做些。可是，随后几年"左"风越刮越烈，黄花岗虽然于 1961 年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冲入陵园，凡有关国民党的标志一概铲除，石刻的纪念碑文也被划得刻痕处

处，自由女神像惨遭砸碎，直至1981年才重塑。

## 那就做一次“洋奴”

“文化大革命”后期，陈云复出主抓对外贸易，一项引人注目的活动，是到广州考察并指导1973年秋季广交会。陈云算大账高瞻远瞩，算小账明察秋毫，这个鲜明的工作特点和领导风格在这次考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1973年10月，陈云（左二）在广州视察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1973年10月3日，陈云一行四人乘火车南下。10月7日经过三天的颠簸和跋涉，到达广州。此时的广州少了一些炎炎夏日的闷热，多了一丝秋天的清爽，这是陈云最后一次踏上南粤之地。下了火车，虽然风尘仆仆，但陈云没有丝毫的疲倦，精神抖擞地与外贸部、广东省的同志畅谈广交会的筹备情况。汇报会上他都是聚精会神，仔细聆听他们的汇报，偶尔插上几句话都是一针见血，直指问题的核心，当谈到商品价定价时，陈云严肃地说：商品定价不能凭主观愿望，而要根据市场行情。价定低了，我们吃了亏；定高了，外商不买，东西压在那里，而且失去了国外的市场，我们也吃亏。10月16日下午，广交会已经开幕，陈云兴致勃勃参观完展厅后，当外贸部副部长陈树福汇报到工艺品的出口价格时，陈云说：“出口工艺品要争取好价。适可而止，尽量多卖。今天，我看到那块石头，商人出价8万元，为什么不卖？我看7万9千我也卖。是不是今年春天批判了低价思想后，认为提价就是马列主义，降价就是机会主义？稳价多销不对，但高价高到卖不出去也不对。”

就是现在，期货对很多人来说也是很神秘和专业的经济术语，可是在1973年，中国已在国际市场上大炒期货，这与陈云也是密不可分的。对于期货，南下广州之前陈云已经酝酿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广交会期间，对期货他已经胸有成竹，同外贸部负责人谈话时重申同五丰行（外贸部领导的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管理的香港华润公司下属公司）的负责人谈话时所表达的观点，再一次支持五丰行利用商品交易所购买期货的做法。期货交易既完成了采购任务，又赚了大钱，这样的事情办得再漂亮不过了。10月10日，陈云为外贸部起草了向国务

院的请示报告《关于进口工作中利用商品交易所问题的请示》，“认为利用交易所做买卖，有一定风险，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试做。”“目前，与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我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已占我进出口贸易的75%。因此，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领我们应占的地位。”他幽默地说：“列宁讲过：‘到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厕所。我看，现在离那个时代还很远。’资本主义国家市场上，因货币危机和供求关系的变化，商品价格反应非常敏感。外国商人认为我国购货时只求完成任务，有时价格越涨越要买，常常乘机抬价。这点要注意。”“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消极回避。”“我们可以利用交易所，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因为利用交易所，可能有得有失，但必须得多失少。”

在广交会期间，从国外进口3亿美元的轧钢设备问题再次被提上日程。这一方案从一开始就注定要遭遇重重阻力和非难。“左”的势力从中进行阻挠，他们主张只进口主要设备，不进口附件和相应的原材料。在他们看来，连附件都要进口，破坏了自力更生的原则，“洋奴哲学”、“崇洋媚外”，各种帽子时不时从一些阴暗角落里飞来。陈云斩钉截铁地说：“正在订货的那套3亿美元的轧钢设备，有关的附件和原材料要一起进口。这套设备投产后可年产钢板300万吨，如果缺了零配件，国内解决不了，就要推迟生产，耽误一年，就少产300万吨钢板，很不合算。”针对“四人帮”挥舞的“洋奴哲学”棍子，陈云非常气愤，掷地有声：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这里所说的“有人”，显然是指“四人帮”而言。

## 特区第一位的任务是认真总结经验

1992年春天，一个注定不平凡的年份，一个载入史册的年份，邓小平“南方谈话”振聋发聩，响彻全国。那时，社会上流传党内分为“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说法，认为邓小平是“改革派”，陈云是“保守派”，“邓陈不和”的议论甚嚣尘上，不绝于耳，对此，陈云没有从正面回答，而是采取迂回的方式作了澄清。1992年6月，李先念逝世，陈云十分悲痛，利用这个机会，他在文章中专门写了对于经济特区的看法。他写道：“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成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这篇文章公开发表在

《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上，有关陈云和邓小平关系的种种猜测算是暂告一段，有关陈云否定特区、否定改革的议论也偃旗息鼓。

这是陈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全面肯定特区，赞成特区。透过承载历史的黄卷，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陈云对特区从谨慎支持到公开赞成的几个关键片段。

1979 年 7 月 15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的报告，这就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 50 号文件，关于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这个历史性文件为创办特区拉开了帷幕。1981 年 12 月 22 日，在中央召开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陈云说过："广东、福建两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在部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广东不是全省特区，福建也不是全省特区)，既要看到特区的有利方面，也要估计到特区带来的副作用。"当时不少省市都向中央要求试办经济特区，陈云毫不犹豫地加以阻止。他明确指出："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像江苏这样的省不能特区，江浙一带历史上就是投机活动有名的地区，坏分子的活动都是熟门熟路。"可以看出，陈云对试办特区态度比较谨慎。他不反对试办经济特区，但要求注意特区带来的负面影响，坚决不主张扩大特区的范围。再三强调"现在搞特区，各省都想搞，都想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家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特区第一位的问题是总结经验。"

陈云讲这个话，打消了其他地区办特区的想法。历史是如此的耐人寻味。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对特区的谨慎稳健，给广东特别是深圳一枝独秀的巨大历史机遇，广东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马当先，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独领风骚，创造了许多对全国影响巨大的第一，形成了改革开放全国看广东的局面。深圳更是创造了从边缘渔村到现代化大都市的人间奇迹，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佳样本。关于要不要增加特区的议论还没有完全平息，特区的经验还来不及总结，广东又进入了陈云的视野。

1982 年 1 月 5 日，新年刚过，人们还沉浸在辞旧迎新的喜悦中，中纪委一份反映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的《信访简报》使得一向冷静的陈云勃然大怒，他把秘书朱佳木叫进了办公室。陈云当时脸憋得通红，情绪很激动，说话的时候拍了桌子，他对一些同志有这个顾虑那个顾虑很不满意。他说怕这怕那就不怕亡党亡国？要是这样搞下去，过不了几年我们就要亡党。他指着简报很激动地说："告诉鹤寿要严办，杀几个可以挽救一大批。"他停下想了想又说："干脆，我来批一下。"于是，他拿起铅笔，把这份简报批给了几位中央常委，写道："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在陈云的批示旁，邓小平又加了八个字："雷厉风行，抓住不放"。1 月 11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贯彻邓小平、陈云等中央常

委的批示，决定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如果哪个省市或部门的党委优柔寡断，熟视无睹，姑息养奸，中央将追究责任。对于这场斗争的艰巨性，陈云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说："抓这件事是我的责任，我不管谁管?！我准备让人打黑枪，损子折孙。"他要朱佳木转告他的子女，出门时要注意安全。那段时间，主持中纪委日常工作的黄克诚、王鹤寿成了陈云家的常客。广东领导贯彻了"要做一个清醒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精神，及时提出了两个坚定不移的方针："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坚定不移，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坚定不移。"春去秋来，反走私暂时风平浪静了，特区要不要办的猜测议论也暂时平息了。

1984 年对广东而言，可以说是一派"阳光明媚"、"姹紫嫣红"的景象。3 月，中央召开部分沿海城市座谈会，决定开放沿海 14 个城市，并形成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中央委托谷牧专程向正在杭州休养的陈云汇报。陈云拿到《纪要》稿，全神贯注地阅读，连散步都取消了，把《纪要》看了两遍。他说"他是很用心看的"，看完后明确表示："我同意这个《纪要》。"并且特别表扬了深圳的管理办法。他指出："深圳有新的管理办法，这也是'拳头'。这样管理，发展得很快呀！有关深圳的报道，每一篇我都看了。要它那里搞'拳头'产品有困难，它的拳头不是产品，而是管理办法。"公开肯定特区的新管理办法。这时"深圳效率""深圳速度"已经国人尽知，深圳已经名扬全国。

（王 莹）

# 胡耀邦

## 1983年南粤之行

2010年4月15日，温家宝总理在《人民日报》的显著位置发表纪念文章《再回兴义忆耀邦》。作者回忆了当年陪同胡耀邦在西南贫困地区进行了历时半个多月的调研之行，通过记忆中的历史片段，再现了胡耀邦襟怀坦荡、平易近人的高尚人格和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崇高品德，特别是他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温总理的文章语言质朴，情感真挚，文中对胡耀邦的深深的怀念，勾起了人们记忆深处的“善念”，读来让人不禁眼角挂满泪花。

我们也不应忘记，在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为了解决改革开放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胡耀邦多次联系实际到广东调研，以坚定的毅力推进改革，建立了不巧的历史业绩。1983年胡耀邦南粤之行就是其坚定支持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建设的破冰之旅。

## 南粤之行前的特殊政治气候



1983 年 2 月，胡耀邦视察深圳蛇口工业区。

党的十二大后，经济体制改革在全国迅速展开，改革重点由农村逐步转向城市。但是改革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守旧的顽固势力，以极左思想无限夸大改革开放中产生的消极现象。他们认为，搞改革开放，允许外商外资进来，而且还要让他们以“剥削”方式赚钱，岂不是重走旧中国的老路。此时，广东、福建沿海地区出现了比较突出的走私和倒卖进口消费品之风，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中央下发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和《关于打击走私的紧急通知》两个文件。这些新情况的出现让广东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们感到了无比巨大的压力，社会上也开始出现了“深圳除了罗湖桥、文锦渡海关还挂着五星红旗外，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的论调。

面对这种特殊的政治气候，胡耀邦无视被责难、批评的危险，毅然站出来捍卫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的建设发展成就，体现了政治家的伟大智慧和勇气。1983 年 2 月 6 日至 14 日，在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书记郝建秀、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李鹏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省长刘田夫、广州军区司令员尤太忠等陪同下，先后到韶关、深圳、海南和湛江等地进行了为期八天的视察，沿途听取了当地各级党委的工作汇报，并对广东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等各方面工作作了十分重要的谈话和指示。胡耀邦的此次南方视察，是广东改革开放和特区发展史上一次有重要分量的视察活动，实际上为 1984 年邓小平第一次南方视察探了路。这次视察活动初步驱散了笼罩在人们心中的迷雾，为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受到非议的广东省委、省政府正了名，为广东进一步冲破禁锢、大胆探索、积极发展鼓了劲、定了调，加快了广东迈向改革开放新时代、迎来生机无限的春天的步伐。

## “要充分发挥山区的特点……把树种起来，把水果种起来，这样山区才能富裕。”

1983 年 2 月 6 日，初春伊始，乍暖还寒。时任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一行 24 人悄然出京，乘专机抵达韶关。

2月7日上午，胡耀邦听取广东省委领导和韶关地委领导汇报工作。省委领导在汇报广东水电建设的情况后，胡耀邦指出，广东要下决心解决水电问题，关于办电的资金问题，提出不要光靠国家投资，要想办法从多方面、多渠道来解决。在汇报过程中，胡耀邦不时插话。他强调领导班子要年轻化，没有大专程度的年轻干部应该去读几年书，学习自然科学、外文知识，为“四化”建设服务。



1983年，胡耀邦在广东考察时与少年儿童交谈。

韶关地委书记马一品汇报工作时，用当地一句俗语介绍韶关说：“桂林山水甲天下，尚有广东一丹霞”。马一品又汇报说，希望机构改革方案快定下来。胡耀邦指出一定要加快体制改革的步伐，简化审批手续，他说：“你们可先斩后奏，照顾大矛盾，考虑中矛盾，难管小矛盾，要快刀斩乱麻。”简化审批手续的提出至今仍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大有启发。

在谈到林业问题时，胡耀邦说：“要充分发挥山区的特点，关键是有得力的措施，让农民放心，把树种起来，把水果种起来，这样山区才能富裕。”关于育林经费的问题，他要求不能马马虎虎，要抓检查落实，不能光报个数。他还建议搞木材综合利用，既可充分利用资源，也可避免浪费。关于农村造林的问题，他说：“造林要搞责任制，要扎扎实实到林场与工人商量，要组织技术人员和农业机械到林场去，不能只是讲。”关于经济作物的种植，他提出要走多种经营发展的路子。

听取汇报后，胡耀邦一行参观韶关南华寺。南华寺是中国佛教名寺之一，是禅宗六祖慧能弘扬“南宗禅法”的发源地，始建于南北朝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年）。胡耀邦一行进入寺庙后，寺庙住持拿出珍藏的皇帝诏书等文物给他们观赏。当看到民国26年蒋介石题写的“宣传佛典”时，他说：“修好，保存起来当学术和旅游用。”参观完后，胡耀邦还问寺庙的服务人员，一个月有多少工资奖金、住宿在哪里？服务人员一一作答后，他风趣地说：“菩萨保佑。”

## “新事新办、特事特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

在韶关的视察结束之后，胡耀邦一行在任仲夷、刘田夫等陪同下又马不停蹄

地赶到深圳经济特区考察。

8日上午听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的汇报，胡耀邦同志边听汇报、边提问、边讨论，有时兴奋地站起来说话，插话很多。“新事新办、特事特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这十六字要求，就是在讲话和插话中逐步提出来的。

在听取梁湘代表深圳市委所作的汇报时，胡耀邦强调指出，特区应按新办法来搞。新事情应走新路子。新事老办怎么行！胡耀邦以深圳建市之初曾经搞了六十五个局的情况为例子说，“你们搞了我们原来的模式，把全国的臃、肿、杂的弊端引到特区来。……虽然创造了一点，但还是过去的东西多，被一些老的东西缠住了，所以现在回过头来又要改。希望你们创造新的东西。”胡耀邦当时还举了两个“新事新办”的例子，他说：“《深圳特区报》有点新事新办的味道，但还是周报；深圳的房子也有点新事新办的味道。”

当时，胡耀邦还以自身的实际行动“特事特办”，帮助深圳解决通讯难问题。深圳特区建设初期，电话通讯十分落后，经过很大的努力，全市才增加到2000部电话，而且经常不通，挂长途电话更是难上加难，远远不能满足特区发展的需要。外商对此也极为关心，当时一些港商宁愿选择直接回港也不愿意在深圳打电话到香港，因为往往等电话打通时，人早已经回到香港了。当时上级有关部门认为电讯涉及主权、保密等问题，因此增加电话这件事情久拖不决。当梁湘汇报到这一问题时，胡耀邦对梁湘说，“没有保密问题嘛！我建了你来管，为什么不行？各路豪杰投奔你白衣秀士王伦，我把全部人马，包括枪支弹药，请你来收编。林冲开始时是投奔王伦的，但王伦不愿收编，结果出了个‘火并王伦’。要告知有关同志，不要当白衣秀士啊！”此事很快得到了妥善解决。

谈话快结束的时候，胡耀邦突然微笑地问在座的省、市领导：“现在还有什么压力？轻松愉快了吧。”一开始大家都没有反应过来，但是很快就明白了，大家都会心地笑了，而且笑得很开心。在座的省、市领导，在得到了胡耀邦的支持和肯定后，有的眼眶发红，深受感动。

汇报结束后，还发生一个小插曲。胡耀邦看大家都穿着旧式的干部服，就笑着问大家：“你们为什么不敢穿西装，我50年代出国还穿了花衣服，你们工作人员穿西装我赞成，自己出钱嘛怕什么。女同志也可以穿太空楼，发型也可以改变改变。外商进来，看你们现在穿的样子，不知道投资保不保险。”当年胡耀邦总书记的这番话，风趣幽默地说明了什么是“立场不变，方法全新”。关键不是穿什么衣服的问题，穿西装也可以立场不变，依然是一名共产党员。

2月8日下午，胡耀邦到渔民村视察，村党支部书记吴伯森汇报了全村情况。胡耀邦在询问了渔民村的收入、生活等情况后，见吴伯森仍然身穿破旧的衣服，便说：“你把衣服穿好点。”

2月9日上午，胡耀邦视察了西沥水库和蛇口工业区。袁庚代表蛇口工业区

党委向胡耀邦总书记作了汇报，在汇报过程中袁庚不无顾虑地谈起中国古代改革的成败教训，提到谷牧所说的“在矛盾中发展，在夹缝中生存，历史上改革的没有好下场”时，胡耀邦说：“过去下面搞，上面少数人支持，现在不是，领导带头改。”

当袁庚汇报到干部选举制度，提出：“如果群众有权选举和监督干部，我相信可以改变一下干部结构和干部作风。我们想做这样一个不大不小的改革，准备冒一点风险。”胡耀邦十分肯定地作出回应，他说：“好嘛！”并说：“著名戏剧家关汉卿，就曾写了个讽刺官僚主义者的诗，他骂县太爷堂上的鼓是‘一棵大树腹中空，上头全是皮儿糊，每天上堂敲三下，扑通扑通又扑通。’”此后，蛇口工业区开始推行干部体制改革，民意推选领导班子，这一试验一直持续到1994年。胡耀邦在离开蛇口工业区之前还强调说：“沿海一带城市，像汕头、厦门，都要学蛇口这样，用蛇口的办法去搞，可以搞活一点。”

在深圳考察结束后，胡耀邦高度评价了深圳特区取得的成绩。他对广东省委及深圳特区的负责人说：“你们搞得不错，有成绩，已经创造了一个新局面，比较出色地完成了中央的意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央一年发50个文件，有关特区的就有两个，总的目标和目的都很清楚了。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新事新办，办经济特区是新事物，新事物允许你们去探索，现在我们还要继续探索，就是新事新办，敢于创新。”胡耀邦这段讲话虽然不长，但很重要。这段话既表明了中央对当时广东省委1981年对深圳领导班子的调整和工作的肯定，又要求深圳特区加大改革创新的力度，为全国创造更好的新经验。

1983年4月，谷牧到广东检查工作。期间，省委领导在汇报工作中提到了胡耀邦对特区工作的评价。谷牧随后说道：“我看这话公正，我同意这个评价。”之后不久，陆续到广东视察工作的中央领导都对特区发展给予了很好的评价。

## “建议赋予海南行政区较多的对外经济合作自主权，并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

在深圳的视察结束后，经过短暂的休息，胡耀邦一行又飞到海南岛视察，在那里度过了一个不平凡的春节。

11日上午，在榆林港，海南区行署主任雷宇代表区党委向胡耀邦作了工作汇报。汇报结束后胡耀邦强调指出，三中全会以来，全国所有地区（包括海南）艰苦奋斗，坚决执行中央政策，作出很多成绩，海南变化很大……但工作不要估计过高，我们政治与经济不相称。海南的地理条件和台湾差不多，但经济是一比十四，你们心里有这笔账，是很大的一笔账。……用这个东西来判断是非，一是不要否定我们的成绩；二是离人民的希望还差得远。进步的幅度慢，主要是没有

在海南岛搞特殊政策。现在，中央给你们政策，希望海南尽快富裕起来，但这要靠海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努力。

胡耀邦十分关心海南宝岛的开发利用。当雷宇在汇报中提到海南农村普遍推行双包责任制，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时，他说："我从陵水到榆林的途中，看到不少荒地、荒山、荒坡、荒滩、荒塘，可以划给农民或者包给农民开发嘛，广大群众是愿意承包的。但也有些人不一定愿意，因为他们只有劳力，缺乏资金、技术和工具，这就产生一个如何支援他们的问题，要注意解决。"

11日是农历腊月二十九，下午胡耀邦来到了驻守海南三亚的部队军营。胡耀邦一行在幼儿园停了下来，十几个孩子轮流让胡耀邦抱起，十分亲热。几位从北方来军营探亲的军嫂，扯开大嗓门连声喊："总书记好！"以引起胡耀邦的注意。果然，他顺着喊声朝她们走去，同她们一一握手，笑问："都是北方人吧？从北方到南方，肯定很辛苦，你们的丈夫为祖国安宁到这里守海防，有你们的功劳啊，你们自己在家里肯定很劳累，明天就是除夕了，先给你们道声辛苦拜个年。"

在与部队官兵合影前，胡耀邦高兴地说："职务不分高低，地域不分南北，军营就照官兵合家欢。"大家簇拥在总书记身后和两边，没有遵循惯例按团营连排让战士列队，真的成了"总书记和官兵合家欢"。在一个多小时的走访中，胡耀邦每到一处总是先给大家拜年，请大家向家中父母亲友转达他发自内心、源于天涯的问候，然后饶有兴趣地听士兵们南腔北调的谈话，询问文化低的士兵补不补文化课，鼓励他们学文化、学军事、学科技，还问北方士兵对海南的饮食、气候适不适应，并亲切地鼓励他们："不适应是困难，也是纸老虎，你硬他就软，你软他就硬，在钢铁战士面前，没有什么不适应。"胡耀邦与官兵打成一片，没有任何架子。这种平易近人的作风及其浑身上下洋溢着的亲情、友情，给部队官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2日上午，胡耀邦离开榆林，乘面包车经天涯海角到八所、石录铁矿视察。沿途光秃秃的，看不到树，胡耀邦笑嘻嘻地说："罗天（海南区党委书记），我将你一军，我到现在没看到苗圃？"因为之前海南的同志向他汇报说海南搞了不少苗圃。到了八所港，听完汇报后，胡耀邦说："海南岛要多搞苗圃，经济作物苗圃要搞20年。你有芒果，运到北京、上海会发大财，就地搞，成本低，就地育苗就地栽，就地包给专业户、联户、个人。"

13日是农历大年初一，胡耀邦风尘仆仆地从石录赶到热带作物研究院，第一句话便风趣地说："恭喜你们发财。到这里，你们招待得很好，可惜你们是清水衙门。经济效益是科研唯一成果。"

胡耀邦在视察和听取海南基层党委的汇报过程中，陆陆续续发表了不少讲话。他分析了海南岛的优势和弱点，说："海南岛最基本的优势，就是地处独特

的湿热带，能种植橡胶、咖啡、可可等热带经济作物。这里出产的许多东西全国其他地方都没有。这是一个最突出的优势。海南的弱点就是，暂时还处于封闭状态，基本上是个待开发和待开放的地区，基本上或很大程度上与外界是隔绝的，好东西运不出去，这就很难有一个大的发展。因此，要以开放促开发，以开发支持开放。开发和开放密不可分，是互相促进、互为条件的。这就是方针。”他说：“你们要放宽政策，在农业、经济作物种植等方面搞经营承包，要一个一个公社检查。……中央各部和省各厅、局不该管的不去管，这就是对海南岛的莫大帮助和促进。”他指出，对海南岛应采取特殊政策，发挥它独立自主的积极性，让它自己搞港口，自己对外。一是对国外，一是对省外。他进一步指出，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内部这个“外”，国内市场还是我们最大的市场嘛。对外省的联合可以大搞。他说：“建议赋予海南行政区较多的对外经济合作自主权，并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

1983 年春节期间胡耀邦的海南之行是中央确定加快开发建设海南岛政策的逻辑链条上一个重要环节。胡耀邦海南之行的许多内容在当年的中央 11 号文件《加快海南岛开发问题讨论纪要》中有直接的体现。此后，1986 年 8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赋予海南行政区实行计划单列，相当于省一级（副省级）的经济管理权限，从而为海南经济特区的设立以及海南建省奠定了基础。这其中凝聚了胡耀邦不少的心血。

## 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勇于改革

2 月 13 日下午，胡耀邦一行又飞往湛江，在湛江停留了 18 个小时。

在工作汇报会上，湛江地委书记姚文绪向大家谈起之前他任佛山地委书记时在佛山推行的商业改革，认为允许农民进城做小买卖，利大于弊。在座人员对此产生了不同看法，认为大批农民进城，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如农民进城后的房子问题、治安问题以及小孩读书问题等等。因此，允许农民进城做生意这扇门不能开得太大。对此，总书记态度鲜明，他说：“让一些农村的手工业专业户、商业专业户到小城镇去建设房子、建设茶馆、建设电影院，隔那么三十里地、二十里地，很快就把一个小城镇搞活起来。那不是很好吗！”对于建房资金，胡耀邦总书记很有把握地说：“动员一部分人自带资金建房子，肯定有人干。……发展小城镇，可以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

谈到改革，胡耀邦激动地站起来说：“历史上的改革，绝大多数受到领导者、统治者的压制。而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则同过去历史上的改革有着根本不同。这是中央决定的，是党中央、国务院号召和支持的！”他指出，改革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阻力，这些阻力来自思想保守的领导干部和顽固势力。所以，我们一

定要解放思想，勇于改革。

在听了地、市领导的有关汇报后，胡耀邦了解到湛江在推广杂优种植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便高兴地称赞这是湛江农业发展的“杰作”。他对中央的有关同志说：“湛江地区种子公司的办法很好！应该介绍这个公司和推广他们的经验。”他还对新华社副社长曾建徽说：“回去告诉杜润生同志，派人来这里作专访，总结该公司的经验。新华社应来这里作调查总结。办种子公司就要这样办，不是办衙门式的。”在这之后不久，人民日报、南方日报等报社专门报道了湛江推广杂优的做法，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很多地区组团来湛江学习。

在谈到干部体制改革问题时，胡耀邦用坚定的语气说：“在领导班子问题上，一定要解放思想。地市一级的领导，60 岁以上的都要退下来，不能在第一线。”说到这里，他转过头，问坐在旁边的林若，你几岁了？又问王国强，你几岁了？逐个问过去，了解到在座的省、市领导不少都超过了 60 岁。“看来，干部年龄偏大。”他说。在谈到选拔年轻干部时，胡耀邦特别强调要注意实现干部队伍的知识化。他说：“我建议下决心用 3 年时间，不够就用 4 至 5 年时间，送年轻干部去脱产学习。”胡耀邦总书记关于注重培养年轻干部的指示在湛江很快就产生实际效应。这年下半年，湛江利用地市合并的时机，大胆提拔干部，一位大学毕业没几年、年仅 27 岁的年轻干部被选进市委领导班子。

在座谈中，胡耀邦就如何发挥港口优势、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外资等问题作了指示。在谈到湛江是个港口城市时，有同志插话说，湛江港的建设早在孙中山的《建国大略》中就有规划，听到这句话后，胡耀邦马上强调指出，湛江要发挥港口的优势，引进外资，大力发展贸易，促进工农业增长。

2 月 14 日（农历大年初二）上午，胡耀邦来到南海舰队司令部看望驻湛部队官兵，在谈到形势时说：“世界大战，80 年代更加打不起来。”

在湛江视察的 18 小时内，干部群众以及部队官兵深深地领略了胡耀邦总书记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风和光明磊落的高尚品格。

2 月 14 日上午，胡耀邦一行乘机离开湛江飞往湖南长沙，结束了南粤之行。1983 年 3 月 14 日，中共广东省委印发了《胡耀邦在广东视察期间的谈话纪要》。在南粤视察的 8 天里，胡耀邦总书记的一言一行，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人性美和坚定的党性，让人如沐春风。同时，他以敏锐的政治眼光，明快、幽默、充满激情的语言，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中央关于改革开放决策的精神，旗帜鲜明地表达对改革开放和办特区的全力支持，为广东改革开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陈雷刚）

# 江泽民

## 甘霖日煦世纪行

### ——2000年南粤之行

2000年，世纪之交，万象迭替。2000年2月，是新世纪的第一个新春，万物生机萌发。南粤的春天，阳光温和明媚，到处树木葱茏，彩花斗艳。广东迎来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一行。此行，是一次载入史册的世纪之行。

江泽民首先来到南粤水果之乡高州市考察。并在高州召开领导干部座谈会，在会上作重要讲话。用高州作讲台，向全国发出加强党的建设的世纪强音。这对高州来说，是一件史无前例的大事，对全国来说，也是绝无仅有的。在高州期间，江泽民深入基层考察，进荔林，植荔树，访农家，问风俗，察市容，作报告。江泽民高州此行，使高州名扬全国。随后，江泽民又到深圳，给深圳带去春天的生机和光明前景。江泽民给广东人民带来了党中央的关怀，同时也把广东的发展经验提升到全局的高度，推向全国。

# 高州之行添春色

高州市位于广东西南部，是广东省茂名市下属的一个县级市，盛产荔枝、龙眼、香蕉，被誉为“全国水果第一县”。

2000年2月19日是中国传统节日元宵节。这一天，江泽民没有选择和家人过，而是千里迢迢，给高州人民带去节日的问候。下午，江泽民的专列抵达茂名。一下专列，江泽民没有停留，马上转乘中巴直奔高州。考察高州东部20万亩荔枝林一带。一路上，他看到荔枝献绿，万绿丛中点点红，美景如画，十分高兴。茂名市委书记王兆林抓紧时间在车上向总书记汇报了茂名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历史文化情况。江泽民的车队直奔荔枝名镇根子镇。

根子镇荔枝种植历史悠久，品种优良，1996年被授予“全国白糖罂、白腊生产示范基地”和“国家荔枝标准化示范基地”。根子镇的荔枝有“六最”：历史最久，面积最大，产量最高，品质最优，成熟最早，市场最广。

顺着蜿蜒盘旋的水泥路向山上行几百米就到了根子镇观荔亭。观荔亭大约有十几米高，分上下两层，六边形的亭沿，朱红的亭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南国春来早，荔林春绿深似海，布满山岭的荔枝梢头点缀着朵朵花蕾，迎着春风向总书记致意。江泽民满面春风地从车上走下来，一边观赏荔林，一边认真地听取高州市委书记邹继海关于发展“三高”农业的汇报。江泽民听说家家户户因为种果树富裕起来，高兴地说：“你们种果致富，做出了贡献。”江泽民走到荔林边仔细察看荔枝。这时，陪同考察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曾庆红看到汇报暂停了，便抓紧时间问：“总书记，高州的同志请你种一棵荔枝树，好吗?”江泽民听了，高兴地答应了。他风趣地说：“我也成为荔枝种植户了。”他顺便问到：他将种植的是什么品种的荔枝？邹继海竖起大拇指说：是高州特有的优质品种“白糖罂”。江泽民高兴地说：“但愿高州人民的生活像‘白糖罂’一样，甜甜蜜蜜，红红火火。”他健步走到植树的地方，接过铲子，便培起土来。如今，江泽民亲手种下的这颗“白糖罂”，已经长成大树，结出硕果。去到那里的人们都纷纷在树旁照相留念。这棵树成为高州最出名的荔枝树，为高州增添新彩。

在高州的山山水水间穿行，江泽民兴致很高。出了观荔亭，已是下午4时，江泽民提出要去一户农家探访。他被带到元坝王竹村民吴礼明家。4时20分，从刚停稳在村道水泥路上的汽车中走下一位熟悉的身影。“呵，是江泽民总书记!”憨厚的吴礼明认出来了，闻讯赶来的吴家周边的村民群众也认出来了，人群涌动。“是总书记，他来到了我们村!”大家都很激动，双手拼命地鼓起掌来。吴礼明赶忙快步迎上去，紧握着江泽民的手，激动地连声说：“欢迎首长，欢迎首长!”他的儿子吴辉也迎上前说：“欢迎江主席到我家!”吴礼明由于太紧张

了，握着总书记的手一直没放。江泽民亲切地用另一只手拍拍吴礼明的肩膀，就势拉着吴礼明进到屋里。入屋后，江泽民和吴礼明一家人并排在沙发上坐下，得知老吴一家自觉“多种荔枝少生育”，年前才添了一个小孙孙后，通晓多种语言的江泽民用广东话对吴礼明说：“恭喜你添丁发财！”吴礼明想不到总书记会说广东话，这句随和亲切的乡音，使吴礼明一下子放松下来，感到和总书记的距离拉近了。江泽民打量了一下吴礼明自家新建的三层小楼。亲切地问：“你靠什么收入来建房子的？”吴礼明回答说：“我全家务农，收入主要靠种荔枝。”江泽民又问：“种了多少荔枝？一年收入如何？”“种了两千多棵荔枝，去年全家收入三万五千多元。”吴礼明的普通话说得不好，说一年收入3万元时，把“万”字说成了“慢”，江泽民出人意料地听懂了，用广东话说了一遍：“三‘慢’元。”满屋子的人哄地欢笑起来。吴礼明很高兴，连说：“是，是。”江泽民随后又问：“那你种的粮食够吃吗？”吴礼明回答说：“够吃！”江泽民听后开心地点头说：“够吃就好！够吃就好！”

交谈中，吴礼明刚一岁的孙子泽城在沙发上爬向江泽民，要江泽民抱，江泽民非常高兴，抱起小泽城，小泽城伸出小手去摸江泽民的脸和眼镜。江泽民笑着对在场的人说：“我抱过很多小孩，一般都很害羞，想不到这小孩不怕，真是逗人喜欢。”泽城的母亲怕累着总书记，忙从他怀里抱过儿子，但江泽民的慈祥和蔼吸引了小泽城。小泽城一会儿又挣着爬向江泽民，江泽民又把孩子抱起。对小泽城说：“把你带到北京去好不好？”在场的同志一齐鼓掌，屋内回荡着一片欢声笑语。

20日中午，趁着江泽民参观意犹未尽，省委书记李长春、省委副书记黄丽满和高州市委领导带着早已备好的纸墨，到他的住地请他题字。他挥笔写下了“搞好山区综合开发，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题词，言简意赅，遒劲有力。

20日下午4时许，江泽民在高州市领导干部“三讲”教育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后，不顾疲劳，轻车简从到市区和群众见面。他心里装着群众。他说：“要和群众见见面，不和群众见面，说我悄悄来高州，又悄悄回去，群众会骂我的。”对我国隋唐岭南历史深有研究的江泽民看了宝光塔后，突然主动提出要看看冼太庙。

江泽民身穿便服，健步拾级而上，进入殿堂。他边走边看，在冼夫人的简历前轻声念到：“……为民请命，惩赵讷贪官，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和，保障地方安宁，发展经济生产……”他一边念一边含笑点头，连声赞好。他表示，当年冼夫人力排阻力不搞分裂，致力民族团结，让岭南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其功不可没，难怪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中国巾帼第一人”。参观完后，江泽民信步走出冼太庙，此时已有数千市民闻讯赶来，希望一睹江主席的风采。潘州公园一带，人头涌涌，但秩序井然，挥手向总书记问好。江泽民也向群众挥手致意，并

用标准的广东话大声说："你哋好！"群众也跟江泽民打招呼："江主席好！""江总书记您好！……"

江泽民与群众见了面，显得格外开心，回到住地一下车，他便高声对服务员说："今晚给我多准备一碗饭。"

当晚7时20分左右，江泽民和高州的同志道别前往他广东世纪之行的第二站——深圳。

## 深圳之行迎跨越

2月的鹏城，花木葱茏，春意荡漾。跨进新世纪，深圳正以勃勃英姿，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就在这个时候，江总书记到深圳来了！在深圳特区建立20周年的关键时刻，是对深圳特区最大的关怀和支持，是对深圳人民最大的鼓舞和鞭策。

2000年2月21日上午，在深圳火车站月台上，几位深圳市负责人和其他迎候的人们，在来回踱步，互相交谈，他们正以兴奋而激动的心情等待着……来了！远处传来马达的轰鸣声。接着一列长长的火车徐徐进站。时针指向8时，一节车厢门打开，江泽民出现了！人们的目光和闪光灯束都一齐投向江泽民。在时隔5年之后，他的足迹又一次踏上深圳这块熟悉的土地。

连日来舟车劳顿，省市负责人劝江泽民休息一下。但是，江泽民却毫无倦意。他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简洁的话语，充分表达了江泽民对深圳的眷念。

下车伊始，江泽民一行参观了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这是1999年新建的高科技企业，集人才培养、成果转化及产业化为一体。江泽民对这一新尝试饶有兴致，仔细询问了开办、运作情况，这种模式的实践效果和发展前景，他对深圳试行这种世界流行的产业化体制给予大力鼓励，希望他们学习世界先进做法，引进高科技、附加值高的产业。

江泽民一行接着视察了深圳市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江泽民敏锐、内行地提出一系列通讯方面的问题。嘱咐公司负责人要有自主移动通讯技术，自主开发芯片，自主掌握应用技术。这样才能有主动权，不会受制于人。江泽民的关注对于当时还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自己的通讯企业来说等于打了一支强心剂，是鼓舞和动力。

在深圳视察期间，江泽民和历次到深圳时一样，特别重视和关心特区高新技术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他指出，面向21世纪，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大力依靠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更艰巨了。如何在新的国内外条件下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增创经济

发展的新优势，要加紧研究和实践。要抓紧通过科技进步和创新来实现我们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晚饭后，江泽民意犹未尽，精通音乐的他问住地深圳市委接待办的同志，哪里有钢琴？服务人员带他到驻地内部的星园西餐厅。江泽民熟练地弹起中外名曲：《我的太阳》、《叫我如何不想她》、《洪湖水浪打浪》等等。其他人跟着节拍和歌而唱，他负责伴奏。他与大家一起弹唱近两个小时，歌声把大家的距离拉近了，气氛十分轻松。

22日，江泽民来到全国闻名的先进典型龙岗区布吉镇南岭村，看望村民，考察农村基层的党建工作。他语重心长地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中国共产党应该怎么前进？现在我们这里都致富了，我就想，致富了要思源，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是很了不起的。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越有必要在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在发展较快地区的干部群众中开展“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教育活动。这是江泽民向经济特区提出的新课题。“致富思源”之“源”就是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和正确；“富而思进”之“进”就是要求特区与时俱进，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



2000年2月，江泽民到深圳南岭村视察。

村民觉得跟总书记在一起的时间过得很快。参观结束，南岭村的干部群众送江泽民上车，他上了车又走下来同村党总支书记张伟基握手，并高兴地双手抱拳向群众告别。

深圳特区20年里始终吸引着千千万万中外人士的目光。这是因为，20年间深圳取得了令世界震惊的成就，创造了世界范围内最快的发展速度。江泽民的深圳之行，使特区迎来了新的更大的跨越。

## 从广东发出的“中国共产党宣言”

2月20日上午，江泽民召集高州市党政领导班子在高州中山纪念堂召开关于开展“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的座谈会。他向到会的同志提

出了一连串问题。江泽民向邹继海提出“现在基层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怎样?”这个问题，邹继海想了想说，现在基层的共产党员大都相信共产党，愿意跟共产党走，但也出现了一些诸如封建迷信等问题。江泽民点了点头，若有所思。江泽民又提出“高州现在的年青党员比例是多少?”当听到说“大约占37%左右”时，江泽民说，那这个比例低了点，要达到40%以上，年青党员是我们事业的接班人，要注意解决这个问题。面对基层党员干部，他讲到了基层党建的重要性。他说：“我作为党的总书记，总在想有关党的问题。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掌握政权的是国民党，但最后被我们打垮了。我们靠什么？就是靠老百姓的支持。”他指出：基层党的建设是我们党的工作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江泽民通过高州讲台寄语基层干部：“21世纪的前20年，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至关紧要的时期，也是现在的县（市）级干部经受锻炼、增加经验、发挥才干的至关紧要的时期。”“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的各项工作，能否最终落实到城乡基层，真正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关键要看县（市）的工作。县（市）工作做得好，我们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才有坚实的城乡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20日下午，在高州市礼堂召开了有近400名干部参加的“三讲”教育动员大会。江泽民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当前世界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多极化格局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党能不能始终与时俱进，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成为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领导核心，进一步改革开放，与国际经济接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这是党面临的严峻考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党员、干部队伍的构成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我们要使党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成为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始终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始终坚强有力地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也必须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进一步从思想上、组织上和作风上把党建设好。

江泽民在高州第一次提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成为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的思想。这是“三个代表”思想的第一次部分表述。

会议结束后，江泽民离开高州，接着，他又马不停蹄，深圳、顺德、广州，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想。

25日上午，江泽民在广州省委小岛中心会堂听取省委常委汇报后发表讲话，第一次向全党完整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指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

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他还向全党提出：“人类又来到一个新的世纪之交和新的千年之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更好地做到这‘三个代表’，是一个需要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深刻思考的重大课题。”

江泽民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论述，鞭辟入里，具有非常丰富的思想内涵，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问题，是对党的性质、根本宗旨和历史任务的新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是新形势下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的新要求。这是在世纪转折的重要历史时刻，基于对国内外形势、党肩负的历史任务和党的自身建设实际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从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作出的战略性思考，为我们党面向新世纪，进一步巩固自己、加强自己、提高自己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三个代表”的提出是江泽民从广东发出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因为已经跨过新世纪，改革开放二十年了，广东创造了很多新经验，涌现了很多新思想，践行了很多新实践，进行了很多新改革。经济、社会得到全面发展，生产力突飞猛进，是全国的经济大省，经济总量多年居全国第一。广东的发展，得力于党的领导，得力于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实干，反过来，群众的支持是因为党的政策符合群众的利益。群众有积极性了，生产就发展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人民群众富裕了，富裕了就可以提高人的素质，追求文化的进步，追求社会的文明。这是节节相连，环环相扣的。因此，江泽民在广东的考察和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总结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选择广东作为这一思想的首发地，把广东的经验提炼总结推向全国，带动全国的发展，将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21世纪。

世纪之交，新思想的鼓点再一次从广东——这片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和理论创新的热土擂响。广东是幸运的。邓小平南方谈话选择了广东，江泽民“三个代表”的提出地选择了广东，后来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首发地也选择了广东。这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机遇，说明广东创造了真理，真理选择了广东。江泽民在结束对广东工作的考察前，亲笔为广东人民题词：“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对广东各级党组织和广大群众的极大激励和鼓舞。

（肖燕明）

# 杨尚昆

## 复出挑重任，南粤立奇功

1979年1月19日下午5时许，从北京南来的客机徐徐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一位头戴深灰色鸭舌帽，身穿黑色呢子长大衣的老干部，轻快地走下舷梯，看上去个子很高，很清瘦，但很有精神和风度。在停机坪接机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省委常委兼秘书长杨应彬等快步上前，同满面笑容、早已伸出双手的这位老同志亲切握手，紧紧拥抱！这位貌不惊人的老干部，就是鼎鼎大名的杨尚昆。

杨尚昆此次复出抵粤重任在肩，中共中央1978年12月10日任命他为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兼中共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在出席翌日上午召开的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时，杨尚昆指出："我们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就是一句话，要把经济搞上去，让广东人民尽快富裕起来，国家富强起来。这是党和人民赋予我们每个党员领导干部的新的历史责任！"短短数语，言简意赅，切正要害，给全体与会者以极大鼓舞和鞭策。

## 试办特区，为全国创造经验



1979年，杨尚昆视察新丰县小型水力发电厂。（孙铁钟提供）

会后，习仲勋、杨尚昆带头，组织省委常委、省直、广州市、省军区等80多个工作组，共300多位干部，分别下到全省8个地区、70多个市县，宣传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进行调查研究。

2月底至3月初，在习仲勋和杨尚昆的主持下，省委常委集中8天时间开会，听取书记、常委们下乡调查研究的情况汇报。常委一班人进一步统一了认识：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就是要充分发挥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商品经济历来比较发达的地缘人缘优势，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尽快扭转广东经济落后的局面。要在全省采取一些优惠政策来吸引港资、外资，要在边境地区划出一块地方来搞出口加工区，要请求中央多下放一些权给地方，让广东“先走一步”，以加快经济发展，使人民的生活逐步富裕起来。

随后，习仲勋、杨尚昆等省委领导把常委会上议定的精神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委员长汇报，叶帅十分欣喜，指示省委要赶快向中央、向小平同志报告。

4月1日、2日，杨尚昆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分别讨论准备向中央汇报的两个文件：《关于广东经济工作的汇报材料》、《充分利用广东省有利条件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4月1日的讨论中提到请求中央解决的几个问题，包括减轻广东粮食上调任务，下放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合作的权力，提高同中央外汇分成比例，帮助广东解决电力、燃料、交通运输紧张等问题。2日的常委会议上，发言更热烈，意见更集中：要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中央请求，充分发挥广东的特殊优势，让广东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先走一步”。杨尚昆在会议小结时，充分肯定了常委们的意见，明确提出：请习仲勋、王全国同志把省委的意见先口头向中央汇报，向邓小平同志报告，争取中央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他还明确指出：“广东先走一步，让地方松动一些，可以为全国创造经验。”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王全国汇报了省委的意见，请求中央“放权”，阐明广东“先走一步”的思路，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根据叶帅的指示，习

仲勋在会议期间还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完全赞同和支持，明确表示："还是叫特区好，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谈及请求中央给些配套资金时，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根据小平的提议，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中央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同意广东试办出口特区。并决定派谷牧副总理率中央工作组来广东协助省委研究起草相关文件。

在家主持工作的杨尚昆，根据习仲勋交代省委副秘书长张汉青从北京传回的电话内容，于4月23日主持省委常委会议，着手成立省的"特区筹备组"，起草向中央工作组汇报的材料，草拟《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

5月，谷牧率中央工作组来到广东，就省委提出"先走一步"的建议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同省委一起草拟《关于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习仲勋、杨尚昆多次主持和参与讨论。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即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创广东、福建乃至全国改革开放历史新纪元的"中发〔1979〕50号文件"。广东坚决贯彻中央50号文件，改革开放，试办特区，发展经济，揭开了崭新的历史一页。

省委采纳国内和港澳专家关于办特区要有法可依的建议，交由省经济特区筹备组参考海外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的法律法规，草拟《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习仲勋、杨尚昆多次组织讨论，十三易其稿，两度提交省人大通过。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委员长亲自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厦门设置经济特区，讨论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1980年春，杨尚昆在视察珠海特区时，了解到珠海的渔民出海捕获的渔产品，过去可以直接卖给港澳市场，换购回渔网、柴油之类的生产、生活资料，对此，我驻港澳有关机构持有异议。杨尚昆便请来这些机构和主管部门负责人做协调解释工作。很快，不仅珠海渔民可以把渔产品直接卖给港澳市场，珠海农民种的鲜花、蔬菜也可通过边境小额贸易方式出口到澳门。当他了解到珠海市委内部对规划兴建九洲港客运码头因泥沙回淤太大而决断不下，就要求吴健民书记陪他去察看九洲港现场。问明情况后，杨尚昆对陪同的吴健民等市领导说：珠海作为特区，又是新兴海滨城市，对面就是澳门，必须要有客运码头，以缩短从深圳、香港往来珠海的行程时间，改善特区的投资环境，促进珠海特区甚至珠江三角洲西部的经济发展。在杨尚昆的支持下，九洲港项目很快上马。1984年5月，胡耀邦总书记视察珠海特区，就是从深圳特区的蛇口港乘炮艇在九洲港登岸，航程一个小时。九洲、蛇口直接通航，标志着世代以来珠海、深圳两地人民互往，必须

绕经中山、顺德、广州、东莞的历史已经结束。

1981年1月，杨尚昆在调回北京之前，再次视察深圳特区。回到广州后，他同前来看望他的梁灵光等省市委领导同志说：特区才刚刚起步，开局很好，面临的困难也很多，还要几年艰苦创业。广州是特区的老大哥，要在干部、技术、人才、物资等方面多点支持特区。省委、市委都要很好研究这个问题。不久，广州市委副书记杜祯祥写信给主管省特区工作兼深圳市委书记的省委书记吴南生："南生同志：尚昆批示要广州支援深圳建设和市场供应。望派一两位同志来广州具体研究。"后附深圳特区所列请求广州支援的人员、物资清单，十分具体。

从1979年开始创办特区，到1998年1月，杨尚昆8次视察深圳，12次视察珠海，2次视察汕头，2次陪同邓小平南方视察……杨尚昆对经济特区情有独钟。

## 解决交易会来宾住房问题

1979年的春交会在广州如期举行。4月14日晚，开幕酒会结束后，杨尚昆来到宾馆大堂，看到大堂内以及通往二楼的梯道上，坐着许多胸前挂着"来宾"条、身边放着行李的西方客人，还有些来宾提着行李在大堂外徘徊。杨尚昆问我（时任杨的秘书）：为什么在东方宾馆集聚着那么多外宾？我如实回答说：肯定是安排接待外商的涉外宾馆不够房间分配，来宾拿不到入住酒店的通知单，只好滞留在东方宾馆，等待安排酒店。这两年每届交易会都有发生类似情况，只是这次可能严重些。杨尚昆要我马上给梁湘和关相生（参与交易会接待工作的省委副秘书长）挂电话，转达他的意见：今天晚上要想尽一切办法，将所有应邀前来参加交易会但还没有安排住房的外宾和港澳同胞，都安排住进宾馆，不属于涉外宾馆的，只要够条件，也要腾出房间给外宾和港澳同胞住。因为他们都是我们国家邀请来的客人。

当夜，经梁湘、关相生等领导和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终于缓解了这个难题，主要是把越秀宾馆全部房间腾出来给外商住，已入住该宾馆的外贸部领导和中央各部各省市交易团负责人连夜搬去三元里的市财贸招待所，各交易团一般工作人员安排到市内其他招待所。凌晨一点多了，我把处理结果向杨尚昆汇报后，他才放心地上床睡觉。

4月22日，杨尚昆在广州市委常委会议室召开专门会议，检查交易会开幕时发生部分来宾无房住的原因，提出整改措施。杨尚昆提出了以地方为主、改进管理体制等六条整改措施，接着十分严肃地指出：在4月14日同一天发生的交易会部分来宾没房住的问题，有一个麻风病人躺在中山纪念堂正门口十几个小时无人收容的问题，海外都报道了，在国际上造成极坏的影响。暴露出一些党政机关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必须严肃整顿，借此以整顿机关作风。

7月13日，杨尚昆主持召开广州市委常委会议，专门研究10月秋交会的接待安排问题，提出7条意见。

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落实杨尚昆提出的改进措施，从而保障了以后各届交易会的顺利举办，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事业的健康蓬勃发展。

## 借外资改造旧东方宾馆

1979年春交会住房紧张的情况发生后，在杨尚昆亲自领导下，省和广州市都切实加快了利用外资大规模改造旧宾馆、建设新宾馆的步伐。

东方宾馆一马当先。时任宾馆总经理的杨献庭春交会还未闭幕就召集宾馆领导人研究宾馆改造方案，初步估算需港币2000万元。杨尚昆主持市委常委会讨论批准了这一改造方案，所需资金由宾馆自筹自还，特许其营业收入的外汇券不上缴，用于还贷。杨尚昆还建议研究边改造边营业的可能性。

那时，国家对外汇控制非常严格，地方没有外汇审批权。在省和市的支持下，东方宾馆几经周折和努力，请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批了2000万港币的外汇指标，请中国银行广州分行作了个“不负经济责任”的担保，在香港中资银行未予同意贷款的情况下，转而向香港汇丰银行高息借贷2200万港元。

东方宾馆从1979年12月1日正式动工改造，到1980年12月27日，改造工程全部完成。由于采用了边改造边营业的方案，在1980年改造期间，宾馆营业总额达到2446万元，比1979年增长120%，除还清贷款外，上缴利润同比增长32.6%。创造了利用外资改造旧宾馆当年借贷、当年偿还、当年获利的奇迹般的经济效益。

对杨献庭借外资改造东方宾馆，当时褒贬不一，状告杨献庭的也不少。杨尚昆的态度很明确：既充分肯定杨献庭利用外资在一年内成功改造东方宾馆的成绩和说干就干的魄力，为广州旧宾馆改造提供了经验，又明确指出，在国家外汇十分紧缺的情况下，如果所有客房的烟灰缸真是用外汇从香港进口的，一经查实，就要严厉批评。对有人反映杨献庭存在经济问题、生活特殊化等嫌疑问题，杨尚昆明确表示，请宋大姐（市委纪检组副组长宋维静）派人查实后再视情处理。1980年期间，尚昆多次到过东方宾馆，对改造工程表示满意，提醒杨献庭在改革开放中既要大胆敢闯，又要谨慎小心，坚持原则，防止在赞扬声中犯错误。

## 引进外资兴建新宾馆

杨尚昆担任省、市主要领导职务期间，从1979年开始先后上了三个大型外资宾馆项目：一是由香港霍英东、彭国珍先生部分出资，和省旅游局合作兴建的

白天鹅宾馆；二是由香港胡应湘、冯景禧先生等多位股东组成“新合成”投资，同广州市羊城服务公司合作兴建的中国大酒店；三是由香港利铭泽、黄球先生等多位股东组成的“香港花园酒店有限公司”投资，同广州市岭南置业公司合作兴建的花园酒店。这三大外资宾馆，投资总额、宾馆规模、设备先进、管理科学等，在当时我国的旅游宾馆行业中，都堪称第一。杨尚昆对这三家宾馆的建设，从谈判到选址，从审查设计到奠基、开业，都曾亲自参与或主持。

白天鹅宾馆投资5000多万美元，花园酒店投资9亿多港币，中国大酒店投资1亿多美元。如此大规模的基建投资项目，当时中央仍限制发展“楼、堂、馆、所”，按照国家规定，省里根本无权审批，必须报请国家批准。有关人员拿着省的文件，找国家计委等有关部委请求审批，他们都说投资额太大，又都是外资，国务院没有授权，他们无权批。杨尚昆听了利铭泽、霍英东的代表从北京回来后的汇报，也感到很棘手。正在这时，他和习仲勋去看望叶帅时，汇报了这一情况，叶帅说：有中央50号文件在手，你们自己审批就行了。叶帅的指示，简明扼要，画龙点睛。从此，省就按照中央50号文件授予的权限，外商投资项目按其投资额大小，分别报请省市审批，有的报中央备案，简化了审批程序，提高了办事效率。

杨尚昆多次接见三大宾馆的香港投资方，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霍英东、利铭泽、胡应湘等每次来广州，他都要抽时间去看望他们。他和习仲勋、刘田夫、梁威林、林西等同志一起，多次审查白天鹅宾馆的设计方案，对广州著名岭南园林设计专家佘峻南、莫伯志设计的以“故乡水”为主题的室内园林山水、高山瀑布、小桥流水十分欣赏，赞不绝口。

广州市有领导人对挖掉象岗山建中国大酒店的方案，提出反对意见，杨尚昆本着遵守信誉和承诺、顾全大局、多做工作的原则，尽力说服有关领导和部门，仍按双方在香港签订的合作意向书执行。中国大酒店聘请了德国人卜格先生当第一任总经理，月薪高达6000美元，社会议论纷纷。杨尚昆听了胡应湘先生的解释，认为值得。一次视察中国大酒店时，他听了卜格总经理的汇报，看了酒店设施，感到很满意，高兴地对他说：胡应湘先生很有眼光，用高薪请了你这位洋专家来，把酒店管理得这么好，经济效益也很好。勉励他要培养出更多的酒店管理专家。

利铭泽先生想到国内建旅游酒店，1978年起在北京等地谈了一年多，双方因条件谈不拢而未果。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王匡建议他来广州建酒店，并亲自写信向杨尚昆举荐，廖承志副委员长对此也积极支持，杨尚昆立即组织广州方面积极开展合作谈判和相关筹备工作。但酒店建在哪里，市规划局选了几个地方，如广州起义烈士陵园正门对面的广场等，利先生都不满意。

一次，杨尚昆请利先生在33层高的白云宾馆顶层喝早茶，请了主管城建的

市委副书记林西、市规划局长戴机等作陪。餐前，他陪利先生站在朝南面的窗前，凭窗眺望，大片绿色菜地，一望无际，坡地上长着许多树木，晨曦穿过薄雾，眼前呈现一片若隐若现的绿色仙踪。他随意问林西：这叫什么地方？林西说：前面这片菜地叫青菜岗，左边那一片叫淘金坑。他胸有成竹却又试探性地问利先生："青菜岗这一片菜地很开阔呀，利先生你看怎么样？"利先生高兴地说："这幅田园景色太美妙了。"说完，利先生顿有所悟，用兴奋而又感激的目光看着杨尚昆，明快地表示："就在这青菜岗划80亩地给我建酒店吧。"他会心地笑笑，望望林西和戴机，说："利先生看中了这块菜地，你们同规划部门研究一下，尽快给利先生一个满意的答复。改革开放，城市发展，青菜岗、淘金坑这一带迟早都要开发的，我们就请利先生在这里先带个头吧！"真是："踏遍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一个早餐的时间，就把利先生几个月甚至几年来没有解决的建酒店选址问题给解决了。

1980年3月，利先生在广州同广州岭南置业公司签署了建造和经营花园酒店的协议书，杨尚昆高兴地出席了签字仪式。同年12月，杨尚昆为花园酒店奠基，在奠基石上连敲三锤，连说三声"基础稳固！"

花园酒店在施工期间因受当时香港政治因素影响，出现股东筹资困难，曾一度面临停建的处境。对此，省市领导都非常重视，也牵动了已回北京工作的杨尚昆的心。他亲自找廖承志、港澳工委、中央有关部门寻求解决办法。后来经多方协调，终由广州市政府出面担保，由香港中国银行牵头组成银团贷款7亿港币，作为工程周转金，使花园酒店渡过难关。

杨尚昆对这三家外资宾馆的建设倾注了不少心血。1987年全世界排名的69座五星级酒店中，我国占四座，即广州的白天鹅宾馆、花园酒店、中国大酒店和东方宾馆。

## 向澳门借钱修桥

1980年12月，杨尚昆应邀出席中山温泉宾馆开幕典礼。这是霍英东先生投资兴建且开业最早的全省第一家大型旅游宾馆，港澳许多知名人士都应邀出席开幕礼。

当天下午，杨尚昆同利铭泽从广州出发去中山温泉宾馆，途中必经两个大渡口，虽经省委警卫处特殊安排，车队过渡时不用排队等候，但行程仍达几个小时。晚上，杨尚昆同何贤、马万祺及南光公司董事长柯正平见面时，直截了当地向柯正平提出，请他想办法在澳门借点钱，把广州到珠海的四座公路桥修起来（这话实际上是讲给何贤、马万祺听的）。还说："要办些什么手续，由省出面；还钱，也由省负责，可考虑用收过桥费的办法解决。你去找田夫同志具体商量一

下，他会支持的。”

柯正平很快同何贤、霍英东、马万祺、何鸿燊等商量，决定由何贤将葡京酒店右侧的篮球场那块私地抵押给葡京娱乐公司，再由葡京娱乐公司向澳门的银行借贷相应数量的资金，再将资金注入为此而专门成立的澳门南联公司，由该公司借贷给广东方面。1981 年 8 月，广东省公路建设公司同澳门南联公司正式签署贷款 1.5 亿港元建设广州至珠海公路上四座大桥的协议书，桥的总长度达 3000 多米。

1983 年上半年，广珠公路上第一座位于顺德县境内的“三洪奇”大桥正式通车。此举的成功，不仅开创了我省利用外资建桥的先河，揭开了省内无渡口通车的新的历史一页，还实行了过桥、过路收费，以桥养桥，以路养路的全国首创。

## 要让广州百姓吃活鱼

杨尚昆多次在广州市委常委会上提出要搞活市场流通，让市民能吃上活鱼活鸡。他对市委秘书长欧初和分管财贸工作的市革委会副主任左铭说：“我在顺德、中山，看到农民养了很多塘鱼和甲鱼，农民说卖不出去。你们去顺德同黎子流同志商量，能不能够想些办法，把那里的塘鱼、甲鱼运到广州来，放开供应，让老百姓吃上活鱼。”还指出：“财贸商业部门的同志，一定要想办法把市场搞活，不要还是过去搞计划经济那一套，管得过严，统得过死。市场上的商品多了，物价就可以平抑下来。”

不久，广州市商业部门打破“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的计划经济模式，逐步开放市场，放开物价，建立河鲜货栈，让珠江三角洲农村的鲜活水产品进广州，首先搞活了市内的鱼货市场。1980 年，广州先后发了 4 个文件，对个体商业从舆论、政策、资金、场地等方面给予扶持。在荔湾区兴建清平农贸市场，这是广州市区内第一家农民可以进城摆卖鲜活商品的交易市场，人们自由购销，价格随行就市。杨尚昆和市领导前往参观，高兴地说：“你们开了一个好头。要逐步把农副产品的市场和价格放开，不要管得太死。”有了这些基础和成功的经验，广州市在搞活市场、放开农副产品价格方面，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并且被评为广州市“1979—1986 年十件大事”之一。

## “救”了培正中学

为了尽快恢复广州的教育秩序，提高教学质量，市委决定新办一所师范学院。市里提出，利用 57 中原有校舍办师范学院，节省投资和时间，很快就能招

生开学。然而，在执行中却遭到57中教职员工和侨务部门的坚决抵制。57中原名培正中学，是一家很有历史的学校，在培正毕业的许多学生，后来移居海外，在美加、港澳等地事业有成，就捐资给母校建教学、办公楼宇，校园内现存的许多建筑物都很西洋化，或者古色古香。

57中的反对意见不被市主管部门采纳。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校领导通过花县县委书记找到孙铁钟，向孙铁钟详细反映了情况。为慎重起见，孙铁钟立即找东山区教育局了解事情原委，查阅了他们提供的大量文字资料，然后向杨尚昆作了详细汇报。杨尚昆感到，问题的性质，不仅涉及教育方面的政策，还涉及侨务政策的问题。他认为，广东是著名侨乡，海外华侨众多，落实好侨务政策，是我们党和国家一贯的指导方针。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更需要广大侨胞和港澳同胞的理解和支持。因此，他倾向于保留培正中学。他将自己的意见同市的有关领导说了，请他们研究解决。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57中的问题不仅没有妥善解决，反而矛盾被激化。8月下旬，57中的领导直接向孙铁钟反映：师院筹备组人员已经进驻57中，进行开学的有关准备，不准57中的教职员工回学校上班。

9月1日学校开学在即，杨尚昆很担心，如果处理不好，双方人员发生肢体冲突，会闹出大事。便在8月29日忙了整整一天之后，仍决定晚上开会解决57中的问题。杨尚昆听取了各方申述的不同意见，很严肃地指出："撤销57中，改办师院，这么大件事，肯定要经过市里同意。现在看来，市里当时的决定就是错误的，首先是我就不知道57中的后面还有个培正中学的历史背景。现在的问题，名义上是撤销57中，实质上是撤销一间同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很有历史渊源的培正中学，违背了党的侨务政策，这才是问题的要害。57中的领导向我提出，在57中校园内，不仅不能办师院，而且还要恢复培正的校名。他们这是顾全大局，拨乱反正，维护党的侨务政策的，我支持他们的意见。师院不仅还要办，而且一定要办好，但必须另选新址。投资不够，市里挤点资金追加一点，还可分批建设，分期完成。"

事后不久，我们在市委机关听到一条"消息"，说杨尚昆之所以那么关注57中的问题，连夜开会，严厉批评，是因为他的秘书的小孩在57中读书。一次从市委下班回家的路上，杨尚昆风趣而又诙谐地对我说："小孙，你的那个'小逃犯'真了不得，不到两岁，就上中学啰！"说得我们和司机、警卫员都捧腹大笑。我的小孩名叫越宇，粤语谐音"越狱"，故尚昆和他家人都戏称"小逃犯"，1979年以来他们一直是这样称呼的。

## 拨乱反正，落实政策

1979年，杨尚昆视察佛山地区以及广州郊区的增城、龙门等县时，鼓励各



杨尚昆1979年视察增城工艺品加工厂。(孙铁钟摄)

级领导干部要放下包袱，落实各项政策，放开手脚，带领广大干部群众一心一意发展经济。

1979年2月，广东省委发出认真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和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有关文件，平反冤假错案。2月开始，省委重点清理了对广东具有特殊意义的两大案件：一是推翻了林彪、江青对所谓“南方叛徒网”的诬陷，对被诬陷、受迫害的干部平反昭雪；二是经党中央批准，对广东历史上“反地方主义”一案予以平反。

“反地方主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历史上一个重大案件，曾经长期伤害过一大批广东籍干部。古大存、冯白驹被诬陷为“冯古地方主义反党联盟”，方方犯了“地方主义错误”。受牵连的地方干部多达2万余人，部分外省籍干部也受牵连。习仲勋和杨尚昆长期在中央工作，深知这一案件极其复杂，牵涉面甚广，影响深远，但他们仍然下决心要为“反地方主义”平反。从2月省委决定对“反地方主义”进行复查，至10月中共中央批示同意彻底平反，习仲勋和杨尚昆无私无畏，态度十分坚决，但又非常细致地做好平反等各个方面的善后工作，从而达到增强团结，调动干部积极性的目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政治观点不同而被宣布为“反革命”的“李一哲”群众组织，在社会上尤其是青年中有些影响。省委慎重研究，决定为其平反。1978年底，习仲勋主持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把已经被判刑的“李一哲”主要人物李正天、陈一阳、黄希哲、郭鸿志从监狱中释放出来。杨尚昆除多次陪同仲勋接见“李一哲”成员外，还代表省、市委，两次在珠江宾馆同“李一哲”的第一号人物李正天谈心。经杨尚昆等省委主要领导的耐心启发和教育，李正天说服其他年轻人，放弃举行集会要求省委公开为“李一哲”平反的主张。

1979年12月，杨尚昆主持市委常委会，对钟明、高辛、吴有恒的历史问题，以及后来对林西的历史遗留问题，都作出审查结论，予以平反，委以重任。对被错划为“右派”的摘帽工作，也是一丝不苟。

(孙铁钟)

# 李 鹏

## 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上世纪80年代初，李鹏多次到广东视察，为广东的改革开放鸣锣开道，给广东人民以关怀和鼓舞。他的足迹遍布南粤大地，留下了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

### 十七次视察大亚湾核电站

从1982年首次踩着泥泞的小路考察大亚湾核电站厂址至今，李鹏曾十七次视察大亚湾核电基地，对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与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28年前的大亚湾还是一片沉睡的滩涂和山岭。1982年7月4日，时任水电部第一副部长的李鹏冒着小雨，来到大亚湾的凌角石和大坑，考察核电站站址。

作为我国第一座商业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不可避免地在决策层引起了争论。水电部已向国务院呈文，认为广东合资建核电站方案合理，建议“六五”期间动



2004年1月4日，李鹏、朱琳与蓝仲凯（左一）、崔鸿兴（左四）在惠州大亚湾石化基地三棵树观景台。

工建设。12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第四次讨论广东核电站问题，最终拍板将广东核电站正式确定下来，这一天，李鹏在日记里写道："今天是有重大意义的一天。核电站项目基本通过，我和选平心里实在高兴。"

1984年4月10日和1985年1月1日，时任副总理的李鹏两次率队来到大亚湾，此时，大亚湾核电站工地正在移山填海、架线铺路，进行"三通一平"建设；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精英集结深圳，轮番展开与香港的合营合同谈判，与法、英两国之间的三大合同等谈判。李鹏两次来到工地，对核电站"三通一平"和水库建设等前期工程表示满意，在深圳召开的国务院核电领导小组会议上，他强调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办好核电站的重视，指出审查与香港的合营合同有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要把这件事办成。当然，办成是有条件的。

1986年4月26日，原苏联发生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由此滋生的"恐核"情绪也波及到距大亚湾50公里的香港。5月20日，李鹏第四次专程视察了大亚湾核电站工程施工现场，要求核电工程建设要自始至终贯彻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方针，采取极端认真的态度和更有力的措施，来确保核电站的安全。贯彻邓小平同志"建核电站不能改变"的决策精神，李鹏在北戴河主持会议，听取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汇报，制定了平息风波和保证大亚湾核电站建设按计划顺利进行的具体安排。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1987年9月，大亚湾核电站主体工程正式开工不久，在核岛厂房基础设施施工中发生了漏放钢筋事件，大亚湾核电站再次成为香港舆论的中心。事件发生后，李鹏召开紧急会议，强调要坚定信心，不要动摇，做好工作。11月9日，停工55天的大亚湾核电站一号核岛土建工程全面复工，风波渐渐平息。次年1月3日李鹏第五次考察核电站工地，反复强调施工中一定要保证质量，加强管理，严格要求，同时，要切实节省投资，保证施工进度。

1990年，大亚湾核电站工程进入核岛、常规岛安装的关键阶段。历经风雨的大亚湾又遇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挫折。核岛安装工程的一再拖期使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好像陷入了"失控的泥坑"，合营公司总经理昝云龙形容当时的情形是：

“好像进了一个黑暗没有尽头的隧道，不知道光明何时出现。”

1990 年 2 月、1991 年 10 月、1993 年 1 月，李鹏总理三次来到大亚湾核电站，现场了解情况，就大亚湾核岛安装问题发表讲话，会见核电站中外建设人员，同参加核电站建设的外国承包商负责人及专家会面，会见法马通公司副总裁德高，多方面做工作解决问题。1993 年 1 月 4 日，在第八次考察大亚湾核电站的当天，李鹏在日记中写道：“回想前年 11 月到此，由于二三公司工程施工质量发生问题，造成辅助管理安装延期近一年，当时真有点一筹莫展。现在看来，前年的决策，即把辅助管理安装责任交给法国法马通公司是正确的。工程进展顺利，已接近开花结果，大家都很高兴。”

1994 年 2 月 1 日，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大亚湾核电站一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2 月 6 日，李鹏总理第九次来到了大亚湾，为庆典剪彩。也就是在这次大亚湾之行中，李鹏召集相关人员，提出成立广东核电企业集团，负责大亚湾核电一期的生产、二期的建设；实行以核养核的方针。这些意见，为大亚湾核电站持续发展提供了指导方针。

1997 年 2 月 11 日，李鹏第十次考察大亚湾核电站。5 月 15 日，大亚湾二期工程岭澳核电站主体工程正式开工，李鹏致信祝贺。

此后几年，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心系核电，关心着大亚湾核电站的成长。1998 年 11 月 18 日，2000 年 2 月 10 日、2001 年 1 月 31 日，2002 年 7 月 1 日，先后四次莅临核电站现场，了解大亚湾核电站生产情况，并察看了与之相邻的岭澳核电站（二核）施工工地。目睹了大亚湾核电站自 1994 年投入商业运行以来，在保证安全生产的基础上，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与国际同类机组比较，已达到较好的水平，利用“以核养核、滚动发展”的方式，岭澳核电站工程进展情况顺利，对缓解广东省和深圳市日益紧张的用电局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李鹏十分高兴。

2005 年 1 月 4 日，李鹏第十五次来到大亚湾核考察基地。他登上岭澳核电站的观景平台，俯瞰全貌，询问核电站建设对周边地区与海水环境的影响，当听到核电集团负责人汇报两个核电站建成运行以来，各项环境监测指标远远低于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与运行前设计的安全限值相比，没有明显变化时，李鹏连连点头：“这样很好！”李鹏专门与参加核电站建设的老同志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在岭澳核电站的主控室，向当班员工了解核电站的安全运行情况，勉励核电站全体工作人员努力工作。

2008 年 12 月 28 日，“与改革开放同行——大亚湾核电站 30 年”座谈会在大亚湾核电基地隆重召开，一直参与决策和支持大亚湾核电站建设的李鹏第十七次来到了大亚湾核电基地。他说，通过几代核电人的共同努力，诞生在改革开放春天的大亚湾核电站，以其 30 年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印证了党中央、国务院

的正确决策，以实践充分验证了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高起点起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大亚湾模式”是发展我国核电事业的一条成功之路。

“春到大亚湾，秋来结硕果，年复又一年，硕果结满园。”30年前的大亚湾还是一片沉睡的海滩。如今，这片海滩上，坐落着我国目前最大的核电基地——大亚湾核电基地。6台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机组巍然耸立，勾勒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核电高起点起步、跨越式发展的足迹，也记载了包括李鹏在内的决策、支持者和几代核电人的努力与心血。

## 为深交所鸣钟开市

李鹏曾两次为深圳证券交易所鸣钟开市，一次是1993年1月5日，一次是1998年11月16日。

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试业，敲响了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股票交易开市的钟声。当时的深圳证券市场刚刚起步，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试验中探索前行。

1992年8月10日，深圳发生了轰动全国“股票抢购事件”。当时市政府发售1992年新股认购证，来自全国各地和深圳的100多万人排队买表，掀起抢购狂潮，再加上群众发现有徇私舞弊行为，街头出现了游行示威和打砸抢事件。此事暴露出当时深圳证券市场发育不成熟、运作不规范等问题。

15年后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的李灏回忆此事，称“平生最惊心动魄的就是这件事了”，事情发生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视察后不久，如果冲击边检，冲击政府机关，出现重大冲突流血事件，怎样向中央交代？

消息惊动了中南海，11日凌晨两点半，李鹏总理亲自给李灏打来了电话，询问情况。“我向他报告，我们动用明年股票发行额度，加印了500万份抽签表，事情已经平息，股民都去排队了。我告诉他，我们处在一种除了这个办法外，神仙也挽救不了的局面，挨什么处分我都认。李鹏说，你在第一线，你了解情况，就按你的意见办。我很感激李鹏，在这关键时刻他支持了我的紧急措施。”李灏这样回忆。

11日一大早，身在北京的李鹏就召集相关人员开了会，会议决定：（1）股票继续试点，不动摇，但发行股票只限于深圳、上海两地；（2）成立股票证券监督委员会；（3）不上市股票以及内部发行股票，可能流入黑市，这类股票暂缓发行。同年10月，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监会成立，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3年1月5日上午8点45分，李鹏在谢非、朱

森林、厉有为、李灏、深圳市副市长张鸿义等陪同下来到了两天前正式投入运作的深交所新交易大厅。

位于大剧院内的深圳证券交易所新址比过去宽敞豪华了许多，原址只有32个出市代表座位，新址已扩至210个，新安装的股价行情电脑显示板，数十种股票在不停地显示着前收市、今开盘的数据……

李鹏对证交所股票行情电脑显示板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不时地向陪同参观的人员询问情况，仔细地了解深圳股票上市的条件、深圳的股价指数、深圳证券委员会组成情况以及一些股票发行情况。

深交所副总经理禹国刚、王健向李鹏总理汇报异地会员上市的情况以及证交所发展的前景。

快到9点开市时间了。这时，大家一起上楼来到了二楼的平台上，王健、禹国刚盛情邀请李鹏总理为证交所鸣钟开市。李鹏总理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走上前去，拉响了开市铜钟。

时隔五年之后的1998年11月16日，时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又一次考察新落成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再次为深圳股市开市敲钟。

李鹏此次考察深圳证券交易所，主要是为了尽快出台证券法而进行立法调研。此时的中国证券市场，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发展，已具有一定规模，在筹集社会资金，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经济结构，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证券市场迫切需要法律规范，用法律来保障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李鹏在深圳主持召开了两次座谈会，分别邀请广东省和深圳市政府有关部门、证券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上市公司、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和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30多人，就证券法草案中涉及的有关如何确立证券发行、上市和交易规则，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规范中介机构行为，明确监管机构权力和责任，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等问题听取意见，与大家共同讨论。

李鹏强调，证券市场是一个高风险市场。要加强市场监管，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监管机制，以防范风险。要加强证券市场的风险教育，提醒广大投资者增强风险意识。上市公司、证券公司、中介机构和审批机关要各负其责，依法规范证券市场的发展，及时化解人为炒作等因素导致的金融风险。要重视和保护证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李鹏要求全国人大负责法律草案修改的有关专门委员会对大家的意见予以重视，把草案修改得更好。

此后不久，1998年12月29日九届人大常委会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酝酿数年、几易其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并宣布自1999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证券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按国际惯例、由国家最高立法机构组织

而非由政府某个部门组织起草的经济法，中国证券市场由此结束了没有成文法典的历史，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待到南海油城起，定叫惠州更繁荣

1994 年 2 月 8 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为广东大亚湾核电站一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庆典剪彩后，来到惠州考察。时值新春佳节，惠州街头和西湖沿岸张灯结彩迎接新春，听到四年间惠州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国民生产总值已由 40 多亿元增加到 167 亿元，翻了两番，李鹏很是高兴，欣然写下了一首诗：

一别四年再相逢，千年古城换新容。
待到南海油城起，定叫惠州更繁荣。

四年前的 1990 年 2 月，李鹏总理曾到惠州考察。当时世界著名品牌壳牌驻京代表孙似钦带着壳牌的布兰伦来到广东，想在广东找一个地方投资大型石化项目，广东省对此表示同意，提供了三个地点供他们选择，惠州的大亚湾就是其中之一。李鹏诗中所说的“南海油城”，指的就是这个项目。

壳牌项目是当时全国利用外资额度最大的项目。由于工程投资巨大，广东省邀请了香港招商局、石油部参与，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牵头。李鹏总理意识到这个项目的重要性，1990 年，在北京签订壳牌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协议，他亲自参加了签字仪式。之后，开始进行正式谈判——这是一个马拉松式的谈判，前后长达十年时间。

李鹏总理一直支持这个项目，他认为壳牌项目是引进国外资金，引进先进技术，产品又是中国市场需要的，经过长期的可行性研究，完全符合国际惯例，规模达到 80 万吨乙烯，技术上比台商王永庆的项目还先进；此项目从欧、美引进资金，完全符合对外开放政策，是应该支持的。

1997 年 2 月，李鹏第十次考察大亚湾核电站，在从惠州到大亚湾的路上，惠州市长李鸿忠谈了壳牌项目问题。他们希望这个项目能够获得成功，请求总理支持。

1998 年 1 月，李鹏准备去海牙访问，他找到了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王彦，对他说：“我下个月要去海牙访问，想和荷兰首相就大亚湾石化项目问题，签订一个政府之间的框架协议。”他叫王彦准备一个框架协议和壳牌进行接触。后来王彦把框架协议做了出来，中方等于表示了主动，壳牌也从来没有放弃在中国打开市场的愿望，很快达成了协议。

2 月 16 日，在荷兰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李鹏与荷兰首相科尔举行会谈，会谈

后，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王彦和壳牌公司全球化工总裁汉克斯分别代表中方的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广东投资公司、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和壳牌南海有限公司签署了有关筹备设立中外合资经营公司的框架协议。

此事成为了壳牌石化项目转折点。2000 年 10 月 28 日，我国最大的中外合资石化项目——中海壳牌 80 万吨乙烯工程合营合同在北京钓鱼台签字，李鹏委员长出席签字仪式。

2004 年 1 月 4 日下午，李鹏又一次来到惠州市大亚湾开发区，专门了解中海壳牌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他还考察了项目建设工地，实地了解了石化区规划建设情况。

看到在近 5 平方公里范围内展开的热火朝天的宏大建设场面，一个石化新城正在迅速崛起，李鹏深感振奋。他说："我记得这片地，当年还是丘陵、田野和荒滩。"

在见证当年创业艰辛的三棵树观景台前，李鹏高兴地与大家合影留念。他特别详细询问了中下游产品产业项目开发情况，语重心长地叮嘱大家特别要抓好下游产品的开发，逐步形成石化产业链，充分发挥石化大项目对地方经济的拉动作用。

时至今日，一个炼化一体化世界级石化基地已在大亚湾悄然崛起。总投资 43 亿美元、拥有 13 项不可转让的世界先进技术、年产乙烯 80 万吨的中外合资企业——中海壳牌已于 2006 年正式投产，它给惠州带来的不仅仅是每年几百亿元的工业产值，更为重要的是，带来了一大批国内外知名企业和中下游项目，日本三菱丽阳、普利司通、台湾和桐、台湾李长荣、香港建滔、无锡兴达等 46 个项目先后落户。

2009 年 3 月，同样拥有世界先进技术的中海油一期炼油项目投料试车，预计一年可新增 500 亿元的产值。中海油二期 1000 万吨炼油和 100 万吨乙烯改扩建项目建设也正加快推进。预计到 2010 年，全市石化产业实现总产值 1200 亿元以上；到 2020 年，这里将形成 4000 万吨炼油、300 万吨乙烯两个大项目为龙头、一大批中下游项目蓬勃发展，年产值达 4500 亿元，可与美国休斯敦、荷兰鹿特丹、新加坡裕廊争雄的世界级石化基地。

"待到南海油城起，定叫惠州更繁荣。"——李鹏当年所期望的前景正在一步步地变为现实。

（赵艳珍）

# 朱镕基

## 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期间，非常重视关心广东的经济发展情况，曾先后13次来广东视察指导工作，广州、深圳、珠海、汕头、佛山、东莞、中山、清远、河源、湛江、茂名等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笔者仅选取几个片段，以飨读者，希望给你一个立体的鲜活的既讲原则性，又讲灵活性的总理形象。

### 率先来广东谈判落实分税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地方实行财政包干，调动了地方理财聚财的积极性，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和财力的增长，但也导致“藏富于企业”、“藏富于地方”现象的发生，中央财政却陷入严重危机，财政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中央委派副总理朱镕基负责这个事情。1993年9月9日到11月21日的两个多月，朱镕基带领60多人的大队人马，“南征北战”17个省、市、自治区，由远及近，同各省进行谈判，争取各省对分税制



1992年9月22日，朱镕基在广东省省长朱森林、广州市市委书记高祀仁和市长黎子流的陪同下，考察广州港集装箱码头的发展情况。

改革的支持。朱镕基谈判的第一站是海口，第二站是广州，其实海南只是为到广东“谈判”而进行的“前奏”。9月12日，朱镕基、李铁映率领谈判人员直奔广东。

9月13日上午召开大会，广东省的五套班子人员全部参加，有些地市委领导也参加了会议。朱镕基先向大家宣布中央决定，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我与铁映同志带领有关部委的同志来广东，是受江泽民同志、李鹏同志委托来的，是来向同志们传达、介绍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内容，同时与广东同志一起就落实改革方案进行商量，一起算账。”他详细介绍了分税制改革方案，特别提到广东对分税制方案了解的信息不确切，指出现在的方案与财政工作会议时已经有很大变化。他讲了四个问题：为什么要实行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是什么内容，如何搞；分税制改革是否损害了地方利益；实行分税制广东到底要吃多大亏。所有人都在认真地听，快速地记。这个方案，没有考虑到下面的很多情况，实施起来的话，广东很吃亏。

怎样才能在服从大局的情况下，为广东争取利益呢？当天晚上，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把省里的几个领导叫到他那里去商量对策。他说：“你们要反映情况，要

讲啊。”常务副省长卢瑞华是分管经济的，决定在第二天大会上向朱镕基反映广东的具体情况。从谢非那里回去，卢瑞华与计委主任、财厅厅长、税局局长又对了一遍账，一直忙到凌晨1点多钟。

9月14日，继续开会。朱镕基先说了几句，接着便让财政部和国家计委的同志说，然后就等着拍板了。等财政部长刘仲藜说完，卢瑞华就抓住机会插了一句：“朱副总理，我可不可以提点意见?”朱镕基说：“可以啊，你说吧。”卢瑞华说：“税制改革，我们很赞成，但是，有些具体问题，也是需要考虑的。第一条，财政部的这个方案是以1992年为基数的，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是1992年上半年的事了，下半年经济发展起来，反映到财政收入上是1993年的事情。假如以1992年为基数，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成果都没有包含在内，如果1994年的财政收入不如1992年，那广东的日子就难过了，我们希望以1993年为实行分税制的基期年。”朱镕基有点火了：“你不要搞错了，我是保证了你们利益的。”卢瑞华说：“是的，这个我知道，总理肯定是考虑了我们的利益，但是，现在财政部的这个方案，也确实存在了这样一个问题啊。”卢瑞华接着说：“第二条，广东改革开放以来，长期缺乏建设资金，很多基础设施是通过贷款搞起来的，而这些贷款都是要通过税收来返还的。这个方案一旦实施，我们还贷就没有出路了。”朱镕基问：“每年要多少钱?”卢瑞华回答：“一年30来个亿，大概32个亿。”朱镕基又问：“还有呢?”卢瑞华接着说：“第三条，还有一个外贸的补贴问题，外汇都收上去了，广东每年要拿11亿人民币来补贴，这个钱我们哪有啊?”听完这三条，朱镕基很生气。卢瑞华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又向他提了一条建议：“总理，您看这样行不行？增加广东的上缴，税制也照样实行，但是，同一个税制之下，是否可以把上缴增加的另外来算。”朱镕基说：“你不要搞错了，我是有一个全盘机制的，你不要以为给点钱就可以打发我走!”这时，傅锐和张高丽站起来说话了，他们也希望总理能考虑一下广东的实际困难。听完两人的陈述，朱镕基开始平静了一点，决定暂时不拍板。中午的时候，他身边的人，包括国务院副秘书长何椿霖，还有李剑阁和几个银行的行长，跟他说：“卢瑞华讲的这三条，我们不清楚，看来，不考虑不行。”他想一想，最后接受了，要财政部修改了方案，把广东提的三条意见全部考虑进去。

分税制就这样在广东定下来了，不但把广东提的三条意见全部考虑进去了，并且是以1993年为基数。在广东的带动下，分税制在全国很快就建立起来了。后来，有一次在东莞开会，朱镕基总理还赞扬广东在推行分税制时顾全大局，带了好头，为全国做出了榜样。

分税制的“谈判”与落实看出朱镕基的政治智慧和政治魄力。他有高超的政治智慧，知道必须照顾地方的既得利益，改革才能被接受。改革成功了，中央才能集中钱，进一步支撑全国的其他各项改革。所以，广东当时提出的三条意见他

全部接受，甚至放得更开，充分照顾了地方利益。他后来说了一句话，“中央集中钱无非是推迟一年，但是照顾到地方的既得利益，改革就能顺利进行。推迟一年换来一切顺利是值得的”。

## “你要感谢共产党，就要赶快把地种上，把晚造搞好，那我就感谢你了！”

1994 年 6 月 8 日，3 号强热带风暴挟着暴雨，横扫南粤大地，百年罕见的洪水，像狂暴的孽龙，肆虐堤坝，吞噬生灵……湛江、茂名、肇庆、佛山、清远、韶关等地暴雨连连，山洪暴发，北江、西江的洪水奔腾咆哮。北江大堤告急！广州告急！珠江三角洲告急！汛情牵动着中央领导人的心。

7 月 9 日下午，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一行从广西梧州乘坐直升机抵达清远市，视察灾情。晚上，在清远宾馆，朱镕基一行观看了反映广东抗洪抢险救灾的电视录像，听了清远市委书记骆雁秋关于抗洪抢险、复产救灾、重建家园的情况汇报，对清远市的抗洪救灾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实际，扎实细致地抓好生产救灾工作，要实行领导责任制，一级抓一级，一件一件抓落实。

10 日上午，朱镕基一行察看了清新县回澜镇的飞水堤围，看到群众热火朝天地在修复被洪水冲毁的堤围，朱镕基加重语气强调：“党和政府要十分重视抓好水利建设，在这方面要舍得花钱。”又说：“这段堤围保护着一万多亩稻田，如果不赶快修好，农民种地就没有积极性了。”为了不误农时抢季节，确保晚造生产，朱镕基要求工地上增加机械力量，搞现代化施工。

朱镕基非常关心受灾群众的生活，当他看到堤边村庄屋檐下围拢不少群众时，便停下来亲切地向群众打招呼：“你们都是本村的吗？”清远市市长陈权向群众介绍说：“这是朱镕基副总理，来看望大家，大家表示欢迎。”群众都热烈鼓掌，兴高采烈。朱镕基说：“不需要欢迎，我是问问你们有什么困难没有？我不会说广东话哩！”大家都觉得总理很亲切，都笑了起来，气氛顿时变得活跃。群众说，困难是有一点，但当前大家最关心的是早日恢复堤围，早日恢复生产。朱镕基提高声调说：“我和你们的想法是一样的，赶快把堤修好，赶快把地种上。现在，你们的早稻被淹掉了，要赶快翻过来，把草沤在里面，就变成晚稻的肥料了。要抓紧时间翻地，晒干了，翻也翻不动了！”群众表示一定会尽快组织劳力、组织拖拉机，突击翻地，不违农时地把晚造种起来！朱镕基又接着对群众说：“我同你们讲，你们的市委书记、市长正组织力量，帮助你们修复大堤；你们也要组织力量翻地、播种、育秧，赶快把晚稻种下去，拜托你们！”群众中又一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笑声，并连声高呼“感谢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

离开堤围时，朱镕基握着在堤上临阵指挥的清新县县长冯国德的手说："眼下最要紧的是抓紧晚造生产，一错过机会，下造的粮食就落空了。你好几天没有睡觉了，辛苦了，再辛苦一下，熬过这一关就好了！"这时，朱森林指着个子高大的冯国德诙谐地说："看他那个子，再熬几个夜晚也没问题！"一下子把大家都逗笑了。

接着，朱镕基一行驱车来到清城区龙塘镇井岭管理区井南村，在村口，朱镕基关注地看了看贴在墙上的救灾物资分配表，清城区委书记黄伙荣介绍了受灾群众物资分配的情况。朱镕基对这种增加透明度的分配十分满意。

进到村里，朱镕基与正在清理倒塌房子的村民冯世雄亲切地拉起了家常，问冯世雄有多少间房子？厨房在哪里？倒塌了多少间房？家里几口人？多少劳力？几个小孩？一年的收入有多少？等等，谢非插话问冯世雄："现在有无钱买米？政府救济了你家多少米？"当得知冯世雄粮食不成问题时，谢非又问："你现在是先搞生产，还是先修房子？"冯世雄说："先搞生产，抓紧把晚造种好，现在已把田全部犁耙好了，种子也播下去了。"朱镕基马上接着说，"你做得很对，现在要是不抢季节搞晚造，下半年就没有吃的哪！"朱镕基反复对陪同的省、市、县（区）领导说，一定要十分重视粮食生产，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即使重建家园、企业复产的步子稍为放慢一点，也要把粮食生产搞好。

朱镕基不但对灾区群众眼下的生产和吃饭问题心心念念，而且挂念群众的长远利益，他强调，一定要搞好重建家园、建设新村的规划，使老百姓不再遭受洪灾。当黄伙荣拿来井南村的规划图向他介绍时，他听得认真，问得仔细。正说着，冯世雄的爱人郑金葵回来了。陈权叫她过来并介绍给朱镕基、谢非、朱森林、欧广源认识，朱镕基等分别与她握手，令她感动得一个劲地说："感谢共产党！感谢同志叔！"朱镕基对她说："你要感谢共产党，就要赶快把地种上，把晚造搞好，那我就感谢你了！"

## "千干扶千户"这个办法很有效，值得在全国推广

1997 年 12 月 28 日，临近岁末，朱镕基副总理带着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山区人民的关怀，到河源察看工作。下午 4 时 20 分，朱镕基及其夫人劳安一行沿京九线乘坐专列来到河源。一下火车，朱镕基即在省长卢瑞华、副省长欧广源、河源市委书记张凯、市长杨华维等领导的陪同下，驱车前往"园中园"察看。察看了"园中园"之后，朱镕基专门到源城区埔前镇杨子坑达石村揭彩华家进行慰问，与揭彩华一家促膝交谈。朱镕基问话很实在，他知道村民们都不太懂大道理，提的问题都很具体，在拉家常中就把一些要害问题都了解到了，让大家回答起来又容易又很自然。朱镕基详细询问了揭彩华一家种养什么、产品卖给谁、收入多

少、如何脱贫等情况。然后，又特意走上揭彩华家的二楼及三楼阳台，仔细触摸察看揭彩华家的家具情况。从揭彩华家新房出来，朱镕基还特意去看了她家的老房子和猪栏、鸡栏等。朱镕基对揭彩华一家依靠种养增加收入而走上脱贫致富之路表示十分高兴和赞赏。

5时45分，朱镕基来到市会议中心东江厅。张凯、杨华维就河源近年进行的脱贫攻坚工作作了汇报。朱镕基说，河源的客观条件优越，雨量足，气候好，有利于搞开发性农业。河源的扶贫开发做得好，标准高，速度快。河源在扶贫工作中一千名干部包扶一千户贫困户的“千干扶千户”的经验这个办法很有效，是干部从自己口袋里掏钱扶贫，是真正的责任制，值得在全国推广。对于河源的城市建设，朱镕基表示赞赏。朱镕基说，河源的城建有整体规划，建得有条有理，说明你们是有眼光的。对于河源的变化，朱镕基说，我看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你们做得很好，是你们辛勤努力的结果，我代表中央感谢你们并表示祝贺，希望河源明年的工作能取得更大的成功。

## 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承认广东的两个“私生子”

2000年开始，我们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西电东送”是中央落实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之一。为了保证“西电东送”落实到位，朱镕基总理要求东南沿海不准办电厂，而要保证全部接收西部大开发的电力。卢瑞华省长先是一口答应！但仔细想想，按照广东的发展趋势，这些电将来还是不够。于是就想让朱总理通融一下，允许广东办电厂，遭到拒绝。后来广东先斩后奏，“偷偷”建了台山电厂和深圳妈湾电厂。2002年11月，卢瑞华特意到中央，向朱镕基汇报了这件事。

卢瑞华说：“总理，广东已经全部接受了西部开发提供的电力，但广东的电力供给仍然欠很多，确实不够，我们又建了两个电厂。”当时朱镕基总理面无表情地说：“我知道！”卢瑞华说：“总理，这两个孩子虽然是私生子，但都是好孩子，你就认了他们吧。”总理笑中带气地说：“你这个家伙，好吧好吧。”

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朱总理非常有智慧，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既有大局意识，也很灵活实在。“西电东送”是大局，是原则，一定要落实。如果当时批准东南沿海自建电厂，“西电东送”可能就搞不成，所以严卡东部沿海建电厂，东部沿海申请建电厂一律不批。后来，西电建起来也发电送电了，发现的确不够用，就认了广东的两个电厂，并没有因为先斩后奏而恼羞成怒或者批评广东。现在，全国各地很多地方电力紧张，国内不少地方都强制性限电，但广东作为用电大省却很少停电，多亏了台山电厂和妈湾电厂，这两个“私生子”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 “你这点提得很好，是我们考虑不周，我现在宣布这条取消。”

外人传说朱镕基总理是一个特别喜欢“训人”的总理，对下属要求非常严格。和朱镕基接触较多的卢瑞华却感叹：“其实，不全是这样。他的严是对工作的严，他觉得你应该知道而不知道的东西，就会很生气。但如果你能说出理由，你也可以向他说‘不’，他很愿意倾听别人的意见，也很乐意听取下属的建议，修改不妥当的决定。”有一次，朱镕基还在400多人参加的大会上，当场承认自己考虑问题不周，采纳了卢瑞华的建议。

事情是这样的：

2001年5月，朱镕基总理召开各省省长参加的整顿经济秩序的工作会议。朱镕基在会上提出三点：第一，全国经济秩序混乱，必须加以整顿。第二，不能搞地方封锁。第三，实行地方领导责任制和经济制裁。哪个地方出现经济秩序混乱和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哪个地方的领导要承担责任，接受处分。不仅如此，还要对那些地方实行经济制裁。经济制裁包括两方面——不给资金，不给项目。卢瑞华省长在会上汇报了广东的基本情况后，给坐在主席台上的朱总理提了两条意见。第一，当时社会上传言中山一家企业生产的洗发水是假冒伪劣产品，洗头后会让人掉头发。卢瑞华听到传闻后，马上着手查了这件事，发现这家企业是家很大的“三资”企业，那个洗发水是真的，不是假的。于是卢瑞华就在会上给总理如实汇报。总理听后笑着说：“好，你再查清楚啊。”他听进去了广东的意见。第二，卢瑞华提出：“地方秩序混乱，地方保护主义盛行，是我们做省长的没有做好，应该受到批评和处分，这点我们愿意接受。不过对地方实行经济制裁这点不妥。那就制裁到人民，人民生活出了问题，最终可就找到总理你这里了呀。”总理当场说：“卢瑞华，你这点提得很好，是我们考虑不周，我现在宣布这条取消。”当时，全场400多人，全部鼓掌。朱总理就是这样一个实事求是、善于倾听、乐于修正完善决策的人。

（师春苗）

# 谷 牧

## 广东人忘不了“总工程师”

人们常说，谷牧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工程师”。他创造性地把邓小平和中央关于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的一系列指示变成了现实，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的创建、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谷牧心系南粤，为广东的改革开放策划、指导、实施，尤为呕心沥血。今天，当广东早已成为中国的经济大省，南粤大地“更加郁郁葱葱”之时，广东人民忘不了这位“总工程师”的历史贡献。

### 勾画出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方略

1979 年初，在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广东省委根据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对外交往便利等省情，经过酝酿和多次讨论研究，一致要求中央适当给广东省下放一定的经济管理权限，让广东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先走一步，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经济性特殊区域，以便让广东发展得更快一些。在 1979 年 4 月中央召开


谷牧

专门讨论经济建设的工作会议期间，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和主管经济工作的省委书记王全国向中央汇报了广东省委的意见要求，得到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首肯。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委派谷牧帮助广东和福建两省进行研究论证，提出具体实施方案，提请中央讨论决定。

1979年5月11日，谷牧带领由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段云，外贸部副部长贾石，财政部副部长谢明和国家建委、物资部同志组成的工作组来到广州后，即与省委、省革命委员会领导广泛听取意见。5月14日上午，谷牧在珠岛宾馆与广东省领导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王全国、吴南生、曾定石等座谈讨论对文件起草的意见。

5月14日下午，谷牧一行在刘田夫等陪同下，前往深圳市考察。据当年同行的工作人员回忆：当时市委招待所的条件很差，住在最好的四号楼也只是红砖地板，周围都是臭水沟，晚上一手拍十几个蚊子。谷牧一行参观了深圳市容和口岸。在听取省、市负责人汇报深圳情况时，谷牧畅谈了深圳对外开放的想法。他强调：我们搞经济特区，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变不了资本主义，划深圳、珠海为特区，在国家大政方针下，坚持社会主义、开放这两点是稳妥的。一定要把深圳、珠海这两个开放点搞好。

5月16日，谷牧一行前往珠海考察，沿途看了顺德、中山，下午参观了孙中山故居，听了孙中山54年前的一段讲话录音，看了珠海的市容和拱北口岸。晚上听取了省、市负责人汇报后，谷牧很有感触地说：看了你们这里的形势，更加觉得中央下决心解决广东的体制问题十分必要。我们不能再“睡觉”（借用孙中山的话）了，要“醒”过来，来一个大转变。先从小范围搞起，这没有多大危险性。他又说，广东的体制改革也同珠海、深圳两个点的改革一致起来，我们想通过广东吸取经验，解决全国的问题，来考虑全国的体制改革。

5月20日，谷牧在珠岛宾馆再次与省领导交换起草文件的意见。谷牧指出，中央决定广东先行一步，搞快一点，你们完全有这个条件。从香港引进技术、搞来料加工，利用我们廉价的劳动力，很有前途。我们应当很有信心来利用港澳的条件，加快我们的建设步伐。谷牧向广东提出了三个目标：一是5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要争取超额；二是要夺回被日本、台湾夺去的香港市场；三是要赶超香港。其办法是中央对广东实行大包干。包干基数，可按去年的实绩或今年的实绩，五年不变。外贸出口增长部分的外汇，中央和省三、七分成；除了铁路、邮电、港口、军工、海关等外，干干净净大包干。计划体制，主要确定哪些指标必须保证，其他根据市场经济的规律，由广东自己安排。

谷牧一行在广东期间除考察深圳、珠海外，还看了广州、佛山、中山、新

会。5月25—26日谷牧一行又考察了汕头市，对筹建汕头特区讲了许多指导性意见。之后，从汕头前往福建。在广东18天，在福建8天。谷牧后来回忆这一次广东、福建之行时说道："一路走来，集中大家的意见逐步形成的大体思路是：第一，广东、福建两省经济发展潜力大，但解放后30年间不是国家建设的重点省份，工业和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优势未能很好发挥。要让他们上得快些，光靠中央不够，还须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这就是扩大省里的经济管理权限，可以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实行大包干。第二，两省都是重要侨乡，具有发展对外经济活动的优势条件，在拓展外贸、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方面，应给两省以机动余地，在国家计划中单划一块，使其发挥地缘、人文优势，先行一步。第三，两省加速建设所需资金，主要由地方自筹，国家给予照顾支持，办法可以采取在一定年限内，对两省新增的收益，国家多留一些给地方安排建设。第四，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海外华人华侨众多的汕头，还有面对台湾的厦门，各划一块地方，实行更优惠的政策，吸收外资，发展对外加工装配、举办出口基地，以扩大出口贸易，加快建设速度。"按这个思路，分别帮助两省起草了向中央请示的政策性报告。

在谷牧带领的工作组的帮助下，广东省由王全国、曾定石牵头的起草小组起草的《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经过反复修改，数易其稿，终于在6月6日的省委常委会议上获得通过，并上报中央。

1979年7月15日，中央以中发〔1979〕50号文件批转了广东和福建的两个报告。中央确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中央50号文件下发后，广东省委认真贯彻，在实践中探索改革开放的路子。1980年11月，任仲夷接任省委第一书记，提出"特殊政策要真特殊，灵活措施要真灵活，先走一步要真先走"，着力推进广东的改革开放。

以后，根据形势的发展，谷牧又多次召开两省工作会议，形成新的中央或国务院文件，指导和不断完善支持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政策和体制。这以后，中央和国务院又先后决定开放广州、湛江两个沿海港口城市并设立广州和湛江等经济技术开发区，开放珠江三角洲（后又扩大珠三角范围），将粤东、粤西沿海市、县列入沿海经济开放区等部署，使广东全省逐步形成梯度开放的格局，大大推进了广东的开放、改革和发展。中央这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实施，都是由谷牧组织有关部门和地区拟订具体政策措施，进行部署和抓贯彻落实的。

## 把中央举办特区的构想逐步具体化

谷牧深知对外开放与境外客商打交道必须立法的重要性，中央〔1979〕50号文件下发后即委托广东起草特区条例的工作。1979年8月15日，广东省委书

记、特区筹备组长吴南生即召集广东社科界专家、学者研究起草特区条例的问题。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庄世平先生热情相助，广泛收集世界各地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的法律法规提供参考。同年12月17日，谷牧代表中央和国务院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两省会议。吴南生代表广东省委汇报筹备建立特区的情况，汇报中提出：将“出口特区”改用“经济特区”含义更加确切。

1980年3月24—30日，谷牧受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委托在广州珠岛宾馆召开两省会议，检查总结中央〔1979〕50号文件的贯彻执行情况。会上对特区建设的方针作了认真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1）特区主要是吸收侨资和外资进行建设；（2）要做好总体规划，有序地开发，分期分片铺开，先搞好水、电、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3）在项目建设上，先上投资少，周转快，收效大的项目，在发展出口加工工业的同时，有条件的可以逐步搞房产、旅游项目；（4）为了吸收侨商、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土地使用费应当略低于港澳，建议中央将外商投资企业的所得税定为15%；（5）特区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特区的经济活动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这次会议把中央举办经济特区的构想初步具体化了。会议还根据广东省的建议和特区初创的实践情况，将“出口特区”，改名为涵盖面更宽的“经济特区”。

与此同时，广东省起草经济特区条例的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于1980年4月14日获得广东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4月5日，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成立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5月4日，省委、省政府任命吴南生书记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代表省人民政府对全省三个特区进行统一管理，并直接经营深圳经济特区。6月12日，省委任命吴南生再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

省经济特区管委会在深圳特区起步开发伊始，利用谷牧帮助解决的3000万元银行贷款作“酵母”，采取“借鸡生蛋”和“滚雪球”的方式首先在罗湖搞“五通一平”的基础设施建设。1980年6月，上报到北京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又由谷牧兼主任的国家进出口委员会牵头组织修改。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这一由国务院提请审议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

随着各特区先后起步开发，谷牧感到：特区到底怎么办？如何才能办好？单在国内研究有局限性，得出去看看。于是确定由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的江泽民带队出国考察。考察组成员包括国家有关部门、粤闽两省、和深圳、厦门特区的负责人。考察组于1980年9、10月间先后考察了亚、欧、美三大洲6个国家的9个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工业公园”。回国之后，对这些经济性特区基本经验进行了认真总结，并向党中央、国务院作了汇报。

1981 年 5 月 27 日—6 月 14 日，谷牧在北京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除两省主要领导人和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参加会议外，还邀请了多位经济学家参加。会议从理论上探讨和论证了举办经济特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会议认真总结了前段的工作，参考国外各类经济性特区的成功做法，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对举办经济特区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和重要政策性措施，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提出了 10 条比较系统的意见。这次会议的《纪要》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于 1981 年 7 月 19 日以中发〔1981〕27 号文件下发。这些意见，从举办经济特区的指导思想、基本操作规程、重要的政策性措施、正确处理内外关系、内部权益分配等方面，构筑了一个经济特区发展运作的总体框架。它对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 帮助广东解决困难和问题

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初期实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主要是一些地方走私活动蔓延，在经济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与此同时，在全国尚处于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实行区域宏观先改方略，引发了与周边省份以及内陆省份一些摩擦，引起了周边地区的不理解，有的甚至向中央反映。

1982 年 1 月 21 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坚决打击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

1982 年 2 月 11—13 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紧急通知》，进一步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认真总结经验，端正对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更好地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一步发展两省经济。同时指出工作中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亟待研究解决。中央批准了这次两省座谈会纪要（即中央 1982 年 17 号文件），还同时印发了《上海租界的由来》的文章。

广东省委在贯彻中央 1982 年 17 号文件的过程中，采取了认真负责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经济领域中的违法犯罪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对问题严重，情节恶劣的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个别判处极刑。对经济工作中的缺点和偏差进行了切实的纠正。

然而，广东在实行新的体制和加强管理的过程中，经济工作中确实出现了新的困难和问题。包括：（1）财政方面的问题，如外贸包干遗留账目问题，解决影响外贸出口换汇成本上升的问题等；（2）关税问题；（3）关于积压的进口商品处理问题；（4）关于前一段广东省被兄弟省扣压、冻结的物资处理问题（1982 年 5—6 月份，全国有 20 个省、市、自治区的一些地方，扣压、冻结广东销往的

物资，一些火车站还专门设置了“广东旅客通道”，对来自广东的乘客出站特别进行严格检查）；（5）关于给广东调拨市场商品的问题；（6）关于开征34种商品出口税，部分按1981年基数返还广东地方财政的问题；（7）关于调整外贸出口换汇成本包干基数问题（由于国家物价调整、美元升值、港币贬值等原因，当年实际出口换汇成本达3元多，外贸补亏数额大，影响财政困难）。

为了解决上述困难，1982年7月，由省委书记、常务副省长王全国率领省有关部门负责人赴京向中央汇报，请求中央帮助解决。7月6日，谷牧、张劲夫同志在国务院第二会议室主持会议，认真听取了广东省的汇报，国务院十多个主管部门的负责同志一起听汇报。谷牧还指示各有关主管部门领导会后与广东省的同志分头交换意见。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广东省的实际情况，在财政、税收、处理进口积压物资、市场安排等方面，帮助广东解决了几个重要问题。同年9月14日上午，谷牧在国务院会议室主持会议，继续研究广东省汇报经济工作中提出的问题。赴京参加中共十二大的广东省领导任仲夷、刘田夫、王全国、梁灵光和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就7月汇报会没有议定的问题继续进行了研究。国务院就两次汇报会研究确定的问题，印发了《广东省经济工作汇报会纪要》。《纪要》明确了中央解决广东经济工作中有关困难和问题的意见。国务院各有关部门采取了积极帮助的态度，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排除了广东经济工作中的困扰，保证了广东改革、开放、发展的顺利推进。

## 引导经济特区迈上外向型经济轨道

从1979年到1984年底止，党中央、国务院专门为特区工作印发的和含有特区工作内容的文件共有5个。这些文件都明确特区经济的发展方向是，“利用外资为主”，“举办工业生产项目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要大力引进先进技术”。但是，在深圳特区工作的一些同志，还有几位专家、学者，一直对此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深圳发展工业的条件差，产品以外销为主与客商投资目标（产品进入大陆市场）相悖，主张把深圳建成金融、商业、外贸、旅游中心。而且这种呼声越来越高。谷牧认为。特区要搞第三产业，金融、商业、外贸、旅游都要发展，但必须以工业为主，相应发展其他产业，成为以工业为主的综合性的外向型的特区。没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工业，经济根基打不牢，出口无货源，引进消化先进技术没有载体，其他产业也发展不起来。因此，上述与党中央、国务院的方针相悖的议论，会造成认识上的混乱和行动上的踟蹰，很不利于实际工作。

为了统一认识和行动，1985年2月24日（大年初四）谷牧在深圳迎宾馆6号楼主持召开了有四个经济特区和国务院十多个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特区工作会

议。谷牧在会议开始时即宣布："本次会议不讲成绩，只讲问题和不足"。会议还将香港《广角镜》杂志1985年第一、第二期上发表的文章《深圳的问题在哪里?》《深圳特区向何处去?》复印给到会的成员参阅。文章用内地报刊公开发表的大量数据，分析说明深圳经济特区五年来的发展，没有按照中央要求的"三个为主"（即产业以工业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资金以利用外资为主）实施。在听了两天多的汇报和讨论之后，2月26日下午，谷牧在会议总结讲话中强调：在新形势下，经济特区应在继续完善投资环境的同时，要把重点转向增加工业生产，积极扩大出口创汇方面来。新上的外引内联企业，都要按此精神审批，要重点建设一批技术水平较高，能够出口创汇的项目，培养一批能够进入国际市场的骨干产品。尽快建成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农牧渔和旅游业同时发展的外向型的综合性经济特区。他要求经济特区朝着这一目标，下大力气"爬好一个坡，更上一层楼"。

会议开过之后，特区如何发展外向型经济，迟迟未有实施行动，有的特区还照样按他们原来的想法干。谷牧听到这一情况后，很想到特区实地了解和研究，但忙于外访后又患严重眼疾，不能成行。于是给深圳负责同志传去一个书面的意见，重申他在2月会议讲的要压缩非生产性建设项目，着重抓生产，大力出口创汇等意见。强调要向着办好工业为主、工贸结合的外向型综合性特区作刻苦的努力。

这个书面意见传去后，效果还是不大理想。此后，谷牧又采取了一系列办法。一是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国光副院长率领一个专家小组，在深圳进行了为时一个多月的关于特区发展战略的调查论证，写出了一本系统的报告，明确提出要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目标。二是请曾在广东工作过的老同志张根生、于明涛去特区调查，与当地领导交换意见做工作。三是就袁宝华同志的一份特区调查，组织有关部门讨论，统一认识。袁宝华的报告和社科院的调查论证一样，明确提出特区要朝外向型经济发展。四是委托周建南、何椿霖同志在深圳召开外向型工业发展座谈会，主要请在深圳办有内联外引企业的部门参加，通过"条条"作这些有强大技术和管理后盾的企业的工作，让他们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起骨干作用。同时，对个别特区的领导班子进行了适当调整。

1985年12月25日到1986年1月5日，谷牧受国务院的委托，在深圳召开特区工作会议。到会的有广东、福建两省，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国务院29个部、委、办、局的负责干部近200人。这是历次特区工作会议到会人数最多、开会时间最长的一次。会议充分肯定了特区举办5年多来取得的成果和经验，也具体指出了前进中出现的需要切实解决的问题。会议集中大家的意见，对经济特区发展提出了5条具体要求，并强调：各特区的指导思想和工作重点，要从前几年搞建设、打基础转到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上来。为了支持特区发展外向型经



1983 年 11 月，任仲夷（前左一）陪同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前左二）视察深圳经济特区。

济，会上还研究了国家需要采取的一些重要政策性措施。

谷牧在会议总结时，强调各特区要从搞基建、打基础转到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上来，为此要发扬“开荒牛”的精神和劲头。会后，国务院特区办公室整理了《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在与有关部门协调意见后，于 1986 年 2 月 7 日，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审定，以国发〔1986〕21 号文件转发。

这次会议是经济特区开拓前进的新起点。各特区统一认识，认真贯彻落实。坚决调整投资结构，按照“压”与“保”相结合的方针，缩短基建战线；着重发展工业生产，改善品种质量；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增加外贸出口；清理整顿公司，克服流通领域中的混乱现象。

1987 年 2 月 6 日到 10 日，谷牧又在深圳主持召开了第六次经济特区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着重回顾了 1986 年各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取得的成果和经验，进一步统一了认识。更加明确了要进一步加强与内地的经济联合，精心筛选和引进创汇能力强、技术水平高、经济效益好的生产项目；致力于科技进步，开发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积极探索国际化经营，把产品出口更多更好地抓上去，在国际市场上不断扩大阵地。这次会议形成的《纪要》，国务院于 1987 年 4 月 11

日以国发〔1987〕30号文件转发。

从此，各经济特区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定的步伐。外向型经济初步入轨上路，基本实现了1986年特区工作会议提出的目标。广东三个特区从自身实际出发，各有侧重地开展工作，取得了各具特色的进展。深圳开创的局面最大，发展较为全面，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利用外资居首，当年外贸出口仅次于上海，过去的边陲小镇，今天成为中国大中城市中经济总量排在前几位的现代化城市。珠海从一个海滨渔镇，发展成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崛起、风景秀雅的园林般的城市。汕头特区艰苦创业，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实事求是，注重效益，从小步紧走开始，逐渐转为大步前进，在带动潮汕地区经济振兴中发挥出明显的作用。

谷牧在他分管我国对外开放工作的年代，每年都会到广东来，或开会、或检查指导工作，尤其是到经济特区、开放城市、珠江三角洲地区走得比较多。深圳有人粗略统计，从1979年5月到1988年3月的十年间，谷牧先后12次到深圳召开会议和检查指导工作。

（罗木生）

# 乔　石

## 希望把特区史“写”得更好

乔石曾三次到广东汕头调研视察。第一次是1992年1月16日至18日，他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广东省委副书记郭荣昌的陪同下莅汕，汕头市委书记林兴胜、代市长吴波陪同先后参观考察了汕头特区，高度赞扬汕头特区十载艰辛创业和两个文明建设所取得的可喜成绩。第二次是1999年4月20日至5月5日，这时的乔石已离开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领导岗位。在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幗英及汕头市负责同志的陪同下，视察汕头特区。对汕头两个文明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肯定。第三次是1999年12月6日至26日，乔石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幗英，省委副秘书长王英刚及汕头市负责同志陪同下到汕头参观考察，对汕头市致力改善投资环境给予很高评价。

乔石三次莅汕考察，对汕头特区寄予厚望，希望汕头把特区史“写”得更好。

## 要不失时机地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写”好特区的物质文明史



乔石

经济特区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产物，经济建设能否搞上去，是特区创办成功与否的标志。乔石第一次莅汕考察时，刚好是汕头经济特区范围扩大至整个市区，潮汕的行政区域也进行了调整。那时，汕头特区的发展正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乔石对汕头的经济建设给予极大的关注。

1992 年 1 月 16 日下午，乔石乘专机离开梅州抵达这次广东之行的第二站——汕头。乔石来不及休息，就在省、市领导的陪同下风尘仆仆地参观了“汕头特区十年成就展览”。乔石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各个展厅，边看边问，并对汕头特区已走过的十年历程给予充分肯定。

展览馆的综合展厅，主要反映汕头特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林兴胜书记汇报了汕头海湾大桥、深水港、广梅汕铁路、第三水厂、煤电站等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进程。乔石关切地询问了海湾大桥的长度、结构，汕头港进出船舶的吨位及通航情况，并指出：“这些项目的建设很重要，对你们汕头具有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当吴波代市长介绍到礐石风景区的迷人和潜力时，乔石说：“汕头有山有水，你们的海洋资料很丰富。”

参观工业展厅时，林兴胜向乔石介绍了海洋（集团）公司的音像产品，并汇报在 1991 年全国评比出三部优秀电视连续剧，该公司就占了二部时，他高兴地说：“那很不错嘛！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当林兴胜指着公元感光材料工业总公司的产品说：“这是我们投资资金最多引进的彩色生产线项目，质量很好，价格比别人便宜，主要是销路存在问题”时，乔石立即指示：“既然质量好，又价廉，你们就要多做宣传工作。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胶卷产品需求量将不断扩大，只要质量上去了，人们了解了，就一定会受欢迎的。”接着，吴波向乔石介绍了汕头电池厂生产的电池在全国评比中连续五年第一名，乔石指出“我们的电池主要是高能的问题无法解决，你们要攻克这一难关。”

在食品展厅，乔石了解到，潮汕食品尤以潮菜著名，其选料考究，刀工精细，煎、炒、焖、炖、烧、炸齐全，菜品清淡、鲜嫩、肥而不腻。所以乔石参观后称道：“‘潮州佳肴甲天下’，并不过分，潮州菜好吃，名不虚传。过去川菜在世界上影响很大，现在潮州菜已超过川菜了。”当看到一张张的烤鳗照片时，他

饶有兴趣地说："这就是烤鳗吧！这些烤鳗的制作很雅观，色泽也非常漂亮。"

在工艺、陶瓷展厅，乔石对潮汕的民间工艺更是赞不绝口。展厅展示了精巧、灵美且极富地方特色的工艺美术、陶瓷制品。乔石指着玻璃纱绣台布说道："这样的产品不错。这才是真正的民间劳动创造的工艺精品。"当他得知其产品销往东南亚、东欧、北美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时，乔石很有见地地指出："陶瓷的品种不错，销路搞得好，是很有发展前途的。"

在服装展厅，看着展厅里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各款服装，乔石指着眼前的真丝服装说："这样好的真丝产品各地销售有一定限度，如果一个地方多了，价值就有所影响。"乔石看着特区美艺发展有限公司的刺绣服装产品由衷地赞道："手工绣花，潮汕人心灵手巧，真不简单啊！"接着，乔石就服装产品的出口问题指出：一方面我们要扩大出口，占领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一定要搞好产品生产、出口的计划工作。

参观完展览回住地的路上，吴波向乔石汇报了汕头特区不断扩大的历程时，乔石指出：特区不断扩大，特区史也就"写"起来了。以后"写"特区史，不要"写"得太抽象，要"写"得实在一些。汕头特区区域扩大至整个市区后的近十年建设实践证明，特区的发展正符合乔石的把特区史"写"得更实在一些的要求。

乔石第一次莅汕时还考察了汕头超声食品研究所和汕头养鳗联合公司。第二次莅汕时，先后到潮阳的雅倩化妆品公司、日权眼镜实业公司，澄海的新溪珍珠养殖场和广东省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澄海市泛海木业有限公司参观视察，在肯定他们已取得成绩的同时，提出更高的要求。

乔石于1999年5月3日上午到澄海新溪珍珠养殖场、澄海泛海木业有限公司参观考察，对两家企业予以赞赏和鼓励。澄海新溪珍珠养殖场场长、总工程师谢绍河独立研究成功、并投入养殖生产的淡水有核珍珠，1991年开始批量向国际市场推出，打破了世界珍珠养殖史上只有海水有核珍珠的现状，开创了淡水有核珍珠养殖新纪元。1994年经国内外资料检索、国家有关部门组织专家鉴定，确认为国家首创新产品，被誉为"绍河珍珠"。乔石兴致十足地参观珍珠养殖场，看着晶莹璀璨的"绍河珍珠"，啧啧称奇。当他了解到企业总体规模及母贝资源已具备年产高档淡水有核珍珠三吨、海水珍珠一吨的能力，并在全面完善海淡水珍珠养殖的基础上，配合珍珠工艺品、珠宝首饰加工、珍珠保健食品、珍珠美容化妆品的综合开发时，乔石对企业已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

接着，乔石一行马不停蹄地驱车来到广东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属下的澄海市泛海木业有限公司。乔石了解到，广东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是目前华南最大的木制品加工生产企业，也是汕头地区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而泛海木业有限公司系集团与澳门羊城集团合作经营的大型木材加工企业，引进了德国具

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复式木地板生产线及配套设备，主要生产复式木地板、刨花定型板、高级木饰线、家具门框等木制品，是中国最大木制品加工企业之一。对此，乔石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欣喜地参观了泛海木业有限公司的三层复合地板厂、实木地板厂、家具厂、干燥厂等10多个车间，观看了工人们的实地操作流程，应邀题写了“拓木业空间，树民营典范”的赠言。乔石虽然没有太多的语言，却给企业的负责人和员工以极大的鼓励。

最后，乔石要求澄海的两家企业要在已打下的基础上多做技术上的研究，再接再厉，并想办法到内地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乔石的几次莅汕，都盛赞汕头所取得的成绩，并指出汕头要不失时机地利用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写”好特区的物质文明史。

## 要进一步发挥侨乡优势，打好“侨牌”，“写”好特区华侨爱国爱乡史

汕头是我国著名的侨乡。解放前，部分潮人为生活所迫，漂洋过海出国谋生。经过长期的努力，他们在侨居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涌现了一批著名的金融家、企业家和科学家。他们大都具有爱国爱乡、热心家乡建设的优良传统。解放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对华侨回国回乡投资设厂以及举办各种公益事业给予支持和优惠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华侨爱国爱乡的积极性。汕头的发展与华侨的支持有着密切的联系。

乔石第一次莅汕就视察了由香港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李嘉诚先生捐资兴办的汕头大学。1992年1月17日上午一早，汕头大学党委书记杨应群、校长戴景宸便在汕大校门前迎候，陪同乔石直达汕大图书馆参观。杨应群汇报说，图书馆已使用电脑管理。乔石听后很高兴。他仔细地观看电脑操作，询问藏书册数，欣喜地说：“使用先进设备很方便，现在学生的条件好了。”登上图书馆二楼期刊厅，乔石询问全校有多少期刊、分多少类，并语重心长地对正在阅读的学生说：“你们有这么好的条件，一定要好好学习，取得优异的成绩。”第二次莅汕的1999年4月23日上午，乔石再次来到汕头大学，参观了大礼堂、科学楼，看望了正在工作的科研人员。他对李嘉诚先生捐巨资办汕头大学的爱国爱乡行动给予很高评价。

那天上午，乔石还考察了汕大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该医院是一座综合性教学医院。乔石仔细察看了医院的基础建设，看望了医护人员，参观了刚刚成立的宁养院。在医院会议室，乔石做了即席发言，肯定了医院的各项工作特别是在医学技术上所取得的成绩。对李嘉诚投资成立宁养院，给晚期癌症病人实行无偿服

务，送去临终关怀的做法表示极大的赞赏，他认为该院创造和积累的经验对全国的医院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最后他希望医院在今后能继续为汕头、为广东乃至全国人民作出更大贡献。这是1999年乔石两次莅汕期间唯一一次通过麦克风作的发言。为激励医院再接再厉，勇创佳绩，乔石为医院写了“全心全意造福人民群众，锐意进取攀登医学高峰”的题词。

1999年4月22日一早，乔石一行从住地北山湾度假村经海湾大桥、中泰立交桥、金泰立交桥、金砂路、迎宾广场抵达林百欣国际会展中心参观。林百欣国际会展中心系林百欣先生捐资兴建而成。主体包括北座、中座、南座三大部分，汇大会堂、展览厅、大中型会议厅、宴会厅、餐饮中心、咖啡茶座等，是汕头市举行国际经贸、科技、文化交流等重大活动场所。汕头市委负责人向乔石汇报了在该中心举行的第九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的情况和中心建成后的运作情况。当听到会展中心为汕头市民带来了高档次的艺术享受，不少商品展销会也在此举办时，乔石中肯地指出，这样可以加强与外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活跃本地市场。

当他们又来到华侨公园时，看到潮籍的侨领们亲手种下的树苗正茁壮成长，公园已成为市民闲暇休息嬉戏的场所时，乔石高兴地说，汕头要进一步发挥侨乡优势，打好“侨牌”，“写”好特区华侨爱国爱乡史。

## 要做好旅游资源的开发，“写”好特区旅游观光史

1999年12月6日上午，时年75岁的乔石乘专机再次莅汕考察。在一年之内两次考察同一城市，对他来说还是第一次。也许正如他自己说的：“我对汕头很有感情。”

在汕休息几天后，乔石于12月12日在省、市领导的陪同下，参观了市农科所培育的花果新品种和市区海滨路新建成的人民广场。当乔石看到人民广场昔日的泥沙和凌乱已被今天的壮丽和宽敞所代替，这里也已成为人民大众休闲散步的好去处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乔石与正在这里休息的群众亲切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为了游览市容和了解汕头市民的夜生活，乔石于12月24日坐专车视察市区的几条主要干道。沿途的灯火辉煌与车水马龙，使乔石深深地感受到汕头人民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当来到金砂路的国际大酒店门口时，乔石下车上了酒店23楼的旋宫看夜景，品尝潮汕的功夫茶。他感慨地说，汕头的夜生活的确是丰富多彩，汕头在市政建设方面也取得一定的成就。他对汕头市致力于改善投资环境的做法给予很高评价。

12月23日，乔石参观了潮阳的莲花峰风景区、灵山寺。在莲花峰风景区，乔石参观了文天祥石雕像、“莲花峰”石刻、忠贤祠等景点，所到之处，均用心

观看，并询问各个点的建成时间、有何意义，随行人员都一一回答。有时由于疏忽而答错，乔石立即加以纠正。特别是对文天祥为何到这里，最后又死在哪里的历史很熟悉，陪同人员均为乔石的真情所感动。原来在参观各个地方以前，乔石都让负责接待的同志拿来参考资料加以阅读，对所要去的单位和景点的情况已有所了解。他的这种细心、严谨、务实的作风，不由让人想起1992年他在中央直属机关召集的一次座谈会上说过的一段话："有些同志老是说对朱镕基同志过去的错误，不能老是抓住不放，这话看上去公正，实质上是错误的。朱镕基同志过去有什么错误？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那不是他的错，他没有错，是我们当时的政策错了……他不是改正，而是平反，是彻底平反！"

随后，乔石一行来到了潮阳的灵山寺。灵山寺为唐朝高僧大颠所创建，是潮汕第二名刹。寺的四周群峰苍翠，寺前水库碧水涟涟，景色倩丽宜人。灵山寺的方丈和尚知道乔石将到寺里参观时，很为兴奋。他们知道，乔石喜欢书法，就商量着无论如何都要让首长留下墨迹。乔石是从来不给庙宇题字的，但当他了解到灵山寺有着悠久的历史，寺里的住持在历史上也有很高地位，又看到和尚们那渴望的眼神和已准备好的文房四宝时，乔石笑了，说："我就给你们题吧！"在场的和尚们喜不自禁，一齐报以热烈的掌声。乔石当场挥毫写下"禅堂"两个遒劲大字。他的善解人意和和蔼可亲给灵山寺的和尚和随行人员留下难忘的回忆。乔石就是这样，不论是对待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是宾馆的服务员、厨师都和蔼可亲、礼貌待人。他有着革命家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对每次为他服务的服务员都要说一声"谢谢！"乔石每次到汕头，都要与宾馆里为他服务的服务员、厨师每人合照一张照片。

参观完几个旅游景点后，乔石认为汕头市的地域文化独特，有着悠久的历史，指出对市政和各个旅游景点要规划好，充分开发旅游资源，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观光。

1999年的两次莅汕，乔石都住在北山湾的迎宾花园，这里的一花一草他都很熟悉，以致有一次他由衷地说："我对汕头很有感情"，"对迎宾花园很有感情"。汕头市委负责人很有诚意地接着说："首长，如果您喜欢，就把汕头当成您的家。"乔石乐得笑呵呵："那我以后就常常来啰！"乔石第一次莅汕时就指示，要把特区史"写"得更好。汕头特区的人民正是在乔石的鼓励和期望下，"写"出他第二、第三次莅汕时繁荣的特区史。如今，特区的人民将继续努力，把特区史"写"得更精彩。

（王天海　郑惠玉）

# 李岚清

## 广东应走在全国前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近日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以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认真贯彻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精神，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转变作风，真抓实干，全面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力。

2001年11月5日至13日，李岚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和省长卢瑞华的陪同下，先后考察了梅州、汕头、深圳、珠海、顺德、广州等地的企业、学校、卫生与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听取了省委、省政府和有关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汇报。李岚清对广东省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广东省的广大干部群众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站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在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方面作出了显著的成绩。他希望广东省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再接再厉，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李岚清

作出更大的贡献。

李岚清强调，在当前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形势面前，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努力做好各项工作。他指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有利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有利于扩大出口和利用外资，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政府对经济管理的观念、职能、方式和方法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企业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要进行必要的改革；一些成本高、效益低、竞争能力差的企业将面临很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否做到趋利避害，关键在于能否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壮大自己，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尽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规范政策法规体系和行政管理体制，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积极研究制订应对措施，及时防范和化解可能出现的不利因素。在这方面，广东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应该走在全国的前列。

李岚清指出，应对加入世贸组织的挑战，要做的工作很多，最重要的：一是大力发展信息技术。信息化建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各地要根据条件加强信息化建设，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推动现代化。二是加快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国内外市场需要的产品，赶超世界先进技术潮流。同时，用高新技术改造那些有市场需求和前景的传统产业，积极淘汰落后技术、落后工艺和市场不需要的产品。三是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事实证明，哪个地方工作决心大，措施得力，市场经济秩序好，哪个地方的投资环境就好，投资者就有信心，就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和高素质的人才，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如果对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现象听之任之，甚至包庇纵容，必然会使经济发展停滞或倒退。一些地方的情况就证明了这一点。对个别地区发生的骗取出口退税、走私贩私的案件，必须一查到底，并对犯罪分子绳之以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对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分子，必须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进行查处。要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明确执法部门的职责，实行责权统一，对执法不力，玩忽职守甚至包庇、纵容违法犯罪分子的，要追究执法者的责任。要采用高科技手段对市场经营活动进行监管，健全执法部门相互联网的电子网络体系。四是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大力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对目前的行政审批项目，要认真进行清理，凡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要坚决取消，确需保留的要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改进审批办法，健全监督约束机制，把主要精力放在加强监管上。对取消的审批事项，不能一“放”了之，要研究制定加强管理的措施和办法，使之制度化、规范化。深圳、顺德等地的改革试点较好地解决了执法部门责权分离，有权无责的问题，建立了“谁审批，谁负责”的责任追究制度，思路对头，措施得力，效果明显。

李岚清还考察了广东的高等教育、科研机构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情况。他指出，广东和全国的高校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今后的发展目标和任务，一是要把工作重心转到学科结构调整和提高教学质量上来，按照经济发展和社会需要设立新学科，适应高新技术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提高本科教学质量，提倡名教授讲基础课；改进外语教学方式，加强听说教学，提高学生的英语实际运用水平。二是要坚持走产学研结合的路子，加快科技成果的应用、转化，使高校成为高技术人才的摇篮、科技创新的源泉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动力。三是坚持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不动摇。李岚清希望基础性、公益性科研院所加快创新改革步伐，积极探索科研成果产业化的途径，不断发展壮大自己，为国民经济服务。他对中科院广州能源所、广东农科院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李岚清指出，医疗保险制度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发展不平衡，有的地方行动迟、进展慢，存在观望、等待思想和畏难情绪，与中央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很不适应。各级领导一定要把推进这项改革作为事关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件大事来抓，做到思想到位、领导到位、措施到位。

在汕头大学，李岚清还会见了香港知名人士李嘉诚。

陪同考察的中央、国务院有关方面负责同志有：李荣融、徐冠华、高强、吕福源、张志刚、邓楠、潘岳、李东生等。

（赵东辉，转自《南方日报》2001 年 11 月 14 日）

# 刘华清

## 在深圳为驻港部队送行

在中华民族洗雪百年耻辱，香港就要回到祖国怀抱的庄严时刻，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进驻香港欢送大会今天在深圳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向即将启程的驻香港部队官兵表示欢送，并发表重要讲话。

雨后的深圳天气格外晴朗。欢送大会会场彩旗招展、锣鼓喧天。身着节日盛装的群众载歌载舞，将一身崭新戎装的驻香港部队官兵迎入会场。

上午10时，欢送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与会人员全体起立，刘华清检阅了威武雄壮的驻香港部队三军仪仗队。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傅全有上将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江泽民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进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命令》。

刘华清在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是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重要标志，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重要保证。他勉励驻香港部队要坚定



刘华清为驻港部队送行。

不移地贯彻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增强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牢记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坚持从严治军，依法履行职责，严守纪律、秋毫无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引导官兵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大力加强军事训练，强化官兵全面素质。

刘华清表示相信，驻香港部队一定能够按照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和江主席关于军队建设的一系列论述，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始终保持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圆满完成各项任务，让党中央、中央军委放心，让全国人民放心。

广州军区司令员陶伯钧中将在讲话中要求驻香港部队认真学习、坚决执行军委江主席的命令，保证部队安全、顺利、准时进驻香港，让五星红旗在香港上空高高飘扬。

广东省省长卢瑞华和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分别讲了话。他们表示，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驻香港部队建设，当好坚强后盾，做可靠后方，继续为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作贡献。

驻香港部队政委熊自仁少将代表驻香港部队全体官兵向祖国和人民表示：我们一定牢记使命，不负重托，永远忠于祖国，严格履行防务职责，坚决维护祖国的主权和尊严，维护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请党中央放心，请中央军委放心，请祖国人民放心。与会群众为这支威武文明之师所振奋，100 名少先队员欢快地跑入会场，向驻香港部队官兵献上鲜花。

欢送大会由广州军区政委史玉孝上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出席欢送大会。参加大会的还有解放军三总部、军委办公厅、海军、空军、广州军区、外交部、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新闻办、新华社香港分社、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处、广东省和广州、深圳、珠海、汕头、东莞、惠州市的负责同志，以及驻香港部队官兵和深圳市各界代表，共 6000 多人。

昨天，刘华清还前往驻香港部队海军舰艇大队、步兵旅检查了进驻香港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亲切看望了部队官兵。

（刘四年　罗玉文　贾昭全）

（转自《人民日报》1997 年 7 月 1 日）

# 李瑞环

## 春风送暖到粤东

### 一

三月的桑浦山下，春光明媚。静谧的汕大校园，春花盛开。1992 年 3 月 16 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同志，在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汕头市委书记林兴胜的陪同下，亲临汕头大学视察，受到在校的领导姜桐、卢启智、庄威凤以及机关部门负责人的热烈欢迎。中央和省市领导听取了姜桐副校长的工作汇报，巡视了汕大图书馆、大礼堂和风光旖旎的校园。对李嘉诚先生爱国爱乡，关心支持祖国教育事业的精神十分钦佩，对学校创办 12 年来各方面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李瑞环同志说，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学校办得好不好，不仅影响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民族的精神面貌和文化水准。他殷切希望汕头大学办成一所有特色的新型大学。

姜桐副校长在汇报时谈到，汕头大学从创办到现在，得到



李瑞环

了中央和省市各级领导的关怀，也得到了香港李嘉诚先生的鼎立资助。从1980年12月至1991年11月，李先生共捐资6.5768亿港元。并一再表示，对学校的建设和发展要无限地支持下去。他迫切希望汕头大学要办得更加开放些，尽快办成在国内、在东南亚有地位、有影响的一流大学，为粤东，为祖国培养更多人才。李瑞环同志说，汕大从筹建到现在得到了李先生的支持，他花了那么多钱来办汕头大学，花钱人应该有发言权。姜桐副校长说，邓小平同志1986年6月20日在京接见李先生时，赞成把汕头大学办得更加开放一些。1990年6月20日，江泽民总书记莅校视察时，对汕大的办学方向、原则予以肯定，并作了重要指示。1991年10月11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汕头考察时，专门接见了汕大负责人，对汕大深化改革的思路给予支持。1991年11月8日，万里委员长莅校视察时说，汕头大学有条件办成一流大学。为了贯彻中央领导的指示，学校在原来的基础上，制定了1990—1992年三年工作规划，为汕大下一步的发展打好坚实的基础。现在，三年规划正在顺利实施。为了适应90年代我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必须转变教育观念，改革教育体制、教育结构、教育内容和方法，建立起与有计划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教育运行机制和体制。汕头大学地处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又有李嘉诚先生在教育经费上的鼎力资助，因此，我们希望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请中央给政策，把汕头大学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试验区”。李瑞环同志对汕头大学深化改革的思路表示支持。他强调指出：汕头大学应该办成一所适应特区经济发展，有自己特色的新型高等学校。可以借鉴和学习国内外高等学校的办学经验，敢于改革不适应我国未来经济发展需要的一切弊端，敢于钻出旧的圈子，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开拓一条新路子。你们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搞出一个中国高等学校的新模式来，提交校董会审议决定。只要坚决按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办，汕头大学就可以办成一所新型的大学。大家热烈鼓掌，感谢党中央对汕头大学的关怀，感谢李瑞环同志对学校发展的支持与启迪。省委书记谢非十分赞成李瑞环同志的意见，希望学校按李瑞环同志的指示，抓住一切有利于汕大发展的时机，加速教育改革的步伐，研究出一个如何办好新型大学的模式来，省委将给予大力支持。

当姜桐副校长汇报到，随着学校的发展，汕头大学迫切要求成立出版社，两年多来曾多次向有关部门申请，李嘉诚先生也曾给国家教委写信，希望国家尽快批准成立汕头大学出版社。最近，国家教委同意了汕大的要求，已致函国家出版

总署核准。现特恳请李瑞环同志予以批示，并转请出版总署尽快批准成立汕头大学出版社。李瑞环同志要学校立即写个报告，由他带回北京予以办理。

中央、省市领导对汕大的关怀，使全校教职员工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学校领导在思索，全校上下在思索，题目只有一个：如何加速汕大发展，尽快办成一所有特区特色的新型大学。

前不久，学校召开了“汕头经济特区扩大后，汕头大学发展对策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通过分析汕大当前面临的新形势，深刻认识到加速学校发展的紧迫性。目前，汕大的发展已经进入关键的历史时期，正面临着国内外高等教育迅速发展和汕头经济特区经济、科技、社会迅速发展的严峻挑战。这个时期的形势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希望与困难同在。当前，学校必须抓住一切有利于发展的时机，充分利用李嘉诚先生大力资助的有利条件，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教育观念；大胆改革，用好用活特区政策。要根据汕头特区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全面优化汕大的专业结构。变革基础学科和专业。发挥多学科的优势，通过理工结合，文理渗透，产生社会需要的新学科和高新技术专业。发展工科专业，为社会新兴工业的发展和传统工业的改造培养各种应用型人才。要改革现有管理体制，把逐步实行学院制与优化专业结构结合起来，集中办学力量，提高办学效益，对专业设置与专业目录、招收研究生、招生与分配制度的改革、人事劳动工资制度的改革、职称的评聘、人才的引进、同国际高等教育的交流与合作等等，不能按常规走路，要做到“特事特办，新事新办，方法灵活，方向不变”。这次，李瑞环同志亲临汕大视察，对汕大深化改革予以极大的关心和支持，使学校进行综合性改革的决心更大了，目标更明确了。相信有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有广东改革开放的丰富经验，有李嘉诚先生的鼎力资助，全校教职员工发扬“团结、勤奋、求实、创新”的精神，就一定能把汕头大学办成一所有特区特色的新型大学。

## 二

2009年2月，李瑞环在广东省委常委、秘书长徐少华的陪同下，乘专机来到梅州视察。在市领导刘日知、李嘉、温华光、陈小山、林碧红、黄伟闻、彭耀新等陪同下，李瑞环一行先后视察了广东客家博物馆、叶剑英纪念园和雁南飞茶田度假村，听取了市委、市政府和市政协近年来的工作情况汇报。

李瑞环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广东客家博物馆展出的客家渊源、客家风俗、客家民居、客家文化、客家精神等内容，了解客家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梅州作为有“世界客都”之称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千百年来，文风昌盛，英才辈出，孕育出伟大的客家精神和璀璨的客家文化。为秉承客家文化、弘扬客家精神，进

一步提高梅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品位和知名度，推动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梅州市委、市政府克服种种困难，建成集客家历史、人物、民俗、风情之大成的国内最大的客家博物馆。李瑞环对此感到非常高兴，并在参观结束后欣然签名留念。

在叶剑英纪念园，李瑞环首先向叶帅铜像敬献了花篮。随后，李瑞环一边听讲解，一边参观纪念园内展出的叶帅各个时期的图文、实物、视频、艺术品等，还参观了叶帅故居，全面了解叶帅伟大光辉的一生和崇高的革命风范。参观了展馆后，李瑞环饱蘸浓墨，欣然题名。在叶帅纪念园内的一块空地上，李瑞环还和徐少华、刘日知、李嘉、温华光等，一起种下了一棵香樟树。李瑞环对梅州市委、市政府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叶剑英元帅故居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叶剑英元帅纪念馆的原有基础上，以展示伟人形象和客家文化为主线，对资源进行整合扩充和配套完善，按照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标准精心扩建，把场馆建设与纪念园功能、发展旅游与生态建设有机结合，建成国家一流的纪念性场馆，给予了充分肯定。

（林贞和　戚帝欧）

# 尉健行

## 推动反腐斗争向纵深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健行于2000年4月13日至24日在广东省深圳等市考察时强调，要从改革体制、机制、制度入手，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推动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

尉健行指出，党的十五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的实践表明，通过改革体制、机制、制度，强化管理，从源头上防止权力不正当运用，是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治本措施。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深圳等市，针对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改革入手，较早地实行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公开招标、拍卖，建立产权交易市场、有形建筑市场，推行政府采购，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等，努力实现政府依法行政、廉洁高效的要求，取得了明显效果。全国还有部分地区和部门在这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都有了程度不同的成效。尉健行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在认真落实中央统一部署的各项治本任务的同时，还要结合各自



尉健行到深圳调研。

的实际，针对容易滋生消极腐败现象的主要症结，主动提出本地区、本部门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对策。

尉健行指出，这些年来一些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其中不少的人就是滥用行政审批权力，个人违规批土地、批贷款、批建设工程项目等，从中收取巨额贿赂，走上了犯罪道路。这些严酷的事实表明，目前一些行政审批运作中存在的弊端，成为有些领导干部利用权力谋取私利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对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具有重要作用。在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过程中，除了该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一定要取消外，对需要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可以运用市场机制来运作的，要通过招标、拍卖等市场手段来处理；对不能通过市场机制运作的项目，尤其是那些容易发生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项目的行政审批权力，必须进行合理分解，并加强相互之间的监督制约，防止少数人权力过分集中又缺乏内部监督、搞暗箱操作的弊端。

尉健行指出，中央要求今年在全国范围的乡镇政权机关普遍推行政务公开。有条件的县、地（市）级等政权机关也要推行政务公开。政务公开的实质是对行政权力运作加强监督。政务公开是手段，是形式，根本目的是让群众知情，便于群众监督政府的行政行为。各级政府实行政务公开，接受群众监督，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这就是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既要勤政，又要廉政。实行政务公开不仅是为了方便群众办事，更重要的是向群众提供真实可信的情况，使他们感到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办事是公正的。因此，政务公开不仅要公开办事依据、程序和结果，而且要建立健全内部的监督制约机制，把对外公开政务同加强内部监督结合起来；不仅要向群众公开，还要向企业、事业单位公开；不仅乡镇政府机关要搞政务公开，派驻乡镇的各个站、所也要搞政务公开。这样的政务公开，才能使群众真正进行监督，有效预防以权谋私现象的发生。

在同工会干部座谈时，尉健行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工会组织都要从江泽民同志关于党要当好“三个代表”重要指示的高度，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指导方针，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各级工会要进一步突出和履行维护职能，首先必须最大限度地把新建企业的广大职工组织到工会中来。工会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当前要特别重视职工的安全生产，加大群众监督

力度，努力防止工伤事故特别是重大事故的发生。对出现重大伤亡事故的，企业工会尤其是上级工会都要参加调查处理，有关方面要认真听取工会的意见。

尉健行在广东省先后到深圳、东莞、顺德、珠海等市，深入工厂、农村、高新技术产业区进行考察。他对这几个市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在推进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等方面取得的明显成绩和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分别陪同尉健行考察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省长卢瑞华，省委副书记张高丽等。

（张知干）

（转自《光明日报》2000 年 4 月 25 日）

# 宋平

## “我的根要扎进特区沃土，长留广东大地”

宋平是中国的开国元老，历任重要职务。他对广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颇为关心，尤其是在广东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更是倾注了大量心血，积极支持和推动广东各项大事的健康发展。

宋平在任时，曾多次来粤调研、考察、指导工作，出国访问亲点原广东省委书记谢非作为代表团成员。宋老从政治局常委位置上退下来后，连续数年受谢非邀请来广东考察工作和休息，每次他都身心愉悦，精力充沛，有如归家之感。他与广东结下了不解的情缘，可以说宋平心系广东，情连南粤。

1995 年，宋平受甘肃省委和河南省委的邀请先后到甘肃考察“阳光农业”，到河南考察“农业大省”建设，由于考察项目安排过多，日程排得较满，休息得不够充分，加上已是 78 岁高龄，两次均得了重感冒发高烧不退，不得不乘专机回京紧急治疗，导致身体极度虚弱。当谢非得知此情况后，利用去京参加政治局会议的机会前去探视，并诚邀他在身体恢复到



宋平视察工作

可以离京时到广东休息和指导工作，宋平答允。

1996年元月3日上午11时25分，宋平的专机飞抵深圳机场，由警卫秘书钟尚彪搀扶着慢步走下飞机，随后其夫人、水电部原副部长陈舜瑶紧随其后。随行有秘书彭清华（现中央人民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警卫参谋薛军、刘光军，医生罗军，工作人员张永国。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市长李子彬、广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刘元和将军和我前去接机。宋老走到离飞机近百米的坐车处竟用十多分钟，看来他的身体的确虚弱。他们一行人住迎宾馆桂园别墅。下午，在6号楼二楼会议室，由我主持召开省、市接待、警卫、保健部门等人员会议，研究接待的有关问题。首先请秘书彭清华和警卫秘书钟尚彪介绍宋平近期情况，对保健、生活、考察等工作提出要求。彭、钟介绍说，宋平1991年来过深圳，多次来广东，最近几年，没来深圳了。去年他去贫困地区较多，很累。这次来以休息为主，先作身体调整，在健康状况允许的情况下，适当地再半天活动，看看企业、农村、高科技产业，能反映深圳发展变化的项目。他老人家历来要求严格，不想过多牵涉省市领导的精力；接待人员要尽量少；生活安排要节俭。特别要注意，宋老在延安任周恩来副主席政治秘书时，挑水时不小心使颈脊椎关节错开。如不小心搞断，会导致全身瘫痪，所以坐车绝对不能急刹车；另老人家有过敏性鼻炎，对花粉特别过敏，住地四周不能有浓香，也不能吃、闻辛辣的东西及气味。最后，我总结说，一切按彭、钟两位秘书讲的认真落实，不清楚的随时逐级请示解决，接待警卫工作做到“热情、干净、舒适、安全”；饮食饭菜做到“地方特色，粗饭精做”即可。因为并不十分了解宋老平时对花粉过分敏感，中午入住后因桂园四周桂花盛开，宋老即感咽喉不适，当即商定将宋平迁至柏园别墅。当日下午4时30分宋老前去拜会了习老（仲勋），顺便也看望了住荔园别墅的王鹤寿。

晚上6时，受谢非书记、朱森林省长委托，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市长李子彬和我为宋平一行接风。陪餐结束时，因饭菜量大不精，宋老吃得不多。厉有为笑着说，宋老，这顿饭吃得不太好，因为省里规定有“四不上”。宋平笑着说，这顿饭已吃得很好了！所谓“四不上”是谢非任省委书记时，为贯彻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内宾接待中实行俭朴的精神规定，如接待内宾，不得宴

请，只能陪餐一次；考察工作要轻车简从；下去调研考察，在离开当地时，目的地领导不得到边界迎送等，在陪餐中规定不上“燕窝、鱼翅、鲍鱼、洋酒（后改为高档洋酒）”。谢非对贯彻此精神很坚决果断，如有一次他陪马万祺吃饭，考虑到马是港澳知名人士，我们商量拿出的菜单上多加“鱼翅”这一道菜。但是在送谢非审定时，谢大笔一挥，将这道菜删去。我争辩说，马虽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但他还是港澳知名人士呀！谢非果断地说，谁叫他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呢?!

为了让身体极度虚弱的宋老尽快康复，我和省、市接待、保健部门的同志研究确定了一周饮食调理方案。因他夫妇单独用餐，餐桌上每顿都放上了菜单，使他们心中有数。第二天早餐后，当我去征求他老人家对饮食起居有什么建议时，他笑着说，既然省委有“几不准”，你们还给我上那个（指燕窝）？我说，宋老，我也是按省委的规定办的。“四不上”和“上”都是上了省委、省政府的红头文件的。退下来的老同志为了健康长寿，保健工作的需要，不受“四不上”的限制。宋平这才点头默认了。加上宋平以坚强的毅力坚持适度的身体锻炼，一周后他的体质很快得到了改善。早晨，他一般近6时起床，到院子里散步；拿着袖珍收音机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及时知悉天下大事，活动近一个小时。上午10时30分、下午4时30分散步。每天早晨，我和他的秘书、参谋、省市警卫局（处）的同志6时前必到他的住房门口，待宋老走出楼门即陪他散步。有一天早晨，我们几人等到快7时，他才从卧室走出来，一看是我们，就微笑着说，对不起，今早起晚了，因昨晚我看广东足球队的比赛睡晚了。边说边到院子里散步。

宋平的身体康复后，他提出到仙湖植物园植树，那里有邓小平1992年南方视察时，和杨尚昆主席种的高山榕。宋平说，广东五年消灭荒山，十年绿化南粤大地，这在全国是第一省，是起了模范带头作用的。“我对广东是有特殊感情的，这次来广东，也要去种树，给‘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1968年广东省委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人民日报》祝贺的社论的标题）的岭南大地增绿添红！我去种树，就是要把我的根扎进特区的沃土，长留广东大地。”宋老要植树，按惯例，要有省、市领导陪同，要通知新闻记者留资料。经请示宋平，一概不准；只同意少数接待他的同志一块去植树。我考虑，退下来的老同志的活动，可以不报道，但应留下资料。我极力说服宋老，争取能让他有些松动，但他不改口，说种树是普通的一件事，自己是退下岗位的老人，不要分散现职领导的精力，不要扰民。我又请钟尚彪秘书去、二请彭清华去、三请其夫人陈舜瑶去做宋平的工作，他坚定如山。至此，我也无奈，只好按他的意图办，在接待他一行的人员中选定必不可少的接待、警卫、保健人员陪他一起植树。1月17日正在早餐时，省委接待处的同志从市接待办获悉，厉有为书记得知宋平去植树的消息后，按惯例他决定陪宋平夫妇去植树，也通知了市的新闻媒体。这一意外情况使我心如火燎，随即放下筷子，跑向服务台，迅即要通了厉书记的电话，我讲清了宋老的意

图及反复做他的工作的情况后，厉书记仍坚持按惯例办。我很激动，说你是省委常委，我作为省委副秘书长应服从你的领导，按你的决定执行；但我现在是代表省委分管这项工作，在此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下，你得按我的意见办。你熟悉宋老的脾气和作风，如违背他的意愿，惹他不高兴，这样后果不堪设想！厉书记听到这里连连说，我听你的，就不陪宋老植树去了！我们少数工作人员陪宋平夫妇在仙湖植物园“名人林”兴致勃勃地种了几棵南国红豆树，实现了宋老的心愿。

越是临近春节，广东的接待工作越繁忙。至2月9日，来广东考察、开会、休息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数十人之多，迎送、陪同市省的领导，尤其是谢非书记忙得不可开交、应接不暇。宋平原计划春节前来广州的，因无合适的住址，也决定在深圳不动了。宋平来月余，我几经提醒，谢非书记也未能挤出时间看望。9日晚陪乔石一行饭后，我紧随谢非身后走向他的座车，我请示何时去深圳看望和陪同宋平活动时，他急促地说，我实在安排不开，只能抽空去看望他老人家了！我回到办公室后，考虑再三，觉得谢非书记不仅要抽空看望宋平，还要至少挤出半天陪宋平调研活动。

经过一番周折，后来在我的精心安排下，2月13日晚饭前，谢非赶到深圳迎宾馆，看望并陪宋平夫妇共进晚餐。14日上午，又同黄华华副书记等陪宋老一行考察了南方制药厂、中国长城计算机公司等，宋老对广东的各项工作给以高度评价。谢非盛情邀请宋老在深圳过春节，宋老也高兴地答应了。尔后，在子女是否来深圳过春节团聚上，宋老夫妇产生了不同意见。宋老意见，在广东过春节，子女们就留在北京，不要来深圳，再给广东增加麻烦了。夫人则希望和孩子们团聚。为了不给广东方面增加接待负担，宋老夫妇平等友好协商后，决定回京过年。2月16日上午8时15分，我们送宋平一行乘专机返京。

（琚立铭）

（转自《侨星》2010年第12期）

# 习仲勋

## 广东改革开放的奠基者

新中国成立初期，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1952年，他调到北京，任政务院秘书长，1956年在中共八届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正当习仲勋大有作为的时候，1962年因小说《刘志丹》冤案，把他打进了人生的深渊。他因此受到牵连，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达16年之久。他历经劫难，九死一生，粉碎“四人帮”之后，才终于盼到了平反出头之日。

### 重新出山

1978年2月，习仲勋作为特邀委员出席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期间，在粉碎“四人帮”起关键作用的叶剑英元帅见到习仲勋，不禁愣住了：仲勋同志，你备受磨难，身体竟还这么好?！当时叶剑英尽管年事已高，工作繁忙，但还是抽空接见了习仲勋。他征求习仲勋对工作安排的意见。这时，叶剑英和华国锋、邓小平等考虑时任广州军区第一



勇立改革开放潮头的习仲勋。

政委、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韦国清已经调到北京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身兼数职，在北京政务、军务十分繁忙，广东的工作实在是无暇兼顾。经研究决定，派习仲勋这位资格老、级别高、领导工作经验丰富的大员坐镇广东，由他来主持广东省的日常工作。

叶剑英郑重地交代，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战略地位相当重要。那里问题比较复杂，还有大量的冤假错案没有平反。希望他团结好本地和外地干部，妥善解决广东的历史遗留问题，率领广大干部群众，把广东的各项工作搞上去，跟上全国的步伐。其后，习仲勋驱车前往邓小平的住地。他向邓小平表示，自己已有16年与世隔绝，没有工作，这次一出来，中央就把他安排到祖国的南大门广东，觉得任务很重，心里不大踏实。邓小平鼓励他大胆工作，要放手干，中央会全力支持他的工作。习仲勋带着党中央的重托，以一个老战士的姿态，毅然踏上新的征程，精神抖擞地来到祖国的南大门，投入紧张又是崭新的工作。

习仲勋一到广东，就参加中共广东省委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会，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说他由北方水土养育了大半辈子，现在到了广东，要靠南方水土养育下半辈子。他言语不多，但把广东作为第二故乡，要和广东人民共同奋斗的决心溢于言表，非常感人。1978年4月6日，在省委四届一次会议上，韦国清当选为第一书记，习仲勋当选为省委第二书记，会场上掌声雷鸣。

会后不久，韦国清返回北京，由习仲勋主持广东的日常工作。而当时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之后的广东，创伤累累，百废待兴。鱼米之乡无鱼吃，水果之城无水果。物质匮乏，买什么都要凭票。市民把买不到鱼的鱼票寄给习仲勋，这深深刺激了他。习仲勋以一个老革命家的革命胆略、远见卓识、大无畏气魄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既沉着面对，又雷厉风行，团结省委一班人，稳住大局，励精图治。习仲勋履新没有多久，叶剑英到广东视察。习仲勋向他汇报来广东工作的初步设想后，叶剑英面授机宜：“深入调查研究；稳妥制订计划；及时报告中央；按步执行实施；分清轻重缓急；注意保密安全。”要他在工作中切实加以注意。习仲勋一直把这六句话作为座右铭。

## 防偷渡治标治本并举

习仲勋到职不久，就遇到了“偷渡外逃”这个棘手的老大难问题。当时

“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国家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内地人民生活水平与香港居民相差悬殊，因此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出现严重的“偷渡外逃”高潮。

盛夏7月，烈日当空。习仲勋在省委书记王全国等人的陪同下，驱车前往深圳考察。公路坑坑洼洼，进入宝安一看，公路两旁杂草丛生，十分荒凉。宝安靠近香港，近几年外流香港的有好几万人，土地丢荒有20多万亩。习仲勋一行在路上颠簸了一天，才抵达深圳。这是一座只有两条半街的边陲小镇，街道狭窄，房屋低矮残旧，破破烂烂。习仲勋又来到沙头角考察，几块竖在街中间的石头，把一条窄窄的中英街一分为二，两边贫富悬殊，对照非常鲜明。

习仲勋感慨万千地说：“为什么香港那边是高楼大厦，人们忙忙碌碌，一派兴旺，我们这边却是一片荒凉，萧条冷落，而且人都往那边跑？”从南海吹来的热风吹乱了习仲勋花白的头发，他的心头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

他对宝安县的领导干部说，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旧的框框多，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许多本来是正确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他支持和鼓励宝安的干部：“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够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

从沙头角回来，天已经很黑了，但习仲勋还是坚持要去收容站看看。在收容站里，他问一个外逃的人：“社会主义那么好，我们自己当家做主人。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那个偷渡的人说：“我们穷，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惠阳地委副书记、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告诉习仲勋，有很多偷渡到香港的人，找到工作后很快就可以寄钱回家，家里人一两年以后就可以盖新房。习仲勋作为老革命家，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十分坚定，他给这个偷渡的人讲了许多社会主义好的道理，希望能纠正他的思想。

后来，习仲勋有一次去深圳检查工作，正好碰上农民外逃香港，冲击边防线。习仲勋感触很深：建国多年来，搞闭关锁国，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我国经济濒于崩溃，群众生活困难，再不改弦更张，外逃的就会更多了。习仲勋召集一些公社书记前来座谈，直截了当地问他们能不能把人留住，我给你们粮食。公社书记说不行，留不住。当时，由于海岸线长，香港与内地人民生活相差过于悬殊，广东对偷渡确实是防不胜防，堵不胜堵。广东边防几个县，军民一起布设了好几道防线，每个县，都有一个领导人专管反偷渡，但也不管用。

古语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现实使习仲勋深刻地认识到，不能再搞过去那一套贫穷社会主义了。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能稳定人心，有效地刹住这股偷渡外逃风。果然，经济特区成立后，“偷渡外逃”现象正如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所言那样，“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没过多久，有些偷渡到港澳去的人见家乡经济发展了，又成批成批地回来了。

## 酝酿广东先走一步

1978年春夏之交，中央开始考虑如何冲破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的状态，逐步进入国际市场的问题。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为发挥这一优势，中央要求广东切实搞好宝安、珠海两个边防县的建设，从港澳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原料，搞加工装配业务，扩大外贸出口的工作。

1978年6月20日晚，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决心切实搞好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和宝安、珠海两县的建设，决不辜负党中央的殷切希望。会后，由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建安主持召集省有关单位开会研究，提出方案。6月23日，李建安向省委上报了《关于搞好宝安珠海边防县建设和外贸出口的意见》。他们在报告中提出了组织领导、机构设置、建农副产品出口基地、进出口物资、工业交通建设、来料加工、引进生产线、搞好城镇建设和发展旅游业等，已初步勾勒出深圳、珠海的未来雏形。习仲勋和省委基本上采纳这一实施方案。在习仲勋的主持下，广东省委、省革委会对举办出口加工区进行了反复讨论和论证，并在领导层中形成了一致的意见。习仲勋和省委根据广东的特点，并且研究了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成功经验，着手筹建大规模出口基地。

10月23日，省革委会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的报告。1979年1月23日，为了加强对宝安、珠海地区的领导，建立出口基地，发展对外贸易，省委经中央同意，正式作出决定，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成立两市市委。这是广东根据中央确立的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这一国策，冲破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迈出的勇敢的第一步。3月5日，国务院批复省革委会，同意两县改设为市。国务院还批复省革委会，原则上同意广东省提出的对宝安、珠海的规划设想。

1978年11月上旬，习仲勋赴京参加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他在中南组作了长篇发言。他说：根据中央的指示，从港澳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原料，搞加工装配业务的工作，现正初步展开。习仲勋建议中央考虑鉴于广东与港澳来往密切，希望中央能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一个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这些实际上成为后来广东要求中央放权，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先声。

12月，习仲勋被中央任命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后改为省长），并增补为中央委员。

## “杀出一条血路来”

为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习仲勋赞同省委书记王全国提出在全国体制未解决之前，要求中央在广东做些特殊规定这一建议。后来，吴南生又提议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用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吴南生说，“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当时常委们都表示赞成，省委在这个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习仲勋当即表态：“要搞，全省都搞。先起草意见，4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带去北京。”4月1日、2日，在协助习仲勋工作的杨尚昆主持下，省委常委会议同意向中央提出要求允许广东先走一步的意见。

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习仲勋赴京参加这次会议。4月8日下午，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李先念、中央政治局委员胡耀邦参加了中南组会议。习仲勋发言说：“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是一致的。”他的发言反映了广东要求中央扩大自主权的渴望。因为华国锋、李先念和胡耀邦在场参加讨论，因此，广东省委提出先走一步的要求，直接反映到中央最高领导层中去。

4月17日，习仲勋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会议，向华国锋、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作汇报。习仲勋在汇报时，郑重其事地提出，广东打算仿效外国加工区的形式，进行观察、学习、试验。运用国际惯例，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他的提议，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和支持。邓小平非常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他敏锐地看到了这种做法是一种新思路，是中国实施开放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当他听说贸易合作区的名称定不下来，大家意见不一致时，邓小平深思熟虑地说：“还是叫特区好，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当谈到配套资金时，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根据邓小平的倡议，中央工作会议正式讨论了广东的提议，并作出了关于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有利条件和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地试办出口特区的决定。

6月6日，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福建省委也提出类似的报告。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发了中央50号文件。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要求两省抓紧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创办“出口特区”。

中央这个重大决策，如一夜春风，给南粤大地带来了一派春意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9月21日，习仲勋在地委书记会议上作总结发言，专门讲了贯彻中央50号文件问题。他斩钉截铁地说：“在态度上我看要有‘三要’和‘三不要’：第一，要有决心有信心，不要打退堂鼓；第二，要有胆识，勇挑重担，不要怕犯错误，怕担风险；第三，要有务实精神，谦虚谨慎，不要冒失，不要出风头，不要怕否定自己。特别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拼老命也要把广东这个体制改革的试点搞好。要下这样一个决心，即使是可能犯错误，也要干。……我相信，在中央的领导下，只要我们认真对待，努力工作，50号文件一定能贯彻执行好，我们一定会在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试验中，走出一条路子来。”

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和“左”的思想影响，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对改革开放，尤其是对试办经济特区，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疑虑很多，阻力很大。有人说，“特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香港市场上‘水货’之源”，“走私的主要通道”，甚至比拟为“旧中国上海的‘租界’”。习仲勋并没有因此退缩。他在向省委常委传达向中央“要权”一事时说，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总得变，你不提，中央也会提。拼老命我们也要干。

## 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

习仲勋到广东上任之后，即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叶剑英元帅的嘱咐，着手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广大蒙冤受屈者对习仲勋寄予无限的希望。因为习仲勋本身就是“左”倾错误的受害者，能够理解受害者的心情。一封封要求平反的信件，一宗宗骇人听闻的案卷，如雪片似的飞进了他的办公室，堆满了他的案头。经过听取汇报，审阅大量的案卷，并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习仲勋基本弄清了广东各种冤假错案的情况。

1978年11月，习仲勋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了“文革”期间广东的冤假错案情况。广东是林彪、“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的“重灾区”。黄永胜等人窃取广东党政领导大权达7年之久，为配合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干了大量坏事，制造了大批骇人听闻的错案、假案、冤案。他们按照江青“审理广东

地下党”的黑指示，揪所谓“南方叛徒网”，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私设专案，搜集整理诬陷周总理、叶副主席的黑材料，并由此几乎把所有全国解放前在广东从事革命活动的烈士、干部和党员都打成“特务”、“叛徒”、“土匪”。全省被立案“审查”的干部达11万多人，占原干部的15%，其中原副专员、副厅长以上干部共640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74.5%；被揪斗的数量就更大了。由于他们支持乱打乱杀，挑起武斗，全省非正常死亡人数，前段查明并作了善后处理的共3.9万多人；从各地披露的材料看，还不止此数。他们搞干部“两退一插”（退职退休、插队落户），使2.8万多名干部无端受到清洗。他们搞所谓“战备疏散”，把10.7万多人赶出城镇，其中被遣送回乡的干部5000多名。他们还搞“海外关系”黑六条，给一批干部加上种种罪名。

1979年春，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会议指出，抗战时期广东党组织是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的，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林彪、“四人帮”一伙策划揪“南方叛徒网”，矛头是指向周总理的，应彻底揭露和清理。至于全国解放前活跃在广东各地的人民武装，在革命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林彪、“四人帮”一伙的一切诬蔑之词，必须统统推倒。省委郑重宣布，凡因这些案件受迫害的同志，都应平反昭雪。在习仲勋的亲自领导下，广东为“文化大革命”中被立案审查的11.2万名干部平反昭雪。

习仲勋还指示省纪委等有关部门对“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历史遗留案件，特别是影响很大的两次“反地方主义”进行复查。虽然遇到省委中几位主要领导干部的极力反对，他还是坚持要复查这一历史积案。古大存的夫人曾史文见到习仲勋时，问他：“有人说你为‘地方主义’翻案，你知不知道?”习仲勋回答：“知道，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被挤出广东；另一种可能是把为地方主义等平反搞成。”1979年8月，省委正式向全省发出《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通知》指出：“当时认定古大存、冯白驹两同志‘联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存在一个‘以冯白驹同志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有的地方也定了一些地方主义反党小集团。现在看来，这些结论都是不当的，应予以撤销。”

习仲勋调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仍关心过问这一案件的彻底平反工作。1982年4月7日，省委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复查结论的请示报告》。但由于有人想为复查结论“留尾巴”，结果节外生枝。习仲勋为赴京上访的曾史文做疏通工作。经陈云、黄克诚、习仲勋等人的关心过问，中共中央于1983年2月9日发出了《关于为冯白驹、古大存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这宗历时20多年的冤案终于彻底平反。

在为广东反“地方主义”这一冤案的平反工作中，习仲勋起到了别人难以替代的关键作用。吴南生对此评价说：“习仲勋在处理广东‘地方主义’问题时，顶住层层压力坚持复查，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落实了干部政策。没有他，广

东平反‘反地方主义’冤假错案就不会这样有成就。实践证明，习仲勋的做法是正确的，维护和调动了干部的积极性，促进了广东局势的稳定和团结。”

此外，习仲勋还领导全省各级党委为原划“右派”分子做好摘帽、改正工作，并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侨务政策、宗教政策等等。

## 为广东争得一把“尚方宝剑”

1980年9月下旬，北京天高云淡，金风送爽。24日、25日上午，在金碧辉煌的中南海勤政殿，胡耀邦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第52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赵紫阳、万里、姚依林、谷牧、王任重、王鹤寿等。中央书记处听取了广东省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关于广东工作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

当习仲勋等人向中央提出给广东更大的自主权，允许广东参照外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大办经济特区，以便加速广东经济发展建议时，想不到在场的一位中央负责人当场大泼冷水。他说，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要在边界上拉起7000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的几个省隔离开来。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听罢，大为惊讶。很显然，这位中央负责人是担心国门一旦打开之后，资本主义的东西会如洪水猛兽一样涌进来，因此，才产生用铁丝网将广东与闽、赣、湘、桂诸省区隔离开来的想法。虽然这位负责人不赞成，但广东的大胆设想，得到了中央许多领导人的赞同和支持。胡耀邦在会上讲了京剧《孙安动本》的故事，说定国公徐龙手上有明太祖所赐黑虎铜锤，鼓励广东大胆实践；谷牧再次讲了广东应学孙悟空翻几个筋斗。

9月28日，中央印发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纪要”指出，中央要求广东充分利用和发挥本地优势，尽快把广东的经济搞活，闯出一条道路，使广东成为我国对外联系的枢纽。中央授权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

中央这一纪要，给广东以更大的独立自主权，让广东更加大胆地去干去闯。这是习仲勋、杨尚昆临离开广东、调回中央工作之前，为广东争得一把“尚方宝剑”。

（卢　荻）

# 任仲夷

## 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

### 赴粤上任

1980年初冬。北京。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上世纪80年代，中国顺应时代潮流，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历史正翻开新的一页。正值此时，中共中央决定调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杨尚昆回北京工作，并决定将原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和原国家轻工业部长梁灵光调往南中国，接替其职。

任仲夷之所以受命承担这一重任，其原因是无论在政绩方面，还是在思想理论、胆识气魄和才干方面，都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因此，中央经过反复挑选，最后确定由他来执掌祖国南大门。

任仲夷和梁灵光赴粤前，1980年10月31日至11月6日，中央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万里、韦国清、姚依林、谷牧等先后接见了他们，并且和他们作



刚刚上任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与省市干部见面。

了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谈话。

1980 年 11 月 15 日，中共广东省委在中山纪念堂举行干部大会。习仲勋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任仲夷、梁灵光任命的通知，会场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掌声里充满了对中央抉择的衷心拥护，表达了广东人民的殷切期望。

任仲夷向大会传达了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他们时对广东工作所作的最新谈话的内容，并作了重要讲话。

任仲夷首先强调团结问题，他说，“我们必须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要求，切实加强党的团结”。“不管过去有过什么毛病，互相有过什么恩怨，只要现在拥护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且努力工作，就是好同志。在这个大前提下，大家都应当捐弃前嫌，团结起来，同心同德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任仲夷继续讲的第二点是，必须按照中央领导人的要求，把广东的经济进一步搞上去，把人民生活进一步搞好。他向大家交底：“要把经济搞上去，必须发挥广东的优势。中央批准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央授权广东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增大了地方的权力；二是允许广东对外更加开放，要使广东成为国家对外联系的枢纽和橱窗。”他又进一步为大家消除思想顾虑，要求各级干部大胆解放思想，他说：“中央给了我们这样大的权力，现在就看我们敢不敢用这个权力。我们应当大胆地使用它，并且学会善于使用它。”

说到这里，他抬起了头，清了清嗓门，声音更加清楚了，“特殊政策要真特殊，灵活措施要真灵活，先走一步要真先走，不然还是空的。”

任仲夷讲话完毕，会场上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 真抓实干，创深圳速度

作为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把特区工作摆到很重要的位置，亲自抓特区的建设工作。他上任不久，即和梁灵光驱车前往深圳、珠海视察。

任仲夷等人抵达深圳时，经济特区建设刚刚起步，建筑工地一片繁忙，到处车水马龙，尘土飞扬。任仲夷不顾一路颠簸，舟车劳累，抵达市委后，立即听取了工作汇报，又找人谈话，常常工作到深夜。他还专程前往蛇口看望正在当“开荒牛”的袁庚。

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考察，任仲夷和梁灵光发现深圳领导班子不够协调，与邓小平提出的“杀出一条血路来”的要求和中央对广东在对外开放中先走一步的急切期望尚有差距。任仲夷和梁灵光都认为，要认真搞好特区，为广东、也为全国作出示范，特区的步伐要加快，应当大干一场。

任仲夷长期在省、市地方第一线工作，他深知精兵强将的作用。他想，开发国内前所未有的经济特区，必须要有一批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开荒牛”，才能打开局面。他和刘田夫、梁灵光等商量，决定对深圳市领导班子马上进行调整。他们认为省委书记吴南生兼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期间，为深圳特区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作出了重要贡献，调他回来，主要是让他负责三个特区的指导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经过挑选，认为调广州市委常务书记梁湘出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最为合适。然而，梁湘建国后一直都在广州工作，不想离开广州。任仲夷等反复做梁湘的工作，希望他去深圳，省委会全力支持他。梁湘最终还是接受重任，同意到深圳去。他提出要从广州等地调些骨干，任仲夷等全力支持他。先后调一批既有实干精神又有才华的干部到深圳，及时调整了深圳市领导班子。实践证明，任仲夷等这一次对深圳领导班子的大调整，是正确的。梁湘是个实干家和典型的“开荒牛”，他率领深圳人民艰苦创业，特区建设从此走上了快车道，上演了一场场威武雄壮的活剧，创造了名闻遐迩的“深圳速度”。

同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任仲夷就特区问题作专题发言。任仲夷针对特区“香港化”、“特区就是租界”之说，在中南组的讨论会上，以满腔热情和坚定信念，肯定特区这一新生事物。他说：“我们之所以办特区，完全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外国的利益。进行一些自愿互利的经济合作，是以不损害我国的主权为前提条件的。为了我国的利益，才给来与我们进行合作的那些人一定的利益。主权完全在我们手里，那里的政府、警察、军队都是

我们的，执行我国的法律。这有什么危险呢？没什么危险！办特区，确实给我们带来好处。”

他还列举自己到深圳、珠海考察时的所见所闻，以切身体会，称赞特区的新气象。“以与香港一街之隔的沙头角公社为例，全公社当时人口 1300 多人，解放以来往香港外流的 2600 多人，等于两个沙头角。前几年，每年外流 120 多人。从 1979 年开始，外流大大减少，到了 1980 年，不仅没有出走的，以前去到香港的人还有些要求回来。”他告诉与会的同志们，“看到特区社会安定的事实，完全应当解除顾虑和担心。”

1981 年 5 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的会议。自从中央提出在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以来，两省各项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始终有人对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忧心忡忡。一怕滑上资本主义道路；二怕乱了国民经济全局；三怕犯错误。某些部门对广东的做法显然持怀疑态度。不少文件都加上一句“广东、福建不例外”。

任仲夷和福建的负责人坦诚交换意见，一致认为，中央还没有给我们真特殊、真灵活、真先走的东西。两省要求中央进一步松绑放权，让两省可以发展更快一些。因此，任仲夷和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在会上提出，能不能定出几条杠杠：第一，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三，坚决完成中央规定的任务；第四，不做特殊党员；第五，执行统一对外政策。在这几条大原则下，中央就不要管死我们，放手让我们去闯。休会期间，两省的同志和中央部委有些同志开玩笑说，在这几条大杠杠下，你们把我们忘掉好了，不要老说我们“不例外”。

会议在谷牧主持下，开得很成功。大家在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会议较好地协调和解决了中央有关部门和两省条块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松绑放权，以利于两省真特殊，真灵活，真先走。

9 月底 10 月初，省委、省政府在广州召开省三级干部会议。会议传达了国务院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精神，检查总结两年多来经济特区建设情况和经验，讨论如何进一步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把两省经济搞活的问题。会上，任仲夷对广东的改革开放提出自己的见解：“对外开放，对内放宽，对下放权，全国各省都适用，都在试验，广东应该加一个‘更’字，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不加‘更’字和全国一样，就没有特殊了。”

1983 年 2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深圳经济特区，任仲夷作陪，胡耀邦肯定地说，特区是新事物，同志们搞得不错，敢于创新，是很有成绩的。胡耀邦还即席题词：“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谷牧后来视察广东三个经济特区时，赞同胡耀邦对特区的这一评价，认为评价公正，符合实际。

6月25日，谷牧又传来邓小平的指示，经济特区“现在办得不错，中外承认，不存在抹掉不干的问题”。这对任仲夷与广东省委，是最大的支持、鼓舞和鞭策。

## 任仲夷被召“二进宫”

1982年2月10日，一架波音客机载着一批“神秘”的乘客从白云机场腾空而起，向北方飞去。机上的乘客有任仲夷、刘田夫、李坚真、梁灵光、郭荣昌、吴南生等18位广东省的党政负责人，还有一大批随行人员。只见大家神情严肃、沉默寡言，不同以往乘机时那样谈笑风生，海阔天空。

广东省委、省政府几乎全部负责人被召到北京开会，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广东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的第一次最严峻的考验。在这次突然而来的风暴中，任仲夷还差点过不了关。

风起于青萍之末。随着经济特区突飞猛进的发展，各地、市的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方方面面的经济生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但也有人追求富裕的欲望日渐膨胀，甚至有人不顾党纪国法铤而走险，沿海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走私浪潮。有些沿海地方，渔民不打鱼，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一窝蜂似的在街头巷尾、公路沿线兜售走私货。1981年底，中央政治局常委看到中纪委一份《信访简报》刊载的《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上面披露了广东省一些干部，包括某些担负一定领导职务的干部极端严重的走私贩私的犯罪活动。中央领导对此十分关注，先后作了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的批示最为严厉：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中央高层甚至还有人大声质问：“任仲夷还是共产党员吗?”

198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以2号文件的形式发出《紧急通知》，措辞之激烈，实在令人为之一惊：“对于这个严重毁坏党的威信，关系到我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全党一定要抓住不放，雷厉风行地加以解决。对那些情节严重的犯罪干部，首先是占据重要职位的犯罪干部，必须依法逮捕，加以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文件下达后，中央随即派中央纪委副书记王鹤寿、常委王从吾到广东，调查办案。南粤大地顿时草木失色，一片惊慌。

1月14日，任仲夷向省委常委宣读了此《紧急通知》，并立即决定由李坚真、寇庆延等6人组成领导小组抓贯彻工作。

其实，广东开放之初，省委、省政府对走私贩私问题就有所警惕。但由于对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缺乏经验，防范措施跟不上，无论缉私队伍、缉私装备和管理措施都不适应。因此给海内外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省委在1981年，先后组织了两次全省性打击走私贩私的行动高潮。第一次是集中沿海各个方面的

缉私艇共59艘，分别驻在汕头、惠阳等地区的6个海域，堵截海上走私。第二次是调集部分缉私艇到香港、澳门周围海域巡逻查缉，堵住大规模的海上私货渠道。与此同时，陆上层层设卡检查，并扫荡取缔了沿海18个主要私货市场。全省大规模地开展打击走私贩私的斗争，使得走私浪潮得到了遏制。但是，对这些情况广东省委向中央汇报得不够及时。

2月上旬，省委便接到中央通知，要广东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立即赴京开会，进行整顿。任仲夷接到通知，不禁大吃一惊。对省党政领导班子采取这样严厉的措施，可以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

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气氛十分严肃。发了反走私等好几个文件，还有一份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的《旧中国租界的由来》，非常耐人寻味。

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谷牧、余秋里、韦国清、姚依林、彭冲、王鹤寿等领导人先后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有的说：广东是见怪不俗，习以为常。有的说：广东“放羊”了，对下面管理不严，物价改革放任自流，塘鱼价格放开了，蔬菜等农副产品价格也逐步放开了，物价上涨，群众意见反映强烈。有的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有的说：“这场斗争又是资产阶级向我们的猖狂进攻”。有的说：“宁可业务上受到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有一位主要中央负责人提出：越开放，对干部，对党内越要严。要有一个惩治贪污、受贿的条例。要准备一年开除多少人，杀多少人。广东、福建就是要杀一些人，不杀不行。任仲夷觉得，如果这样大开杀戒，势必对国内外造成重大影响。他内心虽则对此不同意，但没有公开表态。

尽管任仲夷和刘田夫等人进京时已有思想准备，但没有想到会受到如此严厉而尖锐的批评。他们的心情十分沉重。

会后，任仲夷去找胡耀邦，请示回去如何传达贯彻的问题。任说：这两天中央书记处、国务院那么多领导同志讲了话，但没有一个传达提纲，我回去后是否要全部传达。尤其有的领导同志言语很尖锐，我认为不妥当，不好公开传达。广东离香港、澳门很近，如果传出去，不仅可能引起广东干部思想混乱，而且在港澳海外也可能会产生“政策变了”的错觉。在珠海去澳门的码头附近的楼墙上，至今还存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标语，中央领导有些话如果传出去，很可能引起侨胞的疑虑。

胡耀邦很干脆地说：哪些可以传达，哪些不可以传达，由你自己定。

任仲夷飞回广州，立即主持召开省委常委第八次会议，研究如何贯彻会议精神。他说：我们要按照《中央紧急通知》以及两省座谈会精神，对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活动，要采取坚决、严肃的态度，要把此事摆到各级党委首先是省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上，下大决心，花大力量，抓紧抓好。当前要突出狠抓大

案要案；抓好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堵塞漏洞。

会议正在进行期间，2月18日，胡耀邦给任仲夷打来电话，说：昨天中央书记处将会议情况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政治局常委对广东的同志思想通不通，还很不放心……本来想亲自到广东和你直接谈一谈，由于实在抽不出时间，所以还是请你到北京来一趟。

原来政治局常委听了汇报之后，有的常委认为任仲夷等人对开展打击走私贩私斗争缺乏认识，检查也“不深刻”，还有些问题没“讲清楚”。有的常委甚至提出“任仲夷是不是共产党员，是不是金刚钻”的疑问。因此，特召任仲夷再度进京。

任仲夷提出：自己到广东时间不久，对情况不太熟悉，希望刘田夫同志同我一起去。胡耀邦表示同意。

2月19日，任仲夷和刘田夫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再度进京。当晚8时许，夜幕低垂，冷月如霜。胡耀邦、赵紫阳在中南海接见他们，谈话一直延至深夜。胡耀邦、赵紫阳向他们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指示。

胡耀邦说：“昨天下午，常委碰了头。根据下边的反映，中央担心广东的同志首先是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对这个问题认识清楚了没有？广东的现状（走私贩私以及执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过程中出现的自由化倾向问题）严重程度究竟如何？能不能按照中央的要求下决心转变这个局势？”“省委抓案件的班子，应当充实加强。仲夷同志应亲自抓。现在广东干部中的风气、受腐蚀的情况究竟怎么样？有的同志反映，至少是令人担心的。牵扯到省上干部的要案，一定要查清。”

胡耀邦说：“干部受腐蚀，有思想上的污染，还有经济上的自由化倾向。常委担心，会不会改变颜色？过去中央定的政策不适当的，中央也要采取措施。”

胡耀邦说：“第一位的是不要被腐蚀，要成为无产阶级的金刚钻。我们许多党员缺乏党性，缺乏党的观念。通过这次工作，要使广大干部，首先是主要领导干部变成金刚钻。省委常委要开个生活会。要争取主动。”

谈话快结束时，胡耀邦十分诚恳地提出：“仲夷同志，你给中央政治局写个自我检查好不好？”他做了一个两手摊开的姿势，说：“我都检讨了啊！”

任仲夷不禁愣了一下，接着点头说：“当然可以。我到广东工作虽然才一年多，时间虽短，还是有缺点的。”

回到宾馆，在秘书张岳琦的协助下，任仲夷怀着沉痛的心情，搜索枯肠与绞尽脑汁地写起检查。他主动承担了责任，对“放宽搞活”考虑得多，对“管”想得少作了检讨。第二天，他先将检查征求了刘田夫的意见，然后送给胡耀邦。胡看了两遍，说可以了。

据任仲夷对笔者说，这份检查，应当说是真心的，但也有违心的地方。在管的方面，我确实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我实在不同意“广东不是‘活’得不够，

而是‘活’过了头”的观点。实事求是讲，广东还有很多该活的没有活起来。这是我自参加革命以来，向中央写的唯一的一次自我检查，遗憾的是手头没有留下底稿。

任仲夷和刘田夫这次进京，就是在广东颇为流传的所谓“二进宫”（两次进京）。值得庆幸的是，邓小平等人并没有表态处分任仲夷。

## 既要搞活，又要管严

2月22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议，任仲夷、刘田夫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指示，并决定加强反腐蚀斗争的领导，任仲夷亲自抓，刘田夫以更大精力抓这项工作，其他省委常委、副省长也要抓好各自分管部门的这方面的工作。

在2月26日省直厅局以上单位和参加广东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地、市、县委党员负责干部会议上，任仲夷代表省委强调指出：要严肃处理经济领域里的犯罪活动和纠正自由化倾向，抓紧大案要案的查处，不能手软，不能姑息。对经济工作，既要搞活，又要管严，做到活而不乱，管而不死。

3月2日，任仲夷和省委常委听取了各地、市负责人关于贯彻中央《紧急通知》的情况汇报。他要求各地抓好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抓紧大案要案的处理；研究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完善各项经济政策。必须做到执法更严、纪律更严、管理更严，用“三严”保证“三放”（更加开放、更加放宽、更加放权）。

3月20日至4月3日，省委在广州珠岛宾馆召开了省、地（市）、县三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会议，研究和部署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

当时，全省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有些地方干部估计，这一定是个杀气腾腾的会；许多县委书记都准备到会上来作检查，挨批评。有的干部干脆自带行李，准备随时接受审查与质询。

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开会第一天，任仲夷给他们先吃了一颗“定心丸”，他说：“这不是一个‘杀气腾腾’的会，我们这次会议应当开得热气腾腾的，是一个热气腾腾的会。”会议还真是开得热气腾腾。与会者一方面谈思想认识，一方面总结经验教训，更进一步坚定了先走一步的决心和信心。

任仲夷代表省委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他说：“全省广大干部和群众，这几年勤勤恳恳，努力奋斗，为改变广东的面貌和国家的建设，做出了贡献。缺点错误主要在省委。我们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和经济领域中的违法犯罪活动的严重性、危害性和危险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对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抓得不紧，处理不力；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从发展经济上考虑多，对政治上可能出现的问题考虑少；对工作，看成绩多，看问题少。我认为，在省委里面，又主要应当由我对这些问题负责。

“省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振奋精神，努力工作。凡是过去省委、省政府决定和指示过的事情，错了由省委、省政府负责，下边执行者没有责任。只要不搞各种违法乱纪和犯罪活动，工作上还是允许犯错误。对干劲足、闯劲大的干部应予鼓励。”

任仲夷一番肺腑之言，勇于解剖自己，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与会者无不为之动容，有的同志更流下了热泪。

根据中央的精神，任仲夷在会上提出“两个坚定不移”的方针：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坚定不移。为避免“一活就乱，一管就死”的恶性循环，他提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思想先行，管要跟上，越活越管，越管越活”。

这一年广东省“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办公室”在全省共抽调了2万多名干部组成各级办案组，抓紧大案要案的查处工作。至1983年8月止，全省查处的经济违法犯罪案件8000多宗，已结案的6000多宗，依法判刑的1000多人，沉重打击了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公开的大规模走私贩私活动已基本刹住。

在任仲夷的主持下，广东先后制定了《关于处理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若干政策规定》等10个文件，明确划清政策界限，给一些因经验不足而造成工作中有失误的同志予以改正错误的机会，从而使广大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在先走一步中继续敢闯敢干，大胆实践，大胆探索，使得广东广大干部改革开放的积极性没有因此而受到挫伤，继续保持那么一股锐气，从而使广东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轨道稳步向前。

（卢　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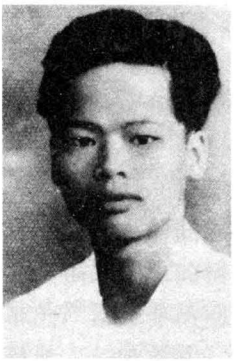
# 谢 非

## 一个实事求是、永不言倦的改革者

谢非出生于广东省陆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接受进步思想，追求革命真理。在陆丰长期的基层工作岁月中，他深入群众，以身作则，带领干部群众艰苦奋斗，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为改变当地贫穷落后面貌而忘我工作。谢非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团结和带领“一班人”，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认真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精神，“不争论，不动摇”，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指导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勇于探索，求真务实，大力推进两个文明建设，使广东省保持了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持续快速发展，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 微服侦查“大锅饭”

1958 年，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席卷全国。在



青年时的谢非

祖国南方小小的陆丰县，也按照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人民公社，搞“一大二公”，生产资料归公社所有，分配实行供给制，大办公共食堂。陆丰县坚决传达并执行上级“放开肚皮吃”及“吃饭不要钱”的指示精神。这样吃下去，公社能承受得了吗？从小吃番薯长大的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谢非心里产生了怀疑。

公社出现了一个小队，队伍的男女老少一大早就向邻村进发。他们没有随身带任何农具，个个兴高采烈，情绪昂扬，好像走亲戚的样子，其实是去相邻近的公社食堂“免费吃饭”。有人跟谢非汇报这样的小队一天居然能吃七八顿。谢非觉得难以置信，由于他历来提倡要深入调查研究并身体力行，于是一天，他顶着一顶破草帽，肘上还挎着一只粪筐，远远跟在队伍后边。一天下来，这支吃喝串连队伍到午后时分，已长驱四十余里，从螺溪吃到了河田的黄沙，已经吃出了自己所在公社境内，在更大的范围及更高的层次实现了一次共产主义的大锅饭。躲躲闪闪地跟在队伍后的谢非自然是一餐也没有吃，早已饿得头昏眼花。他深深叹服农民兄弟的胃口，但是大锅饭真那么吃下去，又能让农民们吃几天呢？

回来后谢非在一次非正式会议上向县领导们汇报了自己化装侦察后的感受。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谢非并没有直接否定公共食堂的政策，只是强调这样下去很快就要坐吃山空。因为他跟到河田黄沙时，发现那里的午餐只是吃番薯粥，食堂外还打出了一个招牌，上面写着‘闲人免进’，说明就是番薯粥也难以为继了。如果口粮出现问题，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就容易出大问题。

“大跃进”时期，各地农业“卫星”纷纷升空，但陆丰一直没有放出“卫星”来，县委常委谢非还兼着《陆丰报》的社长，压力就特别大。于是，一个个宣称能使番薯亩产达到100万斤的办法送到谢非手里。谢非听了，悄悄去了番薯地，一个人蹲在地头，心事重重地琢磨着那些“能使”能否推广。当然，这些方法往往只计收入不计支出，非常离谱。经过认真筛选，谢非把注意力放在一个方案上，办法是往每棵番薯苗根部灌狗肉汁。这个方案的发明者肯定认为天下美味和营养莫过于狗肉，因此发明者由此推论番薯也是非常喜欢吃狗肉的。它的科学之处在于充分考虑到番薯苗没有长牙，吃不了肉，因此想出了灌肉汁的高招。谢非想，这个办法与所有放“卫星”相比，副作用相对最小，代价也不大，因为农民们宁可行军四十里去吃邻村一餐饭，肯定能顺便就将狗肉汁灌进自己的肚子里，所谓肉烂在锅里，即使灌到地里的也等于施了一遍有机肥，这样实际上就不会有什么重大损失。思忖再三，谢非拍拍膝盖上的土站起身来，决定让部里的同志对外宣传狗肉汁种番薯的试验。就算不得不放“卫星”，至少也让农民少些损

失，多一点点实惠。这个“卫星”当然没放成功，但放“卫星”的农民兄弟总算不至血本无归，几顿美味的狗肉吃得他们眉开眼笑，满面红光。

年底，谢非和县委的干部们一同下乡，看到因为大炼钢铁被砍光的秃山，不由心乱如麻，觉得宣传工作不坚持实事求是肯定要出大问题。他立即请示县委，召开了一个宣传干部会议。会议上谢非作了一次总结性发言。他说：“我们做宣传工作的同样要讲实事求是。不要不敢承认失误乃至于错误……明明是苦，硬要叫群众思甜，这就叫不实事求是……现在宣传工作是有方向性错误的……这一点我要负主要责任。什么问题？就是把胡思乱想当成革命精神来宣传，把封建迷信当成科学来宣传，把大话空话当成革命干劲来宣传，把形式主义当成群众积极性来宣传……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很多就是从宣传开始错起的。我们在座的都要认真反省自己！……”

在当时的环境下，谢非的这番讲话在陆丰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许多宣传干部都有如梦初醒之感。坚持实事求是是这个年轻的县委常委身上闪亮的品格，这种品格也伴随了他的一生。

## 保驾护航邓小平“南方视察”

1991 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国内形势复杂、严峻。在这种形势下，部分干部和群众产生了困惑，有的人对改革开放提出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毅然决定南下视察，并发表了扭转局势的谈话。

1992 年 1 月 2 日，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来的通知广东省委接待小平同志来广东的一份绝密电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让谢非意识到邓小平此次广东之行将对广东乃至全国产生重要的影响。谢非和省委的相关领导按照中央的要求精心布置了邓小平广东之行的周密计划。

小平同志对此次出京有个南方之行特别交代：“不要专门汇报，不要陪餐，不题词，不见记者，不摄影，不报道。”谢非认为，邓小平可能会在考察期间发表重要谈话，于是亲自点将，让长期采访谢非工作的靠得住的老熟人，新华社广东分社副社长牛正武、南方日报摄影部主任梁伯权以及广东电视台三个电视记者担负这项任务，还特别安排其秘书陈建华对邓小平全程贴近紧跟，又拍又录。由于谢非思维缜密，才有邓小平南方重要讲话公之于世，并成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压卷之作。

1 月 19 日上午，邓小平乘专列抵达深圳。谢非与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深圳市长郑良玉等省市负责人一早就在深圳火车站恭候。到了驻地没一会儿，邓小平就走出来，急切地提出要出去看看。谢非劝他说：您还是先休息一下吧。邓小平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谢非看见邓小平这么惦念特区的实践探索和广东

的经济建设，十分感动，立即安排车辆陪老人家开始视察。

接下来的几天，在谢非等人陪同下，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和顺德。正如谢非所料。邓小平在视察期间发表了重要谈话，从特区谈到全国再谈到国际，高屋建瓴，使大家豁然开朗，深受启迪。

视察过程中，邓小平充分肯定了广东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和今后发展的思路，并提出殷切的希望。他说，广东在改革开放中起了龙头的作用，今后还要继续发挥龙头的作用。广东要上几个台阶，争取用二十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他接着鼓励谢非等人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我们已经穷了多少年，现在就是要加快发展，要搞跳跃式的发展，你们广东经济发展能搞多快就多快，不要听什么以计划经济为主的那一套。邓小平还对广东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要求：广东争取用二十年时间赶上或超过亚洲“四小龙”，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也是小平同志第一次对一个省提出率先现代化而不是全国一道进入现代化的设想。谢非把这作为小平神圣的嘱托，牢记于心。

谢非心里十分清楚，小平南方视察给广东带来了千古一遇的发展良机，能否抓住这个机会就看他和他带领的省委“一班人”了。邓小平离开广东后的第三天，谢非在广州珠岛宾馆向厅局级以上干部传达了邓小平谈话记录稿。他传达了整整三个小时，全场领导干部难以抑制心中的喜悦，积在心中的困惑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谢非在传达时表现出少有的兴奋与激动，对广东干部大声疾呼：“小平同志南方视察将对广东产生重大影响，我们要开足马力，不负小平！”

小平南方视察后的这段岁月，为了不辜负小平的重托，实现二十年追赶亚洲“四小龙”这一伟大的战略目标，谢非可以说是豁出命来干了。时不待我，谢非率领省委省政府班子，对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作出了艰辛而全面的探索，在全国先走了一步。从1978年到1997年不到二十年间，广东的国民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工商税收，呈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广东的经济发展速度令世界震惊。谢非以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广东经济建设和发展殚精竭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如他在弥留之际所说：“我一生之中最大的安慰就是没有辜负小平同志的嘱托！”

## “多做少说”甚至“只做不说”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广东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很多经验，而顺德又是广东改革的一个重要探路者。顺德的改革在企业转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的意义，完全可以和当年安徽小岗村的改革相提并论。如后来风行的“国有企业转制”就是从顺德开始的，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混合经济”、“盘活优质

资产”（顺德人叫“靓女先嫁”）、“贴身经营”（顺德人叫“埋身经营”）等等都产自顺德。很多顶尖的理论家和经济学家对顺德的评价都很高。然而作为指导这一重要改革的谢非，在顺德改革起步之初是不主张大肆宣传的，而是要“多做少说”。

1993 年初的时候，谢非来到顺德，这是他长期关注的珠三角“四小虎”的典型，然而到了顺德，他却听到了一个令他相当震惊的消息，顺德党政班子向他反映，顺德前景不妙！当时的顺德领导陈用志、冯润胜向他汇报了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存在的问题，用了“辉煌的成就，惊人的包袱”这句话。顺德高速发展的背后，背负着巨大的债务。作为顺德主体的乡镇企业，体制上沿袭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模式，问题也日益凸显——摊子越来越大，花钱越来越多，效益越来越差，负债越来越重，抗风险能力越来越弱。而银行因为顺德企业名牌多，在贷款时不断“放水”，企业不断借贷；而乡镇企业的头头们大都是乡镇领导兼任或任命的，只对自己这一任届负责，没有长期考虑。这样下去，顺德的乡镇企业可能比国企死得更快。顺德的党政领导提出改革的设想：如果进行企业产权改革，可能会走出一条企业良性发展的新路。

谢非深知顺德的政府机构和产权改革一旦启动会带来什么。1993 年初，他叫顺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到珠岛宾馆开会，并且要求他们带好改革方案。顺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一到现场就被那种阵势吓了一跳，在座的是省委全体常委和副省长们。但是顺德的领导班子也是有备而来，他们之前就委托农业银行顺德支行进行了十年来的金融情况的调查报告，领导班子也进行了大量调研和分析。听完了汇报，在场的大多数省领导都表示了支持，也有个别担任省领导的党外人士表示了忧虑。这种忧虑是必然的，因为在大众来看，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础，顺德的产权改革是要把属于集体所有也就是公有的乡镇企业改为民营、私营、股份制，这是要动根子的。

会上谢非最后发言，他说，要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改革未必就会带来预期的正面效应，改革更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不能认为公有制存在的弊端，只要通过改变所有制就能迎刃而解，股份未必就能搞得好。对顺德的改革，他表态时说了两层意思：一是坚决支持；二是请顺德只做不说，对省外、省内都不要宣传。

顺德的做法在当时来说是要冒着很大风险的，谢非陷入了沉思，但是他也感觉到了现行体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必须改革。于是谢非下了决心，中央可以拿一个广东一个福建两个省作改革开放的试点，广东为什么不能拿一个县来做试点呢？珠三角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顺德又是珠三角发展最快的市县之一，顺德在改革开放和发展中碰到政企不分、企业产权不明晰及公有资产的实现形式等方面存在的非改不可的矛盾和问题，很可能就是珠三角、广东乃至全国明天将会遇到的问题。而且顺德这块试验田意义更特别，它不是特区，不是沿海城市，

若成功了对全省更有指导意义。

由于顺德的综合改革意义重大，谢非决定亲自抓顺德的改革，在顺德的改革遇到最大阻力的时候，他每个季度都来一次顺德，及时了解顺德改革每个阶段的发展情况，并多次约见顺德的党政主要领导，一起研究如何解决问题。从1991年到1997年，谢非先后十多次到顺德实地考察、指导工作。

顺德综合改革以企业产权改革为核心，包括机构改革、农村体制改革以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配套改革。企业产权改革，以实现政资分离、政企分开、明晰产权、调整公有资产分布和结构、建立企业法人制度为主要内容，公有资产实行“靓女先嫁”为其重要特色。机构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为中心，全市市属局一级的党政机构从原来的56个减少到32个，机关工作人员精简1/3；同时转变政府职能，实行“小政府，大服务”，使上层建筑逐步适应市场经济运作规律。农村体制改革，一是改革村委会建制，取消以生产队为单位设置村委会和经济社的建制，实行以管理区或自然村为单位设置村委会和股份合作社；二是推行农村股份合作制，村民按股分红；三是完善土地承包制，改短期承包为长期承包，改分散承包为集中连片承包。此外，顺德还配套推行了社会保障、教育、税收、医疗卫生、住房、金融等方面体制和制度的改革。

“顺德改革遇到的阻力非常大”，谢非的秘书陈建华回忆，“在第一轮改革中，顺德的国营和集体企业只保留56%，当时外部压力很大，最后谢非书记提出把顺德国营和集体企业的比例提高到62%，省委向党中央就顺德改革还打了密码电报，作了说明，这个事情才得以解决。”一次，顺德领导人找谢非投诉：某省领导也对顺德发了火，说顺德将统战与侨务部门合并，是没有统战意识。谢非说：“现在的顺德就是要比特区还要特！鼓励顺德要大胆地干。”

“当时告状信已经告到总书记那里了。”陈建华回忆说，“我都看过一些，有的说：‘又一个没有国有企业的县’；有的说：‘政治局委员带头搞资本主义’。这些话今天听了大家会觉得好笑，但当时能笑得出来吗？可是在当时如果没有省委省政府和谢非书记的支持，这场综合配套改革也是无法进行下去的。”

“为减少改革的阻力，省委就提出对顺德的改革‘不宣传，不推广’，成功了再说。”陈建华回忆，在顺德的综合改革还处于摸索阶段时，谢非同志就指示“要多做少说，有的先做不说”，“要尽量减少社会震动，减少阻力”，要求省各部门让顺德放开手脚去闯；指示各新闻媒体暂不报道，待有经验总结再向全省推广。

1995年，在顺德产权改革受到广泛关注，并受到外界指责时，广东省委省政府领导集中听取顺德的汇报，在内部肯定了顺德改革方向对头，指出了需要注意的问题，在公开场合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直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肯定股份制和股份合作经济之后，省委省政

府才公开肯定了顺德的改革。1997 年 11 月《人民日报》连续刊发的三篇关于顺德综合改革的系列报道，算是对顺德综合改革的争论画上句号。1997 年，仿佛成为中国改革的“顺德年”，新闻报道的“顺德年”。可以说，顺德走出一条非特区的改革探索之路，顺德的改革经验已经成为了全国经验。

同样也在这一时期，1996 年秋，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到中央党校参加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写出《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这篇文章的核心就是在党的领导及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通过股份制等对公有制进行产权改造，为共同富裕进行制度设计的探讨。文章写好后，他觉得心里没底，于是把文章送给了正在中南海的谢非，请他提提意见。据厉有为回忆，“我去征求他对文章的意见时，谢非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我看了你的文章，给我的印象很深，你的理论勇气和探索精神很值得提倡。文章中的问题也很值得探讨和研究，作为经济特区的领导人去深入地考虑这些深层次的问题，也是应该的。说到这里他把话锋一转，接着说，凭我多年的经验是多做少说，或者只做不说，我们广东有个说法，叫做生出孩子不取名。这样做不是想隐瞒什么，不是想干什么不正当的事，也不是害怕，是为了减少在改革中的阻力，减少不必要的争论。他又强调说，我这不是批评，是我们共同总结经验。”

实际上，当时的经济改革与国企改革，总是被所有制问题绊住脚，厉有为只是试图从深圳改革开放的经验出发，提出和探讨这个问题。没想到踩了当时所有制的雷区，碰了“公”与“私”的高压线，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

最早出现的一份匿名批判厉有为的“白皮书”，说厉有为这篇文章是“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企图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并指名道姓地直斥厉有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浊流”。随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批判接踵而至。更有党的领导机关干部认为他的文章是“干扰”、是“杂音”。

厉有为不怕被批判，可怕的是他最后也没弄清这些“大义凛然”的批判者姓甚名谁，有些人就在家里给某某部门某个领导打个电话要求批判他，结果批判运动就真的开始了。这样还不算完，有学者在发言时还指名道姓地将谢非抠了出来，说广东在所有制问题上制造混乱，要由谢非负领导责任。谢非此时找到厉有为，对他表示一如既往的支持，鼓励他说这不过是一个思路，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4 月，江泽民在中南海找厉有为谈话，讨论这篇文章，总书记对他说，你回去安心做你的书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有了总书记和谢书记的支持，厉有为觉得非常温暖。

1997 年 5 月 29 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了重要讲话，谢非、厉有为和各省、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人都在台下就座。总书记说道：“努力寻找能极大发展生产力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符合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

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听了这番话，谢非和厉有为的心才真正放到了肚子里。厉有为的文章观点符合“5·29”讲话精神，大批判的声音就此消失了。

“多做少说”，“只做不说”，难道谢非不擅长说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谢非当过《上游》杂志编辑，中南局政策研究室研究员，是《红旗》杂志三人领导小组之一。1995年12月6日晚，江总书记为深圳经济特区成立15周年题词：“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关于“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的来历，江总书记后来于1998年3月9日在与广东省人大代表一起座谈时，作了“透露”。他说，几年前，他到深圳、梅州等地视察时，曾提出广东和经济特区要“再造新优势，更上一层楼”。当时他就这句话和谢非同志交换意见。谢非同志当天晚上给他打电话说，“再造”新优势，好像原来的优势都不算了，是不是用“增创”两字。江总书记笑着说：“谢非同志是‘秀才’，稍改了两字，气势就大不一样了。”

在风云激荡的改革开放大潮中，爱沉思默想但行动果断的谢非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招数，他的“多做少说”“只做不说”是对小平南方视察“不争论、不动摇”的六字真言的心领神会，这样做不是想隐瞒什么，不是想干什么不正当的事，也不是害怕，而是为了减少在改革中的阻力，减少不必要的争论，避免影响改革开放的全局。

（周　珺）



# 科学发展篇

# 胡锦涛

## 不平凡的春天

——记2003年广东之行

2002年11月，胡锦涛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曾于2003年4月、2007年1月、2009年12月及2010年9月前往广东考察。其中2003年4月的广东之行，对于广东乃至全国来说影响重大。在这次考察中，胡锦涛首次提出了“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之后，他进一步将此观点解释为强调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开启了一个新时期。

### 一

2003年的春天，注定是被历史铭记的春天。2003年的广东，注定是非同寻常的一年。

2003年除夕之夜，万家团圆之际，一种被称为非典型性肺炎的呼吸道传染病在毫无预兆的情形下肆虐成灾，迅速波及了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而作为“非典”首发地的广东，沉

浸在节日欢庆中的人们很快就被疾病的阴影笼罩着——“有人染上‘非典’后被隔离，有人已经染病死亡”，“南方传染病流行，市场上食盐、板蓝根脱销，白醋1000元一瓶……”一时间，各种传言、猜测弥漫在神州大地上。

此时，刚刚当选为国家主席的胡锦涛总书记却作出了决定：要到广东视察工作。这是胡锦涛同志首次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身份亲来广东视察。本来这次视察原定五六月份，因为肆虐，总书记不顾个人的危险，毅然把原定的行程提前到四月份，足见总书记对广东民众疾苦的重视和牵挂。

没有什么比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更能牵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心。4月7日下午4点多，广东省委接到胡锦涛总书记4月10日要来广东的通知。4月13日总书记到了广州，当天晚上，总书记提出要到医院看望抗击“非典”的广大医护人员。总书记提出这一要求大家都没有感到意外。自从得知广东部分地区出现非典型肺炎后，总书记一直十分关注和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批示，对患病群众和广大医务人员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总书记十分牵挂。在考察湛江、深圳期间，胡锦涛多次过问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总书记对防治“非典”工作的重视和对群众生命安危的记挂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大家也都知道“非典”具有传染性，时值“非典”的高发期，人人自危。医院是病人出入频繁的地区。很多医护人员就是接触病人后受感染病倒的。在这形势如此严峻的时刻，总书记却要冒险到医院去。大家都认为不能让总书记去，建议调整视察方案。可是总书记记挂着广大的医护人员，他坚持要去看望大家。于是，有关单位只好安排总书记到广东省疾控中心同医护人员和专家见面。

4月14日，总书记来到了广东省疾控中心看望正在“非典”一线奋战的医护人员。总书记先是来到了实验室，与科研人员亲切交谈，了解病因，分析病源查找情况。总书记勉励实验室工作人员要做好病源的寻找工作。接着，他朝着坐在实验室最后方的液相色谱工作人员许秀敏方向走去。见到总书记朝自己走来，小许有些许的紧张。这时，总书记主动伸出手跟她握手问候。握着总书记温暖的双手，听着总书记和蔼的话语，暖流涌入许秀敏的心中。

接下来，他走进9楼办公室，与省市医疗管理部门负责同志和来自防治“非典”一线的23家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代表进行了座谈。总书记分别同这45位工作者代表一一握手，一个不漏。总书记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并就如何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防治非典型肺炎的问题，不时询问在场的专家。专家们踊跃发言，回答总书记提出的问题。

在听完大家的发言后，总书记深情地说：“广东发生‘非典’疫情，我们在北京感到很揪心，既为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感到焦急，又为广大医务工作者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使许多患者尽快恢复健康感到欣慰。”说完，他站立起来，向在场的所有医务工作人员深深地鞠了一躬。这一躬大大出乎

大家的意外！我们的总书记，以鞠躬这种方式，向广大医务工作者表达了对他们的感激与重托；而一句“揪心”，又真切地道出人世间最深厚的感情。大家都深受感动，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座谈会结束，总书记和大家握手道别。走出门口，总书记紧紧握着陪同送出门来的省疾控中心主任邓峰的手，深情地说：“你们一定要把疫情的预防控制做好。”这句话有如千钧重的力量注入了邓峰的心，鼓舞他带领全中心人员继续战斗在“非典”的一线。

在视察完疾控中心后，总书记顾不上劳累，冒着被传染的风险来到广州市北京路商业步行街。当搭载总书记的中巴车停在街口后，胡锦涛总书记走下车来，陪同他的是张德江书记、黄华华省长。逛街的群众看见总书记走来了，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在“非典”疫情还这么厉害的时候，总书记却来到了广东，来到了群众中间。总书记走下车，与他们亲切握手，向大家挥手致意：“同志们好！”——“总书记好！”历史将铭记下这个镜头——2003 年春天，在这座已有 1000 多人感染“非典”病毒的城市里，在疫情仍十分严峻的时刻，在广州这条最繁华的千年古道上，总书记的手和普通百姓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 二

总书记此次到广东考察有两个主题：一个是抗“非典”情况，一个是经济社会发展。因此，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期间，除了关注广东“非典”的防治情况，对于广东的经济社会发展非常重视。在短短的几天行程里，总书记先后视察了湛江、深圳、东莞、广州四市的企业、农村、社区、港口码头、市民活动场所等地方。

4 月 10 日中午，沐浴过春雨后的湛江市空气格外清新。12 时许，搭载总书记的座机稳稳地降落在湛江遂溪机场。

总书记一下飞机，就利用中午吃饭的时间了解广东抗击“非典”的情形。之后，他开始了马不停蹄的视察工作。到达广东的第一站，总书记首先来到了生活艰苦的海岛地区——湛江特呈岛。特呈岛，是广东湛江的一个小岛，面积仅 3.6 平方公里，人口 4500 多人，距湛江市区有 2.8 海里，风景绮丽，资源丰富，也是一个革命老区。该岛是全国闻名的海水网箱养殖基地，年产水产品近万吨，被誉为“海上渔村”。然而，这个小岛群众行路难、饮水难、卖鱼难、避风难等问题长期困扰着当地经济的发展。群众在生产、生活上的困难牵挂着胡总书记的心。

总书记一行人首先来到村委会办公楼前观看该岛的建设模型。他详细地询问

了特呈岛的面积、人口、环境资源、渔民收入和孩子上学等问题。村党支部书记陈枢作了详细的回答。当总书记听说特呈岛上还有500多亩国家级重点保护的红树木时，十分高兴。他勉励村干部要利用岛上的资源，发展旅游经济，增加民众的收入，改善民众的生活，把特呈岛建成文明生态旅游新海岛。参观完模型后，总书记又看了刚打捞上来的网箱鱼。陈枢为总书记介绍了石斑、金枪等10多种鱼的养殖时间与售价。总书记认真地倾听，不停地点头表示说："不错，不错。"

接着，总书记来到了岛上坡尾村网箱养殖专业户陈武汉家。青年渔民陈武汉一家三口站在门外欢迎总书记的到来。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总书记会来到自己家，心理既兴奋又紧张。陈武汉把总书记请到客厅。总书记与陈武汉一家三口促膝详谈，嘘寒问暖。陈武汉向总书记介绍自己如何靠网箱养鱼致富，建起了自家楼房。总书记听后很高兴。这时，他问起了陈武汉还有什么困难没有？陈武汉鼓起勇气，向总书记讲出了岛上乡亲们的饮水难、卖鱼难、行路难、避风难问题。总书记听后，当即作了具体指示，要有关各方尽快采取措施，解决群众实际问题。同时，总书记勉励他要有信心克服困难，做网箱养鱼的带头人。

春风化雨润心田。胡总书记关于把特呈岛建成文明生态旅游新海岛的号召如同春风吹遍了全岛。特呈岛，这个祖国南端沉寂多年的小岛，在2003年迎来了自己发展的春天。

在视察湛江期间，总书记还深入港口码头、企业车间、城市社区、乡村农户，与基层干部交谈，共商维护群众利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大计。在听取了湛江市委的有关工作汇报后，总书记鼓励湛江市要充分发挥港口优势，抢抓机遇，理清思路，真抓实干，全力推动湛江实现跨越式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扎实起步。4月11日上午，总书记离开湛江前往深圳。出发前，胡锦涛从口袋里拿出20元伙食费，让身边工作人员交给下榻的湛江海滨宾馆。然后，他才离开宾馆开始了新行程。

## 三

4月11日上午11时许，一架波音737专机平稳地降落在深圳机场停机坪。广东省委和深圳市委有关领导兴奋而激动地迎上去。飞机的舱门打开了，出现的是身着浅灰色西装的总书记。他健步走下舷梯，满面笑容地与大家握手。从4月11日下午到12日上午，总书记考察了深圳市的各个著名企业和南岭村。

总书记首先来到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深圳市领导向总书记汇报了园区发展和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情况。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步以来，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很快，已成为深圳的支柱产业。听完汇报，胡锦涛满意地点点头。同时他又指出，深圳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走在了前面，产业结构调整很有成



2003 年，胡锦涛同志在深圳考察时来到南岭村。

效。他强调，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掌握核心技术很重要，不掌握核心技术就会受制于人。要下决心攻克一批关键技术，这样才能在竞争中赢得主动。接着，总书记来到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仔细观看了一件件产品。当研究院负责人汇报说，该院近三年发展很快，净资产增长了8倍，去年产值4192万元。总书记对于该院面向市场，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做法表示赞许，他说："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个方向很好。"

随后，总书记又考察了中兴通讯、长城集团、华为和富士康公司，对于他们所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同时勉励他们要继续努力，创新技术，发展科技，争取更大的贡献。

12日上午，总书记冒着霏霏春雨来到深圳龙岗区的南岭村。这是总书记第二次来到南岭村。南岭村，这个过去被称为"鸭屎围"的贫困村，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一跃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1994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曾经到过南岭村。近十年过去了，总书记心中记挂着南岭村的发展。汽车稳稳地前进着，从车窗往外看，如今的南岭村，高楼耸立、街道齐整、鲜花怒放、草木葱茏。

当他们听说有中央领导要来，尽管天空下着毛毛小雨，还是有3000多人自发来到村路口，警卫人员挡也挡不住。热情好客的乡亲们希望来的是总书记，希望能再一次向总书记问好。总书记的车一进村，在细雨中等候的乡亲们欢呼起来，大家激动地拍着手掌。总书记也把手伸出车窗外，亲切地和大家问好："乡亲们好！"

总书记下车后，警卫人员拿出雨伞，准备给总书记撑起雨伞。这时，总书记环视了周围群众，看到大家都没有打伞，于是示意警卫人员收起雨伞，跟着大家一起在雨中漫步。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育彪引着总书记来到村委会办公楼。在办公楼门口，张育彪对胡锦涛总书记说："总书记，1994年你来我们村里视察过。"总书记高兴地答道："是呀！"一行人说笑着进入了村委会办公楼。在上二楼的电梯中，胡锦涛突然问起张育彪："老张身体好吗？"总书记口中的老张，是张育彪的父亲——南岭村前任党总支书记张伟基。而"小张"则是张育彪

本人。这么多年过去了，总书记还记得自己的父亲，这让张育彪感动万分。总书记一行人来到村委会办公大楼的“致富思源”厅参观。看着展厅一张张展示着南岭村走过的脱贫之路图片时，总书记发出了会心微笑。他对张育彪赞许地说：“这件事情办得很有意义。你们取得的成绩，一是靠党的政策好，二是你们自己干得好。”当他看到展厅展板上写着“穷时要有穷志气，富时没有富毛病”时，连声称赞说：“这句话好。”他示意随行工作人员把这句话记下来。接着，总书记又关心起村里的耕地、村务公开、基层党组织情况。让张育彪感到惊讶的是，总书记对农村基层的情况是如此的了解，他提出的问题非常的细：“本村有多少党员?”“平均年龄多大?”“党总支和村委会成员在企业兼职吗?”等等，张育彪一一作了回答。听完张育彪的回答后，总书记特别叮嘱：“村里务工青年多，流动党员也多，一定要加强流动党员的管理。”

从展厅出来，总书记又参观了村务公开情况。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富有的南岭村也开始迈入了信息化的时代。张育彪告诉胡锦涛，南岭村于2000年开通了电脑查询形式来公开村务。在村务公开电脑触摸屏前，总书记饶有兴趣地查看村干部的基本资料，同时详细地查看了村务公开的内容。对于该村实行由村委会主任兼任村民议事小组组长的做法，总书记给予了肯定。

随后，胡锦涛总书记到三楼参观了南岭村党员活动室。活动室内有上网电脑和图书杂志。总书记来到电脑前，兴致勃勃地调阅有关信息，凡是有关党建的资料他都很仔细地看。见到桌上摆放着几十本用橡皮筋绑着的“党员组织生活证”，总书记俯下身子一本一本地仔细翻看。这时，其中一叠“党员组织生活证”散在桌上。见此情形，总书记一本一本地收把它们收起来，再小心翼翼地用橡皮筋绑好。总书记如此细致认真的动作给在场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想不到总书记对于如此细微的事情也注意到了。他还拿起一本《学习党的十六大报告十个懂得》的小册子，边看边说：“在基层党员和群众中宣传十六大精神，要注意采取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形式。”看来总书记对于基层的党建和宣传工作是很重视的。

从村委会大楼出来后，喜欢亲民的总书记兴致未减，他乘车来到了在健民路49号的村民张燕辉家。总书记的到来，让张燕辉喜出望外。张燕辉一家人在门口迎接总书记，心里既高兴又激动。总书记刚上台阶，就拉着张燕辉82岁老母亲郑运莲嘘寒问暖。然后，他一手搭着张燕辉7岁小儿子张海涛的肩膀和大家一起进屋。总书记进门后，就和张燕辉拉起了家常。他先是问起张燕辉家里人口、收入状况。总书记还关心郑运莲的身体状况和养老金的发放。当他听说村里现在每人每月发放1500元养老补贴时，他满意地说：“这样就好，养老有了保障，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接下来，胡锦涛亲切地询问张燕辉7岁的小儿子张海涛：“有没有上学？上几年级?”房间里弥漫着浓浓的春意。

总书记要走了。张燕辉一家可舍不得总书记离开。可是总书记工作繁忙呀。他心里想着，不知道能否请总书记跟大家合影。就在他犹豫时，总书记主动提出和张燕辉全家人合影。“咔嚓”——镜头定格在这一刻，总书记的平易近人、村民们对幸福生活的满足和对未来的美好期盼都清晰地展现在照片上。临走的时候，总书记再次握住80来岁的郑运莲的手说：“老人家，祝您健康长寿！”郑运莲握着总书记温暖的双手，乐呵呵地笑了起来，说：“我要活到一百岁，享享现在的太平福。”总书记又对张燕辉12岁的大儿子张剑涛说：“一定要好好学习！”

就要离开南岭村了，总书记语重心长地对村干部说：“南岭村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特区农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的缩影，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典型。江泽民同志到这里考察时提出要‘致富思源，富而思进’。你们要努力做到不自满，不松懈，不停步，把南岭村建设得更好，使群众生活不断得到改善，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张育彪激动地说：“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请总书记放心！”

当天下午，总书记来到了位于深圳梧桐山西侧的仙湖植物园。1992年1月22日，邓小平同志在这里栽下了高山榕。胡锦涛总书记一行来到已长得枝繁叶茂的高山榕前。这时，正在园内散步、游玩的人们认出了胡锦涛总书记。大家争相涌过来：“总书记好！”“胡爷爷好！”“胡伯伯好！”亲昵的话语交织着童稚的声音飘荡在植物园上空。胡锦涛总书记亲切地与群众握手，并大声说：“大家好！”

离开仙湖植物园，胡锦涛总书记来到莲花山公园山顶广场，瞻仰邓小平同志塑像。在邓小平同志栩栩如生的塑像前，总书记献上一个花篮，红色的绶带上写着“深切缅怀邓小平同志”。在肃穆的气氛中，总书记庄重地三鞠躬，向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深深致敬。

在山顶，总书记听取完深圳市委有关领导人的汇报后，要求深圳经济特区今后要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

## 四

除了视察湛江和深圳之外，总书记在视察广东疾病控制中心的前一天，从广州出发抵达东莞长安镇，先后考察了东莞金宝电子（中国）有限公司、威远炮台、鸦片战争博物馆、绿色世界和新科电子厂等地。胡锦涛总书记每到一处都详细地询问了企业发展的情况，与一线员工亲切交谈。亲临东莞视察指导工作期间，总书记还有针对性地鼓励东莞市要坚持打基础、办实业、走正道；要求市的领导要关心群众生活，时刻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特别要认真对待近期发生的非典型肺炎的问题；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让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永远牢

记历史，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等等。

在广州考察期间，总书记还到广州市东山区劳动就业培训服务中心和东湖街社区服务中心。总书记还在本田车间试开新车，又考察了正在施工的地铁二号线，并乘坐了地铁。14 日晚上他还作客“信息时报号”邮轮，畅游了珠江。

15 日，在听取了广东省委有关领导人的工作汇报后，总书记指出：广东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认清形势、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地发挥排头兵作用。“全面发展”、“协调发展”、“率先发展”，这是总书记在这几天考察后给广东所提出的建议和殷切期望。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2003 年的广东，可以说是因祸得福。尽管“非典”肆虐，但总书记的到来，为广东开辟了另一个发展的新旅程。

春风万里征帆鼓。正是以抗击“非典”疫情为契机所引发的一系列深刻思考，让中央领导在广东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上首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论。广东在 2003 年这个不平凡的春天，有幸得以率先聆听到科学发展观的先声。由此，科学发展的春雷响遍南粤、响彻神州！2003 年 10 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对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作出了明确的阐述。2007 年，中共十七大将科学发展观写入了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指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中国由此进入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现代化新征程！

（胡　耿）

# 吴邦国

## 亲切指导　殷切寄望

2005年12月8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广东考察，寄望广东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努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尽快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不断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这是时隔一年，吴邦国再莅广东考察。他那风尘仆仆的身影，他对广东的深切牵挂、亲切指导和殷切寄望，感动着岭南的山山水水，激励着正在积极谋划“十一五”、准备大干“十一五”的广东人民。

### “掌握了核心技术就不怕竞争”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张德江，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华华，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丽满等陪同下，吴邦国一连几天马不停蹄，深入深圳、梅州和潮州等地考察。期间，还出



2005年12月9日，吴邦国委员长在深圳考察民营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新华社记者马占成摄）

席了在深圳举行的亚欧会议总检察长会议。

9日一早，吴邦国来到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一见到华为总裁任正非，吴邦国就笑着说："我今天带了很多问题来。"走进展厅，看着琳琅满目的产品，吴邦国问："你们的芯片设计做到了多少微米？"任正非说："芯片设计已经从0.5微米提升到了0.13微米，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吴邦国高兴地说："我们就是要掌握自己的核心技术。"

对3G技术，吴邦国非常感兴趣，一口气提了很多问题。任正非和华为的专家认真作答，吴邦国不时插话，热烈讨论。华为的工程师演示3G手机的便利，"宝宝在线"可以实时看到宝宝在幼儿园的情况，"交通监控"可以随时了解道路交通状况。吴邦国饶有兴致地拿起两部手机仔细观看，说："这下父母对小孩就放心了，开车出门也方便了。"

任正非自豪地汇报，华为已申请了2700项3G技术专利，跻身全球3G第一阵营，率先在阿联酋、中国香港、毛里求斯、马来西亚等地实现商用，并突破欧洲市场，承建荷兰全国3G网络。吴邦国说："一定要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掌握了核心技术，就不怕竞争，就可以赢得竞争。"对自主创新的关切与鼓励，贯穿了吴邦国此行的始终。在印刷技术一流的雅昌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他关心地问分色软件在哪里开发；在潮州的中国瓷都陈列馆，他指出只有突破了关键技术，将瓷越做越薄，才可能卖出好价钱；在生产晚装、婚纱的名瑞（集团）公司，他强调开发电脑设计软件，提高服装设计水平的重要性。

吴邦国说，一定要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树立创新观念，完善创新机制，加大科技投入，鼓励专利发明，开发知名品牌，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要支持和鼓励技术要素参与分配，建立和完善体现自主创新能力的统计指标体系，研究和制定财税、金融和政府采购等方面支持自主创新的政策，形成鼓励自主创新的市场环境与政策体系。

11日，吴邦国来到潮州响石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这是国内知名的数码彩色

监视器生产厂家，产品远销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应用于城市、机场、高速公路和档案博物馆等重要工程。公司自主开发出的数字视频处理芯片，使监视系统实现了网络化，不需埋铺管线。公司负责人周粤生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拥有关键核心技术和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产品不易被别人仿冒，从而始终保持技术领先的优势。"吴邦国微笑着点头，说："这就是你所说的销售收入近三年以60%的速度增长的重要原因。"

张德江笑着对周粤生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省里要搞平安工程，需要大量监视器系列产品。"周粤生说："我们听说了，正在全力准备。"吴邦国接过话茬，给他打气："机会难得，你们可得准备充足点，参加竞标呀。"响石数码的员工报以热烈掌声。

## "现在能源紧张，一定要降耗增效"

听说吴邦国要到梅州金利来集团工业中心考察，"金利来"创办人曾宪梓先生专程从香港赶到梅州。吴邦国握着曾先生的手，说："你怎么赶过来了呢?"曾宪梓说："你到我的家乡指导工作，非常感谢。"吴邦国笑着说："我知道你为家乡做了不少事，家乡人都很感谢你。"

在展厅，在车间，金利来领带、毛衣、衬衣、西服、皮具等从原料到成品，一应俱全。吴邦国拿起一条领带，问："现在领带流行什么样式?"金利来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斜纹的。"看到曾宪梓先生的领带是红色暗点的，吴邦国说："曾先生怎么不打斜纹领带?"曾宪梓先生笑道："我还是比较守旧的。"在场的人都笑了。

在生产钥匙扣的流水线前，工人正在利用生产皮具的边角料，制作精美的金利来钥匙扣等饰品。吴邦国又驻足观看，说："这就是变废为宝，我们要充分利用原料，大力发展节约型经济。"

在考察期间，吴邦国反复强调加快结构调整的步伐。他说，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推进以节能降耗为核心的新一轮技术改造，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大力推广和加快发展循环经济，鼓励循环生产，促进循环利用，倡导循环消费。要下决心淘汰落后的、严重污染环境和破坏资源的生产能力，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吴邦国知道陶瓷企业是耗能大户，所以11日在潮州松发陶瓷有限公司考察时，特别关心燃气节约问题。公司董事长林道藩扳着指头算了一笔账：以前使用梭式窑，能耗高，每天使用8小时就要冷却，去年自主开发了70多米长的节能型隧道窑，耗气量下降30%～50%，而且可以24小时不间断使用，生产效率大幅提高。

吴邦国高兴地说："现在石油天然气很紧张，价格高，节约燃气非常重要。"听说公司研制开发了烧成温度比原来降低50℃的高白瓷和中温强化瓷两个新品种，燃料成本可降低20%，吴邦国更高兴了，勉励他们继续努力，不断降耗增效。

## "要考上大学，要懂电脑、会外语、能开车"

发展，说到底还是要有人才。怎样实现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吴邦国走一路，看一路，想一路。

在华为，他详细询问科技研发情况，得知3万多员工有48%从事研发工作，吴邦国很欣慰。在潮州参观潮绣和陶瓷时，吴邦国对这些巧夺天工的艺术精品赞叹不已，同时也关心创作精品的民间大师和能工巧匠的情况，要求他们保护和继承好这些民间艺术，并不断发扬光大。

吴邦国指出，必须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大力培养造就高素质的科技人才队伍。要建立健全培养人才、聚集人才、激励人才和人尽其才的机制和制度，为人才施展才华开辟空间，提供保障，不断激发人才的创造性、积极性和主动性。要注意发现和大胆使用德才兼备的青年优秀人才，放手让他们在创新实践中磨炼成长。

但这一切，都必须从基础教育抓起。在考察过程中，吴邦国每到一个农户，总要问孩子的学习好不好，学费贵不贵，总要勉励他们培养孩子成才。

10日上午，吴邦国来到了梅州市雁洋镇南福村村民黄开田家。黄开田的弟弟刚刚结婚，大门上还贴着婚联。一进门，吴邦国就连声道喜。

黄家两层楼，都整整齐齐地堆满了柚子，黄开田说足有7万斤。吴邦国问："堆这么多柚子，怎么还没卖出去？"黄开田说："已经卖了1万斤，现在想等一等，等到春节卖个好价钱。"吴邦国笑着说："你这是待价而沽啊。"

正当他与黄开田一家坐在沙发上拉家常时，黄开田的儿子黄裕锦跑了进来。吴邦国亲切地把他拉到跟前，问："几岁了，上几年级？"

小裕锦非常腼腆，黄开田代着回答："11岁了，读小学四年级。"

吴邦国又问："谁管你的学习？"

小裕锦胆子大了些，说："爷爷管。"

吴邦国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将来要懂电脑、会外语、能开车。"

一席话，说得满屋欢声笑语。黄开田家堆满房的金柚，散发着阵阵清香。

## “农村建新房，也要像城市一样有规划”

12月的广东，仍带着春意。10日一大早，吴邦国来到了雁南飞茶田。登上望茶亭，放眼望去，漫山遍野都是绿油油的茶树。微风带着雾气吹来，可以闻到一股幽幽的茶叶香。

茶田总经理叶祖根告诉吴邦国，公司积极回报村民，对60岁以上的村民，公司每月给50元，70岁以上的给100元，全村小学生读书免费，考上大学每年给8000元。吴邦国听了，连声称好。

接着，吴邦国来到雁洋镇南福村村委会，向村党支部书记黄清欢了解村里的生产和收支情况，村委会的宣传栏上写着去年初党支部定下来的奋斗目标，吴邦国就一条条地对照着问落实情况。

“上面写着2006年村集体经济收入12万元，人均收入5000元，你们达到了吗？”吴邦国问。

黄清欢说：“这个目标去年底就已经达到了。去年全村集体收入已达14万元，人均纯收入5130元。今年1—10月，全村集体经济收入13.4万元，人均纯收5050元。”

吴邦国高兴地说：“好，第二条，你们说要每年发展1～2名35岁以下、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党员，每年保持2名‘两委’后备干部，要求不低啊，达到没有？”

黄清欢说：“达到了。”

吴邦国非常高兴，继续一条一条地念下来、问下去。

村委会办公室的正墙上挂着很大的红幅，写着“金柚标准化管理讲座”。吴邦国说，好啊，这样的讲座要多搞。黄清欢说，我们很重视科学种植，还要求党员带头，每名党员掌握2门以上实用技术。吴邦国连连颔首赞许。

从村委会出来，吴邦国看到一幢幢新房正在附近拔地兴建，就问起规划的情况。张德江说：“我们以前不重视农村规划，农民有了钱，就乱建房，结果有新房没新村。我们现在已经决定将城乡规划都抓起来，实现一体化管理。”吴邦国对此表示赞同，说：“农村建新房，也要像城市一样有规划。”

第二天，吴邦国又来到潮州枫溪区枫二村。这个村现有878户3075人，办有民营企业250多家，去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3亿元，集体经济纯收入410万元，村民人均年纯收入6684元。有了钱，村里就统一规划，建设枫二新村，分给村民住。

在村民吴喜正家，吴邦国喝起了功夫茶。吴喜正说，他自办了一个陶瓷作坊，雇用20名工人，年产值60万元，年上缴税收2万元，家庭年纯收入6万

元。村里新村给他分了一套116平方米住房，他自己又建了一套200平方米新居。

吴邦国问："是老房子好，还是村里分的房子好?"

吴喜正说："新的好。"

吴邦国故意说："不会吧？老房子有院子，应该比现在大。"

吴喜正憨厚地一笑："新村的房子环境安全，空气好，交通方便，而且整体漂亮。"

吴邦国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让农民生活越过越好。"

接着，吴邦国又到吴喜正的邻居吴喜深家做客。59岁的吴喜深，原在枫二建筑队工作，近几年在村委帮助管理基建工作，每月工资1020元。妻子黄维兰，在亲戚办的企业帮工，各种收入加起来，家庭年均收入达4.5万元，在枫二村处于中等水平。听说吴喜深是一名党员，将两个儿子都培养成了大学生，吴邦国非常高兴。

考察中，吴邦国多次深入村委会和农户家中，与农民兄弟和农村基层干部亲切交谈，了解中央"三农"政策的落实情况。他指出，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这是一项重大而长期的历史任务，也是加强"三农"工作的重要战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坚持实事求是，扎实稳步地向前推进。要在继续稳定、完善、强化和不折不扣落实已有的各项支农政策的基础上，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县级财政状况，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增加金融支农措施，切实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不断促进农业发展，持续增加农民收入，逐步改变农村面貌。要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因地制宜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加强农田水利等基础建设，加快农业标准化进程，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实现农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轨道"

吴邦国上次考察广东是去年11月。一年过去，广东各项工作又取得新成绩。预计今年全省生产总值可突破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2%，全面胜利完成"十五"计划目标。今年1—10月，全省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488.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77%，为三年来同期最高增幅，总量继续居全国第一。

对广东的工作，吴邦国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要求广东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落实胡锦涛总书记视察广东的重要讲话精神，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不断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吴邦国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十一五"时

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和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我们要把思想统一到两次重要会议精神上来，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战略重点，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尽快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我省人大各项工作也取得新进展。特别是今年5月中共中央转发《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后，全省各级党委、人大常委会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结合自身实际，边学习传达，边贯彻落实，地方人大常委会工作制度进一步完善，地方人大常委会及其机关的组织建设得到加强，人大代表工作得到新发展，人大的职能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

吴邦国对此也给予了肯定，勉励广东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继续探索，开拓创新，推进中央文件精神的深入贯彻落实，把人大工作做得更好。

吴邦国还参观了叶剑英元帅纪念馆和故居，视察了梅州一江两岸、潮州韩江城堤滨江长廊，考察了深圳大芬油画村，梅州塘心村客家围龙屋，潮州韩文公祠、开元寺等。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参加了在深圳期间的考察活动。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何椿霖、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傅志寰、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正庆、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叶如棠，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曹卫洲、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委员长办公室主任孙伟等参加了考察。

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陪同了在深圳的考察活动。省委常委、秘书长肖志恒全程陪同考察。

（岳宗）

（摘自《羊城晚报》2005年12月13日）

# 温家宝

## 情满珠江·亲民爱民

当选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后，温家宝曾十次视察广东：2003年4月30日至5月1日，在“非典”肆虐的时候，温家宝到广州的学校、社区、建筑工地和医院视察“非典”防治工作；2003年7月1日，温家宝到深圳视察工作；2005年9月9日至13日，温家宝先后到珠海、中山、佛山、广州、东莞、深圳等市，围绕研究制订“十一五”规划进行考察；2006年10月15日至16日，温家宝参观考察广州的合资和外资企业；2008年1月29日至30日，南方遭遇百年一遇的罕见雨雪冰冻灾情，数万乘客滞留广州，温家宝在粤考察春运及市场供应工作，前往火车站看望广大旅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温家宝分别在2008年7月19日至20日、2008年11月14日至15日、2009年4月19日至21日到广东考察工作，鼓励广东企业渡过金融危机；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温家宝于2010年8月20日至21日在深圳考察工作；2010年广州亚运会举办之际，温家宝于11月11日至12日、14日至15日到广州、珠海等地考察指导工作。

温家宝以关注民生著称，本文通过温家宝在广东视察“非典”防治工作、考察雨雪冰冻灾情时期的春运及市场供应工作、出席亚运会开幕式等活动展现他如何关注民生，如何走进南粤人民中间。

## “这个疾病可防、可治、可控、不可怕”

2003 年春节前后，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袭击了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一种人类尚未知晓的新的传染病使广东成了国内外关注的疫区。在广东与病魔打响“攻坚战”的关键时刻，刚刚出席完中国—东盟领导人关于“非典”问题特别会议的共和国总理，回程时专门于 4 月 30 日至 5 月 1 日到广州考察，来到南粤人民中间，来到了抗击“非典”战斗的最前线！在学校、在社区、在工地、在医院，温家宝的手和大家紧紧握在一起，激动的人们流下了热泪……

初夏的羊城，阳光明媚，鲜花盛开，处处生意盎然。4 月 30 日 16 时 15 分，温家宝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广东省省长黄华华陪同下，来到华师附中。正是下课时间，总理的身影在校园里一出现，教学楼上下顿时响起一片欢呼声：“总理好！总理好！”温家宝不时停住脚步，向老师和学生招手致意。看到学校教学秩序正常、学生们生龙活虎，温家宝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操场上，一群群学生正在锻炼身体，温家宝关切地询问他们怕不怕“非典”，当听到学生说“不怕”时，温家宝高兴地点点头：“对。这个疾病可防、可治、可控、不可怕，人类最终能够战胜它，关键是靠科学。”在阅览室，温家宝看望了正在埋头学习的学生。他对大家说：“你们要好好学习，增强本领，将来敢于攻克各种难关，像你们的院士校友钟南山一样，为祖国和人类的进步事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与学生们依依挥别的时候，他反复叮嘱广东省和广州市的同志：“孩子是祖国的未来，一定要把学校作为“非典”防治的重中之重，使他们得到最有力的保护。”

虽然“非典”威胁着广州，但广州保持了较好的生产生活秩序，羊城街头依然行人如织，一派安宁祥和的景象。车到天河北路侨怡苑停下来，温家宝走下车来，信步向正在路边等候公共汽车的人群走去。首先认出总理的人欢呼起来：“总理来了！”大家兴奋地争相与总理握手。温家宝一一询问他们是哪里人，家里有没有人感染“非典”，知不知道如何预防这个病。他走进侨怡苑小区，不时停下来和欢呼雀跃的群众握手、交谈。在小区居民曾满洪家里，温家宝和他们全家围坐在沙发上拉家常。温家宝问：“家里有什么预防措施吗?”曾家人争着回答：“街道发了预防指引，要勤洗手，保持通风，进行消毒。”温家宝说：“看到你们家人都很好，我很高兴。现在广东、广州这种局面是广大人民经过努力得到的，来之不易啊，要好好珍惜。”走出曾家，楼下人山人海。车子开动了，温家宝打

开车窗，与群众一次又一次地握手。人群中几位妇女目送总理离去，流下了激动的热泪："想不到这个时候在街上见到了总理……"

17时40分，温家宝不顾一天的舟车劳顿，赶到广东省人民医院看望还在值班的医护人员。在医院门诊大厅，他详细了解医院收治"非典"病人的情况，询问有没有医护人员受感染。走上二楼，他与医生和护士一一握手。他问一位医生："你救治过'非典'病人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紧紧握住她的手："谢谢你们!"得知"非典"以来仅广州地区就有200多名抗击"非典"一线医护人员申请入党，其中30人被批准火线入党时，他动情地说："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我们的医护人员临危不惧，舍生忘死，无私奉献，救死扶伤，表现出高尚的革命情操和人道主义精神。党和人民感谢你们，历史不会忘记你们!"就在他踏上自动扶梯那一刻，人群中有人喊道："总理保重!"他向大家抱拳致意："请大家多保重!"走出医院大门时，他主动对依依不舍的医护人员说："来，咱们合影留念。"

在考察中，温家宝一再强调，在抗击非典型肺炎的战斗中，不仅要发挥好大医院技术力量强的作用，而且要充分发挥基层医疗机构贴近群众的特点，筑起防治"非典"的第一道防线。在林和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他再三叮嘱医护人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最贴近居民的医疗单位，一定要为居民提供及时、方便、周到的服务，要积极向群众宣传卫生健康知识，引导大家科学冷静地对待"非典"疫病。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第一道关，一定要把好啊!"

19时40分，忙碌了一天的温家宝健步走进珠岛宾馆二号楼红棉厅，听取广东省委、省政府对广东防治"非典"的工作汇报。他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不时插话，在发表讲话时也不断提出问题让大家讨论。他提出的问题引起了与会同志的深思，大家或反映情况、或提出建议，会场气氛热烈。他说，广东幅员广，人口多，特别是流动人口多，周边一些地区疫情也相当复杂，要防止疫情从发病地区向未发病地区扩散，特别是农村，医疗条件差，一旦出现疫情，就防不胜防。张德江指着省委副书记欧广源说："我们已做了安排，明天广源就到农村去，利用'五一'的时间进一步摸清农村的情况。"温家宝赞赏地说："这就好。你们下去后，要广泛宣传国家对农民'非典'患者免费治疗的政策，要不折不扣地执行。要在农村广泛宣传防治"非典"的知识，还要组织医疗队下乡，加强对乡村医务人员的培训，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治疗、早隔离的基本要求。"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钟阳胜说："我们已制作了10万张宣传防治'非典'知识的VCD光碟，准备发到每一个村，组织农民观看。"温家宝说："好，你们先走了一步。这个片子还可以向全国推广。"

会议结束时，温家宝特地走到与会的医学专家面前，与大家热烈握手。他动情地说："胡锦涛总书记反复强调，战胜疫病最终还得靠科学。防治'非典'是

人类面临的一个新的难题。希望你们加强攻关，早日在‘非典’诊断、治疗、免疫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为全国以至全世界作出新的贡献。”总理一席话，激起全场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 “同志们，我是温家宝。我来看望大家。你们吃苦了。”

2008年初，中国南方遭遇了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天气，多处电路中断，铁路停运，公路受阻。春运期间，广州滞留了几十万旅客，他们的吃住、御寒、防病等问题让总理十分牵挂。1月29日晚温家宝结束了在湖南的考察工作，当即乘飞机于午夜抵达广州，并于30日晨冒雨考察广东省春运及市场供应工作。

寒冬腊月，冷雨飘洒。8时15分，温家宝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广东省省长黄华华陪同下，来到广州火车站，看望广大旅客。火车站内，一辆即将开往武昌的火车停靠在站台旁，许多乘客在默默地祈祷，希望列车按时出发。温家宝登上了11号车厢，看到总理意外地出现在大家眼前，旅客们激动地齐声欢呼。温家宝与乘客们亲切握手，详细地询问大家在火车站等几天了？要去哪里？吃喝有没有问题？一位乘客高兴地说，前天晚上总理到了湖北，昨天在湖南，没想到今天又冒雨来到广州，我们心里很温暖。温家宝说，你们能够回家过年，我很高兴。8时25分，汽笛声响，火车缓缓启动，温家宝在站台上向车内的乘客挥手致意，目送列车离去。

在广州火车站的月台上，温家宝亲切接见了顶着寒风，日夜奋战在春运一线的武警官兵、公安干警和铁路职工。看到大家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他满意地笑了。他首先表示慰问：“你们在一线的同志非常辛苦，我转达党中央、国务院对大家的亲切的慰问和衷心的感谢！”然后提出了三点要求：一要尽快打开通道，使南北通道畅通无阻，这是根本；二要安置好旅客，解决旅客的吃饭、保暖、就医等问题，特别要做好旅客的思想工作；三要发扬干部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怕困难，耐心细致地做好旅客的管理、安全、疏散和说服工作。冷风挟雨，大家不由自主地围到了总理身旁。摄影记者们赶紧按下快门。

在寒冷的冬雨中，温家宝疾步走到火车站广场，来到临时搭建的雨棚，来到候车的旅客中间。“同志们，我是温家宝。我来看望大家，你们吃苦了。”温家宝手拿扩音器，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对旅客说：“大家回家的心情都很急切，你们的心情我完全理解。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正在恢复电网，电网恢复以后，铁路就可以正常运行，各项工作都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每天铁路开通的车辆都在增加，我们把组织工作做好，争取让大家早一点回到家里，和家人团聚。”温家宝这席温暖人心的话让滞留在火车站广场几天的乘客感受到了特殊的感动，人群里一阵阵地自发喊出：“总理，您风雨兼程来看我们，同样奔波劳累啊！”“感谢总

理！”老百姓的真诚与朴实同样深深打动了温家宝，“谢谢你们！谢谢大家！春节到了，祝大家新春愉快、合家幸福！”



温家宝在广州东川新街市农贸市场考察市场供应。

绵绵冷雨中，温家宝又来到了省汽车客运站，坐在候车室的长椅上，与候车的乘客们攀谈起来。老家在湖北的华国红，今天带着母亲要搭乘客车前往他工作地珠海。母亲乘坐的从湖北到广州的火车，在路上走了五天五夜。温家宝说：“我也担心你们回不了家。”华国红说：“前两天很着急，天天来火车站问消息。后来，听说总理要来广州，我就不着急了，知道有希望了。”与乘客拉完家常，温家宝来到售票室，详细了解了发售车票的情况，并登上了一辆即将开行的客车，向大家拜早年。

离开车站，温家宝又来到南方电网公司，调查了解电力供应的情况。在调度室里，温家宝一边听着南方电网负责人的汇报，一边仔细询问倒了多少塔、断了几处线，现在恢复情况如何？温家宝指出要采取一切措施，抓紧修复电力设备，同时调整用电结构。电力战线的干部职工肩负着很繁重的任务，相信你们能经受得起这次考验。

春节快到了，温家宝十分关心雨雪冰冻天气中广州市场供应和价格问题。他来到广州东川新街市农贸市场，详细询问各类蔬菜、肉类的价格，与店主及前来买菜的市民交谈。来到店主梁少芬的档口，他关切地询问咸水鸭一斤多少钱，在这里经营是否要交管理费。店主周霞的档口出售广州番禺区的无公害蔬菜，他仔细查看产地。看到市场物品丰富，价格稳定，供应充足，他不停地点头。一位买菜的老太太告诉他，今年她的退休工资又增加了160元，生活更有保障。他听后高兴地笑了。市民们争相与他握手，“新春快乐”等美好的祝福声此起彼伏，市场里气氛十分热烈，寒冬里涌动着暖流……

## “广州比以前更干净，花更多，树更绿。”

11月的南粤大地，繁花似锦，激情飞扬，第16届亚洲运动会正在广州如火如荼地进行。2010年11日至12日、14日至15日，温家宝在出席广州亚运会开

幕式之际和赴澳门出席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之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省长黄华华等陪同下到广州、珠海等地考察指导工作。

11日傍晚，刚刚抵达广州的温家宝匆匆吃过晚饭，决定先去看看广州老百姓的“菜篮子”。越秀区中山五路百佳超市中旅商城分店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这个占地2700多平方米的大超市，经营商品种类超过了15000个，尤其是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食品应有尽有，价廉物美，深受欢迎。65岁的梁锦华推着车子在购物。她惊喜地发现，迎面走来的是温总理。温家宝拿起了她推车上的鸡蛋、蔬菜、大蒜，仔细察看价格标签。梁锦华笑着告诉他，明天广州亚运会就要开幕了，市民放假一天。大家都赶来采购食品，准备“蜗居”家中观战亚运。他高兴地笑了。“广州办亚运，市民像过节！”温家宝来到超市的消息不胫而走，人们喜出望外，争相与总理握手，爆出一阵阵欢呼声——“总理好！”“总理辛苦了！”超市内瓜果肉菜琳琅满目，温家宝边看边问，了解物价变化对市民生活的影响。他说，市场供求和物价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高度重视。国务院正在拟定措施，抑制价格过快上涨。他叮嘱广州市有关负责人要千方百计保持供货渠道畅通，保证市场供应，加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

随后，温家宝来到了越秀区广卫街都府社区。这里是广州老城区，在“迎接亚运会、创造新生活”中，通过修缮历史古迹、推广贴面绿化、推行垃圾分类、开展节能减排，社区自然环境更加优美，人文氛围更加和谐。晚上9时多，社区广场上依然人流如织，有的在参加亚运会知识灯谜有奖活动，有的在进行体育锻炼。9岁的小学生简诺彤见总理来了，特别兴奋。“我们是东道主，欢迎温爷爷到广州看亚运会！”稚嫩、真诚的童声引来大家开怀大笑。简诺彤把一张印有亚运志愿者口号“一起来，更精彩”的宣传单呈到总理手上。“请温爷爷给我签个名吧！”“好！一起来，更精彩！”温家宝欣然写下了名字。接着，温家宝又走进了广府文化会馆。这个社区综合性群众文化场所里有古乐器演奏、文化讲坛、戏曲沙龙等，居民们各得其乐、各尽其兴。在一张茶几前，温家宝坐了下来，跟老人们一起喝夜茶、聊家常。老居民曾佩贞自豪地说：“这儿房子虽旧了些，但过日子特幸福。早上在广场上打拳、跳舞，晚上来会馆里听戏、聊天！”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变化、谈感受，欢声笑



温家宝在广州越秀区都府社区同市民亲切交流。

语不断。温家宝欣慰地点头说："不仅要提高生活水平，更要改善生活质量。要把科学发展的成果体现在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求上，体现在人的全面发展上。"

秀美的南国花城在亚运脉动中绽放出前所未有的魅力、活力。花城广场就是为迎接亚运会而建立的新的城市客厅，56 万平方米的大广场上鲜花盛开，北面小桥流水、参天大树与音乐喷泉浑然一体，南面布满了亚运元素，用鲜花装饰而成的第 16 届亚运会会徽、吉祥物赚足了眼球。12 日上午，温家宝一到花城广场，就被眼尖的市民发现。大家涌了上来，随总理一起漫步广场，感受广州新变化。温家宝边走边听汇报，并不时停下脚步与市民交流。他充分肯定广州把筹办亚运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紧密结合，推动城市建设上了新台阶。

得知广州把治水放在重中之重，温家宝专门到东濠涌考察水环境整治情况。近年来，经过截污、清淤、调水、绿化等一系列措施，往日贯穿市中心的臭水沟变成了水流清澈、景色优美的生态河。东濠涌的巨变，让温家宝十分感慨。他指出："一个城市的面貌代表一个城市的精神。广州比以前更干净，花更多，树更绿。看到这些变化很让人高兴。"在绿树成荫的东濠涌，温家宝还对那里的亚运志愿者致以亲切慰问。赵丕能老人是 59 万名亚运志愿者的一员，通过选拔成为一名东濠涌亚运志愿特使。温家宝关切地问："您多大年纪了？"赵丕能老人激动地用带有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回答："我 70 多岁了！"温家宝紧紧握住他的手："辛苦您了，你们辛苦了！"短短几句话，饱含了中央领导对亚运志愿者的关怀与慰问。

12 日晚 8 时，温家宝来到了灯光绚烂、流光溢彩的海心沙岛，出席第 16 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并宣布开幕。他和亚奥理事会主席艾哈迈德亲王、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以及来自亚洲各地的贵宾，与现场的 3 万多观众共同见证了广州亚运会的"启航"，称赞开幕式"非常精彩，非常成功"。

近年来，珠江三角洲一些城市加强绿道建设，沿海滨、溪谷修建了可供人们步行、骑自行车并行的景观线路，将山景、海景串联贯通，使人们享受到低碳出行的愉悦。15 日上午，结束对澳门视察的温家宝来到了位于海边的珠海绿道 1 号线海天驿站，走在人行道上，只见天蓝水绿、草木葱茏、风景秀丽，让人心旷神怡。当听说珠三角正在规划建设 2254 公里的绿道，今年基本建成、明年全部到位时，他高兴地称赞："这件事情办得好！"他和正在自行车道上的骑车爱好者不期而遇，并与他们亲切交谈。他接过一辆自行车，娴熟地与大家一同骑车，享受绿道的"慢行乐趣"。

（张丽红）

# 曾庆红

## 金秋的寄望

经历了春寒的料峭和夏暑的炙热，南粤大地迎来了充满收获喜悦的金秋时节。

2003年9月13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在广东进行了为期5天的考察活动。在一个个车间和实验室里，在一处处口岸和大型基础设施场地，他谈发展，论小康，关注固本强基的党建事业，关心港澳地区的繁荣稳定。对我党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领导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幸福生活和美好的未来进行了深入的调研。

### 一

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曾庆红近十多年来曾多次到广东调研，一直关心广东的发展。考察途中，他对考察的广州、深圳、珠海和东莞等地情况如数家珍，对广东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非常欣喜。



曾庆红在深圳市劲力集团了解党建工作情况。

虽然今年年初广东遭受了突如其来的“非典”疫魔的侵袭，但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广东省委省政府果断决策，沉着应对，带领全省医务工作者和干部群众取得了抗击“非典”和发展经济的双胜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汇报说，广东前8个月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同期增长12.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9.4%，实际利用外资、外贸进出口和财政收入等几项主要经济指标也有20%左右的增长。

曾庆红说，这是了不起的成就。江泽民同志要求广东“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胡锦涛同志今年提出广东要“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和协调发展”，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指导思想，他非常赞同。广东有条件有能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地发挥排头兵作用。

在深圳赛百诺基因技术有限公司，留美归国博士彭朝晖介绍了他们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抗癌素和基因搭桥素两大产品情况，听到他们用于治疗恶性肿瘤的药品临床试验效果明显时，曾庆红非常仔细地询问了基因治癌的科学原理，并对彭朝晖说：“感谢你们为人类健康所做的贡献，要继续努力。”

当看到介绍材料上药品的商标名称是“今堤森”时，曾庆红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彭朝晖说是英文的直译。曾庆红说：“叫‘今又生’怎么样？一个好产品还要有一个有含义的响亮名字，让老百姓一看就懂。”

黄华华省长说：“要是用这个品牌推向市场，曾副主席还有知识产权呢。”

会议室里顿时响起一片笑声和掌声。

在广州日立电梯有限公司考察时，当公司总经理潘胜谈到公司正不断提高现代化生产水平，生产线将自动化控制实现无人车间时，曾庆红关切地说，这是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好事，但减下来的人不能失业啊，要把这些人安置好。

潘胜说：“那时生产量扩大了，别的岗位也需要他们去工作。”

“对，这样好。”

参观完广州国际会展中心后，曾庆红来到了会展中心边的地铁新港东站，饶有兴致地在自动购票机上购买了车票，试乘广州地铁二号线。在宽敞明亮的地铁车厢里，曾庆红听到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介绍二号线车站在全国率先采用了屏蔽门、增强了乘客的安全性时，他点头赞许：“既要便捷快速，又

要安全第一，这才是对群众最好的服务。”

在考察中，曾庆红多次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伟大事业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统领，要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用党的建设这个伟大工程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用经济发展的成果检验党建工作。他寄望广东继续在全国领先一步，摸索新经验，创出新业绩，作出新贡献。

## 二

如何实现改革开放和党的建设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在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方面也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广东在这个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狠抓理想信念，加强班子建设，着力固本强基。曾庆红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

曾庆红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一定要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知民情，解民困，化民怨。在广东省信访局调研时，曾庆红说：“信访部门是党和政府的重要窗口，也是重要的参谋和助手，每天都要跟群众打交道，受理人民来信、来电、来访，使党和政府及时准确地了解人民群众的困难、呼声和要求，更好地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广东是非公有制经济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按照中央的部署，广东正在进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试点和在新的社会阶层发展党员工作试点活动。曾庆红在考察广东的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时，非常关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支部开展活动的情况。

位于东莞市的广东志成冠军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民营科技企业，企业产值连年以30%～40%的速度增长。公司董事长、党支部书记周志文说：“公司增长这么快，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共产党员较好地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他介绍说，公司现在党员15人，预备党员4人，自从今年3月开展“保先”教育以来，进一步增强了党支部的凝聚力和党在群众中的形象，至今已有30多位员工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公司党员活动室，曾庆红与入党积极分子陈国祥亲切交谈，征求他对“保先”教育的意见。陈国祥告诉曾副主席，自己在学校读书时就申请入党，公司开展“保先”教育更坚定了自己向党组织靠拢的决心。曾庆红鼓励他：“在党支部帮助下，相信你的愿望是能够实现的！”

深圳市劲力集团公司是广东省先进民营企业，于1997年成立了深圳市第一家民营企业党支部，现有党员12人。集团董事长郑卓辉上世纪70年代就申请入党，但由于工作流动性大未能如愿。郑卓辉兴奋地告诉曾副主席，去年4月自己终于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今年转为正式党员了。

“祝贺你成为我党的同志!”曾庆红紧紧地握住郑卓辉的手,“现在你的身份不同了,希望你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企业做大做强,为我们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 三

广东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先行一步,而与广东山水相连的香港和澳门,无疑发挥了窗口和桥梁的重要作用。广东吸引的外来投资中,大部分就来自香港,二十多年来,港澳投资企业也在广东这块热土上得以发展壮大。

曾庆红副主席广东之行的第一站,就特地安排到澳门投资企业威斯曼服饰有限公司考察,他详细询问企业的产品、市场等情况。公司副董事长谢惠刁介绍说,威斯曼羊毛衫主要销往日本、欧美,在内地也有近300家专营连锁店,去年又投资5000万元扩大生产,今年一年就招了几十个大学本科毕业生。曾庆红高兴地说:“祖国有市场,有人才,相信你们会发展得更好!”

在至卓飞高线路板(深圳)有限公司考察时,曾庆红看完介绍公司情况的录像后,关切地问:“你们说说,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解决的?投资环境怎么样?”公司负责人说:“这里电价、水价比较贵,企业成本较大。”曾庆红扭过头来问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黄丽满。黄丽满接过话头:“蛇口工业区的水厂是独立的,电是香港供应,价格是高点。”

至卓负责人说:“十几年前我们来这里投资,就是看中这里的水电供应比较稳定,但现在情况变了。”曾庆红说:“对了,要历史地看待问题,当然深圳还要继续降低营商成本。”黄丽满马上说:“我们争取并网降价。”

深圳罗湖口岸和珠海拱北口岸,是我国最大的两个陆路口岸,每天都是车水马龙。曾庆红来到这两个口岸,慰问海关、边防、检验检疫人员,亲切地与港澳同胞和内地出境旅客攀谈。

自从今年7月底在珠三角8个城市试行广东居民个人赴港澳旅游以来,广东已发出个人港澳游证件近16万本。看着持证出游的人群络绎不绝,曾庆红说:“看来中央促进粤港澳合作的措施已经初见成效了。”

张德江汇报说: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之后,广东高度重视,抓住机遇,大力推进粤港合作,力争用10~20年的时间,把包括港澳在内的大珠三角建设成为世界上最繁荣、最具活力的经济中心之一。曾庆红频频点头称许:“广东就是要努力促进粤港澳合作,实现大珠三角经济区互利双赢、共同繁荣!”

15日上午,深圳下起了瓢泼大雨,曾庆红来到深港西部通道工程填土工地现场,执意要下车看一看深圳湾大桥的设计方案和施工进展情况。眺望风雨中隐

隐可见的香港，曾庆红深情地说："跨界大型基建项目关系到香港的繁荣稳定，一定要高标准设计、高质量施工，争取早日建成。"

在东深供水改造工程纪念园，曾庆红仔细了解工程建设情况，并到金湖泵站实地考察。看着东江水经过泵站提升到高高的渡槽，清清流水一路欢歌奔向香江，曾庆红欣慰地对省水利厅厅长周日方说："东改工程建得好，要请香港同胞来看一看，感受一下祖国亲人的深情！"

16日下午，曾庆红专门来到广东省信访局，听取信访局办信处港澳组以及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汇报，了解处理港澳同胞来信来电来访的情况。

曾庆红说："广东的港澳投资企业很多啊！"黄华华说："港资7.5万家，澳资5000多家。""港澳回归祖国了，港澳同胞在内地投资、生活、办事碰到的困难，我们都要及时了解，讲清道理，依法解决。"曾庆红语重心长地说："对港澳同胞提出的实际问题，要做到事事有结果，件件有回音，为促进粤港澳合作、为维护'一国两制'、促进香港和澳门的繁荣稳定作出贡献！"

16日下午，当曾庆红得知在全国抗击"非典"期间两次"缺席表扬"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院士正在广州时，立即决定安排时间前往看望钟院士。下午，当曾庆红出现在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时，喜出望外的医务人员和病人都欢呼起来。在医院八楼呼研所病理实验室，曾庆红紧紧地握着钟南山的手，感谢他为抗击"非典"立下大功，勉励广大医务工作者继续拼搏，为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作出更大贡献。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当曾庆红走出医院时，楼上楼下再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凌广志　王垂林）

（摘自《广州日报》2003年9月19日）

# 黄菊

## 在广东考察强调坚持对外开放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近日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强调，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对外开放，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2004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黄菊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广东省省长黄华华的陪同下，在深圳、珠海等地进行了考察。岭南金秋，碧空如洗，草木葱茏，一派生机。黄菊兴致勃勃地考察了盐田港集装箱码头，听取了港口建设和深圳市物流情况汇报。他指出，要统筹规划，加快建设，优化和综合运用多种运输方式，努力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考察深圳高新技术园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和中兴通讯公司时，他要求继续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黄菊十分关心资本市场发展问题，考察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并主持召开了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座谈会。

黄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各



2004年10月30日下午，黄菊副总理在广东省委张德江书记、黄华华省长、财政部金人庆部长、信息产业部王旭东部长、国家发改委张小强副主任、深圳市市长李鸿忠等领导陪同下视察了华为公司。

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位居全国前列。在新世纪新阶段，广东省和其他东部省市要按照中央的部署，抓住战略机遇，继续发挥优势，坚持改革开放，提高发展水平，努力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要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五个统筹”，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继续贯彻落实中央加强宏观调控的各项政策措施，巩固宏观调控的成果，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切实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调整经济结构、深化体制改革、转变增长方式上，努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了解到广东省外向型经济近年来又有新的发展，黄菊非常高兴。他强调指出，广东省和全国的实践充分说明，党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完全正确和十分必要的。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的要求，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致力于建立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牢牢掌握对外开放主动权，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一是要提高出口产品水平，优化出口产品结构，认真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推动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二是要继续扩大利用外资，把利用外资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推进企业技术创新结合起来，着力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三是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支持各类有条件的企业到境外投资兴业，积极拓展发展空间。四是要抓住时机，在切实履行加入WTO的各项承诺的同时，认真做好WTO过渡期结束前的各项工作，增强抵御外部冲击和风险的能力。

在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座谈会上，黄菊听取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等部门和单位的意见和建议。他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资本市场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处在一个关键时期。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加紧工作，通力协作，切实把《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落到实处。要通过深化改革和创新，不断提高我国证券金融机构和市场整体的抗风险能力，为大力发展我国资本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要切实加强监

管，实现规范运作，防范和化解风险，最大限度地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要从制度建设上逐步解决历史积累的问题，消除阻碍市场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建立新的机制，确保资本市场在稳定的前提下加快改革和健康发展。

在广东考察期间，黄菊还出席了第五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开幕式，会见了前来参展的中外客商并参观了展览。

（赵　承）

（转自《人民日报》2004年11月3日）

# 吴官正

## 花开千树五月天

春夏之交的南粤大地，万木竞翠，百花斗艳。城市乡村车水马龙，到处呈现着一派繁荣景象和勃勃生机。

2005年5月20日上午10时许，鹏城晴空万里，艳阳高照，一架带有鲜艳国旗标志的银鹰，缓缓降落在深圳宝安机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亲临广东考察指导工作。

### “我们这次来，主要是了解你们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标本兼治、惩防并举，加大预防腐败力度方面的经验与做法”

在离开机场赴市区的路上，吴官正向迎接他的广东省有关领导同志简单了解了广东省的情况后，说：“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有些问题你们遇到得早，解决得也早，取得了可喜成绩，特别是在抓惩治的同时注意抓预防，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解决深层次问题，取得了好的效果。我们这次来，主要



图为吴官正（左一）在韩文公祠全国党风廉政教育基地参观。（卢宁锐摄）

是了解你们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标本兼治、惩防并举，加大预防腐败力度方面的经验与做法。”

近年来，我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指示，按照中央、中央纪委的战略部署，在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逐步形成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机制。全省上下形成了干净干事的良好氛围。据统计，截至目前，全省共建立建设工程交易中心95个、土地交易中心115个、产权交易中心28个；省本级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和调整413项；省人大建立“实时在线预算监督系统”；党政主要领导和组织系统、公检法系统一把手实行异地交流；广泛开展政府集中采购活动，等等。对广东这些从制度上铲除滋生腐败土壤的做法，吴官正已有所知，非常重视，很想作进一步的了解。

午饭后不久，顾不上旅途劳累，吴官正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省长黄华华和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王华元，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省委常委梁国聚、肖志恒等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深圳市政府采购中心了解情况。中心主任李健成介绍说，政府采购中心成立于2002年10月，并率先在全国推行全程网上采购，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便捷的特点，成效明显。吴官正关心地问：

“你们的采购量有多大？节约了多少资金？”

“2003年至2004年度，中心共完成采购预算27.4亿元，节约资金3.32亿元，节资率为12.1%。”李健成答。

“实行网上阳光采购，效果确实不错。”吴官正满意地说。

接着，吴官正又驱车来到深圳市政府行政服务大厅。此时，厅内一派繁忙景象，许多市民正在窗口办理各种证件、手续。吴官正一连看了几个窗口。在国税窗口前，他悄悄地拍了拍一位正在办证的小伙子的肩膀问：“你在办理什么证件？”小伙子一回头，发现竟然是吴官正同志。他惊喜地答道：“我在办理国税登记。”“方便吗？”“特别方便。”“满意吗？”“很满意。服务大厅既提高了政府的

工作效率，又方便群众办事，还消除了一些不正之风。老百姓举双手赞成这样的事情。”

在与深圳党政干部座谈时，吴官正说：“一个地方的党风搞得怎么样，主要领导要负责，分管领导要负责，我们搞纪检监察工作的同志同样有责任。搞纪检监察工作的同志要自觉接受党内外监督，努力按照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做党和人民信得过的忠诚卫士。”

同时，他还强调指出，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就必须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要坚持科学发展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公平与正义；要按照中央的要求构建和谐社会，就务必要惩治腐败现象、减少腐败现象发生。

在深圳的考察活动结束后，吴官正与陪同考察的广东省领导一起来到深圳莲花山公园，深情瞻仰小平同志塑像，向邓小平塑像敬献花篮，行三鞠躬礼。

##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把反腐倡廉寓于改革和体制创新之中

建设工程招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等，一直是腐败行为的高发区，也成为纪检监察部门关注研究的问题。考察期间，吴官正去了深圳、广州市的土地房产交易中心和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在视察广州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时，刚好有一个路面扩宽工程的开标会正在紧张进行之中。第一个单位的标底已在工作人员监控下开标，第二个单位的标书正在拆封之中。吴官正径直走到第一排坐下，饶有兴趣地看另外三家单位开标。听着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和中心负责人对现场开标会情况的介绍，看着工作人员严格按照程序报出另外三个单位的标底后，吴官正高兴地离去。

吴官正对陪同的省、市负责同志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解决的体制机制问题，有些方面也是预防腐败要解决的深层次问题。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把反腐倡廉寓于改革和体制创新之中。广州、深圳发展有形建筑市场、土地交易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利用市场手段配置资源，使发生在这些领域的腐败案件大为减少，这是非常可喜的成绩。希望你们继续在形成有效防范腐败的机制上下工夫，提供更多更好的经验。

##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来开展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中心，维护和促进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为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在考察中，吴官正反复强调这一

点。他告诫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说："一定要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多深入实际、深入基层，多接触干部和群众，要看到改革发展的大好形势，看到我们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这样，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来开展工作。"

在深圳、东莞、广州的视察活动中，吴官正先后走访了多家工厂企业，了解企业的党的建设情况、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情况、维护员工合法权益和厂务公开的情况、企业的发展情况等。他说，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解决腐败问题同样要靠发展。

21日上午8时半，在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当他听到公司董事长介绍："公司一年的产值有12个亿，今年估计能创利税超过1个亿"时，吴官正夸赞他们："不简单！"10时半，吴官正又来到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这是一家高科技民营企业，去年销售额达到462亿元人民币，海外销售额达22.8亿美元。吴官正听完介绍后十分高兴。他问华为董事长孙亚芬：

"你们这里有没有党支部？"

"有的，这就是我们的党委书记、副总裁陈珠芳。"孙亚芬拉着陈珠芳介绍说。陈珠芳详细汇报了集团党组织的建设情况。吴官正叮嘱她们说："你们一定要带头维护职工的切身利益，切实支持企业的发展。除了保障工人的工资、福利之外，还要尊重工人的人格。人都是平等的，都是有尊严的啊。"

"你们在先进性教育中做了什么啊？"吴官正又问。

"我们教育鼓励党员要热爱企业、建设企业。"陈珠芳回答说。

"做得好。你们要教育党员员工带头遵守社会公德和法律，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为企业作贡献，支持办好企业；使企业发展得更快，才能使国家发展得更好。"吴官正语音未落，现场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22日上午9时，吴官正一行驱车前往新科磁电制品厂，这是一家合资企业，主要加工生产高精密度的电脑硬盘磁阻磁头，产品全部外销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美国等地，2004年出口总额达1亿多美元。吴官正回忆说，1991年他曾到该厂参观，当时没有这么大，技术也没这么先进，没想到这几年发展得这么迅猛。在东莞期间，吴官正还视察了诺基亚首信通信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和虎门黄河时装城。

23日下午，吴官正来到广州科学城，视察了金鹏集团有限公司和联众不锈钢有限公司。联众是一家台资企业，该企业总投资额7.9亿美元，从德国、日本等国家引进国际同类型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工艺技术，生产热轧不锈钢、冷轧不锈钢等产品。吴官正戴上安全帽，兴致勃勃地进入厂区，听公司负责人介绍生产情况。当听说公司年产值有100亿元时，吴官正高兴地说："你帮当地发展，当地帮你发财，双赢！"

离开科学城时，吴官正对广州市的干部说，必须牢牢记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狠抓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通过发展、改革、创新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 开展反腐倡廉，就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广东的群众生活得怎样，广东群众的权益维护得怎样，广东的群众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这是吴官正此次考察中十分关心的问题。

每到一地，他都深入到一线职工中间和农村住户家中详察实情，认真倾听群众心声。在工厂，他问职工权益是否得到保障；在农村，他问农民个人的利益有无受到侵害；在学校，他问学生生活是否有困难，学校有无乱收费现象。亲民爱民之情，溢于言表。

21 日下午 3 时 30 分，吴官正在东莞市长安镇图书馆详细观看了长安镇改革开放成果展后，来到乌沙村村委会，仔细了解村里党员活动的情况以及村务公开和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当抬头看到“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八个大字时，他赞许地点了点头。

离开乌沙村村委会，吴官正来到村民李锐波家。这是一栋三层小楼，李锐波一家四口人住在这里。吴官正挨着李锐波坐在沙发上与他拉起了家常，问李锐波在村里做什么工作，一家人一年的总收入有多少。当他听说李锐波一家一年收入 25 万元左右，而且在村里也只处于中等水平时，吴官正说：“只要你们过得好我就高兴。”吴官正还向李锐波了解村里的治安状况和孩子读书的情况。

“腐败行为和不正之风伤害最大的就是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对腐败行为是深恶痛绝的。我们开展反腐倡廉，就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吴官正动情地说。他要求各级干部更应关心群众利益，并通过实际行动维护群众的利益。一定要从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入手，抓好保证食品药品安全、打击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专项整治工作，坚决查处环境违法案件，规范城镇房屋拆迁行为，加强对拆迁补偿资金的监管，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凡是肆意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都是缺德可恶的人，务必依纪依法严肃查处。

22 日下午，吴官正来到位于小谷围岛上的美丽的广州大学城。在华南理工大学校区下车时，眼尖的学生惊呼：“吴官正来了。”体育场上，同学们顿时中断了活动，自发地鼓起了热烈掌声。吴官正频频向同学们拱手致意。在学生宿舍，吴官正问同学们学的什么专业，家庭情况如何，有无经济困难。他嘱咐身边的学校领导要关心大学生的成长，耐心细致地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让每一个大学生感受到党的温暖。他勉励同学们珍惜青春时光，学好本领，报效祖国。吴官

正还在星海音乐学院的演奏厅内，观看了大学生对《黄河船夫曲》和《保卫黄河》两支名曲的演练。

5月24日上午，吴官正在听取了省委、省政府和省纪委的工作汇报后，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充分肯定了省委、省政府和省纪委的工作："广东处在改革开放前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认真实践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全国改革开放提供了许多好的经验。"他就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以改革统揽预防腐败工作，努力提高有效防治腐败能力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指导性意见："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减少滋生腐败的土壤；规范和维护市场秩序，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从政准则，规范领导干部的行为；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提供高效便捷优质的服务；健全和完善相关制度，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依纪依法查办案件，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

最后，吴官正寄语广东省领导同志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还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希望你们多观察、多分析、多研究，及时地采取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更好地预防腐败的发生，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张德江在汇报会上聆听了吴官正的讲话之后，当即作出学习部署。他说："官正同志对广东工作的肯定，是对我们的鼓励，更是对我们的鞭策。我们一定要按照官正同志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省的各项工作，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程上更加努力地工作，努力向党中央交出满意的答卷。"

24日下午1时许，一架银鹰在广州白云机场腾空升起，直冲云霄。结束在粤5天的考察后，吴官正乘专机返回北京。

南粤春色今胜昔，惟有东风旧相识。谁人不信广东的明天将更美好！

（戎明昌）

（转自《南方日报》2005年5月27日）

# 罗 干

## 任何时候都不能伤害群众感情

春暖南粤，红棉怒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风尘仆仆，于2005年4月7日至9日莅临广东，在省领导张德江、黄华华、黄丽满、王华元、黄龙云、李鸿忠、梁国聚、肖志恒等陪同下，考察我省基层政法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亲切慰问了广大政法干警和武警官兵。

三天的行程中，罗干的行程十分紧凑，从佛山到珠海再到深圳，罗干神采奕奕，步履轻快。他一路走，一路看，一面谈，为广东的社会经济带来热情的鼓励、中肯的指示、殷切的嘱托。罗干说："我们一到广东，就明显感受到了这块改革开放热土上蓬勃发展、蒸蒸日上的景象。广东经济总量大、发展快、效益好，工业化、城市化和开放程度高，反映了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已迈入了一个较高的层次，也反映了广东经济在全国的地位和分量。广东对全国的贡献是很大的。"

罗干又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后，广东提出了建设经济强省、文化大省、法治社会、和谐广东，实现富裕安康的发展思路和许多重要举措。这反映了广东对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



罗干（左二）在张德江等领导的陪同下考察佛山南海区里水人民法庭。（罗文清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更自觉的行动；也反映了广东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

罗干还进一步提出，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要求，扎扎实实做好各项维护社会稳定工作。“我看到了基层法院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4月7日傍晚时分，微风送爽。一架专机平稳地降落在佛山沙堤机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满面笑容地走下舷梯，和接机的同志亲切握手。阔别四年，南粤有忆。2001年，罗干曾在九运会期间考察广州。四年之后，他再一次踏上广东的土地。这也是在当选政治局常委后，罗干第一次来到广东考察。张德江热情地说：“欢迎你来广东考察！”罗干笑着说：“广东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法工作推进很快，我一直想再来看看。”

4月8日上午9时，罗干在张德江的陪同下，出席了在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召开的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他一出现在会场，就引起了一阵掌声，法官们惊喜低语：“罗干同志来了。”

是的。代表们没有办法不惊喜：这仅是一个基层法庭工作会议，罗干同志竟然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到广东参加会议来了！

罗干似乎摸透了大家的心思，他说：“我跟肖扬说过，全国基层法院召开的会议，我一定要参加，这是我第四次参加基层法院工作会议，我很高兴。”罗干说：“基层法庭的任务非常艰巨，也十分重要，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基层法庭工作，使公正与效率真正在基层扎根。这一次，中央编办专门为基层法院增加了编制，大部分就是为基层法庭而增加的。我们一定要解决好基层法庭‘审判无庭，办公无房’的问题。”一席话说得法官们心里暖融融的。

罗干随后来到里水镇法庭，边看边听汇报。在立案室，罗干问：“我要来立案，一般要经过什么程序？”在得到回答后，罗干露出了满意的笑容。里水法庭除了立案室外，还设置了调解室、党员活动室、学习室等，罗干问：“你们的案件那么多，怎么加强党员先进性的学习？”“我们利用晚上的时间，组织党员进行学习。”罗干点了点头。

站在案件查询触摸屏前，罗干说：“信息化好啊。你们这个法庭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法庭。这说明广东非常重视基层法庭的建设，说明你们的基层司法工作做

得好。”

临行前，罗干嘱咐里水法庭庭长麦恒富：“一定要向法官和干警转达我对他们的问候！”

8日下午，罗干又来到容桂镇法庭考察，在看到法院健全的制度，先进的审判信息系统后，罗干满意地说：“看了你们的法庭，我充满信心。”离开法庭时，张德江同志提议，和基层法庭的同志合张影，罗干同志欣然同意，并热情地招呼法官：“你们过来，我们拍一张照片。”

在南海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在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罗干边看边问，了解法院收案情况和利用信息化为审判工作服务的情况，当他看到法院领导能在电脑前用监控器看见每一个法庭的庭审情况时，由衷地赞叹：“我到过的市中级法院、县区人民法院不少，但是今天我在佛山看到了最好的基层法院，你们的硬件建设是第一流的，队伍的素质也好。我看到了信息化在促进司法公正与效率上的威力，谢谢你们让我看到了基层法院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 任何时候都不能与民争利

广东基层派出所的建设情况也牵动着罗干的心。8日下午，桂城派出所的民警们用一起案件的审批程序，向罗干汇报了警务规范化和信息化所取得的成绩。民警在网上录入案件情况，加具承办意见，派出所负责人在网上调阅材料加具意见后，分局领导就立即可在网络流程上进行审批，民警根据审批意见，就可以作出拘留决定书，整个过程不过15分钟，而且均在网上完成，节省了以往民警跑几十公里请领导审批的环节。罗干看后大加赞赏：“这样好，科技强警，节约了警力，提高了效率，也规范化了。”

珠海市拱北派出所处于“一国两制”的交汇点，因为地理位置特殊，公安保卫工作十分繁重，罗干9日下午专门看望了派出所的同志，他热情地和值班民警握手，并亲切询问：“群众报警多不多?”“一天有10多宗，大多是求助的。”“对群众一定要热情接待。”罗干叮咛。

在观看了拱北派出所的专题片“立足珠澳交汇点，创建平安和谐区”后，罗干对派出所建立警务区的做法很感兴趣，他问：“你们的警务室是设在居委会还是在派出所内?”民警介绍，警务室全部设在居委会，民警们基本上在警务室值班。罗干听完非常高兴，他说：“这很好，充分体现了警力下沉的优势，有利于警民关系的密切。”罗干又说：“过去有部电影叫《今天我休息》，是讲民警马天民的，我看你们就像新时代的马天民嘛。”他的话引来一片笑声。

罗干要求民警在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和利益关系日益多样化的环境中，要处理好社会治安的新情况新问题。他说，当前，流动人口管理问题

是社会治安工作中的一大难点，要坚持“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方针，保障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依法加强管理，不断提高管理水平。

罗干随后又来到拱北口岸考察，站在为提高通关效率设立的“一站式”电子验放系统前，罗干详细了解该系统的使用方法，看到过境旅客只要把磁卡插入系统，并伸出大拇指由系统查验指纹，仅用10秒左右就可以顺利通关时，罗干高兴地说：“这样做便民利民，好!”

9日下午，罗干还考察了深圳市罗湖口岸，当他了解到罗湖口岸日均出入境约25万人次，人员出入境占全国总数的一半左右，干警工作任务异常繁重时，动情地说：“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我知道，你们这个口岸的口碑很好。”

罗干进一步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要永葆政法队伍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法本色。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广大政法干警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认真学习胡锦涛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联系执法工作实际、联系思想实际，联系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深刻剖析世界观方面存在的问题，提高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筑牢抵御各种诱惑的思想防线，任何时候都不能与民争利，任何时候都不能伤害群众感情，任何时候都不能侵犯群众合法权益。同时要抓住那些容易受腐蚀、发生问题的执法环节，加大工作机制的改革力度，规范执法行为，维护司法公正。

## 注重解决关系民生的热点难点问题

政法工作如何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呢？罗干又风尘仆仆来到美的集团进行考察。美的集团董事长何享健在展示室内向罗干介绍了美的在全国各地建立了10多个厂区，产品出口美国和欧洲多个国家的情况。罗干听后非常兴奋，他感兴趣地问：“你的销售网络是你自己建立的吗？你有完善的产品售后服务体系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罗干点点头说：“我们要珍惜自己的民族品牌。你要好好干。”

在美的集团的荣誉室前，罗干开玩笑地说：“你把全国的、全省的、市里的奖都拿完了。”

9日下午，在行程很紧的情况下，罗干专门来到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进行考察。华为是一家高科技民营企业，主要从事通信网络技术与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与销售，产品覆盖通信设备的整个领域。在听取了企业的汇报后，罗干勉励该公司要继续开拓创新，不断发展自有技术，抢占科技制高点。罗干对陪同参观的同志说：“深圳社会稳定，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了很好的环境。”

罗干进一步指出，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矛盾不断产生、解决、再产生、再解决的过程。当前，在加快发展的新形势

下，要着重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好人民内部出现的新矛盾。下工夫去改善劳资关系，从思想上、管理上防止“重资轻劳”现象，规范企业工资支付行为，坚决纠正和防止企业主侵害员工特别是外来工利益问题。在提高发展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注重解决关系民生的热点、难点问题，使社会各阶层利益得到合理实现和保障。要把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一个一个地理出来，一个一个地制定解决办法，建立一种能够不断解决矛盾、化解冲突的机制，变不和谐为和谐。

在三天的考察行程中，罗干还参观了孙中山纪念馆及孙中山故居。离开深圳前夕，罗干专程来到位于深圳中心区北部的莲花山公园，向邓小平同志塑像敬献了花篮。

（戎明昌）

（转自《广州日报》2005 年 4 月 11 日）

# 贾庆林

## 放眼南粤气象新 殷切寄语促创新

盛夏南粤，花团锦簇，万木葱茏，一派生机。

2010年7月8日至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出席第六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有关活动前后，又一次莅临广东，就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充分发挥广东优势、做好新形势下对台、统战和政协工作考察调研。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华华，省政协主席黄龙云等陪同下，贾庆林一行风尘仆仆，先后到东莞、江门、广州等地，深入工厂企业、科研院所、市政建设一线，与企业家、科学家、学者和工人一起话创新、议转型、谋发展、促和谐。

贾庆林强调，广东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和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真抓实干，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当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排头兵。

# 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7月9日在东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调研。（新华社记者马占成摄）

扎实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贾庆林此次调研的重点。

骄阳似火，东莞宏威数码机械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派热火朝天。7月9日上午，贾庆林来到这里，听取企业汇报，考察组装车间，看望慰问一线员工。

公司行政副总裁范继良向贾庆林汇报："公司响应省委、省政府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号召，近年开始涉足OLED和薄膜太阳能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2009年，研发出国内首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薄膜太阳能电池生产线。"

贾庆林听了非常高兴。他指出，如果企业的装备全靠进口，产品成本就难具国际竞争力，一定要积极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装备。装备制造本是我国的优势产业，大型综合机床、大型工程机械等都有相当的制造能力，目前的薄弱环节是自动化水平低，机械与电子、工业与信息的融合不够。我国很多装备之所以仍需进口，原因就在于自动化水平不高。装备制造企业要瞄准世界工业和信息化的前沿，努力提升水平，尽快摆脱对外依赖。

随后，贾庆林来到东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这是一家聚合物锂离子电池生产商，研发产品包括手机电池、电脑电池、汽车电池等。

贾庆林十分重视、关心节能环保产业发展。他围绕汽车电池仔细询问："汽车电池有多大？""纯电动、插电式混合动力、混合动力分别有什么特点？""汽车从燃油到纯电动，是不是一定要经过混合动力这个阶段？"

听说该公司生产的汽车电池已经应用于深圳的公交车和出租车时，贾庆林满意地点头，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得知汽车电池成本仍然较高时，他转身对随行的省市领导嘱咐说，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支持，政府可以考虑补贴公交公司，鼓励更多的企业、人们使用电动汽车。

贾庆林指出，广东从自身特点和优势出发，提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并集中资源在若干领域实现突破，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下一步要继续加大对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扶持，抓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重大历史机遇，扎实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尽快成为广东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同时，要十分注意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换代。

位于松山湖的东莞华中科技大学制造工程研究院，是由东莞市政府、广东省科技厅和华中科技大学共建的一个集科技创新、技术服务、产业孵化于一体的平台。在该院展示厅，琳琅满目的产品引起贾庆林的浓厚兴趣，他边走边看边问，还主动把物联网中的电子标签留作纪念。

几个在此创业的大学生驾驶的代步机器人引起了贾庆林的注意，他快步上前和他们亲切交谈起来。“你哪个学校毕业?”“学什么专业?”“今后的发展方向呢?”听说他们志在将代步机器人规模化生产，贾庆林笑容满面地说：“这个好!”他称赞该院为广大科技人员和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研发载体，对提高东莞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广州科学城，清风拂面，绿树成荫，一批高新技术企业掩映在繁花碧草之中。视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年仅27岁的总经理王毅然告诉贾庆林，公司现有350名员工，平均年龄不到28岁，80%为研发人员。当得知这群专注于液晶电视方案开发的年轻人，拥有海尔、康佳、TCL、清华同方、三洋等众多大客户时，贾庆林十分赞赏。他说：“你们做的是创意产业，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他勉励企业进一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元件。

贾庆林强调，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经济发展的效率与活力，最终都要落到企业上。要加快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促进企业由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由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劳动力素质提高、科学化管理转变，由简单的加工制造向拥有核心技术、自主品牌转变，实现专业化、集约化、品牌化、人文化生产，保持持久、高效、可持续发展。

## 二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人才是根本。优秀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始终牵动着贾庆林的心。

7月11日，贾庆林来到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一见到贾庆林，该院院长裴端卿就动情地说：“主席，2000年，您接见我的好朋友、生物芯片专家程京时，我有幸同您握过手、见过面。”

一听说程京，贾庆林顿时来了兴致，他向在场的科技工作者讲述了程京的归国历程和创业经历。他拿程京的事迹激励大家：“我国科研环境逐步改善，国外的高科技人才只要有设想，在国内就能转化为现实。”

该院有一支由国外优秀科学家组成的海外科研团队，裴端卿向贾庆林一一介

绍团队成员。望着这些年轻的面孔，贾庆林显得格外兴奋，尽管预定的考察时间已经超出，他还是拿起话筒作了一番动情的讲话。

贾庆林说，建设创新型国家，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人才是根本。前不久《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颁布，这是人才强国战略的行动纲领。要认真贯彻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精神，不断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大力培养造就具有世界科研前沿水平的高级专家、高层次科技领军人才，注重培养一线创新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积极引进海外人才和海外智力，为自主创新提供人才支撑。

年逾九旬的中山大学教授夏书章是中国当代行政学的主要奠基人，早年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毕业后，欣然回国任教。贾庆林的行程十分紧凑，但他仍挤出时间前往中大看望夏老。

甫一落座，贾庆林就和夏书章话起了家常。“大家庭有多少口人?”“家人每年有没有聚齐的时候?”贾庆林说，他仰慕夏老已久，很想找个机会来看看老人家，如今如愿以偿，感到十分高兴。

“生不逢时老逢时，耄耋欣幸历盛世，只要一息尚存，仍当努力耕耘。”贾庆林当场背诵夏书章的诗作，并表示要学习他谦和宽厚的作风。贾庆林还不忘叮嘱在场的中山大学校领导说，要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各项任务措施落到实处，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 三

7月的广东，见证两岸盛事，喜迎台湾宾客，2010年粤台经贸交流会在侨乡江门举行，7月10日，贾庆林来到这里考察。

真明丽集团1989年从台湾迁到江门，是目前国内外唯一一家实现由外延片—芯片—封装—应用产业链垂直完整的半导体照明企业，产品超过1万种，销售网络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董事长樊邦杨称，由于研发出具有自主产权的LED芯片，LED节能灯具的生产成本下降了一半。贾庆林听了十分高兴，他关切地问起节能灯具的市场推广情况。得知目前节能灯具价格仍然较贵、推广存在障碍时，贾庆林叮嘱在场的省市领导说，政府可以采取措施予以推广。当听汪洋汇报，广东去年推广了800万只节能灯，居民只需出一半费用，其余一半费用由财政买单时，贾庆林连连称好。

临走时，贾庆林关切地询问樊邦杨：“你在大陆呆了多长时间?”樊邦杨说他全家已经在江门生活了20年，公司所有业务都从台湾搬到了大陆。贾庆林对他的努力表示感谢，对广大台商为广东、对大陆经济社会发展，为两岸关系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

贾庆林表示，当前大陆正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一些产业层次较低的台资企业发展处在十字路口。广东要有针对性地研究出台一些政策措施，帮助台资企业提高技术含量，增强创新能力。此外，还要积极帮助台商开辟和进入大陆内销渠道，使他们共享大陆扩大内需的机遇。

联众（广州）不锈钢有限公司，由台湾烨联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引进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是华南最大的专业不锈钢生产基地。

7月11日，贾庆林来到这里考察生产车间。听说该公司去年投产的二期工程，已具备年产80万吨钢坯和钢卷的生产能力时，贾庆林满意地握着公司董事长李必贤的手说："你们为两岸经贸合作贡献了一份力量，感谢你们！"



7月11日，贾庆林在台湾独资企业联众（广州）不锈钢有限公司调研。（新华社记者马占成摄）

在广州富力中心45楼，羊城美景尽收眼底。看着珠江两岸鳞次栉比的高楼、建设中的亚运会开幕式场馆，贾庆林慨叹广州城市面貌大变样，并欣然拍照留念。贾庆林说，广州亚运会开幕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日，广东要用好"中山牌"，大力拓展粤台文化交流，打造一批具有广东特色的粤台民间文化交流品牌。同时，要大力加强与台湾民众的交流交往，不断拓展对台交往的新领域、新渠道。

## 四

2009年以来，广东既考虑当前，又着眼长远，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迅速部署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各项工作，努力创出符合广东实际的科学发展新路子。

7月12日，贾庆林召开座谈会听取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工作汇报。汪洋介绍，去年广东生产总值达到39082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上半年，广东经济社会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初步预计，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2.7%。同时，广东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开创人民政协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对台工作和民族工作的新局面。

听到这些，贾庆林高兴地说：我上次来广东是2008年4月，当时，美国次贷危机正处在发酵期，世界经济出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春江水暖鸭先知”，广东处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已经感受到国际经济寒流的袭来。广东省委适时在全省开展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回过头来看，这场大讨论是很有意义的，这既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想动员，也为抗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贾庆林说，两年多来，广东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继续发扬“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全省上下齐心协力、共克时艰，有效顶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做到了“两不误、两促进”。同时，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规划到户、责任到人”扶贫开发，集中力量解决了一批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难事实事，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

展望未来，贾庆林对广东发展寄予殷切期望：

——充分发挥广东优势，推动对台工作取得更大进展。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形势下，广东要不断总结经验，更加奋发进取，承担更多责任，在对台工作全局中发挥更大作用。要紧紧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进一步加大对台工作力度，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进一步夯实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基础，为早日实现和平统一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扎实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进一步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引进、培养、用好人才，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共同发展，努力形成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大企业增强实力、小企业充满活力的良好局面；加快企业“走出去”步伐，让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经风雨、见世面，加速培育知名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企业要实行人性化管理，更加关心、关爱员工，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更多地通过提高机械设备的利用率增加生产、提高效益。要依法保护员工的合法权益，在法律的框架内调节劳动关系、解决劳动纠纷。要转向依靠人力资源素质、自主创新能力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来实现企业发展。要随着企业的成长和经济发展逐步提高员工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不断改善员工生产和生活条件，让员工有尊严地工作和生活。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和政协工作。集中智慧和力量，为“十二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建言献策，形成共谋发展的强大合力；坚

持大团结大联合，为广东改革发展提供广泛的力量支持，共同维护全省和谐稳定的大局；加大工作力度，努力创新城市民族工作，着力构建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有力屏障。

放眼南粤气象新，殷切寄语促创新。一路风尘仆仆，一路殷切叮咛，贾庆林鼓舞人心的重要讲话，为正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努力当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排头兵的广东增添了无穷的信心与动力。

陪同考察的还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王毅、陈云林、李德水、邵秉仁、李炳才、林智敏，广东省有关领导梁伟发、徐少华、张广宁。

（雷辉　粤宗）

（转自《广州日报》2010年7月14日）

# 李长春

## 南粤迈步从头越

金秋时节的南国，喜看稻菽千重浪，处处皆闻瓜果香，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

2008年10月18日正午，一场小雨洗礼过的深圳，天空格外瓦蓝，满城杜鹃摇曳。在众人的期待目光中，一架专机平稳地降落在宝安国际机场。舱门徐徐打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广东人民爱戴的“老书记”李长春走下舷梯。这是他自2002年11月离开广东后，第12次回“家”视察指导工作。

在改革开放迎来30周年的时刻，前沿阵地广东如何继续解放思想，推动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面对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外向依存度高的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如何抵御美国金融危机？毗邻港澳、思想活跃的广东如何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趋旺盛的精神文化需求？“老书记”念兹在兹，下车伊始就关切地问、仔细看听。

党的十七大以来，广东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2008年10月18日，李长春同志视察深圳罗湖区南湖街道渔民村时亲切地抱起一位村民的孩子。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成绩。李长春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指出，一年来，广东在以汪洋为“班长”的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坚强领导下，在沉着应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展变化，积极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方面有新思路、新举措，取得了新成效。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历经磨难，但是没有一次能把广东经济打垮，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景是美好的。

带着信心，满怀深情。随后几天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等的陪同下，李长春马不停蹄地考察了深圳、东莞、广州等地，深入农村、企业、街道、社区和基层文化单位，就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进行调研，召开专题座谈会，并听取广东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他一路看、一路想、一路问，叮咛切切，寄语殷殷。

## 广东巨变证明改革开放是关键抉择

作为国家首批设立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深圳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唱着春天的故事，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了如今的现代化大都市。

深圳罗湖区渔民村是个老典型。1984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曾到渔民村村民家做客。10月18日，李长春来到渔民村。一眼望去，这里俨然是一个园林式现代化的新型城市社区。以前这里生活的都是穷苦渔民，过着浮家泛宅的渔家生活。改革开放之初，渔民村人解放思想，大力发展经济，办起了来料加工厂，组建了运输车队和船队，盖起了一栋栋楼房。新世纪初，渔民村人响应政府号召，大刀阔斧地进行“城中村”改造，村里原有的33栋“握手楼”改造成为2栋高层住宅楼，空间大了，草地多了，环境变靓了，治安也好了。

李长春关切地询问渔丰股份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兴炎：“现在这里的居民生活主要靠什么？”

黄兴炎高兴地说：“以前的农民现在变成社区居民了，有的搞物业管理，有

的出租房屋，有的做工办厂，每户都有房子出租，生活很殷实。”

“今年房租的价格和去年相比有没有下降？房子好不好租啊？”黄兴炎回答说：“没有降，我们这里环境好，管理好，出租率达到100%，租客还要提前预约。”

李长春满意地点点头。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选择深圳作为改革的试验田，深圳不辱使命，不负重托，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彩缩影”。10月19日清晨，李长春怀着崇敬的心情，登上深圳莲花山公园广场，向邓小平同志塑像敬献花篮。

恰逢周末，天气晴好，很多人在山上晨跑，打太极。李长春刚下车，就有一些眼尖的人认出来了，“这是我们的老书记啊”。李长春也连连用粤语微笑着和他们打招呼：“你们好，大家好！”随后，李长春缓步走到山顶的邓小平同志塑像前，鞠躬缅怀邓小平的丰功伟绩，居高观看总设计师的“代表之作”。今天的莲花山下早已是高楼林立。他脚下的这片热土，沐浴在阳光中，生机勃勃。

李长春走下台阶，与周围群众亲切握手。他深有感触地说：“感谢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开放伟业。”一句话，道出了大家的心声。人群中响起热烈掌声。

在深圳另一个曾经的渔村北头社区，李长春兴致勃勃地观看改革开放30周年展。见到一位抱着孩子的老太太，李长春与她拉起了家常：“看到渔村的变化非常高兴，现在你们不养蚝了吧？”

老太太笑着说：“没有养蚝了，现在子女上班、自己办厂，我在家里带孙子”。

李长春高兴地说：这个村的变化是深圳30年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办些展览让后一代知道深圳从小渔村到现代国际大都市的变迁，这很好。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要用生动的事实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深刻认识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增强坚持改革开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 自主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受美国金融危机等国际国内复杂经济形势影响，当前我国特别是以外向型加工贸易为主的珠三角中小企业面临着巨大挑战。就在李长春抵达广东前几天，世界最大玩具代工商之一合俊集团在东莞的两间工厂倒闭。广东能否克服当前的困难，抓住机遇调整产业结构，继续保持率先发展的势头？作为广东的老书记，李

长春非常关注。他对广东目前正在推进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等战略举措表示肯定，并要求继续加大力度，“化危为机”，提升产业结构，再上新的台阶。

10月18日，在深圳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李长春饶有兴致地参观他们的特种计算机系统，有用于“神七”中根据温度或周围环境来控制开关机等程序的自动控制机箱，有自主研制的被评价为历届奥运会水平最高的电子门票……

公司董事长陈志列介绍：“这些技术立足自主研发、自主创新，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部分产品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去年深圳市奖给我个人100万，这是给予民营企业家最高的奖励。”李长春听了非常高兴，“现在文化教育体制改革，以后院士也要产生在自主创新的民营企业里。”

老书记非常关心当前经济形势。顾不上白天的调研劳累，简单用过晚餐后，李长春又连夜召集深圳的一些知名外资企业和大型企业负责人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企业经营情况进行研讨。夜很深了，会议室的灯还亮着，讨论声不时传出……

带着这种牵挂，李长春10月19日又走进了广东易事特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自主研发了神舟系列飞船的机电系统。董事长何思模说：“以前这种设备靠进口，现在完全是我们独立研发，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李长春关切地问：“今年企业有没有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公司一直用人民币结算，因此没有受到影响，关键是企业拥有自主创新品牌，有多项填补世界空白的专利成果，因此销售额比去年还有增长。公司的研发资金投入比例一直保持在5%以上。”

李长春点头称许：“自主创新的优秀民营企业，政府一定会大力扶持。”

在外商创新型企业东莞宏威数码机械有限公司，李长春也对他们利用自主创新产品走向国际市场表示了肯定。

10月20日上午，李长春召开座谈会，听取汪洋代表省委、省政府所作的汇报。汪洋说，今年广东努力克服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保持了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1—9月，全省实现生产总值25379.68亿元，同比增长10.4%。但是，产业结构不合理、体制机制不健全、城乡区域不协调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仍然未得到根本解决。今年以来又遇到严重雨雪冰冻灾害以及国内经济政策调整、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尤其是美国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因素的影响等一系列新的困难和挑战，导致广东经济增长速度呈现较大回落。1—9月，全省生产总值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4.3%，也比过去30年的平均增幅低3.4%，这是多年来少见的。

李长春指出，中国经济现在遭遇严峻的挑战，广东出现了多年未见的新情况新问题。从近期看主要是国际市场变化、外贸出口压力增大以及国内生产成本普遍上升双重挤压的结果；从深层次看，广东原有经济结构模式必须转变，从而出现了产业转移升级的阵痛。

改革开放30年，广东为全国作出了重要贡献，作出了表率，但从目前来看必须破解科学发展难题，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优化产业结构。必须置之死地而后生，从加工贸易转向自主创新，加快建立以本土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加大研发投入。

“我来广东工作时就遇上了亚洲金融风暴，”李长春说，“当时大家就意识到了产业结构的问题，于是采取了一些措施，大力提高山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等。这次金融危机会让我们认识更深刻。广东已经到了必须破解科学发展难题、调整产业结构的关键时刻。要加快产业转移，实现腾笼换鸟，提高产业层次，把低端产业向山区转移，推动山区工业化程度，实现全省协调发展。”

他要求广东抓好“三个转变”：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主要依靠出口拉动向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转变，推动出口商品结构从以加工贸易为主向以自主创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为主转变，加快广东的产业由低端向高端，建立现代产业体系转变。

## 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广东毗邻港澳，社会思想活跃。李长春十分关心广东的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要求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促进社会和谐。

10月18日，在深圳腾讯公司考察时，得知腾讯网在门户网中流量排前三位、有4500万人在线，李长春很振奋：“我在广东的时候腾讯还没有这么大规模吧？现在互联网产业发展很快，中国人口基数大，农村人口多，企业的发展前景还是很大的。”

接着他特别强调信息安全问题：“对互联网既要看到好的一面又要看到弊端，不能因噎废食，但要加强管理，为我所用，将其作为一块新的阵地来传播先进文化。正因为互联网直接与文化、信息、意识形态、国家安全等紧密相连，因此必须大力支持民族互联网产业。腾讯作为民营企业有完善的党组织，党员比例占12%，应重点支持这样的企业。”

李长春一路走，一路想。10月19日，在东莞拔蛟窝社区的市民学习网络培训基地，他提出，随着信息产业的发展，互联网的监管力度要进一步加强，办网站的标准要提高，防止网络内容低俗化的状况进一步恶化。

在社区三楼的“广东省农家书屋”，李长春走到图书管理员跟前询问：“你对办农村书屋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管理员说：“现在配备的书大都是和农村、农业有关的，但是很多农民现在变成了工人，希望以后能增加工业类、科技类的图书。”据介绍，广东到2010年将建成3万家农村书屋。

下午，李长春在东莞的岭南文化区得知岭南画院和可园博物馆现在都免费对市民开放时，赞许地说："对，要保证人民群众的文化鉴赏权！政府要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李长春欣赏完画展和可园博物馆后仍然余兴未了："岭南画派是全国文艺百花园一朵艳丽的奇葩。有这么一个好的阵地，东莞增加了文化品位。"

考察期间，李长春强调，要充分体现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原则，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为骨干，以基层为重点，鼓励全社会积极参与，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努力建设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 促进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

广东文化产业起步早，发展快。老书记在广东工作期间就十分重视培植文化产业，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广东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文化产业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着力点。李长春此次专门选择了几家大型文化科技公司进行调研。

在深圳华强文化科技集团，董事长李明亮出了"绝活"：介绍公司情况却不用自己动口，而是派出"电子解说员"，在精美的环形幕墙上结合公司特点配置图表和几个电视屏幕，想介绍公司的哪一块情况，相关屏幕上的录像就开启，一位漂亮的女解说员开始图文并茂地介绍起来……

李长春笑着说："这个有创意！"

他对华强的数字电影基地很感兴趣，问是不是拍电影的。

"是拍电影，但是拍特种电影，大都是和旅游、科技等产业相关的。"李明答。

"现在市场情况怎么样？"

"在国内已经卖出了60多套系统，国外出口40多个国家。我们先把放映系统卖给他们，然后他们再购进我们生产的电影，形成了完整的产业发展链。"

李长春还亲身体验"特种电影"，看完连连称赞。

"现在公司在芜湖建立了方特欢乐世界主题公园。去年开园至今，游客量已经超过了黄山等传统景点"，李明介绍说，"这是百分之百中国制造的文化主题公园，以后很多城市都会出现。今后还准备打造类似于迪斯尼打包模式的华强文化科技产业园，将公园、产业基地、动漫基地等合一。"

李长春频频点头："原来以为只有美国才能做这样的事，没想到我们中国人现在也能做到了。原来我在广东工作期间华强就是搞电子配件的，现在发展成可以成套设计供应，在国内外都拿到了订单。真是不得了！"

10月19日，李长春在深圳的雅昌艺术馆饶有兴致地观赏运用现代印刷技术复制的古画和油画等。在交易服务中心的雅昌艺术网，李长春现场查询宋雨桂和关山月等艺术大师的作品拍卖行情，屏幕上马上就出现类似于股票指数的图表，涨跌情况一目了然。

在东莞的广东唯美陶瓷有限公司里，李长春看完绘有诗词、国画的各种马可波罗文化瓷砖后笑着说："这次可对陶瓷大开眼界了。"

董事长黄建平介绍说，现在这种文化砖在公司各个专卖店都有卖，虽然销售比例不到10%，但是通过它，品牌的差异化马上就显现出来了。李长春说："你们这种创新既有科技含量，又有文化，用建筑陶瓷的形式充分展示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很好。中华文化又有了一个新的载体，而且通过你们的产品增强了国际影响力。"

在文化砖烧制前的刀笔书法工作现场，李长春很有兴致地拿起刻刀，在瓷砖上分别写下了"东莞振兴"、"祝愿东莞繁荣昌盛"的寄语。

李长春表示，文化产业具有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发展潜力大等优势，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着力点。要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积极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重塑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改善宏观管理，推进文化创新，努力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和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市场格局，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

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央文明办主任锥树刚，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蔡武，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等参加了考察。省领导刘玉浦、胡泽君、朱小丹、林雄、梁伟发、徐少华和广州市市长张广宁、东莞市负责同志陪同了有关考察。

（岳　宗）

（转自《广州日报》2008年10月23日）

# 习近平

## 在进一步解放思想中推进科学发展

南粤初夏，艳阳高照，满目葱茏。适逢中国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和北京奥运盛会即将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来到广东视察指导工作。随行的还有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晖同志，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高祀仁、赵胜轩、欧阳淞、何毅亭、张晓强、姜增伟、周波等。

2008年7月4日至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华华等的陪同下，习近平一行进工厂、访农家、上码头、下社区，在深圳和东莞两地，对广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进粤港澳合作、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等问题进行深入调研。

4日下午，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专机缓缓驶入停机坪，舱门打开，走下舷梯的习近平一刻没有休息，驱车直奔远在几十公里外的东莞基层。

考察中，习近平对广东充满了感情，他充分肯定了广东的

工作，强调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进一步在解放思想中牢固树立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和谐发展理念；广东等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积极稳妥推进粤港澳合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 广东变化雄辩证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



这是2008年7月4日，习近平在东莞市长安镇乌沙社区居民陈灿亮家中看望。（新华社记者黄敬文摄）

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今年以来，广东人民连续战胜了80年一遇的雨雪冰冻灾害和近期暴雨洪涝灾害，努力克服多重不利因素的影响，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势头，在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的征程上迈出扎实步伐。据初步测算，今年1—5月，全省实现生产总值12951.97亿元，同比增长10.7%；来源于广东的财政总收入4054.17亿元，增长44.2%。与此同时，预计上半年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下降4%和3%以上。

习近平欣慰地说，30年来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历史进程中发挥着窗口作用、试验作用、排头兵作用。广东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定不移地把全省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全面推向前进。

作为前沿中的前沿，珠三角城市源自改革开放的变化无疑是巨大的。7月4日，习近平来到东莞市长安镇，见证了长安镇由过去以“莞草”为生的落后乡村到如今工业发达的现代化城镇的变迁过程。

“全国乡镇中能排到多少名？”“社区的住房都是统一规划的吗？”“医疗保险覆盖率如何？居民收入怎样？”在长安镇乌沙社区，习近平从经济发展到居民生活一一细问，当得知长安镇位于全国千强镇前列，居民生活提前实现高水平小康、拥有完善的社会保障时，他感慨地说，当年深圳刚刚成为特区，站在中英街上，看着香港那边的小高楼，对比我们这边的破烂木板房，非常羡慕。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不仅仅是深圳，珠三角的各个地方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乌沙社区陈屋村村民陈灿亮的家中，习近平亲身感受到这种变化是多么的巨大：480平方米、造价60多万的4层小楼，一家15口四代同堂其乐融融……临行时，陈灿亮年近90的老母亲希望客人能够多来家里坐坐，习近平拉着她的手说："你有一个和睦的家庭，祝老人家身体健康，这样好的家庭环境，我愿意多来啊。"

莲花山下，华灯璀璨，车水马龙尽显城市魅力。虽然天色已晚，但兴致勃勃的习近平仍然想多走一点，多看一些，多感受一下广东改革开放30年来的巨大变化。他深有感触地说："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广东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到人的精神面貌发生的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雄辩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 当前推进粤港澳合作的着力点在服务业

广东毗邻港澳，改革开放以来，这一独特的地理优势对广东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加强粤港澳合作，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广东义不容辞。

习近平在调研中详细了解粤港澳互利合作的情况。在深圳，习近平考察了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威明实业有限公司、虚拟大学园等香港投资或合作项目，每到一处他都仔细询问粤港深化合作的前景和面临的问题。

深圳虚拟大学园是粤港加强教育、科研合作的一个成功案例，7月5日，习近平来到这座"虚实结合"的大学园区。对于大学园致力于复合型人才培养和成员单位高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工作，习近平频频点头，充分肯定大学园的开创性做法。

"什么学校毕业的？什么学历？工作和科研条件怎么样？"习近平在园区中与在场的几位博士研究生深入交谈，当得知众多专业人员来自内地和香港的多所大学，并为深圳和大学园成员单位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时，他非常中肯地指出，大学的文化科技成果应首先惠及所在地区。

"国外消费需求下降，石油等能源以及部分原材料涨价，造成企业生产经营出现一定下滑。"在威明实业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提及了当前部分"两头在外"的港资企业所面临的困难。

习近平说，很多时候面临一道坎，迈过去了就柳暗花明，但卡住了就可能难以翻身。因此，他鼓励企业通过多种方式克服当前困难，并叮嘱随行的地方和部门负责同志要采取措施帮助在内地的港澳企业，为他们排忧解难，坚定他们在广东和内地投资发展的决心和信心。

在盐田港集装箱码头，习近平与大型吊车司机话起了家常，肯定他们为港口

发展作出的贡献，鼓励他们继续提高技术，比学赶帮超。习近平还特别关注港口的环境治理，他仔细询问了港口的排放情况，强调港口的发展和运作不能以牺牲水质为代价。

……

一路调研，一路叮嘱。习近平强调，广东要充分发挥独特的地理优势和与港澳经贸联系紧密等优势，坚持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办事，相互尊重、互利互惠，进一步加大粤港澳合作力度，提高合作水平，开创粤港澳合作新局面，为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要按照突出重点、先易后难、分步实施的原则，务实推进粤港澳合作。当前，要把推进粤港澳合作的着力点放在服务业等方面。

## 广东各级党组织为抗震救灾作出了巨大贡献

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是习近平本次调研的重点之一。前不久，广东省委召开十届三次全会，会上审议通过了《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的决定》。让善于科学发展的人上、不会科学发展的人让、阻碍科学发展的人下，在选人、用人方面，广东正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制定新时期干部考核评价办法。

考察中，习近平了解到广东全省对于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的决心和信心，他对广东的做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也希望广东能够多做探索，为全国提供宝贵经验。他期望广东善始善终地抓好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试点工作，使其成为群众满意工程。

“听说你是村里的老党员？”在东莞村民陈灿亮的家中，习近平问起了村里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情况。陈灿亮自豪地说：“村里人之所以能有这么富裕的生活，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和村党支部的正确领导。”习近平听后非常高兴，他指出，党组织建设对于基层发展意义重大，一定要搞好。

在广东唯美陶瓷有限公司，习近平的印象“颇为深刻”。

“有没有成立党支部？运作情况如何？党员的带头作用在企业运营过程中能够得到发挥吗？”

“我们公司已经成立了党支部，并为党员活动提供专门场所。由于党员的素质比较高，作用一眼就能看出来。”

现场工作人员的介绍让习近平深感欣慰，上车前他还特意询问党员活动室的场地、功能等。习近平强调，抓好基层、打好基础，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经验，也是我们党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的重要保证。

谈到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的作用，习近平说起了今年5月发生的汶川大地震。

在这场巨大的灾难中，各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积极抗震救灾，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广东也有卓越表现，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的风采。

“广东行动很快啊，全省捐款捐物56亿多元，交纳特殊党费数量很大，又是唯一承担了两个对口支援地区任务的省份。”习近平指出，这说明广东充分发扬了大团结、大协作，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广东各级党组织为抗震救灾作出了巨大贡献！

临别之际，习近平深情寄语广东同志再接再厉，乘势前进，在新的起点上做出新的更大成绩，争取新的更大光荣。

（徐林）

（转自《广州日报》2008年7月7日）

# 李克强

## 情牵亚洲盛会

珠江水流光溢彩，广州塔美轮美奂，盛会期间的南国，一派喜庆祥和的气氛。

值此良辰美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莅临广东，出席广州2010年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并就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考察调研。

2010年12月12日至1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华华等陪同下，李克强一行马不停蹄，进场馆、入企业、下田间、看城建、察工业、问物价、访民情，与干部和企业家倾心交流，向运动员和基层群众嘘寒问暖，把党中央、国务院的温暖送到广大群众心坎里。

### 一

以“我们欢聚，我们分享，我们共赢”为理念的广州亚残运会，是亚洲残疾人体育组织重组后举办的首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是中国继北京残奥会后举办的又一国际残疾人体育盛会。



2009年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广东考察。这是2月8日，李克强来到位于东莞的智通人才市场，与在招工信息栏前查询信息的求职青年（右一）交谈。

12日晚，广州2010年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在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隆重开幕，19时58分，在6万多人的热烈掌声中，李克强走上主席台出席开幕式。

夜幕降临，和着梦幻般的天籁之声，多媒体影像将开幕式场地染成一片蓝色星海。运动员的顽强，盲童的梦，聋哑儿童的手语之舞，残疾儿童妈妈的爱……一个夜晚，人和人的故事贯穿始终，人们就这样一次又一次被感动。

21时21分，李克强用洪亮的声音宣布：广州2010年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开幕！顿时，璀璨的礼花绽放夜空，将夜色中的奥林匹克中心装点得格外绚丽。全场群情振奋，宏伟的体育场沉浸在一片喜悦之中，欢庆这个亚洲残疾人的盛大节日。

李克强高度评价了广州亚残运会开幕式，指出亚残运会开幕式精彩纷呈，让人震撼。亚运会的成功举办，反映的是我国经济繁荣发展的巨大成就；亚残运会开幕式的精彩，反映的是我国社会文明进步的巨大成就，充分展示了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全社会人道主义精神，充分展示了广东、广州人民的友好风范和深情厚谊。

广州莲花山南麓，一座背山面海的亚运新城拔地而起。13日上午，李克强来到亚运城，考察运动员村和综合体育馆，看望参加亚残运会的中国代表团和部分中外运动员、志愿者。

在亚运城沙盘前，广州市副市长许瑞生告诉李克强，亚运城占地面积2.737平方公里，分为媒体村、媒体中心、运动员村、后勤保障区、技术官员村、综合体育馆、沙滩排球场和亚运公园等8个区域。亚残运会结束后，亚运城将转为娱乐、购物、餐饮、医疗、中小学等各项公共设施一应俱全的高品质示范性生活社区。

赛时亚运城，赛后宜居城，得知亚运城赛后将成为容纳百万人的“广州新城”启动区，没有一栋建筑赛后会没有用，没有一座场馆赛后会浪费时，李克强十分满意，称赞亚运城将赛时服务与赛后利用充分结合起来的设计方案非常巧

妙。

鲜花与绿树把运动员村装点得格外清新宜人，李克强走进运动员村看望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看到屋内窗明几净，还专门配备了残疾人生活设施，李克强连连称好，感叹“这里的住宅档次真够高的”。他对坐在轮椅上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吕世明说：“昨晚攀岩点燃开幕式火炬的场面让人们心灵得到震撼，拿到了精神文明的金牌，为国家和民族赢得了荣誉。”

李克强随后来到综合体育馆，看望正在训练的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等国运动员。“在广州感觉怎么样?”“生活习惯吗?”李克强与坐在轮椅上的运动员亲切交谈，祝愿他们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在亚运城，将微笑挂在脸上的志愿者随处可见，他们热情周到地为来宾提供无微不至的服务。临走前，李克强与志愿者欣然合影，称赞他们为亚运会和亚残运会的成功举办作出了很大贡献，体现了志愿者精神，体现了广州的无疆大爱。

## 二

通过举办亚运会，广州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广州的城市建设，是李克强此次调研的一个重点。

红花招展，绿竹摇曳，在初冬薄雾的笼罩下，花城广场越发令人心旷神怡。13 日一早，李克强兴致盎然地来到广州未来的“城市客厅”察看城市建设情况。

广州市政协副主席、规划局局长王东告诉李克强，位于广州城市新中轴线珠江新城核心节点的花城广场，总规划占地面积约 56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50 万平方米，是广州目前一次性建成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地下空间开发项目，规划定位于广州市未来的城市客厅。

李克强特别关心广州市民的生活质量，他与在花城广场散步的市民攀谈起来：“现在广州市的环境怎么样?”市民王女士满面春风地回答：“广州现在天更蓝、水更清、路更宽、房更靓、城更美，我们很自豪。”

“举办亚运会，人人都是东道主，个个都是志愿者，亚运的成功举办靠的是大家的共同努力。前段时间，广州市民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现在环境好了，城市更美了，生活水平也提高了。”李克强说，通过举办亚运会，广州不仅提升了知名度，对市民的凝聚力也提升了，实现了“十年一大变”的目标，也说明“迎接亚运会，创造新生活”的观念深入人心。希望广州重视搞好“后亚运”时期的城市建设与管理，继续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成果，并在全省范围内总结、推广各地城市建设的好经验、好做法，推动城市建设再上新台阶，让城市建设管理更持久地惠及更多的人民群众。

李克强随后兴致勃勃地乘坐地铁去亚运城。

广州地铁工程从1993年开始动工建设，目前已建成开通广州地铁一号线、二号线、三号线、四号线、五号线、八号线、珠江新城旅客自动输送系统、城际交通广佛线等8条线路，共236公里。根据广州地铁线网建设规划，2011年至2020年，将增加12条线路，线网总里程将达到663公里。至2015年，广州地铁将累计建成开通473公里线路。

一路上，李克强详细询问广州地铁建设情况。“广州修建地铁使用什么核心技术?”“每天有多少人乘坐地铁?”“地铁站周围有没有停车场?”“每公里造价多少?”“换乘方不方便?”……得知广州从地铁二号线开始就是依靠中国技术自主修建，日均输送旅客最高达到800万人次，换乘非常方便时，李克强连连称好。他称赞广州地铁的服务非常规范，并叮嘱广州进一步完善城市交通网络，提升市民的生活幸福指数。

## 三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物价水平和食品安全，是李克强心里牵挂的大事。

13日下午，李克强来到清远市清城区莲塘经济合作社蔬菜基地查看蔬菜生产和供应。2007年，莲塘村组建了蔬菜专业合作社，以“自愿参加、自由退出、风险共担、资源共享”为原则，建设以叶菜、瓜类、豆类等品种为主的连片蔬菜种植基地。合作社为种植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技术、信息，指导组织产品的销售。

菜畦碧绿，蝴蝶翩跹，菜农在肥沃的土地上繁忙地耕作。李克强踏着泥泞的田间小路来到菜田深处，与一位正在种植荷兰豆的菜农聊开了。

李克强详细了解菜农的种植、销售和收入情况，得知菜农今年人均年纯收入达8000元，比去年增加约2000多元时，李克强非常高兴，风趣地用广东话祝愿菜农“恭喜发财”。他叮嘱在场的清远市干部要帮助广大菜农提升种植水平，扩大销售渠道，确保市场供应稳定和农民增收。

走出菜田，李克强发现不远处有人在往卡车上搬运蔬菜，他快步走上前去，与他们攀谈起来。原来，这是合作社负责收购和销售的工作人员。

“这些菜直接进超市吗?”李克强问。“不是，我们先卖给一个批发商，他再卖给超市。”“菜价怎么样?”“我们以七毛钱收购，卖给批发商一块二，超市卖一块八。”“将来你们做大了，就可以直接进超市，利润就高了。”李克强勉励合作社工作人员确保食品安全，打响绿色、有机、无公害品牌，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带动农户致富。

随后，李克强来到双汇食品有限公司考察。这是河南双汇集团在华南地区设立的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企业，公司引进具备世界领先水平的屠宰、分割生产线，日单班屠宰能力2500头生猪，日产高低温肉制品80多个品种，200多个规格。

李克强十分重视、关心食品安全。在生产车间、产品展示厅和理化室，李克强详细询问涉及食品安全的生产细节："是在高温还是低温环境下加工?""理化室主要检测哪些指标?"看到公司"十八道检验，十八个放心"的广告标语时，李克强对公司总经理余松涛说："应该改为'十八道检验，一百个放心'。"幽默的话语一落，笑声一片。

工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牵动着李克强的心，在考察过程中，李克强不时与工人们亲切交谈："你是哪里人?""一个月收入多少?""在广东生活习惯吗?"言语间流露出深深的关切之情。

临走时，李克强语重心长地对企业管理者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大于天，食品生产经营者依法负有保证食品安全的社会责任，必须充分认识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性，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影响食品安全的细节，使人民群众吃得放心、吃得安全，打造品质质量最好的肉类产品国际品牌。

在视察途中，李克强仔细询问了广州、清远等地的房地产价格及公租房建设情况，要求做好房地产的调控工作，真正解决住有所居的问题。

## 四

李克强非常重视信息产业的发展。13日上午，他来到位于广州大学城中心区的国家数字家庭应用示范产业基地考察。

该基地于2009年1月由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广东省、广州市和中山大学等合作建成。在基于家庭电力线的家庭网络研发方面，已研发出经济原型和经济型家庭网络，今年8月被审定为广东省数字家庭战略新兴产业基地。

番禺区区长楼旭逵告诉李克强，基地突出了以数字电视、家庭网络、数字生活为核心的数字家庭概念，第一代研究互动高清的数字电视；第二代研究四网整合的数字家庭网络，将通常说的三网与电力网整合在一起；第三代研究普适应用的数字生活。

四网整合引起了李克强的浓厚兴趣："今后进入家庭就只有一条线?""将互联网、电信、电视和电力线全部整合在一起，在家里形成一个独立的网，只要一个智能盒就够了。"楼旭逵答道。"智能盒要多少钱?""现在装一套要上千块钱。"李克强听后称赞说："电力线里面包着光缆一块进入家庭，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可以少铺一道线路。"他指出，数字服务在西方国家已形成很大的消费空

间，我国必须积极拓展。数字化应用要从终端消费者开始，先让老百姓享受家庭网络。目前三网融合发展很快，竞争也很激烈。希望广东在这方面继续创新，造福百姓，造福国家。

情牵亚洲盛会，意暖一枝一叶，李克强暖人心田的问候和嘱托，为正在举办盛会的广州，为正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当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排头兵的广东增添了无穷的信心与动力。

（周志坤　岳　宗）

（转自《南方日报》2010年12月15日）

# 贺国强

## 要向党和人民交一份明白账、放心账

2008年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在广东考察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以认真的态度、扎实的作风和有力的措施，切实加强对中央关于做好当前经济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提供有力保证。

冬寒不近南粤地，山清水秀盎生机。2008年14日至18日，贺国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省长黄华华等陪同下，深入广州、梅州、深圳等地农村、企业、社区调研，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了解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广东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考察期间，贺国强专程瞻仰了位于深圳莲花山公园的邓小平同志塑像、参观了梅州叶剑英同志纪念园及故居并敬献花篮，深情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在展示改革开放形象的深圳湾口岸，在见证改革开放成就的深圳北头社区，在浓缩改革开放历史的深



2008年11月16日，贺国强在深圳市南山区北头社区了解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服务情况。（新华社记者庞兴雷摄）

圳渔民村，贺国强亲切地与干部群众交谈，他说，30年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指引、以解放思想为先导、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15日下午，贺国强来到“金柚之乡”梅县考察农村改革发展情况。在雁洋镇南福村，贺国强拉着77岁的老党员黄生贤的手，询问他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村民黄开田的柚林清香扑鼻，沉甸甸、金灿灿的柚子挂满枝头。贺国强兴致盎然地和黄开田一起采摘金柚。“今年能产多少斤?”“10万斤!”贺国强高兴地说：“柚子丰收了，但还要争取卖个好价钱。”他叮嘱当地干部，要认真落实中央各项强农惠农政策，积极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农资配送和储运销售等一条龙服务，推进农产品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市场化运作，真正发挥出特色农业资源优势，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繁荣。

近来，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已经显现，贺国强对此非常关注。珠江新城富力中心，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琶洲展馆，京信通信系统（中国）公司，广州威凯检测技术研究所，梅县荷树园电厂，研祥智能科技公司……每到一处，贺国强都仔细询问生产建设和运营情况，充分肯定广东各类企业顶住压力，坚定信心，加快自主创新、全面提升市场核心竞争力的做法。在杜邦中国公司深圳分公司，他鼓励外商坚定在中国投资的信心，并对陪同的省、市负责同志说，你们可找外资企业开座谈会，听取他们对克服困难的意见和建议。他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决策部署，加大投资力度和优化投资结构，着力扩大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18日上午，贺国强听取了广东省委、省政府、省纪委以及深圳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汇报，对广东省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恢复重建3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当前特别要紧紧围绕扩大内需、改善民生、保持经

济平稳较快发展，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会同有关部门切实搞好五个方面的监督检查：一是加强对中央政策措施在各地各部门落实到位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政令畅通；二是加强对工程项目规划、立项的监督检查，确保项目建设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中央的有关规定；三是加强对工程项目审批和建设程序的监督检查，确保工程项目建设依法合规进行；四是加强对各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向党和人民交一份明白账、放心账；五是加强对扩大内需工程建设质量的监督检查，坚决杜绝“豆腐渣”工程。

考察期间，贺国强还看望了省纪委监察厅机关干部。

（李亚杰）

（转自《人民日报》2008 年 11 月 19 日）

# 周永康

## 为大家创造更加温馨、方便、安全的环境

立秋已过，但9月的南粤大地仍是绿意盎然、满目繁盛。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喜庆渐行渐近，澳门回归10周年的辉煌即将来临。

2009年8月31日至9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来到广东，针对经济发展、社会管理、民族团结等题目进行考察调研。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的陪同下，周永康先后来到佛山、韶关、广州等地，深入工厂、学校、街区、农户，面对面倾听来自最基层的声音，切实了解群众最真实的想法和需求，并给在粤工作学习的新疆少数民族同胞送去党中央的亲切关怀。

周永康希望广东发扬敢为人先、开拓创新的精神，肩负起“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的历史使命；落实好稳定这个“硬任务”和“第一责任”，全力做好维护稳定各项工作，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创造欢乐祥和的社会环境。

# 一



2008年9月1日下午，周永康视察广州市登峰街境外人员服务管理站，了解该站工作情况。

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即将到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周永康格外关注那些为了革命和建设事业付出艰辛努力的老共产党员，格外关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格外关注在广东打工、生活的外来务工人员。

8月31日，周永康来到佛山棉纺厂老党员林修的家中，亲切慰问这位1946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同志。

“身体好吗？儿女孝顺吗？”周永康与林修老人促膝而谈，详细询问老人的生活情况。

林修老人非常感动，她告诉周永康，虽然现在80多岁了，但积极参加佛山市关工委的工作。家里小孩的教育也都很好，工作努力，非常孝顺。

周永康听了很开心，他深情地说，新中国是无数革命志士和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你们这一代人经过艰苦奋斗、付出巨大牺牲得来的。党中央、国务院不会忘记，我们世世代代也不会忘记，要特别珍惜这一切，要努力巩固这一切。也希望各级党委、政府牢记宗旨，多为老百姓做好事办实事，使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我代表佛山所有的老党员、老干部谢谢您的肯定和鼓励。”林修老人握住周永康的手说，现在我所在的党支部每个月都过组织生活。最近，我们党支部要召开畅谈新中国成立60周年伟大成就的组织生活会，我一定把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问候传达给每一个老党员、老干部。

9月1日，周永康来到韶关马坝镇圳背村，考察粤北新农村建设和农业生产情况。圳背村位于曹溪河畔，与佛教禅宗祖庭南华禅寺隔河相望。圳背村的村民们利用这独特的旅游资源，探索走出了一条农业与旅游业紧密结合的发展新路子。

吴玉红是圳背村小组副组长，他在平时的生产生活中充分发挥致富带头人的作用，率领全村父老勤劳致富。在吴玉红的家中，周永康认真了解吴家的收入来源、子女的读书工作情况以及村里的治安情况。

当看到吴玉红家中各种电器、自来水设施一应俱全，还有太阳能、沼气、煤

气等三套能源设备轮番使用时，周永康十分欣慰地说，我们要继续努力，让农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滋润，要进一步统筹城乡发展，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9月1日下午，周永康又来到湖南籍外来工许冬来的出租屋中，了解外来工在广州打工、生活的情况。他强调，我们要看到外来工为城市发展作出的贡献，要为外来工的工作、居住、子女受教育创造更好的条件。

## 二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如何加强、改进社会管理和服务，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周永康此次考察的重点之一。

9月2日上午，周永康召开座谈会听取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和维稳综治工作的相关汇报。周永康强调，要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新疆考察工作时的重要讲话和全国维护稳定暨信访工作第二次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加强社会管理，坚持先富帮后富、促进共同富裕，增进民族团结，携手共建更加和谐美满的社会主义大家庭。

在佛山考察时，周永康来到顺德区北滘派出所、南海区桂城街道综治信访维稳中心，与前来办事的群众及基层干警亲切交谈，并接过工作人员手中的当月案卷，仔细查看案件记录。周永康高度评价了广东基层派出所以公安“三基”工程建设为契机，以“五个一网”为抓手，突出做好信息化建设和服务的工作；也充分肯定了综治信访维稳中心整合资源、便利群众、形成体系、主动下访，从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做法。他希望广东进一步开拓创新，最大程度方便群众，最大限度把矛盾化解在当地。

作为对外开放最早和开放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广州市的外籍人员越来越多，如何做好外籍人员的服务和管理成为政府社会管理的一个新课题。9月1日下午，周永康来到外籍人员生活和工作较集中的广州金麓山庄小区和中非商贸城，与工作、居住在这里的外国人亲切握手，拉起了家常。

“在广州都做些什么？生活方不方便？”

“一直在做小商品交易，利润很高，广州的生活非常好。”

“住的条件怎么样？治安好不好？”

“好，非常好！没出过事。”

听了外国居民的回答，周永康衷心地祝愿他们生意兴隆、生活幸福。

在登峰街境外人员服务管理站，有一位来自尼日利亚的青年义工名叫艾克，他娶了一位中国姑娘，并即将升格为“爸爸”。周永康听说后，高兴地对艾克说：“祝贺你啊。”

看着广州社区内中外居民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周永康深有感触地指出："近年来，国外来华经商、学习、生活的人员不断增多，这是个新情况，希望广东积极探索，依法管理、优化服务，为大家创造更加温馨、方便、安全的环境，实现中外居民和谐相处。"

在广州矿泉街瑶池社区流动人员和出租屋服务管理站，周永康还详细了解房屋的租赁和管理服务情况，考察社区治安状况。他要求有关方面不断创新理念、机制和方法，努力实现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的人性化、社会化和信息化。

## 三

广东作为对口支援新疆的省份之一，在加大对新疆投资的同时，也吸纳了很多新疆少数民族同胞来广东工作、学习。周永康对这些在粤工作学习的少数民族同胞非常牵挂。



周永康视察美的集团，深入了解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企业的发展情况。

8月31日，周永康专程驱车3个多小时来到韶关旭日玩具厂，视察新疆少数民族员工的宿舍、生产车间，与他们共进晚餐，并连夜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方面意见。

"吃得习惯吗？在广东生活适应了吗？与家里有联系吗？"周永康走进员工宿舍一一细问。

"开始不太适应，现在好多了，吃得也都好。一个星期还能跟家里通两次电话。"来自新疆疏附县的维吾尔族员工努尔买买提·库尔班回答说。努尔买买提·库尔班不太会说普通话，听着新疆驻韶工作组负责人古丽娜·肉孜的翻译，这个腼腆的小伙子不时笑一下。

"你长得很英俊啊！来，大家一起合张影。"周永康拉着少数民族员工的手一起坐在床上，快门声响，小伙子们纯朴的笑容被记录下来。

在生产车间，周永康向多位少数民族员工询问生产生活情况。

"现在的旭日玩具厂，有的少数民族员工一个月能拿1500多元钱，自己留500元，往家里寄1000元钱。"

周永康听了非常开心，他勉励在场的少数民族员工说："你们是到这里创业的第一批人，要好好努力，以后的前途是光明的。"

随后，周永康走进厂区的清真餐厅，端着餐盘与员工们一起打饭，一同进餐。大家边吃边聊，长长的食堂餐桌上不时传出轻快的笑声。少数民族员工们告诉周永康："工厂安排了夫妻房、少数民族厨师，我们现在能吃上家乡可口的饭菜，生活逐渐习惯了。"

在8月31日晚上召开的座谈会上，周永康非常欣赏维吾尔族员工代表和汉族员工代表的发言："在新疆，各民族历来像一家人一样平等、团结、和睦地生活在一起"；"能与各族员工共事是一种缘分，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我十分珍惜这种缘分"。

周永康欣慰地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大家在一起工作要加强交流、相互帮助，学好技术、掌握本领，做发展和创业的开拓者。

9月1日，周永康来到广州百年名校广雅中学，与该校新疆内高班的孩子们一起谈生活、谈学习、谈理想。

周永康对孩子们说，中央决定举办新疆内高班是一个战略性的重大决策，是促进我们各民族大团结、大融合的重要举措。希望你们过好语言关、生活关，珍惜机会，发愤学习，努力成为中华民族的英才，成为维护民族团结的模范、促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骨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建设者和捍卫者。

在工厂和学校的时光是欢快的，离开时所有人都依依不舍，员工和孩子们美好的理想让未来充满了希望。

当天下午，周永康在与广东有关企业负责人座谈时着重指出，在改革开放初期，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大局，现在先富地区帮助欠发达地区发展也是大局。广东作为东部发达地区，各级党委政府和企业都要深刻理解和贯彻小平同志"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既要努力解决好省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促进全省协调发展，又要进一步增强支援新疆等西部地区发展的自觉性和责任感，为我国东西部地区协调发展多作贡献。

## 四

考察期间，周永康听取了省委、省政府的工作汇报。他说，党的十七大以来，在以汪洋同志为班长的省委领导下，在历届省委、省政府工作的基础上，广东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取得了新成绩。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措施有力，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发展动力持续增强。社会事业不断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维稳工作扎实有效，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干部群众团结一心，精神状态积极向上。这一切将极大地增强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国际金融危机、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信心。

周永康指出，广东是经济大省，又是人口大省，尤其是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

多，既要确保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又要确保社会稳定。在新的阶段、新的起点上，广东要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改革管理体制，创新管理手段，积极探索社会化和信息化管理的新路子，不断提高社会整体管理和服务水平。

周永康特别希望广东在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的同时，抓好稳定这个“硬任务”，落实好“第一责任”。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今天遇到的问题，全国其他地方明天将要遇到。广东是先行先试的试验区，在抓好社会稳定工作方面也要当排头兵。”“希望广东的社会稳定工作能够落实再落实、加强再加强，不断创造对全国都有借鉴意义的新鲜经验。”

周永康的话令人振奋，令人鼓舞，警钟长鸣。

中央有关部门领导鲍绍坤、穆虹、黄明、姜增伟，广东省领导黄华华、朱小丹、梁伟发、徐少华等陪同考察。

（徐　林）

（转自《南方日报》2009年9月4日）

# 后　记

在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中共名人在广东》一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该书收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80位中共名人在广东工作、战斗、生活的故事共87篇，约60多万字。全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前辈风采篇”，选用中共名人上世纪20年代初至1978年在广东的故事；第二部分为“改革风云篇”，主要选用中共名人1978年至2002年在广东的故事；第三部分为“科学发展篇”，主要选用我党重要领导人2002年以来到广东指导、视察的故事。文章来源有四：一是选用由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管主办、全国发行的《红广角》（原名为《广东党史》）杂志发表过的文章；二是选用由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广东党史资料》（丛刊）刊载过的文章；三是约请党史专家、学者和部分热心于党史研究的社会各界人士撰写的文章；四是选用国内报刊发表过的一部分文章（主要是记述党的重要领导人到广东指导和视察工作的特写）。

本书的编辑主要突出反映中共历代名人（领导人）在广东的激动人心的战斗经历和生动的革命故事。风格上力争达到生动、形象、可读性强，大部分采用纪实叙事体，但也有小部分属传略性文章。为了统一体例，适合于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阅读，编者对所收入的部分文章，在文字和结构上作了一定的删减和调整。全书收入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力争做到图文并茂。

该书编委会由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班子成员和有关处室的领导组成，室主任陈俊凤任编委会主任，陈弘君、杨汉卿、李淼翔等室领导担任副主任，编辑出版处处长、《红广角》杂志主编王国梁担任主编，编辑出版处的同志承担具体的编辑工作。

该书的编写工作从去年4月开始，今年3月作者完稿上交。在一年多的收集资料、组织策划和编辑的过程中，本室领导陈俊凤主任、杨汉卿副主任亲自开会部署；在紧张的编辑出版过程中，编辑出版处的王国梁、游慧冰、张丽红、郑家雄等同志认真负责、加班加点、精益求精，本室兄弟处（室）的同志大力支持、

协助，大家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许多老同志、专家学者、各市县（区）党史部门和党史工作者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与帮助，在此，我们表示真诚的感谢！

由于此书所涉及的人物和史实较多，历史跨度大，再加之编辑视野和水平有限，可能存在错漏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1 年 5 月 6 日

# 致　谢

《中共名人在广东》一书参阅了许多党史书籍和文章、大量档案材料。因篇幅关系，未能一一在书中注明。对原作者和档案收集整理者的辛勤劳动以及对我们的大力支持，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　者**

**2011 年 6 月 25 日**



# 中共名人在廣東

ZHONGGONG MINGREN ZAI GUANGDONG







上架建议：历史类

ISBN 978-7-218-07175-6



定价：90.00元